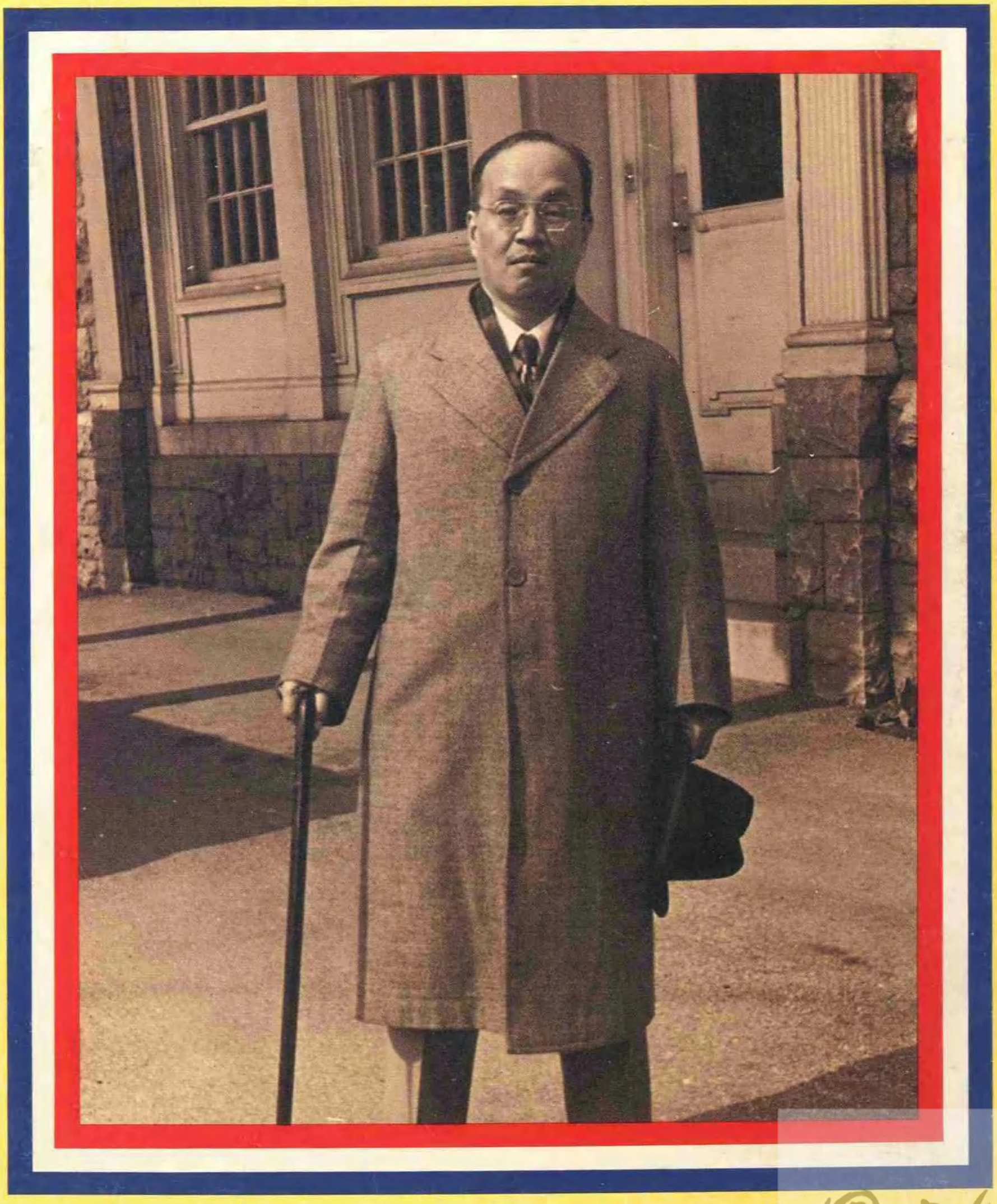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七輯

民憲半月刊(二)

陳正茂　編



國史館印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七輯

陳正茂　編

民憲半月刊

(二)

國史館印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民憲半月刊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七輯

民憲半月刊：第一卷第九期至第十二期
第二卷第一期至第三期

國史館印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民憲

第一卷　第九期

短評三則　舜生

一、參政會大會閉幕以後　二、關於獻金獻糧

三、冷靜！沈著！

兩時代人權運動概論　張君勱

民主政治與非民主政治　陳啟天

婦女對憲政的認識　劉清揚

甘地眞納會談在印度復國上之意義　孫寶毅

馬來亞的政府　張禮千

歐洲人民需要的是什麼？　費穆譯

登陸部隊背後的人物　君適譯

萬竹樓隨筆（六則）　舜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正和銀行

△促進戰後建設　△發展社會經濟

存款便當　手續敏捷

營業項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押匯　儲蓄

及其他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利息優厚　匯費低廉

△扶助後方生產　△增公益羣衆福利

總行：重慶林森路二一〇號
電報掛號：二三二六號
電話：二一六一四號
儲蓄部：地址：太華街八號
分行辦事處：昆明　康定

四川絲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三仟萬元

總公司：重慶民權路一一〇八號　電報掛號九十二號　電話四一七八六

辦事處：南充關子場七六號　電報掛號三台　電話八二八

製種場：北碚三台　巴縣鄧中　南充西充　豐亭仁和場

製絲廠：磁器口第一廠　三台第二廠　五廠　國中第七廠

冷藏庫：重慶李子壩　北碚上場　南充平地門

主要成品：改良蠶種　改良生絲　絲棉　絲筋

安康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利息優厚　信用穩固
匯兌迅速　手續敏捷

各地辦事處：太和鎮——太和鎮正北街
中三——中壩北大街
三匯——三匯林森路

總行：重慶林森路四五號
電話：四一四四八
電報掛號：四一四四

金城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及各種儲蓄存款

各分支行處所在地

重慶成都自流井昆明瀘縣桂林柳州梧州西昌貴陽貴州長沙衡陽辰溪沅陵

廣山都井明縣林州州涼安中雞陽沙陽諸陵遠

重慶分行

地址：陝西路第229號
電話：42362號（經理室）
42363號（營業室）

民權路辦事處

地址：民權路新生路
電話：42041號（營業室）
41269號（經理室）

兩路口辦事處

地址：中三路（兩路口）2號
電話：2072號

沙坪壩辦事處

地址：沙坪壩正街19號
電話：6259號

信託分部

地址：民族路137號
電話：41615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短評三則

舜生

一、參政會大會閉幕以後

最近國民參政會第三次第三屆的大會，於九月五日開幕，十八日結束，依據新改的條例，比較往年多開了四天。因爲會場發言的熱烈，對於許多重要問方面，確實作了若干嚴正的檢討，也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建議，因此頗博得社會的好評，也提高了一般民衆對於政治的注意和興趣，我覺得這個現象是很好的。

可是，經過了這番熱烈的檢討和建議以後又怎樣呢？我們只客觀的態度，就這些檢討和建議再作一番推敲，覺得真正關到若干主要問題的核心的觀點仍然不算太多，但即就這次所表現的一般情況，已經充分可以使政府了解全國人民現在所有的一種怎樣的情緒。

現在的國民參政會以現代民主國家的尺度衡量起來，自然還不能算一個眞正代表民意的機關，可是，截至現在爲止，它至少已經是一個有力的輿論機關了。一個民主國家，或一個準備走上民主軌道的國家，無論如何，她的一切措施畢竟不可忽視輿論。如果已經有了有力的輿論，而政府仍不能予以充分的注意，因政府在施若干重要的措施上，可能遭遇意外的困難，這是無疑義的。

勝利的到來，還需要相當的長時間，還需要比過去若干年更艱苦更激烈的鬥爭，這是很顯然的事實。只有不違背人民的心理，不忽視人民的要求，才能領導人民共同奮鬥，也只有時時把人民抗戰的情緒緊張起來，才可以希望不關出任何一種不必要的岔子，在這一點上，我們很盼望有責任的方面，應該時時留意。

二、關於獻金獻糧

從第三屆第三次的國民參政會大會，叫出了一片改善官兵生活待遇的呼聲，參政員既是一致主張，政府當然也欣然同意。因此，由財政糧食兩部所草擬的一套關於獻金獻糧的辦法，便已提出了參政會駐會委員會的議事日程。財糧兩部草案的內容，以及駐會委員所提出的意見，現在還沒有到公布的時候，我們現在只想對這件事就原則上提出若干應該注意之點。

一、改善官兵生活待遇，勢在必行，因此要有錢的拿出錢來，當然是天經地義。

二、關於增加人民負担的事項，以往幷不提出參政會討論，這一次政府自動的提出來了，雖說時代使然，要亦有之少民主的意義。因此參政會似乎更不能不慎重將事。

三、在獻金的辦法中，除掉一般的獻金以外，更有徵借國人在國外存款的一項辦法，國人在外國銀行的存款總該很多，即以大家所公認的三萬萬美元而論，如以黑市的兌價計算，則所值在法幣七百萬萬元以上。海外的華僑和若干與對外貿易有關的公司行號，大概只佔這筆存款的一小部分，其餘一大部分，則屬於私人。當這個抗戰已到第八年，國內已陷於民窮財盡的苦境，國人中居然竟有少數富翁，敢公然以這樣大的一筆款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子存在外國，不能不說是相當的駭人聽聞。這一次政府既定出辦法要動用這一筆錢，假如弄到最後出錢的依然只有國內二三等的闊人，而頭一等的富翁却依然一毛不拔的面團團滑搖於海外，這不僅在公平的原則上講不過去，即政府自身在威信的一點上，似乎也值得相當考慮。

四、不單只要有錢，有了錢以後還要注意如何用。以往對於官兵的待遇誠然是不好，可是就是不好的這一點點，也正未必能夠使官兵們完全得到。假如這一次相當改善以後，依然不能十足的使官兵們確實到手，這便不是參政會提倡改善官兵待遇的本意。

五、參政會是戰後才有的一個機構，它的地位應該是一面贊助政府，一面代表人民。今日政府所望於的人民的是徵實徵購以外的糧，是募債加稅以外的款金，是普通兵役以外發動十萬知識青年從軍。我們認定這些都是所謂義不容辭，人民惟有勉力應命，參政會也惟有謁誠贊襄，可是今日人民所望於政府的又是什麼呢？我們想參政員諸位先生也決不會不加以考慮吧。

三、冷靜！沈着！

民主政治是講理的政治，不完全是講力的政治，是應該沈着應付的政治，決不是鬧意氣的政治，是一種比較中和的政治，決不是各走極端的政治。因此無論在朝在野，對於若干重大問題的認識與處理，必須以冷靜沈着的態度出之，決不可流於意氣用事！

當一個國家已經陷在危急存亡的時候，一般民衆不免有些致急，這是無可避免的；因發急甚至而流於發狂，歷史上也不乏這種先例。假如朝野的領導人物，處在這樣一個嚴重的關頭，不發揮自己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好好的去理會民衆的心情，而只是一味的推波助瀾，一味的加以超越理性的高壓，這是可能造出重大的過失的。

中國今天需要若干有智慧的政治人物，他們的頭腦要比較的冷靜，態度要比較的客觀，對國家民族的觀念，更要十分的強烈；其自身對於當前的利害，最好是能夠站得遠一些，對若干重大問題的認識與處理，又確有其眞知灼見；既不願爲任何一方面的隱聲蟲，也決不輕於有所左右袒，尤其要緊的是還要有一種比較高深和超脫的懷抱，一種於公正的原理，還要有一種大胆敢言的勇氣，則庶幾他們所提出的主張，可以得着多數人民的共鳴，可引起一部分有識量的責任者的考慮，而國事也才可以庶幾有希望不至敗壞於冥冥！

時候眞是時候了，可是我們可個多麼多麼的國家究底有不有這樣的人物呢？假如有的話，眞是「爲，[illegible]」啊！

兩時代人權運動概論

張君勱

歐洲近代史之演進，與吾國舊歷史之以一姓興亡與政王敗為終始者，有其絕然不同之點，即歐洲三四百年來之變遷，有一種明顯之意義照耀於其前進之途上，是為人之發見，或曰人權之擴充，或又曰人權之普及。始也稱王稱帝者一人之獨斷獨行，繼也為少數貴族或中產階級之特權，更進焉為全國人民同享有政權與生存權。是所謂人格人權，本私之於一人者，由漸擴充，以至於為全國人所共享有，而後為能充類至盡矣。

所謂人之發見，或曰人格之擴充云者，就歐洲言之，第一步脫離中世紀天堂觀念，回至人生本位，人之本務何在，人之理知情感如何，所以保障各人之獨立地位者何在，實為文藝復興以來歐人在政治上學術上一貫追求之目的。夫知人所以為人矣，而人之特長，不離乎知識，上自天文，下至物理，中為人事，無一不在研究之列，是為科學之進步，亦即為人智之進步。然自宗教傳統之目光言之，未嘗不以人智為誕妄不經，阻止之，妨害之，而對於教會方面乃有思想自由學術自由之爭，此類障礙先掃除，而後學術思想乃有客觀標準以為徵信之符矣。然而人民之權利，尚未確立焉。人類同處社會之中，其官骸不殊，而地位之高下，發言之大小，權力之強弱，自有霄壤之別，於是為之求一最小限度之保障者，而人權運動以興。曰人類生而自由，曰人身自由不得加以限制，曰各人有思想言論之自由，曰各人為共同活動計，有集會結社之自由，曰各人有選舉與參政之權利，曰各人之設案，除獨立法廷之審判外不受他人干涉，凡此種種者，皆所以擴失意法之規定，以完成其人民之資格，反是者政府視其人民，蓋如鹿豕，生殺予奪，惟所欲為，即令人民俯首帖耳，而政府之所以行使其權力者，恣睢暴戾，雖欲長此自居於「天王聖明」之地位，安可得乎。故人權運動者所以保障人民之地位，亦即所以使政府之不至為虎狼。此百餘年來歐美良政治之所由來也。

歐洲近代史，由文藝復興以降之人之發見後，有宗教革命，其所爭者為信仰之自由為良心之自由。各人於其所信奉宗教中之禮典儀節與其解釋方法，其自身為其最後決定人。譬之，中世紀時，一部耶教聖經，惟教皇與教會組織獨有解釋其文義之權，至於他人不得妄贊一辭。自新教確立以來，各人對聖經，可各加以注解，又按之舊例，教堂之中每懸耶穌聖像，近世反對之者則信與不信，不關於像之有無，而在乎默坐澄心以自通於上帝。此即宗教派別上之爭執，乃生信仰自由之要求，然其解釋權既操於各個人之手，則人之尊嚴，自在聖經之上，亦即一國中無一種傳統得以長久束縛人心，而後人之最高價值乃以確立。此宗教革命所以為人格運動人權運動之先驅者一也。

夫各人之良心，既可以判別宗教之是非，則世間任何是非，有何一事不應隸屬於良心之下，而良心之所以為良心，在乎辨理，在乎理性，於是不論其為哲學為科學，一以理性為根據，故笛卡兒氏之所謂「我思故我存」，即謂世間任何事物皆在可疑之列，獨我之思不能懷疑，而同一，相反，排中等律，遂成為人類知識之出發點，其推而廣之者，謂知識應以經驗為根

Academia Historica

據，應以歸納爲方法，然其不離乎邏輯之基本原則則一也。以其理性應用於天文，物理，人事，於是有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成立。由人類知識以窮極宇宙秘奧，而人類崇高之地位，亦因之而確定。此則哲學上科學上之發見，又爲人格運動人權運動之先驅者二也。

以上所述，爲宗教革命與哲學科學之產生對於人格運動與人權運動之關係，然尚未及於政治本身也。宗教革命後，良心之尊嚴因以確立，哲學科學發展後，人智之威力因以承認，由此推廣以及於政治改造，則爲人權運動。此人權運動起於對當時專制帝王與貴族之反抗，其所依據之理由曰社會契約，謂人民相結合以成爲國家，由於各人之同意，惟國家成立出於人民同意，故政府權力，不得超出人民同意範圍之外，其所當有事者在乎保衛與發展人民利益。此社會契約論之精意所在也。當時參加此運動者有霍布士、陸克、盧騷、孟德斯鳩等等，各家立言，雖互有出入，其要義所在，則曰國家之主人爲人民而已。陸氏之主張曰，第一、政府之存在，視乎被治者之同意，第二、迷信與宗教上之形式主義不得用之以掩蔽自然公例與自然宗教，第三、各宗教派別應實現相互之容忍，第四、教育應努力普及。由此四者言之，陸氏思想之富於十七八世紀理性主義之成分，顯然可見，其所希望之新政府，不外乎以民意爲依歸而已。然此人權論之影響之最大者，無過於一七七六之美國獨立與一七八九之法國革命，此兩國集合以上各家之學說，規定爲政治上之建國基礎。茲舉美國之獨立宣言與法之人權宣言中關於人權者如下：

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宣言之言曰：

吾人認以下各項爲自明之眞理，第一、各人生而平等，第二、各人皆由上帝賦以若干種不可移讓之權利，第三、所謂不可移讓之權利，曰生命曰自由曰幸福之求，第四、爲鞏固此項權利，乃設立政府，政府權力，以被治者之同意爲根據。

一七九一年法國人權宣言之言曰：

人類就權利言之，生而平等，且繼續平等。

政治社會之目的，即在保障人民之自然的及不可移讓的權利。此項權利爲：自由，財產，安全，抵抗壓迫。

主權之源屬於國民自身。無論何人不得行使權力不爲國民所明白同意者。

一切公民對於立法，有參加之權利，或由自身出席，或派遣代表。

人民在法律之前平等，因而得平等服務公職或受勳位任何人不得因其意見之故，致受滋擾，即關於宗教上之意見，亦復如是。

此時之人權論者，均信奉理性主義，意謂根據吾人之理性，便能發見此項眞理，美宣言中所謂自明之眞理，即此意也。其所發見之眞理，曰人類在自然狀態之生活如何，曰人類因自然狀態中之爭亂，乃設爲政府，曰政府之設立，出於人民之契約，故曰社會契約。此等立言者皆生於十八世紀，自受時代思想之支配。及十九世紀歷史學派大興，紛紛根據歷史上國家成立之事實，以反駁其說，如謂世界上之各國成立，從無見有互訂契約者，又謂原始時代人民受感情智慧之束縛甚深，安有生而自由平等之理。因此天賦人權說爲世界所厭棄，然其所非者，乃以天賦二字之根據之不當，非謂人權之不應有。學術上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派或乙派學說之盛衰起伏，爲思想史上之自然現象，不足深怪者。吾人不能因學派之盛衰，幷人權論之本身而亦詆斥之。試問美國獨立法國革命後，歐美各國乃至日本，何一不走上民主與憲政之路，其憲法中，何一不有人民權利一章，如所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等等。何也，社會契約說雖不必與歷史上之事實相符，然而立國之正當理由，殆無一個能逃出於社會契約與人權學說之範圍之外者矣。人民而一無權利，且一無法律之保障，則生殺予奪，操於政府之手，人民地位同於雞羊牛豕，換詞言之，奴隸而已，安從而仰首伸眉，以成爲七尺昂藏之人乎，其不可一。政府所以待其人民者同於雞羊牛豕，換言之，不視之爲人類，又安從發達其禮義廉恥之知覺，使之成爲一個善良公民乎，其不可二。中央政府以外之地方團體之單位以千計萬計，端賴全國公民分担其職，然後不需設官，自理其事，倘全國人民絕不知分辨是非，與認識其權利義務之所在，將何以使其爲負責之公民乎，其不可三。平日待之如人如奴，而後戰時自知爲國效死，反是民，使之自覺其爲國家之主人，而後戰時自知爲國效死，反是者輒然爲異國臣妾，其不可四。現代行政與工商企業，組織複雜，規模宏大，惟有其職務者自知職責所在，不管上級監督之有無，爲公家爲主人，愛惜金錢物力，且竭盡所能以赴之，然後日新月異有進無退，倘政府所以訓練其人民者，惟以面從阿諛爲貴，則現代分層負責之複雜行政與龐大企業安從而實現乎，其不可五。由此五者言之，人權論雖遭歷史派之非難，然其爲政治與民間活動方面不可動搖之眞理自若也。

自法國革命迄於吾國之推翻滿清建立民國，雖東西國家之憲法法文政治習慣，各有其特異之處，然其必有民選之議會，獨立之司法，與人權之保障一也。此時期中對於陸克騷盧之學說，即有懷疑而非之者，而其採之爲國家大法，則遍世界如出一轍矣。獨自一九一七年蘇聯革命政府成立，迄今百餘年來所奉爲圭臬者，始遭破壞。然蘇俄之剝奪人民自由，乃所以實現其社會主義之大理想，故在同情於民主與自由之人，未嘗不予以諒解，其後意大利德意志法西斯主義繼起，而法西斯數百年之人權保障即民主政治，掃地盡矣。

民主政治也，人權保障也，其規模遍於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與中央地方三行政，其所以成立者，賴乎彼此相維相繫之關係，苟甲部動搖，其他乙丙等部亦隨之而不能支持，猶之漁網之格破裂，則全網皆無之效用因之而失，又如房屋之大柱一經折撼，則全屋不免於傾倒。民主政治全體機構之部門甚多，警察也，文官也，法庭也，黨派也，言論也，國會也，憲法也，苟其中一項之所有地位，爲人所蹂躪，則其他各部門隨之而亦壞，民主政治因此而盡失其本來面目矣。

法西斯主義創始於墨索里尼，其所憑藉者爲地痞民衆之意大利，故所施行之猖狂無忌，不如希特拉之甚，彷以德國爲例以說明之。

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拉之初登台也，尚有所設施不出憲法範圍之宣言，孰料其於數月之內，盡取魏瑪共和國之機構而毀之，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之本部封鎖矣，而黨之報館沒收矣，中央黨經協議停止活動矣，甚至保皇派與鋼盔黨同在解散之列矣。是年七月，政府以法律規定惟有民族社會黨爲合法成立之政黨，倘有發起其他政黨之人隱處罰金或死刑，是爲結社自由之剝奪。一九三四年四月爲止，報館之被封鎖者千餘家，自動停刊者三百五十家。報館主人苟不能證明其祖宗自一八〇〇年以降爲阿利安血統者，其報館應在沒收之列，凡登記者須其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爲阿利安血統，且須經宣傳部長核准，倘有言論不當者，即在開除之列。柏林綠郵報編輯人聞戈培爾氏請人批評之言，認其爲出於眞意，乃向戈氏力言報紙隨意附和之不可，其結果則被處以禁錮之刑。是爲言論自由之剝奪。德國人民言論行動有批評政府或反對政府者，目之爲危害國家，由國家秘密警察逮捕處理，若問此項警察所爲有無法律爲依據，其內政部高級官員皮斯德氏答之曰，此項警察之任務在乎保護民族社會主義國家，其根據在乎民族社會主義之哲學，無須法律條文規定，若是乎人民生死大權，聽之秘密警察而已。彼等更根據阿利安與非阿利安血統之區別，擅意奪猶太人財產或驅之國外，巴黎猶太人嘗行刺德國使館人員，德國政府乃處其德境內猶太人以百萬千萬之罰金，謂爲全族之連坐可也。是爲人身財產自由之剝奪。其對於瑰瑪憲法，自表面言之，至今猶存而不廢，然其各機關權限之實質變更，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希氏嘗藉口於國會之失火事件，對共產黨員八十六人禁令出席，於是希氏黨派之占二百八十八席者遂成絕對多數黨，通過大權授予法案，第一條曰，立法權由內閣行使之，則議會等於廢物矣。第二條曰、內閣所立之法律，除關於上下兩院外，得對於憲法有所出入，則憲法可因內閣之好惡或從或違矣。此項立法權之授予，以四年爲限，即四年之內，非任何人所能加以斥責。自此項法律通過之後，德意志自成爲希氏之獨裁政治。德國學者爲戴爾希氏計，名德國曰領袖國家，直視八千萬人口之德國爲希氏私產而已。

希氏所以集國內大權於一人之身者，其目的何在，曰鞏固國內人權以成一己之功名，再繼之以蹂躪鄰國，以遂其侵略之野心而已。其在「我之奮鬥」中早已宣言曰：

「所謂一國之外交政策，在使其國內人民有所資生之具。一方面爲人口之滋長，他方面爲土地之廣狹肥瘠，二者間保持其相當比例，而後其人民之謀生與健康，乃得以保持。」

「一國之疆界，人所造成，亦由人以變更之。」

「德國之惟一健全領土政策，即在陸面以內殖民地不適於大規模移民之用也。自十九世紀已後，已不能以和平方法奪取殖民地，殖民地之擴張，將引起極大戰事。與其產生戰爭以經海外殖民地，不若爭取歐洲土地之領得。」

由以上所言觀之，併與也，割蘇台區也，奪回但澤也，瓜分波蘭也，蹂躪西班之法比也，希氏在其回國中著書之日，固早已成言在胸矣。

此第二次大戰之起因，雖由於波蘭問題，實緣於希氏開疆拓土之政策，其所以致此之最後原因，則又爲希氏之蹂躪民權，以造成「朕即國家」之政局。因此聯合國中之思想家與政治家認爲大戰之原因，在於民主政治之破壞，實由於人權之推翻。因此其學者與政治家謀所以矯正之，對於人權鬥爭有所研究，方今人權論之物與謂爲在十八世紀陸續產生之人權宣言，而以英國人權宣言爲最早，其目的在於保障人民之自由，因曰免於恐懼之自由。今舉一月致國會報告書之宣言，曰有五項，一曰民權，二曰言論自由，三曰免於匱乏之自由，四

重處不離英國憲政傳統，與羅氏稍異，然其爲民主精神所在則一。要之，羅氏之四項自由與第二次人權宣言，視十八世紀專以個人自由爲眼者已另踏進一步，即各個人之生存與國家之安全亦包括於人類應享之權利之中矣。昔日之人權爲個人的，爲放任的，爲國內的，今日之人權論之社會的，爲計劃的，爲國際的，此則新舊兩時代人權論之異同所在，而吾國人應念及在茲，如何合此二者以畢其全功於一役之中歟。

萬竹樓隨筆（一八）

舜生

余於國民參政會始識羅鈞任先生（文幹），君籍廣東番禺，爲留學界前輩，有通識，亦有專長，雖服官南北多年，而布袍粗食，不殊寒素。在參政會，非重大問題例不發言，每發言，爲全場所注視。會畢，必汲汲覓機返昆明，不願多所留滯，蓋君在任參政員期間，固同時執教鞭於西南聯大，任羅馬法講座也。余喜治國聞，尤樂聽人談往事，君經歷既富，復雅善清談，故余於參政會開會期間，必覓君縱談，如金佛郎一案之事實，中蘇復交經過，及其個人于役新疆之所遭遇，君固曾一一爲余道其梗概也。一日，余與君同赴上清寺一友人之約，以時間過早，方偕往附近一咖啡店閒談，談次，君告余曰：「往者在曹錕時代曾任某要職之某君，其人固無足道，然當時輿論皆謂其人貪污，則殊非事實。」君並加重其語氣曰：「庶可以找錢之地而絕不愛錢者，就余所知，實莫如某君。」余居上海時，與某君亦有一日之雅，固曾親見其人出賣其先人之版書字畫以度日，與當時輿論所攻擊者實大不類，即此一端，可見鈞任論事論人之不肯隨俗苟同也。「中國民主同盟」之發起，鈞任首先加入之，且發願多爲之盡力，今民主已成一世之主潮，即中國亦莫能自外，惜鈞任已不及見矣。君之死也，實在攜眷返粵之途中，留粵中某縣城，遂惡性瘧疾，爲庸醫所誤，遂以不治，殊可痛惜。君逝世後三月參政會同人曾開會追悼之，與君同時被追悼者，尚有大公報總主筆張季鸞先生，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伯鴻先生，三君均卓卓有所建樹，允爲一代之人才，不幸同時溘謝，此則更不能不令人有「人亡國瘁」之感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民主政治與非民主政治

陳啓天

古今中外幾種主要政體的特徵

古今中外政治歷史上所有的政體，雖形形色色，沒有兩個國家完全相同的。然就主權的最後源泉去看，或就主權的運用方式去看，只須分爲民主政治與非民主政治兩大類，便可概括一切政體。再就此兩大類政體細加攷察，又可分爲若干小類：即民主政治，可細分爲直接民主政治與間接民主政治兩小類；間接民主政治，又可細分爲總統制，內閣制與委員制三小類。非民主政治，可細分爲神主政治，族主政治，軍主政治，君主政治，黨主政治五小類。試表列如下：

政體分類
- 民主政治
  - 直接民主政治——全民政治
    - 直接立法
    - 直接罷免
  - 間接民主政治
    - 總統制
    - 委員制
    - 內閣制
- 非民主政治
  - 神主政治——教會政治
  - 族主政治——貴族政治
  - 軍主政治——軍閥政治
  - 君主政治——一人政治
  - 黨主政治——一黨政治

民主政治與非民主政治的根本區別，即在主權的最後源泉不同。

民主政治的主權，在全體人民，故政治主權是人民主權，國家統治是人民統治，非民主政治的主權，不在人民，更不在全體人民，故政治主權不是人民主權，國家統治也不是人民統治。換句話說，民主政治須是「非專制政治」「非階級統治」；而非民主政治，則必是「專制政治」，「階級統治」。故非民主政治，也可稱爲專制政治。民主政治是近代的產物。近代以前的中外政體，幾乎全爲專制政治。西洋古代希臘城市國家，雖有所謂民主政治，但實際上只能算是貴族政治的一種，而非近代所謂民主政治。中國經典上雖有所謂「民主」，（例如商書咸有德篇云：「民主罔與成厥功」，又如周書多方篇云「天惟時求民主，……簡代夏作民主，……誕作民主。」）但其眞意義，是由帝王作主以統治人民，而非由人民自己作主以統治人民自己。又中國西周時代，雖有所謂「共和」，或「共和行政」，但其眞意義，無論解爲共伯和代周天子攝政，抑解爲召公周公二相代周天子和同攝政，均與近代所謂共和截然不同。世間的新事物，一代多一代。人們有時苦於創製新名詞，不得不借用舊名詞以表示新事物所包含的新意義。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民主」與「共和」兩個名詞，即是借用舊名詞，以對譯德謨克拉西democracy與尼柏布利克republic。決不可再用舊意義去解釋。不然的話，便難免錯誤，甚一種民主共和變成反民主，反共和，大大足以遺害於國事。從前勞乃宣仍用舊意義解釋共和，做成共和正解及共和續解兩文，以企圖複辯，便是一種錯誤解釋的例證。我們對於民主政治，要減少錯誤，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好先明白什麼是「非民主政治」，即專制政治。

在歷史上最初建立的專制政治，大體是神主政治與族主政治的混合政體。原始國家，大多是由一族征服另一族或多族而後建立的。征服的一族，是貴族，握有主權，以統治非貴族，即統治被征服的另一族或多族。被征服的一族或多族，除爲貴族耕田服役外，還要完全受貴族的統治，而無一點政治主權。貴族爲鞏固其階級統治起見，除使用「兵刑」外，不得不利用神權的迷信，以麻醉被統治的人民。於是神主政治遂與族主政治同時產生，而互相爲用。貴族與僧侶，在古代政治上同佔最重要的地位，便足證明當時的政治多是神主政治與族主政治的混合政體。這種混合政體，因歷史的演進，也可分化爲各具特徵的一種政體。但族主政治仍必多少雜有神主政治的成分，或神符；神主政治也仍必多少雜有族主政治的成分作基礎。例如中國西周時代的封建政治，是族主政治發展到最完全的一種形式，同時也是神主政治發展到最完全的一種形式。因爲當時的封建政治，在一方面固有完備的階級統治制度，在另一方面又有完備的貴族祭祀制度。又如西洋中世的封建制度與教會制度，是族主政治與神主政治同時各別發展到最完全的一種形式。但西洋封建制度，在近代初期完全崩潰以後，教會制度便雖仍能保持在中世所有的政治威權了。現在世界各地除西藏與羅馬梵蒂岡外，已沒有一國是單純的神主政治或教權政治。不過因爲神主政治起原甚早，歷時甚久，而又具有不可思議的威權，故君主政治及族主政治仍多少留有神主政治的遺形或變相。

神主政治的名詞，並不是新由我杜撰的。這個名詞的來源，在我國從兩漢稱「神主」，或稱「天命」，詳見尚書。至於西洋所稱西阿克拉西（Theocracy），則譯爲神主政治或神權政治，爲恰切。單純的神主政治，或發展到最完備的神主政治，即專制政治。

當以歐洲中世的教權政治爲最好的標本。這種政治的主要特徵，在理論上是神治、神有、神享，在實際上是教治、教有、教享。因爲理論上要神治，神有、神享，所以上帝，教主以及教徒、教享，所以教皇、教士以及教徒，具有最高主權。教皇權之大，不但可以統治教友及俗人，並且可以統治世俗君主。關於歐洲中世教權政治的興起，及其以後發展的經過大略，讀者可參閱羅素的權力論第四章。我們現在只須知道教權政治所以不能在最近幾百年存在的根本原因，實由於人民思想已發生一種橫掃專制政治。教權以外的人，因然反對教會的專制政治。教皇以內的人，也反對教權的專制主治。於是革選動，則係教會內外聯合反對教會專制主治一種大運動。經過了宗教改革運動以後，教會雖還合倚有者手力量，但大權已經由政治範圍以外，不能再伸張中世一樣的專制政治了。

自原始國家直到封建國家，都是神主政治。

凡非由數國分裂而成的新國家，凡由數小國組合而成的大國家，在最初這個的時期，多帶有族主政治。族主政治發展到最完備的形式，是封建政治。封建政治，是從制度始國家發展到某一階段必然產生的一種政治。不過各國經過封建政治的時期，早遲大不相同。有的很早，例如中國的封建政治，早在西千餘年以前的西周時代。有的很遲，例如日本的封建政治，係在幕府時代，到明治維新以後，始行王綱幕，廢「藩籍」。至於歐洲各國的封建政治，則在中世，遠較中國爲遲，略較日本爲早。發展最完備的族主政治，即封建政治，當以我國西周時代的封建制度爲最好的標本。這種政治的主要特徵，是族治、族有、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族享，同時又是軍治，軍有、軍享、而雜着幾分神治，神有、神享。因爲是族治、族有、族享，所以建立一種等級的爵祿制度，將政權（爵制）與地權（祿制）分配給貴族，而庶民同不能有政權，卽地權也不能有。因爲是軍治、軍有、軍享，所以建立一種等級的兵刑制度，將軍權分配給貴族，以鎭壓被統治的庶民。因爲雜着幾分神治、神有、神享，所以又建立一種等級的祭祀制度，以神化貴族的階級統治。爲防止流減少貴族階級的內部衝突與擾亂起見，又依血統關係，建立一種等級的宗法制度，以確立各級貴族的統治法與繼承法。所有爵祿制度，兵刑制度，祭祀制度與宗法制度，統稱爲「禮」，而輔之以「樂」。禮樂專門適用於封建貴族，可以說是封建貴族的內部憲法。至於封建貴族統治庶民的重要方法，則不是「禮樂」，而是「兵刑」。所以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這種以禮樂統治貴族，以兵刑統治庶民的封建制度，非常完備，詳見周禮。一切周禮的重要原則，大多創始於周公。後世儒家復加以潤色，並通同歸功於周公，所以後世儒家好稱頌周公制禮作樂。周公所創建的封建政治，演進到春秋時代已漸次動搖。到戰國時代，便另爲一種新政體，卽君主政治所代替了。關於西周封建政治的詳情，及其以後崩潰的經過，詳見拙著「中國政治哲學」第二章及第三章，（此書尙在撰述中）本篇不能多贅。

在歷史上繼封建政治而起的政體，大多爲君主政治或軍主政治。在封建政治時代以前，雖有所謂國王或天子，但國王或天子的權力非常有限，決不能稱爲一人專制的君主政治。由貴族多人專制的封建政治，演變爲帝王一人專制的君主政治，在政治歷史上是一件大改革。前面曾經說過，封建政治的主要特徵是族治、族有、族享。而君主政治的主要特徵，則是君治、君有、君享，兩者相反對。要辨認貴族治、族有、族享的封建政治，以建立君治、君有、君享的一人政治，必然引起君主與貴族間的大衝突。君主政治必須在這個大衝突中勝利後，始能建立起來。就中國的歷史，看君主所用以致勝貴族的方法，大要不外以下四種：第一實行君主集權的軍事政治，以剝奪封建貴族的軍權；第二實行君主集權的官僚政治及郡縣制度，以剝奪封建貴族的政權；第三實行自由買賣的土地制度，卽實行開阡陌，廢井田，以剝奪封建貴族的地權；第四實行眞命天子獨祭上帝的祭祀制度，以剝奪封建貴族所恃以生存的軍權、政權、地權與神權，完全奪以上四種方法所剝奪了，於是君主政治遂代封建政治而出現於世。君主政治既經建立以後，除實行君治、君有、君享外，尙須實行軍主政治、官僚政治與神主政治，才能繼續維持生存。所以軍主政治，官僚政治與神主政治，雖不是君主政治的主要特徵，也是君主政治的次要特徵。君主政治，在世界各國中，發生最早，歷時最久，而理論與制度又均最完備的，只有中國。一部廿四史，自秦至清，多是君主政治史。一部九通，自秦至清，多是君主政治制度史。全部古經以及先秦至清末的學術思想，多半不出君主政治的範圍。君主政治學的專著，在兩千年以前，已由法家寫定，一直流留到現在。自清至清最有勢力的傳統學術，是儒家。儒家雖然苦口婆心的勸君主要「君君」，要「師用」，要「愛民」，要「爲政以德」，但並不根本反對君主政治制度，所以儒家能在君主政治時代長期流行。如果我們要詳細研究君主政治的利害得失，自必須，也只須研究中國君主政治史。但一部廿四史從何看起，學者難免望洋興嘆。爲求便捷起見，最好

Academia Historica

公讀張居正的雷霆國說及[illegible]以冰室全集內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和論專制政體有自溺於君權無一利害。

君主政治，掃除了封建政治的舊流弊，但又發生他所特有的新流弊。君主政治，完全集權於君主一人，必須君主本身壯健賢明，始能統治得當。如果君主本身幼沖、孱弱、愚昧、衰老、橫暴，則大權必旁落於左右、近倖、宦官、后妃、親貴、外戚和權臣之手，成為宦官政治，后妃政治，親貴政治，外戚政治，權臣政治，而不是君主政治了。縱君主本身十分壯健賢明，也有時難免為宦官、后妃、外戚和權臣等所劫持。況在君際上十個君主難有兩三個是十分壯健賢明。所以我國君主政治時代常有宦官、外戚、后妃和權臣之禍，任何朝代不能全免。大概每一朝代開頭有一兩個壯健賢明的君主創業垂統，以後多傳是守成的君主，甚至連守成也不夠格。當每個朝代將近結束的時候，或者偶然出個中興君主，但只能算是迴光返照，不易再長期繼續下去。我國最初建立君主政治的秦始皇，雖抱有極大的野心，想建立萬世一系的君統，但秦二世即亡。以後各朝代，除漢唐宋明清外，也多一二世或三四世而亡。漢唐宋明清各朝的年代，雖較長，但也只有漢唐超過二十世。各朝代君主的平均年齡，據統計所指示，較一般人為低。君主既多短命，又多不大賢明，這是君主政治本身上難於救治的大病。由此大病復產生宦官、外戚、后妃、權臣等大禍。於是一個朝代不得不變為另一朝代，成為朝代起伏，治亂循環的局面。這便是我國兩千年來君主政治的剪影。

我們要記着：君主政治，同時必是軍主政治。如果不是軍主政治，則無由建立君主政治。既建立以後，也無由保持君主政治。軍主政治的由來甚早，在族主政治時代即已有之。不過那時代的軍主政治，與族主政治合一，即軍權與政權合一，軍除不能離開主權外，而另成一種勢力。到君主政治時代，不能不用武力奪取政權，並擴張國勢，但又沒有世族軍除可資憑藉，於是不得不用雇傭軍隊，在[illegible]制度下，如果不要君主的專制，便另成一種軍主政治。軍主政治的軍隊方式，便是所謂「軍閥政治」。軍閥政治的主要特徵，是軍治、軍有、軍享。這種政治，在歷史上持續的時期雖多不長久，但也常常出現。西洋古代希臘的軍主政治，日本門治維新以前的幕府政治及明治維新以後的軍閥政治，都屬於軍閥政治一類。我國自秦以來，每當朝代更迭的時期，都是軍閥政治極盛的時期。軍閥政治是新一朝代瓦解的重要因素，也是新一朝代建立的重要因素。治亂循環，便新一朝代完全瓦解。然而「打天下做皇帝」，以建立另一新朝代。所以每一朝代開國的太祖太宗，幾無不是軍閥出身。「以馬上得天下」，是自漢劉邦起直到清止，每朝開國君主的惟一信條。不過新朝既經建立以後，如果仍舊迷信軍閥政治，便是根本反背君主政治。所以每一朝代當天下大定之後，便要實行「文治」，以防止軍閥政治的復生。但無論何朝代，到了季年，總有軍閥政治發生，成為豪雄割據的局面。此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由豪雄割據的局面，漸次變為豪雄逐鹿的局面，最後由一個大軍閥統一起來，重新建立君主政治。此之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當分的時候，必定是軍閥政治。當合的時候，必定是君主政治。君主政治是已成熟的軍閥政治，軍閥政治是未成熟的君主政治。由軍閥政治到君主政治，復由君主政治到軍閥政治，自秦以來的中國政治，都是如此往復循環，成為一種根深柢固的政治傳統。這樣的長期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治傳統，是中國政治歷史的一大特點。我們要了解民國以前兩年間的政治歷史，必須注意到這一大特點。我們要了解民國初元建立的民主政治制度所以爲北洋軍閥破壞的根本原因，也必須注意到這一大特點。

歐洲各國，在中世都是封建政治，到中世初期，始有趨國完成君主政治。君主政治既經完成以後，即漸次進入民主政治，很少軍閥政治的踪跡。這是近代歐洲政治的一大特點，值得我們加以注意。不過第一次歐洲大戰以後所發生的一種新政體，即黨主政治 party dictatorship 雖非軍閥政治，却多少含有一點軍主政治的成分，也值得我們加以注意。

以上所說各種政體，如教會政治，貴族政治，軍主政治及君主政治，都是舊的專制政體。至於黨主政治，則是一種新的專制政體。我們所以說黨主政治是一種新的專制政體，只是就他的說法或形式去看。若就他的本質細加分析，即可發見他確含有各種舊專制政體的成分在內。因爲一切黨主政治，雖說法或形式不同，而在本質上却可以說是教會政治，貴族政治，軍主政治及君主政治的一種混合政體。教會政治所最尊崇，是上帝，教主與教義，無論何人不許非議。黨主政治的上帝，教主及教義，即黨義創說人，創黨人，及黨義，也無論何人不許非議，這不是變相的教會政治嗎？在貴族政治下，貴族高於一切，一切權力歸於貴族。在黨主政治下的貴族，即黨員，黨員高於一切，權力歸於黨員，這不是變相的貴族政治嗎？在軍主政治下的軍隊各成一特殊系統，惟力是視。在黨主政治下的軍隊，也各成一特殊系統，惟力是視，這不是變相的軍主政治嗎？在君主政治下，一國一王，不許多王存在。在黨主政治下的王，即黨，只許一國一黨，不許多黨存在，這不是變相的君主政治嗎？單純舊形式的各種專制政體，已爲歷史所淘汰，不復能使多數人信從。黨主政治，乃混合各種舊專制政體，而以一種新形式出現於世，這不免令人迷惑了。

以上所說，是一切黨主政治共有的主要特徵。若再就所謂實行黨主政治國家的實例來看，有的主要特徵爲黨治、國有、民享，有的主要特徵爲黨治、民有、國享，如德，又有的主要特徵，爲黨治、黨有、黨享如意。不過無論那一國的黨主政治，都與英美所謂民主政治不同。所以英美的民主政治學者，多將黨主政治歸入非民主政治一類來研究。羅素根力論對於黨主政治的看法，便是如此，可資佐證。

舊的以及新的各種主要專制政體，已略論如上，繼此再一略論民主政治的特徵。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徵，是民治、民有、民享。這句話的詳細意思，是說政府須爲人民所有，而非人民以外的特權階級所有；政府須由人民治理，而非人民以外的特權階級治理；政府須爲人民謀福利，而非爲人民以外的特權階級謀福利。合於這種意思的政治，才是民主政治；不合於這種意思的政治，便非民主政治。我們依據這種意思，將民主政治與教會政治，貴族政治，軍閥政治，君主政治，黨主政治等政體互相比較，便可顯出民主政治與各種非民主政治的大差異來。民主政治，依據主權在民的原則，要有一個全民共有的政府。教會政治，依據主權在神或在教會的原則，只要一個教有的政府，而非民有的政府。貴族政治，依據主權在貴族的原則，只要一個貴族共有的政府，而非人民公有的政府。軍閥政治，依據主權在軍閥的原則，只要一個軍閥所有的政府，而非人民所有的政府。君主政治，依據主權在君的原則，只要一個君主獨有的政府，而非人民公有的政府。黨主政治，依據主權在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原則，只要一個一黨獨有的政府，而非全民共有的政府。這是民主政治與各種非民主政治的一大差異。由這個大差異，我們可以看出民主政治沒有特權階級，全體人民都是國家的主人。各種非民主政治，均有一種特權階級，只有特權階級才是國家的主人。民主政治既只要一個民有的政府，則政府自須由人民治理，以建立一個民治的政府。教會政治既只要一個教有的政府，則政府自須由教會治理，以建立一個教治的政府，而人民不得過問。貴族政治既只要一個貴族共有的政府，則政府自須由貴族治理，以建立一個貴族政府，而人民不得過問。軍閥政治既只要一個軍閥獨有的政府，則政府自須由軍閥治理，以建立一個軍閥政府，而人民不得過問。君主政治既只要一個君主獨有的政府，則政府自須由君主一人治理，以建立一個君主政府，而人民不得過問。黨主政治既只要一個一黨獨有的政府，自須由一黨單獨治理，以建立一個黨主政府，而人民不得過問。這是民主政治與各種非民主政治的又一大差異。由這個大差異，我們可以看出民主政治沒有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嚴格區分，而各種非民主政治則各有一種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嚴格區分。民主政治只是人民統治，而各種非民主政治則均是階級統治。民主政治的惟一目的，在使政府的一切設施，確實是為全體人民謀福利，而成為一種民有的政府。而教會政治的最要目的，則在使政府的一切設施，先為教會謀福利，而成為一種教有的政府。貴族政治的最要目的，在使政府的一切設施，先為貴族謀福利，而成為一種族有的政府。軍閥政治的最要目的，在使政府的一切設施，先為軍閥謀福利，而成為一種軍閥的政府。黨主政治的最要目的，在使政府的一切設施，先為黨謀福利，而成為一種黨有的政府。自然，各種非民主政治，有時也宣言為人民謀福利，但不一定能兌現。更有時也宣言為人民謀福利，但在事實上多只認為是一種「恩惠」或「仁政」，甚至不過是一種「籠絡」或手段。各種非民主政治，無論如何宣言或實踐為人民謀福利，總難免先私後公，先特權階級而後人民，甚或假公濟私，化公為私，以公為私。這是民主政治與非民主政治的第三大差異。由這個大差異，我們可以看出民主政治是與人民最有利的一種政治，非民主政治是與特權階級最有利的一種政治。在民主政治下，人民固有義務，也有權利。在非民主政治下，人民只有義務，而毫無權利。最苦的，也不過是義務多於權利。在民主政治下，人民所享有的一切權利，確有法律的保障，不得人民的同意，不得加以限制。在非民主政治下，政府雖有允許人民以若干權利，但仍可隨時任意剝奪，毫無法律的保障。縱有法律，也多是具文，不能確實保障人民應有的權利。

民主政治與非民主政治的大差異，除以上所說的三點外，還有第四大差異。在民主政治下的政府，既為人民所有，為人民所治，為人民所有，則人民與政府合為一體。人民對於政府，雖可自由批評，但用不着過激的怨恨；雖可改組政府，但用不着武力的手段。政府對於人民，雖可實行統治，但用不着非法的壓迫；雖可防止危機，但用不着恐怖的手段。所以民主政治比較和諧、安定，而非「恐怖政治」。至於各種非民主政治的政府，則均由特權階級，實行階級統治，以先謀特權階級的福利，則不得不依靠武力，使用恐怖，而成為一種恐怖政治。凡非民主政治，都多少含有恐怖政治的意味，這有古今中外的許多歷史可資證明。現在為節約篇幅起見，只舉兩事為證：例如，宗教本應是十分聖潔的，但歐洲中世教會政治對於異教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徒的迫害，實極恐怖之能事。又如近年日本所實行的軍閥政治，與德意實行的黨主政治，都不外一種恐怖政治。他們所用的恐怖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因而使其國內大感不安，又使世界各國也大感不安，所以各民主國家都要一致反對日德意等國，日德意等國內被壓迫的人民也反對他們的政府。只有民主政治，才不靠武力，才不用恐怖，才是一種太平政治。所以頗享太不愛恐怖的人們，都要贊成民主政治，而反對一切非民主的恐怖政治。

我們既經明瞭民主政治與非民主政治的四大差異，便可從此等差異中發覺民主政治比較一切非民主政治為合理，諧和而穩固，實是一種長治久安的政體。一切非民主政治，雖在暫時之間，好像十分強有力，但因其太不合理，太不諧和，又太不穩固，無由使國家長治久安。我們試看近代各國，凡已真正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如英美瑞士等國，都能長治久安；凡未能真正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如南美各國及中國等，難免禍亂頻仍，便是證明民主政治實優於一切非民主政治。所以英儒麥克斐說：

> 我們可以假定越穩固的組織，是越善良的組織。我們已知民主政治應付危機，較好於君主政治。在文明進步的民族中，政治平等不是表面的事體，也不易於推翻。沒有制度是穩定的，但建立在社會合作之下的制度是最強有力的。一種民族能夠推翻每種形式的政府，但其本身所建立的政府不能推翻。……民主政治較能溝通各方情意，故能較永久而且較安定的進展。（見拙譯麥克斐著政治學第十二章民國廿五年中華書局出版）。

有些人們以為民主政治不能應付危機，而麥克斐却說民主政治最強有力。他不是故意倡反調，而是根據英國實行民主政治的經驗所得的一種結論。我們試看法國大革命時，拿破崙以帝政稱雄歐洲，不可一世，然卒為民治的英國所敗。我們再看第一次歐洲大戰時，德國以武力橫行歐洲，亦不可一世，然卒為英法美所敗。我們更看此次歐洲大戰前後，希特勒對內實行黨主的恐怖政治，對外實行閃擊的軍事政略，震動世界，更不可一世。然一鼓作氣，再而衰，亦將為民主國家所挫敗了。非民主國家既曾迭為民主國家所敗，即足證明民主政治較非民主政治更強有力。非民主政治在暫時間，好像十分有力。然因其力太過用，太濫用，太逞強，太招忌，而結果反成無力。這個道理，便是中國古訓所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民主政治，在表面上，好像無力。然因其不耗力於內爭，養力於平時，決不輕於用力。到萬不得已時，始全國合力以對外。用力既非常得當，自易於集中國內的民力，也易於得到國際的助力，而結果竟成為最強有力，足以擊敗非民主國家。這個道理，就是中國古訓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由上證來，可知民主政治，在理論上與實際上，均較非民主政治為優，所以成為近代世界政治的一種主要潮流。雖非民主政治遲時時想死灰復燃，然結果總是民主勝利，而非民主失敗。所以中山先生說：

> 現在是什麼世界？就是民權世界。
>
> 世界的潮流，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流到了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反抗。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保護著凱，不能終歸失敗。
>
> 民權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權政治。有些人們以為人民去管理政治，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

Academia Historica

民主政治。（以上統見民權主義）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見黃文中譯日本民權發展史中山先生題辭民國十四年商務出版）

民主政治既為近代世界的一種主要潮流，所以近代各國多已由君主政治趨向民主政治，很少國家再能完全保持過去的君主政治。換句話說，君主政治再不能與民主政治競爭了。現在足以威脅民主政治者，只有日本式的軍閥政治，與德意式的黨主政治。然軍閥政治的基礎，完全建築在武力之上，不足以資號召，縱能稱雄一時，亦決不能持久，只能暫時阻撓民主政治，終久還是要為民主政治的潮流所淹沒的。至於德意式的黨主政治，雖對於民主政治的威脅很大，然經過這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意國已因實行黨主政治而投降，德國也因實行黨主政治而挫敗，將不會再有多人相信黨主政治了。

現在世界各國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在原則上完全相同。但在方式上，以各國歷史，環境與民族性等不同，沒有兩個國家完全相同的。因此我們對於民主政治，又可加以小分類。在未說明民主政治的小分類以前，我們須將民主政治的範圍，限定在實際上已完成民主政治的各國以內。現在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在名義上是民國共和國，而在實際上却未必是民主政治。又有許多國家，在名義上是帝國或王國，而在實際上却已經是民主政治。所以我們所說的民主政治，必須着實際政治如何，不問名義如何，也不問有無君主或國王。如果只就國家的名稱必須標名共和國或民國，才認為是民主政治，便難免於錯誤。這是我們對於民主政治分類必須注意的一點。又有些國家，在實際上雖已傾向民主政治，但以其建立不久，尚未達到完成的階段，不易論定，只好暫不多談。這也是我們必須注意的一點。

英儒蒲徠士 James Bryce 的現代民治政體，是一部關於民主政治的大名著已由商務印書館譯印。蒲氏在此書中曾說：

現代世界的民主國，有不列顛聯合王國，不列顛合自治領、法、意、荷、比、荷、丹、瑞典、那威、希臘、美、愛斯坦拿，也許智利和烏魯蓋也可算在內。至於歐洲新造諸國，現在還不能論列。而中美和克里崩海岸諸共和國，實在不是民主國家。（見原書第一編）

蒲氏以為在第一次歐戰前，真正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只有以上所引的那多。他在此書中所選論的民主國家，只限於法國，瑞士、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錫蘭。其餘不曾專論，也當當涉及。我們要了解民主政治的原理及在各國實施的情形，不可不讀此書。

關於民主政治的小分類，首先須就人民行使主權的方法，分為直接民主政治 direct democracy 與間接民主政治 indirect democracy 兩種。由人民親自行使主權，以直接立法，並直接罷免政府人員的政治，叫做直接民主政治，又叫做全民政治。人民直接立法，包含創制權與複決權兩種制度。創制權制度，是由人民用投票的方法，選行制定法律，不必經過議會的決議。複決權制度，是人民對於議會所已決議的法律案有異議，而復由人民用投票方法否決或可決之。如經人民投票否決，則該法律案即不能成立。以上兩種制度的重要論據有二：一為國滿發揮人民主權，二為救濟議會立法不合人民公意，可謂理由充足。不過此兩種制度，較宜適用於小國；不大適用於大國；較宜適用於地方自治，不大適用於中央政治；較宜適用於人民程度較高的國家，不大適用於人民程度低的國家；較宜適用於簡單的事項，不大適用於複雜的事項；較宜適用於特定事項

Academia Historica

，不大適用於一切事項。所以此兩種制度僅發生於小國寡民，而人民程度又高的瑞士，而瑞士實行此兩種制度的範圍，也以各邦事項多於聯邦事項。瑞士聯邦之大，不過約等於中國一大縣。其各邦之大，不過約等於中國一鎮一鄉而已。美國各州雖在第一次歐戰前多已仿行瑞士的直接立法制度，但在聯邦政府以內，則尚未見仿行。第一次歐戰後德奧等國曾一度仿行於中央的幾種事項。然其成效則不及瑞士及美國各州之好。我國也欲仿行此種制度，例如五五憲草曾擬定「關於自治事項，依法律行使創制複決之權」即是。關於縣市以下的自治事項，酌量由人民直接立法，確是合理，可能，而且有效的一種適當辦法。又查五五憲草所擬定國民大會的職權，有創制法律及複決法律兩項。論其原來意義，應與縣民所行使的創制複決權同為一物。但國民代表並非國民本身，國民代表立法並非國民直接立法。在同一憲法條文上，一個名詞含有兩種意義，殊易使人費解。自然國民大會應有最高立法權，却不必名為創制複決，以免兩歧。

直接民主政治下的罷免制度，是指人民對於選舉的官吏或議員或法官，於不滿人民公意時，得用人民投票方法實行罷免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應用的範圍及辦法，在瑞士美國各州及德國威瑪憲法不全同，本篇不能詳述。我們只須知由人民直接罷免的人員，只宜限於議員及地方的民選官吏。過此範圍以外，則恐難有良果。

直接民主政治制度，雖發源於瑞士，仿行於美國各州，但瑞士及美國各州，也只局部採用，而大部仍行間接民主政治制度。其他各民主國家，幾乎全行間接民主政治制度。縱仿行直接民主政治制度，也不很多。所以通常所說的民主政治，多屬間接民主政治。間接民主政治制度，是由人民選舉代表，組織議會，以實行立法，並監督行政的一種制度，所以又叫做代議政治。這種制度依據各國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的相互關係看，可分為三小類：第一小類，為內閣制，例如英法，其要義為「行政屬員與常務官的主腦負責，常務官的主腦對各部總長負責，各部總長對內閣負責，內閣對國會負責，國會對人民負責」。（見麥克婁政治學第七章）第二小類，為總統制，例如美國，其要義為總統由民選，對人民負責，不因國會的信任與否而進退；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由總統國會與法院依照憲法規定，分別行使其職權。第三小類，為委員制，例如瑞士，其要義為由國會選舉若干行政委員，依照國會的決議，專負行政的責任，依規定的任期而進退，不依隨時的信任與否而進退。以上三制的利弊得失，普通政治學及比較憲法書上均曾詳論，本篇不必多贅。我國自清季預備立憲以來，對於此三制均曾一度或兩度試行。但以一般人，尤其是有力者，多忽略此三制必須同具的前提條件，致迄今尚無一制確實建立起來。此三制必須同具的前提條件，即一切民主政治所必要的前提條件。這種前提條件，扼要說來計有：（一）須認明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只求職權擴大，不求責任分明，便不能建立起任何種民主制度。（二）須認明政治責任分明的第一個必要方法，即須建立民選的國會，依照憲法規定或憲法慣例，監督行政。內閣制與委員制固必須國會監督行政，總統制也必須有國會監督行政，只是權限有大小不同，並不是不要國會監督行政。（三）須認明政治責任分明的第二個必要方法，是容許人民對於政治容言論出版的自由，以養成健全的輿論，使政治能隨時依輿論而改進。（四）須認明政治責任分明的第三個必要方法，是容許人

Academia Historica

民對於政治有集會結社的自由，以養成和平的政黨，使政治能因政黨的互相監督而進步。其他還有必要的前提條件，暫從省略。我們只就以上所說四種前提條件來看，可知民主政治不僅是個政治制度問題，而且是個政治風度問題。我們要實行民主政治，必須先培養合於以上四種前提條件的民主政治風度，然後始能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最後再一略說民主政治的法律保障。民主政治，需要一種全國共守的根本法律來確實保障。這種根本法律即憲法。憲法，無論成文或不成文，政府的組織與活動以及人民的權利與義務，都要確依憲法而定。所以民主政治也可稱爲憲政。不過我們要注意：民主政治固未必是憲政的，而憲政却未必是民主政治的。因爲如果只就有無憲法，以分別是否憲政，則憲政可分爲三類：第一類爲民主憲政，其特點爲民意，爲民定憲法，爲民定民權保障書。第二種爲君主憲政，其特點爲君意，爲欽定憲法，爲欽定君權保障書。在此種憲法中，雖稍賜與人民以若干權利，但未必能眞正享有。第三類爲黨主憲政，其特點爲黨意，爲黨定憲法，爲黨定黨權保障書。在此種憲法中，雖有人民權利的規定，亦多是具文。我國如果要用憲法來保障民主政治，自然在以上三類中，應是民主憲政，而不是其他了。

萬竹樓隨筆（一九）

舜生

桐鄉陸費伯鴻先生（達），中華書局之創辦人也。早歲曾參與革命，一度加入劉敬安等所組織之武昌日知會。在革命前，即曾於武昌察院坡經營一小規模之書店，後入商務印書館，從事小學教科書之編撰，並曾任教育雜誌編輯。民國元年，乃自創中華書局，即以出版教科書與商務競爭甚烈。中經頓挫，幾至不支，民六以後，復再接再厲，卒趨穩定。余以民九入中華，任新書部主任，先後凡十年，自民國十年迄二十年，除中小學教科書及兒童用書外，凡中華所出版之新書及若干種雜誌，大抵余所經手也。伯鴻任總經理，日必往來發行所與編輯所兩處。其人治事甚勤，頭腦明晰，性豁達，富有常識，於文學亦頗有素養，雖自信力甚強，任人則甚專，余與之共事十年，實生平最愉快之一時期也。抗戰軍興，政府設國民參政會，伯鴻亦應聘任參政員，曾兩度由香港來渝出席，余乃得復與之作短時期之周旋，雖覺其健康已大不如前，但不意其即一病不起也。方余決計離去中華時，伯鴻曾一再挽留，意頗怏怏，且告余曰：「君性實不宜政治，如覺厭倦，可仍回中華，」並舉范靜生先生爲例，意甚懇摯，余回至今感念不忘也。

Academia Historica

婦女對憲政的認識

劉清揚

憲政運動，是中國近百年來，在各個時代，用各種不同形式所奮鬥爭取的民主革命運動。所以中國的民主革命，從鴉片戰爭後，到辛亥革命這一歷史階段，以民主主義反封建鬥爭的結果，遂創造了中華民國，而產生了一部「臨時約法」。此後更從殘餘的封建勢力之下，再繼續努力，由辛亥一直到現在的爭取憲政與民主，可以說是中國革命軍發展一貫的內容。這也就是中山先生為中國革命艱苦奮鬥四十餘年，對外為中國爭取自由平等，對內為中國建立民主的憲政國家，所努力的目的。我國同胞在中山先生的領導之下，經過數十年的奮鬥，大家都已了解，要使一個落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走上進步解放的道路，而建設一個新的中國，除非實現民主政治，否則是不會成功的。

推進憲政運動，就是促進實現民主，因為我們要的憲政即是民主政治。一個被異族統制了將近三百年，已衰頹的中國，要想發奮圖強，而獲得自由平等與獨立，必須自力更生，發揚民氣，振奮民力，而使人人能負起復興建國的責任，所以就必須以民主的精神，鼓起民衆的勇氣，求得民族的解放，才能作到現代獨立自主的國家，而名符其實的入於世界民主國家的行列。這樣偉大的歷史使命，是全國民衆共同一致的要求，所以才能以百年的奮鬥爭取而不懈。中國婦女在憲政運動中的奮鬥活躍，是不弱於男子的，在早年，雖因婦女受教育的機會不均等，僅限於少數的先進參加，但在歷屆的戰鬥中，婦女都曾與男子並肩努力，從未放棄過責任。無可諱言的，還有許多女同胞，是不大關心國事的，故不明了憲政與民主，對於國家民族生存獨立復興建國的關鍵，更不明了憲政與民主，對於婦女自身解放的關係。因此對於什麼是民主政治，許多人便認為就是人民有選舉權，能參政。所以在憲政運動才開始的階段，有許多婦女只知集中精神注意到：「我們要競選，我們要作參議員，我們要在國民大會中，爭婦女的名額和地位」。這些見解和主張，是並不錯的，不過未免把民主政治看得太狹隘，只知專重於婦女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顯然是不夠的。因此我們婦女對憲政與民主，應有正確的認識，而須加以仔細的研究，是很必要的。

一什麼叫民主政治　人之生存於社會，是不能像蜂蟻那樣漂流在孤島上，離羣索居的，必須有人與人的聯，人與人的互助，人與人往來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衆人之間，如何把關聯，互助，和往來的方法，加以條理和組織，這便是人類的政治行為。所以亞里士多德曾說：「人類是政治的動物。」中山先生有云：「管理衆人的事，就叫做政治」。但世人對「管理衆人的事」所採取的方法，是各有不同的；因而便有「君主政治」，「貴族政治」，「官僚政治」，「軍閥政治」和「民主政治」等分別。從上古神權時代過去以後，世界各國，多以君主制度治理國政，那就是由一個惟我獨尊的皇帝，掌握政權，獨裁專制，不許人民過問國事；然後由於封建割據，而形成「貴族政治」，「官僚或軍閥政治」。按上述各種政治的主權，是依一個人，或一羣人的意思，管理萬民，不容許由全民自治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建立共信共守的法律，那就絕不是民主政治。由於歷史的演進，人權的發展，所以近代國家，多已採用民主制度。凡民主政治，是必須以主權在民的原則和方法，來管理衆人之事的。所以，山先生對民主政治的解說是：「由衆人管理衆人的事，就是民主政治」。又說：「我們主張民權，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成立民主政體，凡事都應該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美國的林肯總統說：「所謂民主政治，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詳言之：就是國家是人民所有，政事爲人民所治，國家的利益爲人民所享；這也就是中山先生的主張。民主政治在中國，雖然由中山先生一生努力提倡，奮鬥爭取，直到現在還未能實現民主者是中山先生隨終之恨！也是我們後繼無人。

一個國家，必須有其根本大法。既要實施憲政，必須頒行其有關於人民權利義務與政府組織權責的民主憲法，本來憲政並不僅限於一部憲法而已，如有了一部好的憲法，而不認眞執行，也不過是等於具文，但若沒有一部良好的憲法，雖欲認眞舉行而又無所依據。所以凡是關心憲政的人，都應努力求得一部良好的憲法，這是非常必要的。爲要求得一部良好憲法，我們對於憲法的內容，必須加以深刻詳密的研究，也是很明顯的。憲法的本質和歷史而言，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應該是它的最重要的任務。所以中山先生也曾說：「憲法者，人民權利之保障書也」。難道我們受了幾十年封建壓迫的人民，更受封建束縛的婦女，既要求良好憲法，必爲上下所共守，而且要樹立純正民主政治的規模，是沒有階級男女和種族之差別的，必使社會各分子，能有均等的機會，充分發展各人的天才，得能貢獻於社會。

二、各國婦女在憲法中的地位

憲政，在世界先進國家，是早已不成問題的，我們只要了解在各國民主制度之下，對於婦女的待遇，究竟如何？故不可不舉個例明白敍述。就一般而言，美婦女之獲得參政權而言，自然是經過艱苦的長期運動所爭取來的。但在法律上承認婦女的參政權，大都是在歐戰之後。先進各國的婦女，在法律上雖承認有參政權利，在形式上也獲得男女平等的地位，但事實上，還是要視各國不同的政治形式，而對婦女的待遇，仍有很大的差異。先從英國說起，英國原是提倡民主政治最早的國家，是被稱爲「巴立門之母」的（巴立門即國會）。然而英國的婦女參政運動，雖經過多年英勇鬥爭而獲得了參政權，但在他們的資產階級的統制之下，尤其在他們那種君主立憲制下，所頒布的選舉法上，規定有財產，資格等條件限制，所以他們除了少數的貴族婦女外，一般婦女實際是不能享有參政權的。直到現在這個號稱巴立門之母的國家的議會裏，雖有六百多名議員，而婦女僅佔九名，這就是說，英國的婦女參政運動，沒有民主革命徹底勝利的保障，所以也就沒有能夠徹底成功。

再說美國，美國是新興的國家，較比英國是少保守性，而富於民主精神，所以美國婦女在社會及政治上是平等的，政治上也比英國自由，但它雖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自然還是資產階級佔優勢，資本主義的民主，仍是限於少數人，大衆人民既不能普遍享有民主權利，其中半數婦女，當然也是無份的。

法國的情形怎樣呢？法國婦女的參政運動，格外富於鬥爭性，它是從法國大革命中奮起的，法國婦女曾襲擊過巴斯提獄，上過斷頭台，發表過婦女的人權和公權宣言等理論鬥爭的光

Academia Historica

榮悲壯的史蹟，但在法國的政壇上，從來沒聽說過幾個婦女，這不但是說明法國民主革命之不夠澈底，而也就是法國在二次歐戰中失敗的原因之一。

德國在希特勒未登台以前，在魏瑪憲法第一七條，曾規定：「……其人民代表，應以百德國籍之人民，不分男女，依照比例選舉之原則。」第二二條：「議員由年滿二十歲以上之男女，依照比例代表選舉制……」等進步條文。但從法西斯暴徒希特勒上台以後，婦女便被剝奪了人權而趕回家庭，去作服服貼貼男子的廚房和奴隸。同樣軸心國家，如義國和日本的婦女，當然不會有參政權的。

最後我們看看蘇聯婦女的地位怎樣？大家都知道，現在世界上講男女平等最澈底的，就只有蘇聯。在蘇聯，婦女同男子已完全沒有分別。在政府裏有婦女任部長，並不稀奇；在各聯邦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婦女曾任財政部長，漁業部長等要職，蘇聯的女外交官任大使的，已早有人；各省或自治區的政府情形，都是一樣的；各級議會男女代表的數額，差不多都相等；在蘇維埃最高議會裏，同樣有很多女代表。尤其蘇聯婦女，無論在輕重工業上，是凡男子所能作的，女子也莫不能作，而工作的報酬，完全與男子相同，所以蘇聯婦女在經濟上的地位，是完全與男子平等的。總之蘇聯婦女在社會上，法律上，政治上，文化教育上，不但在原則上平等，在事實上也是一律平等。這也就是蘇聯的政治制度，經過希特勒號稱世界無敵的軍隊的嚴重攻擊，獨能英勇無匹的戰勝而成功的原因之一。

三、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與民主革命的關係　從歷史上看來，婦女自從失去原始共產社會的母權時代，因為經濟制度的變遷，婦女為了經濟從屬的關係，便淪為男性的奴隸。後因覺悟了的婦女，不甘心處於奴隸地位，所以歐美先進各國的婦女，曾經過數百年的艱苦鬥爭，直到現在，才能或先或後，或多或少獲得部分的解放；只有蘇聯婦女，由於他們國家制度的合理改革，才真能澈底達到男女平權的目的。我們中國婦女，因為自己國家的落後，格外延長了奴隸生活的時期。在封建的社會裏，曾忍受了多年封建禮教的壓迫。對於婦女的規誡：「婦人有三從之義」，是要女性終身受制於男性的枷鎖；「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脅迫婦女堅守片面「貞操」的斧鉞；有「七出」之條，使男子可以任意離棄其妻；更加上助紂為虐的女教徒，班昭所寫的「女誡」，簡直把婦女完全不當人，而要敬謹順從著丈夫的任意打罵或凌辱，還要以笑臉相陪而忍受。像這樣奴隸牛馬的生活，是不是有人性的人，所能忍受的？但我們中國婦女，居然在「深宮閨門，閤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的封鎖之下，忍受了幾千年。國家大事，更不許女人過問，已不待言。

時代的齒輪是不能停止的，所以久被壓迫的中國婦女，也得有抬頭的一日。一由先進各國婦女解放的刺激，再因辛亥革命的刺激，更得到中山先生的領導，且對婦女解放，男女平等，格外與以贊助和扶持。中山先生說：「政治上人人平等，不僅是階級平等，就是男女也要平等」。在這樣的號召之下，婦女們才加入辛亥革命的陣營，和男子共同擔負革命任務，以完成推翻封建束縛下解放男女兩性的偉大歷史使命。凡一切推翻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都與脫離封建束縛的婦女運動有着因果的關係，就是說：民主革命成功，婦女才能從封建制度的隸屬關係之下獲得解放；同時也必須婦女參加革命運動，民主革命才能澈底完成。所以各國婦女解放運動，大都是伴隨着民主革

Academia Historica

命運動而發展起來的。沒有民主革命澈底勝利的保障，婦女解放運動也不能達到澈底成功的目的。所以中國婦女運動的消長，常是隨着民主革命的成敗為轉移。

因為辛亥革命並未完成其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它只做到在形式上推翻滿清專制政權，而沒有從基本上澈底粉碎封建政權所依以建立的社會經濟基礎，所以使留給封建勢力以復活的地盤，同時也就留給帝國主義以侵略的根據，於是形成民國初年間，封建軍閥混亂的局面。因反動軍閥的猖獗，自然革命的民主勢力則相對的消沈下去。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在將近抬頭之時，便遭受如此的打擊，雖然仍在繼續努力，但終是無所得的。至第二個時代的到來，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青年運動中，重復高揭起民主革命的旗幟，婦女運動又在英勇而積極的努力之中，再次抬起，由此逐漸獲得法律上的平等，女子乃有了財產繼承權。直到民國十三年春，更因國民黨的改組而發揚了民主精神，發表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宣言中已賦與我們婦女在經濟上，教育上，政治上，職業上的平等待遇。中國婦女運動，才算是獲得了初步的勝利。就在這種影響的激勵之下，所以我們婦女在北伐大革命中，更廣泛深入的動員了各階層，而盡到了大的努力！第三次，又在民族抗戰初期政治民主化的高潮裏，全民的熱烈動員，有如春花怒放；同時憋伏的婦女，又在溫暖的陽光裏，積極活躍在敵後，前線，以及後方的努力，再次創造了不少的功績。但在局面轉變之後，婦女們又在經驗教訓之中，重復沈沒。在婦女解放和民主革命間，共患難的今日，我們尤須切記中山先生所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訓。

十四、中國婦女的地位

從辛亥革命之後，婦女地位已逐漸在形式上推翻滿清專制政權，而沒有從基本上澈底粉碎封建政權所依以建立的社會經濟基礎，所以使留給封建勢力以復活的地盤，同時也就留給帝國主義以侵略的根據，於是形成民國初年間，封建軍閥混亂的局面。因反動軍閥的猖獗，自然革命的民主勢力則相對的消沈下去。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在將近抬頭之時，便遭受如此的打擊，雖然仍在繼續努力，但終是無所得的。至第二個時代的到來，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青年運動中，重復高揭起民主革命的旗幟，婦女運動又在英勇而積極的努力之中，再次抬起，由此逐漸獲得法律上的平等，女子乃有了財產繼承權。直到民國十三年春，更因國民黨的改組而發揚了民主精神，發表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宣言中已賦與我們婦女在經濟上，教育上，政治上，職業上的平等待遇。中國婦女運動，才算是獲得了初步的勝利。就在這種影響的激勵之下，所以我們婦女在北伐大革命中，更廣泛深入的動員了各階層，而盡到了大的努力！第三次，又在民族抗戰初期政治民主化的高潮裏，全民的熱烈動員，有如春花怒放；同時憋伏的婦女，又在溫暖的陽光裏，積極活躍在敵後，前線，以及後方的努力，再次創造了不少的功績。但在局面轉變之後，婦女們又在經驗教訓之中，重復沈沒。在婦女解放和民主革命間，共患難的今日，我們尤須切記中山先生所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訓。

提高，也是顯然的事實，但這種事實的發展，一是由於革命潮流所激勵，再是由少數先進堅強的婦女，打破家庭牢籠，大踏的走進社會，以鬥爭的精神，而創造出社會地位；自然這種地位，還只限於少數婦女，因沒有民主力量的保障，大多數婦女，仍在壓迫之下呻吟，就是今日還更的問題，有些人認為，中國婦女在法律條文上所規定的地位，已經達很平等的，即或是那些崇美先進國家的婦女，還有些不知我們中國婦女，甚至某些掩耳盜鈴之輩，硬說中國婦女不但已無問題，而且已在享受解放後的幸福生活！那些貪官污吏的太太們正享幸福是不錯的，但她們正是侵奪了困苦大衆婦女的福利。我曾聽到一位法律專家的男朋友說過，「中國的法律條文，對於婦女的規定，確是最平等的。」但我問他：「事實上怎樣呢」？他却笑着答：「正相反，是頂不平等的」。這總該不是我們女性要抹煞平等事實的偏見，所下的定論。

在公洞的法律條文上，所規定的男女平等，我們並不否認。但從事實上看，教育是平等了，但女子求學，只在讀文科，在畢業後作作教書匠的一條路；若商工科或理科，畢業後，在工商，實業，金融各界，只有到處碰壁，被拒絕，又在社會各種事業上，研究理科的婦女是難得位置的；至於已容彩於婦女的職業崗位，還是時刻在搖搖欲墜的危險裏，隨便用什麼理由，都可以擋駕或趕回廚房去。經濟地位呢？不用說在社會各方面，男女作同樣的工作，還多是不給同樣的待遇，就是同作政府機關的公務員，居然可以規定，男的可以領米，而女的無份。政治地位呢？沒說高級的地位，絕無婦女，就是次級或低級的有婦女，也不是有力的背景，便是有人事關係，才能貪綠而得位；再次然是指派幾位女議員代表之類，作作裝飾門面的點綴。眞有經驗能力氣節的份子，是應該被埋沒

Academia Historica

的。至於下層廣大婦女羣，既不給以教育，更無所謂扶植，至今仍在受壓迫，被打罵，遭遺棄，無出路，以至男子公然出賣妻女，或迫於飢餓而出賣肉體，像這些萬言難盡的苦痛，是不是婦女本身的問題？而且在這些問題還依然存在的今日，試問那些平等的條文，究竟給了什麼解決的保障？為此種種，所以我們婦女要求得眞正的平等解放，不但須對憲政有澈底的認識，更需要為促進憲政，實現眞正的民主而負起積極的責任。

五、中國需要怎樣的憲政　中國要求抗戰得勝，建國得成，必須要全國人民，能共同負起責任，因此就必須實施憲政，才能動員全民之力。但中國需要怎樣的憲政，才能眞正動員民力，而對抗戰建國得有所貢獻呢？制定一部良好憲法，作為施行的依據，自然是必要的，但要憲法能發生效力，又必須要有民衆的擁護，如要使人民大衆肯擁護的憲法就必須遵守中山先生所說：「憲法者，人民權利之保障書也」的原則。所以中國需要怎樣的憲政？應注意以下的原則和精神：

第一、要按受遺教，並遵守其博愛大衆，而衞護民權的精神。中山先生畢生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務，給我們所留的寶貴遺教，主要的是有關實施憲政的部份，所以中國憲法要以中山先生的遺教作根據，才是民主政治的眞精神。中山先生當年在廣東女子師範學校講演時說：「三民主義是用來在國內打不平等的。中國在十三年前，有皇帝，皇帝之下還有公，侯，伯，子，男，許多階級，那是很不平等的事情。我們主張民權革命，就是要剷除這些階級，要政治上人人都是平等，就是男女也是平等。」又說：「民權主義是對本國人爭平等的，不許有軍閥官僚的特別階級，要全國男女的政治地位，都是一律平等的」。這便是中山先生對於民主政治一貫的主張。也就是我們人民大衆所希望實現的民主精神。

第二、要切合於時代的需要。憲法是適應時代需要的產物，中國今日正是為了抗戰建國兩大使命而奮鬥，為完成這兩大使命，抗戰需要廣大的民力，建國需要樹立堅強的基礎，都是非要動員雄厚的人力不為功。關於這一點，蔣委員長在第四屆國民參政會開會詞中，曾鄭重的指示說：「中國欲貫澈其絕對必要之作戰目的，更須動員全民，加強長期抗戰之一切設施……政關正有計進攻，我自不容稍有懈怠自滿，一切力量皆須發揮，一切缺陷皆須補……提高民權，加強國本，尤為最要」之務，緊接着說：「用是決議請政府召集國民大會，建立憲政規模」。依蔣委員長的指示，我國非需要動員全民，而配合抗戰建國的要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譬如去年十一中全會又決定改遲在抗戰勝利後一年，才召開國民大會，但在中國抗戰急待準備反攻的今日，「須動員全民」，「加強國本」，仍是最要之務！」並且為了實施政治的準備，尤應即開始政權，應使人民在實施民主的訓練中，得「提高民權」，然後才能使人人得努力於抗戰，而可發揮最後勝利的前途。至於久遠建國之圖，如憲法不能適應時代需要，迷夢的民主的流，能澈底保障民權，則建國的希望，仍恐難以完成。

第三、要注重切實的精神，我國所需要施行的憲政，必須是民主的憲政，所以憲法的內容，是凡涉及民主的內容，都應加以修正。不但要一部完美的憲法，而且如要一切實執行的精神。要憲法的憲法內容，不僅要定了條文，而且還附加上保證實現其條文的憲法。蘇聯婦女，不經過鬥爭，因憲法的保障，文化生活，社會生活各方面，皆享有與男子平等之權利」。除條「婦女與男子平等之權利」，旁加強實現可能之保證為：蘇聯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之權利，旁加強實現

Academia Historica

休息，社會保險及受教育之權利；產妊嬰兒之利益，受到國家之保護；婦女在分娩前後得長期休假，並於休假期內，照常領取薪資；產兒院，托兒所，幼稚園等，遍設各地。」由此可見，蘇聯婦女之所以能得到澈底解放，並不是偶然的，一面固由婦女自己的努力奮鬥，但能使婦女得有盡量發揮能力的機會，還是由於發得澈底的民主政治的保障和扶植。我們中國婦女，曾忍受了幾千年封建壓迫的枷鎖和鐐銬的束縛，而失去了人生的活力，所以更需要民主的設施加以扶植，才能使落後的婦女大衆，走上解放的道路。因此中國婦女對於憲草的研究，是不可忽視的。如「五五憲草」（第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第八條）「中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樣的規定，本來「人民」兩字是包括男女兩性而言的，所以對於婦女不能說是不平等；但依照一般人歷久的封建觀念和習慣，「人民」兩字多是指的男人，而不一定把女人包括在內，所以僅僅這樣籠統的規定是不夠的；必須把「人民」兩字改爲「男女公民」或加以「不分性別等字樣。並在第八條之後，似應另加一條：「婦女在經濟，文化，政治，及社會生活各方面，均與男子享有同等的權利。」本來對憲草的研究，還有很多應注意之點，這不過是簡單舉例，而提起我們婦女的注意。總之，我們對憲法所應注意的，既要有民主的實質，又有進步的精神，更加以切實執行的保障，才能切合於全民大衆的願望，而達到澈底實施憲政的目的。

六、我們應有的努力　中國的民主政治，是全民的民主政治，已早在中山先生的指示之下，奮鬥了數十年，就是求達到四萬萬人有權管理政府的政治。爲要完成此偉大任務，就必須以不分階級，黨派，男女，種族的合作精神，由全民動員而共同担負起國家的責任。所應要推動此種任務，則取得最低限度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是目前最需要的。其次，在四萬萬人中，要使婦婦壓迫的大衆婦女，應與以提攜，却是我們知識婦女不辭的責任；當然應先由知識婦女，澈切到憲政的問題，要注意研究和了解，再切實提倡和推進，然後逐漸聯絡發展到各界婦女的組織和討論，最要的還是深入到下層婦女的婦女運動的教育和扶植。再因要注意到婦女切身的痛苦，而要認清此痛苦的來源，婦女們要與聯合的精神，實際的行動，共同保衛自身的利益，凡是以封建男權反民主的行爲，施與婦女的壓迫，要共同一致給以反抗和打擊。爲要促進憲政，無論在任何婦運工作，都要以身作則，表現民主的作風；領導幹部，教育學生，協助同仁，隨時都要訓練其學習民主方法，作爲到實施憲政之時，婦女絕不落後的準備。我們要認清真正民主政治的路線，不受欺騙，用切實深入的精神，努力推動。我們應注意國際婦女的發展與進步；也要注意國內，如西北晉察冀邊區各地的婦女，是怎樣走上進步之途，而普遍獲得縣長，區長，村長等的參政與爭錄的權利？都是與我們努力的參政和自己爲要實現我們重大的責任，更重要的還是要加緊充實，自己的知識思想和能力，以增強我們婦女工作的效率和責任心，不要再給某些男性以口實，說至今男女的不平等，還是由於婦女努力不夠的原因。最後我們更要明瞭，要求實現民主，而是爲了全國廣大人民的福利；要求婦女解放，也是爲了全國婦女的解放而努力，絕不是爲少數婦女的參政或作官。而且我們不但希望中國全民能享受真正民主的生活，尤願早日使世界也成爲人類民主的樂園，才算達到人類合理生活的目的。

Academia Historica

甘地與納會談在印度復國史上之意義

孫寶毅

(一)印度亡國之原因

印度面積二百萬方里，人口四萬萬，其文化遠在於巴比倫與埃及，紀元前三千年已有繁華之城市，其物產極爲豐富，其蘊藏之鐵鑛約三〇〇〇（百萬）噸，煤礦六〇〇〇（百萬）噸，水電三九（百萬）馬力。以如此地大，物博，人衆，與歷史悠久之泱泱大國，而近二百年來，竟備嘗亡國之痛，豈不怪哉？易詞言之，印度土地之廣大，十九倍於英國，其人口之衆多，十倍於英國，而印度竟亡於英國，其故安在耶？

關於此，尼赫魯氏曾有所答覆，並感慨言之曰：

「印度陷於此境，究由誰負責？非印度之衰弱與愚昧有以自召之乎？一民族之衰弱與愚昧常招致外族之侵略與橫行，英人之佔印度，由於吾內部之自裂自爭，此內部之自裂自爭，非英人之過，而吾人自身之過也。或曰此由於英人之離間分化，利用吾印內部各派之自私心而擒縱之，必吾內部之本分，而後彼得而利用之，故許其爲此者，其責仍在我而不在英，印之內部分而彼之內部不分，即英之強，而吾之弱也。」

(二)印度之覺醒

英人之統治，搖撼印度，使印人對於政治的統一與民族的獨立，有所覺醒。一八五七年之印度兵變，是爲印度民族主義興起之信號。迄乎今日，所有印人，尤以知識份子爲最，皆稱爲民族主義者，無不可焉。印人中之擁護英人統治者，雖感謝英人確有加惠於印人之處，但認爲印度之自負其責，與夫享受自治政府之權利，已不容再緩矣；至反對英人統治者，則根本認英人統治爲萬惡之源，而有不共戴天之感。

甘地氏對於印度民族主義之發展，貢獻最大。一部份由於其個人之感化力，一部份由於其手段之巧妙，一部份則由於其所憑藉之國民大會黨之組織嚴密，遂使彼今日成爲印人崇拜之中心，被稱爲釋迦以來最偉大之印人。

甘地最成功之點，爲其善於運用各種象徵，以推進政治運動；如彼提倡購買及應用 Svadeshi（印人自製之物），使印人對印度獨立有具體之瞭解，並以之爲抵制英人之最切實之方法，彼又提倡印人穿着印人自己紡織之 Khaddar，並鼓勵印度農村努力紡織，使民族運動之意義深入於全印農人之心中。彼所宣揚之 Ahimsa（非暴力）則深合印度教之教義；彼所主張之 Satya graha（非暴力抵抗），則不但爲最適合於彼之天才之發展，且爲攻擊英政府最弱點之最有力之利器。

甘地氏在印人之心目中，固爲聖雄也，但在西方人士視之，則爲一不可瞭解之神祕人物。彼雖反對工業主義，但不反對資本家教，但亦混合其他宗教。彼雖反對工業主義，但不反對資本家。彼雖反對任何方式之暴力，但彼容許英美軍隊駐紮印土，以保衛印度。彼雖發動英人退出印度運動，但當行將被炸之際，彼曾一灑同情之淚。

然而尼赫魯氏則爲西方人士所能充分瞭解者也。彼受西方自由思想頗深，其平日所發表之政見，亦與西方人士每日所耳

視目聽者，曰國際主義，曰社會主義，曰反法西斯主義。彼之主張，因之有時與甘地氏不同，但為團結起見，彼每犧牲己見而尊重甘地所堅持者，此自不失為大政治家應有之風度也。

印度之民族主義，在甘地與尼赫魯等輩領導之下，遂如火如荼，有不可遏止之勢。西方人士或不能瞭解甘地氏，但必能瞭解尼赫魯氏，是故對印度之民族主義與夫獨立自主之決心，猶欲不予以認識，而思設法壓制之延擱之，豈非天下之大愚事乎？

（三）英人不能永久統治印度

英人對印度民族主義之興起，亦豈嘗熟視無睹哉！英人統治印度之初，即自認不能永久統治印度。一八三三年麥考萊氏曰「印度必有一日有歐洲式之自治政府」，即其例也。後因印度民族運動之威逼，英人曾作數次之讓步。一九一七年印度大臣蒙太格氏宣佈英國對印度之政策，於任何行政部分增加印人之參加，並逐漸發展自治制度，使印人得以逐漸實現負責的政府，而成為英帝國不可缺之一部分。兩年後，乃產生所謂蒙太格柯姆斯福特印度政府改革草案。該草案創立一種兩重管轄之制度，僅許印人以相當程度之各省自治權，至各省之財政與維持秩序之兩大行政權，以及全印之國防外交財政等大權，則非印人所能預聞。印人不滿該草案，自在意中，甘地氏遂於一九二〇年，出而發動所謂不合作運動。英人為壓制該項運動計，通過羅蘭特法案，給予警察以特權。於矣遮普之阿姆利則城，英司令戴葉命令兵士向印人擲槍，亦手空拳之印人死傷者千餘人。戴氏之緊急措施，英國上院認為適當之舉。印人之反英情緒，一時不可阻遏。印人相約不與英人之任何政治經濟社會機關相接觸，不做英人之官，不讀英人之書，不買英人之貨，罷工與暴動，遍及全印。阿城慘案之陰影，永誌於印人之心中而不忘焉。

此種英印間之緊張狀態，直至一九二八年，始由英政府派遣西蒙委員會赴印調查，以謀改善之道。西蒙委員會之報告書中，雖建議兩重管轄制度必須取消，但對中央方面，則隻字不提。甘地遂又發動反抗鹽政運動，親自率領民衆，趨赴海濱製鹽，嗣後其範圍擴大而為民事反抗運動。印督歐溫爵士（即今英駐美大使哈利法克斯氏）懼事態之擴大，乃召見甘地，成立甘歐協定，甘地允許參加倫敦圓桌會議。甘地頗後悔參加該項會議，民事反抗運動又起。

一九三五年英政府頒佈印度法案，或曰新印憲。該法案中規定印度省政全由印人自理，但省督仍為英人，且保持種種特權，至中央方面，則成立一聯邦政府，由英屬印度與藩邦各派代表組成，但國防外交等大權，仍由總督及英人保持。國民大會黨，初對此項新憲，不表贊同，認為其不合印度完全自由之要求，但終於同意參加各省選舉。（在十一省中，該黨佔勝八省）。

印人雖由於英人之屢次讓步，在地方政治方面，享受完全之自主權，但全印之國家大政，則仍操於英人之手。一九三九年世界第二次大戰爆發，印督不經印人之同意，宣佈印度為交戰國。國民大會黨認為英人顯然仍以印度為奴隸之國，故通令該黨之中央議員與各省之官吏，一律辭職，並決定不參加戰時工作。吾人若以此論斷該黨對此次戰爭根本無興趣之可言，則又屬錯誤之見矣。因該黨曾發表宣言曰：「印度不願參加以帝國主義為目的之戰爭，但願竭力支持為民主主義而戰之戰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換言之，該黨一方面反對法西斯與納粹主義，但同時亦反對英國帝國主義亦已。

（四）英人給予印人之「期票」

太平洋戰爭爆發，英帝國主軸心間東西交迫之下，危如累卵，為增強其戰爭力量計，乃不得不作更大之讓步，謀打倒英印僵局。於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英政府宣佈派遣克利浦斯氏赴印，向印度提出「準備與印度各領袖進行討論之宣言草案」。其要點在建立一個新印度聯邦，其地位與各自治領完全相同，其內政與外交絕不受英國之支配；戰爭停止後設立選舉代表團，擬定印度新憲法；新憲法內規定各邦亦得參加制憲機構，新憲法擬定後，英政府決予接受，並立即實施，惟有下列條件：（一）英屬印度內任何一省倘不接受新憲法，應有權保持現下之憲法地位，此等省份倘於將來決定實行參加新印度聯邦時，仍可加入，英政府準備與之協商另一新憲，其地位與新聯邦完全相同；（二）英政府擬與制憲機構進行談判草定條約；英政府保護種族及宗教兩方面之少數份子之諸言，應列入新約；各邦無論是否接受新憲法，如需與英政府進行談判，以修改條約關係，則兩方應舉行此種談判；在目前戰時殿重局勢時期以內，及新憲法草成以前，印度防禦問題之統制與指揮權，必須由英繼續担負完全之責任，作為英作戰努力之一部分，而印度軍用物資之動員，則由印度政府在印各民族合作之下，負其全責。

英印談判初時相當樂觀，但終因國防權限問題與臨時政府方式問題，宣告破裂。克里浦斯於四月十一日在疲憊之狀態下，毅然離印返英。

四　國民大會反對英案之理由

（甲）該案並不給予印度負責的戰時政府，其所給予之國防權限，亦涉不通道路（二）該案容許印度境內有無數自治領之組織，與印度統一之原則相反，（三）該案規定任何一省可不參加聯邦，亦保證成印度將來糾紛之大因。要之，國民大會認着眼於現在之鬥爭，與英國草案之專以未來制憲問題為搪塞，自有格格不相入之處。回教聯盟反對英案之理由，則為英案不能使彼滿意，巴基斯坦問題，倘克教徒則因在英軍見時代，曾受種種壓迫，故對回教徒有懷疑恐怖心，彼等因以為理由反對英案，認不但與英人予錫克族以在英遮普省居住之權利，且有分省及建立巴基斯坦之趨勢。印度教大會自印度教中心於戰鬥性者，素主張印度應由印度教統治，故與回教聯盟勢不兩立，雖因教聯盟與國民大會為印度教之問題，但在印度教大乘會觀之，則國民大會為印度回教聯盟之態度過於妥協，英方草案雖經規定回教聯盟之處，印度教大乘會自亦者亦不能接受矣。國家主義者，如民族自尊之輩，雖主張鼓舞溫和，但亦主張反對成立獨印度聯邦，認為印度由地大上言，乃一聲獨之單位，且有一貫之歷史文化背景，故未來之印度應以統一為唯一之基礎，今英方不許印度有自主權，而是要使各省取得與各邦王公，亦因草案未清楚闡明有關彼等之各點，反應亦屬不佳。

英方之草案，原在各方討好，但結果為各方反對。英對印度案之最後之想像力，與夫不願立刻放手印度之心跡，顯然可見矣。在印人方面，明知英人在目前必須控制印度國防權，且即使印度得以組織新政府，英人亦必以總督者臨其上，此克利浦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斯所謂「印度國民政府」無須向總督負責，此種政府勢將成爲獨裁制」是也，但印人因其理由之正大光明，毅然決然提出印度完全獨立自由，自組織國民政府，自管理國防事宜之要求。英方與印談判之目的，原在增強戰略地位與作戰力量，以應付當時之緊急戰局，故給予印度以戰後完全自由之「期票」，但印人之目的，則在利用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以達到彼等歷年來所奮鬥之目的。雙方之目的不同，心緒各異，又加上歷史所養成之偏見，欲求談判之成功，實戛戛乎其難也。

（五）印人請英人退出印度

克氏之訪英，不但未能打開英印僵局，且使關係日益惡劣。一九四二年八月八日國民大會黨通過「請英人退出印度」之決議。英方先發制人，於下日逮捕甘地及尼赫魯阿沙德等。不服從運動隨之蓬勃興起，示威，罷工，炸彈，放火，暗殺，流佈全印各地。英方將此項破壞社會秩序之責任，歸之於國民大會黨。甘地對此表示抗議，於一九四三年二月在獄中絕食三星期。彼且曾致函印督，請其予彼調查其責任究應誰屬之機會，或允彼與國民大會黨其他領袖會面，以重行考慮彼等之方針。但印督嚴予拒絕，認爲「英人退出印度」決議未取消以前，不服從運動公然威脅之際，彼實無能爲力。全印大騷動，由於英方之鎮壓，雖未演成滔天大禍，但英印間之關係，始終處於此種僵局狀態之中。迨今年五月六日，英方鑒於甘地之病況，以保治與人道上之理由，無條件釋放甘地。甘地在獄中居一年九月之久，在此時期中，世局變化相當激烈，德日當時有不可一世之概，現今則處於日暮途窮之境矣。甘地素稱善變之政治家，豈有不見此種情況之不同，而不謀政治策略之改變乎？

（六）甘地非取印度獨立自由策略之大轉變

甘地氏身體恢復康健後，又面面從事政治運動，政治家固以身許國者也。但其主張，已有極大之轉變。彼對其記者云，彼今日之要求與一九四二年要求不同，第一、彼之意愛動不服從運動，第二、彼願協助盟國之作戰努力，第三、彼日新月成立國民政府爲滿足，就軍事行動言，總督與總司令有極圓之全權，但國防部應在國民政府之手中，即供給軍事上之一切需要，第四、總督仍可存在，但應總從責任閣員之意見。曾有人認爲甘地今日之立場爲開倒車，甘地答曰，如此建議印度獨立，雖開倒車亦屬無害。有人又曾問甘地，印度國民政府成立後，是否將對日本作戰，甘地答曰：「然」。若人問甘地之言，不能不佩其隨機應變之天才，與夫其過人智慧之超人。

於七月二十七日，甘地將其「具體」建議，正式致函印督。但印督回信甘地云，其建議與一九四二年阿沙德提交克利浦斯者相似，英方拒絕甘地之建議，其理由與當時拒絕阿沙德建議正相同，在戰時結束前，國防與行動之責任，不能與政府之其他責任分開，在此期間中，英政府與總督必須繼續負其全責，是故甘地之建立向中央立法會議負責之印度國民政府之建議，礙難予以接受。

今日之印督爲魏菲爾將軍，其態度全從軍事着眼，自不愧爲軍人本色，但不免使世人從此證實彼等以前所持之懷疑，即英人實無意立即放棄統治此四萬萬印度人民之權力也。

（七）印度獨立自由乃印人自身之問題

Academia Historica

前美總統羅斯福氏之派印專使，現任美政府駐艾森豪威爾總部之政治顧問費立濱斯氏返美之際，經約翰報適於此時添備其有關印度之報告，有人遂謂費氏之召回，乃應英方之要求。於是，英美之間，因印度問題，又引起外交之波瀾矣。費氏之報告全文，吾人無法探得，但據云其要點為英方對印度之態度足以妨害該戰區之作戰努力。德國擊潰後，戰事移至遠東，印度為進攻日本之重要基地，從軍事上言，盟國對印度問題，自應加以過問，美國之所以時與英國，因印度問題發生瓜葛者，其原因即在此。然而所謂印度問題，一方面為英國之放不放問題，從另方面言，則全屬印度自身之問題也。印度之所以亡，由於自身之自相爭，而印度之所以迄今不能掙脫英國之桎梏，其大原因亦由於其自身之分，至少英國之藉口乃如此。亡國之原因自為不能復國之原因，此誠為印度之悲痛史。印之內部分，則亡，則不能復國；印之內部不分，則不亡，則能復國。至今內部尚未團結一致之國家，對印度之慘痛經驗，豈可不以此為殷鑑耶？不求團結，不求一致，但求爭權奪利，雖為其一黨一派快意之事，但奈國家之不能復興乎？

印度內部本身，相當複雜，此乃不可否認之事實，舉要言之，約有以下三端：第一，印度民族主義者，對於脫離英國統治一點，或可獲得同意，然而對於彼等在獨立印度中之地位，則頗有爭執。國民大會黨主張全印統一，但印度第二大政黨回教聯盟則主張巴基斯坦，在印度教國家以外，另成立回教國家，其範圍包括孟加拉、阿薩密、旁遮普、信德、俾路支、西北邊省。印度聯合政綱印度教大乘會，則堅決主張應由印度教統治全印，反對回教聯盟之巴基斯坦，並極力阻止回教統治之再起。此外旁遮普省中之五百萬錫克教徒，亦堅決反對回教聯盟之巴基斯坦。第二問題則為不可觸階級問題。甘地雖極力提高該階級之地位，稱該階級為上帝之選民，但一般印度教徒，仍加以蔑視。國民大會黨獲得政權後，不可觸階級能否獲得相當之地位，實屬疑問。第三為藩邦問題。藩邦之數約五百六十二之多，雖與英方分別訂有條約，但與英屬印度根本無政治上之關係與義務之可言。藩邦之政體，為專制政治，其中有數邦較開明而已，但國民大會黨則主張民主政治，兩者是否可以組織聯邦，已成問題，至於能否一體實行民主政治，則更屬不可知者矣。

（八）印回團結為印度復國之主要條件

但印度內部問題，其主要者究為印回團結問題，亦即國民大會黨與回教聯盟間之問題。是故甘地出獄後，即表示極願與真納會談，希望彼此真誠相見，尋取共同方案，以謀解決印回間之問題。嗣後經查理氏等之斡旋，甘地贊同以下之建議：回教聯盟接受印度教派之要求，與國民大會合作，戰時組織臨時政府，戰後設立委員會，劃出印度西北部與東部回教徒絕對多數之區域，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是否成立主權國家，與印度教區脫離；但分立各國之間，應有共同協定，在國防與商務方面互相合作。此項建議符合「巴基斯坦」之要求，回教聯盟或有接受之可能。國民大會黨中之回教徒份子，本不在少數，主席阿沙德氏即為顯著之一例，且今日之回教徒，其祖先亦多屬印度教，故印回團結，本非如水火之決不能相容。此次甘地已作極大之讓步，若真納不再有所苛求，印回團結前途實甚樂觀也。

甘地與真納之會談，以及印回兩教之日趨接近，吾人又須

Academia Historica

歸功於查理氏之耐心與堅定。查理氏現任馬德拉斯省總理，其女婿甘地之子，原屬國民大會黨，後因憎該黨對回教聯盟之態度過於遷就，故宣告退出。

印度復國史上展開一新頁之甘地與納會談，終於九月九日在孟買與納寓展開幕矣。兩氏見面時，曾互相親熱擁抱，而全世界關心印度之人士，亦集中其目光於兩氏之身。甘地氏之辭就教，可見其謀國之忠誠。而真納氏亦自覺其責任之重大，故對甘地曰：「吾人如不能成立協議，而忽然分離，則吾人即將宣告吾人智慧之破產，而吾幾百萬人民之更大希望，亦將完全粉碎。」

此次甘地與納會談，吾人認為有一最大之意義在焉，即印人一致覺悟印回團結，為印度復國之主要條件。以前有人曾謂英人退出印度之後，印回問題始可解決，現或已認為先解決印回問題，然後可使英人退出印度耶？英人之所以能統治印度，而於印度內部之分裂，而英人之所以不立即放手印度，其主要藉口亦為印度內部之分裂，將使印度內部造成無政府狀態，甚而妨礙盟國之作戰努力。英人之理由，雖令印人不勝其憤慨，但自有其現實性在焉。若印度內部先謀得團結一致，則不但英人無藉間分化之工具，且試問英人尚有其他理由堅持印度之不能立即獨立自由乎？此吾所以聞甘地與納會談之消息，而不禁喜而雀躍也。國家內部團結一致，為一切問題之先決條件，反言之，國家內部自裂自爭，乃招致亡國之大原因。若內部團結一致，即不幸而亡國，亦必有翻身復國之一日。誠如英儒拉斯基所言：吾人之經驗中，從未有何種事物，可證明任何國家或階級有足以接受統治其他國家或階級之委託。然而吾人之經驗中，亦從未有一國家或階級足以長久統治一內部團結一致之國家或階級。此文之作，即所以預祝一獨立的，自由的，光明的，強健的印度之出現，殆不遠矣。

（九月十八日）

陳莊竹徑

一徑蕭森萬玉椽，破雲龍影落中天，寒鴉飄盡青山淑，日暮何人倚翠烟。

再宿天師洞　老秋

塵網深深人漸老，已拚多難送中年，松間小憩能忘世，又入青城古洞天。

贈趙二秘監　南鷗

北落昔荒墟，今茲忽仙境，嘉樹翳中林，理棧結巖嶺。舟車宛游龍，衢術快騁騁，翩翩此瑋村，志業共春永。荊瓊琢頑石，霜鬢翻自警，廿年胼胝勞，幽意慨獨醒。嘉陵高墳碧，訪書縱橫橫，江山深情致，美願尤興哀。

Academia Historica

馬來亞的政府

張禮千

殖民政府自然沒有憲政可言，更說不上民主，可是它們所以生活總可勉強維持，其二，近似的事，也有不少令人滿意的地方，像爪哇和馬來亞的政府，對交通建設的積極，產業開發的興盛，眞是有目共睹的。凡入其境者，莫不感覺路平如砥，塵沙不揚，兩旁綠樹成蔭，一望青葱可愛，民少飢餓之色，路無熱死之骨，盜竊無聞，乞丐罕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之風，可於比地得之。當一九三〇年的前後，南洋土產猛跌，其產勢力乘虛而入，新嘉坡的馬路中牆壁上都寫標語，宣傳文件到處亂貼，當時余適主持一間名聞南洋規模宏偉的中學，學生三百餘名幾盡有左傾思想，一日華文教育當局巴素博士到校視察，與吾談起這個問題，似頗不安，余告博士曰；這裏的居民都有事做，都有飯吃，共產主義是不會生根的，政府爲防患未然計，嚴密注意，理所當然，但大驚小怪妹可不必，兩三年後共產壓勢終於沈寂下去了，爪哇地狹人稠，居民密度之高甚於江浙，生活競爭自較馬來亞深刻，而荷人之治理殖民地又遠比英人爲嚴，故爪哇地方，黨派林立，大施活動，其中以印度尼細亞黨和共產黨最有勢力，當時有一日本浪人是頭山滿一流的人物，名叫竹井天海，居爪三十年，著書甚多，是日本惟一的爪哇通，乘機煽惑土人，推翻荷蘭治權，事爲政府所悉，查有實據，遂將竹井驅逐出境（一九三四年日荷會商貿易協定於爪哇，日方派長岡森一爲全權代表，竹井曾行賄與荷人以難堪）竹井氣終不作，然爪哇土民之所以不能發生煽動者，還另有兩個主要因素，其一，爪哇土人生活程度極低，每日有二銖二仙的收入，吃飯便無問題，而千人每月所得的工資至少在六盾左右，所以生活總可勉強維持，其二，近十餘年來荷人鼓勵爪哇土人移植蘇門答臘，已見成功，我想此項政策荷人不但在戰後仍繼續施行，且將推及於婆羅洲摩鹿加甚至新幾尼亞，由是爪哇人滿之患可以消除。所以據我個人二十餘年的觀察，英荷兩國在南洋的殖留政府，對其統治區域內老百姓的民生問題，可說解決了一大部份。然而英國人和荷蘭人總不免有榨取之嫌者，爲甚麼呢？這是因爲他們政府裏的官吏和銀行公司裏的大班經理，過於享受的緣故，關於這點。荷人比之英人尤覺過分，在爪哇地方，就是一個普通的荷蘭人，總有一所雅潔的住宅，宅前有精致的庭園，僕役因五族，即入有汽車，至於要人和闊人的起居動用之豪華，自更不必說了，以土人之感，當然也會想到彼我距離之遠，由是發生反感，毫無可疑。英人的方式和荷人不同，雖知新嘉坡東陵的英督住宅，雖甚堂皇，但比之吧城的荷督住宅，海內的法料往矣，究相差甚遠，馬來亞的大礦場大農場大銀行大公司，由英人經營的固爲數不少，然它們的大股東却都在英倫，所以大班和經理實際上不過是一個帳房先生罷了，那敢有過分奢侈的享受，這是英人比荷人的聰明處，而骨骼還是英荷兩國殖民政策的不同。荷人的政策是要把爪哇變做荷蘭的一部，到爪哇好像到了自己家裏一樣，希望子子孫孫永遠居住下去。英人的政策是像倫敦把馬來亞變成英國的屬國，換言之，就是要馬來亞的各色居民全部英國化，而成爲英帝國的好百姓，至於英人自己除希望永遠握有統治權外，自不想長久在此落籍之地。所以新嘉坡的名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律師不老頭兒（R. Bindell）號爲文鼓吹，說其若祖若父，均久居馬來，均克享高齡，然終激不動一般英人久戀之心。這是英荷兩國對南洋殖民地觀念的分野，爲我們留心南洋問題者所應注意的。我常把閩僑比荷人，粵僑比英人，也是這個道理，以上所述是本文的弦外之音，現歸本題，談馬來亞的政府。

馬來亞小如彈丸，還不到四川的一半，比廣東小九千方公里。比福建大些，然而它的政府機構真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我們用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話，來喻馬來亞的政府，是再恰當沒有了。這塊小小地方，分做三個政治單位，一海峽殖民地由英國直接統治，其中重要的是新嘉坡檳榔嶼和馬六甲（婆羅洲附近的納閩也是海峽殖民地之一，此外還有直轄新嘉坡很遠的若干小島）華僑稱三州府。二馬來聯邦，是由霹靂，雪蘭莪，彭亨四州合成，故僑胞稱爲四州府。合此三單位，僑胞又呼爲七個府。三馬來屬邦，一共有六州，五州在馬來亞，一州在婆羅洲（即文萊），其中馬來亞者，即柔佛、吉打、吉蘭丹，丁加奴和玻璃市。（是近看到一本地理指南書，說柔佛、吉打、吉蘭丹、丁加奴、玻璃市五州府，這是不用的名稱，華僑於絕對不用的名稱，這是英國保護領，三屬邦單位，換言之，就是英國保護領，各自政府的首腦是蘇丹，蘇丹有治治，一任五年，任滿可連，下世行政長官和立法議會，兩者有議員九人，計官吏佔七席，門補政司（即海峽殖民地總督長）軍務長檢察長財務長市政委員長和檳榔嶼及馬六甲的民政長，非官吏的兩席，土生華人之涉獵者有時可得一席。後者有議員二十六人，官吏和非官吏的各佔半數，非官吏議員的分配爲華人印人和歐人的代表各佔三席，西人總商會的代表二席，馬來人和歐亞混種的代表各佔一席，這個代表民意的機構，英人佔最大多數，這是政府要實施的策很易通過，人民要反對的案則難一邊倒，但也不盡例外，令人快意之舉。當金文泰任總督的時候，有一項遊艇費用，列入預算，年需三十餘萬元（叻幣，下同），卒遭立法會議否決，新嘉坡築軍港之初，馬來亞的負担過重，庇經會議通過，由奧洲與錫蘭分負，上次歐戰之後，政府還沒所得稅，終以個人收益有限，會議不予三讀，這些殖民政府的民權精神是值得贊揚的。海峽總督兼爲聯邦和屬邦的總監，其各州間各有一蘇丹，各有一英駐劄官或英顧問，各有一州議會，在州議會中，平民可得代表一二席，今居陪都之責樹芬先生曾在州議會議員之一。至聯邦和屬邦不同的地方，就是聯邦有一個聯邦政府，它的重要長官是英委的聯邦秘書長，下設一聯邦議會，由總監總督長四州蘇丹四州駐劄官法律顧問財政顧問及華官吏的各民族代表六人組織而成，凡聯邦議會中通過之法令方案，在州議會中不得反對。不過馬來人和英人當有一段爭論，就是有關土地保留問題，當保留土地議會中加入討論，聯邦議會絕對無討論之權，除此兩外一聽之，這種方式，爲之政治學者稱爲三權方式，爲保護領，然究民權之不同，其行政機構與權限，有僅限於七州府或四府或三州府者，有之，施政分歧者有之，但總以英人主權不見其分歧，分歧不見於侵凌，居民安樂，總督有力，凡居馬來亞者，莫不盛道英人的治績，當每一機構之與，總是因事設官，斷不因官生事，至有事無官之際，必先派人去調查去研究去考察，適人才已備，主持有人，機構始立，所以事不合官，官不配事的情形，是絕無僅有的，此與國侵擾官，因官生事的政府；其間實有霄壤之別也。

Academia Historica

新嘉坡是英王王冠上寶石之一，也是全南洋的海陸空樞紐，然而馬來亞的重要行政機構並不完全設在新嘉坡，這是英人因地制宜的好措施。這有性質類似的事業並不容納於一機構內，分別辦理，這是英人因事制宜的好辦法。現將全馬的重要行政機構開列於下，凡機關名稱之上附有馬來亞者，其政令可通達全馬，附有七州府者其政令不及屬邦，但得為屬邦之顧問，如有例外，另加說明。

馬來亞華民政務司署（附設於該署之機構，請閱本刊第一期）

馬來亞國庫署（該署所發紙幣通行於全馬及英領婆羅洲）

馬來亞漁業局（附設漁業學校專收羅馬來子弟）　七州府

提學司署

海峽統計局（專司出入口貿易及人口等一切統計事宜）

防軍總司令部　義勇軍總司令部　以上設於新嘉坡

七州府農業署　七州府森林局　七州府地質測量局

馬來亞橡膠研究院　馬來亞獸藥研究院

聯邦鐵道局（統管全馬鐵路事宜）　以上設於吉隆坡

七州府礦務署　設于霹靂之巴都牙也（Batu Gajah）。

凡重要行政均有之機構而以在新嘉坡為規模最大者，有：

郵務署　郵政總局（兼管電報）　雅片專賣局　土地局（在新嘉坡的極小）

警察局　偵探局　救火局　衛生局（通稱鄉區）　船舶檢查所

植物園　博物院　圖書館　政府印刷局

高等法院（凡不服該院判決之案可再向倫敦大理院上訴）

地方法院　遠藝裁判所　驗屍庭

市政委員會（內設市政會議華僑有代表數席）。該會之職掌為管理全市道路、溝渠、醫院、清潔、水電、和建築等事宜。市區以外之公路，另由工務處辦理，同時該會得徵收地稅，建築稅，教育稅，各種牌照稅，車輛執照費，水電費，和煤氣費等。

我們看了上面的機構殊無系統可尋，可是辦理得頭頭是道，絲毫不紊。如政令之須通達全馬者，一經立法會議通過後，聯邦和各州的會議也能一致通過，英國人的政治頭腦真使人佩服。譬如拿衛生來講罷，凡到過新加坡的都要為世界上最清潔城市之一，歐洲人的死亡率僅千分之六點五，鄉僻之區苟有積水，於每日清晨由吉寧工人用藥水噴射，所以像這樣炎熱的地方，少見蚊子蒼蠅，這與羅宋學田兩溝之臭水橫流，蚊蠅滋蔓者，實大有不可同日而語之感。農業署之內容高分完備，計有種子、肥料、害虫、灌溉、家畜、淡水養魚、合作、農貸、出版、宣傳及農業經濟等各部門。另設一大規模之農事實驗場，場內附有農業專門學校，吾國桐油樹在彭亨種植之成功，即該場研究的結果。二十年前馬來人之蔬菜味帶苦澀，自廣行高地栽培以來，所產幾與閩粵相埒，而水芹蔣茄馬鈴薯等或且過之，人定勝天洵非虛語。稻種試驗場部至四五十處，出版之中文農業叢報和英文宣傳品一律贈送，到鄉間去宣傳悉用電影，不倚空談，全憑事實，故時傳兩十年，而農業之發達已與爪哇錫蘭相等矣。至民地的教育政策目前可有全人非議的，然並沒有絕對統制的辦法，我可以舉一件事供主持教育者的參攷，約在五年以前，有一英人名齊士曼者，任代理提學司（即教育部長）之要職，其人倡議一套馬來亞新本，由倫敦編輯遞交司印行，出版以來倘能行銷英校，而華校則以該書馬來風光過重，不甚歡迎，於是齊氏利用其權位，通知華文圖書提學司設華校一

使採用，事爲僑教之發美倫及郎門士等大書局所出，與告理藩部，該部認統制教科書這要不得的，卒告新嘉坡總督請降氏歸去代理提學司職務，一場風波，始告平息。當佛士學院（同大學程度，因爲還沒有完備，所以不稱大學）開辦之初，曾聘了一位年紀未滿四十的歐學教授，海峽泰晤士報即爲文譏笑之，蓋英國的大學教授，除拉斯基等特殊人才外，其年大概都在四十以上，我們看了上面兩點，知道英人對馬來亞的教育也是他們當注意的。

上述機構有一特點，就是施政與研究並重，如農礦漁林和地質測量等衙門，甚且研究重於施政，所以除軍警等機關外，都有精深著作明細圖表和詳確報告出版，一律公開發售，並無機密意味，不過於英德開戰遠東風雲緊急之時，僅對地圖與年鑑一種予以限制而已，但如向政府印刷局申請，獲得許可，仍能買到。在出版物中比較普通而是供行政人員參攷的是各衙門的年報，分本合本任人選購，一九四〇年出版的是皇皇兩巨冊，厚數千頁，售價不過六元，其中所載，盡是行政立法市政諸會議所通過的議案，這原是一個帽子，倒無關重要，最值得一看的，還是庸政方針，施政計劃，工作進行，和工作成績的分析詳盡，敍述詳遺，所以讀英文的老百姓如能買了一部，放在手頭，那末對政府某一年中的動態，便瞭如指掌，這也可算得政府對老百姓的一種交代，並且也多少有民主的意味。還有一種舉世聞名的藍皮書，海峽政府亦年出一巨冊，書中所載多關政府經費事項，最有趣的一門叫做Establishments自總督以至公役的俸給都開列在內，現舉其要略述一二：總督的年俸是五千鎊，除歸英政府發給，其公費則由海峽聯邦和馬來邦分担，像提學司華民政務司以及局長署長等，都是甲等一級的文官，年俸是一萬〇八百元，華人在政府中，最高的官如孫崇瑜先生年俸是七千二百元，華文副提學司（英人）是甲等三級的官，年俸是六千六百元，一個博物館和圖書館長，一個久任的中學校長，其年俸與甲等一級文官相同，所以中學校長不但做提學司，植物園長不想做農林署長，這樣以學術經驗做標準，不以地位高低去衡量的辦法，是安定政治的一種重要因素。還有馬來亞的學術機關以及含有學術性質的機關（如農林漁礦地質測量衛生統計等），其首腦都是學有專長經驗宏富的人物，如新嘉坡的植物園長李總當任職近三十年，白克萊任職近二十年，他們都著作等身，對世界學術界貢獻甚大。

英德開戰後，在新嘉坡也成立了不少新機構，值得一說的計有三個：一是情報局，兼管宣傳和書籍等檢查，組織非常龐大，每月經費七十五萬元，宣傳方面總有盡有，供給華僑的讀物，就有兩種報紙，檢查方面辦得十分嚴密，有一次檢到幾封信，由信獲得線索，知有敵方輪船三艘，將經過印度洋，結果敵輪被捕，因獲物資數千萬元，這是情報局的一樁大功。吾在三十年冬初，將要來滬之前，把所帶的圖書數箱送審，兩日而畢，取還箱子時，均用麻線束紮，線端以錫熔封，上加烙印，這是告訴我們在沒有離開新嘉坡時是不准開看的，迨到卸光，啓箱檢點，僅缺少了一幅詳細的新嘉坡地圖。十二月底到滬時接友人來信，謂圖已送還，其辦事之週到認真，夠使人信任罷。二是戰稅局，專徵所得稅（包括營業所得和個人所得）售物保險稅（凡國貨之公司廠家商店須一律向政府保險納費）和遺產稅等，後者的稅率極重，凡家產滿一千萬或以上者，須繳百分之六十，當時年老富僑無不憂心忡忡，深恐一旦死去，財產大部被征，因是遺戶化名著，不無乘時而趨，戰局爲預防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特別職員，迅速地以最簡單的方法，使各人產業，保無一絲遺失。據吾所知，有兩個華僑遭此厄運，一是暹羅華僑公益事業，一毛不拔的余東旋，死於他在香港所築的別墅中，被他的黃某被征七百餘萬元，馬來亞政府風俗此項法令，華僑雖不滿意，但英本國以及任何英殖民地均同樣辦理，非常公平，故無敢異議者。三是外國統制局，該局對僑匯數額雖一再修改，最後決定為每人每月每次准匯歸二百五十元（荷印僅准匯五十元），華僑之欲歸國者准帶現款出口一百元，但如有正當理由，提出申請，立可多准數百元，其辦事之簡易了當如此，然亦極少有弊竇發生，其時不必要貨物的入口亦須申請，如一經批准，貨款即可照單匯出，決不為難。物價管制亦極嚴密，例如糧食一項，售者須標明每斤或每斤之價格，違者重罰，依在歐戰兩年期間，新加坡之一切物價漲落極微，凡戰時一切新法令新辦法均在憲報公佈，除須別設機關辦理者外，像管制物價等重要事情，倒並無專司其事的機構，大概由警察局代為執行罷。總上所述，僅係一鱗半爪，寫些出來，聊供吾人之參考與借鑑耳。

三三、九、九、渝

竹樓隨筆（一〇）

舜生

翁叔平（同龢）李純客（慈銘）王壬秋（闓運）葉菊裳（昌熾）四家日記，已先後印行。翁為達官，李王葉均名士。四君交遊甚廣，李葉均久客京城。李卒於光緒二十一年，翁卒於光緒三十年，王葉則均入民國後始逝世。（王卒於民五，葉卒於民六）余以網羅史料者之眼光讀四君日記，覺其無一非談近代故事者之寶庫也。長白金息侯君（梁），取四記原書中之涉及臧否當代人物一類者，剪裁成傳，凡得五百餘人，題曰「近世人物志」，大抵自道咸以迄民初約百年間之重要人物，略具於是，少數久居中國之客卿亦附及焉，實傳記一類書中之別開生面者也。

越縵堂日記光緒八年二月十六日一條云：「雨日在文昌館觀劇，見吾鄉鍾某（家世為吏）之女三四人，年皆及笄，髻足由額，為男子服，而耳飾珠翠，面傅脂粉，雜坐樓梯之側，駢肩擁背，皆屠沽也。時或對鏡撩髮，褰裳露袴，佻態百出，衆人指目，坦不為意，此亦人妖矣，衆皆指之為鍾家女云。」此可見當時北京風氣之一斑也。一日余漫步蓮花街附近，見迎面一最新式之汽車來，止某銀行門首，一年約二十餘之麗妹自車出，着男子西裝，帽歪戴，脣塗朱甚赤，面敷粉甚白，門首立兩少年，體態服飾，類上海所謂「小白臉」，見女下，即擁之入銀行。此為誰氏之女，余不得而知，倘亦越縵之所謂「人妖」也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歐洲人民需要什麼？

譯

一、

在開羅和德黑蘭開會的強國領袖，並沒有完全決定關於戰後世界的所有的計劃。歐洲淪陷國家和軸心國家的民衆，對於他們自己的解放的形式，勢必起而自己所有主張。倫敦、華盛頓和莫斯科，不能夠完全不顧這些人民的意志。

關於這些意志，我們可從流亡政府的政策和國內秘密團體的政綱中見出一些來。

所有地下秘密運動的團體，都希望建立或恢復議會民主政治和人民自由。他們不歡迎帝制。傑福生和潘恩的思想比列寧和史大林的思想，更能影響他們，雖然後者在某些國家中有強大的組織爲其後盾。秘密運動的特點，是要求社會改革。對於戰後如何處置德國這問題，反而比倫敦和華盛頓人士所建議的，較爲寬大。雖然，大家希望保持國家民族的獨立，但公認若要世界機構有效，必須限制國家主權。

德國佔領前，歐洲的民衆運動可分爲三大類：（一）社會民主黨，其背後爲組織鬆懈的勞工和社會主義者國際（第二國際），（二）共產黨，其背後爲現在已經宣告解散的共產國際，（三）農民黨，雖沒有正式的國際組織，但國際間亦何嘗沒有其聯繫。以上三黨的勢力，在今日地下秘密運動中，仍舊存在。

只有在南歐的斯拉夫國家中，共產黨才居抵抗運動的領導地位。鐵托的游擊軍是最顯著的一個例子。領袖雖然是共產黨人，但他們的政綱，並不如此。他們主張成立「真正民主政治性質的民選的政治機構」，由這個機構決定所有戰後的社會政治的重要問題。他們並保證「完全承認哥羅西亞，斯拉夫，塞爾維亞，和馬其頓及其他民族的權利。」

鐵托的經濟政策，其溫和性更值得我們注意。保證「私人財產的不可破壞，以及工業經濟方面的自由企業的全部機會，」並且沒有提到所謂農業改革和工業社會化。鐵托的政綱的保守性，可以反映出共產黨目前所採取的路綫。

二、

東歐南歐農民的意向，在「農民憲章」中表顯得最充分。該憲章於一九四二年七月，由現僑居於盟國的人士所簽訂。他們與國內秘密運動保持密切連繫，其代表包括波蘭的溫和的左派，哥羅西亞和羅馬尼亞的農民黨，捷克和塞爾維亞的保守的農民黨，保加利亞農民的激烈左派，斯拉夫人民黨的右派，個人則有前匈牙利共和國總理加羅爾夷氏。

該憲章，反對「各種方式的獨裁制」，擁護大西洋憲章，並信仰「民主原則和四大自由。」該憲章中有以下一段話：

「我們深信，人民有選擇和解釋他們自己的命運的權利。我們認爲，在許多國家中，應該給予我們人民，尤其是農民一種適當的工具，使他們能夠提出他們的要求，以及各種機構，使他們能夠決定他們的國家政策。我們知道，納粹反對這些人民的基本權利是這次戰爭的主要原因。我們何以要把爭取一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較好的世界的奮鬥，和完全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戰爭連合起來，其原因亦即在此。」

該憲章的主要點是農業改革。重新提出歷來的老要求，就是耕者有其田：「農人有其田是我們的口號……田地應該屬於耕種的農民……我們認為沒收大田主和分割他們的田產是社會改革中的一件重要事情……一個健全的進步的農業社會，其主要基礎應是田地由農民所有。」

該憲章要求以取締田地的投機，規定抵押品和限制賦稅的剝奪等方法來保護農民的權利。並主張設立銷售，購買和信用合作，以及由政府設立農民銀行，穀物保險和市場等方法，使農業現代化。此外，教育的水準，必須提高，農村的房屋，營養和衛生，必須改良。同時要求「在合作的基礎上，儘其可能工業化，使農村中的剩餘人口有出路。

該憲章承認，農民的利益超過於狹義的民族主義：

「我們深信，所有農業社會，由波羅的地起直至地中海，有一個凌越一切的共同目標，就是我們希望振興起來。十九世紀的過分的民族主義，使我們民族間互相衝突。我們希望二十世紀，不要如此。我們決定消除過去所有的宿仇，並給予世界知道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而括說來，「農民憲章」是一張終止東南歐的獨裁制，地主制，高利貸，以及文化和機械落後的政綱。其重要性，不因後來各國間的政治和民族的糾紛而減少，因為該憲章實在代表了農民大衆的需要和希望。關於這一點，可拿各國國內秘密運動團體的政綱來比較，而加以證明。

東歐最重要和最詳細的政綱，恐怕是波蘭國內勞工和農民秘密團體所草擬的了。他們是波蘭抗德運動的主要力量。擁護這政綱的政黨在波蘭流亡政府中也佔多數，雖然波蘭流亡政府的政治複雜性，常使我們不解。波蘭的政綱，類似「農民憲章」，不過更具體化，更前進。憲章中所稱的民主政治，在波蘭的政綱中則具體化為以下數項：

一、建立一個共和的和民主的機構，保證國家的必要安定，並保證所有公民用以左右國家最高行政當局和其政策的權利。人民應經由議會實施他們的力量，這裏當然以民主方法選舉其議員，並恢復其尊嚴性，人民又應有總投票和創制的權利。

二、廣泛的地方自治，以前由中央政府低級機關所管轄的許多政務，應交由地方自治政府。地方自治政府外，又應有自治的職業組織，社會安全機關，和科學團體。自治的工會，管理組織和合作團體，對於國家政策的決定，應給予彼等一定的地位。

三、言論自由，和在民主的獨立的基礎上從事政治社會文化活動的權利。

波蘭政綱和「農民憲章」一樣，主張農業改革，和建立一個以獨立，和由所有者耕種的農場為基礎的經濟，不過波蘭政綱主張，大地主財產的沒收，不必給予補償。

波蘭的政綱，一方面是農民的產物，一方面又是城市勞工的產物，所以對於工業化方面，也予以相當的注意。建議重新組織波蘭的經濟，以重分配國家收入和增加生產量。經濟生活的大部分，主張社會化，極力減少財產和收入的不平等現象。交通、運輸、鋼鐵電力等主要工業，由國家管理，但管理方

Academia Historica

由應付其可能安給地方政府與合作團體。分配由合作團體負責，由國家給其財政後台。和私人企業由各工業的「社團」管制，代表生產者與消費者。

從波蘭的歷史和民族解放的觀點而論，波蘭政綱着重於民族主義方面要求「在疆界範圍內重建波蘭，以確保其將來的政治安定和獨立，並對中歐和平給予相當的保障，再者，這國家應充分強大，足以保護鄰近民族的自由。」屬於德國血統的人民，只要「實際上證明他們確是效忠於波蘭國家，尤其在這次戰爭中和納粹佔領的時候」，就允許他們仍舊居留於波蘭。但保證同等的權利將給予「所有波蘭共和國的忠實公民，不論他們的宗教和民族血統。」

國家主權的應該有如限制，在波蘭政綱中，亦予以承認：「波蘭將為歐洲自由人民聯邦國的一份子」，並且一再表示波蘭工人和農人的任務，不但是「堅決抵抗侵略者」，而且是「堅決抵抗國內的反動派。」總而言之，波蘭的民主同盟希望重新建立一個波蘭，但這個波蘭不是波克上校們的波蘭。

四、

戰前的匈牙利，和戰前的波蘭一樣，是一個軍人的，地主的貴族政治的國家。但波蘭，即使在戰前，無論如何在社會主義者和農民黨的周圍，存在着一個有力的和日漸長大的民主反對黨，但匈牙利的情形，則比較要使人沮喪了。匈牙利的社會民主黨早與反動的羅爾政府訂立協定，以阻止農民運動換得匈京的秘密投票。這協定不久即告破裂，但其損失已經無法補救，社會民主仍舊是一個純粹屬於都會的運動。戰事爆發以前，由於議會中幾個社會民主黨議員的無能，以及只圖在狹小的合作範圍內從事反對的緣故，所以即使都市中亦失去了人民對他們的信仰。同時匈牙利的納粹黨在，在農民和城市工人之間，極力宣揚大財產的分割和所有猶太人資本的沒收。所以在戰前最後一次大選中，納粹黨奪取社會民主黨的地位，而為匈牙利的主要政黨。

當然，自戰爭發生後，匈牙利納粹黨的聲勢跌落了。因為人民根本不希望戰爭，納粹黨的親德政策，亦漸漸比經濟的激烈主義更為明顯了。同時，社會民主黨比戰前享有更大的自由，其原因大概是因為匈牙利的統治階級從來相信德國會獲得勝利，所以希望利用社會民主黨作為與盟國接觸的橋樑。情形愈絕望，社會民主黨的聲勢愈大，在議會中該黨代表的發言亦更多更有力，工人加入為黨員的人數增加數倍。

匈牙利的秘密團體，名叫「獨立陣線」，我們相信社會民主黨為其主力。該陣線要求立即單獨講和，並與軸心斷絕關係，又要求秘密普選，言論結社自由，取消反猶太人法律，少數民族的民主自治，以及終止日耳曼民族的特權。在經濟方面，要求分割大財產。與波蘭政綱不同的地方，乃在沒有關於工業社會化的規定。

五、

奧大利的社會主義者，仍舊是一種主要的和進步的力量。我們有各種理由可以相信，反抗納粹運動的主要份子，不出於社會主義者的政黨，所以希特勒崩潰後，組織奧大利政府的，或許就是他們。據最近報告，自一九三九年後，他們的政綱在一個重要的修改。奧國社會主義者，時常提倡和德國團結，雖不一定和希特勒，但他們在現在則要求在歐洲聯合國的範圍內

Academia Historica

重建一個獨立的奧大利。他們或許有見於德國必將受罰，所以如此主張，用以解救奧大利。

社會主義者的政綱，仍以實行全部民主爲他們的主要目標。除恢復人民自由外，要求創制權和民衆投票。爲消滅所有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痕跡起見，又規定各種特殊的措施。教會和國家完全分開，設立普遍與強迫的教育制度，學校不受教會支配。

在經濟方面，分割大財產，重工業社會化，擴大社會安全，改良勞工環境。

六、

因爲東歐南歐極需改革，所以在該區域的祕密地下運動的政綱，比北歐西歐，更爲詳細，更爲激烈。說到荷蘭，比利時和法蘭西的戰後計劃，則就混雜了帝國主義。荷比法三國都是有殖民地的帝國，並且殖民地在他們的經濟上佔重要的地位。流亡政府和國內地下團體對帝國的意見不相同。例如，法國社會主義者的祕密報紙「解放」，曾這樣寫道：

「參加解放運動而奮鬥的人們，並不是爲了民族主義的或帝國主義的偉大的奮鬥，也並不是爲了這個或那個列強，甚而法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獨霸世界而奮鬥。我們不能容忍三個或四個法西斯國家的統治，由四個或五個大資本主義國家或民主國家的聯盟來取而代之。所有各種帝國主義，不論軍事的，經濟的，殖民的或種族的，必須要斬草除根。」

這種在抽象方面反對帝國主義的欣然許諾，並不就是在實際方面反對眞正擁有殖民地的帝國。解放委員會：雖有國內地下運動的代表參加，目前所統治的領土，差不多全是殖民地，但是並沒有急於與這些殖民地脫離的表示。

黎巴嫩的例子，可以證明從法帝國中脫離出來，並不是不可能，但似乎不會出於自願。當黎巴嫩要求實踐戴高樂所允諾的獨立時候，解放委員會的態度就顯出躊躇了。另一方面，委員會允許擴大北非回教徒的選舉權，似乎預示殖民地在帝國的骨架內可以增加他們的權利。

荷蘭和比利時的地下運動，對於帝國問題，不很關心，其原因恐怕是由於他們顧意把這些問題交給流亡政府去處理，並且認爲他們仍舊保有原有的殖民地是一件當然的事。

雖然，荷蘭流亡政府建議樹立一個改良的帝國，在這個帝國裏面，荷蘭本土，東印度和西印度，各將有自治的政府，在一致愛戴的皇室之下，地位互相平等。至於東印度和西印度的自治政府中，不屬於歐洲的居民將佔一個什麼的地位，則沒有說明。

在內政方面，比利時社會主義黨曾提出一個包羅萬象的政綱，據說流亡政府曾加以鄭重的考慮。在這個政綱裏面，其他政黨欲加以反對的地方，似乎很少。

該政綱主張管制銀行和獨佔事業，「個人的創業須加以鼓勵，但同時須加以領導和管制。」在這種語氣之下，並且沒有具體指出何種工業影響國家經濟的利益，所以我們似乎不必去注意他們的政綱裏是否規定這種工業將社會化。該政綱又主張，強迫教育，和恢復以前關於工資工時等的規定。

政治方面，比利時社會黨着重於議會的改良，使政府更能安定，而沒有犧牲立法控制行政的原則，同時維持國家的統一，而沒有加強中央的權力。政府管制書籍和報紙，絕對禁止國外津貼報紙，和強迫登出國內津貼的來源。這種規定如果執行

Academia Historica

，將去掉法國報紙，比利時的情形，也如此。

國際方面，比利時社會黨，和歐洲大多數小國一樣，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世界組織。取消各國軍備，設立國際警察，國際糾紛的強迫仲裁，以及原料，資用和市場的國際分配。

七、

荷蘭地下運動，大部分是由反納粹的份子組織起來的，每一家地下報紙反映出不同的政治趨向，他們的政見亦不一致。

有一家報紙，似乎代表流亡政府說話，主張政治休戰，在驅敗德國和秩序恢復後，組織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其人員以商問委員會為根據，「由皇后從各宗教團體中選出。」但有一家溫和保守的報紙，主張荷蘭解放後，立即恢復人民自由。

另有一家很有力量的地下報紙，說道：「真正的社會和經濟的改造，應使勞資兩方的組織成為他們的所經營的企業自治。他們不應再互相對立。能工和關閉，不應再發生。工會不應只計較團體或階級利益，而應為全工業和全國家服務。」

這張報紙似乎受了納粹制度合作方面的影響，所以主張設立各種工業的勞資聯合委員會：「該委員會的任務是解決所有關於社會和經濟的事宜，包括工作環境和工資。該委員會的決定和規章，應是交國家社會經濟或職團委員會予以通過，勞資代表外，又有國家代表參加，以監護全社會的利益。」

「國家委員會有一件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管制各種工業委員會，監視各種企業的工資和工作環境，使他們不要縱殊太甚，向政府提供關於社會和經濟方面事情的意見，準備勞工立法，和通過工資和物價的規定。」

一家流行左傾的報紙，建議：「設計到經濟，資要由經濟和消費者共同管理，而最終的目的「社會主義」的建設，任何費用下生產工的組織，在種「勞工」的價值，如此，任務，世界上不再發生一場戰爭，因為他們可能成為第一次的智慧工，亦不再「壞工」，因為他們可能成為第一次的智慧子。

上面的國家社會，上長決定制的動機的，但反對最他的和平。

八、

法國的地下運動大部由左派主持。社會主義是法國政治上最有力量的一個黨。最近通過了重建法國與共和國的綱領，領袖，管理解放地區的行政事宜，並負責救濟和恢復自由的責任，使人民能自由選擇他們的政府的形式。

法國社會主義者方面，在一九年一國社會民主黨被德國佔領期間，就在國民議會選舉以前，就把獨佔事業，公共事業，銀行和保險公司社會化。

關於國際方面，他們說：「法國將在世界合作國家，佔有一席，世界合作國應超國家的，對於社會主義國的政治機構，應有統制的權力。」

至於德國問題，他們承認這次戰爭的正義性質，並且不贊成取得一個侵犯的和平，按何條件，對彼而特勒和納粹壓迫的德國人民，不主張干涉。

德國的軍事機器應加以破壞，應幫助德國人民革命，應控制「重工業」，應把貴胄階級的財產社會化，並且在法律，規定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德國統一的原則下，（因爲他的生存是不可否認的），成立一個聯邦的政權，取消普魯士的獨霸，最後，應管制政治組織和民衆教育。

但是這種改革，必須在社會主義者影響下的世界中，才有可能。並且如果沒有德國民主派的密切合作，也沒有成功的希望。

管制德國軍事機器，應爲眞正普遍裁軍的一個信號。並且對德國主權加以必需的損害，除非各國對他自己的權威，亦接受重要的限制，不然很難想像。

社會主義以人民的權利爲基礎。反對任何違背人民意志的領土併吞。

把歐洲瓜分爲三個或四個強國的思想，必需要加以反對。

關於蘇聯，社會主義黨並不認爲國際社會可以不需要蘇聯的合作。所以，對於解散第三國際這件事，表示十分高興，認爲這是合作的先兆。

法國社會主義者又希望，法國勞工和社會主義者國際的組織，以及和以前隸屬於第三國際的政黨訂立聯盟，可以鋪設一條路，使各政黨，尤其法國共產黨，大家互相平等信任，合而爲一個國家社會。

這個政綱惟有在勞工國際強有力的條件下，才有實現的可能，他們對這事實也沒有忽略。

九、

現在說到北歐的挪威，在戰前是一個民主國家，並且生活程度很高。所以目前地下運動以主張恢復原狀態。挪威人有注重國際問題的趨向。流亡政府和國內地下運動，都強調集體安全制度對挪威的重要性。挪威和其他國家不同，遭受痛苦較少，所以認爲等到罪犯懲罰之後，一個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德國，必須成爲國際間自由分員的份子。

關於德國地下運動的實況，我們還不能完全明瞭。流亡到英國的德國共產黨員說，德國國內有所謂「聯合陣線」，其主要主張是恢復民主政制，自由企業，國家幫助製造消費物品的工業和輸出業，保護合法獲得的財產等等。但是即使這種政綱在德國實現出來，也與全世界各地的共產黨的政綱並沒有什麼區別，這是可疑的一點，所以這個政綱不像是德國地下秘密運動的大部分團體的主張。

歐洲各國的地下秘密運動能否實現他們的政綱，依靠於強國是否讓他們在歐洲自由其手。意大利是目前惟一由盟國解放的歐洲國家，但是以他來做例子，可以證明盟國並沒有再保證，允許歐洲人民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我們可以斷言，除非歐洲人民能夠自己決定自己，不然不會有持久的和平。（本文譯自Common Sense本年四月號，作者名哥爾特勃（Maurice J. Goldbloom），他在戰前曾廣游歐洲各國，研究各國的政治經濟情形。他最注意歐洲的工人團體，並和德奧秘密團體，以及匈牙利和南拉斯夫的半合法的運動，保持接觸。所以對於歐洲人民需要什麼這個問題，頗爲熟悉。歐洲全面崩散的日期，或不在遠，我們需要認識歐洲人民的一切，因此特遠譯出以介紹於本刊讀者。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登陸部隊背後的人物

登陸勤務隊司令
史密威爾上校原著　君適譯

當軍隊登陸，或空軍轟炸了一個日本島嶼，新聞報紙很容易的把一切行動記載在報紙上，第一行。但陸軍後方勤務隊對於世界各部分陸軍和空軍的供應工作，則不能那麼容易用一句話簡括很盡。

我們的工作很複雜，種類繁多並且散佈各地。我們在背後暗中工作絕少登載在報紙前頁，現在讓我們第一次跑到後台，把陸軍後方勤務隊的工作作一確實的特寫。

眼前大家最注意的是攻入西歐一事，陸軍後方勤務隊遠在一九四二年就開始準備着登陸日子的來臨。我們先在英國建築大囤積棧，除租借案及其他供應之外，每月所儲藏達於六〇〇、〇〇〇至一、二一〇、〇〇〇噸，實在是歷史上最大的供應工作。關於我們所做的其他進攻準備，將在下面說到，現在先舉出一項如下：我們的工程師曾招西南歐大陸的面貌，繪圖獻給艾森豪將軍，共印了六九、六〇〇、〇〇〇份凡三一三二種不同的地圖。

陸軍後方勤務隊所供應的隊伍，遍及全球。去年運輸隊曾運供應品二八、五〇〇、〇〇〇到海外去，與前一次大戰時運輸的總量八、八〇〇、〇〇〇相比，就可見出這數量的龐大。另外我們曾運一、八〇〇、〇〇〇戰士到海外去，並在美國大陸上移動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人。潘特貢大樓一房間內六個官員每天遣送軍隊三七、〇〇〇人，日夜不斷的每五分鐘調這一個隊伍出動。

特殊緊急秘密的工作，接踵而來。例如去年春天軍需隊伍受命為攻入阿圖島的非正式預先登陸部隊裝備一切，需要的東西有特種望遠鏡，無線電，衣服，帶幕等，共三十四項。有的物品需要趕造，然後把所有的物品集合在華盛頓，予以標記，最後送到西岸，這一切工作在六天之中完成。命令在星期四由電話通知，星期五六兩日工廠就開始製造。

星期六下午和晚上，這一切裝備送往華盛頓，有的由飛機運送，有的用在波士頓買的大箱裝置，當行李寄去，又有一批在俄亥俄造成的，則由賓夕法尼亞不裝載行李的快車裝運，準在會客室裏由司機鎖起，並在夜間看守。在華盛頓有一位軍需人員在星期日全日工作，擦去假造的籤條，加上軍事標記，全河裝上行李車裏。

在芝加哥六個卡車裏的兵士們將裝備運到聖他費，那裏的站長正等候着把裝備裝上另加的行李車去。行李車加封：有一位軍需長官巡視着，每一站都要卸車查看使裝備不致錯搬。每一次停車他都打電話探問預先登陸部隊決定從洛杉機抑從聖地愛岡上船。所有事物都准時到達。

雖然是一件小事，却救了在阿圖島登陸的美國人的生命。另一次緊急任務，是為艾森豪威爾將軍攻入西西里準備的一六、五〇〇車輛，八五〇中型輕坦克車，四七五架舊砲和不透水的包袋，必須在三星期內送到海口，接着又接到將軍的無線電要求三〇五、〇〇〇磅的石棉脂油，三七八、〇〇〇尺的細管和二七〇、〇〇〇尺的銅綫。

銅綫還有存貨——其他的物件要臨時物色再趕送到海口。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不但如此，這特殊的石棉脂油根本就沒有製造過，剛從美國快郵運到標樣，就在一夜間趕製大量新的脂油，算是準期趕成五〇、〇〇〇磅，從彼得司堡飛運到紐約。

西西里登陸前要五七〇〇架信號隊用的無線電，我們還不得已把所有其他戰場的無線電都湊集來應用。又有一個電表來需要一三三〇哩長的電話桿線，還包括一切配用零件，算到釘子為止。又有一次要求準備百多架一七、〇〇〇磅的卡車及施車的無線電站，我們竟到非洲金岸gold Coast運來四架湊用。

生產戰爭已成過去的說法並不是確實的——我們在一九四四年所生產的比一九四三年多得多，一九四三年所得的產量已經比一九四二年多十七倍。我們減低坦克車和市高射砲的產量，增加了卡車，載貨小汽車，舟砲，彈子以及其他裝備。

去年軍器部發給軍隊一五〇種新武器，今年新武器還要加多！有些武器一定會使一般人和敵人一樣表示驚異。有一天我在格勒地恩伯安大將——軍器技術部部長——辦公室裏，看見一本書有紐約電話簿兩倍厚，全書一〇一六頁中略述新武器的設計，有些在一頁中提到二三種。馬歇爾大將有一實驗隊在海戰場表演給軍隊看，怎樣運用新武器。

同時在國內還有其他訓練隊來試演即刻要造出的新武器。兩年前我們分派經過技術訓練的官員到各戰區去搜集從敵人奪得的武器。這些官員要想跟尋求紀念品的遠征軍相徵逐。是不容易的事，但是現在我們在亞伯丁試驗基地已有四千噸從德國和日本奪來的各種武器。我們加以研究，折開，重裝，和我們的武器一同開火，以資比較。伯安將軍的報告在武器方面德軍保持先進，而日本所造的就沒有這樣好。

我們的工作曾經過幾次證實，去年秋天巡察過共長四九，〇〇〇哩的世界各戰場。又一次是拿不勒斯陷落後三星期在意大利所見的，又一次是雷區被占後十日在新幾內亞所見。我和和好幾位師長談過，並問他們兩個問題：你們得到那些物品嗎？其中有什麼不同的？前線將官們的意見日本惟一超過我們的是使武器不生銹的油。我們也有這種油，可是不及他們好。

但是我們並不停止改進。例如我們軍需除曾經為軍人發明一種萬應肥皂，可以洗衣兼洗器皿。無論冷熱軟硬各種水都可以用，並且還是剃鬍鬚的好肥皂，也可以當牙膏用。我們督導部發明兩種新的化學混合物，幫助防禦疾。一種無臭無色的藥水，供給軍士們塗身上使蚊虫不敢近。還有一種是炸藥，放出一種細霧，在四秒鐘內，周圍十方呎的蚊蟲都被毒死。

我們同農林部及其他機關合作，發明兩種的蟲子粉，是去年十二月的一種重要產物，正當全不勒斯報告一四七五種班疹傷寒症狀的時候。這種流行症震動了美國在北非的援軍和在意大利的軍隊以及老百姓，後來因剷除蟲子而得救的有一、六三三，〇〇〇人。

同時還用一種新法打斑疹傷寒針使萬千意大利人民得以長期避免這種病症。曾經在接到命令不及廿小時之內，運送五噸這種針藥到堪薩斯城裝好，劃記，由飛機運往意大利。

陸軍後方勤務隊不但供應軍隊，同時充當軍隊的管家主婦兼理雜差。我們是軍隊的醫師，律師，商人牧師——也是警察，照像師，會計，銀行家，學校教師，郵差，和戲夫。還引導人民加入陸軍隊伍，製造電影片，收發海外無線電消息，簽署支票，處理軍事方面的案件，幫助軍士們法律上權利的請求事件的解決。在我們的反省營裏收留罪犯的兵士使他們受新式的訓練，並完全恢復其軍事服務。

Academia Historica

在一九四三年我們每月有一二，〇〇〇函授學生，發給應用書籍。我們還領導宗教集會，賣了八一，〇〇〇，〇〇〇美金的商品出郵遞交易。又付了三百萬家津貼金計一，四七六，〇〇〇，〇〇〇美金。我們爲建設工作費了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并保有三三〇〇哩軍用鐵路，一七，〇〇〇哩的電線，和貫穿大陸十三倍長的軍事公路。在醫院裏收容了三，八五〇，〇〇〇的病人。

四十五省的九十四個兵營中，共看守了一七七，〇〇〇俘虜，其中有德人一二三，〇〇〇。我們同時不斷查詢我們自己人被俘的踪跡，把零零碎碎的消息隨時收集在索引室裏。每天從遠方送來五六道黃色長電報到這室裏來；失落的人有的死亡有的被俘，凡是被俘的姓名都與登記，一便家屬一有電話探問，便可立刻報告。

去年我們送到海外的信件共七六四，〇〇〇，〇〇〇件，和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袋包裹。我們處理了二〇，〇〇〇，〇〇〇聖誕節的包裹，除百分之五外都在節前送到。以現狀計算，每年遞到軍隊的信件是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件，其中約三分之一是回件。回件之中包括非洲森林中活的野獸，和無數噸日夫的項鍊物件。此外還有船隻，飛機，車輛，我們軍隊的郵務有規定的郵路，用小划，划船，大隊，駱鹿隊，駱駝以及本地跑差，飛機郵遞在飛行時裝置包裹郵袋，是歷史上的創舉。現在在格林蘭又發展到用降落傘投遞的方法，這可使戰後的郵遞發生大變化，因可把郵件送到沒有大機場的鄉村。

在這種供應和服務之上還有訓練的組織，去年陸軍後方勤務隊訓練了二千服務的單位，從三個人的探海盤隊到七千人的

國史館藏 Academia Historica

紮營上和空中的戒士，還有其他工作人員；麵包舖單位，洗衣單位，造機場的建築單位，恢復被德軍有系統破壞的海港，特殊工程師。還包括了鐵路單位，使被攻毀的鐵路恢復原狀，並使海口連接供應的火車到內地。還包括了伐木鋸木廠的森林單位，救火的小隊，登記墓地的隊伍，修補坦克車的單位等等。

爲着侵入敵境，我們訓練有人員補充站，和流動的機器記錄的派遣隊，備有大拖車裝面設置高速度的商業用的各種機器。這些站把補充人員分類準備臨時事件發生時應用——就像人員的儲藏室一樣。譬如艾森豪或爾將軍有一種工作需要專家時候，儲藏室裏只要按動機器，放進卡片，卡片立時跳出，寫好合格人員的姓名。

若說陸軍後方勤務隊的工作一點錯誤都沒有，那只是愚笨人的看法。我們知道錯誤是不免的，最初糧食的包裹很不好，我們還受到其他的攻擊。但是大致說起來我們所進行的工作，這種情形還是極少數，若果有不犯錯誤的人那只是不工作的人。

去年我們費了兩個月的時間，巡視前線，就是爲了要發現錯誤，看看我們怎樣可以改良。後來我們列出一張現在的主要問題的單子：我們必須要作的事情，必須要改善的活動，必須要集中的範圍——共有三五九項。然而以我們所有的計劃仍不能改變人類的本性，和戰爭本身的性質。戰爭是流動體，變化極快，充滿了意外事情。每次攻勢都要發生危急的事項，無疑的此後幾個月就要我們來應付不能預知其大小急切和祕密的工作。

我們還得想法來應付。供應的細目不免有錯誤，但是就大

們的供應工作，總不至令人喊叫「太少」或「太晚。」

體而論，在希特勒的門口，或是日本東條的許多脚踏石上，我

萬竹樓隨筆（二一）

舜生

甲午一役，李鴻章初實主和，以格於廷議，乃不得已起而倉卒應戰。及海陸兩俱潰敗，津沽門戶，岌岌可危，乃又不得已割地賠款以戚焉關之辱，於是此七十老翁遂重爲世所詬病矣。時陳右銘（寶箴）任直隸藩司，吳摯甫（汝綸）任保定蓮池書院山長，陳責李甚嚴，吳則相李甚力，然此二人者，固同爲當時之賢者也。乙未閏四月十一日，陳訪吳縱談，以吳仍爲鴻章多方辯護，陳乃責吳「以濁流自處，甘爲權門之孝子慈孫，」拂衣逕去！吳亦負氣，即於同日發函請辭，語頗決絕。翌日陳復函，更列舉種種事實，以證李之失職，吳復函有云：

「…至開示李相各節，多爲某所未及知，豈敢妄辯，獨謂淮軍之敗，并無戚容，似非其實。某聞平壤之敗，李相痛哭流涕，徹夜不寐，此肯堂所親見，某親詢之者。及旅順失守，憤不欲生，未聞其無戚容也。倭事初起，廷議決欲一戰，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當時倭人索六百萬，李相允二百萬，後增至三百萬，內意不許。及平壤敗後，英俄兩使居間，則勸出二千萬。其時清議，皆謂李相通倭，業已積毀銷骨，李相面告二使，謂大皇帝決計開戰，某係領兵大臣，和議非所與聞，請入都與恭邸議之，其後議卒不合。及十月初，不佞再至津，其時旅順岌岌，詢知各國皆守局外，不復排解，有言和者，則倭人已索五萬萬矣……今春乃減至二萬萬，此非李相口舌之功，乃入境破刺，倭恐見譏歐洲，僅得割地之益，乃減爲此數。至此次和約之不容於清議，則西人已先事知之，不謂吾國士大夫竟不出外人所料也。……中國不變法，士大夫自守其庸惰之論以爲清議，雖才為十倍李相，未必能轉弱爲強，忠於謀國者，將何以自處？李相之欲變法自強，持之數十年，大聲疾呼，無人應和，歷年表陳，可覆按也。今斷國者持書生之見，采小生妄議，必欲與之爲難，使國事敗壞至此，反委過於外，不聞有一人議其非者，乃羣集矢於李相，而隱託正論以自附於政府，其意殆別有所爲，豈大賢而亦爲此，必不然矣。…」

孟按吳所言均當時事實，而各尊所聞，持論倔倔，尤足見其時士大夫之關心國事，固自有其真知灼見。今茲之役，去甲午又五十年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果仍持不變之旨，而望勝利之億來，私心實未敢以爲可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四川省銀行

資本總額國幣肆仟萬元

本行宗旨

一：發展社會經濟
二：調濟全川金融
三：扶持特產運銷
四：促進生產建設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款　貼現　匯兌
代理公庫　儲蓄　信託　倉庫

總行　重慶

分行　成都　萬縣　內江縣

支行　自貢　瀘縣　井研　南充縣　達縣　合川縣　遂寧縣

辦事處　榮昌　富順　洛山　樂山　隆昌　眉山　眉山　峨眉　等地

電報掛號總分支行處均爲零九六六號

重慶

湖南省銀行

專管匯兌業務

行處衆多　手續簡單　辦理迅捷　匯水低廉

通匯地點

湖南省各地：桂粵浙贛湘

行址　陝西路一七九號

電話　四一六五八號

民憲半月刊（第九期）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

編輯人　左舜生

發行人　鄭振文

發行所　民憲半月刊社

社址　重慶信義街卅九號

定閱處　本社

印刷者　南方印書館

代售處　重慶桂林昆明貴陽等地各大書店　成都祠堂街華西書局及其他各書局

本刊編輯委員會委員

張瀾　張君勱　沈鈞儒

李璜　羅隆基　章伯鈞

張申府　梁漱溟　左舜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九四一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重字第三五七號　重慶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九七二號
本期定價國幣拾元

中國通商銀行

我國首創第一家銀行

服務社會達四十九年

總分支行處

重慶　自流井　威遠　成都　寶鷄　西安　天水　平涼　蘭州　酒泉　桂林　柳州　陽朔　涼山州　水安　安鷄　都江　成都

重慶市範園一號五十：地址
重慶分行
電話：七〇七一四　八〇八一四

郵政儲金匯業局

——是服務大衆的銀行——

分局

重慶　長沙　貴陽　湘潭　昆明　永安　桂林　福州　柳州　樟州　衡陽　龍泉　吉安　成都　贛縣　天水　韶關　寶鷄　梅縣　西安　台山　蘭州

經辦

儲金　匯兌　壽險

業務

全國二千餘所郵局代辦本局各種業務

大同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銀行部

重慶：大同街　昆明路　護國路　桂林路　桂東路

蘭州：中正路　中山東路　柳州路　培新路

西安：大衆街　衡陽路　剛直路　天水路　綱常路

儲信部

重慶中一路

電報掛號除昆明（3588）外餘均（7041）

中元造紙廠

（製造廠）四川宜賓中元新村

精造上等紙張

自製化學木漿

電報掛號郵政信箱一二三四

電報掛號六一六一

電話號碼四一五五二

（重慶辦事處）中正路一四〇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民憲

第一卷　第十期

短評三則　舜生
（一）關於十萬青年從軍　（二）戰爭何時可以了結
（三）法國在復興的途中
威爾斯氏政治思想及其近作人權宣言　張君勱
論今日習氣之由來及其救治法　余家菊
民主與哲學　張申府
論穩定幣值問題　楊宜林
巴黎光復後之法國政情　毅生譯
麥克阿瑟和西南太平洋戰場　抱貞譯
凡爾賽和會的悲劇　靜觀譯
邏輯答謝幼偉教授　章行嚴
萬竹樓隨筆七則　舜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四川絲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三仟萬元

總公司 | 辦事處 | 繅絲廠 | 製絲廠 | 冷藏庫 | 主要產品

重慶陝西路九十一號
電報掛號一二〇八 電話四一七八六

南充電報掛號 三台電報掛號
國中四七六七 政部四八二八

北碚 巴縣 南充 璧山
三台 國中 西充 仁和場

碚區口第三廠 南充第二廠
三台第五廠 國中第七廠
重慶李子壩
北碚上 南充平城門
改良蠶種 改良生絲 絲棉 絲筋

正和銀行

存款 取款 匯兌 貼現 押匯 儲蓄 及其他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存款便當 手續敏捷

營業要目

利息優厚 匯費低廉

△發展社會經濟 △扶助後方生產 △促進戰後建設 △增益羣衆福利

總行：重慶林森路一五〇號
電報掛號：二三六二
電話：一六二一四號
儲蓄部：重慶太華樓街八號
分行：昆明
辦事處：康定

安康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利息優厚
匯兌迅速

信用穩固
手續敏捷

各地辦事處
太和鎮——太和鎮正北街
中壩——中壩北大街
三匯——三匯林森路

總行：重慶林森路四五號
電話：四一四四八
電報掛號：四一四四

金城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及各種儲蓄存款

各分支行處所在地

重慶成都自貢瀘涇柳梧平西漢寶資長衡辰沅威遠
璧山都江明縣林綿涼安中雅陽沙陽綿梓遂

重慶分行

地址：陝西路第229號
電話：42862號（經理室）
42363號（營業室）

民權路辦事處

地址：民權路新生路
電話：42041號（營業室）
41269號（經理室）

兩路口辦事處

地址：中三路（兩路口）2號
電話：2072號

沙坪壩辦事處

地址：沙坪壩正街19
電話：6259號

信託分部

地址：民族路137號
電話：41615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短評三則

關於十萬青年從軍運動

何健雖有帶職軍，
何嘗能有帶職刀；
商榷非可將人託，
自由託人徒勞！——原譯擬命參看職。

最近政府有徵集十萬知識青年從軍的舉動，這件事在中國歷史上是很少先例的。我們盼望能發揮圓滿的成功，同時希望主持這件事的人們，要以徵集的心情，加以周密的規劃。

當委員長表示：他願意自己來親率領這一枝特殊軍隊，這是很好的，並且我們老早就盼望委員長能以他大部分的精力貫注於軍事的一方面，因為戰勝敵人的根本，畢竟還是「軍事第一」。

南京傳部梁寒操部長，代表國民黨發言，說兩沒有把這枝軍隊稱成「黨軍」的意思，這個聲明很重要，態度也很出率。其實把民黨黨政將及二十年，領導抗戰亦已在七年以上，其生機已與人民所深惡，實歷史尤為國人所珍重，所以黨國其黨勢，「黨軍」云云，誠如梁部長所說，「名稱」，其實不多，所謂「黨軍」云云，誠如梁部長所說，「名稱」已不存在，在事實上亦確已無此需要。今後建軍的正軌，惟在「軍隊國家化」之一途，軍人除效忠國家，服從其領袖外，更重要的是這今日熱心從軍的青年所應該切實認明的。

無論有關于教育界的人士，對這件事仍頗留意思想問題，我們覺得大家不妨：因為「國家」已頗意暫時放棄他的讀書生活，經過他安樂的家庭，自動入伍，為國效忠，並且願意集中在一個集團以內，接受委員長的領導，為個百年的思想可謂新鮮經驗的洗禮了，如果在徵集以前，或入伍以後，仍然要對他們的思想加以組織訓練，這可能引起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再者，短識青年畢竟與文盲不同，他們對於精神食糧是確有需要的，我們主張在集中訓練時期內間趕前線的時候，應該充分供給他們以各種書報，并且這種書報的種類，也不可過於單調，對此無良藥，當然是公好的食品，但是更應自覺與其等不可以換取打緊。總之今日國家的管理與世界的新潮，對一個獻身國家民族的知識青年，似乎是應該使他們完全明白的。又軍中有所謂精神講話，此於青年的精神生活極有關係，若其人之知識道德確能起領導作用者，不能勝任愉快，今後似宜妙選人才，老實說，以往擔任這類教官的，並不一定，是很適當的人物。

敵人經過七年以上的消耗，長近在海一方面已受重大的損失，可是陸軍還是相當的完整，在[illegible]，[illegible]有朝鮮台灣以及我各淪陷區的壯丁可供[illegible]樣，假定我們從這三百萬以上的可用之兵以與盟軍巧為配合，[illegible]一舉殲滅在其本土已遭受重大的失敗，他們可能[illegible]要作長期的掙扎的。假定這三百萬的精銳部隊要到[illegible]之一，則這一次所預備徵集的十萬知識青年，也不[illegible]而已。如何發揮大家的知識勇氣，都要靠[illegible]，我們國際的軍事的本身以外，[illegible]他條件的改善，也[illegible]忽視的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戰爭何時可以了結？

這是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所隨時關念着的一個問題。過去曾有人作過種種不同的問答，同時却沒有人確有絕對的把握。

十月三十一日倫敦路透電，邱吉爾首相曾在英下院說：歐洲戰局的結束，可能在明年的春夏之交，至遠東戰事的了結，則在希特拉打倒以後，所需要的時間，遠不致少於一十八個月。照他這個看法，則是把日本完全打敗，至少還需要兩年。

我們承認邱吉爾先生在現代諸大領袖中，是一位年事最長，而政治軍事的經驗也最豐富的人物，以他的常識來判斷遠東事件，也許不會大錯。可是我們依然不願根據他的見解來判斷戰敗日本的時間。因爲日本的戰敗是可能相當提早也可能相當延緩的，一切要看爲戰勝它所具備的條件。這些條件，有關於我盟邦全體的，也有純屬中國自身的，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關於盟邦全體的：（1）美英蘇三國對戰後遠東的看法和步調必須相當一致，同時三國共同的看法與步調，又必須與中國相當一致。（2）三國必須承認中國是戰後世界和平一個有力而必要的支柱，不使中國有和平統一的發展中具有衝的能力，則世界將無眞正的和平可言。（3）必須認識日本的海空軍在幷世諸強中備屬次要，而其陸軍則確與德國不相上下，因此除中國外不有更大的陸軍國家從大陸上與英美的海空軍切實配合，則戰敗日本的時間可能延長。（4）假定美英蘇三國在戰時對遠東所採的步驟不能完全如今日在歐洲所採的一樣，即令終於把日本打敗了，但戰後在遠東所遺留的問題，可能比較德國戰敗後在歐洲所遺留的問題更難解決。（5）我們的盟邦必須認識：即令日本的海空軍全部失敗，在中國大陸的敵軍不能全潰，則戰事仍不算終了，而日本仍有死灰復燃的可能。

（二）關於中國自身的：（1）我們應該料敵從寬，宜確信在中國境內與敵人作種種方式的鬥爭，決不是短時期內所能終了。（2）我們千萬不要爲客氣所中，必須承認只有與盟邦切實團結，始有擊敗日寇的可能，今日全世界實在沒有一個眞正獨立作戰的國家。（3）要別人看得我們起，尊重我們的國格，這完全是我們自身的問題，我們要把一切被人輕視的毛病完全去掉，要把一切被人重視的成績具體表現。（4）以民主的方式求得全國眞正的團結，這是改進一切的張本，政治的進步是軍事進步的張本。（5）中國還需要三百萬以上重編重訓重建的精銳部隊，才談得上眞正的反攻，這三百萬以上的精兵至少要有百分之一的知識分子。（6）要繼續鼓起人民的鬥志，出力，出錢，出生命，只有政治全盤的合理的改革才是有效的辦法。

上舉這兩類的條件完全辦到，我們才可能希望戰事提早結束；也必須這些條件完全辦到，我們才不怕戰事不幸的延長。

法國在復興的途中

從前中國有一位對西洋文化有特殊認識而也確爲一部分西洋和日本的學者所承認的老先生，他曾在他所寫的一本名叫「中國人之精神」的小册子裏，就中英德法四國的文化有所比較，他說：

「英國的文化博大而欠精深，德國則精深而欠博大，既精深而又博大，則除中國以外，其誰法蘭西乎？」這幾句話的正

Academia Historica

他們究竟已到怎樣的程度姑且不必管它，但以為「精深博大」四個字去贊法國的文化，正我想凡是對法國有相當認識的人是不會反對的。

法國文化也絕對，其與世界的民族相。

法國人的理智與藝術發展到極端，因之她的科學、哲學、藝術也一樣的發展。一談到學問，則法國人所造出的都是一流的，這是毫無疑義的。

凡接觸過法國文學的人們，都會感到他人道意味的特別濃厚，凡經過法國社會的法制，都會覺得它民主精神的特別強烈。人道與民主合成和平世界的「存在」，法國人的一顆心，決不愧為世界文化民族的先驅。

法國人的自信心是完全恢復了，他們為著重建法國已經是全國一致的團結了。由全國所產生的臨時政府，既由全世界的承認，而在未來的世界和平機構中，也為法國留下一重要的一席。我們不久的將來依然有法國的光輝，已經成為世界文化和政治的中心，我們依然會看見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的「色旗」復興於全世界。法國已經在復興的途中，「偉大的民族」有什麼人會敢於去輕侮她呢？

萬竹樓隨筆（三三）

舜生

八月廿六日起而響應之，鄂局賴湘應以間，時余離晉長沙，時余離晉長沙，時余離晉長沙

威爾斯氏政治思想及其近作人權宣言

張君勱

威爾斯氏之名，震於中國久矣。世或稱之爲文學家，然彼之所以爲文學家之特質安在乎。謂爲詩人乎，則彼所寫作者，皆散文也；謂爲作劇家乎，則彼未嘗有劇本，如莎士比亞，或以其思想寄諸戲劇之中，如蕭伯納也；謂爲小說家乎，則彼未嘗以寫情之筆，寫常人生活，如奧斯丁也。威爾斯氏之所以成爲文學家者在其以先知先覺者之天才，隱約窺見未來人間世界爲何狀，而發爲大胆之言辭以主張之，且時有洞中肯綮之妙，此則威氏寫作之精神，不論其方式爲小說爲莊論一也。

威氏以一八六六年生於英倫郊外，年二十入今之倫敦大學治自然科學，時受爾文進化論盛行，赫胥黎氏爲之傳播其說，遂爲教授，威氏在學之日，德業拜赫氏，其一生學識實得力於此時。威氏在學之日，已嘗加入英國社會主義先鋒之飛滾協會，開齊伯爾與華爾斯（Webb）（政治學者）之演說，其早年之思想，已視英之個人主義與放任政策爲不適於今後世界矣。其後或任教員，或投稿於報館，及一八九五年『時間機器』一書出版，乃繼續從事於科學小說之寫作，及一九〇〇『創造中年『預料』一書成，而威氏著作之型因以形成，其名著如所謂之人類』（mankind in the making），如『現代烏托邦』（Modern utopia）如『未來事物之形狀』（The shape of thing to come），皆就未來世界而預測其應作何狀，謂此爲威氏著作之特色可也。

『預料』一書中所根據以爲料定世界之資者，曰世界財煤尚有幾何？迄何時告罄；曰人類之生產率，循今日之數不變，則未來人類人口之繁密將如何；曰太陽系之熱力漸減，則地球將成何狀。此皆威氏本其所稽審之科學智識，乃能寫此類文章。夫專門科學家之見聞，豈不更廣於威氏，然彼等之眼界爲專科的爲局部的，專收集一門中之事實，以求公例之發見，而威氏獨用科學家之知識，以測定未來世界，此其所以爲威氏之天才也。

威氏向視現世界上之各國對峙，爲不滿人意，心中期望將來有一世界國出現，其辭似下文論之。彼『預料』一書已隱約表示將來世界改造運動之萌芽如何長成。其言曰：

吾所欲告人者，即世界上有一種歷程，（Process）不論平時與戰時常在進行之中，一方爲事理之無可逃遁，他方隨自然之運行，而出之以萬分堅忍者，即今日雖醞釀不成形的某方過分發育的社會羣衆，必有一日焉，不爲組織的教育的向所未見的階級，此即吾之所謂新共和國也。此類大商算工作非現有之政府所能行力，在政府以外且大之權力與智力，方能對此巨任，他日必有新社會主義（Socialism）繼死此戰爭與民族仇恨之毒蛇於其搖籃中也。

威氏所謂組織的教育的階級，猶之黎堯拉氏因革新天主教而有十字會之組織，與夫日本軍人中有所謂武士道之風氣也。惟有少數人毅然以天下爲己任，操守純潔，步伐整齊，又抱有改造社會之目的者，方能樹立一種新風氣而造成一種新局面。

威氏改造社會之先見之明，莫著於其一九一二年爲每日郵報所寫之文，此文中標出『計劃的社會改造』之名，早於蘇聯

Academia Historica

之數一五年計劃約十七年，早於第二大戰後之言計劃經濟者有三十年以上之相隔。威氏之見解，幾於歐洲所謂預言家矣。其言曰：

今日之各人類集團，尚未能以其意志與想象，對於全社會施以根本改造之工作。此改造之觀念，自柏拉圖以來，向爲人間所習聞。自科學成績推廣以來，此改造之念，益加堅強，所以然者，昔日所用之方法爲暗中摸索，盲目指氣使，今日科學之方法，爲分析爲思考的計劃也。世人雖在今日尚鮮有眞信改造之舉爲必可能者。此項試驗工作之條件大出人意料之外，然必有人焉，或抱成見，或以私利害之關係，或因惰力之故，視改造爲不利於己矣。今日吾人所處之時代，乃放任主義之結果，乃斯賓塞哲學之所造成。所謂「任物自己」則自有調整之功用發生於其間也。世間自有若干事物，非細小之調整所能爲力，如跳越大溝，如殺牛，如避失火，此時非決定其應採之途徑且繼之以不斷的動作不可矣。有人焉與失火之地爲隣，見火及身，乃僅遠離於一二碼之外，或有人於塗上見一大溝不能跳越而過，乃僅遶旋其旁，若此二人，因其行事之緩和，非遭大禍不止矣。方今所謂世界大改造，即工人階級所提出之要求，自爲一種大革新運動，決非若干人之偶造或由或依昔日所謂自由競爭，適者生存，與供求相調之原則，所得而解決者也。人類精神上對於工人階級之長期存在，不免起反抗之念，試問工人每星期發給之工資，如何而能因絕微之增益，忽變而爲月薪與養老金乎。然工人每週工資之不取消，即工人胸中之不平永無了期。此種大改造，年日之久七年，實之行動不可，否則有孚於深耳。今日所急

需者，爲全國之社會改造計劃，而此計劃經濟者有此種要求，用美國人之言言之，倘使一個大命題。今後世界上新計劃，將有更大於此者，爲不應有，此決難成立之說也。吾人之社會組織病發於偶然，爲天命所致，而吾人今日則有全國健康改造計劃矣。昔日各家各戶之飲水，應各人之自求，今則有全社會之飲水計劃矣。昔日孩童之讀書與否，父母主之，今則有義務教育之制矣。昔日英德兩國之城市，街道凌亂，房屋擁擠，昔至破屋敗戶隨處可見者，今則有市政計劃矣。所謂社會改造云者，視以上種種更加以擴大之計劃，使工人生活同於上流社會，而社會上應採國道以解決之。我已將全國中央方面之情況，加之以診斷矣。今社會上各種力量，無一不趨於一種傾向，在於工人階級之取得政權的全國努力，與夫全國性改造計劃之產生，反對者，社會上之定期性的鬥爭或革命爆發，終不能免，即吾國國情非寧靖之故，僅有成爲懦弱無能之國矣。」

由上所言，威氏因衛生改造計劃與市政計劃，而推論及於全國性之改造計畫，此與威氏開一知己之頭，爲他人所未及。抑威氏同時於人類學等之大業，深知勞工階級之存在，好爲社會革　之大因，欲以計畫的改革，爲當前急患之計，立言譬辭，雖與於馬克思主義之公式，然其傾向於社會主義則一。

威氏所謂計畫，較之蘇聯第一第二第三五年計畫，尤爲宏大，蓋其心中所想望者爲一計畫的世界，非徒一國之計畫，改良其內政已焉。威氏自傳中之最後一章，曰計畫世界之觀念，實能代表威氏思想中心所在。此計畫世界中之要點凡：

Academia Historica

，一曰世界國，或曰國際聯盟，二曰世界教育，三曰世界革命。

威氏明白反對各民族各國家之對峙，贊成地球上只有一個世界國，與美參議院所斤斤以保持各主權國之地位為長策者，正相反也。威氏於上次大戰後之初一二年中，早已認定他年和約之中，必以各國之大結合為結束之地。其於一九一六年已嘗著論，將各國之熱帶殖民地歸為一，而共同管理之。此文中已有一國際聯盟之輪廓在矣。其言曰：

方今討論路洋越海之大帝國之將來，愈令人感覺一種大委員會大會議或永久性之上級團體之不容或已，其權司者為超於民族主義與愛國的帝國主義以上所能為之事。此項團體終久非成為人間事物之一部不可。究竟其即日實現乎，抑經百年之流血而始次實現乎，此視乎當代活政治家之勇氣與想像力矣。

威氏嘗自言曰，一九一六年中，予所努力者，即使各交戰國承認世界國為戰爭目的之一主矣。自是迄於戰爭之終，威氏於北嶺爵士為宣傳部長之日，嘗入其部中為之寫宣傳文字，雖此以發揮自己思想非為一部半職也。威氏於未入部前，已草擬一文，力言國際聯盟應有規定及限制各國陸海空軍備之權限，及既入部，乃主張應在戰爭目的之說明一文，並謂戰爭之目的定，而後為宣傳文字者乃有所依據以為立言之準則，若僅以宣佈德國罪狀或德國當敗為限者，只說到一半而已，所以戰爭者，非徒為勝利，乃勝利後之平和何如耳。其關連所在也。各反德之同盟國之目的，在乎世界各國應結為一個整體以保持其共守之法律，提出爭議於終審法庭之中，保護弱國，限制軍備，此種種者包括於一個名辭之下，曰世界國之聯盟而已。威氏之意

心於國際聯盟如此，謂其為上次國聯勝產生中之一人無不可焉。

威氏更進一步，以為欲求世界各國真有團結一致之情緒，非先使各國人民瞭解於人類一體之念不為功，而教育之一，尤為歷史一科，倘使人明瞭歷史之本身，非為分國的，而為一體的，則威氏「世界史綱」之所為作也。威氏全書根據生物學與古生物學採集之資料，溯之有生之始，下迄於今日飛機與無線電橫貫上下之時代，視舊歷史家之觀，專以朝代，王室，國土，時代，勝敗，榮辱為出發點者，可謂別開生面矣。威氏作書之宗旨，可借其一九三九年，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演講稿中所言，較其初著書之日，尤為明顯也。威氏曰：

在歷史教授之中，教員常有常識社會的政治的區別為一成不易，不知青年人腦中之民族異同之見解，皆教員諸君之灌輸有以致之。吾以愛國者之失，在於過分着重青年人之愛國心，在於認為人人皆人人猶太人在天性上本來各異與彼此分開者。其迷惑地，豈者定乎。所謂民族異同之觀念，非與有生俱來，乃教育者以致之，即人力勉強而致之。嬰兒於其誕生之日，苟令國將其所生者互相交換，使其好父母者，無論國之該變為法國之人，法國之孩變為英國之人可為，可知民族主義，純出於人為，純出於歷史教授，非出於自然，所謂歷史教授，有出於父母，有出於學，有出於宗教，有出於國旗，有出於國節，然其大部分則出於學校之中也。今日學校所造成之民族主義，將使文化之生存漸趨於危險者。

氏更述歷史之兩大種類曰：

吾願吾者者，歷史有兩種反之兩類，（一）傳統的歷史

，已成爲過時而衰敗之物，富於至多之毒性，在今日學校與制度之中，尚維持其勢力；（二）另一種爲新派歷史，可稱之爲人類生物學，尚未列入於教育機構之中。此新派歷史之發生，由於過去一二百年中，生物學思想之大變，而其發展則由於近四十年中考古學之成績。此新派歷史之手中，經過多數具體事實與科學的批評，乃對於舊日所謂記載，以懷疑的眼光目之。舊派歷史專以採諸公文爲事，換言之，所根據者爲書籍，爲抄本，爲碑記，謂之爲書本的歷史可也……反之新歷史，就其方法範圍與可能性言之，與舊者絕然不同。惟新者之異乎舊者，應另錫之以新名曰人類區位學，曰社會生物學，乃擬議中之新名號也。

威氏更論舊歷史之不適用於今世之故曰：

歷史之所以作所以教，皆所以鑄鑄一國之人心，以合於其生活集團中某種特定目的，若所以養成公民，所以使之成爲愛國者，所以使其不忘民族之光榮，與鼓勵其侵略的目的是也，一言以蔽之，所以提高其自驕自傲之心。史家之第一人希勞屠託氏之歷史，記希臘攻擊波斯之事，即希臘太之宣傳品也。舊約全書，記猶太人自埃及歸至耶路撒冷之事，所以使猶太人毋忘其爲上帝特加寵愛之人也。猶太受此書之影響，乃抱持一種種族的自我主義，永遠激怒其非猶太的異族。

今日一般歷史爲分國的分地的宣傳品……歷時久遠而受人尊重之國界，至今未打破，猶爲歷史中之劃分方法。……因而有所謂東方精神西方精神希伯來精神北族總性青年民族老年民族，黃金時代，文化搖籃與文化自東徂西之種種名目。彼等之訓練與其傳統，乃所以促成彼等之幼稚的思想也。

威氏反對民族主義，一心以人類一體之觀念傳移人心，雖施之於吾國，不免言之過早，然威氏特創之見在此，故果而出之。

威氏又斷言新歷史應發生之理由曰：

若諸君要使此世界成爲一個首尾完整之全體，應先在思想中成爲一個全體。惟其然也，不應以各國家各民族各帝國爲單位，再就此各單位湊合之以爲一體。倘吾人誠希望世界平和，所謂國家也民族也在在物界之冒險中等時來時去之物，應視之爲次要之物質然矣。……倘吾人誠望世界平和之一日，則惟有拋棄舊歷史之劃分而已。此新歷史中，倘其所記載猶有政治的事項，應爲一種同一歷史，非分國之歷史也，乃漸次擴大之多數集團之歷史也。

威氏演講中之最後數語，尤表示其果決心理，錄之如下：

苟無新歷史之正當教授法，世界和平之前途，治無希望。惟其然也，應將此新歷史，先灌之於各人思想中，繼以推及各大學各百科全書與各種學校中。陳吾人海舊歷史焚毀以避諸此雷閃，盡諸此自然的與必然的人類恐怖。

威氏於自傳中自述其「世界史綱」寫作之始，先計算時間完成需時一年之久，乃與其夫人經長時考慮，估檢其家中當時存款二萬鎊，因戰爭跌價之故，落至原價之一半，此項存款之利息收入，足支一年用度，乃決心將小說工作擱置，而專致力於此書之作成。不料世界史綱刊行後，英文版，銷數已達於二百萬本以上，不獨版稅之多在預料之外，即威氏聲名此洋溢乎天涯地角矣。

威氏自傳中用「世界革命」之名稱，驟見之下，似與第三

國際爲同調，然威氏文人也，其腳下之土眼與蘇聯同，然其內容則大異矣。威氏心目中，亦知舊革命，門革去舊社會之謂，然非有新社會之組織，終不能成功。威氏早年游代會提出新社會之組織，及夫九一七年蘇俄協會中人所贊同，威氏亦因革命告成，列寧與其新社會之組織，亦無能建立階級專政之制，亦既近於威氏之所謂武士道，蓋由少數人抱定堅強之決心，貫徹社會改造之大任爲革命大業之惟一途徑，雖謂威氏隱約之中已窺見可焉。

然威氏對於革命黨人潛伏地下或竄身異國，憑藉武力驅除舊政府之所爲，大覺其破壞性多建設性少，乃匠心獨運而發爲「公開的造反」之妙論。威氏曰：

欲求創造的革命，非先握有權力不可。現世界上權力之所在，一方爲工業，蓄與科學相聯繫；他方爲世界金融。此兩種人能在建設力面改造人生之現狀，他人決不能及也。其他各種權力或爲輔助的或爲限制的或爲阻礙的或爲破壞的。財產之權力，誰知保有財產而已。其極也，壞壞機器，逐管理之人。如是，惟有科學家，工業家，銀行家，報館主人，政黨領袖等等人之間誠的合作，方能取此現社會而大改造之，使之得於秩序之發展。此等人，不論其願意與否，應爲此世之實際革命家。現時之工業家與金融家，因其事業之擴大與密接，正在育自己，開拓其眼界。倘吾人能喚醒此等事業界人之自覺性並使之與科學家合作（此段文有節略），則世界當為之貨幣制度與經濟活動之造成，有何難事。以云政治家等交家與軍人或不免守其舊習而不變焉。如是即在保守勢力之面前，固言無忌，何惜一倒造成一個世界共和國之金融與經濟制度乎。所以使人感覺，即所以使人感覺於我，故以吾人之社會與方法，在人為公開討論，未見有何損失而招致失敗之危險。此即為公開的造反。

英美兩國之人，理智發達，其遇事理上不可通過，自知改絃易轍，如法國革命後之德國憲政黨與夫近年勞動黨之執政，即其顯例也。威氏公開的造反之說，以之施於俄國，或他國革命黨人，未有不視爲奚語者，然在英美兩國人傾於漸進主義者，當爲理智所折服而相於翻然改圖，在歷史上已不乏其例，故威氏公開的造反之說，施之俄國未見其可，而在英美則自有其發生效用之日。威氏對於羅斯福氏新政之施行，目之爲資本主義國之覺悟，即化意也。

威氏思想中之三大要點既如上述，然威氏自以天下爲己任之人，非能以寫作將能專己責。其自傳中有語曰：

「當我寫此自傳之日，當我全世界在我肩之上。」

「凡人已脫離其童年，而尚有一種社會的自覺性，惟有將全世界置之於肩之上。」

威氏於第二大戰起後，專務力於世界之改造者，一如上次戰時之舊狀。昔威氏曾主宣傳部，當時政府以戰爭已的明告天下。此次又約宣明政，要求人權宣言一文，同時又名之曰：「吾人所以爲爭之理由何在」，其與爭目的之宣佈出於同一用意者。

威氏一人發宣言草定後，曾著成一書，對於本文加以解釋。茲但將本文譯出，以求讀者之明瞭，摘要錄之如下：

（第二）所以保護生存之人權理由，威氏之言曰：

「一般個人制之民族之惯例，歷史上之革命問題，經驗時代之所應遵循之根本原則，蓋為一種宣言以警告天下，所以阻止約翰王之侵犯人民權利者，大憲章也。所以抗沙利一世之暴政者，則一六二八年之權利請願也。更有一六八九年之權利法案，從此結束英國政治上之「大憲章」（霍布斯之書名，即專制政治之謂）與帝王之神權。」

「吾人今日已達於歷史上之另一關頭，因此又須將普通人民之權利與其所反對之特權，作一種根本的確認。吾人須確定人之權利，俾政府無由肆其暴虐中敗壞之使命。吾人需要一種權利宣言，所以使地球上東西南北暴力與鬥爭從此絕跡。」

（第二）人權宣言含有國際性。昔日之人權宣言，為國內政治爭執之解決方案，今威氏之所聲者，除為各國政府所遵守外，應為全人類之基本法規。試與宣言序文中之言以明之。

「此項宣言為世界和平下之各社團各集體之公共基本法。此宣言應與各交戰國所宣佈之戰爭目的之文互為經緯。此事應為和平條約中之第一件大事。」

申言之，今日之人權，以全世界為範圍，謂為國際民主基礎在是可也。

（第三）暴力使用之限制。昔日所爭之人身自由，謂不應加人以不法之拘捕或處制而已。今則對於人身更有種種防制之法，如集中營，如隔絕生殖之根基也。依威氏之意，凡對於不出於各人之同意者，即為侵害各人之自由，皆設為第九條以限制之。

（第四）人身保護狀。第三頁所限制者與於權利之類，第八頁所欲保護者為人身自由。其規定曰：除其為證明的精神病外，任何人未經定罪，不得禁錮至三星期以上，如未經公開審判，不得禁錮至三月以上。其違法之恒例，除現行犯外，不得任意拘捕，即在浪費旁有可疑情形者，未嘗不可加以拘禁。文中既規定日除為證明的精神病者可以如此待遇外，其他一切人均不得任意拘捕了知。此即英國人身保護狀之傳統也。

（第五）個人姓名之虛設。中法西哲主義與納粹主義歷行，既有黨部，復有防殺大保，既於黨黨，或不肯盡聲明之各人，各備有卡片一紙，記錄其所得之言，積日既久，其所記錄，即為定罪之證據，吾人無法可逃，因此定案，便成不白之冤。故第九頁規定：「各部不得有秘密記錄，即令有之，須准本人閱讀或校正，除有正當之證實外，不得作為證據。此條之設，所以祛除特務警之任意陷人於罪也。

（第六）生存權。昔日所謂自由，如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皆對政治權力之壓迫而起，而當人民之政治權利可也。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工業大商業興起，大多數人之生活，不特未改善也，更因受失業之影響，而處於饑寒交迫。此後人民之生存，無之商業之盛衰而有起伏，隨潮汐浮，抑國家另可以處置之。威氏之意，「生存權」自百年來國際間之新知識，經力之所保護，使政治向民主發展的控制，顯現出不可思議之進步，政府（如……之投票），今後之控制必須密之於一個大資產之下，……之路不可。……的……序，吾人類非法上既經……之路不可。……法有二，一曰政治的經濟的民主化，二曰……為集體化之趨勢既不可免，所以管理……於集產意思，一曰由於……制而……故彼以為應對個人更加以堅實之保護，……宣言……所由來也

Academia Historica

。各項自由之中，尤以各人之生存權爲最重要，故開端處即言「各個人爲民族遺產之連帶承繼人，各人不問其族種信仰與意見之異同，咸享有飽食，住居，衣着與醫藥之權利。」如是凡爲人者之生存得所保障，不獨工人不應因失業而凍餒，即資本家亦不得利用資本以壓倒貧苦之人，而猶太人或他族人之不應排斥，更無論矣。

（第七）工作權，財產權與經營商業。　全文十條之中，其關於個人之地位（第二），財產保證（第三），營業自由（第五）買賣自由（第六），居住行動自由（第七）者，共計五條，已占其一半矣。依威氏想像中之集體主義，如土地，如工廠，如大宗貨品，如船隻與運輸，皆歸社會公有，其歸私人買賣者，有於業，有珠玉，可歸私人所有者，如書籍圖畫，至於私人住宅亦爲個人應享有之權利。是威氏意在不妨礙集體主義範圍之內，儘量許人自由。此則西歐社會主義之所以異於東歐也。

吾人敍述威氏思想大體後，更以威氏之人權論殿於其後，良以此乃威氏自傳結束後之重要思想之一端也。夫二十世紀之今日，知集體主義之爲必然趨勢者，不乏其人矣，既同情於集體化，而同時又能瞭解人權之重要者，則不可多得。何也，穆勒與斯賓塞時代已去，而馬克思時代方來也。主張集體化者，將生產工具收歸公有，然土地也，資本也，一切歸諸政府，則政府權力之大不知所底止，政府壓迫也，官僚政治之擴張也，舞文弄法也，是皆意中事矣。惟如此，惟有保障人民之生存，更補之以言論結社與夫個人合法經商之自由，斯政府權力愈大，而人民有其愈大之權利，庶之相抗，此則人權問題之提出，所以在社會主義實行之日爲不容或已也。嗚呼，威爾斯氏，世咸目之爲政學家，若然與於政治者，抑知威氏念念不忘人類，念念不忘政治，雖其著作與聞斯與拉斯基等異其性質，然對於時代問題，決無先知先覺之見，先世人而有所主張，與華氏拉氏之不越軌術規矩者異矣。而則謂威氏爲現代政治學方面大思想家中之一人，有何不可之有哉。

附錄　威爾斯氏宣布人權宣言

前言

相互信心之毀壞，爲現時世界分崩離析之各種惡因之一，而現時人尚未明白覺察之者。已往數千年之若干時代中，全社會或全社會中之大部分，各事其事，各本誠實，爽直，與自尊心之美意，與人往還。各人以自己出品之優良，自豪於人前。各人一生所經歷與其對人之關係，自有其彼此相安相忍之條件。各人所遵守之法律，雖因地因時而異，然其法律之性質，不外乎箴國人民共守法生活之中。彼之所教所信者曰：按之物理人情，自應如此。自己還守規矩，除意外不幸事件外，決無他事之能影響於汝之一身。自己尊守規矩，決無他人能妨礙或阻制汝之一身者。何也，有法律爲之保證故也。雖然，以上所云之感覺，其在今日世界上，所存者尚有幾何乎？因此種感覺之消失，而人與人之行爲中所表現者爲監督中之爭先奪取，爲彼此欺騙，爲侵犯他人，爲強盜組織，爲虐積，爲隱藏，以及其卑汚苟賤有已無人之情緒，此皆社會的不安定之自然結果也。

此種風氣，可名之曰道德的奔突，不獨政府如是，即在個

Academia Historica

人亦然。於是有識之士關心最甚者，莫過於[illegible]信心之恢復。吾人所居之團體日趨於社會化，國家之權力愈益集中，所以保護個人，使之免於官吏之殘酷，上下其手，與狹隘之待遇，及使之免於幼稚人類所犯之肆意妄爲者，愈爲一日不容或緩矣。

就過去言之，大西洋世界方面，所以設爲方法，以防止人類此種弱點，較其他區域爲最有成績。吾人傳統的，特殊的方法，即爲一種基本的宣言之方法。吾西方人民，本其天賦之性，好發爲權利宣言，自大憲章以來，每採用此法，謀對於人民與中央政權之間，設爲政治機構上之防禦是矣。

普遍而深入之集體主義，在今日已屬於不得不實行之勢，然期其組織之成功而不受嚴重之障礙，惟有以人權之新宣言與之相輔而行，以發生防禦劑之功用，此項新宣言，應爲今日新社會組織之日趨複雜，較之昔日之宣言，應更爲愛護人羣，更爲條理分明。此項宣言，應爲今日和平世界中一切國際與集體之共同基本法律。此項宣言應與各交戰國所宣言之戰爭目的交織爲一體，應成爲平和議定書中第一事項，應請各交戰國明白承認否認或守緘默。

此人權宣言，擬爲草案若干條，俾人恍然於其內容所在，所謂人者自指男女少年概括而言之。其關係重要者務求其包含在內，其次要者可自大原則中演繹而出。此草案原爲大家參考研討之用，自不免於遺漏或重複之處。

人之生於斯世也，其責不在各人自身，然人既生矣，自爲過去所累積者之連帶承繼人，此項累積足以滿足社會中各個各人之要求無疑矣。茲舉各個人之所應得者如下：

第二種

自近百餘年來，人類之物質生活上發生一種極大變化。各數之發明品，改變世界交通之步調與性質，所以聯絡國與國民族與民族間之距離者，業已廢棄矣；同時機械力之增加，較前世紀人，即云有人類之合作，殘害，壓迫，與夫[illegible]於天然資源之例例，[illegible]費，[illegible]矣，或浪費等等舉動，[illegible]云人力能勝[illegible]機力，不免於過去其餘之病。此種變化，在前一世紀[illegible]有[illegible]日高之勢，今且漸達於頂點。人類生活與[illegible]制度，[illegible]種危險狀態之下，勢非加以[illegible]不可。人類[illegible]之所願，而昔日各自主國之[illegible]滿彌之工作，今日非由於[illegible]合作不可矣，又以受大工商業公融公司對於經濟生活之敗壞，非謀所以救濟之者不可矣。各個人之努力於此方向者多被性其自己幸福，而其所爲不免於盲目與[illegible]。其爲政府者或彰明較著因時勢需要以成爲集體主義者，或自居於爲大工商業公融公司之工具。政府之權力與侵犯有逕無已，控制日益集中，即宗教教育與報紙亦隸於政府之下，科學文學工作與[illegible]事業之指導，向不受國家控制者，今亦過於政府之手矣。然政府之責，[illegible]於宗教等事，因而誤屬悉歸日有所聞，而一切自由，尤其爲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趨於衰落矣。於是這世界之內，但見以個人隸屬於權力組織之下，惟其方式稍有差異而已，此種政府[illegible]不足勝此重任者，乃成爲漫無限制之專制主義，而效率與幸福之源之個人自發自動能力，日爲其所蹂躪矣。人民居於此種權力之下，受其奴隸性之訓練，惟有自甘於墮落與混亂之途。惟其然也，戰爭與經濟的剝削乃日出而不窮。昔日因權力之增加與機會之增

Academia Historica

加，若已引導人類達於無限豐足之境者，今則此種景況又將化為烏有或且永遠消失而成為社會的崩潰矣。

自昔以來，民主國政治之國，於政府權力[illegible]高之日，每以個人權利之明白與增強的認識，為抵制之策。此種先例之應復活，未有甚於今日者。此種國家中之吾人認定世界改造與世界整體主義之不容或已，依昔日傳統，將此種認識表現於二種權利宣言之中，所以使目前進行中之大變革，不成為黑暗中之改造與遺殃之革命，而成為光明之改造與日新之革命。昔日基權利宣言設政府與自由之均衡，今日吾人仍遵而行之，惟世界國家小程度高下，自當以現世情況為準則。吾人宣言如下：

（一）一切人，不論其種族與膚色之差別，應享有食，住，衣，醫藥與注意，俾其身心充分發展，自生至死，當在經濟之中。

（二）一切人應受充分教育，俾成為國中有用與關心國事之公民，對於國人所共知之事項，應許以隨時考察與調查之便利，各人應享受最大之討論自由。

（三）各個人與其合法取得之財產，應有警察與法庭保護，免於旁人之侵暴，劫奪，強迫與恐嚇。

（四）各個人雖應受其他人之評論，不關於故意侵害其本身之款項與偽造事實等事，應享有不當之保護。政府中所有關於人民之警記與記錄，應公開准許人民自行考查。各行政機關外不許藏有對付人之秘密案卷，對個人案卷應詳關係人姓號，依其所提出者加以修改。對個人之案卷，只為一種備忘錄，不得在不經證實之前遽用為證據。

（五）各人得自由從事於合法職業，所得酬報，比例於工作之所需與其對於公共福利之增進。各人應有要求職業之權利，並須有各種職業任人選擇之際，應享有自由。各人得提出其所擅之職業，並應公案加以討論。

（六）各人得以自己經營在世界上任意行動。各人應有私人住宅或租賃之居室，或相當有限之花園田地。各人之城堡，期得其許可，不得入內。各人應有權利漫游於國中之山林，荒野，田產與花園田地上，只須各人之出入，不至變易道路，或礙其自身，或妨礙其鄰居之人。

（七）各人應有權利買賣出之物，不得對人有何歧視待遇，至其數量多少或自己有所積蓄，均視其與公共幸福相容與否。

（八）各人，除正式證明其為精神不健全外，苟非經定有違法之罪者，不得留至三星期以上，裏則必經法院審判，不得留至三月以上。既經三月之後，如尚未依法審之正當手續判決者，應即釋放。

（九）任何人，除出自己內心同意外，不得毀傷其肢體，或斷絕其生殖根，除出自身之強暴外，不得以野蠻，毒毀打或加體刑。各人之拘囚，不得過分惡劣或過分暗黑，過分光明或過分黑暗之下，使受精神上之痛苦，亦不得加之於疾病傳染或溫度之取暖之時，亦不得與有毒物或傳染病人同居。如人自願臨死之際，不應強迫其飲食。各人除自己知覺外，不得強迫其服藥品，對各人所加之至酷之刑如定期之禁錮，不得過二五年以上或為死刑。

（十）本宣言中之各規定及原則，應列在一部法典內詳細規定，法典應為人所共見共明。此項宣言不得隱任何藉口，加以限制[illegible]之。每日之人權宣[illegible]於其中。因此人權宣

Academia Historica

言為全世界人類之基本法規。不論任何條約任何法律涉及以上所舉原始權利者，除公開由人民所制定，或為人民之直接參與投票，或為民選議會之多數表決外，就個人或一省或行政各部言之，不生拘束力。關於國際行動之事項，惟有多數決議，公開的確定的任何秘密條約不得對於個人，或組織或集團發生效力。任何命令違反於憲法者，均為法律之適用加以推翻者，不應有執行之效力。法律之源泉，除人民全體而外，不應有其他人，且各代之人民在新陳代謝之中，任何一代之決議，不應將後人與有之立法權拋棄或剝奪之於他人。（完）

十一月十日重慶

蔣竹樓隨筆（二三）

舜生

長沙明德學校，創辦於清季光緒二十九年，實胡子靖先生（元倓）一生心血之所貫注。光緒三十三年，余始讀書長邑高等小學，校址在城北荷花池，去明德甚近，因得偶往參觀，頗覺其規模之閎闊也。時長沙私立學校之最著名者，曰明德，曰修業，曰楚怡，曰周南，稍後則有廣益獻靈等芳蹤校。當時長沙之學風，並視私立學校為轉移，其設備與設備，往往為公立學校所不及，人才之造就，亦以私立各校為獨多。蓋其時外患日急，風氣已開，興學育材，率由人民自動，政府僅予提倡扶助，絕少干預，而胡先生之堅苦卓絕，在湖南教育家中，則尤為世外所知名，而南之工商九先生，亦猶在諸之間也。民國十一年，余始見先生於上海，時先生剛五十，精神特健，說話聲音宏亮，氣宇軒昂，與前清舉人無異。二十七年，先生垂滇口，應政府聘，任國民參政會參議員。二十八年，自安南來渝，是年五月三四兩日，敵機大舉來襲，轟炸遍之半，先生乃投城外巴縣吳宅，賃屋居焉，公餘暇，靜之所。其地去余所居不及一里，余因得數度往謁先生。時先生已近七十，精力既衰，頗仍中氣足足，每見必長談，而每談必及明德，先生之於明德，真所謂相期無負，死而後已者也。迨參政會閉會後，共產黨，凡先生有光榮內爭迫民國己卯三十餘年間所為之詩，已燬焚殆盡，而今之八九，亦與明德有關，可考見先生之素節，與錄錄我先生於其第一集中詞，所謂「立懦廉頑，百世下猶當興起」者，信不誣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論今日習氣之由來及其救治法

余家菊

民覺一卷十期 33.12.20

今日國人習氣，就多數人所表現者而為觀察，實屬不免於浮誇躁進，極悍，譎詐等不良傾向，從而隨為敗衍，傾軋，把持，貪污，欺飾種種習尚。習尚之成熟，自有種種原因，而學術之鼓盪則為一有力因素。由於講學之不慎，國人養成三種心習；由此三種心習之推動，乃造成今日之種種惡劣現象。吾所謂三種心習者，第一為因求有裨實用之故而歪曲事理；第二為因求達成目的之故而不惜採用任何手段，從而視他人以滿足自己慾望為當然；第三為因有感於求知之煩難而樂於自信其心以逞情直行。此三種心習，實今日惡劣風氣之所由來。

先論為實用故而歪曲事理。例如為爭取革命反對盡忠。盡忠是為長上而盡心盡力以執行其命令，革命是決用暴力以推翻政府。驟視之要忠似為革命之障礙，所以革命似須打破忠的思想。不知任何人羣，皆須有一公共意志，及行此公共意志之人，而此執行公共意志之人，為公共意志之實激計，在道義上，實又有權要求其部屬忠實執行其命令。苟忠的思想一旦打破，則紀律無從建立；紀律不立，雖革命事業亦無法進行。此所以前有炮打觀音山，後有西安事變也。假使當初鼓吹革命之人，能謹約其辭句，使其無錯僅指向於滿洲政府之腐敗無能，而不為掘基礎之議論，則今日紀律之建立以及統一之完成，必能事半而功倍。

次論為目的故而不擇手段。前述之為求裨實用故而歪曲事理，本可謂為因目的故而不擇手段之一種形態，不過前者涉及於思想，後者僅有關於行動。今之身為貪污者，其小焉者直莫不曰：為生活計，吾實不得不貪污；否則必曰應付太大，不貪污，發將何出？貪污之大者，則竟若曰：吾不拖活錢，則不能大做政治活動；不能大做政治活動，則政權不能到我手；政權不到我手，則我之抱負無從展佈；我之抱負不得展佈，則國由誰救？所以目的能使手段歸於神聖之說，假如成立，則大小貪污都成正當行為。正因國人沉迷此種心習之故，遂以既定自己的主張為救國不二法門，便逕求國人之擁護；因求國人之擁護，便不惜採用恐怖手段；於是而屠殺乃成理所當然，決斷評議更是天經地義。為達成目的，不惜犧牲他人，毒禍之烈，於今正方興而未已，言之痛心莫為極！

復次，請論為求知煩難故而自信其心。中山先生說：知難行易。行是否易？吾不了解；但知難則確為至論。求知知治如欲，須忍耐，須虛心。五十年來，熱心國事的志士，多半憂心靜，須盡國家立刻興盛，而實行快幹主義。若有人剖析事理至於第二層，第三層，則乳臭小兒亦將挺身呵斥於長者之前！夫幹，誰曰不宜？然而我們應當辨什麼呢？事理不明，而空言幹，是為盲行，是為蠢幹。國家元氣能經得起這樣幹！梁任公好言：今日之我不惜與昨日之我挑戰。吾人既欽佩任公改過之勇，又為得見真理之困難獲一證明。為答任公，依今日之我與昨日我之前例推之，則明日之我將與今日之我挑戰，要可推想得之；今既預知今日之我不必果然並確，又何必不將今日所見者留待明日考驗一番，再行發佈，以免後悔無及之咎乎？然而今日有明日，明日又有明日，明日之明日依然有明日，所見所知

則有一日不平迫使自己與自己挑戰乎？殆其難言。熱烈志士不能忍耐，非無故也。然而在「不求其解」的氣習下，國家受辱，已是不淺，豈仍應于以保持乎？

吾於今日風習之改革，平心推究其原因，得此三者。因有爲求實用故而歪曲事理，於是而學說之講授失其眞相；因有爲目的故而不擇手段，於是而行爲之抉擇失其正軌；因有爲求知難故而自信其心，於是而措置之決定，失其憑依。此三種心習，合力爲禍於國中，吾人何能自免。吾嘗追求此等心習之來源，乃深有歎於學術之足以驅策天下，而吾輩研究諸學家之各自善盡其力也。

此三種心習，其學術的淵源，自亦多端，而其尤要者則爲權利思想，陽明學說與經學今文學派。此三派者，各有其整個體系，各有其一定價值，吾不欲從事批判，吾亦無意輕事攻擊，吾之所圖，祇是在說明三派末流之弊與今日國人心習之關係。是則所當敬謹自矢者也。

首論權利思想。中國之傳統思想爲仁義，而權利思想則爲西方所傳來。仁義思想，其核心在使自己服務於他人。權利思想，其核心在主張自己之利益。欲自己服務於他人，故重愛人，至少亦不損害他人。主張自己之利益，故爲自己的利益而奮鬥，至多亦不能關心他人的利益。服務他人的利益，則因感應之理而彼此間的情感融和，因連帶關係之理而自己的利益亦因他人得利而蒙受其益。主張自己的利益，則因人人的對立而趨於相爭，因忽視他人而入己之利害衝突。重人之弊，有時而損己，所以當國勢積弱之時，有志之士，競事輸入權利思想以爲救治。重己之弊，當時而損人，所以合者智欺愚，者勢者壓弱者，權勢者，狡黠者都知加入會黨以張大聲勢。在國人心目中，權利思想爲時代潮流，仁義學說爲落伍思想。持己則主張權利，責人則要求博愛平等；推而至於國際，則責難他人不能遠爲我而大量犧牲。凡此，皆重己之利而不盡己之分所由致。待遇則求其厚，地位則求其高，權勢則求其大，而「己的努力則求其小，能力則不求其增益。夫權利與義務，本爲對待之辭；但重點既在權利，如有法術，可以享權利而不盡義務，又何樂而不爲？況且得取權利之道，如奔走，如朋比，如劫持，其徑不一，又何必唯義務是盡以求權利乎！

次論陽明思想。陽明教人致良知；其說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良知即是非之心，人人生而有之，不待學而知，不待慮而能。蓋即今日所謂理性，致良知即所謂實踐其理性。理性爲先天的，實踐其理性亦爲先天的。故曰：個個人心有仲尼。吾人但須遵循良知所示而力行之，即能合理而不謬，不必追求理則於外物之上。故曰：心即理。故視程朱即物窮理工夫爲支離破碎。心即理，不必外求，故不必考求聖賢之遺意，援引歷代之典章。自信其心之所是。故曰：求之於心而以爲是，雖仲尼非之，吾必以爲是。以自信其心之態度，而抹煞前人之一切議論，於是不辯論，於是而益覺前無古人，於是而予智自雄，於是而輕視一切，於是而敢作敢爲，於是而覺得一切！

失是非之心；本屬先天者。但祇限於主動的理解力而已。至於客觀上所理解的內容，則實有待於後天的學習思辨，而有待於所謂即物窮理的工夫。不問主客分別，在究竟上，可否遂出唯心論的範疇，而主客之對立終是一種事實。謂不須學問，不須思辨，祇須良知晶瑩靈照，便可無不明朗，所行無不合宜，則是佛家禪定之說，縱有其事，亦與常人經驗相去甚遠，亦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為常人所能窺行。既然，如欲知道，必須虛心靜氣，以求之於己。大抵無其人，墨子是外人，中決不能領見真理，如能看見真理，其見之之時，亦必在其心境空虛之頃。然而真理之認取，除去心境空虛以外，絕類於禪悅，又無反復推敲的工夫。不然，則會自各種專家，其心境無疑，既有所見於其間，專習之一方面以外，不能，亦有同等精博之見解。經可知能知雖為先天的，而所知終有待於學問思辨。

自晚明以來，自信其心，已臻成學境界之弊。及入清代，陽明學說本不盛行。然味無學者，知識日以功利相勝，識定大詳，見陽明學說之淺陋，又見四人論王學已收其效，乃顯倡提倡之人，而面本明儒學案者，亦皆流行一時。王學功罪，本難論，而其不免於流弊，要為無可諱言。

經學今古文之爭，吾人不欲有所軒輊於其間，亦不願投身於文字之中。然中間不過就其作風言之，則古文家為守前人之遺說，而今文家皆傾向於發揮自為之創見，則似可以斷言。考據之學，鈎沉索隱，其比字求其例，沉潛深，與致不淺，所獲亦多。一旦外界刺激來，則打破而驚醒，回顧前專，恍如大夢一場，無可捉摸。於是自己的思想乃不能本活潑。考據的家間，一時又不能彈蛻乾淨，於是通用自由思想於考據之中，今文學乃風行一時。

廣西海之公羊學說，比較傳公之原意，已屬牽強附會新酒；比較公羊之原文，更為新意發揮。夫則見本可珍貴，但若創見於解說篇，昔者京房條例的推演法，以其無不免有牽曲之時。作始也簡，將其要終也繁，遂成為定例，而陰害其己之本旨者，即為對於與自己學說具有相關者，以證成其

為新意，於是而疑古之風昌盛。大抵無其人，墨子是外人，中國人無四千年之歷史，種種說法，皆相因而生。凡古者可疑，所不疑者，自己而已。馳騁己見，獨行己是，既無考據，又無反復推敲的工夫。乘其心境以治學，既容於武斷，乘其心境以治學，所謂自己證

察，實一種而容之。所謂小心翼翼，所謂自己證

滿腹思想，陽明學說，今文家作風，無論其本身實值而若，其流弊所及，實為今日頹風之淵源所在。欲加救治，宜所為之種來學風，今日之科學程度。程朱教人即物窮理，謂定大下之物長不有理，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即其所知之理而窮究之，則來至乎貫通，自有豁然貫通之日。科學家教人求審無現象作精密之觀察，為周詳之分析，以達於正確之綜合。這科學方法比於進步，而其氣息自與程朱學風相通。程朱教人敬為主敬，一般言之，即以勿自欺解釋主敬，亦無不可。如自欺，則不至拘持偏見，識無信義，而所行亦不至於違反其所知。純粹理性活動之成功，實繫於實踐理性之證成。此與科學精神尤相脗合

國中提倡科學者甚多，無須多加論列。唯科學知識乃科學精神之產物。欲昌明科學，當自發揚科學精神始。科學精神：（一）首在使自己生活與自然融成一片，凡不合理之行為，決不能自認成之。所以科學不僅是知識之事，即連以行為之道循為真根本義。科學之發展，即性之權威，正存於是。（二）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次，研學精神，於凡事理，必確見其真，決不盲從，決不昧心。是爲理性之純真。（二）有歸因，無武斷已歸人，皆足以毀滅之。（三）又其次，科學精神，決持理性之純真，所以對於任何論題，苟無充足理由，或未嚴密論討，即不立任何論斷。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決不強不知以爲知，亦不人云亦云，隨聲附和。（四）再其次，爲保理性之純真，於其所知，必須付之行爲，不能分知行爲兩歧，知而不行，知識不過爲談話資料。綜此四者，科學精神實是用爲人生而設，不僅作學術研究的人作者。[illegible]

吾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萬竹樓隨筆（二四）

自甲午失敗，梁啓超等變法後，與六君子，[illegible]，爲市門新學術之先導設組之一時期，尤在於此，非於地方，戊戌前，在地方尤之最力者，湖南爲代表。

先是光緒二十三年丁酉，梁任公等[illegible]學於長沙時務學堂，任總教習，時值右銘[illegible]湖南巡撫，其子伯嚴三立佐之，黃公度[illegible]任臬司，江建霞標，參觀夫仁錄光[illegible]任學政；成主維新。地方人士之有力者，如葉吏三[illegible]，謂復生闢制，倡設新才當等，亦主張革新不遺餘力。湖南人之性格，敦厚簡樸，新者固能其新，舊者亦能堅舊，當時所謂新學者，既[illegible]於湘，於是湘籍之士如王益吾先輩，[illegible]，爲超[illegible]之。新者以時務學堂爲大本營，以南學會爲別動隊，以湘學報湘報等爲宣傳機關，勢張甚。顧王[illegible]之於舊學，亦[illegible]非梁及韓文舉等所能搖撼，（韓亦長有[illegible]，與梁偕入湘，任時務分教習。）[illegible]忠三書院學子以爲[illegible]，故勢亦不弱。凡舊者[illegible]所輯之「[illegible]教[illegible]編」一書。是書印行於戊戌八月，已在政變以後，吾人今日讀之，猶可窺見當時新舊思想曾作殊死鬥之一斑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民主與哲學

張申府

民主與科學，這個題目，講的人已經夠多的了。但民主與哲學的關係似乎講的人還太少。我現在就想來講講這個問題。

許多人都說，甚至相信，民主與科學是相需相因的，科學是隨民主而來；沒有一種的民主，科學就不會發達，反之，沒有進步的科學，民主也一定不會真。而且有民主就有科學，遠古的美索波達米亞就是一個例子。我也曾說，科學與民主是相輔而行的，如車的兩隻輪子，如鳥的一雙翅膀。正是在天有同比翼鳥，在地好比連理枝。

至於民主與哲學的關係似乎沒有這樣密切。縱然可以說，沒有一種哲學就沒有民主；但却很難說，沒有民主也就沒有哲學。

自從這次歐戰以來，英美已有建立一種民主的哲學的呼聲，我更相信民主也要有一種哲學的基礎；並且我還信我近年所懷抱的一種哲學，一種可以解決一切眞正哲學問題的哲學，我所謂具體相對論的，正是一種民主哲學，也正是最可以爲民主理論基礎的哲學。

在蘇聯方面，哲學在反法西斯上的作用，更是在那裏盡量發揮着。

一般言之，既然非不可說，沒有一種哲學就沒有民主。事實上，更大大可以說，沒有某一種哲學，就沒有某一種民主；沒有某一種哲學，就沒有眞民主。而且還可以說，有某種的民主，就有某種的哲學發達起來。

這地方也可以看出哲學與科學的不同來，不同的一點就是哲學還非一，而科學則無異。但科學與民主關係固極密切，說哲學與民主沒有關係，在今日顯然是大大不然的。

且從一個小地方講起。

且先拿邏輯來說。不管是把邏輯屬於哲學還是不把邏輯屬於哲學，總之，邏輯是與哲學最有關係而不可分的一門學問。邏輯，尤其型式邏輯，一向以反對它著稱的蘇聯近來已極力予以重視，以爲缺乏講邏輯，特別是講型式邏輯些問題的著作，曾是近年以前他們哲學工作上的一大缺陷。近年則已開始這些問題的處理，已著手創作一本邏輯教本，而認其需要之大不可爭議了。（詳見蘇聯今日領袖哲學家蘇聯科學院院人米丁前冬所作「哲學在蘇聯的二十五年」報告第四節中段。該文全五節，四五兩節論敎「哲學」季刊今年四月號裏有節譯。題目由俄文直譯本作「二十五年間蘇聯國裏的哲理科學」。）關於這種教本，據聞今年已成兩種稿本，一種已經開始發表，作者即「哲學史」鉅著的作者之一，莫斯科大學教授阿斯特斯。（第一章敎「馬克斯主義之旗下」今年第四、五期。）我可以說，假使今日相信民主的人，主張民主的人，而不懂得邏輯，而不重視邏輯，而不利用邏輯，那結果一定是不幸的，至少也將是不忠於其主張，不忠於其信念。

中國古人曾經注重過正名。這就是邏輯一部分的應有事。假使今日相信民主的人，主張民主的人，而不先正名，而不防制名字的濫用，而不杜塞自己信念主張的變成八股，變成濫調，變成口頭禪，變成擋箭牌，變成敲門磚，那結果一定是一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識書上切實說，假使相信民主的人，主張民主的人，時至今日，還不就所謂民主，具體切實想一想，還不具體揭出所謂民主的具體意義，還不把所謂民主推到它當然的邏輯結論，就是還不把它推到具體事實上去，那結果將一定是一個天大的哄騙。

因爲內外的推迫，中國的民主運動，顯而易見已經非由口說的階段走上實行的階段不可了。假使今日國內相信民主主張民主的人還見不及此，還不急切從事于此，那他不過隨波逐流，以民主爲時髦而已，以民主投機而已，一定不是透底了解民主的。

在中國怎樣實行民主，這在證界今日一點也不是什麼難問題。

要實行民主，必須有某些條件，這當然是不錯的。而既落條件，那就要看時勢；顧局面。在什麼時勢之下，要什麼條件；在另一種局面之下，就要另一組條件。而且因果常是相互的，條件可以生條件。雞可以生蛋，蛋也可以生雞。特別拿人民程度來說，人民程度高一點，固可以民主一點；但是民主一點，人民程度也就可以高一點。所以，條件論一定不能是絕對的。

若說到提早實現民主的具體辦法，那就除所謂民主以外更要注意所謂提早，所謂具體。既說提早的具體辦法，顯然就是說救急的具體辦法。如不是爲救急，何必要提什麼早？既要救急，當然更不能以平常條件來衡論。

民主的救急的實行的具體辦法是什麼，這在眞正認識民主忠于民主的人，實在當下就是，更是不費尋覓。

一般說來，要在中國實行民主，就大家已經見到說到的來說，不外三條路子。

第一條路就是：召集國民大會，制頒憲法；同時或先期實行地方自治。這在今日局勢之下，顯然有一見緩不濟急。因此，若要提早實行民主，勢難循此迂緩之路。而且我早已說過，憲政應在憲法之前，以使憲法有事實的根據；不應憲政在憲法之後，幻想社會作機械的變革。今日許多人論民主與科學的關係，那就應知科學是注重實試，試驗，實驗的。實行民主也是注重實試，試驗，實驗的；民主也是注重民主經非一蹴可及。

第二條路與基：要求先給人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或者說先保障人民這種權利（不是權利）。當在這種種自由或權利之下，人民設自在民主政治之下，人民設自由思想。這種種自由或權利，可說是民主的先決條件，而實要以這種種自由或權利，分內容，一部分的果。尤其在今日，如果說，倘使要求者，方面說只是自欺，就給予者一方才可以談民主，那就要求者一方面說就是欺人。事實上，在今日那不但緩不濟急，而且是不可能。在理論上，自由與民主是相通的；在事實上，自由與民主也應同時并有。在今日事實上，簡直是必待有了民主，所謂人民的種種自由或權利，乃能具體，有着，而不落空。

第三條路是眞正救急的路，那就更有待于了解邏輯了。但是這條路在那兒，凡是認識民主忠於民主，更了解了邏輯，而不憚於推求思索的人，也就不難看得出。實在當下就是，更無待於旁求。在那兒？就在民主兩個字上。相信民主主張民主的，當然不是相信的，主張的，兩個字。可是試想想，所謂民主兩個字是什麼意思。最簡單的解釋，民主就是民爲主。這個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謂民又以什麼爲範圍？當然是指的全體人民（漢奸除外，可不待言），而非指的那一部分。那麼，在一個國家緊急的時候，全體人民作主又如何可能呢？全體人民的意思在政治上又應怎麼表現呢？這而易見要以有組織的意思爲代表。一個時候，在一個國家，關於國家大事，總不外幾個意見。在一個國家緊急的時候，政治上必須全國一致。而所謂全國一致者，就是使全國不同的代表意見融洽爲一體，使各個方面都得有所表現，都得爲國家盡其所能，而都不因一己而抹殺其它。在一個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凡是有理性而負責任的人也必無不能融異見爲一體之理。這在政治上應該採取什麼形式，尤其應該採取什麼具體形式，凡是認識民主，忠於民主，又懂得邏輯，不憑模糊邏輯把民主推出它當然的邏輯結論，推到具體事實上去的人，當都可以默契於衷，不言而喻。……

特別在國家對外作戰的時候，也就是生死存亡之秋，軍令政令的統一原是天經地義，任何人任何黨派也不能否認。可是統一不能只具形式，更要有其內容；不能只是說說，更要見諸實際。統一如何才可能？統一的內容是什麼？但就合義說來，那就是在政治機構上，在人事上，在政策上，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政治基礎上，各種有組織的不同派別不同意見的全國一致。作到這個也就作到統一；作不到這個，也就作不到統一。這是今日民主主張的當然的邏輯結論。事到如今，一向號召民主的人，一定可以相信只兩個字是不成的，只靠符咒是不行的，縱然符咒不是完全不曾有其用處。事到如今，一向號召民主的人，既乎必須拿出更具體的辦法，更切實的口號，更積極的行動來。

以上只說明了民主與哲學幹部的邏輯的一種關係。至於民主與一般哲學的一般關係，什麼是民主哲學，什麼是民主的哲學，或民主的哲學者是什麼，只好更籍另說了。……

萬竹樓隨筆（二五）

舜生

友人范君告余，史學階（春霆）之蜀川也，頗師武侯治蜀尚嚴之意，於一切犯法亂紀者，家以綱之，不稍假借。時法人趙亞任嘉司，亦不肯寬貸，然亦無法制止，因與一聯云：「能公心則反側自安，徒有知兵非好戰。不解分別寬嚴思！」舉兒之頗可容云。

陳啓天先生著：民主憲政論 出版 全書凡十餘萬言，其分九章，關於民主憲政之原理，歷史，及其實施問題，均有詳盡之研究。政者不可不讀之名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定價二元五

Academia Historica

論穩定幣值問題

楊宜林

（一）

目前經濟問題，當推金融為其中重要關鍵，而穩定幣值，尤其是金融問題中的核心。惟平貨幣經濟的現社會，一個穩定的幣值標準，而欲求國計民生的圓滿發展，實不可想像之事。我們從七年來的戰時經濟生活，更能體驗到穩定幣值的重要性。除少數投機者藉之徒，乘着時代的混亂，發財致富的分外，誰不感覺得物價日高，幣值日跌的感苦。並失業人數遂隨膨脹的階段，而繼續也增加起來，國家的度支，愈形提標見絀，難于應付。此一問題不得解決，國家難免敗北，我們的創痛依然存在，又何必修說勝利之果？

幣值存在對外和對內雙層意義，故本問題可從國際與國內兩方面，加以檢討。本年七月，美國布里敦森林國際貨幣會議對于戰後國際間的貨幣合作，已奠定一基礎。國際貨幣基金計劃，原則已經會議通過，現在正待關係各國政府的正式核准參加，如果見諸實施，對于國際間的收支平衡，和幣值的穩定，當有莫大貢獻，我們參加這項會議，關于理事人選以及基金攤額各點的決定，都尚相當圓滿，因此國人頗感興奮，甚且以為這是我們幣值問題的救星。此種信念，誠有相當理由。經過上次歐戰之後，若干國家貨幣的整理，倘不得力於國際的援手，即如這幾年來，我們所得盟國關于平準基金的援助，以及美國的黃金貸款，也都極有利于我國幣制。但從另一觀點言，國際間的援助，總是互惠的，而不是單方面的，我們果欲自躋于強國之林，自盡力求與世界友邦合作互助，而萬不可稍存依賴之心。

要是任何方面的市場。可視國際貨幣基金計劃能否施行奏效，須視各國[illegible]在其[illegible]，也是適合新立場視其[illegible]與各國幣制，不穩定的[illegible]，而關涉的穩定，[illegible]國民間的幣值穩定，何條法理定，[illegible]能達力。所以[illegible]解決其身的幣值問題。

（二）

一國貨幣的價值，在國內以物價為表示，對國外則以匯率為表示，這是同一事物的二方面，在國際金本位或其他國際性的幣制之下，長期趨勢，二者應可能傾向一致的。但如果一國的經濟失衡，同時又採取隔絕國際影響的措施，那末該國貨幣的對外和對內價值，可能分道揚鑣，呈現極大的罅縫。返觀現在法幣的對外價值，按官價匯率計算約等于戰前幣值3/20，或百分之十五，而其對內價值，假定按躉售物價指數50,000%計算，約等于戰前幣值1/500，或百分之〇・二，兩者之間，差距不下七十餘倍之鉅。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究應以對外價值，抑或以對內價值為穩定幣值的標準，出入至大，殊有檢討的價值。

所謂抉擇對內或對外幣值為穩定標準者，可能包括兩種意義。第一種係指貨幣的本位，或幣制問題的抉擇而言。一般經濟學者都認為在動態經濟情形之下，穩定匯價與穩定物價，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勢不可得兼，必須擇取三者之一，作爲貨幣的本位。在國際金本位時代，各國莫不以匯價爲標準。反之在過去十數年間，管理貨幣制度風行于世，各國頗皆注重貨幣的對內價值。以上二種本位，各有利弊得失，論者已多，毋容贅辭。但就現實觀之，戰後世界應爲一國際合作之世界，似毋庸置疑。大西洋憲章，和盟國領袖的言論，都充份表示國際合作的精神。在金融方面，布里敦森林的會議，更強調建設國際貨幣合作的機構，主張各國貨幣之間確保穩定的匯兌關係，而且前進行的匯兌制，以及各種際國際貿易的設施，概應撤廢。在此種國際合作的組織之下，各會員國家對于穩定匯率，比較穩定物價，責任更重大。我國朝野人士，已經表示參加國際貨幣合作之意向，祇待政府加以最後核准。觀乎此，四不難推想我國今後貨幣制度將何所趨從了。

可是我們須進一步研究，在上述國際性的貨幣合作組織之下，我國貨幣的對外價值，應穩定在何種水準，方爲合理。換言之，我們是否照戰前的法定外匯平值，按照時的物價水準，按購買力平價舉行，另行計算一新的平價，這就是擇穩定標準的第二種意義。

現在和將來的國際金融的範圍之中，美金是最重要的地位，我們試以對美匯率討論的對象。戰前中美匯兌平價，每一美金約等于法幣三元。抗戰以還，我國施行匯兌統制，匯率逐漸下降，迨後政府規定每一美金等于法幣二十元，即現行的法定匯價。近年爲補償外僑起見，于結售我國政府的外匯，除法價二十元之外，准予加給補助費二十元，即每一美金等于四十元。此外市場上美金公價行市約一百一二十元，美金儲蓄券約爲一百六七十元，美金鈔券，則高達二百六七十元。以上所市價格，各地頗有出入，復隨時漲落不定，動態至爲混亂。再美金與黃金有固定的聯繫，每一盎司黃金約合美金三十五元，如照目前滬市金價一萬七千五百元折算，理論上中美匯兌平價，至少須在五百元左右。不寧惟是，按諸學理，不免換紙幣的對外平價，須以購買力爲準則，假定我國物價指數爲戰前的五百倍，美國的物價指數，僅增一倍，則兩國間的購買力平價，應約略等于戰前平價的五百倍，即在七百五十元左右。由上觀之，同一美金匯率，可能高達七八百元，低至三元，我們果將根據何種匯率，以決定我國的穩定價？

（三）

在目前幣值紊亂之際，姑不必作長遠恢復戰前的外匯平價。先從現行法定匯率說起，如果以之爲穩定幣值標準，實際上能否辦到？第一要看外匯工具是否充實。目前市場匯率，決定于供需，必須外匯基金雄厚，充分供應市場的需求，匯率方能穩定，不能求過于供，外幣價格必然不斷上漲，即難收穩定之效。所謂基金是否雄厚，當然對于法幣發行言。目前國內外貿易情形，輸入方面所需的外匯，尚屬「無限」。一旦海運恢復，舶來品湧到，對于基金的壓力，勢必一時增強，一時我們是否能比例增強基金的實力，殊屬問題。其次統制外匯制度是穩定匯率的重要工具，目前外匯基金所以能應付者，莫非藉統制社會將一大部份出口匯需求接受于國外。總言之，現行法定匯率的效力，實已與統制制度的存在，不可須臾分離。希里敦森林會議所通過的國際貨幣合作協定，對于我國的特殊情形，減有彈性的規定，在過渡期間，暫將容許管理外匯。但其基本精神，則力主取締統制制度。目前情況，法定匯率的可能性，充其量不過使用元數的過渡期間，一旦統制撤除，普通供需，

即將大感棘手。再者，外匯基金既未必能比較現狀顯著增強，同時統制制度又終須依國際合作計劃的規定而廢止，那末唯一的辦法，必須在過渡期間，厲行緊縮，使物價下降，俾可鼓勵輸出，限制輸入，從而調節外匯的供需，以求法定匯率的穩定。可是觀察現實，物價指數已超過戰前水準五百餘倍，而法定匯率較戰前平價不過跌落六倍有奇。匯價與物價，差距如是其鉅，消費獲利優厚，勢必大量湧到，國產不堪賠累，輸出必至停頓。如欲挽救此種壓倒性的入超趨勢，非將物價極度壓低到不當於法定匯率的程度不可。這在事實上，恐難辦到，譬如說要把每尺一百元的布匹，平抑到每尺二角或二角半，簡直是不可想像之事。再一撥天之幸，藉國家當鑒萬物之力，民衆亦忱合作之助，終于把緊縮政策勉強貫徹施行，但其過程中勢必引起嚴重經濟恐慌，摧殘百業，民不聊生，甚或發生經濟以外的惡劣反響，尤屬不可忽視。

次言美金黑市匯率，現鈔，儲券，債票行市，軒輊不齊，漲跌無定，已成爲投機標的之一種，絕不足以反映外匯市場的正常供需關係，自亦不可作爲穩定幣值的標準。至于黃金的價值比較穩定，且國際貨幣合作計劃對于各國貨幣的聯繫，仍傾向使用黃金。如果按國內和國外的金價并列計算，也可求得一種外匯比率。不過目前我國金價情形至爲混亂，黃金市場的買賣，投機色彩甚濃，金價的漲落波動與經濟因素不相聯繫，故金價本身是否合理，尚成問題。再我國產金不多，美國貨我之黃金是否足數控制國內金價，亦未可必，倘金價波動不能就範，則以金價爲計算根據的幣值，自更無從穩定。不過黃金在今後國際金融範疇之內，既佔有相當重要地位，凡以金價爲計算根據的平價，也自有參考的價值。

另一部份學者，主張以物價爲穩定幣值的根據，即上文述及之購買力平價，不過問題亦多，第一購買力平價須根據物價指數爲計算根據，在技術方面物價指數因所括項目之不同，其性質亦各異其趣。計算平價之際，應當採用何種指數，學者意見紛歧。倡言購買力平價學說的卡塞爾教授主張採用一般通常物價指數，可是其他學者認爲一般通常物價指數所括項目之中，頗多不參加國際貿易的貨品，既與匯價的變動沒有直接關係，就不應該列入計算。另一派以爲國際貿易商品的價格變動，和匯率的波動，影響相隨，如果根據國際貿易商品的價格計算購買力平價，無異根據匯率計算匯率平價，不免陷入循環論理的困難。于是一部份人主張採用純粹國際貿易物價指數。另一部份主張採用純粹非國際物價指數，此外更有人主張採用生活費指數，工資指數，以及總成本指數等等意見極不一致，究竟如何抉擇，頗費躊躇。且我國幅員遼闊，物價的地域性極強，應如何算出一種充分代表全國性的指數，也應注意。再則我國從事物價指數工作，歷史尚暫，對于資料之搜集，如何便其完備適用，對于編製之方法，如何求其精密正確，也都要努力改進。第二，目前國內物價劇漲，癥結固爲複雜，貨幣因素，雖是其中主要，而他如戰時運輸的困難，生產機構的摧毀，投機心理的流行等等影響，也自有相當重要的關係。換言之，戰時物價水準之特高，決非完全由于貨幣因素造成，如果把戰時物價指數作爲計算購買力平價的根據，不免有偏高之弊。這類非貨幣因素可能隨戰事的結束而消滅，因而使物價發生下降的趨勢，但欲正確估計其可能影響物價的程度，良匪易事。第三，上文已經提及如照目前物價指數計算對美匯率，當在七八百元左右，和現行法定匯價，相差至鉅，倘今後物價繼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種上漲，則下跌的程度，必將更甚于此。這樣劇烈的調整，對于民衆心理的影響如何，不可不加顧慮。見如此貶低匯價，能否達得國際方面的同情，也不無問題。

筆者認為穩定幣值的方策，必須兼顧理論與實際。為適應國際貨幣合作的要求起見，我們應從調整匯率入手。但新匯率的釐訂，必須以國內經濟狀況為根據，方可使物價與匯價儘量趨向一致，貨幣的對內和對外價值，泯除鴻隙。至于上文所述各種匯價，原則上似以購買力平價比較合宜，惟對于物價指數的抉擇適用，尚待專家的精密研究。愚見以為不妨以產國各重要城市的一般慣售物價為均指數為根據，再以黃金價格按適當的權數，算出一綜合指數。惟關于非貨幣因素，對于物價及金價的影響，不易處理，似必須待戰事收平，社會經濟恢復常態之時，方能得到比較正確的估計。再為貨幣的流通便利起見，不妨于現行法幣之外，增發一種單位較大的新幣，但此項新幣的發行及流通，必以不妨礙法幣的信用為原則，新幣和法幣更須保持固定的比率，方可避免混亂之弊。

（四）

以上所論方針的得失，僅是穩定幣值的起點。要彌的方面，固然要正確運營，後續的步驟更須針對不穩定的發生所在，予以解決。本國[illegible]經濟的原因，雖要且論，其在今日[illegible]國以內的，下列幾端，尚有[illegible]出的重要。

關于貨幣本身，應從質與量方努力整頓的基礎。（1）本國[illegible]為保定幣值的重要工作，務必力求其充實。所謂方面，當發展國營工業，發展國營出口事業，吸收僑匯資本，以期逐次引投資，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給高工商信貸[illegible]，各方面時加注意。關于政府外幣支出，方宜嚴加[illegible]，各機關應用物品，凡能可以利用國貨者，一律倡用國產。民間用途，也可用勸導方式，儘量節省外幣的浪費。（2）黃金白銀均為貨幣準備的中堅，應當努力增產，同時對于民間所藏金銀，以相當優惠條件，勸令繳存中央銀行，集中保管。（3）發行數量與幣值關係最切，戰時預算龐大，因而影響發行數額，實屬萬不得已。戰事結束之後務必極力收縮，其關鍵自在于財政收支的平衡。建設經費雖不可省，但如果在效率方面，多多注意，以同一數額的財力達成較大數量的事功，那也未嘗不能減輕預算的負擔。開源方面，如果能廓清弊端，振刷稅制，加強募債，獎勵儲蓄，國庫收入，必能增強，縱有不敷，也務必避免增加發行。對于發行準備應當恢復公開檢查制度，以昭人民的信仰。

關于金融機構方面，也須從資金流通方改進，其最緊大者，（4）全國金融網的設設，是吸收明民資源，促進法幣回流的[illegible]要條件。現在銀行分支機構，單位既嫌過多，分佈尤不妥當，務須依法規劃一定善的金融網方案，付諸實施。（5）三重要者。[illegible]現在[illegible]銀行的充實，其重為[illegible]。[illegible]，也不容[illegible]。[illegible]民的信任[illegible]，是中央銀[illegible]，[illegible]能[illegible]，務[illegible]目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Academia Historica

然以財長兼任中央銀行總裁之例。其最顯著的用意，當在避免政治影響，藉以昭大信于人民。次就權責觀之，財政部爲督導金融行政和政策的主管機關，中央銀行是執行金融政策的機構，以督導機關的首長兼任執行機構的首長，不免喪失機構存在的作用，確有未妥。再就效率着想，中央銀行總裁的職務異常繁重，非有傑出幹才專任其事，不易勝任，財長爲內閣之中堅份子，日理萬機，豈可再分其心思才智，以担負此項要職。縱有兼賦特厚之士，勇于服務，不惜犧牲個人之精力，以肩負此兩項要職，但爲確立國家制度，保障行政效率計，實不足爲訓。故今後中央銀行的刷新，必以其首長人選問題的解決爲要件。

（五）

綜之，穩定幣值已成爲我國今後經濟問題的核心問題。所衡現局，國際經濟關係日臻密切，各國的金融穩定與否，將不可分割之勢。所以我們的方針，自應在穩定匯率入手，而匯率的確訂，則應依據國內物價水準，方可符合國民經濟的需要。至于治本之道，尤須在幣制及財政機構方面，積極努力，使其臻于健全。不然本身力量既欠充實，國際援助恐也未必有裨于我們問題的解決。

頁長，三，十，三十，

萬竹樓隨筆（二六）

民國十九年秋，共產軍突入長沙，時傳開國子靖先生與葉煥彬德輝同時被害。後悉湖先生以劫數避成家得免，而葉之死耗，則不久即證實。葉郁郁多文，辯才無礙；精版本之學，藏書甚富，有著作多種，而『書林清話』一書尤有名。然喜干預政治，發營商業，曾一度任長沙總商會會長。性保守，於維新革命，均力持反對，跡其行徑，類今世所謂土豪劣紳。辛亥湖南獨立，唐蟒任都督府軍政部部長，拘捕葉，擬置之重典，以章太炎發電力保，始得省釋。後太炎爲袁氏所幽禁，煥彬亦往省視之，贈聯稱章之『國故論衡』，章亦頗賞煥彬之葉氏說文，其交情殆即原於辛亥救護之一電。民國十年，余曾一度晤葉於余堯衢先生之上海寓廬，葉終席娓娓談不倦，信一亂世之清才也。頃讀吳瞿安（梅）『霜崖詩錄』，有哀葉五律兩首，頗能狀葉之生平。詩曰：

自空天下士，爲我倘垂青，豈意一朝別，南天見落星。恢諧得奇禍，刑辟失常經，安得中郎筆，重書有道銘。

大名垂四海，小隱寄三吳，曾寫通靈第，如披博古圖。奇文蒐紫簡，餘技事丹鉛，竟殺讀書種，天高何處呼。

舜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巴黎光復後之法國政情

毅生譯

自巴黎光復與戰局樂之臨時政府遷返巴黎後，法國之政治情形，仍然不甚安定。雖然，現已趨緊要關頭，一切現象在在可以決定法國之將來。法國民族抗敵委員會為法國國內地下抗敵運動之最高機構，其中包羅各種政黨與政治團體，且各有其左右輿論之政綱。

彼等之政治思想，政治方法與政治策略，雖各有不同，但有數點為彼等所一致主張者，此可從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之戰爭綱領中見出之。茲將抗敵委員會中各主要團體之政策與決議案，敘述於下，以供關心法國政治問題者之參考。

「民族解放運動」乃許多軍事抗敵團體所組成的，其領袖現居臨時政府中之重要職位，如軍事委員會主席薩蘭特，生產部長賴各斯脫，救濟部長費蘭乃等，曾於九月十七日在巴黎通過以下之決議，第一，立即逮捕合作與投降份子，包括維琪政府各領袖與各部長，第二，沒收賣國賊之財產，第三，為私人及敵人之利益計，不法盜賣國家財產者，應處以監禁與死刑，第四，不法獲得之利益，以及從民族解放運動所屬之人員與企業所獲得之不法利益，應予以處分，第五，刷新及改革國家政治機構，尤應注重於財政部外交部與司法部，第六，應組織一混合委員會，以協助經濟建設，第七，大工業與大企業，如電力，公益事業，重工業，大銀行與保險事業等，應收歸國有，第八，重建法國軍隊。

「民族前綫」則為抗敵委員會中之另一主要團體。巴黎之暴動與光復，該團體之功勳甚大。成立於一九四一年，其宗旨為團結所有愛國志士，不論其政治信仰與宗教信仰為如何，共同起而為解放法國而奮鬥，其任務則有三，第一，殲滅敵人於法境與驅逐敵人於法境之外，第二，懲罰賣國賊與合作份子，第三，恢復人民之言論自由與選擇其自身之政府之自由。

「共和人民運動」，即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之運動，則為現今臨時政府之外交部長皮杜爾，司法部長蒙教，與宣傳部長戴蘭所領導之政治團體。該團體在德軍佔領時出版一機關報，稱為「共和解放運動」，現今則改稱為「黎明」，曾公佈包括以下數項之宣言，用以闡明該黨之主張。第一，建立一自由強大與正義之共和國，尊重人民，主權與基本自由原則，完全脫離全體主義觀念之國家，尊重個人，國有公益事業，如電力，礦產，運輸和銀行以約束托拉斯與財政利益，尊重自由與正直之報章，實行普選，包括婦女選舉和比例投票，以求真正代表全國。第二，家庭方面，該黨主張家庭津貼，家庭慈善事業，家庭投票，家長自由選擇其兒女之教育，建築康健的房屋，以及重定法規在家庭中之地位。第三，青年方面，新的職業政策，學習之機會，津貼新婚者，三星期給薪之例假，青年代表，與懲罰賣國賊及合作份子。第四，發揚光大法國與其帝國，恢復法國領土主權，與其在大國中之地位，解放法國人之自由，以表露彼等對其國家之真正愛情，與担負法國之文明使命，建立一足以保障和平之強有力之國際組織，復興法國軍隊，富有責任心之軍官，以及尊重法國之道德與宗教傳統。第五，勞工方面，尊敬勞工之神聖，光榮和安全，維持最低生活之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資，組織工會之自由，工人參加經濟組織與企業，勞資兩方公分生產利益，尊重由於工作與儲蓄得來之財產之權利，保護手藝工人之權利，鼓勵私人企業，舊時工廠，與提倡運動與娛樂之組織。第六，對戰爭俘虜，該黨主張重行訂定彼等在國家中之正當地位。第七，對所有法國人民，則該黨主張由於勞工之神聖，應使彼等咸有安居樂業之機會。總之，以工作，統一，自由之意志與法律之演進，使法國復興。

另一團體在最近曾公佈其政策者，則為由上次及此次之戰士所組織之 OCCM。其宣言之標題為「吾人應起而重建法國」，法國人從未放棄法國之獨立與其偉大之地位，因之在法國歷史上又有抗敵運動之興起，「法國屹立於戰壕之上而再生矣」。該項宣言強調法國之獨立與偉大，「法國當此大國之間集合討論世界之將來組織，尤其有關於歐洲之時，應要求獲得其傳統之地位。」法國在國際制度方面，以及佔領德國等事項方面，自應負起其責任。法國對世界和平與繁榮，自有其重大之貢獻，在西歐及中歐應完成其經濟與道德之使命，是故法國務須起而担負在上次大戰後未清楚認識之工作。所謂共和政體者，乃保障個人之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與示威自由，住宅之不可侵犯，通信之秘密，法律前所有公民之絕對平等，以及尊重個人之政體也。「但解放與資本主義之第三共和已為維琪所壓倒矣，是故吾人應恢復第四共和，其特留為一眞正的與強有力的民主政治。」

該項宣言中又提出六項必需條件：（一）選舉之必需加以改良，在二十歲以上之男女皆有投票權，而選舉方法應與傾向於大政黨與大團體之趨勢相混合，（二）文官制度之建立，不但應效忠於民主制度，且應使其不能默許將此項制度隸屬於私人之手，而為特權利益服務，（三）報章之講求職業的正直，應絕對自由發表其所見所聞，不應有所顧慮，而為某種利益所支配。（四）新社會之奠定；在此新社會中，個人之價值，以美德，而非以財力為標準；學校給予人人同等之機會；經濟制度保證最低生活程度之工資；在此新社會中，由於工人地位之提高，職業之組織與參加管理之責任，將使社會上之階級消滅。（五）人民權利之確立，「不論政府如何，人民應予以統治，彼等之主權，必須予以尊重。倘政府與人民爭權，則該政府為不良之政府，應即予以更換。」（六）政府由人民所創立，應授與彼等行政大權，俾確保較大之行政的連續，並保證於國家重大困難問題發生時，必將徵求人民之意見。

托拉斯壓迫人民，由於彼等企業之龐大，逐漸吞沒獨立的工業家與商人，是故該項宣言中主張立將此等私人獨佔企業收為國有，但須避免官僚化。

除此以外，該團體又呼籲加緊戰時努力，俾戰事早日結束；懲罰賣國賊，不但須迅速，且須嚴厲；處置戰時獲厚利者及取締黑市；提高工資，因德人佔領法國時曾極力降低工資，實行奴役法人之政策；組織一眞正人民之軍隊，即將內地重編入正規軍。

關於法國外交政策，吾人可從法國基督教社會主義黨之外交政策中見出之。現今法國臨時政府之外交部長杜氏，即為該黨之黨員。第一，應使世界週知法國抵抗運動對盟國勝利之貢獻，恢復法國之財富，並保證法國不再成為歐洲糾紛之犧牲品。第二，除恢復其領土外，法國不再有其他領土之要求，（雖有一部份人士主張，法國應併吞德國某項領土，以保障法國在軍事上之安全），法國亦須參加德國之佔領。第三，關於如何

Academia Historica

處理德國，法國駐首從其國家安全着眼；撲滅所有納粹主義之形跡，以及西德之大資本主義與東德之大地主主義；實行社會改革，尤須注重於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登台後所長成之德國青年之再教育；德國之重火與工業，則須加以管制。雖主張對戰敗之德國，應予以嚴厲之處置，但該黨認爲若將德國分裂，勢必危害歐洲戰後之和平。總之，應使德國人民得一印象，即德國並未完全破壞。而德國在國際上之道德與信用之恢復，亦應爲逐漸的。關於世界和平與安全，則該黨主張設立一國際組織，但須具有強大而有效之力量，能將其威權加放於各國主權之上，用以維持世界之法律與秩序。（以上所譯者原爲中央社記者之巴黎通訊，見十月六日英文自由西報，但其他各報未見刊出，故特譯爲國文，以介紹於讀者，譯誤之處盼中央社予以指正。譯者附識）

萬竹樓隨筆（二七）

舜生

民九至民二十之十年間，余在上海任中華書局編輯，以所經手者爲出版新書及各種雜誌，因於當代學人之新著，每有機會得先讀其原稿。在此十年間，就余記憶所及，所有著作者書寫稿件不假手抄胥而又能一字不苟者，僅得四人焉。其一爲梁任公先生，次馬君武先生，次亡友王光祈先生，又次則吳爾生先生也。吾先哲以敬事垂教，書寫稿件而能一字不苟，是即敬事之一端，此今日青年所最宜效法者也。先是梁任公所著「清代學術史概論」，在未印單行本以前，曾以一部分在當時由中華所印行之「改造」雜誌發表。一日，任公忽以快函抵余，余頗以爲怪，蓋余與任公僅有一面之雅，平日雖素敬其人，但從未以一書致候，在誼固不應由任公先施也。及拆閱，則親筆竟兩紙，首對上海一度晤面表示拳拳，次乃託余將其所寫「清代學術史概論」中之一段，涉及胡適之先生者，依據來函代爲改正。現在單行本中，點於適之先生者，僅有如下之二十五字，即：「而績谿諸胡之後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是也。較其最初之原稿，已省略十餘字，此等處可見前輩對於同時代人有所稱許，其態度固異常矜愼也。

Academia Historica

麥克阿瑟和西南太平洋戰場

抱貞譯

麥克阿瑟將軍自一九四二年春季以來，就負起保衛澳洲的責任，當時他的兵力，只有澳美混合的軍隊五六師，一支渺不足道的艦隊，至於空軍更不必說了，在目前，則已有五倍的兵力，空軍已能每次出動一百五十架以上，海軍亦已相當像樣了。從珍珠港那邊可以得到源源不斷的給養，在那邊又駐有尼米茲的空前強大的海軍。沒有一個指揮官對於他在人員和配備方面的需要，是會感到滿足的，這已成爲軍事學上的一條公理了，並且麥克阿瑟如果能夠得到充足的兵力的話，他在明天恐怕就可以攻到東京了。

太平洋戰爭有三個特點，一是面積的廣泛，二是人員的龐雜，三是作戰方法的奇妙。尚有第四個特點，每爲一般人所忽視，就是太平洋戰爭不但區域廣大，並且使人發生陌生之感，不像歐洲戰場上的地名，人人熟悉。再者，歐洲戰場上的事情，如開闢第二戰場等等，大多極事渲染，而關於太平洋戰爭的戰略，則仍舊神秘非凡。

麥克阿瑟屢次申言，誓欲打回到菲律賓，尼米茲則主張由海上直通中國。現在漸漸明白兩者是互相會通的，換句話說，各是一個大計劃中的一部分。麥氏從澳洲向北攻，尼氏從珍珠港向西攻，麥氏沒有海軍的運輸，休想回到菲律賓，反之，除非佔領了菲律賓，海軍才能到達中國海岸。麥氏在菲律賓立定腳跟，海軍控制直達中國的海路，兩者聯合起來，就可以封鎖日本本土和切斷日本與南洋之間的交通。

（換一種說法：麥氏一旦在菲律賓建立了他的根據地，他的轟炸機，快速艦艇，和那些不可思議的潛艇，就可以切斷日本中非間的交通線了。留駐在南面的五十萬日軍就要陷於孤立。日本軍火供應綫被切斷之後，菲島以北的七千萬人沒有高級的辛烷瓦斯；許多急需的軍用物資也就沒有了。最後，他們要派海軍出海應戰，尼米茲將軍是會將它送回老家去的。譯者附註）

麥克阿瑟是太平洋戰場上的主要角色，將來統一指揮的話，他有成爲攻日總司令的可能，其地位有如歐洲方面的艾森豪威爾，第一，他是清楚太平洋的作戰計劃，第二，他的階級較高，第三，菲律賓在軍事上的重要性，而麥氏在菲律賓又深得民望。（羅斯第二次赴北克會議後，據羅氏宣佈因種種關係太平洋不設總司令，英國爲了表示決心攻日起見，或許也想取得這個位置。譯者附註）

麥氏今日的地位，乃由環境使然。但他一生的事業，每是危險的和不照舊例的。四十年來，不是受敵人的威脅，就是受政治上的攻擊，但他都很平靜的安全渡過了。他在七點半鐘開始批閱公事，十點左右上辦公廳，往往回家午飯，三點左右又上辦公廳，直至晚上八點鐘才停止辦公。在作戰時，他的總司令部就移到與前線很接近的地方。他時常在槍林彈雨之中，冒險視察。舉海軍島一役爲例，美軍登陸該島不久，他就上岸去，他的部屬手指五十碼以外的叢林說道：「我們在幾分鐘以前，才把一個日本射擊兵殺死了」。麥氏說道，「很好，應該這樣對付他們」，他仍舊處之泰然的繼續他的視察，

Academia Historica

他不關心他的自己的將來，他相信命運會自己處理自己。據說，他在六歲時，曾被印地安人的毒箭擦破他的頭皮。他現在的滿不在乎的態度，據說就是在那時養成的。他是將門之子，他父親在南北內戰中，屢建勳功，死時是一個顯赫的中將。他在西點陸大畢業後，不到九十天，就被派到菲律賓去幫忙他父親。菲列賓騷亂平定後，他回國返家。一九零四年日俄戰爭爆發，老羅斯福總統想派一個軍官去觀戰，陸軍部建議道：「派兩個麥克阿瑟去最為適當」。他就隨從他父親，得以第一次觀察日本軍隊的底細。嗣後他旅行遠東，足跡遍及遼瀋，瓜哇，馬來亞，印度和錫蘭。日俄戰爭後，他由父親的隨從升為老羅斯福總統的隨從。一九零八至一九一七年之間，他研究機械工程，並曾游歷墨西哥。一九一七年柏克（Newton Baker）建議從四十八個警衛隊中抽出優秀人員，組織成一個特殊的師團，柏氏詢向麥氏的意見如何，麥氏說：「好極，這將像一條燦爛的虹照遍全國」。當這虹師團出發法國，參加歐戰時，他就是該師團的參謀長。在法國，他作戰非常勇敢，據說在聖米歇爾，他曾活捉一個德國軍官，捏住一隻耳朵來過戰綫，又據說在色當，因他出現太早，美國兵士不相信自己的參謀官會到來，所以把他當作敵人捉住了。

自法國返後，他大享盛名，且已升為少將。彼任為西點陸軍大學的總監，這樣的職位由他這樣年輕的人來担任是空前的。一九二二年，他離開西點，去菲律賓。一九三零返華盛頓，任美國陸軍參謀總長之職。一九三五年，他又去菲律賓，初任菲政府的顧問，後任菲律賓陸軍的上將，羅斯福總統於珍珠港事件以前幾個月，任他為遠東美軍總司令。

麥氏在西南太平洋作戰時，遇到了幾個問題。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羅斯福和邱吉爾的決定，他們兩人認為歐洲方面的戰爭更為重要。其次是自從德國開菲律賓後兩年來的大局趨勢，不但太平洋戰爭比不上歐洲戰爭的重要有色，並且就是以太平洋戰爭而論，麥克阿瑟與海軍比起來，亦顯出被人冷淡了。不但如此，麥克阿瑟一保衛的國家不是自己的國家，與他共同決定軍事大計的政治家亦不是自己的同胞。而他居然能應付裕如，並且成績斐然，這是他在美國軍事歷史應該佔有的一頁光榮史。

他所保衛的土地，有如美國這樣大，而他所有的兵力，只夠閱兵典禮之用。但他卻決定不在澳洲本土應戰，而設法在新幾內亞進攻日軍。這就像一場冒險的賭博。因為麥氏如欲進攻新幾內亞，就必須要出動所有的兵力，不留一個預備隊在後方，換句話說，如果他打敗了，日本就可如人無人之境的進取澳洲。在另一方面說，這也是一場合理的賭博，因為守衛澳洲北部是不可靠的，並且欲和日本決一雌雄，亦只有在新幾內亞，打勝了就算贏，打敗了澳洲也就完。新幾內亞幾次勝仗，都是間不容髮得來的。例如，那次越過歐文史丹萊山脈，二萬六千人的供應完全依靠於空軍，有一次氣候太惡劣，飛機不能活動，而軍隊只有一天的糧食，若而不久天氣就轉晴，給養源源從天上飛來了。

麥氏對於太平洋戰爭的看法，很是簡單。他認為「歐洲第一」的決定是羅邱兩人的事情，所以不應該加以疑問，而只應該服從。但即使擊敗德國為先，加緊太平洋戰爭，亦顯然也許多好處。譬如說，切斷日本的橡皮來源，不但是太平洋戰爭的重大勝利，並且也可困之減少我們的人造橡皮工廠，而增加其他軍火生產。自英美決定對日作戰計劃以來，歐亞兩戰場都有

Academia Historica

新因素的發生，擊潰德日那個容易，亦已有所改變，所以原定的計劃應該加以修正。再者，我們應該充分利用日本不平衡發展的弱點，使日本不能從容準備對付將來的盟方攻勢。

數月來的事實的發展，證明原定計劃確已修正了，至少在兵力方面已予以調整。一年前，麥氏反對「躍島進攻」，而主張「重力打擊」。現他在正照着他的主張做去。從夏威夷向西進攻的海軍活動，受基地的距離的限制，因爲艦隊有一定的作戰範圍，並且須保持充分燃料，俾能返回基地。麥氏的進攻，則受飛機場的限制，同時受戰鬥機保護轟炸機的距離的限制。其距離通常爲四百英里。所以如果沒有特殊的情形，麥氏向菲律賓的前進，每次跨步大多相近於這個距離。（新的戰鬥機現在已達到麥氏那裏，其飛行半徑可達五百英里，同時又發現如果在舊戰鬥機的腹部加設油箱，也可以增長其飛行半徑。譯者附註）

麥克阿瑟與中太平洋海軍總司令尼米茲的關係，很值得我們注意。過去事實證明，欲保證菲律賓，須靠海上的增援及供應，而以菲爲基地的海軍，即使不能阻止敵人進犯，亦須襲擊進犯者的交通綫。菲律賓之失守，由於空軍力量之薄弱，由於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條約，使日本有足夠的力量以從事於侵略，並且當時美國海軍大部分調在大西洋，担任護航由美去英的船隻的工作，加上珍珠港又被敵人偷襲，所以即使美國海軍還有另一部分在太平洋中，亦成爲極弱無力了。這已經是一件無容隱蔽的秘密，當時麥氏與西太平洋艦隊司令哈特間的意見，時常不能一致。後來，麥氏調到澳洲，哈氏調回華府。但麥氏和海軍間的糾爭，仍舊十分尖銳。一方面由於海軍離開本國較近，另一方面由於海軍更投合於總統的思想，因爲我們須知道羅斯福總統以前曾經做過海軍部次長。自一九四二年海軍將領間的不和，似乎逐漸消失散。（當時爲了要將瓜達康納爾島包括在海軍管轄的戰區之內，曾把南太平洋戰區的東面防綫向西推進了六千英里，這意思是說，在瓜島戰役之後，海氏的全部作戰區域，都被包括在麥氏戰區之內了，事而這位老海軍家很漂亮的把這件事數衍過去了。譯者附註）自尼米茲和麥氏見面後，麥氏和海軍的關係更接近，在以前尼麥兩人從未見過面。

麥氏於一九四二年抵達澳洲，美國人民歡呼若狂，稱他爲民族英雄，在政治上也起了相當變化。澳國人民對他的歡迎，情感上的成份則比較少一些，因爲當時恐懼的空氣籠罩着全澳，日本人有隨時進犯的可能。澳國人民以爲他們得到了麥氏，美國必將調來一支大軍援助麥氏，可是不但澳國人民就是麥氏自己，也感到失望了。此外還有二件事，可以顯出麥氏兩年來維持其英雄名譽的不容易。第一，澳國是由勞工統治的國家，他們所最關心的政務當然是勞工的福利，我們試想假使蒙巴頓在英國而欲解決英國鋼鐵業的罷工，請問美國人民將作何種感想？第二，澳國人民素來是安逸且在的人民，即使在緊張的戰時，也並沒有改變他們的賽馬和休假日的習慣。例如，碼頭工人爲了週末的休息，往往停止起運槍彈。一個作爲外賓的軍人，而欲想改正這種現象，無疑的是需要相當的才幹。

麥氏和澳總理寇丁氏間的關係，超過一般政治家和軍人間所應有的。寇氏是左派，和羅斯福比較起來，羅氏似乎是一個反動派了。寇氏稱麥氏爲澳國的救星，麥氏亦稱讚澳軍的戰鬥力，總之，兩人的關係維持得很好。

麥氏的演說，富於修辭，美國聽衆認爲近於[illegible]

Academia Historica

意。他的演說天才，大部由於他讀書的廣博而來，他在馬尼剌的藏書達八千本之多，他的太太每逢聖誕節又送他一本書，往往是名將的傳記。他很注意公報的文字，所講究的倒不是戲劇化的詞句，因爲這是他拿手本領，而是軍事上的準確性。有人認爲他的公報，帶些誇張。

至於他在軍事上的能力，則從來沒有人疑問過。（有人認爲麥氏富於英雄色彩，善於自我表演，這與尼米茲的謙遜，完全相反，所以麥氏是指揮將軍的將軍，尼氏是製造將軍的將軍，換言之，在麥氏的戰區內，一切給麥氏過了，在尼氏的底下，則時有新人物的突起。譯者附註）他在軍事上惟一嚴重的過失，就是在戰爭剛發生時，十七架空中堡壘沒有起飛而被敵人炸毀了，但這不能完全歸咎於他。巴丹之役，雖然他打的是敗仗，但好像打勝仗一樣。他熟悉敵情和戰區地形，譬如說，他不取逐島或跳躍式的進攻，而取越過戰略，則不但由於他從前深刻研究地形，而亦由於他善於利用日本人的好勝和自殺的心理。麥氏有先見之明，深知道日本人不能想像打敗的可能，所以沒有準備對付此種進攻方式的方法。

（越過是麥克阿瑟整個戰略戰術的關鍵。他所以採取這種戰法，沒有他的理由。他既決定不在澳洲迎戰，而欲在新幾內亞進攻，但新幾內亞的海岸線，不但崎嶇，並且有一連串的堅強據點，日本都派有重兵駐守。假使採取逐島和逐點進攻的辦法，恐怕要打一二年，並且麥氏在當時也並沒有從事這種短距離沿岸逐點攻擊的本錢，所以他終於採用了不直接碰日本堅強據點，繞陣地的「越過」的戰法。他們戰法，好像足球上在一個球員跑到敵人的大門口，由另外一個球員將球從遠方踢給他，然後拚命趕過去，來一個最後的一擊。譯者附註）

從戰術上講，西南太平洋的戰爭，一如北非之役，其關鍵在奪取飛機降落場。關於這點，須歸功於肯尼將軍，因爲他使美國第五航空隊成爲一支使日本人胆寒的力量，並飛機數量遠不及其他戰場。（在中國的陳納德當然例外。譯者附註）

麥氏任西點大學總監時，有一天他的副官看見他脫掉鞋子把雙脚擱在桌子上，同時在撫摩他的脚趾，他轉頭對副官說：「請告訴我，你脚上的鞋子是誰做的，好像很配脚，但我從未遇到一雙很舒適的」。這是一件小事，但我們如欲深知他，就顯得很重要了。他時時保持簡潔。他不像羅斯福，他喜歡把他的桌面收拾得清清楚楚，並且盡其可能不多見人。除非作戰，他很少出門，經年在辦公桌上辦公。他今年雖已六十四歲，但甚康健，其原因由於他養成步行的習慣。他步行時，每站首大步，把手在背後拉緊。名記者克拉伯曾比之爲鐵龍中的獅子的徘徊。在辦公室中，這種動作，尤爲顯然，因爲地方有限，必須時常轉。

有大成就的將領，每對政治人物產生興趣。華盛頓氏由戰場上的成名，而進學為總統，在美國歷史上是一個將領升爲總統的先例，在麥克阿瑟氏的榜樣。但麥克阿瑟所學的不是華氏的樣，而是希門[illegible]的樣，因他不願做總統，[illegible]表示[illegible]果他從學[illegible]總統候選人，他[illegible]不接受，如果真的被選爲總統，他[illegible]不做。（其[illegible]推舉他[illegible]統，有一個最大的理由，就是時總統的任[illegible]，[illegible]要[illegible]做總司令，而麥氏是最合適的人。譯者附註）

麥氏選舉[illegible]不干涉政治的原理，而專心一志於[illegible]的工要任務。我們可以斷定，麥氏必有一天達到他的志向，就是回到華盛頓，而他的名望亦將大過於今日。（摘譯自生活雜誌五月號，原著者波[illegible]氏）

Academia Historica

凡爾賽和會的悲劇

一九一九年和會中一位老將分析當年和會的錯誤並給與下次和會一種教訓——

摘譯自生命雜誌 威廉爾特原著

靜觀譯

凡爾賽和會在上次大戰結束時立下了一種不安定的休戰局面——不得謂爲和平——我們能否從上次主持和會人們的錯誤得到教訓，來幫助這次大戰結束時建立一個持久的和平呢？

巴黎和會似乎是產生持久和平的機會，那時世界形勢特別有利。德，奧，匈以及俄國都是戰敗而失勢的國家。意大利和日本是二等國。握世界大權的是美英法。他們都是民主國。他們的領袖威爾遜，喬治，和克利蒙梭的權力似乎足以改造世界模型變成一個思想健全人們所渴望的公正自由和平的世界。

他們爲什麼失敗了呢？

克利蒙梭是一位偉大好鬥的人，以他無提的精神把法國從黑暗帶到勝利。聰明，率直，愛憎分明的他中心充滿了抵抗德國侵略以保衛法國安全的熱望。他知道法國之不敗是一種神蹟，他也知道美俄，意，美及其他小國的聯合力量實在是法國致勝的不可少因素。他懷疑着法國能再召集一個這樣的列強同盟。有一件可怕的事實常呈現於他心目之中，便是勝利的代價法國死傷的人數達六，一六一，〇〇〇人，英帝國三，一九〇，〇〇〇人，而美國僅喪人民三五〇，〇〇〇人。此後法國至少要在卅年之內，缺乏兵士與領袖的人才。

他不相信各國所計劃的國際聯盟可以改變人心。他懷疑這種組織的價值，直到智同上校 Colonel House ——威爾遜的密友——對他談起國聯有使美國在種族侵法時候即刻援助法國的可能。從是之後克利蒙梭勢於國聯的離離變成比威爾遜和喬治更強有力。他前後力爭建立一種永久的國際保安隊以維持和平。

喬治首相精明愉快善於利用對手人的感覺心理和弱點，是一位口齒伶俐的律師服務他的國主——英國。英國四百年一貫的政策，決定了他所忠由的途徑。這種政策，所謂勢力均衡；有他基本的信念認爲如果有一國家統治了歐洲，英國就有被侵略而不能抵禦的危險。因此在戰勝後英國決不願她的主要同盟國太強或者被侵略的敵人太弱——因爲說不定下一次她要聯合敵人來對付現在的盟友。

喬治還有一種陰險的政策，就是要在世界各地擴張英帝國的領土。德國的非洲殖民地，太平洋上德領羣島，土耳其屬地（敍利亞，利巴嫩，巴勒司坦，約旦，伊拉克，和亞剌伯）都是大量可能的戰利品。

國際聯盟給與喬治促進這兩種政策的機會。割取土地是要觸犯世人的輿論的，但如果接受國聯所委託的委治領土，就差不多同樣的可以獲得治理權。進一步國聯還可以成爲動員弱小國家以抵抗歐洲強權的有用機關。並且，且戰爭發生，英國還可以因國聯關係立刻得到美國的援助，爲此之故英國接受國聯；但他們並不想要一個像法國所要的強有力的武裝國聯。他們也不願允諾在國聯中有一個會員受侵略的威脅時，有參加戰爭的義務。他們却願意容忍小規模的侵略——就如滿洲和亞比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尼亞的事件，——只要這些事件不切身影響到英國的安全，也不產生獨霸歐陸的強權。

保衛法國安全是克利蒙梭的熱望，維持勢力均衡，擴充英國領土是喬治的責任。建設世界永久和平是威爾遜的夢想。

在厭惡戰爭與死亡的今日，請大家不要輕視威爾遜的幻想。在世界人類所以遭遇痛苦，並非由於威氏目的錯誤，實在由於他不知道如何達到他的目的。

威爾遜和其他一般人一樣有他的短處。他善於造出動人的字句。但是他對於文字有一種信仰使他有時認為一字即是一事一言即是一行。他忽略了實現他的目的的方法。他幻想各政治家都會受他理想的感動，而沉醉於犧牲精神來實現公正和永久的和平。

英國參戰不久，美國外交部長巴爾福先生Mr. Balfour來美訪問時是威爾遜第一次的機會可以要求廢止密約。這個機會的重要或不可以言詞形容，因為那時巴爾福迫不得已告訴威爾遜說聯盟國危險萬狀，他們的生命全懸於美國的人力，金錢軍火和糧食的接濟。

威爾遜不會利用他的機會。他決定不要求廢除密約。甚至不去過問。

其中有一個英日密約，根據此約英帝國佔領德屬太平洋赤道以南各島，日本佔領德屬太平洋赤道以北各島為條件——現在美國正犧牲無數海陸空軍的生命，以攻取這些地方。

其後十七個月中還有許多機會發生。在一九一八年十年德國軍隊崩潰以前，聯盟國總是依賴美國。在此長時期中威爾遜隨時都可以運用他的權威強迫聯盟國按照他的理想議定和平。他在他十四點演辭和其他無數演說裏，敍述美國參戰的目的。

而在德國崩潰以前，始終沒有想出約束聯盟國的方法。

同樣，他對於參議院中和平條約的通過忽略了事前的準備以取得保證。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他要求選舉一個民主黨的國會，但是選舉的結果下議院和參議院都是共和黨佔多數。一大羣的共和黨員中有前任總統塔虎脫 Taft，前任外交部長伊力忽特 Elihu Root，都願意有一個國聯來維持和平。他們向威爾遜提議，如果他答應在和平會議裏有兩位強有力的共和黨代表，他們一定盡力在參議院中爭得和約的正式批准。威爾遜漠視了他們的建議。

秘密條約錯過於前，不妥協的共和黨員爭得大多數於後，威爾遜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四日登喬治華盛頓號輪船到歐陸去。他極端相信他的能力足以給與世界他所允許的福利。巴黎個數意大利都與高采烈的歡迎他的來臨——到處民族運動的影響前面點起燈燭——證實了他自己言論和使命是有力量的信念。

的確往古來今如果有人可稱為人類精神的領袖，那麼他便是這種的領袖。他相信歐洲各民族都要羣起跟從他，甚至不惜違抗他們自己的政府。

和會中沒有大家同意的計劃。克利蒙梭提議先草定和約的內容然後再討論國聯的盟約。威爾遜堅持先建立國聯，然後再討論和平條件。他的理論是安全之後才有和平這樣他才能夠順利的慫恿集在巴黎的政治家使他們保持着基督教的真精神。

威爾遜達到的目的。克利蒙梭和喬治都沒有彩自參加國聯盟約起草委員會，只有威爾遜參加了。他興奮的從事，並且成績很好。他沒有餘暇顧到和會中關於軍事經濟以及領土的問題。但是次年一月廿四日在十人小組會議中提出了委託領土的問題。英國提出一個議案「無論在何條件之下不得把德國的殖民

Academia Historica

地歸還德國」。這是非常緊要的時候，因爲這問題不但關係各民族的命運，並且關係德國是否可以得到眞正和好的和平如威爾遜所希望的。

他所常表示反對割取土地；在他十四點中的第五點便包括了這個意思，而且英國和其他聯盟國也曾承認這一點是和平的基本。但是威爾遜贊成了喬治所提德國應喪失所有殖民地的要求。他曾被說服德國不應有殖民地。這是他所行的第一步使任何德人不能承認凡爾賽和約是十四點的公正表現，或是一種和好的和平。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四日威爾遜返美之前在和平會議全會中宣讀國聯盟約。他十分疲憊但也十分愉快，他說「人們當初互相猜疑現在可以像朋友侶伴一樣相處於一家之內。不信任和陰謀的癌氣從此消滅，他這樣說——他這樣相信。

在離歐之前，威爾遜委託賀司上校與聯盟各領袖協同擬定和約中關於軍事領土賠償以及經濟各條款。賀司滿懷熱望去開始他的工作，但當各聯盟國的要求提到他的面前時候，他失望的寫信告訴威爾遜說：現在很明顯的和平並不能像我們所希望的，也顯然不是這一次可怕的戰爭所應有的結果」。

三月十四日威爾遜重返法國充滿了奮鬥的精神。賀司告訴他國聯的成立，並沒有，降低各盟國的要求，並勸他即刻承認各國的要求。如果接受賀司的勸告，就等於放棄他自己所信仰的使命，因此他拒絕了他的勸告。

他到巴黎那天的下午，便與克利蒙梭喬治相見，他決定不退讓。但之前，他先給他們一個大讓步。「在他滿腔熱情的宣言約保證若果德國進攻法國之日，美國將立予援助

時可以打消法國對於軍隊必須永久佔據萊因河西岸才有安全的爭點。

出席巴黎和會的美國代表幾乎全部認爲參議院決不肯批准這種的盟約，並且都相信克利蒙梭是受了騙，因爲這種允諾決不會發生效力的。而克利蒙梭却接受了這空洞的保證。

三月廿七日克利蒙梭要求佔領萊因蘭Rhineland卅年和割據陸爾區域 Saar。翌日威爾遜發怒之下，回答說法國人沒有提出領土問題與任何國家戰爭的目的都不相干，直到休戰以後也沒有人聽到他們有割取陸爾的意思。

克利蒙梭忿然說：「你在那裏設法毀滅法國」。

威爾遜答應說「並無此事，你自己明白」！

克利蒙梭回答說：除了法國取得陸爾他於和約決不簽字。

威爾遜反問說：「那麼就是說法國如果不遂所欲，就要拒絕同我們一致行動。你願意我就這樣回返美國是不是」？

「我並不願意你回去，可是我自己預備這樣」克利蒙梭說着慢然離開座子。

威爾遜遭此重創弄得進退兩難。他覺得他若簽了沒有「公平與正義」的和約就不啻自己種了第二次大戰的種子並且陷全世界人於失望。但是他也知道如他解散和會一定會讓成歐美兩洲劇烈的政治衝突的危險，而他又不免於孤立寡助。失望之餘，他冀望將德國完敗前他所有可以劫持各盟國的權力善爲運用，但如早能運用自然有效，到現在可是太晚了。

四月三日他的精神和身體都失了健康。「他寫劇烈的咳嗽所困，妨害呼吸，熱度高至一〇三度，病情顯得非常嚴重。

但和會工作仍須繼續進行；兩日之後喬治，克利蒙梭，意大利的奧爾杜 Premier Orlando 及賀司上校在威爾遜書房聚

Academia Historica

會，賀之間必堅執夢想喬能付的價格。

報告會議進展的情形。

論，威爾遜已經吩咐美國專家不款的數量列入條款之內。但他還在持德國賠款總數必以德國在卅年內所負的報告喬治反對，所有對於年限和賠

這使威爾遜驚惶不寧。

至卅威爾遜下令殺止今後美國對英法通融的款項，他食料各盟國還在需款，經濟制裁還是非常有力量的武器。同時命令喬治華盛頓號輪回到巴黎同特，若果他得不到為世界所追求的那種和平時，便可離歐返美。

當克利蒙梭對格雷遜海軍上將 Admiral Grayson 威爾遜的醫師以及他的親信朋友說：「威爾遜是在吹牛而已罷」？格雷遜上將十分戀戀的回答說：「他身體裏面還一個吹牛的血球都沒有」。

但是即使威爾遜心裏還有鬥的精神，這種精神也被兩個電報掃除得無影無踪。第一個電報是他自管祕書約瑟夫特莫特 Joseph P. nmnlly 發來的他說：「國人認為喬治華盛頓號輪之調返法國是一種不忍耐與忿怒的行為。在這時候引起質與遜遜無異。第二道電報是從財政部部長發來的說美英間經濟協定業已包括英國需要到七月一日止，至於與法國的協定已是接洽法國未來全部需要。因此威爾遜滿以為可以運用的經濟武器竟在他不注意中無形消逝，他對於賠款的問題接受讓步的辦法。

從此之後威爾遜所有美國代表於四巨頭和議之外。喬治和克利蒙梭各有顧問，威爾遜一個顧問都沒有。他單身承當把十四點變成凡爾賽和約。

威爾遜在良心上自慰說：國聯總有一天健全起來可以補償和約中一切不公正的條款。他屢次對他的朋友說「如果我非確信國聯能夠修改此項條文我決不會如此辦理」。

五月七日凡爾賽和約條款交與德國代表，德國所損失的包括下列各項：

亞爾色斯及勞倫兩省 Alsace and Lorraine 割與法國。

薩爾暫由國際委員會管理十五年後由人民投票決定所屬。

薩爾煤鑛則讓與法國。

北斯蘭西威克 Northern Schleswig 讓與丹麥

綱力司亞上游 Upper Silesia 之南半部波遜及伯羅毋伯格區域 Poson of Bromberg 之大部橫斷東普魯士與德土之中的通海迴廊劃與波蘭

但汶城 Danzig 由國聯管理

割棄所有殖民地。

德國所有超過一六〇〇噸的商船和在一〇〇〇至一六〇〇噸之間的半數都歸與英國，這是根據同盟國在戰時所損失的噸數相抵銷。

賠款的數目由委員會任意決定，或照其所能取自德國者而定。

德國軍隊減至十萬人，槍砲軍火按比例限制，其餘全部毀滅。所有砲台全部破壞。德國萊因河沿岸之地絕對解除武裝。

德國海軍投降之不只限小戰艦六，輕巡洋艦六，驅逐艦十二，魚雷艇十二。

消滅所有海陸軍之航空隊和空軍器材，陸軍之航空隊絕對禁止。

凡爾賽和約所引起的累積印象是一種仇視的憤怒，但事實上持未盡其殘酷之能事，德國仍保存其工業不曾粉碎。地雖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喪失權力但並不是永世不能翻身。

另一方面說此種和平顯非和好的和平，和好的和平能予新興的民主德意志以生存的機會，並且還可以澈底剷除普魯士軍國主義。但斷定的和約中包含着可以爲專家如希特勒者所藉口以引起仇恨之點甚多。

最殘酷的無過於關於賠款各點，全德意志民族似乎要替同盟國勞役到無限止的時日——事實上此種規定無法應用，徒使德國發生經濟混亂情形而不得不加以修改——結果德國所付還的只是美國私人借給她的貸款。

俄國爲內亂所分裂，巴黎和會中沒有她的代表。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四日蘇維埃政府向同盟國及聯合政府建議召集一個會議，根據以下的原則來討論和平，所有事實上在從前帝俄與芬蘭領土之內已經成立的政府，應該維持他們在所佔據領土的統治權。當時蘇聯政府所統治的地方不過現時蘇維埃的一小部份而已。列寧建議的意思，是自願暫時的放棄全部西伯利亞，烏剌山，高加索山，芬蘭，波羅的海的各國國家和大部份之烏克蘭。更進一步列寧答應承認帝俄的債務。

威爾遜此時憂傷過度，已不能再爲此項建議煩心。結果三於十分嚴重。威爾遜這一種不願以他自稱爲「聖軌的頭腦」來考慮蘇俄所提出的問題，可以說是他在巴黎所下的最重要的決定。

日本從凡爾賽和約得到統治中國的山東省。威遜遲爲了這一條款良心上受了重大的打擊，曾經一夜思索不能成眠。他知道世人將咒罵他違犯了他自己的主義。中國政府在巴黎拒絕簽字，使美國參議院中他的反對黨得着最充分的理由拒絕批准和約。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凡爾賽和約簽字，威爾遜對和約加以下的評語：「這和約把從前不可忍的秩序一掃精光。我們有理由感到深刻的滿意，普遍的保證，和可靠的希望。」他過股了罪過的認識，因他堅強的相信國聯將成爲人類的國家，能夠改正和約的缺點。

當時參議院中的共和黨大多數反對國聯盟約中規定，堅持應加入保留條款。威爾遜反對這種辦法。結果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凡爾賽和約附帶保留條款，在參議行中提付表決批准的時候，威爾遜請民主黨參議員提反對票——批准案以三十九票贊成對五十五票反對而失敗。

美國始終沒有批准和約，當初克利蒙梭想藉美法同盟得武裝佔領萊因河西岸的要件實沒有達到實現。

克利蒙梭不曾爲法國獲得安全。威爾遜沒有堅持久的和平。新治達到表面上完滿的成功，因他維持了歐洲勢力均衡的局面，同時爲英帝國獲得一些戰利品。事實上他又何嘗不失敗呢？英國最注意的是求和平，而勝利廿年之後眼見英國再陷入戰爭漩渦，瀕於危亡。

凡爾賽悲劇中一個勝利者都沒有，全人類整個慘敗了！

由善意而終演成悲劇所引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可得下列幾個結論

一，每次大戰結束的時候，世界常現一種流動狀態，在這期間勝利的刻強可以隨意改造世界，使牠或比較好或更壞的模型。這樣可以把握機會的時間除忽即逝，而和平方案全在這期的和平，不然立刻又要充滿戰爭的動力。

二，要想在政治經濟軍事以及道德各方面達到好的和約必

Academia Historica

須遠在敵人崩潰之前，就作準備，我們須要在盟國還在依靠我們以保存他們生命的時候，把國際協定加在他們身上，才能避免缺乏知慧的和約。我們必須在我們有權威的時候善為利用。可惜威爾遜沒有這樣做。

三，建設和平的機關比組織戰事的機關問題更為困難。我們應洞悉何者為我們所需要，如何可以達到這需要，和在時機未錯過前即時進行，為和平機關問題應有一參謀部，同大總統朝夕不離的共同探討，與戰事需要參謀部初無二致。

四，按我們的憲法凡與條約事宜總統和國會的權限均等，所以大家也需要一種思想意向和決心方面的合作，才不至總統所要商議的條約都為國會所反對。

五，美國既成一個國家，就不能離地球。如果歐亞之間因和議中之不智規定而引起下一次大戰，我們將不能避免應得的果報，而且只有捲入戰渦。

六，歐洲，世界上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得天獨厚居民所會集之地，其和平實在是世界和平的中心問題。這問題可謂關鍵之至。我們曾幾次冀可放棄兩種希望，一是德國無望可容納于國際公法支配下之優美社會中，一是歐洲無望可以組織成和平的民主政府聯邦。

憂戀之際，我們真想對於這些問題洗手，所恨我們無法洗手，波提阿西拔愛勒提 Pontius Pilote 洗了手，至今世人還說有餘怨他。

× × × ×

威廉布勒特于一九一七年受命任外交部助理員，當時他畢業耶魯大學已五年，在費勒得亞省新聞機關任訪員及國外通訊員，一九一九年隨賀司參加和會任時事情報處處長，觀察四面頭進行和議，注意他們的糾紛，調解，都錯過的機會。和會期間他曾以特別使命作了赴蘇聯的領袖，一九三三至三六之間他充了美國第一任蘇聯大使，一九三六以後他任了法國大使，直至納粹進攻法土為止。

永遇樂　燕生

試尋定慶寺大佛龍猛何年，凌雲飛上，翠巖探處。近倚層巒，遙連雪嶺，二水同回護。成壓兩蔡，平臨八國，人說尊顏度。想當年穿鑿事了，幾回俯仰今古。千秋事往，英雄不見，賸有斜陽古樹。倦客登臨，故園回首，淚灑青衣雨。苦侵輪頂，湖容趺座，佛也悠悠無語。憑誰問，要岡巨靈，尚如故否？

Academia Historica

選輯答謝幼偉教授

章行嚴

（謝教授原文見思想與時代二十六期，選義浙江大學出版）

拙著選輯指要出版後，頗辱海內名家，商討得失，就中浙江大學教授謝幼偉評論一首，尤意勤而旨遠，媿荷媿荷。愚十餘年來，絕意辯論文字，因闕然久未報。偶觸舊緒，因藉民意雜誌餘紙，約略敷陳，惟教授有以進之。

此書止於啓示學者塗徑，敍述多而斷制少，凡名理浮於辯士舌端，迄無定論者，亦不輕爲左右袒。君見責演繹歸納二術，書中解說不詳，誠然。惟選輯有兩大趨勢，相沿競爽，即百年前科學乍明，新邏輯驟爾制勝，近二三十年來數理大張，舊邏輯又見中興是也。所謂舊邏輯者，即演繹邏輯也。穆勒爲當時論宗，即極端鄙視思想律，幾幾不認演繹得名推論。至最近而反之。君所稱歸納不爲推論，乃出於數家經案之口，無怪其然。本書於此等處，未及指示明白，洵屬闕憾，今請得因君言，補綴一段於下。

歸納之得名推論與否，君述錢眉敎授調和之見，甚善甚善。惟鄙意可得以因明五支折衷之，蓋因明論法，較司洛輯沁多兩支，而此兩支，固非虛設。於質論之，五支者乃驅遣題逐陰達兩種三段而合於一，以喻爲之樞紐，無他法也。如左例：

一、彼山有火……宗

二、有烟故……因

三、凡有烟處必有火——如灶等……喻

四、今彼山有烟……合

五、故彼山有火……結

試將喻分作兩截，上截，凡有烟處必有火，比於題達之大前提。右行而及於因，爲小前提，而及於宗爲斷案，題達之三段論式以成。下截如灶如竈如爐如燈如淡巴菰等，比於陰達之大前提，左行而及於合，爲小前提，而及於結爲斷案，陰達之三段論式以立。誠如是也，歸納與推論之運讀如何，應不煩贅言而解。

拙著釋同一律曰，同一非他，亦凡持一論，乙丙丁戊終爲乙丙丁戊，無所往而不與甲相同已耳。此有凡持一論一語疑之，謂祇在論方爲如是，假無謀會爲事物本身始終不變理。君言事物本身，何能同一，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濯足清流，投足再入，不爲前水云云。如提住學童，使誦高頭講章，讀之媿汗。雖然何原本釋學說一條，對凡書中用字，在別有說明以前，絕對守定一義，毫無出入，此正是鄙意所在。吾所謂始終，亦限於別無說明時耳，辭能得意。又兩引論衡，疏釋未當，可見行文應須慎重。要之思想律一章，通篇綱領殊非，已蒙亦絕不滿，經君指點，容改板時別起草，厚謝厚謝。

中西文化之不同，與思想之邪正略負有連，並在本書附贅餘流，本不應有。文人辯智，往往與之所至，下筆不能自休，而又無法繁縮，掛一漏萬，致賢者疑焉，而原其意，謬稱不解，有罪有罪。鄙意，今爲農時，國論率基負面，取叶於農，以政治言，太平景象，以除暴安良一語盡之，沒黯一隅三月，濟陽大治，孔子爲政，朞月已可，久至百年，效亦無過勝殘去

Academia Historica

殺。以道德言，禮義廉恥，號稱四維，違對刑言之，求不犯刑，始教人爲禮，義有所不爲，廉有所不取，恥求所不辱，他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諸聖門口語，用意無一非負。數千年來，國務苟安，人者無過，社會之沈淪不進，職是之由。然吾國究有文化可言，功亦在是，良不可淺，此則東坡蘇氏最善道之，其言曰：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稱文景，言賢者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

語見上皇帝書，此理悉信之基德，平時多所論述，惜非區區短章可盡，至黑格爾認否定爲思想完成之歷程，始於負而終於正，此範疇不同，非更端無從著議，望賢者更有以教我。

文中猶有小小疑義，足資探索，即不贅續。惟本書重要疏漏，斷對本師，又詞條不遂，無以通其滯澀，致見好者猶且艱於卒讀，多負多負。至如君逐章詳繹，懃懃誘掖，有所未慊，坦懷告語，可謂曠世未見其儔。愚也才謝子雲，敢以桓譚相擬，然文章知己，定有因緣。耄學之人，因此來無大過，拜賜之餘，伏冀爲道自重。

萬竹樓隨筆（二八）

舜生

民國二十四年春，余與幼椿由滬赴宿，歸途經鎮江，暢遊金焦二山，江山之勝，風物之美，至今猶存夢寐。與未盡，復渡江遊揚州，泛舟瘦西湖，品茗於平山堂，讀石刻歐陽公遺句，時則春風融融，士女歡笑，日光透翠竹映几席間，恍如身在六朝也。日將夕，乃呼船孃拏舟，訪所謂二十四橋者，則僅土橋一座，在平山堂另一端，雖陋不損其美，信乎詩人足爲山川生色也。翌日，漫遊全市，至一繁盛之通衢，見手工藝精品無算，售化妝品商店尤多，時時有脂粉氣撲人鼻宮甚濃，令人想像太平天國以前之盛。午膳於某餐室，室中陳杜鵑數盆，堂倌燃紙媒以水煙進，洒不必甚醇，要不必甚可口，其風味固自不同也。午後，驅車至梅花嶺，謁史公祠，低迴於所謂衣冠塚者之側，讀壁間史公臨死前致其夫人之遺書，並瞻仰其遺像，令人感奮興起，未嘗不太息痛恨於馬士英阮大鋮一輩權奸閹黨也。此行幼椿無詩，余得兩絕句，作經句作余猶爲第一遭，淺陋不足道，錄之以誌一時鴻爪。詩曰：「夾岸垂楊拂水低，蕪城四月草萋萋，輕篙一剎征君去，波影花光夢欲迷。」其二，「漫言春去太匆匆，載酒酬春與未窮，春盡江南又江北，我來猶及杜鵑紅。」

Academia Historica

嘉州呈馬一浮先生

燕生

一卷清吟鎮此州，半驅風物入冥搜，關心家國同憂動，暫憩林泉寫百憂。已向青衣傳勝業，可憑赤手挽神洲，宗風聖學雙龍會，直覺心源最上頭！

端午前夕偕朱孟實先生及印度學生沈蘇美君散步樂山郊坰即事

燕生

漫成

溪語酒風送萬幽，一城初盛水中浮，高高弦月依人上，浩浩吟魂到耳秋。遠客漸聞蒲醬賣，故人何事肝愁，明朝角黍知同食，一曲清歌佐渡舟。（沈君許明日為朗誦太戈爾詩）

賀新涼竹根灘晚景

燕生

夏雨晴清夜，漸向晚，涼風收謝，素蟾圓。檢取浮生閒半日，來看魚鳥游冶。正水繞山容如畫，應似宋江濃醉夢，問幾年長其船拖。容冉冉，暗銷也。　夜闌旅舍垂燈下，有誰人胡琴幽怨，素枝低亞。頃刻驚雷催震電，掃盡蚊雷世界，又臥聽風吹瓦。一日天心已數變，況百年人事營營者。隨意景，惜長夏。

本刊因篇幅加多，紙價大漲，不得已將定價酌改，零售每本二十五元，定閱如下表，請讀者鑒諸。

預定			
時間	期數	收費	零售每冊二十五元
全年	一四冊	五千四十元	
半年	十二冊	二百七十元	
三個月	六冊	一百三十五元	

不通匯兌之處，一元的郵票可以代現。不收寄費，加快或掛號照加。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國通商銀行

我國首創第一家銀行

服務社會達四十九年

總分支行處

重慶 自流井 成都 鷄西 安 寶鷄 威遠 成 自貢 西安 天水 蘭州 平涼 酒泉 蘭州 柳州 桂林 梧州 衡陽 吉安 贛縣 韶關 梅縣 台山

衡陽 桂林 柳州 梧州 龍泉 成都 天水 寶鷄 西安 蘭州

行分處重

號五十場市統模一第處重：址地

八〇八一四 七〇七一四：話電

郵政儲金匯業局

——是服務大衆的銀行——

分局

重慶 貴陽 昆明 桂林 柳州 衡陽 吉安 贛縣 韶關 梅縣 台山

長沙 湘潭 永安 福州 梧州 龍泉 成都 天水 寶鷄 西安 蘭州

經辦

儲金 匯兌 壽險

業務

全國二千餘所郵局代辦本局各種業務

大同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銀行部

重慶大同街昆明路國賓巷桂東巷

蘭州中正路照壁中山東路金城銀行新疆路

西安東大街東關路天水南關馬場路

儲蓄部

重慶中一路

電報掛號除記（2588）外餘均（7041）

中元造紙廠

自製化學木漿

精造上等紙張

（製造廠）四川宜賓中元新村

電報掛號 郵政信箱 一二三四

（重慶辦事處）中正路一四〇號

電話掛號 六一一五五二

電話號碼 四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獨立

第一卷　第十一期

短評三則　舜生

（一）國民大會召開以前（二）突破軍事與政治的難關

（三）法蘭兩個時代

論建國人才　余家菊

國際聯合作戰問題　陳啟天

國共問題公開以後　張君勱

實施民主憲政不患其急進廣泛與澈底　孫寶毅

現代學人的責任　張中府

太平洋區之中心問題　孫寶毅

荷蘭的寶庫東印度　西棲譯

組織國際機構的理由　榮實譯

盟國歐洲遠征英國地面部隊總司令蒙哥馬利將軍　抱貞譯

第二戰場開闢日的敦倫情緒　超然譯

萬竹樓隨筆九則　舜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四川絲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三千萬元

總公司 | 紡織廠 | 製造廠 | 織綢廠 | 冷藏庫 | 主要成品

重慶陝西路九十二號 電話四一七八六
電報掛號一〇八
南充電報掛號 三台電報掛號
閬中四七六七 成都四八一八
北碚 巴縣 南充 鹽亭
三台 閬中 西充 仁和場
涪陵口第一 三廠南充第二廠四廠
三台第五廠閬中第七廠
重慶李子壩 南充平城門
北碚上場
改良蠶種 改良生絲 絲棉 絲筋

正和銀行

△貸展社會經濟
△扶助後方生產
△促進戰後建設
△增益羣衆福利

存款 放款 匯兌 點現 押匯 儲蓄 及其他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存取便當
手續敏捷

特業要目

利息優厚

匯款便捷

總管理處 分行 儲蓄部 信託部 重慶林森路二二四號 電話 二二六一 電報掛號 重慶 電報地址 重慶 行址 重慶太平街明定二六八號 電話 二二六一 電報掛號 重慶 電報地址 昆明

安康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利息優厚 信用穩固
匯兌迅速 手續敏捷

各地辦事處
太和鎮 太和鎮正北街
中壩 中壩北大街
三匯 三匯林森路

總行：重慶林森路四五號
電話：四一四四八
電報掛號：四一四四

金城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及各種儲蓄存款

分支行處所在地

重慶成都自貢瀘涪柱柳梧平西源資貢長衡辰沅蘭
廣山都井明縣林州州涼安中雅陽沙陽常酉酉

重慶分行
地址：陝西路第229號
電話：42362號（經理室）
42363號（營業室）

民權路辦事處
地址：民權路新生路
電話：42011號（營業室）
41269號（經理室）

兩路口辦事處
地址：中三路（兩路口）2號
電話：2072號

沙坪壩辦事處
地址：沙坪壩正街19號
電話：6259號

信託分部
地址：民族路137號
電話：14615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短評三則

國民大會召開以前

本年元旦，蔣主席發表新年文告，表示不必待戰爭結束，可能提早召開國民大會。

本來，根據中山先生的遺教，由訓政時期進入憲政時期，必須經過由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頒布施行，始能舉還政於民之實，而國民革命也才眞算是告厥成功。民國三十四年度一開始，蔣先生即鄭重發表這樣一個「民主諾言」，我想凡屬國民，當無不同聲慶幸，尤其是若干年來曾以空談爲實現民主稍效棉薄的一部分人士，當然更有一種說不出的欣慰。

可是，茲事體大，我們以鄭重的心情來考慮蔣先生這樣一個重大提示，實在覺得有若干原則必須求得大家的相互了解；有若干先決問題必須以敏捷妥善的方法求得解決。

請先談原則：

第一、國民大會的召開，是建國工作的開始，同時也是自革命以來，包括這次八年的抗戰，所有一切爲國家犧牲了生命的志士仁人的一個慘痛紀念，在中華民國史上值得大書特書。因此，我們主張這個會必須開得莊嚴神聖，眞誠切實，萬不可先存一個因陋就簡的念頭。

第二、國民大會所代表的應該是全國民意的總和，由這個會所產生的一切重大決議，務使全國大多數的國民，尤其是一部分確有政治瞭解的國民，覺得稱心滿意，而絕少偏枯之感。

第三、國民黨的中央，原決定在抗戰後一年始行召開國民大會，現在蔣先生以國家元首，全國領袖，最高統帥，國民黨總裁的資格，既已主張提更原議，提早召開，我想蔣先生必已經過深長的考慮，認爲在事實上確有此種必要，並且有遲則或恐不及之感，因此，我們不能不盼望這個會成爲全國團結的象徵。

第四、我們應承認國民大會爲行使最高主權的機關，大會本身的自由，似不應事前加以限制，例如第一次國民大會，其職權是否應以制定憲法爲限，應即由大會決定之。我們覺得，果如蔣先生所提示，在抗戰尚未結束前即行召集國民大會，事實上實在相當艱難，且關係着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如一經召集之後，又不能執行憲法上所付予之職權，而只能制定一部暫時並不實行的憲法，則政治意義必異常稀薄。似不如等到戰後從容召集反而來得妥當。

次請談先決問題：

第一、我們希望國民大會所代表的是全國民意的總和，但民意因環境的變遷，時代的演進不能不變，以今日全國情形與抗戰以前相較，顯然不同，因此斷不能以抗戰前選出的代表來反映這八年以後的民意。我們知道國民黨中央曾有舊選代表一律有效的決議，但同時也有抗戰結束後一年始行召開國民大會的決議，假定後一個決議可以變更而提早，前一個決議當然也可以變更而重選，否則會是開不好的，仍以一律不變爲是。

第二、截至今天爲止，中國所實行的依然是一黨制，儘管在事實上國民黨外還有若干的黨派，但在法律上是沒有地位的

Academia Historica

，行動與組織是不能公開的，宜僅是受限制的。現在既希望提早召開國民大會，則最足以集體表現各種不同的民意的，乃莫如各個不同的黨派。因此各黨各派一律公開，在法律上與國民黨取得同等地位，實為當前即應解決的問題之一，否則將來的國民大會中仍將充滿一黨的空氣，而民主的實現將更遙遙無期，且可能引起若干不必要的紛擾。

第三、依照二十六年立法院修正的國民大會組織法第三條，凡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及後補執監委一律是國民大會的當然代表，這個人數是相當可觀的。假定這一條不能變更的話，則各黨各派即令可以公開參加競選，其地位依然是絕對不平等的。究竟是國民黨放棄這種權利，抑或以同等權利付予其他各黨派，這也是應該首先決定的。

第四、國民黨中常會已決定本年五月五日召開六全代表大會，據云其重要議題即為討論國民大會如何召集。此項決定，在他人或嫌其遲，但我們則覺得多有這幾個月的時間，讓國民黨黨員及全國關心政治的各方人士，依據其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就此一重大問題再作一番愼重的考慮，乃非常有益。我們認為當前有若干即待解決的實際問題，假定國民大會能解決這類問題，則召集自以愈早愈好，否則國民大會召集以前，仍須有一臨時過渡的緊急辦法。只要這個過渡辦法能處理當前的若干重大事件，則大會的召開即再遲若干時日亦不無關係。

凡上所述四個原則及四個先決問題，均就目前所想到者發言。再有所見，當繼續發表。我們認為這個問題過於重要，換言之，假定國民大會開得好，則勝利可以提前，國家可以統一，一切隱憂可以消弭，建國工作也可從此樹立規模，否則前途將不堪設想！所以我們不得已坦率陳辭，希望引起國人對這個問題的注意與討論，並切戒草率從事，以遺無窮的悔恨於將來。

突破軍事與政治的難關

敵人把我們的河南湖南廣西三省大部拿去以後，軍事動作又一時歸於停頓，這是敵人的常態，我們千萬不可以為危機已經過去了。敵人要在中國大陸打開一條交通線，這在敵人的本吐和南洋的海上交通將要斷絕的時候，他們是感到有絕對必要的。現在這個目的既已將次達到，他們乃以全力貫注在這一點，對別方面便不妨暫作緩圖。可是敵人看見我們的陸上國際交通將次復活，他們還是如火中燒；我們大後方仍有若干的基地可能威脅他們在我淪陷區的軍事據點，他們還是甚感不安；因此敵人繼河南、湖南、廣西以後的第二個軍事動作，他們便可能還要企圖發動，這應該值得我們非常警惕。

七年半以來，因為我們的政治與軍事始終不能得到適當的配合，因之就連現有的這點軍事力量也無法充分使用，同時也無法使這點軍事力量普遍的充實健全。由於這種原因所表現的事實，便是當敵人對我某一區域猛加攻擊的時候，我某一區域以外的任何據點，大都作壁上觀，不僅談不上全面的反攻，也談不上多方的牽制。這種現象，好像原因在軍事的本身，而實際乃在軍事以外的政治。此外如過去役政的層層黑暗，交通機構的凌亂腐敗，一切統制專賣的毛病百出，生產的衰落停滯，甚至連一個慰勞機關也可開出幾百萬的貪污巨案，凡此，均與軍事不振有關，而其根本原因，亦莫不由於政治已陷於斷港絕潢，八年以來，實在看不出有什麼進步。

國共談判，這是最近中外所一致關心的，但是從年五月開

Academia Historica

始，一直鬧了半年，始而是雙方代表直接談判，繼而是向國民參政會公開報告，最後更由友邦有力人士出而加以撮合，可是經過了六個月以上的工夫，依然是一張白紙，沒有留下半點痕跡。我們應該明白認識：這個問題如不能得着圓滿的解決，不獨影響戰爭，稽延勝利，戰後且將爲統一之障，建設之梗，甚至引起國際的新糾紛也不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應從解決黨派問題入手，只要政府實行民主，放棄一黨體系，承認一切黨派的合法公開，則政治問題軍事問題不難迎刃而解。否則國民黨外的各黨派一一發生生存問題，當然不能不各求自存自衛之道，如此而言政令統一，軍令統一，豈不等於緣木求魚？

凡上所陳，其一在說明軍事的危機并未解除，其次在說明政治的困難已更加深刻，全國一致的軍事行動，必須有全國一致的政府與之配合始有可能，這個趨勢很顯然，理由也很明白，不把握這個現實而速求解決，則不僅全面反攻一時甚少希望，甚至過去半年所演於河南湖南廣西貴州的一切慘象，且難保不重演於其他各地。我們以十二分的誠意，希望朝野提高警覺，爭取時間，挽救當前的危局。

注意兩個時機

美軍在太平洋的積極發展，可能於今年春季即將菲島問題得一澈底的解決，等到將要律賓的收復完全做到以後，其第二個步驟可能就是在中國沿海的登陸，這是一個時機。

歐洲問題因爲最近小有頓挫，希特勒的打倒，也許要延緩到今年的秋冬之交。目前蘇聯對於遠東，雖仍保持其一貫的緘默態度，但等到美軍一經在中國登陸以後，則無論歐洲問題是否全部解決，蘇聯的態度必然趨於積極，這是第二個時機。

美國登陸與蘇聯積極，本來都是中國所切盼的，可是在這兩個時機到來以前，必須中國自身能做到眞正的團結統一，並且在軍事、政治、外交、財政、生產、動員等方面，能樹立一個完整的體系，始爲有益。否則不僅中國在國際所處的地位，或將增加困難，即國內問題，亦將更感棘手。

本年元旦，新華日報微文及余，我當時匆匆寫了一篇幾百字的短文交給他們，題爲『樹立反攻的體系，』因時間關係，不及暢所欲言，因此再補述上舉兩個時機的應當注意，仍將該短文附錄於後：

『在過去的五六個月，敵人從河南打起，一直深入貴州，於是一時頗呈極端緊張之象。現在河南、湖南、廣西三省，雖因這次軍事的失敗已大體淪陷，可是敵人却……退出了貴州，於是一月前的緊張狀態，又轉而入於鬆弛了。

若干年來，我們有一句老話：『以空間換取時間』，我們的抗戰已支持了七年有半，『空間』雖然丟掉不少，『時間』却是換來很多，我們所要問的，就是這許多的時間究竟換來幹什麼？就大體言之，我想總不外兩說：其一是等待國際的變化，其次是培植自身反攻的力量。

從一九四〇年到今日，國際的形勢是一直於我有利的，可以說越到最近這種於我有利的情況是越來越多。但自從政府搬到重慶以後，已整整的六年，這六年中爲着培植反攻的力量，究竟成績怎樣呢？……

我們承認『軍事第一』，可是軍事決不是單獨可以健全得起來的，必須政治、外交、財政、生產、動員等一一與之配合，成立一個體系，然後才能有效。我們今天所要樹立的，便是這樣一個『反攻的體系』。

Academia Historica

則創立「反攻的體系」，參與世界大戰中，獲得之，即要把全國所有的力量一一用之於加強反攻。靜待敵人的自退，自然永遠沒有這回事；完全倚賴友邦，也十分的要不得。

最後勝利的到來，時間尚早，曲折尚多，這個時候最值得我們平心靜氣加以考慮。我們應該承認多數人的力量，畢竟大於少數人的力量；全國的力量，畢竟大於部分的力量；團結統一的力量，畢竟大於分裂破碎的力量。如果連這點基本的認識都不承認，則所謂「反攻的體系」便不容易樹立得起來，不能構成這種一個體系，則勝利根基搖搖，且會浪費，的時候，我們應該密切注意的。」

自從蔣先生於本年元旦發表可以提前召開民國大會的文告以後，國民黨中常會更有於本年五月五日召開六大代表大會的決定，這樣一做，時間又可延緩一年，抗戰將正式到達第九年，像上舉一個團結統一的反攻體系，依然無法樹立，我們預不愛感時機坐失，有鑑不擴急的危險。

萬竹樓隨筆（二九）

梁任公年十九，即從康有為學於萬木草堂，在戊戌以前，任公之思想，大抵不出康氏「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及「大同書」等之範疇也。戊戌以後，亡命日本，任公之思想，乃大動搖。康極不以革命為然，梁則一度與中山接近。徐勤所謂「發入行者圈套」者是也。康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祀孔諸議，梁則於「新民叢報」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以駁之。康於海外設保皇會奔走宣傳甚力，任公居東，則以讀書辦報為生，所發表者大抵批評時政及介紹新知之作，於保皇說，殆亦不甚理會之。入民國後，康氏為頑強之復辟黨人，梁則聲言：「立憲黨人祇問政體，不問國體。」民五倒袁，康曾與袁一書，勸袁自退，此似與任公之護國無異，然其跡近同，心理實不同也。民六張勳復辟，康實慫恿之，且赴北京躬與其役，梁則贊助段祺瑞，誓師馬廠，起而討張，使民國危而勿墜。凡此均康梁師徒治學與應事始合終離之點也。梁氏批評其師曰：「有為之為人也，武斷純任主觀，自信力甚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之事實，或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其在事業上有然，其在學問上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數開起一時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實之基礎者亦以此。」又曰：「有為太有成見，啓超太無成見。」此不獨可見任公自知之明，亦知師莫若弟之一證也。康於民六復辟失敗後，深致憾於梁，曾有詩云：「鴟梟食母猶貪父，刑天舞戚虎守閽，逢蒙彈弓專射羿，蔡京棒喝不殺趙立言。」於是民五民六兩度維護民國之功，乃變字不及，不知擬稿者出於誰氏。梁雖學問不談，而應世技術，則廢又陵王靜安數之可發揮者，又豈在任公下乎。

舜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論建國人才

余家菊

玩味近代史實，值國學衰弊之際，當東西思潮澎湃而來之時，國人從善如流，一有接觸，輒欣然受納。於其是否適合國情，慨否講求步驟，任不暇問。人謂國人性情偏於保守，吾則謂國人性情極好趨新，於各種新說，孰曾造福我國家，孰曾道福我人民，今者不欲置論。今之所欲指陳，僅在於東西學說競鳴之時，正值我學術凋弊之際，致令國人批判力不強，消化力不健，於是囫圇吞棗者有之，創足適履者有之。國家元氣，因而耗蝕，固為事實，而國是不定，人心惶惑，依然為今日之隱憂，則尤不可等閒視之。

舊制科舉取士，人之懷才進取者，必經多次攷試，售於縣試，售於鄉試，售於會試，攷試關隘既過，始能沈潛學術，留心當世之務，故為數極少，零星散佈於四方，往往百里之內，不見一讀書明理之人。學術之不普及，有如此者。學人之養成，不可發一人即期望其得一人之用。必所養者多，然後能得較多之人各有成就，而此各有所成之人之中，或有極少數之出類拔萃者能有特殊之發明創見以貢獻於世。故養士之量，不可不宏，而養士之途不可不多。科舉取士，蓋眼文辭。文章為各人性格之表現，蓋於衡鑑文章者，每能即其文而知其人之將來成就。虛偽作品，未能掩盡天下之耳目。衡文者果得其人，去取得當，抑揚不爽，使欲售其文者知文章根於性格，欲售其文，須先養其性，則士風可隨而大變。無如當時衡文者，多沈酣八股之士，於學術根柢，未能深厚，於觀人之術未能靈有真知。於應試者，或取其文辭綺麗，或取其記憶富瞻，或取其文思雋永，或取其筆致險峭，而於為人作事之基本性格反致忽略不曾措意。為人作事或則發皇剛毅，或則文理密察，或則寬裕溫柔，或則齊莊中正。衡文者不足知此，則落選者多有為之人，而及第者多僥倖之輩。性行淳厚，不遇於時，世慮深遠，不知於世，則狡詐輕險之風，必將猖狂不知所底，此科舉之所以重視主考，而主考難得其人，致令科舉制度，其結果必然重文輕德，而使一世人心相習於浮薄輕巧，遺大難於邦家。

科舉以八股取士。今人皆知詆訾八股。夫八股應受詆訾之處，究竟安在，則似殊少能言之者。或謂八股格律謹嚴，拘人太甚，使才氣縱橫者不能馳騁如意。不知馳騁必循軌道，才士必守繩墨，文章必有條理，考試必有格式，以此而詆訾八股，八股之病，未必在此。或謂八股，代聖人立言，所讀不出五經四書，所知不出孔孟顏曾，囿見聞於一家，縛思想之自由。不知考試之事，乃考試士子學業之術無所成就，而須作基本工夫者，豈可不示之準的，予以範圍乎？以此而詆訾八股，八股之病未必在此。依吾所見，則八股之病，第一在重形式而不重實質。唯其重形式，故其文章有頭、有領、有腹、有尾、其結構有起有承有轉有合，就形式觀之，則燦然成篇；就實質觀之，則了無多義。長篇累紙，盡是油腔滑調之辭。言出於口，全不感其責任；文成筆下，茫然不知其何謂。空疏、空洞、斯為必然之結局。其次、八股之病在剝襲。夫公衆之事，必須有準則以樹之鵠的。準的既立而模倣起。模倣既久而剝襲興。由社會之同化作用，而剝襲之弊，必然附隨以俱起。故剝襲非大病

民國一卷十一期

Academia Historica

，大病在盲目之剿襲。八股代聖人立言。聖人之言，或涉經國大道，或關天人奧義。後生小子，初識之無，便開口正心誠意，下筆修己治人，實長其狂妄之習，以及輕視天下事之心情。一國讀書人，相習於以狂妄之心，輕談天下之事，欲其不亂，不可得矣。又其次，八股之病，在文思之無邏輯組織。文章為思想之結晶，本以理性之條貫為其骨髓。能重理性則條理謹嚴，生活肅正。惜八股文措意於意念聯合之巧妙者，不置意於推論步驟之綿密，於是無情之接搭，視為奇思，矛盾之湊拍，視為妙語。又加以詩賦之考試，花月之吟咏。作詩要領，在想像之豐富巧妙，不可沾滯於實事，不可泥囿於理致。故詩人與思想家，不能兼備於一人之身。詩自有其不磨之價值，惟防止詩教之弊，道在發展理性。在科舉制度下，佐詩教而俱行者，乃為八股文。重聯想而不重推論，成為國人之通習。講學無條理，治事不綿密，其為禍慘烈，今日已完全暴露矣。八股病深中人心，時人吠影吠聲，尚不覺病症所在，眞為可哀。

清代有所謂乾嘉之學，訓詁精審，考據詳確。乾嘉諸老，功在不朽。及其弊也，則支離破碎，堆砌煩瑣，見一樹而不見全林，明細節而不通大義，立身則詆嚴肅為作偽者有之。夫專家之學，必入於細碎，學人持身難期於不偏，是固勢有必至。然而細碎繁多，不可湮沒大義，今日科學家之窄深研究，何嘗置所習科學之大理大法於不顧乎？行為錯誤，出諸事不經心者，號學者之所常然，但想恃有學以非違理義，利用邪說以自便私圖，則不得不謂為學風之敗壞。乾嘉之學，重視求知，而忽略做人，已屬不幸，況其求知又涉於遺大義而困於細碎乎！

科舉之禍既如是，乾嘉之學，流弊又如此。道咸而降，國勢日危，救國念切，有志者不能不挺身自任以天下之重，而當時學術於救亡圖存之計，又一無可資利用者。於時乃有兩大救亡途徑之出現，一則為學術救亡論，一則為政治救亡論。持學術救亡論者，知國無學術即不能立國，或則獻身教育，或則潛心研究，雖變亂頻仍，而此志成就終有可觀。持政治救亡論者，念救亡須急進，政治革新而後學術乃易昌明。或倡革命，或事維新，其崇高偉大，亦足令百代仰慕。兩大路線，孰優孰劣，難為軒輊。然而，就今日之時代性觀之，則政治救國必須學術為其基據要無疑義。

晚近愛國志士，犧牲小我，奔赴國難，前仆後繼，絕不回顧，如戊戌六君子，如黃花岡七十二烈士，成仁取義，途徑雖殊，其壯偉可風，足振國民之氣，則無二致。即在武昌首義一役，當時諸公之勇敢純潔，不畏難，不避禍，不爭權，不攘利，亦復足為民族光而垂範百世。嗣後袁氏當國，誅鋤異己，大行收買之計，恃官位金錢以牢籠人心，摧毀政敵，在白刃與黃金之下，人心乃日即於頹廢腐化。袁氏既歿，派系紛爭，縱橫捭闔者逞其謀，攻瑕抵隙者施其計，正行中道，被目為迂闊，而詭詐傾險之風乃不可遏。回憶民初之熱烈純潔，乃如唐虞盛事。降至近年，則校門未出，已知奔走鑽營之途，世故未深，已工結納逢迎之術，斲喪未久，已習吹拍捧打之技。雖時有純潔愛國之聲，未見束身自好之行。每一美名，如熱心，如負責，無不被人用作自便之口實。熱心幾即等於熱中，負責幾即等於把持。由是言語道斷，凡以正道教人者無不為人所竊竊笑，而謂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必能正也。世道衰弊，可謂極矣。

識者又憂之，倡為力行之說。「做人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變浮華之習，為篤實之風，轉炫人之態，為反己之行，庶幾人人脚踏實地，處處實事求是，盜名竊譽之風，捨己殉

Academia Historica

人之習，或可廓清，而國事之趨衰振廢，乃可有望。夫無諸己而後責於人，不唯待人之恕道宜然，即立己之誠意亦不許知其非而故蹈之。君子恥其行之不逮其言，故寡其言以殺其恥。今人不顧其行，唯大言是務，將以欺世，實足見其無恥。篤實踐履之風，誠為刻所急需，故「幹之哲學」盛倡於今日。

吾人願幹而決心幹矣，然而吾人將何所幹乎？又宜何如幹乎？目標不明，方術不講，則皆肯幹而已，譬幹而已！苦幹何益，快幹速禍而已。在維新時代，國人認為但西政一一倣而行之，則國家強矣，在革命時代，國人認為但取滿清一舉而推翻之，則國家興矣，在五四時代，國人認為但取舊學一舉而掃除之，則國家治矣。於今大夢已醒來，知世事原不如此簡單，建國實不能無學。前乎此者，動機純潔，即足以挺身任事，責任心強，即足自負以天下之重，而今則徒有純潔，不足以救國，徒有熱情亦不足以救國，必須加以學問工夫，瞭然於建國經緯，設施方略，然後次第實行，不撓不敗。我國今日一切落後，其總原因實在於學術落後。我國今日須迎頭趕上，其總關鍵實在於「學術趕上」。二十世紀，無學術決不足以建國，無學術亦決不足以成事。眞事業必自學術中來，強國必自昌明學術始。

宋元而後，朱學獨盛，窮搜博討，講究詳密。及其弊也，支離破碎，委瑣卑微。有明王守仁出，倡即知即行之說以振之。雖所行未必果為眞知，難免流入狂悖，而當時之人倫大法既一宗孔孟，而當時之治國方略亦復有軌轍可循，故多重力行少事求知，其弊尚淺。今日則舊轍既毀，孔孟已倒，吾人欲實幹，快幹，硬幹，試問將何所遵循乎？遵循外來之成法乎？則外來成法牴牾不齊，試問何去何從？亦唯有自行其所見而已。使一己所見，果為眞理，則取而行之，誰曰不宜！無如自己非神，難免無錯；今唯自己之智慧是賴，使自己錯誤，又將何以知之？有錯而不知，正人世之大苦。此所以求知須虛心，處專須自反也。今人習於狂悖，既不知天下事之難，又不認天下人有知，唯知予智自雄，敢行己意，而潤飾之以純潔熱情之美名，於是誤盛天下蒼生而不知愧。依心理分析學，人心於不覺之間，對於不正大之行為每飾以正大之理由。此種歷程名曰理性化。以此理性化之作用，世間無人承認自己為有罪之人。彼擄奪之專，由擄奪者觀之，殊不覺為可恥，而反為義所當然。意若曰：當今之世，捨我其誰，我豈可坐視斯民疾苦而不救哉？此所以人苦於不自知，而自訟工夫所以為聖賢所樂道也。求知入德，着手處皆在自覺有所不足。故張皇之人，其失多；斂退之人，其失少。

生活於主觀心理之下，乃學有大成者之事。故孔子曰：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若夫學未大成，則須以客觀事實勘驗主觀意象，使吾所見而是也，必合於事理而推行無礙；使吾所為而輒與人迕，則當反躬自問，我之所捧或有不當乎？中國人為常識民族，緊密推理為所不耐；而事實勘驗，則其所擅長。宜發揮此優點，用客觀控制主觀，從事實推求知識，腳踏實地，追求眞知，不逞私臆，不逐時潮；建國前途，庶幾順利。

Academia Historica

國際聯合作戰問題

譯敵武

一、國際聯合作戰與一國單獨作戰的分別

近百年來，我國雖曾經過數度對外作戰，但除此次對日作戰外，如鴉片戰役，英法聯軍之役，甲午戰役以及庚子戰役等，都是一國單獨作戰，而不是國際聯合作戰。即此次對日作戰，即數年也是中國一國單獨作戰，到日本襲擊珍珠港與新加坡以後，始造成與美英等國聯合對日作戰的局勢。這個局勢的造成，對於久經單獨苦戰的我國人民心理，是一種大興奮；同時對於我國抗戰前途，也是一種大轉機。今後我國宜如何運用此局勢，以爭取最後勝利，則是急待適切決定的一個大問題。要適切決定這個大問題，須先明瞭這個大問題是國際聯合作戰問題，而不是一國單獨作戰問題。我國人對於一國單獨作戰問題已多少有點經驗與常識，這是可以自信的。不過對於國際聯合作戰問題，則既缺乏經驗，又缺乏常識，也是應自知的。如果我們仍用一國單獨作戰的辦法，來應付國際聯合作戰問題，便恐難於十分合拍，更恐難於收到國際聯合作戰的切實效用。因此我們對於國際聯合作戰與一國單獨作戰的兩個問題，首須加以明確的分別，以免辦法錯誤。

一國單獨作戰的範圍，僅以本國與敵國（敵國方面是否亦為一國單獨作戰，可姑不論）的敵對行為為限。因此關係比較簡單，行動比較自由。一切對敵行動，只須於「知彼知己」之後，便可完全由本國自行決定。但國際聯合作戰的範圍，除本國外，尚有友邦。如何聯合友邦以共同打擊敵人，則關係比較複雜，行動亦比較不自由。一切對敵行動，除須知彼知己外，尚須「知友」，（按此係借用舊名詞，以特指聯合作戰的友邦。）然後始可與友邦協商決定之。孫子說：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孫子謀攻篇）

這幾句話，是特別說明一國單獨作戰的要義，在知彼知己，而知己尤重於知彼。現在仿用這幾句話的格式，來特別說明國際聯合作戰的要義，則應如下：

知友知己，聯合作戰必勝。不知友而知己，聯合作戰或勝或敗。不知友，不知己，雖聯合作戰亦必敗。

關於知彼的重要性，在一國單獨作戰時與在國際聯合作戰時，完全無分別，故本篇不多論。關於知己的重要性，無論一國單獨作戰，或國際聯合作戰，均應佔第一位。不過在一國單獨作戰時所謂知己，係着重本國與敵國各種事項的較量，而在國際聯合作戰時所謂知己，則着重本國與友邦各種事項的配合。這種合義的大分別，我們應首先記取。

一國既與他國聯合作戰，則彼此之間，應在主權上與禮貌上互相尊重，以保持兩國的友好，這是必要的。但若因此即謂兩國可以完全平等合作，却未必然。因為在事實上，兩國的各種情況，如政治、經濟、軍事、和環境等，既不完全相同，而兩國的相互要求與各別所能相任的力量，也不完全相同。在此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各種不同情形之下，要確收國際聯合作戰之效，必須先行審查自己一番，即必須先知己。本國的政治是否已經修明，能與友邦合作至何種程度？本國的經濟是否已經開發，能與友邦合作至何種程度？本國的軍事是否已經精強，能與友邦合作至何種程度？本國的要求是否與本國的力量相稱？自己對於這種種問題逐一加以審查以後，才算得「知己」。知己以後，才能適切決定本國對友邦所應取的態度與所能提出的要求。

當國際聯合作戰時，首須知己，這個道理似能得到一般的承認。但是一個人要知己，已極不易，何況一個國家呢？一個人所以不易知己的原因，一大半由於好自誇，一小半由於好自餒。好自誇，則要求每易超過力量，難得他人的信賴。好自餒，則連有一點力量也等於無力量，也難得他人的尊重。一個國家也有種種的情形，而在國際聯合作戰時，尤易於暴露出來。當友邦對本國有所敦請時，難免偶有過分的揄揚，於是易於引起自誇，致不知己。又當友邦對本國有所責難時，也難免偶有過分的批評，於是易於引起自餒，致不知己。如果一個國家在表面上好自誇，而在骨子裏又好自餒，則必使國際聯合作戰時首須注意的一個要義。

出盧溝橋發生困難與波折，更無由知己了。不知己，則必使國際聯合作戰與一國單獨作戰的分別，一在知己的內容不同，二在知己的程度不同。如果這兩點不同，如不完全一致，則須知友邦所置重者在何處？能不能與本國所置重者調和？友邦為何而作戰？為利害呢？抑為榮譽呢？抑為榮譽重於為利害嗎？換何話說，友邦對於戰爭的結局，重在實現和平呢？抑重在貫澈野心呢？如其重在澈貫野心，又須進問其野心是否與本國的利害有無大衝突。友邦在軍事政治經濟以及外交各方面所能及所願動員的力量，優於本國，抑劣於本國？如其優於本國，友邦能否，並願否以其餘力援助本國？如其願援助，是有條件的，還是無條件的？友邦對於本國的要求是什麼？本國對於友邦的要求能不能達到？對於友邦的青望可不可曲從。以上種種問題，都是關於友邦的問題。知道這種種問題的明確解答，便叫做「知友」。知友之後，然後友邦始樂於與我聯合作戰，並樂於助我作戰。如其不然，雖聯合而未必能作戰，雖作戰而未必能勝，雖能勝而未必能分有之。所以知友是國際聯合作戰時次須注意的又一個要義。

由上說來，可知國際聯合作戰與一國單獨作戰的分別，一在知己的內容不同，二在知友的程度不同。如果這兩點不同，如不完全一致，則須知友邦所置重者在何處？能不能與本國所置重者調和？友邦為何而作戰？為利害呢？抑為榮譽呢？抑為榮譽重於為利害嗎？換何話說，友邦對於戰爭的結局，重在實現和平呢？抑重在貫澈野心呢？如其重在澈貫野心呢，又須進問其野心是否與本國的利害有無大衝突。友邦在軍事政治經濟以及外交各方面所能及所願動員的力量，優於本國，抑劣於本國？如其優於本國，友邦能否，並願否以其餘力援助本國？如其願援助，是有條件的，還是無條件的？友邦對於本國的要求是什麼？本國對於友邦的要求能不能達到？對於友邦的青望可不可曲從。以上種種問題，都是關於友邦的問題。知道這種種問題的明確解答，便叫做「知友」。知友之後，然後友邦始樂於與我聯合作戰，並樂於助我作戰。如其不然，雖聯合而未必能作戰，雖作戰而未必能勝，雖能勝而未必能分有之。所以知友是國際聯合作戰時次須注意的又一個要義。

由上說來，可知國際聯合作戰與一國單獨作戰的分別，一在知己的內容不同，二在知友的程度不同。如果這兩點不同，如不完全一致，則須知友邦所置重者在何處？能不能與本國所置重者調和？友邦為何而作戰？為利害呢？抑為榮譽呢？抑為榮譽重於為利害嗎？換何話說，友邦對於戰爭的結局，重在實現和平呢？抑重在貫澈野心呢？如其重在澈貫野心呢，又須進問其野心是否與本國的利害有無大衝突。友邦在軍事政治經濟以及外交各方面所能及所願動員的力量，優於本國，抑劣於本國？如其優於本國，友邦能否，並願否以其餘力援助本國？如其願援助，是有條件的，還是無條件的？友邦對於本國的要求是什麼？本國對於友邦的要求能不能達到？對於友邦的青望可不可曲從。以上種種問題，都是關於友邦的問題。知道這種種問題的明確解答，便叫做「知友」。知友之後，然後友邦始樂於與我聯合作戰，並樂於助我作戰。如其不然，雖聯合而未必能作戰，雖作戰而未必能勝，雖能勝而未必能分有之。所以知友是國際聯合作戰時次須注意的又一個要義。

由上說來，可知國際聯合作戰與一國單獨作戰的分別，一在知己的內容不同，二在知友的程度不同。如果這兩點不同，如不完全一致，則須知友邦所置重者在何處？能不能與本國所置重者調和？友邦為何而作戰？為利害呢？抑為榮譽呢？抑為榮譽重於為利害嗎？換何話說，友邦對於戰爭的結局，重在實現和平呢？抑重在貫澈野心呢？如其重在澈貫野心呢，又須進問其野心是否與本國的利害有無大衝突。友邦在軍事政治經濟以及外交各方面所能及所願動員的力量，優於本國，抑劣於本國？如其優於本國，友邦能否，並願否以其餘力援助本國？如其願援助，是有條件的，還是無條件的？友邦對於本國的要求是什麼？本國對於友邦的要求能不能達到？對於友邦的青望可不可曲從。以上種種問題，都是關於友邦的問題。知道這種種問題的明確解答，便叫做「知友」。知友之後，然後友邦始樂於與我聯合作戰，並樂於助我作戰。如其不然，雖聯合而未必能作戰，雖作戰而未必能勝，雖能勝而未必能分有之。所以知友是國際聯合作戰時次須注意的又一個要義。

Academia Historica

國際聯合作戰問題

陳啟天

一、國際聯合作戰與一國單獨作戰的分別

近百年來，我國雖曾經過數度對外作戰，但除此次對日作戰外，如鴉片戰役，英法聯軍之役，甲午戰役以及庚子戰役等，都是一國單獨作戰，而不是國際聯合作戰。即此次對日作戰，頭數年也是中國一國單獨作戰，到日本襲擊珍珠港與新加坡以後，始造成與美英等國聯合對日作戰的局勢。這個局勢的造成，對於久經單獨苦戰的我國人民心理，是一種大興奮；同時對於我國抗戰前途，也是一種大轉機。今後我國究如何運用此局勢，以爭取最後勝利，即是急待適切決定的一個大問題。要適切決定這個大問題，須先明瞭這個大問題是國際聯合作戰問題，而不是一國單獨作戰問題。我國人對於一國單獨作戰問題已多少有點經驗與常識，這是可以自信的。不過對於國際聯合作戰問題，則既缺乏經驗，又缺乏常識，也是應自知的。如果我們仍用一國單獨作戰的辦法，來應付國際聯合作戰問題，便恐難於十分合拍，更恐難於收到國際聯合作戰的切實效用。因此我們對於國際聯合作戰與一國單獨作戰的兩個問題，首須加以明確的分別，以免辦法錯誤。

一國單獨作戰的範圍，僅以本國與敵國（敵國方面是不亦為一國單獨作戰，可結不論）的敵對行為為限。牽涉關係比較簡單，行動比較自由。一切對敵行動，只須於一知彼知己之後，便可完全由本國自行決定。但國際聯合作戰的範圍，除本國外，尚有友邦。如何聯合友邦以共同打擊敵人，則關係比較複雜，行動亦比較不自由。一切對敵行動，除須知彼知己外，尚須「知友」，（按此係借用舊名詞，以特指聯合作戰的友邦。）然後始可與友邦協商決定之。孫子說：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孫子謀攻篇）

這幾句話，是特別說明一國單獨作戰的要義，在知彼知己，而知己尤重於知彼。現在仿用這幾句話的格式，來特別說明國際聯合作戰的要義，則應如下：

知友知己，聯合作戰必勝。不知友而知己，聯合作戰或勝或敗。不知友，不知己，雖聯合作戰亦必敗。

關於知彼的重要性，在一國單獨作戰時與在國際聯合作戰時，完全無分別，故本篇不多論。關於知己的重要性，無論一國單獨作戰，或國際聯合作戰，均應佔第一位。不過在一國單獨作戰時所謂知己，係着重本國與敵國各種事項的較量，而在國際聯合作戰時所謂知己，則着重本國與友邦各種事項的配合。這種配合的工夫，我們應首先記取。

一國既與他國聯合作戰，則彼此之間，應在主權上與禮貌上互相尊重，以保持兩國的友好，這是必要的。但若因此即謂兩國可以完全平等合作，如未必然。因為在事實上，兩國的各種情況，如政治、經濟、軍事、和環境等，既不完全相同，而兩國的相互要求與各別所能担任的力量，也不完全相同。在此

各種不同情形之下，要確收國際聯合作戰之效，必須先行審察自己一番，即必須先知己。本國的政治是否已經修明，能與友邦合作至何種程度？本國的經濟是否已經開發，能與友邦合作至何種程度？本國的軍事是否已經精強，能與友邦合作至何種程度？本國的要求是否與本國的力量相稱？自己對於這種種問題逐一加以細查以後，才算得「知己」。知己以後，才能適切決定本國對友邦所應取的態度與所能提出的要求。

當國際聯合作戰時，首須知己，這個道理似能得到一般的承認。但是一個人要知己，已極不易，何況一個國家呢？一個人所以不易知己的原因，一大半由於好自誇，一小半由於好自餒。好自誇，則要求每易超過力量，難得他人的信賴。好自餒，則連有一點力量也等於無力量，也難得他人的尊重。一個國家也有兩種好誇與好自餒的情形，而在國際聯合作戰時，尤易於暴露出來。當友邦對本國有所鼓舞時，難免偶有過分的揄揚，於是易於引起自誇，致不知己。又當友邦對本國有所責難時，也難免偶有過分的批評，於是易於引起自餒，致不知己。如果一個國家，在表面上好自誇，而在骨子裏又好自餒，則必露出虛驕虛偽的眞相，更無由知己了。不知己，則必使國際聯合作戰發生困難與波折。這是國際聯合作戰時首須注意的一個要義。

當一國舉行作戰時，從來政治家與軍事家多知道外交戰的重要。孫子兵法有「伐交」的說法，詳見謀攻篇。不下於武力戰的初步。在外交戰中，友邦共同作戰時，則必須知己知彼，尤爲必要。何以非知己知彼不可呢？因爲本國既已與友邦聯合作戰，則友邦在國際聯合作戰時最爲必要的一個要件。

二、國際聯合作戰的四大問題

呢？因爲本國既已與友邦聯合作戰，則戰爭的勝敗關係兩國前途，勢須互相關切，互相了解，並互相援助，以求戰爭的必勝而不敗。友邦的作戰目標，是否與本國的作戰目標完全一致？如不完全一致，則須知友邦所置重者在何處？能不能與本國所置重者調和？友邦爲何而作戰？爲利害呢？抑爲榮譽呢？爲利害重於爲榮譽呢？抑爲榮譽重於爲利害嗎？換句話說，友邦對於戰爭的結局，重在實現和平呢？抑重在貫澈野心呢？如其重在澈貫野心，又須進問其野心是否與本國的利害有無大衝突。友邦在軍事政治經濟以及外交各方面所能及所願動員的力量，優於本國，抑劣於本國？如其優於本國，友邦能否，並願否以其餘力援助本國？如其願援助，是有條件的，還是無條件的？友邦對於本國的要求是什麼？本國對於友邦的要求能不能達到？對於友邦的青望可不可曲從。以上種種問題，都是關於友邦的問題。知道這種種問題的明確解答，便叫做「知友」。知友之後，然後友邦始樂於與我聯合作戰，並樂於與我作戰。如其不然，雖聯合而未必能作戰，雖作戰而未必能勝，雖能勝而未必能分有之。所以知友是國際聯合作戰時次須注意的又一個要義。

由上說來，可知國際聯合作戰與「國單獨作戰的分別，在知己的內容不同，二在知友的程度不同。如果這兩點不同，被人忽略，則聯合不能成爲眞聯合，如何能作戰呢？更如何勝利呢？要國際聯合作戰勝利，則必須知己並知友。知己然始能盡其在我，知友然後始能得助於人。既能盡其在我，又得助於人，便不患不能勝利了。

Academia Historica

關於國際聯合作戰問題，就對敵國說，固是軍事問題；但以國就對友邦說，則是外交問題。不過這種外交問題，不是單純的外交問題，而是牽涉到國家各方面的外交問題。因此國際聯合作戰問題，可粗分為四大問題，即：（一）政治外交問題，（二）人事外交問題，（三）經濟外交問題，與（四）軍事外交問題，試分別說明其要旨如下：

（一）國際聯合作戰時的政治外交問題——政治是外交的根本，外交不過是政治的枝葉。欲求枝葉茂盛，必先培植根本。故欲求「外交上有辦法，必先求在政治上有辦法。本篇所謂「政治外交」，即是想先用政治的方法，以增進外交的關係。一個國家在國際聯合作戰時，宜如何用政治的方法以增進外交關係，便是政治外交問題。關於此問題，有二要旨須加以解說：第一、須力求本國與友邦的政治氣味相投。所謂政治氣味，指政治的體制，或作風而言。古語云：「物以類聚，人以羣分」。國家是由人組成的，故亦多「以類聚，以羣分。」從前國際關係，多以種族或文化的異同而分合。近代國際關係，則多以政治氣味的異同而分合。例如法國大革命時，與相極特須所主持的神聖同盟，係由君主國家聯合而成，即以其政治氣味，都是反民主的。又如現代政治有三種迥然不同的氣味，即（一）民主政治的氣味，（二）無產階級專政的氣味，與（三）獨裁政治的氣味。凡同具民主氣味的國家自易於聯合在一團，凡同具無產氣味的國家也易於聯合在一團，凡同具獨裁氣味的國家也自易於聯合在一團。所以在這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關係的分合，大體係依照以上三種政治氣味而定。及這次世界大戰既起，以德日的獨裁氣味過於逼人，於是引起英美蘇中等國的大聯合。在此大聯合中，英美的政治氣味，原來大體相同，自易於聯合，且不必說。蘇聯的政治氣味，原與英美不大同。但以國於聯合對德的必要，乃自動改定國歌，（即不再用世界革命的國際歌為國歌）允許宗教自由，解散第三國際，並改組共產黨為普通政黨，同時又證明蘇聯的政治亦是民主，以金國國旗與聯合，而取得其援助。這是一個運用政治方法以增外交關係的新例，可謂眼明手快，實有政治天才。至於中國呢？依照國名及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本應是民主的，奈迄今猶滯留於訓政時期，反使友邦有所疑慮。政府有見及此，已開始準備實施民主憲政。我們只希望進度要稍快，推行要有力，以便能用政治的方法，促進外交，爭取勝利。促進外交，爭取勝利，是人人所贊同的，不過要促進外交，爭取勝利，必須從速實施民主憲政，以國與友邦更密切合作，才有可能，似乎還無多人真正覺識。這一點關係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趕快覺識，並決心實行呵！第二、須力求本國與友邦的政治利害相近。一個國家既已與他國聯合作戰，則兩國間的政治利害必有相同點。這相同點，即為聯政兩國的共同敵人，只求於兩國前途均有利。國際聯合作戰之所以能達成，與其所以能繼續，多在有無這點共同利害。不過除這點共同利害外，聯合作戰國家間的政治利害，即未必完全相同。因為每個國家好以本國的利益為前提，雖是聯合作戰國家，彼此亦均難能免。既然如此，則聯合作戰國家間宜如何一面而能力保持雙方共同的政治利害，又一面盡力調和彼此各別的政治利害，實是國際聯合作戰中的一個重要問題。要盡力保持雙方共同的政治利害，只有一個最要緊的方法，即雙方須與共同的敵人，盡力作戰到底，而不讓任何一方中途單獨對敵妥協。換句話說，戰要共同戰，和要共同和。始能始終保持雙方共同的政治利害。至於要盡力調和彼此各別的政

Academia Historica

治利害，則宜酌採以下各方法：（一）對於兩國間歷史上的仇怨，不要算舊賬，以免引起反感。（二）對於兩國間的外交懸案，可讓步的，宜自動讓步，不可讓步的，宜在適當時機謹愼提出，以免引起不能解決的爭論，致影響聯合作戰。（三）對於與本國無直接利害關係，而與友邦有直接利害的問題，如友邦屬地問題和歐洲均勢問題等，切忌輕率發言，激成惡感。即友邦屬地原爲本國領土，也不宜於聯合作戰時輕率倡言收回，以免友邦誤會。（四）本國對於友邦的要求，須與本國的力量與努力相應。凡過於超過本國力量與努力的要求，如難得友邦的贊同，則不宜隨便提出。（五）本國對於作戰的具體目標，宜明白宣示，使友邦明瞭本國作戰，只爲擊敗敵人，以保持本國生存，並維持世界和平。擊敗敵人之後，本國只收復失地，並無其他領土野心，更無干涉友邦屬地的企圖。（六）如本國需要友邦的援助甚急又甚大，則除多方設法引起友邦的同情外，尚須於合理範圍內予以「利益交換」，使其更樂於援助。所謂利益交換的內容，或爲敵國領土，或爲戰時及戰後通商權利，或爲共同投資經營本國工業，或爲與友邦最有利害關係的問題，雖與本國無直接利害關係，亦予以外交上的援助。以上所說各種方法，都不外力求本國與友邦的政治利害相近，以便更能密切聯合作戰而已。

（二）國際聯合作戰時的人事外交問題——一切外交問題，都要經過人事關係。如果人事關係不大融洽，則外交必易生阻礙，無由達到使命。故人事外交問題，在平時已甚重要，而在戰時更爲重要；對普通友邦已甚重要，而對聯合作戰的友邦更爲重要，不可不特別注意及之。所謂人事外交問題，不是說外交事件的問題，也不是說外交政策的問題，僅專指辦理外交的人選及其態度等問題而言。關於此問題，也有二要旨，須加以解說。第一外交人選必須其對人與本領能得友邦的信任。外交事項不但有關於本國，而且有關於友邦。因此辦理外交的人選，不但要能得本國的信任，而且要能得友邦的信任。不能得本國信任的人員，不宜充任外交人選，已爲一般人所共知。但不能得友邦信任的人員，也不宜充任外交人選，似乎還未得到一般人的確信。我們要知辦外交，不是辦差事，也不是辦私事，任何人均可充任，必須慎選友邦所能信任的人員，始能辦得通，並能辦得好。如果隨便任用友邦所不能信任的人員去辦外交，則必引起友邦的輕視，甚至引起友邦的惡感，如何能辦外交呢？所以外交人選必須十分愼重，必須中外共信的人才始可任用。外交人選既須中外共信，則必須公開詮選全國第一流外交人才充任，不宜有所偏私。二有偏私，則外交必因之而敗，作戰亦必因之而大受影響。所以各國在國際聯合作戰時，莫不愼重外交人選，以求確能培進友邦外交。這一點，在強國固不可疏忽，在弱國更不可疏忽。強國疏忽外交人選，則小之足以損失國信，大之足以使友邦變成敵國。弱國疏忽外交人選，則小之足以減少友邦的援助，大之足以增加本國的危險。弱國在戰時對於友邦的外交，本重在爭取援助。倘人選不能十分得到友邦的信任，如何能爭取援助呢？現在外國雖有人稱中國爲「四強之一」，但我們要知道這只是一種鼓舞，切不可誤以爲我國已經是一個強國。其實世界中國是一個大國，要變爲強國，實饒有極大的可能，不過還要看今後我國自己的努力如何。外交是今後中國應該努力的一方面，只要有好人選出任外交重任，自能在戰時爭得外交的大援助，使中國漸次成爲一個強國。以上所說外交人選，除應包括普通外交官，如外交部主官，

Academia Historica

駐友邦使節外，其他因戰時需要，派駐友邦辦理軍事、財政、經濟、以及戰後問題的特殊使節，亦均應包括在內。普通外交官的聲譽與本領，固須能得友邦的信任。特殊使節的聲譽與本領，也須能得友邦的信任。如此然後始可刷新外交陣容，促進友邦關係，而使國際聯合作戰更趨於密切。否則，雖有極利於我的外交形勢，也恐難免因外交人選失當而漸次敗壞了。

第二、外交態度須力求不亢不卑，不欺不欺，以增進友邦的友誼。一個國家對於聯合作戰友邦的外交態度，應與對於普通友邦的外交態度稍有不同，也如一個人對於患難朋友的態度，應與對於普通朋友的態度稍有不同，差不多。一個人對於患難朋友須保持不亢不卑，不欺不欺的態度，方能始終得其助力。一個國家對於聯合作戰友邦的外交態度，也宜大體如此，才能始終聯合作戰，並得其助力。如外交態度太亢，則易引起友邦的反感，而不願助我作戰。反之，如太卑，則又易引起友邦的輕視，而損及本國的國譽。因對於不亢不卑之間，以與友邦周旋，始為得體。又外交態度如變化不測，則易引起友邦的疑忌，而不願盡力助我作戰。如出語及行事近於欺騙，則易使人感覺不夠做朋友，也不願盡力助我作戰了。先哲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一個人要在「蠻貊之邦」相處得很好，尚且需要「言忠信，行篤敬」，何況一個國家及其外交官要與聯合作戰友邦相處得很好，不更需要「言忠信，行篤敬」嗎？言忠信，即不欺之謂。行篤敬，即不變之謂。不變不欺，然後乃可始終與友邦並肩作戰。不過現在有些人過於相信宣傳，難免不以欺騙為宣傳。又有些人過於相信外交不能離開手腕，致外交手腕令人莫測高深。不知對於聯合作戰友邦的外交，不是普通外交，而是同生死共患難的外交。要友邦與我同生死共患難，自不宜有欺騙的宣傳，也不宜用變化莫測的手腕。

（三）現代戰爭對於經濟既是一種大消耗，又是一種大破壞。無論何國，欲求在對外作戰時，經濟能自給並有剩餘，多不可能。於是不得不有賴於國際的經濟援助，以便能長期支持戰爭，並獲得最後勝利。此在財政充裕，產業發達的國家已不能無此需要，則在財政困難產業落後的國家自更急切了。不過前種國家取得國際經濟援助較易，而後種國家則較難。因此凡財政困難，產業落後的國家，對於戰時的經濟外交問題不得不特別請求。欲請求戰時的經濟外交問題，須注意數要旨如下：第一須盡力保持本國與友邦間的經濟通路。本國有餘的物資，要輸出國外須賴有國際通路。本國不足的物資，要從國外輸入，亦須賴有國際通路。最主要的國際通路，是陸上通路與海上通路。至於空中通路，雖可補助運輸，但數量有限，難於供應需要的大量需要。故欲保持本國與友邦間的經濟通路，必須注意陸上通路與海上通路的聯絡及其保衛。現在我國海上通路的聯絡與保衛，要全賴外交，陸上通路的聯絡與保衛，也一半要賴外交。因此我國欲保持國際通路，以便確實取得大量的國際援助，自必須特別努力外交。第二、須盡力保持本國對友邦的經濟信譽。所謂經濟信譽，不僅指國際債務的確實履行，而且指國家財政的徹底公開。凡對於國際債務不能確實履行的國家，雖有損於經濟信譽，尚可以藉事實理由，向友邦要求延緩並諒解。但若財政不公開，則恐友邦疑心有中飽與浪費的情事，不願予以較大的經濟援助了。故欲保持國際的經濟信譽，必須財政公開。所謂財政公開，除預算決算必須經過民意機關決議外，尚須有適當的人才主財政的人，不能

Academia Historica

已難得國內人民的信任，更何能保持國際的經濟信譽呢？以友邦所不能信任的人去與友邦交涉財政援助問題，則結果必難如期望了。就當前的國際局勢看來，戰鬥從聯合作戰友邦取得較大的財政援助，似不甚難，只要財政得人，交涉得人便可。因為財政與交涉二，都得人，則本國對於友邦的經濟信譽即可樹立起來，何愁財政無辦法呢！第三、須盡力注意本國與友邦間的物資交換。本國缺乏的物資，在戰時只有設法取之友邦。欲友邦供給本國所缺乏的物資，通常有以下數種辦法：（一）以現金購買，每苦為國家財力所限，不能大量購買。（二）以信用賒購，則須信用素著始可辦到。（三）無條件租借，則須本國對於敵國的力戰，足以引起友邦的同情，並足以輔助友邦的作戰。（四）比較易於取得友邦物資援助的辦法，莫過於以本國特產的物資，與友邦貨物交換。此種辦法，既於本國有利，又於友邦有利。只要是友邦，無論是否聯合作戰之均宜盡力進行物資交換的辦法。第四、須盡力運用友邦的人才，技術與資本，以開發本國的產業。只要大體無礙於國家的主權，對於友邦的人才，技術與資本須充分加以大規模的運用，以便本國產業能在戰時盡量開發。為求在戰時迅速開發本國產業，以應急需起見，雖中外合資共同經營工業，亦可在一定條件之下，放手做去。所謂一定條件，乃指中外合資經營的工業，一須遵守本國法律的規定，二須友邦除注意經濟利益外，沒有政治野心。

（四）國際聯合作戰時的軍事外交問題——所謂軍事外交問題，乃指以實際聯合作戰為目標的外交問題。這類外交問題，頗先由政治家與外交家負責交涉，次由軍事家負責完成，故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為求交涉較適於實際聯合作戰起見，自須軍事家參贊交涉，不過其主要責任應由政治家與外交家，即政府主腦與外交當局負之。關於此問題，有數要旨須加說明：第一、須努力與友邦協商於雙方均有利的大戰略。每個國家所欲採取的大戰略，都想於自己比較有利，終不免有意見的參差。這種大戰略的意見參差，在敵國不只一個時更為顯明。例如此次大戰的共同敵人，在歐洲有一個德國，在亞洲又有一個日本。從英國看來，自然要採取先攻德國，後攻日本的大戰略。從蘇聯看來，自然要採取專攻德國的大戰略。從中國看來，自然要採取專攻日本的大戰略。從美國看來，自然要採取一面攻日，一面攻德的大戰略。我國在大戰略上，不可強求蘇聯一面攻德，一面攻日，也不可強求英國先攻日本，後攻德國；也不可強求美國只攻日本，不攻德國。但在外交上仍須本着下述方針，多多盡力：對蘇聯多方設法促進友好關係，使日本無忘北顧之憂。對英可請其於攻德的時期，酌分餘力，協攻日本；待打敗德國以後，再以其全力協攻日本。對美可請其逐漸着重攻日，以至勝德以後全力攻日。這樣的一種方針，是饒有可能的，只待外交的努力。第二、須切實與友邦商定聯合作戰計劃及指揮問題。關於聯合作戰計劃，應包含有戰區劃分，任務分担，軍需互助，軍隊合作，與情報聯絡等事項的具體規劃。提與友邦協商，以便雙方依着實行。凡本國所能分担的任務，所能應的軍需，以及所能調用的軍隊，須切實說明，使友邦明瞭本國的實力。切忌粉飾，致將來實際作戰時失信於友邦。如本國的軍需不足，或軍力不足，須大胆的，並大量的向友邦提出求，請其援助。切忌虛驕，致作戰陷於覆敗。聯合作戰計劃經商定以後，尚須商定聯合指揮方法。如本國與友邦所担任戰區不同，則各別指揮其軍隊，自不易發生爭議，只須商定

Academia Historica

聯絡的方法便可了。但在同一戰區有兩國以上的軍隊共同作戰時，則如何聯合指揮，實一易於發生爭議的問題。因為每個國家都願獨立作戰，而直接受其本國將領的指揮。例如前次世界大戰，在德國未為聯軍統帥之前，英美法三國軍隊各有一個統帥指揮，各打各的仗，難於協同動作。何能迅速打敗敵人呢？於是不得不協商聯合指揮的問題。欲解決此問題，不外三種方式：即（一）由戰區所在國任聯合指揮，（二）由出力最多國任之，（三）由戰區所在國任最高聯合指揮，而出力最多國分任實際聯合指揮。聯合指揮確定以後，於較易於協同動作。不過參與國軍隊的聯合指揮，自不如一國軍隊的統一指揮之自由，尚須隨時協商，始可增進聯合指揮的效能。第三須盡力謀求對盟軍的態度。在聯合作戰中，我軍與盟軍相處的態度，宜始終保持友好精神。如何而後始可保兩國以及兩軍的友好精神？我軍在盟國境內，則不宜稍有驕橫的神氣。盟軍在本國境內，則不宜稍有怠慢的樣子。強國與弱國聯合作戰，則強國對弱國不可予取予求，同時弱國對強國也不可事事爭面子。最要緊的事，是切實了解盟軍的精神，而事事善處之。如有大裂痕，則恐聯合作戰中途發生變化，不利於己。凡盟軍聯合作戰，如語言、風俗、企圖、以及民族精神等不同，難免時時引起誤會與責難。要減少誤會與責難，兩國政府代表與兩軍高級指揮官，宜隨時保持聯絡，並舉行會商。通令我軍切實了解盟軍的特性，亦為減少誤會與責難的必要方法。前次世界大戰時，法國不得美國的大力援助，即難得勝利，故法軍總司令告誡法軍說：

目前大局危急，美軍自能舉足輕重。本軍借同美軍作戰之各級軍官，責任至大。本總司令茲有數事特為諸君告：一、應深悉美軍援法之重要。……本總司令深望各官長與美軍談話時，處處應表示傾謝美人助力之意，深表法人感激之忱。二、與美軍官相處，應知美人係大國國民，皆富有自尊心。故吾人與美軍官相處，應避免說短說長。三、應與美軍官極力聯絡，引為知友。人與人之間，相處既久，情感必深，則當辦公事時，雙方友誼當能左右一切。故平時對於美方軍官之聯絡，亦應盡相當之人事。此是之故，我各級官長應與美同志力加聯絡。凡有意見，務須本於友誼態度，誠懇發言，庶使對方徹底諒解，能予信任。美人素來豪爽真摯，原無不易結交之處。今後吾人仍應一本初衷，力謀兩軍合作，吾法前途，有利賴焉。（詳見潘興我之世界大戰經驗，商務有譯本）

現在與我國聯合作戰的盟國家是美英兩國。我國要與美英始終保持友好關係，必須了解美英人的特性而善處之。美人素豪爽真摯，故能為人用錢又能為人拚命。前次世界大戰，美國所以能出兵援助英法，這次世界大戰，美國所以又能出兵，援助中英法蘇的原因之一，即由於美人素豪爽真摯。對於素性豪爽真摯的朋友，便宜用豪爽真摯的態度相處。這一點，似乎是當前我國對美軍應注意的，故引錄以上的話，以作參考。至於英人的素性沉着切實，我國亦宜用沉着切實的態度與之相處。總之，我國對盟軍的態度，應確切認識美英援助的重要，而時時善處之，乃大有於利抗戰建國前途。

Academia Historica

國共問題公開報告以後

張君勱

一、

方今國人愛心如焚，而不知前途稅駕之所者，莫過於下列各問題：

(一)國共問題能在戰爭期內解決否乎？

(二)萬一此問題不能解決，豈非國家又將陷於內戰乎？

(三)國內政權更迭豈非長與武力消長結不解緣乎？

(四)國內之民主也憲政也法治也和平建設也何日而能實現乎？

以上四點可概括於一個原則之下，即吾國之從事於政治活動者，能否裁抑其黨派觀點，而稍為國家前途着想而已。此第二次戰爭之中，在縣合國方面之各國，遂於對外一致之程度者，獨有美英蘇與荷比等國，其他如法、波、意、南、希無一不演成黨爭，因而其內政外交上發生不健全之現象。如法於巴黎陷落之後，有投降者為貝當等，有繼續抗戰者為戴高樂，如意大利，始則與軸心同盟，繼則知德之必敗，乃轉而依附英美。此種主持大政者之舉棋不定，即為國家之國際地位之下降。其在南斯拉夫與希臘，其內部之黨爭，大影響於國內之治安。今年四五月，吐埃及之希腊海陸軍，忽起叛變，宣言贊助希臘自由運動，反對希王與其政府，賴英軍之力為之平亂，同時希王又任命泊幡赫為其首相，羅致各黨派於政府之中，而後希國之變亂消滅。(以上詳情見民憲第六期縣合國之治國與亂國文中)以云南斯拉夫，其始之击抑抗戰者為米哈羅維夫氏，旋以德勢日盛，米氏部隊與德妥協，蘇俄覺察於先，英倫繼之於後，於是抗戰之責，轉移於鐵托元帥之身，英俄兩國皆排米氏擁鐵氏，南王不得已從之，則南國主帥之易人，謂為外人所左右可焉。如是，一國中之各政黨，不能保持其對外一致之態度者，或為軍隊之變亂，或為外國之干涉，乃勢之無可逃避者也。

竊嘗論之，英美政黨，與南希等國政黨，對於國事之態度，所以截然不同者，曰辨之於其人民對國家信心之立不立，與國家自身基礎之立不立而已。外國發明家之有發明品者，呈明政府，載諸公報，由專利局核准，給以專利若干年之證書，而吾國福州沈紹安之漆器，除秘傳於子孫外，至今不以告外人，何也，法律保護不周，盜竊他人之發明而私自仿製習為故常故也。外國人之財產，由其政府收稅機關明白調查，鮮有漏稅之弊；其在吾國豪商大戶之名一旦聞於鄉里與官府，則捐稅之攤派，將不堪其擾，乃以隱匿為藏身遠害之惟一善法。可知權利界限明確且有法律保障之國，人民對於公私大小之事，自掌於公開，而不必有所懷疑與猜防，只須自己努力有所貢獻，即出人頭地，而不必以他人之暗算為慮矣。由此類心理以求之，各國政黨對於國家之態度之所以不同之故，可以瞭然矣。民主國之政黨在憲法上，在政治習慣上，有結社權利之保障，出入議會，掌握大政，所以或勝或敗者，決於選舉時之投票，視其民心之向背，其為人民者，一切有智識有職業，本其自身之意志以定其對於各黨之或贊或否，其為政黨者既有人民意與國家大法為後盾，猶之發明家之有專利保障也。反之名為政黨，在

Academia Historica

，而其背後所憑藉者，或為軍隊，或為金錢，或為政權，或為人民之愚昧，藉威迫利誘使多數人為吾驅使，其勝者雖得意一時，其敗者未必甘心雌伏，乃亦運用軍隊，籌措資金，以圖報復，甚至對外作戰之日，雖舉旗反抗，亦無所顧忌，則此類在朝黨之不容安枕可知矣。抑政黨之制度所以差異若此，亦各國之政治機構實有以致之。民主國之所以立國，曰民意之所在，即政權之所在，亦即法律之所在，伸言之，民意所向，政權從之，法律從之。惟國家既為重器，不可朝夕更張，倘每屆民意之或左，或右，而一切事從頭做起，則每次大選舉之後，即為國事大改造之日，而紛擾將無紀極矣。各國有鑒於此，謀所以縮小黨爭之範圍，於是陸海空軍，置之於黨爭之外矣，選舉後內閣所必需更迭者限於總理與部長若干人，其為公教人員之文官，在黨爭之外矣。立法為國民之大權，非他人所能代為行使，財政為國家預算上之歲入，非政黨之所應染指，此三者亦置之於黨爭以外矣。所以如此者，將政黨干涉之事項愈加縮小，即國家本身之基礎，愈加擴大，反而言之，國家基礎之擴大，即為黨爭地盤之狹小，其為政黨者，於選舉獲勝之後，除自己立朝執政之外，絕無特殊利益可言，政權之所在，乃不成為衆矢之的，而國基亦因以鞏固矣。此則因制度之異同，而政黨運用所以又有健全不健全之別也。

二、

吾人本以上所言，推論國共問題之所以解決，茲先舉九月十六日林參政員伯渠之言如下：

「（一）我們經過七年來的作戰，正規軍已增加到四十七萬，新七千五百人，並組織了民軍二百二十萬人，我們要求政府先給我們五個軍十六個師番號。（二）敵後已建立了十五個抗日根據地……希望政府承認這些抗日民主政權，管理和指導這些抗日政權。（三）我們要求政府，給中共以公開合法的地位，對其他黨派也是如此。（四）希望撤銷對陝甘邊區的軍事封鎖，與經濟封鎖。」

翌日，蔣主席出席參政會，宣布大政方針，其關於中共問題交涉條件，有如下之表示：

「（一）陝北邊區行政區域與組織，除駐軍等問題，可以說已經照從前林彭師長所提的，完全容納。（二）關於軍額問題，中央政府已准其增編為十個師。如果因為兵額多，實有困難，就照林彭師長所提的增編為十二個師，亦可以與商的。（三）關於餉糧問題，十八集團依照中央政府核編以後的部隊，其軍餉糧械，當然與國軍一律待遇，絕不歧視。」蔣主席尤為關心者，為統一問題。其言曰：

「我認為政治解決的基礎，在乎擁護國家統一，尊重國家法紀。……大家都知道政治以法律為基礎，無論何人與軍隊都不能離開法律和紀綱，這是國家立國的基本。……凡是愛國的國民與為國家負責的政府，應該是任何成見都可以捐棄，任何私利都可以犧牲，而絕不可有絲毫妨礙國家統一，毀壞法紀的行動。」

吾人以為統一目的，不論乎統一者不統一者不成國家。惟國家之統一也，全國軍隊立於同種號令之下，不許兩種軍隊相對峙，而醞成內戰，遂至必以甲軍監視乙軍，以減少國家對外作戰之力量。惟國家之統一也，外交政策出於一途，不至發生甲黨親甲國，乙黨親乙國，示外人以與政權出於兩歧之虛度。惟國家之統一也，各政黨同處於國家之下，不至有一黨自命為

居國家之上，而他黨與之對峙者，不必亦步亦趨，惟恐後人，乃合政府所以猜防之者，[illegible]無可否認者也。然統一云者，論理學上所謂共相也，處此共相下之各個體，自有其內容上種種差別，如法之為單一國，固為統一，即美之為聯邦國者何嘗害其為統一，蘇俄聯邦中之各小共和國，各有廣大之自治權，何嘗有損於蘇聯之統一，甚至英帝國中之加拿大，澳洲，南非，各有憲法者，何害英帝國之為一個帝國乎？統一不統一之分，決之於有無兩種軍隊之相循於內戰，更決之於外交政策上之是否一致，倘在此對內對外兩方，有其不能成為一體者在，則其不統一之病象顯然矣。

三、

今日之吾國其有此病象乎，其無此病象乎？如以為無病象，則參政會中，國共兩方所為紛紛報告者，何為而來？吾人以為國共之爭，非邊區之區域與職權已焉，非十八集團之師數多少已焉，非八路軍之聽軍事委員會調遣指揮命令已焉，乃全國黨政軍三方面之基本問題也。此三方面所以調整之者，曰就其是否合於民主國之常規而定其去取而已。

第一、軍。民主國家只許有國軍，不許有黨軍。國軍受國防責任，不管國中各分子所信仰之政治主義如何，同隸於統一的軍令之下，對外作戰之日，共同為國效死。各民主國中，平日養兵極少，甚至有平時不許有大將名稱，（如瑞士）其為陸軍部長與海軍部長者由文官任之，所以表示管軍之人與之軍與政者為議會為政黨，非軍人也。吾黨自北伐迄於今日，常在內憂外患之中，中央軍隊始自抗戰以來不一心抵禦外侮，然因近年十八路軍之自由擴張太而中央軍隊始與之偶然對峙，在新四軍事變中，雙方已曾以兵戎相見，對於西北邊區，自不免有既謂惶惶[illegible]之狀，甚至日人侵入中原與[illegible]中央調動軍隊不能自由自在者亦此故也。今戰事已達最後階段，倘因此種種[illegible]，豈非所得於國內者小，而所失於世界者大乎？吾人以為政府應再明白宣佈軍隊專司國防，不涉黨爭，各軍隊機待遇，一視同仁，各種軍隊中可無須設置黨部，即軍委會指揮之地，亦應調用各方人員共同負責，以示無偏無黨之公心，此軍政之應調整者一也。

第二、黨。民主國家之所謂政黨，即十二中全會決議文中所宣佈之普通政黨之謂也。各政黨成立於國家之下，從未有自認為居於國家之上者。惟國民黨為造成民國之黨，在訓政時期負領導革命與訓練人民之責任，其地位乃較其他黨派為特殊。全國人民之政權，由國民黨代行使之，國家大政大權，操之於國民黨。今則訓政之約束，如去年所宣佈者，為戰後一年以內，如將主席此次所宣佈者，為訓政約束之更加提早，則其為時不過一年半載而已。政府誠於此時將國民黨所居之特殊地位及早改變，豈不證實將主席所謂「決沒有黨派和局部利害得失的觀念」之言，而更將國人所藉之以為攻擊之資者奪之以去乎？此黨務之應調整者二也。

第三、政治。國民黨自認為負有訓政責任，其他位翹然高出於衆人之上，各民主國中人民所共享之一切權利，吾國人民不全有焉，由選舉投票以選定國會議員，吾國未嘗有焉，預算之議決，並經人民同意，吾國尚無有焉，一般人民之請願權利，吾國尚無經對之自由焉，甚至文官之無關於政治之僅為人民以公職為謀身之階梯，而民主國中受文官之保障，不得任意免者，吾國又無有焉。誠認定民國之為民國，與主權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在民之原則，適此者去之而順此者樹之，則天下人民陰然於政府之興民更始，以必進於民主政治之正軌，奚必擁有強軍以事內爭，則所以統一國家之關鍵，豈不卒是矣乎？此政治之應調整者三也。

結論

中華民國之建國大業能否成功之決之於今日之國共關係而已。今日能調解也，斯內部統一而和平建設因以如願進行，否則遷延復遷延，而卅年以來之混亂將因國共問題而復起矣。或尚有人以為今日之難題，戰後反為易事，吾人以為此必無之事也。試問七年之苦戰，吾國頻於危亡之境如今日者，尚不能令國家逆於和平建設之境，而謂敵人退出國境之後，反能優游息鼓乎？此吾人所以謂不解決則已，欲求解決舍今日外恐無他時矣。倘今日竟不獲解決，兩軍長此對峙，尚何餘力以整理財政，本備法幣，更何從而調集資金以整飭國防，實行五年十年十五年之工業化乎？吾人民經此七八年顛沛流離之苦，無復有安居樂業之幸福。而吾國之處於四強間，自身既不能保其治安，尚何能去東亞，與其他三四強抗顏論理乎？此吾人所以對於學後國家將衰存亡關鍵之國共問題，不敢自安於緘默者也。

十月十五日

萬竹樓隨筆（三〇）

弈生

『宋漁父日記』六冊，石印，裏居滬上，友人生平好廷問余從事蒐集近代史料，曾於長沙購以見貽。余當時匆匆翻閱一兩冊，其所記大抵留學日本時之預聞及個人私事，未及終卷。後見李劍農先生所著『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其紀光緒三十二年乙巳七八月間同盟會在東京成立經過一節，錄宋日記數則以資佐證，則時間地點，以及當時留東諸人參與該會之行動言論，均如在目前，實具有第一等史料之資格。此書留上海不及攜出，今後恐不易得矣。又宋先生另著有『閒島問題』一小冊，余曾於長沙定王台圖書館曾一見之。宋被刺後，曾印有紀念冊一厚本，是否將『閒島問題』文錄入，余亦不復記憶。此類史料蒐集頗難，而喪失甚易，殊可惜也。

Academia Historica

實施民主憲政不患其急進，廣泛與澈底

孫寶毅

今日吾國朝野，異口同聲，無不主張中國須走上民主憲政之路。所謂民主憲政，當不指君主，獨裁，或一黨專政之憲政而言，而指基礎屬於全體人民之憲政而言。大原則既一致，吾國之實施民主憲政，似無不可解決之困難問題，然而何以至今尚姍姍其來遲耶？

依余觀之，因對實施民主憲政之時間之遲早，程序之緩急，與夫範圍之廣狹，未能獲得一致之意見之故也。

有一派人主張中國政治應有所「變」，以收面目一新之效，故認為目前應立即實施民主憲政。吾國人民之智識程度，雖甚低落，但彼等之愛國，並不後於智識份子，而彼等之是非標準，並不因其愚昧而不明，是故固在此戰事緊張之際，以政權交予彼等，亦不致於違誤所謂「亂政」。反而可以激發彼等之責任感與政治意識，更進一層認清此次戰爭為彼等自己之戰爭，而加緊其戰時之努力。另一派人則反之，有取一仍舊貫之態度者，有取徐圖變化之態度者，有取徘徊瞻顧與過分謹愼之態度者。

上述兩派人之意見之分歧，歸根言之，實由於第二派人閉目不見今日世界民主政治之潮流。

今日之民主政治，雖非此次大戰中之新發明物，如飛彈，無線駕駛員，飛機與人造海港之類，但與昔日之民主政治相比，名雖同而實質已異矣，是故吾人今日討論民主政治，應從其積極方面與夫其廣大目的方面着眼，不應再囿於舊見，漸漸於民主政治之前提與人民自由之太多。

今日之民主政治實在進取精神，若重於如何擴大人權，以及如何發揮政府之權力，以保護國家之安全與恢宏人民之生活，與昔日民主政治之注重如何保護人權與如何限制政府權力者，迥不相同。人民以應大之權力交予政府，其故何在耶？換言之，人民對政府權力之運用中而膨脹，不但不反對，且認為現代複雜生活中所必需者，其故何在耶？曰人民之權力亦同時擴大，政府須絕對向其負責之故也。所謂負責者何？曰徵求人民之同意，獲得人民之許可，實現人民之意志，尊重人民之權利，與接受人民之裁判是矣。邱吉爾氏曾對意大利之人民言曰：「何謂自由？可由下列簡單而扼要之測驗獲得解答：（一）人民是否有自由發表言論反對或批評彼等政府之權？（二）人民是否有推翻彼等所不贊成之政府之權？人民能否合法獲得實現彼等意志之立法方法？（三）人民之法庭能否不受行政力量之干涉？（四）此項法庭能否執行在人類心目中認為與守禮公正兩大廣泛原則相符合之公開而穩定之法律？（五）不論貧富或私人及政府官吏是否咸獲得公平之待遇？（六）是否每一公民對彼之國家應負責任之各種權利，咸能永遠維持保護並且增強？（七）是否普通自食其力維持一家生計之農工戊能避免一種控制下之密祕警察組織之威脅？」邱氏之言，即不啓為今日民主政治加以註解。今日之時代，一切務求進取與積極，政治亦然。此或乃由於戰爭之迫切所使然，然而大部份則得自過去之慘痛經驗。法國之馬奇諾防線之保守思想，實為促成希特勒興起之主因。今日之民主政治，不但反對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離於「人權

Academia Historica

事之專責的機關，[illegible]自己的事之審判者」之自殺。且過一層認為管理而不負責者，即是專政不即是獨裁。此種絕無民主，今日之民主政治，不但包括上述之政治的民主，且擴而及於其他方面，最要者為經濟方面。關於此，蘇聯曾宣言：「新民主政治，即全民的民主政治，非特包括人權宣言（即政治的民主），而且包括經濟的民主，種族的民主，教育的民主，兩性間的民主。方今世界正在劇變中者，即以上各種不同形式之民主政治，必需混合為一和諧之整體是也。」所謂政治的民主，前已言之矣，至經濟的民主，其意義則為保障人民之最低限度之生活，提高人民之生活水準，以及力求財富之公平分配，種族的民主，則為給予各種不同民族及少數民族以同等之機會，教育的民主，則為保障人民享受教育之平等權利，兩性間的民主，則為保障婦女與男子在經濟上政治上法律上文化上社會上之絕對平等。

以上所言之各種民主，不但須混而為一和諧之整體，且須以人之意志，使之趨向於一個總的計劃。換言之，計劃性為今日民主政治之特點之一。昔日批評民主政治者，謂其效率低下，力量分散，不足以成大事，然由此次大戰證明，民主國家若懸一目標，全力以赴，決非獨裁專政國家所能匹敵，若將此項戰時之經驗，移用於平時，則民主政治之前途，豈可限量哉！蘇聯在戰前已實行計劃，英美自開戰後，始採取各國統籌之各項措施。大戰停止後，英美必將保持戰時措施所產生之優良結果，並將獲得以下之經驗，即實行全國計劃，不必將所有土地工廠及其他一切，均歸為國有或國家管理，除富於獨佔性交通礦業水電及其他公用企業，或有關於國防者，或有關於國計民生者，或便於全國性之管理者外，一切將由私人經營，國家但

[illegible]國家之權力，即是專政不即是獨裁。此種絕無民主，而在國家[illegible]，而在國家是否有[illegible]經統籌之政策而已。

西洋近代民主政治之另一特性，即為世界化。在同一地球上，而有不民主之國家存在，則永無長久安定之望。有人或起而駁余之言曰：蘇聯豈可稱為民主哉！然何以與民主之英美互相合作？由此可知，世界永久和平之「鍵」，不在民主與不民主，不民主之國家亦何嘗不可與民主之國家和好合作。吾人不願與人辯論蘇聯是否民主，吾人所欲言者，蘇聯過去措施者，偏於經濟的民主，但此項民主趨於極端，每將所有權力集中於一人或一階級之手，今後蘇聯或將返而注重於政治的民主。而今後世界之大趨勢，必將調和英美與蘇聯之態度，在兩者之間求一中庸平衡之道，若兩者不求會合，而互相水火，則世界前途，實不堪設想矣。英美雖三國會議之宣言中曰：「世界民主國家之大家庭」必如是解釋，始顯其眞意義。要之，今日世界以民主政治為殊途同歸之利標，乃顯然可見者。美前副國務卿威爾斯氏曾於其論新聞自由中，更進而言曰：「應規定一個國家必能以其憲法或基本大法表現已予其國民以信仰的自由，言論的自由，以及新聞的自由，而使此種自由成為人民不可動搖之權利，否則便不許其成為國際組織之會員」。不民主者不准其參加國際之林，雖為成其個人之意見，但由此可見今日民主政治之世界化為如何矣。

總而言之，今日之民主政治，已非昔日之民主政治，其內容與實質已予以極大之擴大與補充。所擴大與補充者，不外為人民之人權，故吾人稱之為新人權運動，亦無不可焉。因人權已擴大，故吾人今後不必担憂政府權力之發中興影響。政府權

力之增强，與人民權利之擴大，若成正比例，則不但無從濫用，且適足以更有效率為人民謀福利。

吾國今日政府之權力，已相當龐大矣，但吾國人民之人權之保障為如何耶？此所以中國民主憲政問題至今成為問題也。

但若吾人明瞭以上所述今日民主政治之趨勢，則吾人可斷言，吾國應立即實施民主憲政，惟恐其保守，遲緩與零碎，而不患其急進，廣泛與澈底。必如此，始合乎中山先生所提出之『迎頭趕上』口號之精神。此不獨有關於吾國本身今後之政治前途與立國根本，且有關吾國今後在國際間之地位，故特提出以上意見，以就正於國人。

萬竹樓隨筆（卅一）

舜生

方沈衡山先生，今年七十晉一，熱情洋溢，不失赤子之心，嘗撰生，喜勞勩，每晨必沽太極拳片刻，辟若平年如丁日，光足為青年效法。頃以新刊『寥寥集』冊見貽，兼新舊詩，純乎天籟，茲就暫照中各錄數首，以實吾隨筆。五律如『二十六年十月三十日夜歸』云：『微軀不自恕，歷險勉能支。五載逢狐鼠，輪蹄落照時。夜行軍事急，野曠彈聲斷，且撫衣塵坐，將情語愛兒。』仲仙二兄正月三日所寄書感賦』云：『一自書斷，眞如隔死生，片箋隨客至，泉水在山清，慰極忘悲喜，時驚見憔悴。莊莊梧樹處，長憶關關載。』此詩作於二十七年二月，是時張仲仁先生辭寇居蘇州某寺中，『在山泉清，起居獲適。』仲仁先生書中語也。『三十二年三月三十七日因事赴璧山，蒲新連城邀宿正心場別墅賦贈』云：『芳時連野綠，入眼感懷新，路近頻山轉，春寒帶雨侵，移燈傾夙願，抑硯避煩襟，記取可家坳，資閑主意深。』七律如『南泉曉枕賦呈慧揩先生』云：『原韻』云：『如吉論功事把微，昔人進德重知非，心隨山市雞聲動，夢遠鄰園雁影飛，一老匡時殊需謂，卅年共命倍依依，酒情詩興俱衰減，愧向尊前道古稀。』又『無題』云：『蜀道鵑啼事可哀，杯弓燭影費疑猜，相逢綠葉成陰日，難得紅閨不櫛才。無地安巢三匝苦，有心織錦十分灰，自由莫寫雙羅怨，千古家庭是禍胎。』自註：『雙羅謂羅闌羅敷。』七絕如『銜舍桐花』云：『馬鞍山下粉牆邊，一樹桐花紫可憐，憶盡錦江春萬里，低回不及此門前』。『花底』云：『去年詩句帶花香，花底吟詩喜欲狂，今日對花成一夢，更無人識在花旁。』『舊歷中秋』云：『玉臂清輝近更遙，月傷心處禁淚如潮，團圓最是中秋月，不管人間有寂寥。』後兩首蓋皆二十三年後先生悼亡之作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現代學人的責任

——一篇想象的老赫胥黎與小赫胥黎的談話

尤里安·赫胥黎作
張申府譯

譯者引言——本文，「現代學人的責任」這個題目，譯者爲醒目加上的，原題只作「多瑪亨利·赫胥黎與尤里安·赫胥黎：一個想像的晤談」。多瑪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即老赫胥黎（生一八二五，卒一八九五），就是「天演論」那篇名作的作者，由於清末嚴幾道的翻譯，早已膾炙中國學人之口了。（關於他有小赫胥黎的父親楞涅德·赫胥黎的大著「多瑪亨利·赫胥黎的生活與書信」特別可讀。）小赫胥黎名尤里安（Julian）（生一八八七。科學博士，倫作教授），就是他的長孫。達爾文，赫胥黎，何登，馮嘉孫，勳爵芮雷，都後繼有人，都已成爲英國的學者世家了。小赫胥黎也是一個生物學家，兼社會思想家，著作也已等身，與他祖父簡直是一樣的人物，而且大有後代勝於前代之概。他并且是這次大戰中，就我所知，表現得最好，最活躍，最積極，最有成就的學者。前年還出了他一本登峯造極的專門大著「進化：現代的綜合」（Evolution: The Modern Synthesis.）一九四二秋初倫敦亞倫·安文書店出版。大本六四五頁。價美幣二十五先令。在美由紐約哈波書店出版，價美幣五圓）。去年六月爲紀念他祖父「天演論」那篇講演（原名「進化與倫理」，蓋一八九三所作）的五十周年，也作了一篇同類的講演（羅曼納士講演 Romanes Lecture），表示根據現代更進步的科學的新道德哲學或新人生觀，可爲前書的補充，題目是「進化的倫理」（Evolutionary Ethics.）一九四三十一月倫敦牛津大學出版部出版。小本八十四頁。價美幣二先令）。

赫胥黎博士的這篇對話印在他今年四月出版在英特別流行的一本新文集中間。文集名子叫作「論生活在一個革命中」（On Living in a Revolution. 倫敦查託·文都書店與紐約哈波書店出版。美版中本一四加二四二頁。價美幣二圓半。英版價英幣十二先令半）。一共有十五篇文字，除了這篇雖有意極的對話與一篇使人究斷肚腸的「史本納博士：一種傳說的生長」等短文外，主要的還有「論生活在一個革命中」與「戰爭者的世界裏的哲學」等名文佳作。兩篇都曾在一九四二在美國雜志上發表過，一篇在「哈波雜志」，一篇在「福氣」。篇幅都比較長。本文據原註，原爲廣播而作；大概也是在一九四二，曾登在美國另一個叫作「域與鄉」的月刊上。篇幅雖小，所牽到的問題却非常之不少。或者也可使今日中國一般學人開所未

聞，「見」所未「見」（指的見解之見）。所謂爲老赫胥黎的話也都有根有據，并非完全虛造。

著者的最中心意思就是：現在正是一個徹底革命的時代，而革命要用民主方法。「民主，最一般言之，乃是一種動的體制，目的在得到極大多數個人的極大自由與好過與發展」（語見「論生活在一個革命中」一書序言）。同處又說：「這個革命是第一個，科學與自覺的設計能在其中發生作用的」。同時他承認宇宙中確有進步，而人類應當負起推進進步的完全責任。個體的發展就是人類進步的最後準繩。發展了的個人是宇宙過程的最高產品。只是個人除非在有組織的社會裏不能圓滿地或自由地發展。他更認爲價值與科學，道德與科學，或人生觀與科學，應該結合，也可以結合；照科學已作的進步，價值（如善，美，眞）在原則上的是絕對的與在實踐上是相對的，也可以融合。凡此大意，都可說實獲我心。

赫胥黎博士在他那篇「戰爭着的世界裏的哲學」裏對於今日在科學上有基礎的哲學，而且是今日戰時需要的哲學的性能識分，是說得清清楚楚，足快一讀。

關於著者這本新書的詳細內容以及著者的詳細履歷，會當另寫一篇文字來介紹。——一九四四、十二月。

尤里安（有些忤意）：安排這些談話的人告訴我到這兒來，與我祖父，多瑪亨利·赫胥黎，交換幾句話，他是在一八九五，七十二歲之初死去的。這種談話，固然很好，可是就是大英廣播公司又怎能使一個人與幽靈界接觸？——像幽靈界的存在這類僅僅只是意想的特徵，我祖父縱然是小心翼翼地不肯武斷，但他對於這個固與我一樣地不相信。

我還很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同一般小孩子一樣。

多瑪亨利：小尤里安，我也記得你啊。

尤里安：呀！你是什麼呀？

多瑪亨利：你的私人幻想的一個投影。

尤里安：隨便怎樣，這却是一個可用假設。您的成就，不論作爲科學家，還是作爲科學的述說者，究竟對我都已有了很大的意義，在我小時生活與以後的生涯上曾產生了一種極有力量的影響。

多瑪亨利：好能，我們的可用假設，總之沒有理由會阻礙我們的談話。尤里安，你才談到你的生涯。我曉得你也同我一樣，成了生物家了。本來，在你七歲的時候，關於一個生物學的事實，你就曾改正過我，從那個時候，我就知道你有生物家的品質了。

尤里安：我父親常常告訴過我這個。我很願我能記得起那時情形！

多瑪亨利：是的。那是在吃午飯的時候。大家談到動物裏邊父母對兒女的照顧，我曾說在魚類裏邊，找不到那個。於是你叫起來了：「爺爺，小棘魚怎麼樣呢？」呵！大家全都笑了。

尤里安：我打賭您是那樣子。

多瑪亨利：這個事情的妙處就是你是對的。我說的一般道理，就是說魚類不照顧小魚，原是對的。可是當然不是不德有例外。而小棘魚就是其中的一個。

尤里安：好，這眞令人喜歡。我想我那時正是在讀「本巴克」作的講生物學的那些給你的兒童書來啦。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多瑪亨利：我想你是的。……呵，那些時真是快活的時候，至少我們以為是如此。無論如何，比這個混亂的時代來，那時是很快活的。

尤里安：我推想您大概不覺着一九四三是一個很愉快的時期？我甚不以為異。

多瑪亨利：從我所聽到的種種來說，這確乎不是一個適於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家來訪的時候。

尤里安：在您的那些著名的論文中您曾討論過許多論題，但我却不記得有戰爭在裏邊。

多瑪亨利：我想你是對的。我們曾經歷過種種的戰爭；可是我們却從不曾想到，就連無聊着懸想也不曾懸想到，整個的世界竟會又墮落到一種交戰的野蠻狀態，我們也決不曾夢想過你們所叫作全體戰爭的。

尤里安：對於今日這些政治理論又怎麼樣呢？我知道，在，同您那時代的大多數進步的人一樣，也是一個對於德國學，德國文學，德國哲學的偉大讚美者。對於他們關於血與土，關於阿利安與諾地克的種族優越的現代學說，對於他們的迫害思想，只因那照納粹標準是非正統的，或甚至只因它是猶太人的，您又怎樣解釋呢？

多瑪亨利：這真駭人。既知道世界總有些乖僻的人，發現有人相信那樣的胡說，我本一點也不以為異。可是這竟能成了一個偉大民族的正式學說，而且類像是助成它的些軍事勝利，助成它相信自己有命運的許多方面之一——這我却覺着很難想像。

尤里安：那是不可想像的——可是它竟發生。

多瑪亨利：那必也連你們的思想的基礎也搖動了。

尤里安：當然，在您的時代，甚至在我小的時候，那麼樣子像似穩定，那麼樣子充滿希望的，那個世界統系，竟崩潰了；對於這個，我們要與德國，因為不久前在三五年的光景，這紅想紅淺的時期；然後，發生歷史上最輝煌的經濟崩潰；然後，法西斯主義起來了。可是現在還有許多人依然沒有興趣適應，完全見不到，自己乃正生活在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些革命中的一個的正中。

多瑪亨利：那些確是到自己是正生活在一個革命中，但却並不以這事實為樂的人。又您怎樣曉得，我就是正在想要明白看見這種情勢的影響。

尤里安：是的，這種人的反應是有好幾種方式的。有少數人經情於溫和的樂觀，那想對於一天必會發生的新世界預先加以設計。有些——這或者就是其中的大多數——則有意識地悲觀的，更有多數人則想求助於像占星術一類的迷信，或只是求助於僥倖的性樂主義，以求逃避這種不容公認的悲觀。

多瑪亨利：這種普遍的悲觀，我想會使您覺着是我們的時代與您的時代主要的不同點的一點。

尤里安：我倒是覺我最大的力量證明，關於進步及反樂的事情的不可免，不涉於理性的懷疑。可是，誠然，我們時代的一般背景是樂觀的；雖然如此，在增加着；而迷信與信從都在被迫向防禦方面。在某些限度之內，同時樂觀與物質的富有都正在增加着；而迷信與信從都在被迫向防禦方面。在某些限度之內，同時樂觀與物質的富有都正

尤里安：實際上您的時期，您們確是很幸運。照今日我們看來，您們曾佔有雙重便宜，那麼，竟能希望成了合理的，而同時傳

Academia Historica

多瑪亨利：你的話，我不能一定說懂得。在我則我應說，統的思想方式所供給的安隱的架子也還沒有失掉。我們確已大部分把傳統的思想方式都破壞了——至少是神學上正統派的主張與政治思想上過時的威權派統系的主張。

尤里安：是的。可是你們依然還是生活在一個絕對真理與絕對道德的秩然有序的世界。

多瑪亨利：你真能那樣說麼？我們固相信科學精神，所以也相信真理的不斷地增加着的收穫，與錯誤的不斷的破壞。而且我們相信，道德行為的規律與自然界的規律，在只能以觀察與實驗來發見上，是類似的。可是，對於教徒們以及所有那些自稱為據有完全的一組真理與完全的一套道德規則的人的主張，我們却斷斷地不予承認。

尤里安：縱然那樣，縱然您把威權派的真理，威權派的道德，加以攻擊，加以推翻，您所在發見，所在考驗的，那種真理，那種道德，確乎依然還被視為絕對。今日我們真邊，那些最有學的人却常頻把科學與道德，都從一種相對觀點，視為社會的器官，隨着時代的條件在改變。

多瑪亨利：一定你不會否認：道德有一種絕對性質——庶德所叫作「無上命令」的能？

尤里安：那固有被人感覺為絕對的性質。可是，照着現代心理學的些發見，那不過叫作壓抑的那種不無粗野的心理過程的結果，這種過程，我們人人在幼稚時全都經歷過。

多瑪亨利：在我接受這種乍聽好像一種可惜的程度的相對道德觀以前，關於你談到的這些發見，我倒願意先多知道一些。

尤里安：我想請您翻翻幾種翡羅乙德的著作。對於他的些主要結論，像無疑會成有一種內心的拒絕承認，恰像在您的時代許多人對於達爾文的結論都感覺一種拒絕承認一樣。可是一旦那種拒絕被克服，我敢說：您就要覺看那些結論很合人心者開朗。

多瑪亨利：我希望這樣。可是我依然還看不出這些新論與廢能把道德在人生中的存先天重要高貴的地位給混淆了。

尤里安：假使許我這樣說的話，我可以說，那是因為您除了是一個大科學家，還總是一個大道德家的緣故。可是有一問題，直從我還是一個青年，成熟的有名的羅曼諾士講演，「進化與倫理」的時候起，就久想問您的，在那篇講演裏您曾告（我清清楚楚地記得那段話）：社會的道德進步并不依賴模仿宇宙過程，而在反抗它；所謂宇宙過程，今的意思當然是說是說的那種殘酷的生存鬥爭。我既是一個進化論者；因此我不禁得：人自己既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怎麼還能去打發那個就是產生人的過程而還行他的命運。

多瑪亨利：那不是自明的麼？隨便什麼倫理理論不能不受認人生的角鬥場：德行的實踐，對於在宇宙的生存鬥爭上能成功的那種類型的行為，必是反對的。

尤里安：我有點看出您的論點了。但我以為，現代生物學關於這個題目，却有些不無不同的東西要說。今天，八十年後，我們又回頭注意達爾文，當作我們這門科學的奈端，是對這門科學提出了久在等候的那種統一說法的人。……

多瑪亨利：（打斷他的話）：是的，是的，很對。這就他的著作在當時的情形——道照亮了一片黑闇而混亂的風的光。在我第一次讀「物種由來」的時候，我曾對我自己說「簡直笨極了，怎麼竟沒想到這個！」

Academia Historica

尤里安：是的，我記得。而且您還有那種對於一科學家罕有的特殊便宜，就是不但經歷了一場科學的大論爭，而且在使得新理論被人承認上更靈了一個特出的份兒。可是再回到我的論點罷。在您的時候，當務之急是證明進化的事實。但現在生物學已進得超過了那個階段了，對於進化路程，與對於它的些方法，都已建造起來了一幅極其圓滿而詳細的畫圖。

多瑪亨利：自然淘汰的理論，照達爾文所表示的，確乎是很一般；我承認；對於他的某些徒從的搬弄理論熱我總有一點兒懷疑，而且切的有一種更圓滿的具體事實的基礎。那麼，告訴我些關於新發展的情形罷。

尤里安　好，一件就是：我們現在對於進化所由以發生的遺傳與遺傳變化，那種細緻得驚人的機構，已經有了很周密的知識。但現在要把那個講完全，那就要費時太長了；我只能請您把若干講門德爾遺傳說的書包在我的讀物表裏邊。我所以為主要對我們的討論有關的乃是生物家們現在已得了兩個遠大的結論：一個關於生存鬥爭，另一個關於它的結果。

多瑪亨利（回想的樣子）：生存鬥爭——我的朋友丁尼孫曾經把它總括為「自然界張牙舞爪」。

尤里安：這似乎不免過分簡化了。例如，智力似乎就曾在進化上盡過一個爽快力一樣重要的份兒；而且合作也與競爭貢獻一般多過。

多瑪亨利：這確乎攀得起想想。

尤里安：可是這并不是我的主要論點。我們現在已把生存鬥爭兩種根本不同的形式分別出來。一種原本是整個物種反對其敵與反對自然界的些敵力的鬥爭；另一種是物種個體分子間為了飛黃騰達的鬥爭。而這後一種類在物種裏邊的鬥爭可以無論如何對於整個物種也無裨益或改善，在有些例子上并且能夠證明是實際有害的。

多瑪亨利：這似乎是一個謬論，但自然非常常是謬論的，我已準備承認它。在你舍意中，我的「宇宙過程」只代表這種不大有用的形式的鬥爭，而作成人類進步的道德力乃代表那另一種麼？

尤里安：粗略說來，是的。而您這進步兩個字正引到我的第二點。我以為對於一般思想，生物學一向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證明在生物進化上確有進步這樣一種東西。

多瑪亨利：你的意思是說甚至在人以外麼？可是還有退化的事實也要打算上，而且更還有這個事實：一個阿米巴或一個氣子與一個龍蝦的蟲或那天賦最高的人類，對於存續的適應，乃是綠綠都一樣。

尤里安：可是進步一定不因為不普遍或者因為不不可免就不復存在罷？您的那一代曾把進化擺在地圖上；我們這一代已把進化地圖畫出來了。而且我們的解析已經證明：進步只是進化的變化許多種類型之一。誠然，進化的結果大多數都不是進步。許多只是偏偏的變化；許多別的，縱然是前進，却只是一面的前進，命定了終極要達到一個死的歸結。可是一條細細的眞正進步的線穿貫在整個變化之網中。

多瑪亨利：我希望你不是在作循環論證，僅僅從一個人類立場來界說進步。究竟，人不過幾十萬物種裏邊的一種。

尤里安：不是，不是，進步是能夠照一種完全客觀的方式，生物學地來界說的，就是界說為指示增加了的構造的和諧，增加了的對於知識與對於情感的能力，以及增加了的對於自然界的統制，增加了的對於外面種化的獨立不依。

Academia Historica

種擬人觀點去了，只照着你自己的影子來創造進步。

多瑪亨利：我依然還有這種感覺，就是你已經重行滑到一

尤里安：我却不這樣想。事實上，恰是其反。中世曾從人類立場來判斷宇宙；現代生物學家則研究進化的傾向，然後乃看出人類適處在向着進步的傾向的頂點。

多瑪亨利：把人類看作進步的保管人，以代替那創物主麼

尤里安：如果你喜歡這樣說也可以。不論怎樣，覺得在事物上有種標準，有種方向，究全不依附我們自己，這確是種安逸。對着這個背景，這場可怕的戰爭，便可照較好的比例，較好的配景，來看；而我們的努力與受苦，也就顯明是一個範圍遠超過打贏仗這個眼前必要的過程的一部分。

多瑪亨利：這就是科學的禮物的一種：它把我們生活放在寬敞而鼓舞人的幕景當中，縱然超不容許我們有不用努力也可以達到什麼的那種享見。可是最後標準這個命題不免太大了，不是現在所能討論：現在已是我該與你離別的時候了。

尤里安：不要這樣快，好不？

多瑪亨利：這有什麼相干？究竟，我總是你的私人幻想

萬竹樓隨筆

（續一）

辛生

林琴南先生紓，字長蘅，別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人也。以譯西洋小說蜚聲全國，其桐城派古文家及畫家之名，似亦爲其譯才所掩。最初所譯者王子喬墓口述，林筆受，其文格胎息史漢，而以爲小說之原韻出之。當譯是書時，林新喪耦，卒慈寡懼，賴以排悶輯編之餘，曲達男女苦戀之悲，與原作殆雖輕輕。民國二十七年春，余由武漢回長沙，偶於舊書攤上以法幣一枚，購得是書一冊，乃光緒二十七年秋玉情搖館之木刻精印本，竟開完整，自譯此書出版後，商務印書館即倚之爲譯小說之台柱，前後共譯百二十餘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各書原作雖瑕瑜互見，然國人藉此得窺見西洋社會之情況，實林先生有以啓之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太平洋區之中心問題

孫寶毅

太平洋學會已定於今年一月五日在美國佛吉尼亞洲之溫泉舉行會議。中、英、美、加、澳、紐、菲、法、荷等九會員國均將參加，蘇聯是否參加，刻尚未悉。該會爲國際學術機關，其所討論者爲太平洋區之政治經濟外交各問題，其討論之結果，雖對各政府無約束力，但集太平洋區各國代表於一堂，開誠布公，各抒己見，在世界民主大潮流中，自有其意義在焉。本文本「溫故知新」之義，回溯上次該會之討論情形，或有助於吾人瞭解太平洋問題之中心所在也。

上次太平洋學會召開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加拿大之蒙特脫里姆勃蘭特。參加會議者，除中、英、美、澳、紐外，非列賓流亡政府，荷人及爪哇人之流亡在外者，以及戰鬥法國，亦派有代表。又有一效忠於聯合國之泰國代表，與一韓國代表參加。至印度則首次派遣代表參加該會。會議中所討論之主要問題，爲：

（一）聯合國（特別是此等在太平洋中有重要利益之國家）能否共同的或個別的採取某種步驟，以幫助戰事之順利進行，或建立某種民族的政治的與經濟的公道與幸福之狀態？

（二）何種程度及何種方法方可使從第一項所討論得來之結果，成爲聯合國戰時及戰後之實際計劃之基礎？

上述兩大問題乃互相關聯者，苟第一問題不能獲得確定之答案，則第二問題即無從解決。上次太平洋學會初開之際，即提出此兩大問題，隨後十天之辯論，大多由此發覺，而在最後之閉幕會議中，仍不失爲主要之論題。

美國代表以自治領與中國代表爲後盾，表示對英國是否真正遵守大西洋憲章，有所懷疑。英國代表則以荷蘭代表爲後盾，對美國是否保證參加戰後國際安全制度，不再如上次大戰之戰後然，遇回政治的孤立，亦表示懷疑。

美國代表深信此次大戰爲「人民戰爭」，其一切意義已包括於大西洋憲章之中。要之，爲帝國主義之結束是矣。是故，對英首相邱吉爾氏對大西洋憲章之解釋，以及在印度發生之事態，大表不解焉。

英國代表則否認英國對大西洋憲章曾有所保留，並進而提出以下之理論，苟無類似英帝國之聯結世界之組織，即應由英國提供保證，必定參加國際安全機構。

美英兩方代表所爭執之問題，有人稱之爲「惡性循環」。除非美國於戰後確實參加國際安全組織，否則大西洋憲章爲一空頭支票。蓋於美國之政治制度，美國實不能事前有所決定，因之英國惟有固執其帝國機構，而對大西洋憲章理論之發展，有所躊躇不前矣。

該會經過激烈與詳盡之辯論後，遂逐漸認識此惡性循環，並非不可打破者，蓋因此項問題乃屬動的，非屬靜的。易言之，此項問題之解決，端賴於英美同時一致前進，決不可等待他國前進。如兩國互相等待，各取不爭天下先之態度，則此項問題永無解決之日。如欲美國活潑其孤立主義，惟有在戰爭期中，採取若干進步的舉措，使戰後之世界組織中，或能毫無障礙主義之痕跡，反之英稱美國於戰後的發覺此新世界一切皆世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僅不願保住的殖民地主義，則美國對將憲章爲擁護其身之計。在英國方面言之，若對大西洋憲章作進一步之解釋，亦可促進美國輿論日趨於參加國際秩序。英首相邱吉爾氏對大西洋憲章之解釋，確使人發生迷惑之感。彼於該憲章簽字後之第三星期，曾對下院言曰：「在大西洋之會晤中，吾人之心目中，惟圖恢復現在納粹桎梏下之歐洲各國之主權，自主政府與其民族生活，以及規定或將發生之疆界變更之原則。是故，此乃顯然屬於另一問題也。不能與效忠於英王之人民與地區之自治制度之逐漸的發展，混爲一談。」嗣後，彼又聲明，彼之爲首相並非以清算帝國爲其責任。倘若英國明白宣告全世界，大西洋憲章之原則，適用於全球，則此種迷惑自可煙消雲散矣。至於國對其帝國與殖民地之態度，雖含有若干眞實性，第一，苟無英帝國，則英國在德國攻擊之下，或早已不復存在，是故，在世界安全機構未能固建立以前，英帝國確爲世界最其本之安定力，第二，殖民地人民達到自治之階段，其間實有許多困難問題，是故，惟有以逐漸方法解決之，且從軍事安全方面言，亦不能突然予以放棄。英國雖言之成理，然之有據，然而英國對殖民政策之自由主義之趨向，與夫使各殖民地人民達到自治之步調，將大大加速，則以爲世人所一致要求者矣。

七次太平洋學會打破此種性循環後，遂遂而探討應取何種步驟及何種政策，庶使受益更能順利進行，而戰後世界亦更能建立於健全之基礎。會議中曾有人指出，東南亞洲之人民達一萬萬，咸屬歐美統治者之臣民，然而當日本侵略之時，鮮少遭遇抵抗，其故安在，頗值吾人深思，一方面固由於不准土人（非列賓或爲例外）武裝，一方面則由於七人對歐美統治者之憎惡。是故，東南亞洲乃試驗大西洋憲章是否有履行之誠意之最好場所。換言之，聯合國如能在此方面採取各種證明的進步的政治步驟，則不但可以增加盟國間之互信，且可以增強進行戰爭之力量。

該會有鑒於此，於是由到會諸機構一備忘錄，綜合各方對殖民地政策之意見如下：「一、採同意，殖民地政策之基本目標，乃在使世界上現存於殖民地或附屬地位之部分，盡可能早日達到其自治或獨立之地位，其實並不對其在目前狀況之分裂，予以鼓勵。

目標，乃在使世界上現存於殖民地或附屬地位之部分，盡可能早日達到其自治或獨立之地位，其實並不對其在目前狀況之分裂，予以鼓勵。

在推進者，應承認各民族獲得自主政府之時間，應有所不同。殖民地國家一方面接受委託，一方面接受管理。前者指殖民地人民而言，後者指全世界而言。如此之後，各國尤其是各強國，除權利外，尚有責任在焉。彼等經由一適當機構，有權利，同時有責任，以監督殖民地向政治目標之進展。爲求達到此項目標起見，該機構應擴大其職權，而顧及人民之社會的與經濟的福利。其他國家對殖民地之關係，端賴於對殖民地之安全與經濟發展，亦應負起相當之責任，此項責任可以確定方式之保證，保證之，尤以強國之保證爲最重要。此項國際機構可取區域會議之方式，每加之代表爲直接有關之殖民地國家，該區域內之各土著民族，以及在該區域內無土地利益之獨立國家，如美、中、蘇。該機構之任務，須適合於各民族之不同需要，及其進展之不同程度。該區域內任何部分，如已達到自主政府，則該機構之權力，即告終止。」

上次太平洋學會又進而討論太平洋區域安全之機構，認爲該機構應有三大主要任務：（一）形成一狀況，使該區域內之安全不破壞者，不能與逆，（二）根本解決引起糾紛之根源，並於發生後，採取調解與仲裁之制度，立即解決，（三）使用武力以及警察力。關於第一點，因機構成該區域會議之份子，俱屬

Academia Historica

主權國家，是故各國某種內政，區域會議不能干涉之。關於第二點，有人提出警告，決不可聽任糾紛滋長，關於第三點，成問題區域會議應有軍隊，此項軍隊為世界安全機構統率下之世界軍隊之一部分，而交由地方司令指揮，地方司令須有充分權力，執行立時之緊急行動，亦隨時不必等候區域會議，但設立國際軍隊之後，並非取消各國軍隊之責任，各國海陸空軍，雖應有所限制，但仍屬必需，蓋互相等級，非區域軍隊所可解決者也。

因上述之戰後問題，涉及目前最緊急之戰爭機構改組問題。中國代表認為今日之太平洋區及亞洲之作戰機構，主要的仍為美英所把持。重要軍事方針，咸由英美設立於華府之聯合參謀部決定，中國與其他聯合國不能直接參與。聯合參謀部之計劃決定後，交由美國海陸軍將領主持其事。甚至亞洲大陸方面，將委員長名義上雖為總司令，但實際上則必須經由後之美國顧問。太平洋作戰會議，為惟一用以討論亞洲與太平洋之政治與軍事策略之機構。中國在該會議雖為一平等之會員，但該會議之性質，顧問而已。中國代表對此深感不滿，故提出立即成立聯合國行政會議之提議，該會議不僅在戰時具有行政及指導之權力，且將成為戰後集體機構之核心。中國代表所提出之議案，於最後數日之會議中，曾予以詳審之考慮，並通過一謹慎可行之決議案，注重於今日聯合國機構之發展，而逐漸予以改良，使適合於戰後情形。美英兩國把持之嫌疑，應力設法去除之道。聯合參謀部，以聯合國名稱而論，並無組織上之關係，今後如屬可能，應包括蘇聯與中國在內，且應與聯合國其他機構，互相連合，如此之後，始可使全世界週知，進行此次戰爭者，為聯合國，而非單獨英美兩國也。聯合國會議，此次雖其可能，早日成立，在現時情形之下，召集此項會議或需極當時日，但咸認為應立即採取此種趨向於此項方針之步驟也。

以上所述者，為上次太平洋會議之情形，其所討論之結果，已有若干項為英政府所贊成，故有人謂太平洋學會不失為國民外交之有力機構。

太平洋問題為世界問題之一部分，而太平洋之形勢，近一年來亦因世界局面之大改變，而隨之有所改變矣。上次太平洋學會舉行於珠港事變週年紀念之日，當時美國在太平洋中處於防禦攻勢之地位而已。故心緒低沉，仍不可一世。而此次太平洋學會則召開於非列賓陷落之後。從世界整個局勢言之，則召開於莫斯科會議，德黑蘭會議，開羅會議，與英國第二戰場開闢之後。從美國內政上言之，則召開於美國大選之後，亦即獨其可能，早日成立，在現時情形之下，召集此項會議或需極當時日，但咸認為應立即採取此種趨向於此項方針之步驟也。

太平洋區域會議應有軍隊，此項軍隊為世界安全機構統率下之世界軍隊之一部分，而交由地方司令指揮，地方司令須有充分權力，執行立時之緊急行動，亦隨時不必等候區域會議，但設立國際軍隊之後，並非取消各國軍隊之責任，各國海陸空軍，雖應有所限制，但仍屬必需，蓋互相等級，非區域軍隊所可解決者也。

因上述之戰後問題，涉及目前最緊急之戰爭機構改組問題。中國代表認為今日之太平洋區及亞洲之作戰機構，主要的仍為美英所把持。重要軍事方針，咸由英美設立於華府之聯合參謀部決定，中國與其他聯合國不能直接參與。聯合參謀部之計劃決定後，交由美國海陸軍將領主持其事。甚至亞洲大陸方面，將委員長名義上雖為總司令，但實際上則必須經由後之美國顧問。太平洋作戰會議，為惟一用以討論亞洲與太平洋之政治與軍事策略之機構。中國在該會議雖為一平等之會員，但該會議之性質，顧問而已。中國代表對此深感不滿，故提出立即成立聯合國行政會議之提議，該會議不僅在戰時具有行政及指導之權力，且將成為戰後集體機構之核心。中國代表所提出之議案，於最後數日之會議中，曾予以詳審之考慮，並通過一謹慎可行之決議案，注重於今日聯合國機構之發展，而逐漸予以改良，使適合於戰後情形。美英兩國把持之嫌疑，應力設法去除之道。聯合參謀部，以聯合國名稱而論，並無組織上之關係，今後如屬可能，應包括蘇聯與中國在內，且應與聯合國其他機構，互相連合，如此之後，始可使全世界週知，進行此次戰爭者，為聯合國，而非單獨英美兩國也。聯合國會議，此次太平洋學會顯然亦應以新

Academia Historica

眼光觀察之。自羅斯福重選總統後，美惡性循環之一環已不復存在，但美、英、中、法、蘇聯間，對於太平洋問題，若謂意見已完全一致，則不可能之事也。亟待討論與解決之太平洋新問題如下：如何建設東戰事早日結束，如何處置日本，如何建設中國，如何處置由日本手中奪回之太平洋各島，如何確定菲列賓、朝鮮、印度、泰國、緬甸、荷印、越南等國之前途，如何維持由戰爭所造成之加、澳、紐與英美之三角新關係以及如何建立太平洋區之安全機構。在原則上言之，其中心所在，不外三點，曰安全，合作與民主而已。關於此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氏於今年六月間離渝時曾賍要言曰：

「太平洋上之長期和平，其所賴者為：（一）以有效方法永久解除日本之武裝，（二）太平洋區域內之四大主要強國，密邇美英，彼此間以及所有鄰國間隙秩序性質之聯合國家，相互間之諒解與友誼合作，（三）太平洋諸國前亞洲各屬領人民取得自治之機會與利，且須在合理時期，經濟與社會方面，早日採取步驟。使彼等獨領人民，準備於穩定而可能之時限內實行自治。」

安全、合作、民主，豈但太平洋區，將來全人類世界之中心問題，亦無不可焉。

萬竹樓隨筆

（四二）

弁生

樂任公曾手書廉南湖詩集，截至光緒三十四年為止，當時似已印行。但余未見，民國三十年商務所印者，則為崔斯哲君（卓吾）所手書，末附有南海女弟子同壁一跋，則南海入民國後所為之詩已全數錄入。全集凡十五卷，曰汗漫舫詩集，曰萬木草堂詩集，曰明夷閣詩集，曰大庇閣詩集，曰須彌雲亭詩集，曰逍遙齋詩集，曰游存廬詩集，曰納東海亭詩集，曰南海生游成學八年詩集，曰紫天室詩集，曰游存廬詩集。按南海生游成學八年戊午（一八五八），卒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得年七十。始為維新運動之領袖，卒為復辟黨之渠魁，戊戌以前，以趨新為舊黨所仇，入民國以後，又以篤舊為後生所謗，前後不過三十年，其個人所得之毀譽已懸殊若此。然不論事功與學術，南海要為近代史上一極有關係之人物，無可致疑。其門人東莞張伯楨君所述「南海康先生傳」，都數萬言，狀南海之學術思想及一生事蹟，最為詳盡，清史以南海與張勳合傳，為光宣朝列傳之最末一卷，即以張氏此傳為藍本。余讀南海詩集，不甚好之，蓋以其好為大言，喜標榜，與余之個性不入，且以此點疑其一生於政治上無所成就，國學其餘事耳無關係也。

荷蘭的殖民地・東印度

一・導言

西陵

這年頭，寫文章實在不容易，紙張缺，印刷差，資料少，檢查嚴，一切都是制約了，別是文章寫好了，也許送審通不過，就是通過了，也許印刷廠糊塗，「鉛字」鉛字模糊，「花花綠綠」，「標點」，「標點」，「標點

字的新和眞，自然爲是經濟文章者所希望的重要條件，然而新而謬，倒不如舊而眞，因爲舊些究竟還可以拿來做推算的根據，假使新而謬，甚或舊而謬，那末便完全變成無用了。因爲一隻停止的時鐘，到底比了一隻走而不準的時鐘，總有一個準的時候呀！本文所用的統計資料，以一九四〇年以前爲限，其來源或出自荷印中央統計局公佈的數字，或取材於英日文書刊之讀荷文者，這是要向讀者聲明的。

該過了統計，再簡單地說一說南洋的專名，所說專名，係指人名地名物名而言，後二者是寫經濟文章時要常常遇到的。如果作者參攷西文書籍，把專名譯音譯義，而費上一個洋名，便可完全解決，這些譯名雖大都與華僑通用者不能相符，但因費有洋名之故，總不會使讀者墮入五里霧中，假使作者參攷日文書籍，那就不同了，日本人是一種極端愛國的機敏民族，就是在文化方面也有他一貫的作風，所以凡日人所寫的南洋論著，一切專名均用日文字母拼成，例不附加洋名，僅費十年前的作品，或專名之非常怪僻費上一二洋名而已，因此由日文拼音轉成漢名，極易錯誤，推其原因，由於讀音之歧異，二由於來源之複雜（有英文荷文法文及各種土語），三由於作者之不瞭解南洋實情，遂使讀者見了出自日文的漢名，每致無從索解，弊害之大，難以勝言。現在我舉幾個淺顯的例，以明作者對南洋專名的忽略：本年四月十日十二日，重慶大公報載有「戰後我國對南洋之貿易政策」一文，文中述及南洋重要城市時，於馬來一項內引述新嘉坡喬治市萬巴老三名，喬治市究不若檳榔嶼的普通，萬巴老則在西里伯北部，安可移置馬來半島，此因作者信手拈來，遂將馬六甲遺忘了。在東方什誌四十卷第八號中，載有「戰後復興南洋華僑經濟問題」一文，於華僑經濟事業項內，既有風梨園，復有波羅蜜園，「風」也許印錯，應該是「鳳」，至波羅蜜從無稱爲園者，這也許粵人所稱之波羅，而波羅就是鳳梨，國人對波羅和波羅蜜的不分，歷時已久，大勢看來，已有積非勝是的氣概了。「新南洋」爲我國唯一研究南洋問題的機關所主編的什誌，於該誌一卷二期中載有「馬來的對外貿易」一文，在統計表中見有「巴拉加染料」一名，這是出於日文的譯音，我想作者看到此日名時，一定費了不少心思，而結果終不得其解，其實這是世界熟知的樹膠，它的英名是Alecanut，國僑呼爲槟榔，其主要的用途不是染料，是以供咀嚼和藥用，華僑經營此業者甚多。關於南洋專名的錯誤，實在不勝枚舉，以上僅引數例，並非我故意挑眼，我是很誠摯的希望寫作南洋論著的人，連我自己在內，能夠把南洋常用的專名慢慢統一起來，那末對於南洋研究前途，大有裨益，可以斷言，至本文中所用的一切專名，儘採華僑通用的，如係新譯始附洋名。

現在國家已設了專門研究南洋問題的機構，同時有若干政府機關也因一時高興，風起雲湧，成立了不少研究南洋或華僑問題的組織，更有名義上是官民合辦而實際爲少數人操持的南洋團體，所以到了今日，中國對南洋的發生興趣，不但沒有比日本落後，甚至迎頭趕上了。可是這些機構和團體，對國家的貢獻何如，對民族的效用安在，這也許因爲歷史尚淺，正在埋頭研究之中，所可惜的，一個好好的研究機關，任憑一二人的意志，把它當做一種禮物，送來送去，總是送給圈子裏的人，這種令人不可思議的怪現象，眞是世界上任何開明國家所罕有的舉動。像這一類機構，除了供養一羣有關係的人和豢養一羣逃避兵役的王友外，在要希望它對國家民族產生一種有益的作用

Academia Historica

，恐如海底撈月罷。有人拿「辦」和「亂」來形容這麼的一切，這倒不是過火的話，現在研究南洋的機構之多，可以算得辦了，言論之雜，可以算得亂了，但是辦和亂並不是現象，只要辦而整齊，亂而能統一，是不要緊的，你看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進步，豈不是都由辦和亂產生出來的嗎？新加坡馬尼剌吧城河內是各仰光來書不辦，未嘗不亂，可是因為辦能整，亂有統，所以人處其中卻並不感覺過分的麻煩，最怕的是辦來辦去成一團糟，亂無亂亂亂得無頭緒，那就完了，就不可救藥了。現在我很誠懇地希望我們的政府不要像月亮一樣，月雖是相當的光明，但畢竟一邊，總不免意識到好像被一條直徑不滿一尺的圓門所圍住，所以氣魄不大，力量有限，並且把一顆燦爛的星，排斥在外面，這眞是危險萬分的現象。假使我們的政府，能夠由月亮化成宇宙，包羅萬象，那末不但研究南洋問題可以獲得溫暖和光明，就是政府其他的一切一切，也可大放異彩，我滿腔熱誠，祈香祝禱其成功，俾我們在戰後跑到海外的時候，不愧為強國的人民，這樣，猶歟盛哉，豈不光榮！

荷蘭是世界上小國之一，也是世界上富國之一，他的面積祇三萬四千平方公里，人口不過八百六十四萬（一九三七年），所以造成它小國大富的主因，一面敵之，是能統治東印度的緣故。我們根據戰前官方公佈的種種統計來推算，知道世界上消費的橡膠三分之一，錫五分之一，石油十九分之一，都是荷蘭供給的，而金雞納的獨霸天下，更人無不知，此外蔗糖，椰子，棕油，咖啡，茶，木棉，菸草，澱粉（碩莪），胡椒，龍舌蘭等在世界市場上也均佔重要地位，自一八八〇至一九三〇之五十年間，從荷印輸往別國的土產累計之達一百四十萬萬盾（戰前每盾約各國幣二元餘），在此同時間的出超額達五十五萬萬盾，這就是荷印七千萬人民汗血換得的結果，而獲利最豐者當然是荷蘭人。還有各國投資於荷印者，在戰前已超過四十萬萬盾，其中屬荷蘭者在三十萬萬盾以上，以年利八厘計之，荷人於此方面之收益年達二萬萬四千萬盾，小國大富之基，奠定於斯。然荷人之取得這個寶庫，也費了莫大的精神和力量，其始與葡萄牙人爭，繼與英吉利人鬥，而與土侯的混戰更為悠久，此種血肉和彈藥交織而成的歷史，自有專書記載，在此不必細說，我現在僅就經濟觀點，來作一概括的敍述。一五九五年四月二日，繼脫曷率船四艘，離荷蘭東陵，次年六月二日到了爪哇西端的萬丹，此為荷人履爪之始，一六〇二年，日光遠大的荷人，把經營南洋貿易的許多小公司聯合起來，集資六百六十萬盾，創設了操縱南洋商務約二世紀的東印度公司，並且荷王允許它可享代表荷蘭與土侯締約開疆拓土的特權。所以到一七九八年公司宣告破產的時候，荷人在荷印的政治和經濟勢力已根深蒂固了。一六一九年公司的首腦也就是爪哇首任總督高恩佔了Jakatra，為紀念起見，遂用荷蘭民族的名稱 Bata 者改稱其地，此即我僑俗呼之八打威，簡呼為吧城者，此名自一六二一年八月起沿用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日人恢復舊名止，歷時三百二十年，可算長久了。十七世紀之際，荷人統治爪哇的土地僅百分之十六，到十八世紀擴為百分之四十三，到十九世紀始一躍而達百分之九十三，具見其統治的成功，然荷人之能一帆風順，實由於一八二四年春在倫敦締結的英荷條約，經此而後，英人在馬來半島的勢力互相撤退了，換言之，英荷兩國在馬來翻亞的政治經濟，劃分得清清楚楚，各遂其願了，然就整個東印度來說，荷人的治權遍佈每一角落，但其直接統治的區域，不過佔總面積一百九十萬

Academia Historica

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三十，其餘百分之七十是由三百個土侯與荷王締約矢忠上國負責分治的，故在戰前，日人利用此點，交歡土侯密設聯絡，現在這個荷蘭的寶庫已被日本搶去了，日人自然本其一貫政策，扶植土人，所以在去年土人參政之風已普遍實施，近更策劃有使東印度完全獨立的企圖，我想這個毒計到了太平洋決戰的階段，一定會實現的，根據這一論斷，荷人於戰後恢復荷印的治權比了英人恢復馬來亞的治權要困難十倍，殆無疑問，在治權未復之前，要想復興經濟，像荷蘭這樣的小國，當然感到吃力，因此我在來一個創議，貢獻給純樸儉信的華僑，過去美國依存南洋的物資，尤其是依存荷印的物資是非常迫切的，據一九三九年官方的統計，是年由荷印輸入美國的土產計值一萬萬四千五百萬盾，由美輸入荷印者僅六千七百七十四萬六千盾，相形之下，美國是蝕本生意，一望而知。同時美國在荷印的投資也不過一萬萬六千三百〇三萬五千盾（一九三一年末荷印農商工務部發表的數目），是以戰後，美國將大量投資於荷印，顯係自然趨勢，華僑奇能應事會之乘，運用本身的力量，以國民外交的姿態出現，和美人聯絡，共向荷印政府建議，締結一荷美華土（人）四面俱到的協定，讓荷人專致力於政權初還元和商業的重振，同時得荷印政府之保護，讓美華專盡力於荷印經濟之復興和開發，我想我們能出之以純經濟觀念的態度，荷印政府是不會完全拒絕的。這個問題在我們的政府看來，自然不足道，因此政府既不會注意，就是出使外國參加任何經濟會議的代表也不會提出，所以只有希望華僑自己去解決。南洋戰事發生後，僑胞紛散，有些也回到母國的懷抱，有些在印度經商，有些在澳洲靜待，有些在美國做寓公，為什麼不要聯合起來，作未雨綢繆之計，先來從長討論一下嗎？我想化些飛越高山橫渡大洋的旅費是值得的。它將來對母國對華僑對南洋的功績，決不在出使代表之下，不過這種聯合的工作，還是希望我們的政府去發動，才易收效。再退一步想，假使聯美不成，華僑不妨單獨進行，去和留澳的荷印政府協商經濟合作，也不一定沒有希望。倘坐失時機，仍如過去的坐井觀天，各自為謀，則南洋華僑的經濟地位不但不能發展，而且萎頓情形也會有光臨的一日，到那個時候，眞是亡羊補牢，悔之莫及了。這一個淺陋的見解，不但適於荷印，抑且適於南洋各屬，順此提出，促我僑胞覺醒，使政府注意。

三三年雙十節前一日

萬竹樓隨筆

（卅五）

舜生

「我願後來君子，饑寒痛癢，當自己兒女關心。」藹然仁人之言，聞出溫江陳君手筆，現在成都之慈惠堂，即育嬰堂舊址，該聯至今猶在云。

民沙玉船山先生祠堂，在曾文正公祠堂之側，余亦記其一聯云：「慟哭西臺，當年航海行師，知己猶餘盟相國。」「縛棲南嶽，今後名山述作，同聲惟許顧亭林。」民國初年，曾文正祠已改為烈士祠，「抗戰中長沙燬於火，不知船山祠今尚存否？（第十期記范君所述趙藩一聯，「能公心則反御自安」云云，公心係攻心之誤，特此更正。）

Academia Historica

組織國際機構的理由

崇實譯

歐洲大陸從納粹手中解放出來以前，第切需要的一個政治上一致行動的方針。歐洲各國間和國內的分裂，實使希特勒於一九三九年征服他們時，得到大大的方便。有許多分裂，現在仍舊存在着，並且由於戰爭和內鬨的慘酷經驗，更是惡毒和激烈了。如果聯合國幸苦得來的軍事勝利產生結果的話，對於我們如何好好利用勝利這件事，確應該在事前得到一種諒解。軍事同盟嗎？還是建立世界機構？

最麻煩的，在戰事快到最後階段的今日，對這問題有兩種根本不同的意見，有一派認為在戰爭的緊張情緒鬆懈以前，除非成立一個國際機構，不然，不但歐洲大陸，就是其他大陸，也不會有安定的日子。美國前副國務卿威爾斯氏，對於這種意見分歧的危機，看得很清楚。他雖然似乎過分樂觀，以為在戰後美國不合重返孤立主義，但他很準確的指出，我們今日的問題並不是在孤立和國際合作之間予以選擇，而是在，「真正的世界機構」和「無限制的擴張軍備，必然隨之而來的全面的帝國主義的軍事同盟」之間予以選擇。更使人担憂的是這個選擇似乎早已由一種議論壓蔽了美國和其他強國的人民的聽聞了，他們認為軍事同盟是國際合作的方式之一，並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只有這種同盟可以保障安全，至少在強國方面是如此，誠然，國際機構而沒有強國間的彼此同意是不能存在的。但是國際機構能否從強國的軍事同盟中產生出來嗎？（十月九日公佈的國際組織建議案中，規定設立安全理事會與軍事參謀委員會，邱吉爾認為是「在國聯掩護之下的一個武裝的大同盟」，這句話的意義如何，實在值得我們深思。譯者附識）我們能否希望有新的東西產生？

四強同盟的趨勢，又內閣歷史家卡爾皮克（Carl Bick er）的警告，予以意外的鼓勵。他說，在戰爭的緊張狀態下不能希望有根本上的轉革，許多人所企求的「新世界」亦不會十分的新。這種警告適與月光燦爛的理想主義者相反，因為理想主義者以為當我們接近戰後的世界，可以引用懷特曼一句話：「我們把所有的過去離棄在後面」。有許多東西仍舊多少保持其原狀，這是千真萬確的事，例如人類生活中的許多實質的東西，很少人希望有些改變。但是因之而認為人類的關係，或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很少甚而根本不會有極大的改變，我則認為這近於接受失敗主義者的態度，並且忘掉了我們大家所熱烈的事實。

在我們一生中，我們親眼看見許多重大的改變，例如偉大的革命，美美的改良。所以我們相信將來也會有新東西出現。如果各國的內部可以變化，何以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阻止其有變化？當然，我們有意阻止它，另當別論。就是在戰爭的時期中，也沒有證明這是對的，因為欲擊敗軸心國起見，聯合國已經發展有效的合作方法，如果這種方法轉而應用於和平時期，確是能大大改善我們的國際生活。我們亦不能忘記以下的事實，即使強國認為許多事物多少可以保持不變，但其他國家的人民不會採取這種無為的態度，例如德國和日本按照他們自己的利益強暴的改造這個世界，又例如全世界的人民希望改變他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現狀。改變之中是否會有進步，這是一個無休止的哲學論題，而且在每一個時代中，都有許多人誠懇的相信，在所有的變革中，都不免帶些危險和不能成功的可能性。

一方面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國與國間的關係，很少希望有改善的可能，一方面又認為所有國家不能永久和其他國家不發生關係，欲解決這個難題，最容易的方法自然是四強或是歐洲的三強同盟。這種理論很容易打動強國的人心，因為他們都認識清楚，他們的國家不但當戰爭之術，並且當戰後建設之術。這種理論的背後，又有一個充足的理由，就是英美蘇不像德日，他們很仁愛的運用他們的權力，所以大家都可以得到好處。這種理論不幸將帶些歷史上所有獨裁者的口氣：「我最知道如何替你們謀福利。」在民主的社會中，不但不反對有一個強有效率的行政當局，並且為現代的複雜生活所需要，什麼「主權」，只是因為它是對人民負責的。如果沒有一個由所有大「小國家派遣代表參加的國際組織，請問四強或三強向誰負責呢？他們既然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和軍事的力量，如果有不負責或有害的行動，請問由誰來阻止他們呢？他們本國人民的公共輿論，或許可以阻止他們，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強國的任何行動，變為謀國家安全的必要舉動是如何的容易。

對國際機構沒有責任之可言，強國又如何運用他的武力呢？是否幫助小國促進他們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呢？還是維持多少不改變的一九三九年的歐洲現狀，有如一八一五年的神聖同盟呢？退一步說，即使英美蘇對於解決前後的歐洲問題，謀得諒解，從希特勒刀底下掙扎出來的歐洲人民，是否願意接受三強的命令呢？任何人如果認為歐洲人民會如此，那是完全忽視了歐洲人民今日的意向。

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急需把聯合國對歐洲的目標明明白白。

（原文見外交政策報告，著者 ANNA MICHELES DEANZ）

萬竹樓隨筆

（卅六）

舜生

景陶告余：國民參政會第三屆參政員嚴君立三，楚產也。原名軍，以嚴軍兩字聯稱不便，遂以字行。民初，畢業保定軍官學校。曾立講社，與同志共為深遠之思，嘉卓越之行。黃埔軍校立，佐校長蔣先生負訓練責，學生多敬憚之。北伐，任師長。寧漢交鬨，不自安，以軍交陳薛館，自引去。民十八，任湖北省政府廳長，不得行其志，走廬山，耕田。抗戰軍興，政府頻電召其出主湖北政，堅辭，卒以辭修任主席，而任嚴以廳長，旋代主席。三十一年解任，被選為參政員。立三與石瑛張難先，號稱鄂中三怪，然其人率能取予不苟，守正不阿，自為怪，實由世俗之少所見也。嚴卒時年五十三，石卒年六十二，張壽已七十晉二，猶健步如壯年，現亦任參政員，著作不輟。所著有「湖北革命知之錄」，嚴著有「禮記大學篇攷釋」，石著有「石蘅青言論集」。

第二戰場開闢日的倫敦情緒

拉斯基著
超然譯

昨天在倫敦的人沒有一個會忘記那些新聞的印象。在街上的人們，走路的步伐，好像都帶着一種新彈力。他們的眼睛裏都有一種光彩，這光彩幾乎四年以來從未照耀過。法國人、波蘭人、捷克人、俄國人、挪威人、比利時人、甚至不易衝動的荷蘭人身上，都可以看出一種新的發光。解放正在開始了。自由的理想不再是討論中說來說去的空洞概念，而是一件使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要變成不同較和快樂的生活的事實。我們已經等待這麼久了，到了今日，我們能夠希望並沒有白等。無論那一個聽過昨天邱吉爾在下院中報告的人，都會感覺到新時代已經誕生了。他並不是過度興奮。我們寧可說他是極愼小心的，使我們知道現正從了的巨大戰鬥是僅僅一個程序中的初步階段，等這程序終了後，千萬人的美夢方能成爲事實。

要議院保持安靜，很不容易。要公共汽車中和地下車中的乘客們不彼此交談，則更不容易。只要有一個叫賣報紙的人出現，就會有一大羣人聚集他的周圍。這是幾年來購報人不能排成行列的第一次，他們只怕得到有新消息報紙的機會錯過了。我想我當時有兩大主要情緒；（一）安慰（二）驕傲：安慰的是這在英國已經有了數百年歷史的傳統，到底能夠得到他的證明。驕傲的是如此巨大的一個組織的功業到底有了勝利結束的切實希望。

昨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這種巨大戰鬥的開始。已經使聯合國成爲一種比雜湊的人民更高超的東西。我們希望，他們已經熔成一個統一體，一個共和國，已經達到了能以一個單獨的面目與敵人相周旋的地位。我覺得我們若說昨天在倫敦的十二種國民，是一種人民，也並不是誇張過甚，他們並不知彼此間有何不同，因爲他們有一個共同希望，就是納粹的脊柱快被壓斷了。久已停止做夢的人，又開始做夢了。

一個法國人邀我到巴黎去過聖誕節；一個荷蘭教授問我願不願意明年到里登大學去講學，一個捷克人說，他自從一九三八年以來就沒有見到他的家庭，但是他知道他的家庭在此同時同刻必定同他發生同樣感想。我想，的確，昨天的十二時中，是沒有猶大人，也沒有希臘人；沒有奴隸與自由人之分。所有在倫敦的人，都是大集團中的一部分，大家的心，都關切着法國沿岸沙灘上登陸的盟軍。

我們聽到轟炸機漫長而震動的隆隆聲音而驕傲。四年前的現在，我們不是在轉着被侵略嗎？而現在是爲解放文化而前進了。我們是在歐洲土地上追擊納粹軍隊。千萬艘的船隻，載着我們的戰士到那個戰場去，雖然千萬人因之死亡，但同時給予我們後代以生命的自由。地下火車裏有一個人對我說，他簡直不敢想像一個沒有卍字（或萬字）旗飄揚的歐洲，而當他提到他是多麼自傲，他的兒子是在第一批傘兵中，他的眼淚忍不住充滿在眼眶裏。

我在牛津街上，看見美國兵同英國兵握手；，而很顯然的，他們彼此從前並未相識。我看見國會裏的議員感動得話說不出來，我發覺同我說話的每個人身上都有一種被抑制住的興奮的空氣。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以為我們不應該低估我們獲得勝利所應付的代價。我們知道牆角裏老鼠的狂怒。我們認清這些抓住德國人民在掌握中而施行暴政於三分之二的歐洲的惡人，如果他們要保全生命，會一切事情都做出來的。我們昨天在一起談論的很多人，懂得納粹投降的時候，我們會遭遇着很多的大問題，並且隱約窺見這大聯盟相互間的關係在造成勝利之中比在勝利獲得之後相處較為容易。

那些對邱吉爾先生和羅斯福總統的意向懷着疑慮與恐懼的人們，至少在今天會發覺，我們的感覺是消失了。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以保守黨領袖的眼光看待邱吉爾先生，縱使明天可能被迫作如此想。我們認他是一個偉大的英國人，雖然他有着同喜馬拉耶山一樣高的過錯，但他從未絕望，他總是給我們鼓勵，他不斷的加強我們的決心。我們認羅斯福是一個偉大慷慨的同盟。也許，明天，我們會請求他對於使他成為傑費遜與林肯的同像的新政的輪廓，下一定義。

最後，我們也沒有遺忘，在克瑞姆林宮中的人們（指蘇聯當局）到底可以看出我們的諾言是與我們的公債一樣的可靠。我們是走向自由大道上，並且永遠不會向後轉。

萬竹樓隨筆

（卅七）　舜生

文人相輕，自古已然，雖碩學通人，亦往往難免。章太炎先生一代大師，文宗漢魏，持論能言人所不能言，其精到處更每發人所未發。嚴又陵林琴南兩先生，均雅擅古文，並各以譯述自顯於當世。顧太炎於嚴林之文，乃深致不滿，其言曰：

「……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復辭雖飭，氣體比於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姿者也。紓視復又彌下，辭無涓選，精采雜汙，浸潤唐人小說之風！夫欲物其體勢，視若蔽塵，笑若齵齒，行若曲肩，自以為妍，而祇益其醜也！與蒲松齡相次，自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眞司馬遷班固之言，』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則復不得比於吳蜀六士矣！……」

殷先生持論矜愼，不開於太炎有所詆諆，林則反脣相稽，於太炎亦抨擊不遺餘力，其言白：

「……庸妄鉅子，剽襲漢人餘唾，以摶搏為能，以餖飣為富，補綴以古子之斷句，塗墨以說文之奇字，意境義法，概置勿講，侈言於衆：『吾灋代之文也！』倘人入城，購搢紳殘敝之冠服，襲之以還其鄉里，人即以搢紳目之，吾不敢信也。……」

自吾人觀之，太炎既非庸妄鉅子，畏廬實亦未可下儕於蒲松齡，嚴又陵功在介紹一時代之西洋思想於中國，初非以文字與人爭短長，凡章林之所云云，以批評之旨趣衡之，固均非持平之論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盟國歐洲遠征軍英國地面部隊總司令蒙哥馬利將軍

柏自譯

諾曼第登陸以前，蒙哥馬利將軍每天忙於檢閱軍隊。他跳在吉普車上，向四周圍着的英國軍隊說：『我到這裏來是看看你們，藉此機會，我可以認識你們，你們也可以認識我。但是我沒有什麼可看的，（官兵們大笑起來）。而你們是多麼少年英俊呀！』他接着說，軍隊中最要緊的事，是官兵互相信任。他很少說到德國兵，他認為德國兵雖然很好，但不能自己思想，只能服從命令罷了。他說，第二戰場早已開闢，盟國機轟炸德國，就是第二戰場的先驅。他給予他的軍隊一種信任，『除非我有打勝仗的把握，不然，我決不會驅使我的軍隊出戰。我們將給予敵人一個重大的打擊，使他們從此不能起來。』官兵們歡呼：『蒙哥！蒙哥！蒙哥！』他跳下吉普車，又向別處檢閱去了。

蒙哥馬利風塵僕僕的與他的軍隊講話。英倫三島上每一個戰士，他差不多都已見過面。他用這種見面和講話的方法，掌握他的軍隊。

關於他有許多近於傳奇式的軼聞。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那一天，他趕到開羅，就任第八軍軍長之職，以前的軍長都是知名之士，如魏菲爾，威爾遜，肯寧漢，李查和奧欽勒克，但他則被認為第二流人物。第八軍軍長之職，本由高特將軍担任，不幸在路上因飛機失事死了，所以才由他代替。第八軍官兵們根本不熟悉他，但他在過去早已熟悉第八軍的戰績了。當時，軍火雖源源運到，但第八軍已經失去了自信。不但不相信自己，且不相信他的將領們。而隔美爾又正在準備攻勢。

蒙哥馬利走進他的司令部，對軍官們說：『你們正在做些什麼事啊？』一位軍官說『正在準備撤退的計劃。』蒙氏說：『趕快撕掉它。』他又看見另一位軍官正在準備軍隊撤退到開羅以東的運輸計劃，他對這位軍官說：『你根本無法運輸，因為我將領其所有，用以進攻。』嗣後，蒙氏出巡檢閱他的部隊，他看見有些兵士在前線的後方挖掘戰壕，他對他們說：『不要再挖了，德國兵不會跑得這樣遠。』

不到幾天，這些軍事傳遍第八軍。士氣頓時由衰靡不振轉而為旺盛。蒙氏召集軍官講話，召集的地點，離前線很近，德國兵很可能跑到講話的聲音。所以開來幾個砲彈。蒙氏說：『很好，讓他們知道我們究竟是那一種人。』

他對軍官們說：『敵人將開始進攻。如果在一星期以內發動，對付或許十分困難，在兩星期以內發動，那末並不十分惡劣，假使等到下旬發動，那真好極，好極！』

『美爾果然在兩星期後發動攻勢，英軍的防線支持住了，七星期後，蒙哥馬利開始艾爾阿拉敏的攻勢。他對他的部下說：『正在開始的戰役，將是歷史上的一個決戰。且將是整個戰局的轉捩點。』但他並不十分担心這次戰役，在英國大砲開始射擊之前的一小時，他在軍中睡着了。他思索片刻，說一段聖經，就沉入甜蜜的睡鄉。

近代典型的總司令，每喜歡把他自己當做大公司的總經理，高高在上的坐在這龐大的行政機構的上面。但蒙哥馬利則認為他的工作好像是一個足球隊的訓練員。他一樣的作風，更像

歷史上的大將，如亞力山大，漢尼拔和薩敵。

作戰時，他每天總要出巡，時常停車和士兵談話：「你好嗎？你有沒有接到家信？你有沒有新鞋子？」他知道他的部隊的給養。有一次，他看見一批改造的皮鞋平的事情？

他關心他的部隊，當作智識份子看，使他們知道他們的任務和作戰計劃的是否適當。在北非作戰時，他時常站在部隊中間，在沙地上解釋他的進攻計劃。

他就對軍官說：「我不願意我的部隊穿舊鞋子，請你趕緊換新鞋子。明天就辦好。」

蒙氏對待他的部隊，當作智識份子看，使他們知道他們的任務和作戰計劃的是否適當。在北非作戰時，他時常站在部隊中間，在沙地上解釋他的進攻計劃。

蒙氏的目的，不但在討好他的部隊，例如供給他們充足的香煙，亦不但在諂媚他們，例如解釋作戰的策略，而是在使他們信任他，對勝利深信不疑。他從不使他們忘記，他們的任務是在戰勝敵人，進攻馬里斯滌時，他召集所有非戰鬥員講話，「明天我們要出擊了，但你們不能和我們一齊去。我只需要能打擊敵人的人。我們不需要食品，不需要音樂，不需要照相，斯以你們不必去。」這批人聽了有些生氣，其中有幾個要求上前線，蒙氏說：「如果你們想去殺死德國兵和我們一樣，這批人歡呼起來，蒙氏繼說：「你們做廚子的，先殺死德國兵，然後煮飯，你們管軍隊員，先殺死德國兵，然後奏樂，你們照相的，先殺死德國兵，再照相，你們理髮的，只要殺死德國兵就是了，剪髮德國兵就不需要理髮。」

他時常說：「我必須要有時間去想想，當他軍長麗泰德必先思索若干，然後躺床上，躺在床上時間亦必先論若干，然後入睡。」

他在戰事的前途都是正確未來，「滿江清，五顏雲眠

無放地圖。在睡眠的那一刻，單裏，惟一的裝飾品，是一張隆美爾的相片。當他躺着，他會看着隆美爾，而自己發問道：「我的前途的腦中想些什麼呢？」他知道他超初很尊敬隆美爾，但後來他覺得他能預料隆美爾的事中次的動作並且十分準確。（諾曼第登陸後，他的對手又是隆美爾，不幸隆美爾現在已作古人了。譯者註）

自他就任第八軍軍長後，他從未在一張文件上簽過一個字，所以將來的歷史家，很難找到他的手跡。他說：「如果我欲某人去做某件事，我必須當面告訴他。」他的部下必須對他口頭報告，他亦口頭回答他們。起草書面計劃和簽字，則是他們的事。

每次作戰時，先由蒙氏思索他的大計劃，然後由他解釋給他的部下，再由他的部下對劃實施步驟。蒙氏的參謀長為高因甘特，就是他剛到開羅時叫他撤掉撤退計劃的那一位。他的行政處長為格閻漢姆。他們都是沒沒無聞，而他則顯赫一時。

他認為一個好將領應該永不失敗。因為一次打敗了，不但役打敗而已，就是他的部下也必對他失去信仰，而不相信他下次次會再打勝仗。因此之故，所以他除非有勝利的把握，決不輕舉妄動。如果他的部下告訴他，沒有力量把這個計劃實施，他就改變這個計劃以適應情況。但一旦發動戰爭，他就勇敢執行貫徹到底，即使在最緊張的關頭，他也從不讓他的部下見到他的疑惑或恐懼。（行伍是一種藝術，除科學知識外，還有許多不可捉摸的變化，做指揮官，就應該注意以下三件事：計劃的周密，理由的充足，和想像的豐富。而最要緊的，是把他的必勝的信念，傳給部下。譯者附識）。

他信任他的部下是如果做錯事情，他要求他們立即加以解

Academia Historica

釋，如果仍認爲不滿意，則老實不客氣的撤職。在戰場上時常發生這類事情，所以成了新聞記者開玩笑的資料。例如在意大利，有一位新聞記者問一位剛從前線回來的記者，前方的戰事如何。這位記者答道：「一切按照計劃順利進行。攻擊開始於七點鐘，在十點鐘蒙哥馬利撤職了這位團長。」蒙氏對這類不快的事，從不猶疑，他很簡單的對這位團長說：「你很好，但不夠好。」下一天早晨就有一架飛機把這位團長送回英國了。

蒙哥馬利和邱吉爾的關係，亦成爲傳說的一部分。蒙氏可以說是最獨立於邱吉爾的一位將領。我們大家知道，邱吉爾本身是一個軍事專家，所以許多英國將領覺得很難不接受邱氏的意見。但蒙氏不容忍任何人對他有所干涉。如果邱氏欲想顧問技術上的軍事問題，他時常發覺，蒙氏所給予他的事實，往往指引他得到與蒙氏相同的結論而已。

蒙氏是惟一的英國將領，不應邱吉爾的召請。一九四三年一月，邱氏召請蒙氏赴卡薩布蘭卡開會，蒙氏回答道，他忙於作戰，不能出席。（這好像史大林回答羅斯福和邱吉爾的態度一樣。譯者註），所以希望還是邱氏自己來突里波利，結果邱氏真的去了。蒙氏又是惟一的英國將領，遣送邱吉爾上床睡覺，蒙氏宣告已到睡眠時間，蒙氏宣告已到睡眠時間，邱氏則坐下來預備促膝作長夜談談，蒙氏：「敗時，不用不挑，勝利，有一位新聞記者問蒙氏：「敗時，不用不挑，勝利，就此離去了。但邱氏仍舊稱讚蒙氏如何。這位記者答道：「一切按照計劃順利進行。攻擊開始於七點鐘，在十點鐘蒙哥馬利撤職了這位團長。」蒙氏對這類不快的事，從不猶疑，他很簡單的對這位團長說：「你很好，但不夠好。」下一天早晨就有一架飛機把這位團長送回英國了。

蒙哥馬利和邱吉爾的一位將領，我們大家知道，邱吉爾本身是一個軍事專家，所以許多英國將領覺得很難不接受邱氏的意見。但蒙氏不容忍任何人對他有所干涉。如果邱氏欲想顧問技術上的軍事問題，他時常發覺，蒙氏所給予他的事實，往往指引他得到與蒙氏相同的結論而已。

蒙氏是惟一的英國將領，不應邱吉爾的召請。一九四三年一月，邱氏召請蒙氏赴卡薩布蘭卡開會，蒙氏回答道，他忙於作戰，不能出席。（這好像史大林回答羅斯福和邱吉爾的態度一樣。譯者註），所以希望還是邱氏自己來突里波利，結果邱氏真的去了。蒙氏又是惟一的英國將領，遣送邱吉爾上床睡覺，蒙氏宣告已到睡眠時間，邱氏則坐下來預備促膝作長夜談談，蒙氏宣告已到睡眠時間，就此離去了。但邱氏仍舊稱讚蒙氏：「敗時，不用不挑，勝時，不可阻擋。」（邱吉爾往往在午夜還不想睡，並且打電話給政治上和陸海軍當局的首腦，）如果你并不不方便，我想和你談談」，可是首相要談談，怎末會不方便呢？所以有一位議員曾對人說：「英國的憲法中是否可以有一條讓首相到了一個一定的時間睡覺的法律？」（譯者附註）。

除戰事以外，蒙哥馬利從未想到其他。就任第八軍軍長不久，有一天，他突然哲學氣味濃厚起來。他說到軍事光榮的易於消逝，他說到將軍失敗後的淒慘，以及人民的易於忘記他的功勳。坐在旁邊的另一位將軍說：「看事情不要這樣暗淡，你的前途是無限的。」蒙氏回答道：「噢！我並不說自己，而是替隆美爾設想呀！」（隆美爾的遭遇，好像蒙氏已經預先見到了。蒙氏現任盟國歐洲遠征軍英國地面部隊總司令，正在攻破齊格菲防線，要到德國境內去打獵。本文摘譯自生活雜誌五月廿五日原著者狄克（譯者附識。）

十一月十一日晚飲沫若先生家既途二十日乘竹輿下神仙口望見南山忽憶其事得句因成一律十二月二日記

衡山

經年不放酒盃寬，霧壓江城夜正寒，有客喜從天上至，感時驚向載中看。新豎共舉荀醪，觸角是誰鬱哥怒，痛哭孤臣俱未足，河山頻遠試憑欄。

（新蜀報沫若譯詩文數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國糧食工業公司

富豐養營　干餅糧雜　稗無漫品　米山製機

總司：重慶正中路大信中廈
電話：四二一九號

營業處：重慶國民路第一劇場對面
電話：三〇一一號

第一支店：重慶棗子池模範區一〇四號
第二支店：重慶米亭子特二號
第三支店：重慶化龍橋正街五十七號
第四支店：重慶南紀門上南騾馬路七號
第五支店：重慶北江正街三十八號
第六支店：重慶棠溪正街五十二號
第七支店：重慶寺林壩正街三十三號
第八支店：重慶生北香國寺正街

提高糧食品質

促進國民健康

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

機器——江北青草壩設有民生機器廠
電水——合川設有電燈自來水廠
物產——重慶設有物產部經營進出口貿易

航業——現有航線

短航

渝陵——陵江分辦
渝長——長壽公司
渝洛——洛磺公司
渝唐——唐家沱公司
渝寸——寸灘重慶一
渝合——合川重慶一
渝北——北碚重慶一
渝棠——棠溪朝天門
渝磁——磁器口天門
渝白——白沙門
渝江——江津北碚
江合——合江北碚
瀘敘——瀘縣敘府
敘屏——屏山敘府
敘嘉——嘉定敘府

長航

渝三——三斗坪東巴
渝萬——萬縣三斗坪
渝瀘——瀘縣三斗坪
渝敘——敘府三斗坪
渝嘉——嘉定三斗坪
萬三——三斗坪東巴

電話
四一九三六

電報掛號
陵陽・長壽・雲陽・均縣・合川・北碚・江津・合江・瀘縣・敘府・嘉定・萬縣・三斗坪・東巴・成都・明昆
四七六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九四一八號

中國通商銀行

我國首創第一家銀行

服務社會達五十年

總分支行處

重慶自貢成都威遠井流

衡桂洛蘭平天西寶成

陽林陽州涼水安雞都

重慶分行：重慶第一模範市場五十號

電話：四一七〇七　四一八〇八

郵政儲金匯業局

是服務大衆的銀行

分局

重慶　貴陽　昆明　桂林　柳州　吉安　衡陽　贛縣　韶關　梅縣　台山

長沙　湘潭　永安　福州　漳州　龍泉　成都　天水　寶鷄　西安　蘭州

經辦

儲金　匯兌　壽險

業務

全國二千餘所郵局代辦本局各種業務

中元造紙廠

自製化學木漿

精造上等紙張

（製造廠）四川宜賓中元新村

電報掛號　郵政信箱　一二三四

（重慶辦事處）中正路一四〇

電報掛號　六一六一

電話號碼　四一五五二

大同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銀行部

重慶：大同街　昆明　國貨路　桂林　桂東路

蘭州：中正路　貴陽　中山東路　柳州　培新路

西安：東大街　衡陽　剛直路　天水　綢常路

儲信部

重慶中一路

電報掛號除昆明（3568）外餘均（7041）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大期定價國幣二十五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聞週報

第一卷　第十二期

短評三則　舜生
（一）從克米亞會議預測戰爭結束
（二）四月二十五日　（三）民主運動深刻化
政治成敗論　陳啟天
法國人權協會之人權宣言　張君勱
民主政治與生存原理　余家菊
一個呼籲　張申府
新年的兩個希望　范樸齋
參政員的人選問題　艸民
法蘭西的國民參政會　沈頌芳
法國內地軍　君適譯
意大利政治前途遠視　抱貞譯
美國遠征地面部隊總司令布來德雷將軍　超然譯
雲孫匯筆八則　陶元珍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十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四川絲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三仟萬元

總公司 重慶陝西路九上二號 電報掛號一一〇八 電話四一七八六

辦事處 南充電報掛號 三台電報掛號 成都四八 陝中四七六七

製種場 北碚 巴縣 南充 三台 閬中 西充 仁壽

繅絲場 三台第五廠 閬中第七廠 重慶李子壩 北碚 上壩 南充平城門 三台第一廠 南充第四廠 三台第三廠

冷藏庫 改良蠶種 改良生絲 絲棉 絲筋

主要產品

正和銀行

存款便當 手續敏捷

△發展社會經濟 △扶助後方生產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押匯 儲蓄 及其他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利息優厚 低廉匯費

△促進戰後建設 △增益羣衆福利

總行：重慶林森路一〇五號

電報掛號：三二二六

電話：一四一六二一

儲蓄部：重慶太華樓街八號

分行：昆明

辦事處：康定

安康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利息優厚 信用穩固

匯兌迅速 手續敏捷

各地辦事處

太和鎮——太和鎮正北街

中壩——中壩北大街

三匯——三匯林森路

總行：重慶林森路四五號

電話：四一四四八

電報掛號：四一四四

金城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及各種儲蓄存款

各分支行處所在地

重慶 成都 自貢 昆明 瀘州 桂林 柳州 梧州 平西 漢中 寶雞 貴陽 長沙 衡陽 辰溪 沅陵 威遠 涪陵 遵義 山井 郡縣 林州 州涼 安中 雞陽 沙陽 路陵

重慶分行

地址：陝西路第229號

電話：42362號（經理室）

42363號（營業室）

民權路辦事處

地址：民權路新生路

電話：42011號（營業室）

41269號（經理室）

兩路口辦事處

地址：中三路（兩路口）2號

電話：2072號

沙坪壩辦事處

地址：沙坪壩正街19號

電話：6259號

信託分部

地址：民族路137號

電話：14615號

中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短評三則

從克里米亞會議預測戰爭的結束

最近美蘇三強在克里米亞所舉行的會議，已由羅斯三頭所發表的聯合聲明充分表現了這次會議的基本精神：

第一、今後民主原則，必在全世界普遍推行，不容更有例外，反之，法西斯主義必被根本撲滅，不容許其以任何形式殘存。

第二、三強間對於歐洲的若干問題，過去在看法上雖有多少出入，但經過這次會議，即一切歸於融洽，可見三強希望戰爭盡早結束的意思甚切，期待和平能垂諸久遠的意思甚誠。

第三、凡對戰爭貢獻愈多的國家，其意見必愈為國際所重視，此可於蘇聯的意見多被英美所重視見之；凡任何一國能本平民主的原則以求得國內的切實團結者，其國家的地位，必為國際所尊重，此可於法國的國際地位驟然提高見之。

我們深深的感到這種精神——即不背理想而又注重現實的精神——不只當前適用於解決歐洲問題，在最近的將來亦必適用於解決亞洲問題。三強間因解決歐洲問題發揮了互讓精神而決得圓結，將來為解決亞洲問題亦必本乎這種互讓精神而繼續團結。三強以團結而愈強，軸心則以次第瓦解而日就漸滅，聽憑日蘇兩國如何掙扎，其終必出於無條件的投降，到底只是時間問題了。

然而這只是原則如此，但一推敲到問題的核心，則橫在我們眼前的，依然是一個艱鉅的前途。在這次戰爭以前，世界是有三個最強的陸軍國，德日和蘇聯，其美在今天雖然對於海陸空三方面都有了極良好的發展，但始終特別偏於敵人的，畢竟還是在海在空，而陸軍作戰所耗的代價却是異常的巨大。尤其英國因為人力的關係，對於陸軍的使用，乃不得不以極端審慎的態度出之。三個陸軍國站在同盟一面的只一蘇聯，因而紅軍成了壓敗德國的決定力量，蘇聯對歐洲問題發言的有力，亦與其軍事力量的進展有關。據一般的推測，日本今天還擁有四百萬至五百萬的陸軍，盤據在中國及南洋一帶的，至少當不下於兩百萬，而對於補充的人力，似不較德國為優，這個力量並不是單靠參軍可以把它全部提出來的。最近敵人在塞班，在菲律賓，在琉磺島的苦戰，雖然遭受了巨大的犧牲，但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敵人還是相當的頑強敢戰。以最近的軍事形勢，敵人到必要時終必全部退出南洋，則他可能把所有的陸軍力量全部集中在中國境內作相當長時間的苦鬥。美國究竟準備以多少力量用在中國大陸以與敵人相鬥？英國除收復南洋以至九龍香港，究竟有多少餘力可與中美合作？中國全部的力量，究竟何時始能統一使用？凡此均屬極可注意的問題。蘇聯在過去以不願陷於兩面作戰，日本以有事於南進，亦不願輕於開罪蘇聯，因此，蘇日間訂了一個五年的中立協定。現在歐洲的戰事既將次結束，蘇聯為爭取全面的和平，為消滅對其自身今後安全的威脅，終必與美英合作以有事於遠東，這是無可懷疑的。但國際間的微妙關係，只能以漸進移轉，蘇聯自身亦須有相當時間的整理與準備；中國要想與三強取得更密切的合作，其自身的

舜生

Academia Historica

問題亦實有待於輕加調整；同時垂死的敵人亦必運用其最後的技倆，覓取其不可必得的機會；凡此種種，均可能使遠東戰事的結束相會的延長，而中國須受更多的苦難，更是勢所必致！但敵人必敗，大勢是已經確定了的，假定中國能民主，能團結，能統一，則中國必可與三強間享勝利，而且勝利的到來還可能提早。反是，則不幾快的事件可能次第發生，國際對中國的觀感，亦可能先後發生差異；何去何從，這大體要看中國自決。時機是異常的迫切了，機會眞可說是「千載一時」，「稍縱即逝」！我們以萬分的誠意，期待關係方面屏除客氣冷靜思考：必須體念今日全國人民的處境是何等的艱難，因之影響其心情者是何等狀態！必須認識友邦對我的關切，這并不只是一種普泛的友情，實在以中國能否以一個團結統一的民主國家姿態出現於今後的國際，將關聯着世界永久的和平與人類的福祉！小己與集團的小利小害，只是一瞬間的過眼煙雲，惟有國家民族的得失利害，才會影響我們子子孫孫的命運啊！

二 四月二十五日

最近的克里米亞會議，除解決歐洲一部分當前的問題而外，同時還決定了在本年的四月廿五日在舊金山召集一個聯合國會議。地點在太平洋的彼岸，時間剛好正是蘇日中立條約在四年前被批准的一個時期，意味當然是相當深長的。現在由美英蘇中法五國出名的請柬即將發出，到我們這本雜誌與讀者見面的時候，距開會的時間也許只剩得四十天左右了。這個會議的主旨，是在產生一個戰後維繫世界和平的有力機構，凡與目前戰爭有直接關係的專項，當然不是這個會議的議題，可是這個會議所代表的一種力量，却可對目前戰爭的形勢，發生很大的影響。我們對這個會議將提出何種有益的貢獻，或有力的主張，我們想負責的政府必定已經在作充分的準備，用不着我們担心，我們現在所願意提出的却只有下面一些很平凡的意見：

一、我們覺得中國的代表出席一個這種性質的國際會議，最好能使舉世明白認識中國已經是一個團結統一的民主國家，即令時間上已經萬來不及，最低限度也要使舉世承認中國確有成爲一個這種國家的明確姿態，與其正在進行趨向這一途徑的明確事實。這個話看來很抽象，其實是非常要緊的。

二、關於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人選，希望政府能以審愼的態度出之，必使我們的代表所發表的意見，能使國際友人確能意識到這是代表太平洋此岸四萬萬五千萬人所發出的呼聲。在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巴黎和會，以及後來在華盛頓召集的收縮軍會議，因其時中國的內部未能統一，以致引起國際上一種不良的印象，我們希望這一次因代表人選的妥善能一播而空之，且預防着若干可能發生的紛擾。這對於中國國際地位的確定，也有密切的關係。

三、中國本來是一個能好和平的民族，但我們的代表在這種會議裏面發言，却並不在如何敷陳我們先民對於和平的統傳理想而近於空談，乃在針對事實提出今後如何維繫世界和平的切實辦法。中國今後已書無傍貸要成爲亞洲各民族的一個領袖國家，關於亞洲一局部，最少遠東的一局部，足以影響今後世界和平的若干特殊事實，我們的代表要必具有充分的認識，然後才能言之有物。徒唱高調固不必有益，俯仰隨人要亦有損一個大國的立場。現在距開會的期間既已不遠，而我方的代表人選，似乎還未確定，對於和平方面準備如何，自然更談不上。我們希望政府要把這件事實認眞的辦一辦，並且要把中國對於

Academia Historica

這個會議的見解能使國民也明白一個輪廓，因爲這種方案的本身在事實上是無須乎過分祕密的。

總之，這個會議的成就如何，將影響今後若干年人類的命運，我們檢討中國自身一切的一切，實在感到使命的嚴重，對於負荷艱鉅而勇於負責的政府，不能不抱有無限的期待。

三 民主運動的深刻化

國內政治的動向，在最近一月餘，頗呈現活潑的氣象。全國人對於實現民主的期待，可以說已經普遍了。可是，中國人的作風，畢竟是中國的：明明看見問題非解決不可，苟可推諉，姑且推諉；苟可延宕，姑且延宕；忽視現實，而專喜架空；抹煞事理，而多憑意氣；小己與集團的利害第一，國家民族的利害第二。我們放觀民國以來這三十幾年的歷史，眞不知放過了若干應把握而未把握的時機，更不知躭誤了若干應辦而未辦的事業！

即以抗戰以來的這八年而論，基礎的良好，實在是空前所未有的：大敵當前，全國一致對外的熱情甚熾；政府領導抗戰，全國的向心力甚堅；假定能本着這樣一個趨勢而妥爲運用，更配合着抗戰後半期這四年以來的國際情勢而預燭於發先，我想不僅四强之一的地位可以永保，全國統一的基石可以早已奠定，甚至連最近一年來民主運動的氣力，也大不必白花啊！不幸中國數千年來歷史的殘影，依然支配着一部分的人心，對於世界新潮的洶湧，實亦受着先天的限制而顯於適應，因此過去的曲突徙薪，既不易爲功，今日的焦頭爛額，乃更難於着力，我想到目前的政象，若干略有實際體會的人們，都是或多或少抱得有這樣悲觀的。

可是，就大勢論，依然不必悲觀：「人之欲善，而不知我，」大家總盼望着爲國家民族爭取光榮，這應該是毫無疑義的；整個世界的局勢，只有民主一條路，我想任何人也莫能自外；戰後必須保持長期的和平，這是今日一切有力的國家所抱的共同趨向，也是事實的必然要求，假如有任何一個國家，尤其是那種得天獨厚在戰後理應對世界繁榮，有所貢獻的國家，如其他在戰後依然不能自泯其內爭，這可能引起國際對她的厭棄，甚至可能被屏絕於國際共同生活的範圍以外，質言之，戰後的新世界，固不容許侵略國家的再生，同時也決不容許任何一個國家自甘墮落，而重爲引起世界糾紛的媒介。凡此均理智所可推，常識所共喻，我們即令對於普通人的良知有時不應予以十分的信賴，但我們終不信利害得失的計較人性是會十分相遠的。

不錯，我充分承認現在的時代是一個人類成見最深矛盾最多的時代，所表現於事實的，我們一面可以看見人類的智慧，一面也可看出人類的糊塗，今日全世界幾千萬人所流的血，可匯爲一股浩瀚的洪流，所遺留的屍體，可凝成一座可怕的山嶽，便是人類智慧而又糊塗的一個有力說明。中國不過是頭髮於這個狂流中的一員，但凡世界上有一種思想，無論這種思想是如何不健全，或大有害於人類，但在中國所發生的影響，依然可以形成一種牢不可破的成見。這種成見可以從人們的思維和行動多方面的表現出來，自以爲是了不得的智慧，實際却是糊塗透頂。今日整個世界的鬥爭，表現得最明白的便是民主思想與法西斯思想的鬥爭，幾座代表法西斯的堅强堡壘終必次第陷落，這是了無疑義的，但是武力的戰勝是一件事，思想的根絕又是一件事，我們如果把它看得過分的簡單，不僅有時可以上

Academia Historica

當沒甚至發出極明起人們一種苟安的情緒而流於自我滿足。

所謂中國問題還有文章的大部份是缺乏研究的，他還有許多的油學阿世之徒，假在海外一個角落裏說謊騙，我們還可以對這般人用來存之不問也罷，但對於解他們若干爲自我打算來得也的苦處，可是我們必得知道，像這樣於西斯中毒的情況，與過去中國數千年歷史逐漸養成的心智，並不是沒有相當的因緣，否則即無發榮滋長形成人們一部份年來可能的成見的可能性。因此，以大勢所趨，就程程度的民主形式，終於是不久要在中國實現的，但假如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們，不從改造思想作更進一步的努力，則法西斯餘毒，依然可能被上一輩民主的外衣，從種種方面來發酵。

所謂思想的改造，須從科學哲學文藝作多方面的努力，初不限於一種政治制度的更張，必全國國民從民主的風習中逐漸培育出一種生活態度，一種新的民主政治制度，才有在中國生根的可能，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民主運動有待於長期的努力，不單止要求其能普遍化，同時還要求其能深刻化。

陶元珍

白旗

孫隨筆

白旗，吾國古已有之，如史記周本紀謂武王時太白旗以麾諸侯，又謂武王繼續於太白之旗，懸旌已顯於小白之旗是也。下及漢代，八旗軍之正白旗，所用旗色，即係純白，（正原作整，後省寫作正。）其與白旗紅邊，要皆用作軍旗，非若兩人以爲乞和或投降之符號也。吾國以白旗乞和，始於鴉片戰爭中廣州之役。黃鈞宰金臺殘淚記云：「英夷進犯廣東省垣，知縣余保純，與紳耆商議，不能禦，則令紳耆商議，不能禦，則令紳耆商議，不能禦，則令

政治成敗論（一）

陳啟天

凡是談論政治，或從事政治活動，或執掌政治權力的人，幾無一不想政治成功。但是近四五十年來的中國歷史，充滿着政治失敗，而迄今猶不見有任何政治成功，其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這個問題，實值得一切關心中國政治前途的人們仔細加以思致。據我看來，近代中國政治歷史所以只見失敗，而不見成功的根本原因，第一由於企圖政治成功的人，多不眞正知道如何才是政治成功；第二由於企圖政治成功的人，更多不眞正知道達到政治成功所宜採用的方法。換句話說，第一由於目的錯誤，第二由於方法錯誤，因而只能得着政治失敗，而無由得着政治成功。

如何才是政治成功？如何便是政治失敗？要正確解答這個問題，首須明瞭眞正的政治成功，必須與一般的政治目的不相違背。換句話說，眞正的政治成功，必須能達到一般的政治目的。關於一般的政治目的，古今中外的政治學家及政治哲學家的說法雖紛歧不一，但實際政治家總須認明「治强」是必得完成的兩大政治目的。這兩大政治目的，是一切國家的基本要求，也是一切政治所必須完成的超碼目的。（按政治目的，除治强外，尚有多種，茲不具論。）如果一個國家不治不强，便是喪有完成這兩個政治目的，也是政治失敗了。要政治成功，則必須完成這兩個政治目的，使國家既治且强，治與强的兩個政治目的，也許在步驟上難於同時完成，尚須分別先後去做。這即是說第一步宜着重圖治而不完全忽視圖强；第二步宜着重圖强，而仍不忘却圖治。只有治國，尚有圖强的可能。決無亂國，而可以倖倖圖强的。所以任何强國，必同時又是治國。任何亂國，必同時又是弱國。要轉弱爲强，必須先行撥亂反治。不先撥亂反治，便無由轉弱爲强了。所以我們可以說，一切政治須以圖治爲第一目的，而以圖强爲第二目的。能初一步完成第一目的的政治，可說是政治一半成功。能進一步完成第二目的的政治，才算是政治完全成功。我們所謂政治成功的正確解釋，應是如此。

不過我國一般人心目中的所謂政治成功，是不是完全如此呢？實在是一個大疑問。從我國歷史上看來，一般人所謂政治成敗，可大分爲兩等：第二等人，以政權在手爲政治成功，在則便爲政治失敗。所以古諺說：「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無論爲王，或爲寇，均只關於一人一姓的事，可以說是個人的成敗，但不能說是政治的成敗。今天張三爲了王，只是張三個人成功，不是國家政治成功。明天李四爲了王，也只是李四個人成功，而不是國家政治成功。如果只以爲王與否定政治的成敗，則我國歷史上曾經稱帝稱王的人，都可說是成功了，豈不是滑稽可笑！然而我國歷史上第一等人所謂政治成功，多不過如此滑稽可笑，豈不更滑稽可笑嗎？其所以滑稽可笑的處所，全在誤以個人成功當做政治成功。又一等人，以能攀龍附鳳，升官發財爲政治成功，否則便爲政治失敗，這等人所謂政治成功，也不外是個人成功。如以個人成功爲政治成功，則凡能攀龍附鳳，升官發財的人，也都可說是成功了，豈不令人嗤笑皆非？然而一般的俗見，多不過如此，令人嗤笑皆非，豈不更令人嗤

Academia Historica

笑皆非嗎？其所以令人啼笑皆非的處所，也全在誤以個人成功當做政治成功。我國政治歷史上的第一等人和第二等人，既均誤以個人成功當做政治成功，所以我國雖經過多次的朝代起伏，總是治時少而亂時多，強時少而弱時多。

我國政治歷史演進到近代，因受世界局勢的影響，已發生一種大變化，即須改用民主政治，代替君主政治，以圖國家的治強。這種大變化，可以說是近代中國政治的新趨向。凡順應此新趨向的政治，始有成功的可能。凡違反此新趨向的政治，必定歸於失敗。滿清政府以違反此新趨向而失敗於前，袁世凱以下之各軍閥政府也以違反此新趨向而相繼失敗於後，這是過去不久的歷史事實，尚爲人所記憶，不待贅述。至於近三四十年中比較傾向民主的政力，每能號召民衆，以推翻反民主的政府，如辛亥革命與十五年以後的北伐，也是一般人尚能記憶的事實，無須多說。不過我國何以迄今猶未能完成民主政治呢？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在此不能詳論。但有「個重要現象，必須指出：即一種勢力，在未取得政權以前，雖較當時的政府傾向於民主，然一經取得政權以後，往往反較其所已經推翻的政府更不民主。讓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我想來想去，亦多半不外由於誤以個人成功爲政治成功而已。未取得政權以前的革命是一事，既取得政權以後的政治又是一事。前一事屬於破壞性質，需要個人犧牲，自不易以個人成功當做革命成功。後一事屬於建設性質，需要政治能力，而政治能力即與革命精神不大同，有充分革命精神的人未必就有充分的政治能力。因此當有革命成功，而政治失敗的危機發生。一個由革命而起的政府，遇着此危機發生時，以有政權在手的原因，便難免不以個人成功當做政治成功，而求快意於一時。從前辛亥革命時，有「革命軍起，革命黨亡」的警語。又十五年以後，有「軍事北伐，政治南征」的警語。這兩種警語，都是諷刺革命成功以後的新貴，多半消失了革命精神，而趨重於個人權利的爭奪，也誤將個人成功當做政治成功了。至於因革命已經成功，而始蜂擁而來的新附分子，多注重個人成功，而不顧政治成敗。自不待說。民國以前的政治多是企圖稱帝、稱王、或升官、發財，誤以個人成功爲政治成功。民國以來的政治，雖名色與從前不同，然仍多不外以個人成功爲政治成功，這可以說是「死人支配活人」，傳統支配現狀。我國所以迄今猶未完成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多半在此一點，值得我們切實加以注意與反省。

我國有一句老話說：「不以成敗論英雄」。這句話的意思，是教我們不要以爲在政治上有個人成功的人，便算爲英雄，否則便斥爲非英雄，以免失平。現在已由英雄政治時代進入了平民政治時代，但我們仍可推演這句老話的意思來討論政治，那便是要不以個人成敗論政治成敗。個人成敗是一事，政治成敗又是一事，二者不可混同。個人的成敗，僅以個人能否達到富貴的目的而定。政治的成敗，則須以國家能否達到治強的目的而定。凡從事政治活動的個人，如能得着富貴，可說是個人成功了，但決不可說是政治成功。因爲政治成功的目的，是國家的治強，而不是個人的富貴。在成功的政治之下，也許另有一種個人的成功，即個人靈藥國家，造福人民，而爲當時所景仰，後世所師法。但此決不是單純的個人成功，更決不是個人的富貴成功。至於通常所謂個人成功，則顯然與政治成功獨立，我們必須嚴加分辨。爲什麼須嚴加分辨呢？因爲一般政治活動者，多過重個人成功，而忽視政治成功，更多以個人成功當充政治成功，致政治永無成功的可能，國家也永無治強的可能

了。我們要求政治成功與國家治強，自必須認清政治成功與個人成功的不同。如認識不清，則大之足以禍國殃民，小之足以淆亂是非了。這一點關係非常重大，凡熱心從事政治以及熱心討論政治的人們，首宜加以注意。

我們嚴格分辨政治成敗與個人成敗以後，可以得着兩種清晰的認識。第一對於政治目的，有一種比較清晰的認識，不致以個人成功當做政治成功，使目的錯誤。第二對於政治方法，也有一種比較清晰的認識：不致以個人成功的方法，當做政治成功的方法，使方法錯誤。一切社會事件，均有一種特定的目的，同時又有完成其目的的必要方法。目的不同，則方法亦應隨之而不同。個人成功，有其特定目的，即前所說的個人富貴。個人欲取得富貴，自須採用易於取得富貴的方法。至於政治成功，則另有特定目的，即前所說的國家治強。國家欲促進治強，又須另採用易於促進治強的方法。如果採用取得個人富貴的方法，以圖促進國家的治強，則方法錯誤，政治是決不會成功的。所以我們不但要認清政治成功的目的與個人成功的目的大不同，尚須認清政治成功的方法與個人成功的方法也大不同。

政治成功的方法與個人成功的方法如何不同呢？個人成功的方法，只求合於個人富貴的取得與保持，而不必講道理，也不必講道德，更不必擇手段，只要有益於個人的成功，任何手段都可採用。這便是通俗所謂「為目的不擇手段」。我們試翻開一部二十四史看看，除少數賢哲外，多是為個人的目的而不擇手段。我們又看看近三四十年的中國政治史，除少數志士外，也多是為個人的目的而不擇手段。可空見慣，便難免積非勝是，至於有人公然倡言政治是不講道理與道德的。不知不講道理與道德的政治，只是個人爭取富貴的勾當，實在算不得政治。政治原是與大家有關的事體，要大家能共同生活在同一政治之下，必須有大家共喻的道理，與共守的道德。我不講道理與道德，他人也不講道理與道德，則大家無由共同生活在同一政治之下了。這種現象，可以說是「亂」，却不是治。採用不合道理與道德的手段來治國，可以說是求亂，却不是求治，要求治，即要求政治成功，則其所用的手段，必須不大違背道理與道德。所以說政治成功的方法，應與個人成功的方法不同。（按此係就世俗所謂政治成功而論，其實依我看來，真正的個人成功，亦須不背於道理與道德。）

瞻視我國政治歷史多數權勢家所慣用的主要手段，大抵不外威脅利誘，而雜以陰謀詭計。偶有一二人能用「文治」的方法來點綴昇平，便會被儒生推尊為「神聖文武」，歌頌不已。在從前君主政治時代，無論是打天下，做皇帝，或是依靠權勢，希圖富貴，多不外求個人成功，只為個人成功，則威脅利誘的手段，也許可以暫奏小效。但現在時代大變了，從前君主時代所慣用的手段，已不合於現在民主政治時代之用了。民國初元的袁世凱不明白這個道理，仍舊採用威脅利誘的手段，以權毀異己，希圖稱帝。結果異己尚未摧毀盡淨，而袁氏已因護國軍突起而失敗了。由此可證威脅利誘的老手段，已不大適於民主時代之用。

威脅利誘的老手段，何以不合於民主政治時代之用呢？這個道理，說來非常顯明，在君主政治時代，天下一統，王者無外，自不容有異己存在，摧毀異己的方法，只有威脅與利誘兩大種，所以從前慣用之。但到了民主政治時代，依據主權在民的原理，人人有權過問政治，自須容有異己生存。如不容異己

Academia Historica

生存，而仍用威脅利誘的壞手段以摧毀之，則顯然違反了民主政治的原理，必爲公論所不許了。如悍然不顧公論，而濫用此種壞手段來摧毀異己，則異己必分爲三路走：第一因受威脅利誘而惰滯，走上積極革命之路，第二因不甘受威脅利誘而養晦，走上消極反抗之路，第三經不起威脅利誘的分子，雖不免暫時變節，然非出於心甘意願，一有機會，即在權門內部陰圖搗亂，以洩宿恨。從前袁世凱視國民黨爲異己，不惜用威脅利誘來摧毀國民黨，當時的國民黨員多半走以上所述的三條路，即是一個例證。一個當權者用高壓的方法迫使異己走上以上三條路，既都無益於政治成功，亦都無益於別人成功。袁世凱不因能用威脅利誘的手段，摧毀異己，而得着任何成功，當時的國民黨也不因被袁氏摧毀而完全失敗，便可證明威脅利誘的手段確實不合民主時代之用。現在提起民國初元的故事來，實在值得我們加以深省啊。

從前有人說：「一部廿四史，都是相斫書。」這句話的意思，特別指明一部廿四史充滿着內戰。內戰的起因，多由於不容異己存在。到轉來說，不容異己存在的結果，必然產生內戰。以內戰相斫，誰也不易得着個人成功，並何能得着政治成功？其結果，相斫不過等於自斫，相毀不過等於自毀而已。過去的廿四史固是如此，民國以來的歷史仍是如此。所以我們研究歷史，雖較世界其他任何國的歷史爲特長，而政治反落後。以我國雖談民主政治已將近五十年，而迄今還未見其成功。如果今後還是相斫相毀，則中國必無倖存於世界的道理。我們要求中國永存於世界，必須參考於國治圖強。要確實圖治圖強，又必須大家放棄相斫自斫，相毀自毀的政治失敗方法，而一致講求共存共榮的政治成功方法。關於共存共榮的政治成功方法，現在世界已試行有效的方案，只有民主政治一種。在民主政治之下，如何才是政治成功的方法？又如何便是政治失敗的方法？這等問題，說來很長，留待另篇再論。

雲孫隨筆

陶元珍

明初人發明泅水袋

馮夢龍智囊補捷智類記云：「太宗（明成祖）以北兵渡淮，時無一卷之日。有人於蘆中取乾猪脬十餘，內氣其中，繫著腰間，泅水而南，得奪舟以濟。」是明初人已發明泅水袋，特其質用猪脬，不若西人用軟木或膠皮之精。其時聊以應用，後無聞改良者，甚可慨也。

蜀人白巾帕首之習

吾川無論男女，多喜以白巾帕首，其習牢不可破。說者謂始於爲諸葛武侯服喪，故俗稱「孔明孝」。蓋屬想像之詞，未足爲據。案馮夢龍智囊補捷智類記云：「耿司馬公定力（定向弟）知成都府，蜀俗不喪而冠素，亟禁之。」則至遲明代蜀中已有此習，尚難更遠推其朔耳。

Academia Historica

法國人權協會之人權宣言

張君勱

吾人既讀威爾斯氏人權宣言之文，而在威氏原書之中，附有一九三六年法國人權協會之人權宣言一篇，蓋已先威氏而從事於二十世紀之新人權運動矣。吾人所深怪者，自法國革命迄於今日，幾時已逾一世紀半以上矣，何以在此百五十年之中，人已視人權問題爲過去者，今則開會也起稿也解釋也，一若蓬勃物又爲世人注意之集中點者，其故安在？曰人權之爲人蹂躪而已。

人權之蹂躪，起於三方，一曰起於政治，二曰起於經濟，三曰起於國際。

所謂起於政治者，自一九一七年共產黨之專政開其端，法西斯與納粹運動之而鍵本加蹂焉。此兩種專政之興，皆以一黨之黨員或與之意見相左者，則不得有言論結社之自由與夫預聞政治之權利，甚且投之圈圈之中，馬克政之間，毀壞人民自由權利者一。自美國獨立法國革命以來，其最重要之立國原則，曰主權屬於人民全體，曰法律爲人民總意之表示，今日專政之制者，皆明標以一黨治國之旨，使人民無南陸選擇，不過徒有虛名而已，此專政之制推翻主權在民之原則者二。專政制度之下其最大之理名爲政見不同，最根本對爲主張不同之人，若此人者逮捕之，拘禁之，或置之於死地，或奪其生命，見地以定人之有罪無罪，則不待法庭之審判而罪案已定矣：此專政之制違反司法獨立者三。此三事始見於一九一七年之俄羅斯革命，其產業以打倒資本主義爲號召，不能除其已以爲遂行己意之地，及夫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之興，既不取消地主與大資本家，又不爲無產者抬高其地位，徒憑少數人之私意，但圖鞏固其地位與遂其侵略野心，而意德兩國大多數之人民，乃在水深火熱之境，豈惟意德，全世界人民之受害不淺矣。

所謂起於經濟者，美國獨立與法國革命之起也，所以反抗帝王之專制與貴族之特權而已；以云社會財富之不平分配則未嘗夢見也。十九世紀之所爭者，曰人民財產之保障，曰營業自由，曰放任政策，彼等以爲人民有從事於農工商業之自由，與其所積蓄之財產之保護，則全社會人民自樂於幸福與欣欣向榮之境。孰知工業革命以來，資本開發矣，富力增進矣。新發明之事物日出不窮矣；然其真能享受科學與技術上所產生之果者，獨少數人而已。以云多數勞工，恃工資度日如故焉，不能有所蓄積如故焉，居室之破敗如故焉，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故焉。一八四八年以降，有工人組合與第一第二國際之發生，其因待遇不公而以大罷工相要挾者時有所聞矣。蘇俄革命與德國魏瑪共和政府成立之日，世人引領以望社會主義之施行，豈知蘇俄處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之中，備備勉圖自保，德國社會民主之政象，竟成曇花一現之局，蓋社會公道之實現，以達於參政勞工之各得其所者，猶甚遼遠也。

所謂起於國際者，近代大工業之興也，起於科學之發明，其出現於市場也，則爲國際資本主義之壟斷。各國之重要物品如汽油，如鋼鐵，如顏料，如藥品，如肥田粉，如電燈泡，如電燈泡，如電燈泡

結合而爲國際間之托拉斯，或曰卡沫爾。貨物之產額也，市價也，市場也，皆由各大生產者經相互妥協之下自操縱自支配之。產額既有限制，貨物不思銷售之地而市價不至暴落，則各大公司永遠不至有虧折之虞，在一方面爲少數製造家之利益，在他方面即爲千百萬消費者之損失，出品之原可以無限製成者，今則以定額限之，依求多供少之原則而享用之者，不能不隱受其害矣。且此種政策施之於落後之國，所以妨害其初萌蘖之工業，使之無以自存，亦即以削弱其國家之經濟地位也。抑經濟雖超越國界而另有結合，至於國家政治方面之衝突，受領土主權之限制，絕無調和之法，於是出之以武力鬥爭，或併吞他國領土，或化之爲市場，或夷爲植民地，或造成勢力範圍，皆所以使之化爲一國之私產也。此種經濟與武力之爭，行之於國際間，或隱或顯，有爲土地之割讓如麟台區，有爲爭城略地如蘇德之於波蘭，有爲牽入强鄰勢力圈之內如巴爾幹半島，要其國家民族之受人壓迫，亦即人權之受人踐踏也。

方今世界上既有此三種現象，其所以抵制之者亦有三策：一曰民主政治之强化，二曰社會主義之實現，三曰國際和平組織之確立。此三種運動之出發點或爲國家本身，或爲社會，或爲國際組織，換詞言之，皆爲個人所屬之範圍而已。

顯然，此三種運動，何嘗不可以人權爲出發點，而定其下手之方乎。方今世界風氣，將各種權力集中於國家，而國家之濫用其權力幾於不知所底止，如驅除猶太人也，禁止人民之言論結社自由也，取締學術自由也，將十九世紀以來所認爲不可移讓之權利者而剝奪之，一若國家之任務乃不在乎保護人民之自由，而在乎剝削人民之自由矣。本宣言第一條之規定曰，人權之享有，不因種族，宗教，意見而生差別，其第二項曰，此不可移讓之權利，無論何時何地應予以尊重，以對抗一切政治的社會的壓迫。誠如是行之，庶幾政府不得以一黨意志，以民族光榮爲藉口，而置人權於不顧。此以各個人人權之保障，謀民主政治之確保也。

社會主義者，每曰生產工具公有。易詞言之，生產工具不爲私人所有，而屬於公共團體，意在使全國人民不分貧富各享有生人之樂之謂也。此社會主義者之目的，既在於財產之公平分配於各個人，其就個人言之，亦可曰各人應有生存權利，工作權利，老病殘廢，應有撫恤權利，乃至工作人員對於生產與分配之計劃，應有參加與監督之權利。庶幾使此管理生產工具與經濟生活之人，不至以公家之委託徒爲一黨或少數人之私利計矣。此以人權之充實限制政府握有經濟權力者之濫用其權，亦即所以保證財產公有之實能爲民造福也，

地球上一日有分土而治之國家，即一日不免於戰爭，戰爭一日不免，即各人之生存一日不能自保。本宣言第十一條規定曰：生存權中含有戰爭之廢止。第十二條曰不論任何情形之下，一國不向他國挑釁。第十三條曰：被侵略之國，得向人類集體請求保護。此自國際方面說人權之擴大，亦即在國際和平確保之條件下，而後人權乃能長久享受也。

抑不僅此三方面問題，可自人權觀點以謀解決已焉。即其爲本體之社會，或國家本身所負之義務，亦不外乎本國家或社會之權力，以謀各個人之發展而已。第十四條之規定曰：以上各種權利，匯合而爲社會之義務，第一、反對各種類之專制，第二、訓練人民盡力於智德之進步，與個人及社會之幸福，第三、灌輸人民以平和與容忍之精神，第四、擴充理性主宰力之發展。如是言之，所謂社會與個人二者相依爲用，相爲表裏可

Academia Historica

也。

民主政治也，社會主義也，國際和平也，不論自人權方面與集體主義方面，皆有其可以下手與進行之法。今日為集體主義盛行之日，在民族光榮之名義下，人權剝奪矣，在社會主義之名義下，人權又剝奪矣。在革命名義之下，人權更剝奪矣。吾人讀法國人權協會之人權宣言，乃知個人與社會之本無衝突，即有衝突而自有調和之法，雖謂此項宣言，示人以二者折衷至當之新塗徑可也。該會於希忒拉登台後之三年，繼承大革命舊宣言之傳統，參照以百五十年來之新局面，而謀所以補其缺失者，乃有人權宣言之補充一文，此吾人所認為應譯述以廣其傳者也。附錄譯文如下：

一九三六年法國人權協會所擬人權宣言之補充。

人權為自然的，不可移讓的，神聖的，於一七八九年之宣言中首先確認之。此項原則，經羅白斯比氏之手，加以擴充，一七九三年為山岳黨所同意，又經一七九三年五月廿九日國民會議所通過，是為第二次權利宣言。但百餘年社會的進化更引起新問題，即特權之廢止與科學進步後新解決方法之開闢，因是昔日政治解放之後，當繼之以生計的民主，是為自理勢兩方言之應有之補充。

第一條　人權之享有，不因男女，種族，國籍，宗教，意見，而生差別。

此不可移讓與非來自他處之權利，附屬於各人人格之上，無論何時何地應予以尊重與維持，以對抗一切政治的社會的壓迫。此至小權利應有全世界之保障，不應准許任何一國拒絕其領土內人民之享受。

第二條　人權中之第一個為生存權。

第三條　生存權所包括者，第一、為母者應受之體恤，第二、小孩身心兩方發展之需要，第三、婦女不受男性凌辱，第四、年老疾病殘廢者之撫養，第五、一切人應分潤現代科學所給予之援助與保護。

第四條　生存權中又包含工作權，各人應有定時工作，同時應享受閒暇之時間，各人所得酬報，應為現代科學技術所造成之幸福中之一公平部分，此項幸福之公平分配（第一）應令男女兩性同能充分發展其德智，美術技術方面之天才，（第二）其不能工作者，亦應享有生人之樂。

第五條　凡工作人員對於生產與分配之計畫有參加之權利或自身出席或另選代表，對於此項計畫之運用，有監督之權利，所以阻制人對人之剝削，所以保障勞工之正當酬報，所以使科學所發展之天然資源，得以充分利用並加惠於一切人民。

第六條　私有財產之或為權利，限於不侵犯公共利益範圍之內。各民族各公民之獨立性，已受侵略性之財產權（如卡特爾，托辣斯及銀行管理制等）之嚴重威脅，故目前第一要事在將此被剝奪權利還諸公共幸福之中。

第七條　意見之自由需要報紙及其意思表示之工具，應自金錢勢力支配中解放出來。

第八條　社會全體之權利之受侵犯，其嚴重等於個人權利之受侵犯，凡人民代表與政府官吏之管轄經濟生活者，不得在其所主管之利益中，藉此營利，爭取地位或受任何酬報。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十九條　各國家對於其他同劃之國家，均有其權利與義務，猶土內人民之與其地域上之國家共同組織而成人類也。本宇宙的民主。與不干涉主義，組織於自由之中，應為各國之最高目的。

第十八條　依人類理論，各國從事於殖民，其中含有兼力侵略之意，但承認為人類幸福計之同胞的協助，此項協助應尊重人類尊嚴與遵守行為之文明標準。

第十一條　生存權中含有戰爭之廢止。

第十二條　不論在任何情形之下，一國不應向他國抗費。國際間一切爭執，應由調停，公斷或終結之國際法廷，以和平解決。任何一國不遵守此所決定者，國際聯盟應採取防止之方法。

第十三條　地球上之各國，共構成一社會。受侵略之國，對侵略國之外。

第十四條　以人類集體為求保護，而各國各有責任協助此被侵略國之義務。

以上各種權利，匯合而為一社會之義務，為人類幸福計之同胞的協助，此項協助應尊重對各種類之專制，第二、調節人民權力於智德之進步，與個人及社會之幸福，第三、謹愼人民以和與容忍之精神，第四、依據法國革命以來傳統，推廣理性公道與同胞之主宰精神於世界之上。

雲　粥　隨　筆

陶　元　珍

粥之記源

余閱書在宋陸游云：「浙西人家，晨起皆啜粥。乃觀宋杜清獻公文集有奏劄云：『今范鎮合五粥後渴望義米，臣筋力雖未强，只得勉從其言，在初八日粥後一往。若遂晨朝參，尚與[illegible]，又當遲以數日。』云云。然則晨起啜粥，宋時已然。且形於奏劄，則知當時上下通行，雖官禁亦習聞其語也。清獻公名範，宋理宗朝宰相。」愚案：東晉末劉裕起兵討桓玄，裕嘗孟昶到教劉道規等屯壯士數十人宿入玄青州刺史桓弘府，時天未明，弘方嚼粥，衆即斬弘。是晨起啜粥之習慣不始於宋代，遠在宋晉時已有此習矣。

紹興幕友

清代幕友多紹興籍，幕友與黃酒，同為紹興之特產。「紹興師爺」蓋成為紹興人幕賓者之通稱矣。蓋王維楨陽湖人序云：「項君者，越人也。越人號稱多才，習文法吏事，而項君益復絕榮，故項君為南京刑部郎中有聲，籍甚。」（明文海卷二十四）是在明代，紹興已多文法之士，選者如項君服官有聲，不選者當館幕而游幕。蓋多師弟相承，游作風氣，遂徧全國，固由相互援引使然，亦由具有專長故也。清末興辦學堂，法學設為專科，又參用西法，頗行新律，紹興幕友，失其長技，乃漸被淘汰。民國初年，各縣承審員，雖間有紹興幕友，而其中，終悉為學校出身者所代替，紹興以外各地業幕者之喪厥舊業，更不待言。今紹興之特產，惟黃酒而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民主政治與生生原理

余家菊

政治制度以政治思想爲其基礎，政治思想又以人生思想爲其輪廓。言政治制度而不及政治思想，固難得透澈之見解；言政治思想而不及人生思想，亦去源頭甚遠。國中言政治制度者多矣，言政治思想者亦多矣，茲篇之作，乃欲就中國根本思想之表現於政治者一爲觀察，以了解吾先民政治風尚之所由來。

一曰治化生生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治春秋者謂元氣。宇宙依氣而成，由氣而始；有政權者當「撫天奉元，養成萬物」。漢書魏相傳，相曰：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宇宙元氣，流行佈施，生生不息，以綿延演進於無窮。其間萬物，各當生生之化，以成其形，以定其性，而分域蓋然，秩序井然，各遂其生而不相陵犯。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爲其生生演化之樞紐者則爲太陽。太陽照臨蒸蒸，爲熱力之源泉，爲風雲雨露之動力。宇宙之所以成其生生化育之功者實有賴於是。人世政治行爲，當順承宇宙化育之意，發揮生生之功能，以遂成萬物之生活。是爲「生長原理」，乃政治最高義所在。

政治既以遂生長爲其最高義，故凡足以妨害人民之生長者皆爲惡。以云刑殺，則曰：刑期於無刑；刑曰：予爲政，焉用殺；則曰：勝殘去殺。以言戰爭，則曰：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則曰：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以云賦稅，則戒暴斂，以期民無不足，而不至轉徙溝壑。以云振濟，則鰥寡孤獨，窮而無告，不能自助者，必爲發政施仁之所先及。以言經濟，則五畝桑，百畝田，雞豚之養無失其時，山林之禁以足其用。以云教育，則忠孝和睦，務使人相助而不相害。故所謂「王政」即仁政；所謂仁政即遂成人民之生長之政治也。

政治設施，當本於種育生成之道，而不當立於權利義務兩相對待之觀念上。若必謂義務始得享受權利者，則被壓殘疾之人，失其履行義務之能力，即喪其生存之權利矣。不必使義務與權利相俱以備行者，則人之教養弱小，有何種權利以享受報稱，而受教養之弱小又以何種義務之履行而獲得教養之權利。推而言之，後代國民，因何理由而使當代人士尊重其福利，而不妄肆斲喪國家元氣，以遺害於其身。故公平之義，正義之說，誠政治設施所不可忽，但非政治之究竟義。政治之究竟義在仁愛，在各竭所能以服務於他人，且其服務，係爲服務而服務，非爲報酬而服務，其聰明英哲之士，服務，貢獻多，乃無可報酬，亦不得以無可受報而漠視斯民之疾苦。故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足見孔子胸懷浩蕩如天。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指示仁政精神亦甚明捷。建立政治制度於權利義務觀念上者，未得窺見究竟義也。

二曰行人類愛　政治既以生生爲第一原則，故凡屬人類，皆欲其各遂其生，而不相陵犯。對外對內，同欲其相安相親。春秋「無駭率師入極。」公羊傳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大夫有罪，貶去其氏，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明不當爲大失。展無駭其民展被去者，以其入極而滅之也。滅人之國，實吾國政治思想所不容。其有殘賊人民，昏亂貪墨之政府，則隣國可興「弔民伐罪」之師，去其戕民之主而解除其人民之倒懸。但亦祇許變易其主政之人，而不得侵其疆土，奪其人民。若欲取其土地，則必須人民悅服始得取之。孟子所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者是也。鄰國相處，救災恤難，有無相通，緩急相助。輕重先後，有內外之殊，而康樂是求，並無人己之別。其國勢如大小別懸不同，則大國當以仁厚之心輔導小國，小國當以實畏之心尊奉大國。所謂「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是也。若夫謂鄰國之利乃己國之害，以至於國有災害而以鄰國爲藪，是皆亂人所言，適以禍國殃民塗炭。吾先民無所取焉。

國際交涉以協和萬邦爲目的。故有興滅國，救弱小之義舉。於同族之間，尤須發揮仁施愛，以興親睦之實。同姓相戰，爲春秋所深惡，正猶國家發起內戰，爲文明世界所深恥也。人生而至於同室操戈，手足鬩牆，則是自私之心與狠戾之氣，交熾並盛。而仁愛之意，不存於應接骨肉之中，其人必爲天下大毒。

華夷之辨，春秋所嚴。蠻夷猾夏，中國深恥。然而夷夏界限，決於文明標準之異同，種族偏見，實爲中國之所絕無。是故華夏而用夷禮，則視爲夷狄；夷狄而用華禮，則等諸華夏。種族異同，判於血統，無可將而混合，血統採合須先有種族平等觀念而後可。文明水準，可依人力而企求其同，且以來往交通逐漸頻繁之故，禮儀文教，亦必然而漸趨於同，以歸宿於四海一家。以文化爲界域，則文化懸殊如納粹之於民主者，則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當深謹防閑之術。在彼此互既同軌，行既同倫之後，則情意交孚，無猜無忌，可融爲一體。是故以血統爲主，則世界壁壘森嚴而不可泯，以文化爲準，則天下可成一家。我國能混合衆族，成爲泱泱大國者，其政治哲學尚同交之愛而不煽種族之恨，實爲一重要原因。

三曰民主自決　人民共遂其生無分於彼此，亦無分於內外，已如上述。唯人民之共遂其生，又非由他人代遂其生，而當許人民自遂其生。統治階級，常從游牧時代之慣語而有「牧之稱，譬統治事業以牧民活動，而謂爲政者職在牧民。牧民要務，不在貫民之鼻而牽之行，以飲以食，而在於「去其害羣者而已。」害羣者是爲強暴，戰其暴，良自得安。良之不安，暴實害之。暴既除，官勿頻事干涉，更不宜桎梏人民手足而專專代人民爲之。故曰：「代大匠斲，鮮有不傷其手者」。「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生人以向上之性，風民以是非之心，於禍福利害之所在。自能辨識而趨避之。即令識有不周，見有不明，先覺者據其所知而告語之，曉諭之，亦即轉瞬豁然，自然樂從。禍福利害之大原則，人人皆能了解，初非苦政治技術，有甚深之艱奧在。倘謂人民爲無知阿斗，而必須與以長期之訓練保育，則聖人與我爲同類，舉凡同類者，莫不相似也。彼訓人者，豈果爲超人乎哉！納粹自視爲天之選民，誕膺天命，以努力拯救世人，而不聽世人自救，故屠毒人類，至於此極！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宇宙演化不息，但有一大力主張而運行之。唯此大力，自在萬象之轉之中，而非超越於萬象之外。若萬象之流行，必待有一超越之力以運轉之，則此超越之力者，是否更須一大力以主宰之？如更須一力，則是循環相須，永無止時。如無所須，則故萬

Academia Historica

象自身不可更無所知。是見人民愚昧不能自主自決者，實妄誕錯亂也。吾人唯當承認「人性善，民智高，」然後能「因民之所欲而欲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然後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夫如是，縱不能「太上因之」，亦當能「利導之」，而不至「與民爭」。與民爭，則泰山壓卵，民必敗；敗則怨；怨則不叛即潰。

政府願人民爲善而有福。唯關於善與福之見解，彼此不必一致。若必待官吏指定爲善爲福，人民始得行之，則官吏所未經指定者，即不得作爲而廢棄矣。官吏不能以一人之身代萬民思而代萬民行，欲世運清明，終須人民有自決之權力。書稱惟皇作極，猶今人言建立中心信條也。政治措施，須有一定依據，於相反言論，自不能兼採並行，譬如既行民主，又行專政，此實無此理也。但建立信條，以爲大衆之共同依據者，正不必於事事之上強迫一切人而一概遵行之。故書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人民必須獲得自由以有爲有守，而後風清俗正，事舉功成。欲發揮人民之有爲精神，又必須使其能依自己之判斷以自求多福，而不可強其祇得依照官吏之指示，以決定行爲，故雖不合於規定，而亦不陷罹於罪咎者，仍當用弘大法則以承受之。倘依照己意以行動，即失去安全保障，則人民必因畏禍而歸於消沉，久之，一切敗壞，而國亦不國矣。專制爲禍酷烈，不僅及於一代而已。

人民欲自遂其生而共保其存，須當發揮其「有爲精神」。凡代人民所作者，皆須限於人民所不能自作者。人民所不能自作而能共作者，則由人民共作之。官吏的職務，祇在鼓舞之，慰勉之，最多加以輔導而已。昔子路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勞之。子路更問；孔子曰：無倦。所謂勞之者，慰勉其勤勞也。所謂無倦者，恆久慰勉之也。人民能依己意以作爲，則人民能享其生，遂其生，而樂其生矣。孟子曰：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勞之來之，使自得之。行政須當鼓舞人民，輔導人民，充當聽人民自動而自得之。官吏非萬能，何能代全國人思且爲。

宇宙遷流不息，人受此遷流不息之德性以成人，故人人皆願有所作爲以冒犯險阻，不顧無所作爲而獲消極之生存。人人皆願發展其生意以有益於他人之生存，而不願束手縛足以聽他人之代其生存。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即宇宙生意所由表現，而人所以體宇宙之德以爲己德者也；若子祇是其代表而已。言政治者，須聽人民自遂其生。

鷓鴣天

訪李幼椿左舜生於陋巷不遇題門而反

門外慚稱長者車，干戈天地此遷蘆，萬言却有平戎策，三畝曾輸負郭居。居處近，往來疏，

行嚴

Academia Historica

一個呼籲

張申府

度歲偷閒，漏讀滬市各報。深感各方所見，自上至下，由朝而野，特如蔣先生的播講，毛先生的演說，左舜生章伯鈞南先生等文章，責任之先生等的獻言，等等，大體上頗有相同的地方，并非根本合不攏來。而一九四五年最要緊的一件事也就是各方面都在抗戰建主的大纛之下，合攏起來。我在年尾作的這個呼籲，大部分所見也與大家從同，但也有一部分比較具體的頗覺仍可供大家參攷。因此願仍在本刊發表出來。

中華自記。三十四年元日。

按我八年以來，許多人民的困苦艱難，原已難以想象，最近湘桂淪陷，黔桂黔南，人民奔波逃難之慘，更是不可言狀。月前敵將窺已逼回桂北，凡屬有識之士莫不承認危機依然潛伏。我們的責任固不在保證敵人是否再來或再犯何處，而在保證我們備有足夠抗敵的力量。假使敵人再西侵滇，而北窺川，我們究將何以禦之？而且我們豈但僅要能夠御敵，我們的最終任務固然在於國境之外，我們一切失土，而得到抗戰的最後勝利。這有在國內，倘不及今立定和平統一穩定基礎，又豈能料定最後是何局面？

在這種情勢之下，推諉等待，徘徊觀望，客氣頗忌，胡混瞞騙，固然只有誤國，只有害事。驚慌逃避，誘惑利望，平驕抱怨，或自暴自棄，鬥意氣，鬧成見，也只是無能無聊，不過大體。至於於此時刻，更不能不有堅決抗敵，公正無私，當然更是可恥萬分，應為國人所不齒。就是浮光掠影，人云亦云，蜻蜓點水，蜉蝣撼樹式地喊幾句空洞的標語口號，道幾之無物的藝術常說，也必於事無濟，不會有什麼好處。不從大處，遠處，根本處着手，不作通盤計劃，總是抱殘守缺，支支節節而為之，也必然有困處。

在目前局面之下，要有濟於事，善於共處，共渡難關，一方面不能不希望全體國人，堅定信心，澈底覺悟，切認個人的安危繫於國家的存亡，再勿作小己一時的利害打算；同時更不能不希望一切有識之士，中流砥柱，堂堂正正，挺身而出，都更切實積極起來，面對國家的危難，認明自己的責任，各本所知所能，切實想出種種以挽救可能的劫數的辦法，也就是挽救國家危機的具體辦法，而發揮偉大的力量，力促其實辦。

在你的部門之內，本分你的專門知識，你看國家應該怎麼辦呢？請你坦白地說出來！這就我對國人的一個衷心的願望。因為這樣，我姑且先就我所看目前以及對將來極端必要的，試寫出幾條大端原理來，以與大家相商榷。非特拋磚所以引玉，也是為的先盡我的一部分責任。

我認為國家目前以及將來打算，主要就積極方面而言：

第一、應即由各黨派，包括國共在內，以及其他社會有力人士，商議協商，訂定共同綱領，成立包括方面的全國一致的統一政府，以增加抗戰力量，以促進政治進步。由此統一政府切實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

第二、地方政治當由中央與地方關係應即本發揚民力，增強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力，平衡發展，互相依存的原則，加以改造，盡量容許人民對於國家政治的興趣，盡量容許地方的自治，避免中央過分的集權。

第三、國共談判應即恢復，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并由其它黨派參加，迅速使一切黨派上的懸案都得到適當的解決。談判進行情形并應隨時儘可能地公開於社會。（戰爭或須用僞，政治則應倘眞。）

第四，應即決定對敵反攻計劃。國內一切武力，并配合盟軍，應即全部用以抗擊敵人。所有盟國武器，裝備，醫藥等項援助，均應公平適當地分配於一切作戰部隊。應即打破一切障礙，切實提高士兵的待遇。對於到來的盟軍應盡量與以方便與優待。

第五、國內一切武裝力量，正規軍與游擊隊，應在統一的最高統帥指揮之下，取得最必要最密切的配合，以增進對敵的效率。

第六、對於淪陷區一切抗敵力量應儘可能予以最大接濟；對於敵後受難人民應儘可能隨時予以必要的安撫；對於收復區域應儘可能依照計劃舉辦革新的復興建設。

第七、應即進行大後方的民衆組織，并隨離敵遠近分別先後把民衆武裝起來，照辦民團或民兵。

第八、應即進行各集邊疆各民族會議，談得最親切的聯繫，啓發其潛蓄的力量。

第九、立即加緊推進與英美蘇等盟邦的友好關係，派遣特使與民間訪問團，分赴英美蘇等盟邦，一方洽商對我進一步的援助與軍事配合，以期戰後互助關係，一方增進彼此的了解，共同奠定戰後國際和平的基礎。儘可能努力參加盟邦鉅頭國際會議。在國內并應力排大體，嚴厲消除一切對各盟邦的誤解與怨望。

第十、應由政府有關各機關，立與全國工商界代表，切實商訂增產辦法，即行協同執行，以增加抗戰實力，并以安定後方民生。今日生產事業仍應偏重人民自發自管，政府應予以發展的方便，施以裨益全盤發展的調劑配合（設計或計劃化的意思主要也不外此），而不應加以過分干涉統制。國營事業還應重在示範，而不重在爭利。農業與土地租佃關係應即採行地主與農民雙方兼顧的改革。

第十一、應即就全國各方面有理想有學識了解世界趨勢兼有教育經驗的人士成立戰後教育學術設計委員會，切實周到地設計戰後教育的根本改革與戰後科學的普遍發達。目前研究專業應即參攷蘇美英成例力使與國防與生產緊密接合。對於目前尚在施行的奠化教育，應即予以廢除，對於學生學習教師講學應即予以極大的積極自由，以期學術研究與青年思想得以煥發。同時脚踏實地提倡堅實深厚宏毅的學風。

第十二、一切政治上、行政、業務、機構、人事、應即澈底檢討，屬行簡化，務期合理，增高效率。對於一切財政、金融、經濟、交通、運輸、兵役、物價，以及各項公用事業，均應嚴格站在國家與全體人民立場，重定適時的政策，施行澈底的革新。

第十三、統一全國救濟與慰勞與徵募機關，由政府與人民合組，採取分工合作辦法，切實舉辦救濟與慰勞事業，隨時詳盡公布其進行結果，以加强信用。

第十四、由各黨派以及其他社會有力人士合組戰後和平計劃委員會，就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社會教育學術文化各方面妥擬

Academia Historica

戰後和平計劃，國際國內都努力促設保持和平機關，既以避國際戰爭的再起，也以防國內鬥爭的發生，以期國際國內都得和平順遂地發展。

在國家目前這樣危局之下，并在應該迅求勝利而且痛定思痛的時候，凡屬國人都應只知有國，不知其它。今日最要之義約說是把全民族一切力量，不論人力物力，都爲國家動用起來。人人應該時時體念「貨惡其及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的名訓，把貨把力都爲國家發出來，用出來。同時盡力合政與民爲一體，盡量保持舊來「政不擾民」的傳統。上來的十四條，就是完全本着這些意思寫的。如果無當，只盼大家拿出當的來，倘或有當，願大家也不吝與以充實發揮。

還有一點，我認爲也是重要的，也顯就此附帶一說。清末年來，國人中表現得最規矩，最公正，比較最有知識最能感覺，最關懷國家，忍受的苦遂也比較最多，最不失爲固窮的者了的，就是若干大學教授。今後國家一切改革，總應該對他們多加些重視才是。

雲孫隨筆

（一月五日修正稿）

陶元珍

中國最早之鐵路

吾國最早之鐵路，人皆知爲第一次淞滬鐵路。是路英商所建，經清廷給價收回拆除。今之淞滬鐵路，乃厥後重建之第二次淞滬鐵路也，案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記云：「同治四年七月，英人杜蘭德，以小汽車駛其上，迅疾如飛。京師人詫所未聞，駭爲妖物，衆國若狂，幾致大變。旋經步軍統領衙門飭令拆卸，羣疑始息。」是又在第一次淞滬鐵路之前。然杜蘭德所敷之路，自敷設至拆卸，歷時極短，路長不過里許，且未營業，實不足與淞滬鐵路比。茲引野乘，聊供談助云爾。

翁同龢稱讀譚延闓之書法

翁同龢致譚鍾麟書云：「三令郎偉器也。其筆力殆將扛鼎。入祥可喜，行即騰驤。」（翁松禪相國尺牘卷續第九冊）鍾麟乃譚延闓父，翁書所謂三令郎，即指延闓也。延闓書法，遠宗顏魯公，近宗鍾南園，與同龢同趣，故幼年即爲同龢所賞識。後延闓果以書名，翁氏之衡鑒，誠不虛矣。

Academia Historica

新年的兩個希望

希望政府「變」

希望國人「幹」

范樸齋

到了民國三十四年，我們的抗戰，又進入一個年頭了。在今年這一年中，抗戰的局面，必有一個大的開展，這是無可疑的。然如謂今年就可以勝利的結束抗戰，誰也不敢冒險，作如是判斷。固然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然而勝利是不可以坐待，待至，還得大家更艱苦的努力！奮鬥！

「勝利」！這些年來一般人似乎中了這兩個字的毒。我常說：這勝利兩個字，好比一座銅牆鐵壁，把人們的眼光，人們的思想，都擋在這頭了。一切一切，似乎都以此為止境；而不曾把眼光和思想透過這銅牆鐵壁的那一面。這就是說，勝利誠然有到來的一天，然而我們的國家，乃至整個的世界，是不是從勝利之日止，也就一切終止了嗎？我們試透過這座銅牆鐵壁，放眼向那面看一看，拉長向那面想一想，要是我們老是這樣的混下去，我真覺得到是突破了這座銅牆鐵壁之後，那才真到了困難境界。說不定立刻擺在面前的，是深淵！是懸崖！何況，就在勝利混，如不努力，「也恐怕勝利得太難看」，這已經有人感到了。為使勝利不太難看；為使勝利以後更能步入康莊坦途，我們都得在抗戰中有所佈置，所以我們在今年，更該加倍的努力。

今年，我有兩個希望：第一希望政府「變」，第二希望國人「幹」。

說到「變」，我希望執政者，首先要明白一個道理：就是必要無所靳惜於「傾」，然後才說得上「變」。這道理明儒王夫之說得最好，他說：「勢至於不可止，必大反而後能有所定，故易曰傾，否，先否後喜。」他以為國者當勢至於不可止之時必須放手改變，不可瞻顧，所以他又說：「如有所惜於傾而靳不為傾計，則亦保否而已。」故一切左支右絀枝枝節節的補救，那無異用破布補舊衣，任你千補萬補，終是補成否象。也就是說，這樣的變，任你千變萬變，終是保否而已，決不能收變通之效。夫之以此衡論宋朝李綱，在金兵渡河之時，定內禪死守之計，而結果弄到汴京破，二帝俘。正因為他是有所靳惜於傾，而欲保其不傾，反而成了保否，以致於大傾。故不如唐肅宗的靈武接位，到還做到了事佔機先，傾否復泰。夫之說李綱為「無識」，甚至說「敗天之猶，綱為罪魁」。以李綱之資，而不免受責備，這是確有至理的。

明白這些道理，我們就明白必是怎樣一個情形，才能算是「變」。這并不是說今天需要來一個「靈武接位」；而是說今天確實需要來一個「大反而定」。去年十月，就有人說「中國需要變，而不需要亂」，這話是不錯的。然而從去年十月，變到今天，究竟是怎樣變的？如果我們承認中國今天的局勢，確已到了「勢至於不可止」之時，我們就希望「大反而定」的變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不希望「用破布補舊衣」的變。而且我們希望趕快變，澈底變，務要以變彌亂，不要亂了才變。

如何變？要變體制、變政策、變作風、而不必只是變人，或許當局者也是有所斬情於傾，故不顧，或不敢爲大反而定之計。本來，以李綱之賢，尚難下大決心，而不免有此過失，但也在可原之列。然既明白這個道理之後，我就希望真的要「變」。

至於變的方式。不管主張擴大國防委員會組織也好，召集各黨派會議也好，只解各有不同，而目標即是一個——實現民主。在去年雙十節，中國民主同盟發表過一個對抗戰最後階段的政治主張，（必五項三十六日）我認爲這是最低限度的「變」的方案。最近中國民主同盟，還有一個宣言，要點也不出此範圍，是最平易溫和了。我希望聰明的執政當局，深長思之！努力赴之！在上面所說的各種方式中，自擇一個方式徵取大家的同意，就在今年，必須澈底變好，才能使國家傾否復泰；才能使勝利不會太難看；才能在勝利後爲國家樹立了建國基礎，而不致突破勝利的銅牆鐵壁之後，立刻又墜入深淵陷入懸崖，對不住國家，民族，也對不住自己——這是第一個希望。其次，說「幹」：

我所謂幹，是希望國人不要消極的意思。今天的中國人，無論何黨何派（包括國民黨，共產黨，及民主同盟的各黨派）。與夫無黨無派的人們，有良心，有熱忱，有見解，有本領的人，并不少。不過，一向中國人的人品道德觀念，是多少帶了點封建意味，在不知不覺中，支配人心，力量最大；尤其在中年以上的人，受這影響最多，也最深。以往的我，也并不例外。舉一個例：諸葛亮的鞠躬盡瘁，在以往的說書人看來，是認爲因有三顧草廬的代價，然後才去拚命的。不然的話，是「無媒自薦，士女醜行」，是躁妄不安分。這些道理，在某種情形下，也自有其價值。然而今天的人們，却不可中毒太深。很明白的，我們如用這個道理去衡量羅斯福總統的第四屆競選，眞就難於想像，你會得不到解答了。所以我們今天從事於抗戰工作，從事於政治活動，是爲國家，爲民族，也就正是爲盡自己的責任。并不是爲那一個人，或爲那一些人，而去從事於抗戰，從事於政治。因此，你既有良心，有熱忱，有見解，有本領，你就該拿出勇氣來幹，不必在家裏等待「三顧」。你千萬要明白！在今天你不是諸葛亮，而是阿斗——國家的主人，就是你。

還有：腳子愛思，賈生痛哭，那也是在以往封建和君主制度下的社會中產生出來的。今天如腳原賈誼這種熱心爲國的人，確也不少。但我希望今天的腳子賈生，請你們再不必去愛思痛哭而只須「幹」！何況，就在君主制度下，也早有人喊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一句名言。今後，我們只要積極的「幹」，不要消極的「嘆」。

我是近五十歲的人，過去屢次從政而屢受挫折，但我并不失意，灰心，也不改脾氣，不改作風。我始終保持了我的節操，我不貪污，不作奴才，尤其不作我良心不許可作的事。不但不迎合風氣，且隨時隨地想盡己之力去改正風氣。所以我屢次從政，而我却始終痛惡官僚。自然，結果我是改正不了風氣，反而屢被風氣所排斥了！但我最服膺蘇東坡一句話：「我聲之在世，當如人之有眉，雖無甚用處，亦覺其不可少。」我以此自況以此自豪，并不菲薄自己。我又吃得苦，受得窮，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以磨難不了我，我并不發牢騷。因我認為受了很久的薰染很多的磨難之後，我始終不曾為官僚風氣所同化，而僅為官僚風氣所排擠，這并不是失敗，毋寧說是成功。故我是心安理得，并不尤人。我更堅信世上必有眞理的存在，政治清明，定有那一天。於是我樂觀，我不憂思，不痛哭，也不抱膝長吟，等待三顧，更不在家裏等勝利，我只是勇敢的，繼續的「幹」！

抗戰是大時代，我們幹得好，的確是千載難逢轉弱為强的建國機會；幹得壞，也眞可以再墜深淵重墮懸崖而造成萬刼不復的痛苦。所以我們大家在今後，更該要屏除消極意念而切實的幹！好好的幹！

誰幹？我幹，請你也幹！上面已經說過，你如是中國人一定要明白，今天納爾遜才是諸葛亮，你不是，你是阿斗——國之主人，所以你該幹。

幹什麼？凡有利於抗戰建國之事，都該幹。「尤其督促政府實現民主，這是抗戰建國的根本大計，更要漸策羣力，努力的幹。我們既希望政府要趕快的，澈底的，眞的，向着這條道路上「變」；我們自己也就該趕快的，澈底的，眞的，向着這條道路上「幹」！

怎樣幹？只要不是亂幹，假幹，在共同的目標之下，這裏你的能力志向，隨你愛怎麼幹就怎麼幹。不過總要幹，不要極。

何時幹？從今天起，就幹。今天是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由於我們大家的「幹」，實現了眞正的「變」，那才眞是復始，眞是更新，謹以此祝禱政府！祝禱國人！

三十四年元旦陪都客中。

雲孫隨筆

荷蘭牛輸入中國之始

陶元珍

荷蘭牝牛，體幹小而產乳豐，品質之佳，為全球冠，乳用牛之首推荷蘭，正猶力用牛之首推印度也。近年吾國各農業機關多購入荷蘭牡牛以供乳食者。案荷蘭牛之輸入中國，不自晚近始。王士禎池北偶談云：「康熙丁未（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夏，荷蘭國甲寅吧王油頻嗎綏極，遣陪臣卑鄧攀阿圍等八員入貢。內有……西洋小白牛四，高一尺七寸，長二尺有奇，白質斑文，項有肉峯。……」又云：「予在禮部，見荷蘭所進西洋小牛，異之」。是在清初荷蘭牛已輸入中國，體小而白質斑文，正荷蘭牛外形之特徵也。惜清廷僅知悅其外形而不明其實用，致荷蘭牛輸入雖早，並未流傳厥種，此四小牛竟與獅象虎豹之屬同為玩物，良可慨矣。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參政員的人選問題

艸民

各省市國民參政員，或已先後選出，或即將陸續推選，中央方面在最近亦將決定人選。近年因參政會頗能發揮力量，故各方對於該會之義務甚殷，此次改選，無不盼望新分子益加健全，以便更發揮澄清政治之效能。吾人此時供獻選舉之意見，不僅為此次選舉參政員而發，同樣亦可作省縣選舉參議員之參考。

一、國民參政會，顧名思義，為民意機關，則參政員自應以能代表人民為必要條件，故其人選必須視其在社會上之資望如何而決定，斷不可視同政府要人的代表，而將名額分配於重要官吏，致根本失去國民參政之意義。

二、官僚在選舉非執政黨人士。參政會原是政府為集思廣益，團結國力之機構，其主旨在使政府以外之人民得到參與政事之機會。政府黨本身即係「主」政者，大權在握，自無須再「參」政，故參政員似應儘數選舉政府黨以外之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者參加，方與設會之宗旨及國民參政之意義相符合。

三、參政會設立之目的是為集思廣益，及團結國力（見組織條例第一條），則參政員之人選第一自必須有思想，第二又必須有號召人民的能力。思想是要有學識，能力是要孚衆望。參政會不比元老院，亦不是養老院，參政員不是應酬品亦不比捐官，凡學識資望不夠者，雖有勳勞，有錢財，亦不宜選作參政員。

四、參政會組織條例第十六條規定，現任官吏不得當選，但同時又規定地方自治及教育學術機關人員不在此限。現時政府之機關很多，性質亦頗複雜，有時一個人是官吏非官吏，頗不容易弄清楚。譬如一些官營事業，及特種公司之類，名目上非政府機關，實際則與衙門毫無分別，裏面的職員儘管是叫經理等等，而實在是官吏。這第十六條的意義應該有一個切實而且嚴格的解釋；凡為政府服務，而受到報酬的，都是官吏。照這樣的解釋，一切官營事業機關的職員，以及不必登敘或具有幕僚性質的人員（例如國防最高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參議室之類）都應算是官吏。如來這些人實際是從事專門時工作，而且對政府負責者，當然不應該又佔任人民的地位去參政。至於教育學術人員，也要看性質是如何，凡負行政責任的，比如校長院長等，當然不應當選參政員，至於教員及研究員等，則應可以參加選舉。

除以上四點意思而外，吾人認為選舉必須絕對公開。選舉公開是一切政治事情公開之首著，假使選舉尚不公開，則其他更何從言公開。選舉必須公開，絕不能徇私，也絕可以杜絕賄門與行賄等弊。所謂公開，應將競選人的姓名公佈，俾大衆皆知誰人當選，誰人落選，及當選者是否適當。因為必如此，然後選舉人可以感覺負有責任，而不能免於輿論之指摘，因而像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法蘭西的國民參政會

沈頌芳

在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正當戴高樂和吉羅德開始合作的時候，法國本土各抗敵組織，各黨各派，各職工會也成立了一個統一性的組織——全國抗敵會議。在它的宣言中正式表示：「法國人民要求阿爾及爾迅速成立臨時政府，並推舉戴高樂將軍為主席」，接着六月三日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便在阿爾及爾成立了。

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成立，是法國人民實行民主團結並加強作戰努力的新階段。八月二十六日英美蘇中諸國承認了法國臨時參政會合法的地位，同年九月十七日的法令，成立法國臨時參政會議，從此和人民的聯繫是加強了。比較由普選產生而有整個立法權的國會還還有相當的距離，然而臨時參政會議却已經代表了本土抗敵的團體，海外戰鬥運動及各黨各派的人物。大家向着團結和民主的大道上邁進。

臨時參政會議的組成份子，有的屬於黨員，有的屬於工會，有的屬於國內或法屬殖民地的各種抗敵組織的代表。他們之間都抱着熱切而互相了解的希望，提供的意見又是非常的坦明的，目標所有一個，就是驅逐納粹和解放祖國。它的人數共一〇二位，名額分配如下：（一）國內抗敵團體的代表四十九人，（二）海外戰鬥運動的代表二十一人，（三）參衆兩院的議員代表二十人，（四）各州及殖民地參議會的代表十二人。

臨時參政會議的會員都不是民族解放委員會指定的，也不是固定的。它對於行政當局究全屬於獨立的地位，將合了民主制度的基本精神。國內抗敵團體的代表是由全國抗敵會議選出的，海外戰鬥運動的代表由海外各抗戰團體提出名單而經國內代表選擇，分配如下：阿爾及利亞二人，突尼斯亞二人，摩洛哥二人，馬達加斯加島一人，海洋洲一人，及戰鬥法國代表二人，共二十一人。參衆兩院的議員代表由自己推選，名額分配以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以前衆議院各黨派的議席百分比例為標準。各州及殖民地參議會的代表由各地方參議會推選。

臨時參政會議的會員享有免役權與議會同的絕對大多數。他們自由發言的可能。開會投票表決須到會人數是否超過但國內抗敵代表議席四十九人，共票數總計到會人數是否超過贊成或反對均照四十九票計算。）凡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切實政治，經濟，文化等項提案和綜合組織退出參政會的討論和發表意見，經過會員三分之二的贊成，臨時參政會議可以把一切有關國計民生的問題列入它的議事日程，在同情情況之下，它可以要求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任何工作到於某問題作口頭說明。它在目前軍事的時期中，致妨礙政府的行動，同時却經常以建議來協助政府，而絕無強迫地而且在自由討論的空氣中，把人民的意見直接提供政府。

法本土解放以後，國內抗敵團體和海外戰鬥運動攜手合作，團結無間。全國抗敵會議決定暫不取消，繼續作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各項努力，以便在重建法國民主制度方面發生重

Academia Historica

大的作用，它對政府居於諮詢性質的地位，臨時阿爾及爾的臨時參政會也移到法國本土。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發表的「政府公報」中，修正了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七日法令中的臨時參政[illegible]組織和權限。因爲臨時參政會是廢民族解放委[illegible]的運動而產生，號召自由法國西的人繼續抗戰，並發動國內地下組織，共同奮鬥，[illegible]祖國的解放。目前環境需要改組或[illegible]，所以把臨時參政會改爲國民參政會，它的職權沒有多大變更，但負了一項重大任務就是籌備普選及召開國民大會。法國[illegible]普選須要等待到各地交通恢復和行政機關重新建立，同時留在德境的征工和戰俘三百萬人，也不能放棄選舉權。

在國民大會未召開前，國民參政會是代表民意的機關。但因爲處於非常時期，一切軍事行政都需要迅速的決定，而議會的討論有時反而延誤時機，所以臨時政府既有緊急措施的權限，[illegible]參政會居於輔導政府的地位。去年十一月七日國民參政會在巴黎皇宮（即參議院舊址）舉行首次大會。從現時起直到普選爲止，國民參政會的任務是向臨時政府提供建議，表示人民的意[illegible]希望，協助政府，共同爲祖國復興而努力，國民參政會的名額已擴至二百四十八名，分配如下：（一）國內抗敵團體的代表一百四十八名，（二）海外鬥爭運動及科西嘉的代表二十八名，（三）當日國會議員的代表六十名，（四）海外殖民地的代表十三名。全國抗敵會議委員十七名及該會正副秘書長都是當然會員。在開會期間，非得該會的許可，不得因刑事或輕罪致被拘捕。但兇殺案罪不在此限。參政會得要求在開會期間。暫緩拘禁犯罪的參政員。參政員在任期內無論口頭或書面發表政見不負法律上的責任。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的法令國民參政會的議席分配如下

（一）國內抗敵團體一百四十八名計爲：

全國抗敵會議委員兼正副秘書長十九人，

民主[illegible]三人

大衆民主黨四人，

全國共和聯合會三人，

共產黨六人，

急進社會黨六人，

社會黨六人，

智識界職工聯合會一人，

天主教職工聯合會四人，

農業協會二人，

農民聯合會二人，

總工會十二人，

解放會六人，

抵抗會六人，

戰鬥會六人，

保衛法蘭西會二人，

愛國青年聯合會六人，

法國戰鬥會六人，

游擊隊六人，

民族陣線十二人，

北部解放會六人，

南部解放會六人，

解放與聯合會一人，

[illegible]林一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戰俘與征工團人，
軍民抗敵會六人，
新共和黨一人，
抵抗團二人，
工業聯合會二人，
婦女聯合會二人，
北方之聲社二人。
（二）海外戰鬥運動二十八人計爲：
科西嘉二人，
阿爾及利亞二人，
突尼基西二人，
摩洛哥二人，
海外戰鬥法國委員會五人，
法屬西非一人，
法屬赤道非洲二人，
喀麥隆一人，
安南一人，
聖加麥多尼亞一人，
馬達加斯加島一人，
海峽洲一人，
國鬥法國代表七人。
（三）當日國會議員的代表大會名額，官的分配比例，依照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的決分，與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參衆兩院各黨派的議席百分比例爲標準。如：
共產黨七席，社會黨十五席，左傾民主黨，急進黨，全國社會黨二十一席（包括社會共和聯盟，左傾獨立黨，共和聯盟與急進社會黨，民主左傾與獨立急進黨，大衆民主黨）其他政團或無黨無派的國會議員十七席。
（四）海外殖民地的代表十二名，業經解放的海外各州及各殖民地參議會來推選。它的分配比例是非各地參議會每地二人，各殖民地每議會一人。
國民參政會每三月召開大會一次，會期一個月，由於政府或會員四分之三以上的要求可以召開特別大會，會期至多十五天。在開大會之間得召開特別大會一次。大會准許旁聽。

國民參政會的任務是由臨時政府提出任何問題來請它發表意見。如國家總預算案，五千萬萬法郎以上的借款案，縮減關稅或增加稅收案；凡涉及個人自由的立法案，公共事業的組織及國家經濟和社會機構的各項法令事先必須徵求參政會的意見，如遇有緊急案件，國民參政會在十天以內不表示意見，臨時政府可作便宜的措置，但有關總預算的建議，其期限延長至三十天。由於會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建議有關國計民生的任何問題，國民參政會當予以採納而列入議事日程。同時，也可以要求臨時政府對於國計民生的任何問題提出實際報告。

下列人物不得之參政會會員：
（一）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七日以後任僞政府職務者。
（二）一九四〇年七月十日曾投票贊成以憲法全權賦予貝當者的國會議員。
（三）舊日國會議員、公務員及公職人員曾實踐敵人，損害法國及盟邦利益者。
（四）臨時政府公務員不得參任參政員。
（五）凡公務員曾利用職權，毒害公款者。
法關西的民主團體，完全是有利於一個全民的機構——國民參政會。他們在廢墟上把國家重新建立起來。國民參政會是在國民大會未召開以前的一個過渡性質的機構，但它仍然不失爲全法關西人民主力最的大團結，而又是本土抗敵團體，海外戰鬥運動和各黨各派政治團體合作的一種民意機關。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法國內地軍

君適譯

當英美軍隊登陸希特勒在法國的防線的時候，德國的佔領軍也將同時受到法國強有力的內地軍的攻擊。這個組織現在雖無聲無息形影不見，而他們收羅了百萬以上的法國愛國志士準備隨時發動。（盟軍在法境登陸後，已證明了事實確是如此了——譯者註）

由於我個人過去的殘忍經驗，得以深知這內地軍的內幕，因為在一九四〇年停戰之後，我立刻就成為該組織的一份子，並担任文項官職。一般輿論以為這種組織是由孤立的破壞份子，敵手以及刊物寫作家們烏合湊成的，事實上是錯誤。這種內地軍是一種真正的軍隊，由法國最刻苦最機敏的老戰士，和他們的官長以及老百姓所組成的，內分突擊，破壞，信號，情報及工程師等單位。他們的行徑遍及全國，他們的分子包含國內各種階級的人民，以及各種政治信仰的黨人。

正在德軍侵入之前，幾千萬人民及隊伍沿着道路向南逃亡的當兒，這種組織就產生了。混亂之際，家人每易散失，報章上紛紛登載尋人的廣告。內地軍組織人員對於這種廣告予以有力的答覆：「你現在已流亡無家，但戰爭並未結束，你應為國家奮鬥，請將這字句謄寫三份分給你的朋友注意不要中斷了我們的連環鎖。」

這種思想漸漸擴佈國內，組織的人員結集朋友把計劃告訴他們，警告他們法國的危機，對於每個人都發問：「你有一個可信賴的朋友嗎？請告訴他關於我們的計劃，並指引他。」

高級軍官因此得到了助手。按理法國所有軍需部已交給德國軍隊；但實際上還有成千成萬噸的被隱密運藏起來。文件到了幾百萬的法郎收藏起來。

在法國各山中內地軍建造了城堡，稱這些地方作防禦部事地區。凡是隘口小道都有機關槍以及大礮看守着，此等關口十分險要，有一夫當關萬夫莫入之勢。這些地方也就是永遠不曾被德國征服的法蘭西。

開始時的主要工作是在管理和指導向德軍復仇的動作。當時發生許多沒有宗旨的暗殺案件，被殺者多是不重要的納粹黨人。例如有一位出身優秀家庭的女郎，因她的未婚夫被敵人殺，她連續的引誘六個德人到她的房間來一一都被她刺死。還有一個人因為他的八歲的女兒在敵人面前逃走被害，他就每晚外出殺死一個納粹黨員，殺了十五人之後才被俘虜受刑。一個農夫在他的田地裏埋了八個被他絞死的德人，因他的女兒曾被殺害。雖然被殺害的德人有數百個，但同樣數目的法人也因復仇而被處死刑。

內地軍不贊成這種私人復仇的事情，因為會防害更有效的軍事目標的直接攻擊的進展。一位參謀部的上校說：這不過是一種簡單的記賬，如果德國人為着被我們所殺的每一個德人而殺掉一個或幾個法國人時，我們實際上是失算了，我們還不起這種損失。我們必須使每種行動有意義。

起初內地軍的組織人員將巴黎的隧道當作他們的司令部，當火車不停的來往的時候，他們就在車中進行他們的工作。這計畫被德人殘殺之後，他們不得不放棄。陰謀的人時常調換地

Academia Historica

方，記錄載在小紙條上，每條寫着一個新入伍的姓名，任務，關係，有無自行車，他能供給多少人的膳宿，和他授軍的目的：破壞，運輸，或是司令的任務。目錄是由銀行的會計師在夜間製成的。

法國各種社會組織都有調查統計，及編製記錄，表列所有的隧道火車，所有火車應當慢走的地方，所有工廠，汽車間，和造船所。祕密報紙最初用複寫版謄寫，後來印成四頁的小刊物，由藏在閣樓或地窖中的小印刷機印刷出來，一方面藉以形成輿論和政見，一方面用以報告人民消息。現在大約有四十種這樣的報紙，合計起來銷路約共五十萬份。

內地軍的活動人員滿佈全國，藉以探悉人民的言論，反駁德國的宣傳，同時登記新的工作人員。千萬登記加入內地軍的人員，都曾經過訓練。分遣教官去訪問他們。這些人從前是律師，兵士，——在夜間旅行經過全國，躲避德人的路上巡邏。

這些教官每次開班只有兩人，他們訓練入伍的人員怎樣去埋炸彈，怎樣在火車道上放爆炸火線使火車出軌；怎樣去破壞為德國製造貨物的工廠。他們也傳授應用絞殺法（一種方法使受刑的人來不及作聲）；怎樣把低音器裝在手槍上；怎樣去裝置並應用自動來福槍。

教官常試驗新入伍人員的胆量，先讓他遞送一架機關槍！——一個看不出來的包裹——到幾里外的市鎮裏去，要經過火車站受檢查，把包裹送到貨車上去，然後再經過檢查拿出來，所有這些工作都要經過警察的視線。新入伍的人員也有受命令去割斷電話線或在火車道上放置炸彈引火線，每個人員經過這種初步的胆量試驗之後，才由教官斷定他所担任的適當工作。

這支內地軍的軍隊，與我們所知道的世界上任何軍隊都不類似，權力因能力而定，從前的將軍有時要接受從前中尉的命令。在參謀部之下有二十個地方單位，每一單位由一軍官負責指揮，指揮站每八至十日遷移一次。一個前進活動人員名叫做發糧食者，在一個鄉村裏找尋十間房子，使指揮站長可以安全居住。雖然德人曾下令凡收容一個內地軍的人就要處死刑，但房主很少拒絕幫於內地軍的幫忙。

內地軍的突擊部隊是法朗克司隊，等於美國騎兵隊，或是英的突擊部隊。他們名為大猩猩（Gorilla），因為他們每次工作之後為着節省肥皂和刀片，任鬍鬚生長起來。他們不顧危險，大多數都在四十歲以下，所有工作須要胆量，氣力和不怕死。

在另一方面，担任破壞工作的人員多半是年老的男女和孩子們。他們的工作同樣的重要，一旦被捉也不能免於一死，但是這種工作需要偷竊和狡猾的技能，比氣力更重要。

各種工作都要精細小心，計劃詳盡，例如這裏是一個堆棧，裏面有內地軍所要的小軍械，他們便要仔細調查守衛的人數，以及他們的習慣，還要知道堆棧房屋裏的居民，和進入貨棧門徑的方法。

譬如有八個德人守衛，這個貨棧內地軍指揮官，就從法朗克司隊中選定十六人注意他們的行動。準備二輛卡車和五十人以便運走軍火。選定四個破壞人員去搗毀貨棧，告訴他們應當怎樣進行。遊擊隊的規定時間是十分鐘，卡車人員四十分鐘，破壞隊十分鐘。

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法朗克司隊到了貨棧。起初一陣附有滅音器的槍聲，繼以重物降落聲，最後哨聲，第一步的工作算是完成。遊擊隊退出。這時不認識遊擊人員的運輸人員把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卡車繼續從閘口，貨物裝完的時候，有四個黑影子衝過來。卡車聲音漸漸走遠，而消失的時候，最後一個內地軍也已逃逸無蹤了。

他們常常費了三個月的工夫來計劃一種工作，如破壞法國最大的巴黎無線電台。曾經派人到倫敦去查問所需要炸藥的準確數量。英國人，特造一個同樣大小的電台模型炸燬試以求懲得答案，法國克司歐選定四人担任這個工作。他們在內地軍軍官監視之下反復演習了他們個別的工作一百次。規定的日期一到，四個人從牆上溜入，裝好炸藥再逃走。計分鐘以後轟然一聲！那四人永沒有被捉住。

再有一例可以證明計劃的精密和執行任務的成功，是發生於美國軍隊攻入非洲的時候。那時大家以爲法國南部也要被侵入，所以很需要把這心的軍隊阻止在意大利境內，不使進到法境。因此就要封鎖通行兩國的鐵路線。一隊內地軍在一個極形的隧道裏燃放炸藥。使火車炸燬彎曲，在相當日期之內這條通路確被隔斷了。另一隊內地軍炸毀山壁，使山石崩裂下來，破壞一座重要的鐵路橋樑。第三隊偷殺了另一橋樑的守衛，然後把橋樑炸燬。

當納粹開始把法國糧食運到德國去的時候，內地軍的化學專家設計在這糧食裏放毒，活動人員潛入巴黎停車站的車裏去實施計謀。結果千百的德人都中毒死了。納粹又試用法國其他部份的停車站，但是每處都有內地軍的守望人員，這些人員有時就是在火車上担任通常職務的人員，因此糧食不斷的受毒。

內地軍預備毒素的實驗室還發明一種破壞粉，應用在工廠裏面。德國人爲安全起見，把出產品散布各地。一個工廠製造機器，如此類推，只有一個工廠製造卡車的車身，另一個工廠製造機器，如此類推，只有一個工廠把所製造的裝配起來。但就在那一個工廠裏，有一個人們所看不見的軍隊人員，私自在重要的部位塗抹破壞粉。假如在這個上塗上破壞粉，這卡車駛過一百公哩之後，就會的奇妙的內燃機。有一時期，在十個月之中，百分之九十的卡車都發生了相像奇妙的病態，而這些卡車都從同一裝配工廠製造出來的。

同樣奇異的事件也發生在飛機廠，造船廠及其他在國境內的各機器製造廠裏。至今造船廠還沒有造出一隻完備的潛艇。

德人用逮捕刺殺和苦刑的直接方法和陰謀的間接方法來對付內地軍。德人最喜歡用的一種計謀，當他們捉住一個內地軍人時，就把他施刑到半死半活，然後棄置路旁，希望內地軍組織中有人看見他流血而去幫助他，就把這個人又逮捕了。這是一個同志而對此情形熟視無睹的固然不對，但是他們不得不忍心而看看不一看。

德人常用女間諜，因爲他們認定愛情是法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興趣。美麗的德國女郎能得一口好法國話，坐在咖啡館裏，夜總會裏，以至在街頭巷尾，都可以乘機與法人接談，而破壞陰謀害納粹的計畫。但此種女人所發佈的情報很少，因爲同盟軍很快的就看透她們的陰謀了。不但如此，法國人反而使德國婦女們受上了他們，藉以破壞她們間諜的用處。這類事情屢見不鮮。市政府又用約束娼妓的規則來約束許多婦女，不久之後德人只好放棄此種方法。

內地軍最大的一個問題是怎樣和各單位保持聯絡，以及怎樣和英國通消息。大部份的工作都由於秘密無線電。

有時德人查出內地軍裝有秘密無線電發報機的房屋的部位，就派遣了一個人帶着一套小耳機在街頭巡邏，直等到他們發現那準確的地方，然後派遣一隊兵士進攻那屋，無線電師被殺

，機器也被毀壞，內地軍為對抗起見，便時常伏兵攻擊納粹無線電車，並暗殺他們的技師。

口頭傳消息是最有用的一個通訊方法。通訊人員常常把消息用心牢記，不帶帶片文隻字，除了搬移軍火需要簽字以外。他們又把簽字寫在米價紙上，如果帶訊人員被逮捕時，就可以把紙咀嚼嚥吞下去。

法國人民因為營養不足身體日漸衰弱。牙齒變成黑色而發曲，甚至脫落下來。德國人，在捕到法國人的時候，就讓他張開嘴，看他牙齒若是潔白完整，就認他是從外國新到法境的人，也許是一個間諜。最近一個內地軍到倫敦，要求牙醫生把德的牙齒弄成不健康的樣子，使他回去時不致發生危險。

內地軍工作人員的旅行，極為困難。坐自行車的人，時常一個義團女為了某種原因比行路的人被懷疑的成分較少，時常一個義團女子所走得過的地方所男子走不通。有一個工作人員坐了憲兵隊的汽車旅行了法國許多地方。他用了一個簡單的詭計讓巡警把他加上手銬，德國巡察隊以為他是囚犯，便不加注意。

每一個愛國志士旅行法德之間，總帶一點消息來，那一個德國火車站可以平安過夜，那一個婦子的德國人比較友善，那一個是家可以得到食物，內地軍活動人員應用這些報告從德境到俄國。美美人被德國拘囚的，也由這路徑逃回法國，然後經過西班牙，或者乘船到英國。

有一個很機巧的內地軍人員，他加入納粹在法境所得集到德國去充奴工的運送輪上，要想發現潛水艇的秘密製造廠所在。有一天他從德國拘捕的地方脫逃，在邊境流了一個月，幾得半死，才轉到那裡潛水艇的場所完全在地下。他把部位牢記在心裏，然後逃到巴黎，經過同樣準確的轟炸，很是的時間不能製造。

法國內地軍人已準備盟軍的攻入，那時他們將割斷德軍的交通線，破壞軍事行動的中心地區，阻止增援軍隊的前進。

許多男女都經分別指派担任一種單獨的工作。例如割斷電話線，擅代猛炸藥在火車軌道上，或是到已經佈置火線的地方去開動炸彈爆發的機關，藉以消除德國的機關槍網。在飛機場及汽車間的周圍，卑下的傭工會一種他們謙和的行徑而很勇敢的從事他們所担任的工作如放火燒毀敵人空軍的活動。有許多精細工作須要時間的準確性，——例如封鎖機器經行的鐵路線——就要由克朗克司謙和破壞軍事設施。

這些工作都要完全達到目的，無論需要多少生命的代價。德國隱藏的軍士們急不及待的等看他們的參加最後消滅德氣的日子的來臨。

Academia Historica

意大利政治前途透視

H. L. Mahy 著
抱貞 譯

「意大利能否斬殺這條法西斯毒龍？——！

目前意大利有一個時常聽到的字眼。這個字眼不但難於解釋，並且難於實行，可是將來的歐洲和世界，能否避免重大的危機，全視這個字眼的如何解釋與如何實行。這個字眼叫做「肅清法西斯」（Dfascistizat on）。

我們這次作戰的目的，大家都認為是消滅法西斯主義，但是我們鑒於意大利過去一年來的經驗，很清清楚楚的告訴我們，法西斯主義是一個多頭的怪物，你能夠把法西斯主義摧滅升，但是必須要徹底收拾，不然他會從新滋生出來。

墨梭里尼在意大利百科全書上曾寫道：

「法西斯主義包含了所有主義的一般性，這些主義於其興行之際，都曾經各自代表過人類精神歷史上的某個時期。」

墨梭里尼所說的並不僅僅是誇大之言。而法西斯主義也並不是意大利脚上雞眼，可以切去。法西斯主義可以說是一種有機的疾病的徵候，換句話說，是一個結果，並不是一種原因。

試看今日意大利的情形。我們起初很樂觀的認為：如果把法西斯黨和其政權推翻，如果把法西斯黨的各種機構摧滅，而恢復言論和報紙自由，如果把法西斯黨所頒佈的法律取消，而在公共場所登高一呼，法西斯主義已經死了，那末法西斯主義就會眞正的在角落裏死去。但是我們現在開始知道，這些不過是法西斯主義外面附加的裝飾品，並不是其實在的本身。

盟方當局處置法西斯主義，曾經按照查理波利梯上校所宣佈的法西斯的定義。他說，所謂法西斯黨徒是那些曾經進軍羅馬，曾經接受，或是來得法西斯最高政治勳章的人。

但是意大利政府得到一個結論，若使嚴格按照這些規則實施，意大利將無人來管理。所以他們擬定了他們自己的法律，該項法律公佈於七月十日。

該項法律不及盟方所希望的嚴厲，所以有人批評意大利政府並不像盟方政府這樣顯意激底肅清法西斯主義。波諾米和史芬率很憤慨的反對這種說法。他們簡單的答覆道，他們應該切於實際。他們所能做到的只是肅清這批大罪犯，以及有犯罪證據的和過分忠誠的小雲騙們。

他們指出以上的事實，許多法西斯黨徒是熱烈的青年愛國志士，他們接受法西斯主義是因為法西斯主義曾經給予他們許多偉大的允諾，但是當法西斯主義顯出其原形來的時候，他們就可以放棄法西斯主義。

這類青年愛國志士的罪狀，是有極大的輕重區別的。任何人如曾服務於中央，各省和地方行政機構的，就是一個法西斯黨員。民間各界有名的人士，亦都如此。最近有一個過去加入法西斯黨的人對我說：「我現在隸屬於意大利最大的政黨——被肅清者。」

意大利必須肅清法西斯主義，是大家一致贊成的主張，但是担任肅清工作的人，一旦遇到其對象是他的親戚或朋友，他們每起而辯護，使他免於這殃。最近盟方當局曾請意大利政府某要人介紹三個人參加某重要委員會。這位要人所介紹的三個人，都是曾經得過法西斯最高政治勳章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今日意大利政治舞台上的顯要人物，其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政治信仰，是不必疑問的，但是他們在過去某一時期中，確曾參與法西斯的勝利。法西斯政權在意大利解放區某些地方，仍舊很堅固。我們又聽到以下的傳聞，有許多法西斯黨員現在加入共產黨，作爲掩護。這猶如西班牙內戰後，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加入長槍會。有許多法西斯黨員則搖身一變爲保皇黨和地方自治主義者，總之採取各種方法，找尋避難和避免被檢舉肅清的場所。而眞正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倒沒有參加任何黨派。

各種新的基礎已經建立起來了，不久將來，類似於法西斯主義的東西，或將從這些新基礎中產生出來。以遊擊隊「論」，就十分相像於上次大戰時和戰後的 Arditi。傘兵和突擊隊，亦都微像過去跟隨達納察（D'Annunzio）進軍皇城的舊部。這些遊擊隊將來都會發生麻煩。

有許多游擊隊員是眞正的英雄和愛國志士，但是有許多則並不是。盟軍攻入羅馬不勒斯的前三日，遊擊隊起來奮勇作戰，內應盟軍。據盟方統計這類遊擊隊員約四百人，並建議發給證明書。截至今天爲止，已發出四千九百張證明書，而你們可以用很便宜的價錢買到這類證明書。

共產黨和社會黨現正企圖恢復黨軍，所謂黨軍是法西斯主義的發明品，並且是最有力量的武器之一。法西斯黨中的戰鬥份子，是幾千個青年，他們沒有機會在世界大戰中作戰，而在種族戰爭和革命的熱烈空氣中，發揮其青春的精力。這和現在有什麼區別呢？

當盟方著手肅清羅馬大學的法西斯份子時，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員會把權堅給其政黨，由每黨選出兩個代表來担任 政黨

最近有一本幽默的週刊，名叫「廣塔契亞羅」，裏面刊有一張諷刺畫。有六個「元首」（譯者按：是墨梭里尼的尊稱）站在六個陽臺上向六個手揮黨旗的羣衆團體演說。（譯者按：這是諷刺今日意大利的六個政黨 於此可見意大利今日的政情了。）

意大利有一個困難——正如德國一樣——就是根本沒有可以回去的民主政治。意大利從來不知道眞正的民主政治的自由主義，雖然與法西斯政權相比，以前的政府或許可以說是較近於此。從一八七〇年起至一九二二年止，意大利實際上由三個獨裁者所統治，狄波利第斯（Depretis），吉利斯卑（Giolitti）和吉奧里梯（Giolitti），他們的統治方法是操縱議會中的團體。這並不是說吉奧里梯不是一個眞正的自由主義者，而是說他的自由主義只局限於一批少數的統治階級。再者，意大利政府時常是高度集中權力的。

所以今日意大利政府，如果眞正誠心誠意，希望使意大利成爲民主國家，除了具備了一二十年的民衆教育外，別無他法。我們不要忘記，據墨梭里尼所說，法西斯主義是「民主政治的最清楚明瞭的形式」。而今日共產黨人，社會黨人和自由主義者，都在高聲要求一個民主的意大利。但是只把意大利叫做民主國家，並沒有解決問題的根本。這問題不是共和政體問題，也不是帝制皇室問題。由此可見，現今主持意大利政治的自由頭腦者，其前途確有許多危險和困難，並且確是需要我們不斷的幫助。

意大利有許多反動的力量存在着，從前扶植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就是這批力量。許多特權階級亦可歸入該類，如大實業家，少數反主義者，多數愛國者，[illegible]

Academia Historica

和法西斯主義妥協的，但由於極端統治的結果，他們是不受歡迎的。他們時常遭遇不滿心的民力官員參加他們的集會。這些份子不但在等待機會，並且企圖滲入各種自由的或保皇的政黨。他們在玩弄「幕後時的犯罪」，就是若要反對法西斯或革命黨，就必須要扶助保守的力量，相信把國家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之間，和在戰前的所謂政黨組織時期中，曾經大見功效。

法西斯主義的存在，是小資產階級，即被壓尼哲後的羣衆，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月前這個階級已經在沒落，窮乏和困惑之中，有許多正在傾還他們從前給予法西斯主的幫助。他們不再是法西斯分子，但是不法的傾向仍可證明他們的擁護，以達成他的野心。

意大利的小資產階級，和其他意大利人一樣，心中感到十分的不滿意，同時受到經濟上的壓迫的苦痛，他們雖然比較消極，但亦圖謀一致反對德國人，反對法西斯黨人，甚而反對盟國。

他們比意大利其他份子，更富於勇敢，擁護和保衛的感覺。這種所謂「貴族」使他們在上次大戰後擁護法西斯主義，在今日則可以促使他們從事於冒險事業。

意大利最大的弱點，是在於他的傾向不能給予除法西斯以外的其他清楚明瞭和使民衆擁護和瞭解的路子。他們雖然認為高談民主政治，但是人民不知道民主政治究竟是什麼東西，至少，每一個政黨對於民主政治的解法，各自不同。

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實行二十二年之久，其中十六年是為獨主義，所以在從四十五歲起的意大利人民的心靈上，已經刻上了一個深刻的印象，不久的將來即應滅。其法西黨人在這三十三年中，並沒有做出什麼重要的感覺的事。

許多真誠的反法西斯主者提出抗議道，意大利不能和法西斯主義脫離關係。法西斯主義只是少數罪人所主張的主義，並不是以[illegible]的觀察家都不贊同以下的問題，就是說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已經絕跡了。換何話說，若欲使意大利在歐洲國際間，重獲一個正常的地位，必須要經過一代之久，始能[illegible]館，並且須由波諾米、克羅西，史芬卓，和較年輕的像薩拉吉特，芬納爾託，波孫尼和卡爾薩尼之流出來領導。

所謂「肅清」，現在不過是問題而已。譬如外交部，就還沒有開始。有許多外交官從前曾經法西斯服務，現在則在營反法西斯效勞。有一句話可以用來表明將來發生的問題：「誰來肅清這批肅清者？」

在意大利歷史上，法西斯主義將被陸續，而成為不名譽，但不是不自然的一頁。關於這點，大家都能相信，並且希望如此。但是若因此而忽略法西斯主義在今日的力量，和在將來的危險，那就未免不顧事實，而把自己暗藏禍患起來。這些事實，在今日意大利是如此，在將來德國當然更為顯然。

我們可以掃除意大利的全權國家的納粹觀念。我們可以取消其「血和傾向制的法律」，我們可以解散其軍隊，但這些還是納粹主義的外衣，不是其本身和其精神。我們若欲把納粹的本身和精神殺絕，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

德國的納粹主義，由於其軍事的成就得以保持了一些光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則因其軍事成就較小，所以得不到什麼可以保持的地方。但他們對於他們的羅馬帝國和意大利傳子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躍而爲强國的數年中，似乎仍有留戀和值得驕傲之處。在公共工程和勞工立法方面，某種利益仍將保留。

但是保留下來最多的，是崩潰和道德墮落，以及不能夠獨自思索。這是法西斯主義的最大的罪狀。雖然，法西斯主義不就是墨梭里尼，亦不就是意大利，而是德國，西班牙，日本和其他國家，也是維琪，牽斯林和所有的傀儡。它是一種世界的力量，採取各種形狀和方式，但從其表面下細看，就可以認識出來。

墨梭里尼說：「現世紀是法西斯主義的世紀。」他是說錯了，因爲他認爲法西斯主義將獲得勝利。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他是說對了，因爲我們將耗費這世紀中的極大精力，才能夠戰勝法西斯主義。（譯自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紐約時報雜誌）

陶元珍

中國有水雷之始

雲孫隨筆

昔林則徐在粵購洋船一艘，船名 Chambirdge 是爲中國有新式兵船之始。（據梁廷枏夷氣紀聞）然尚未有水雷也。梁章鉅浪蹟叢譚云：「粵東近傳噗喇嘞國夷官，創造水雷之法，遣善泅者潛至敵人船底，擲水激火，迅發如雷，雖極堅厚之船，罔不破碎。粵省洋商潘姓者，如法製造，凡九閱月而成，曾經將水雷器具二十副齎京，恭呈御覽。於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奉旨交直隸總督天津總兵會同演試。用徑八寸長丈六杉木四層，紮成木筏，安於海面，堅定錨纜。將噗喇一百二十斤水雷，送至筏底，緊定引繩。拔塞後，待時四分許，轟然聲，激起半空，將木筏碎散，碎木隨煙飛起，其海面水勢，亦圍圓盪動，洵爲火攻利器。云云。並纂成水雷圖說，進呈刊布。」是爲中國水雷之始。惜則徐所購之船尋爲英軍所奪，至同治中操江艦遭成，中國始復有新式兵船。此次水雷試演之後，未聞大批製造，殆清廷以奇玩視之，試過即已忘卻，否則英法聯軍之役，中國在大沽，斷無不敷設水雷之理也。至光緒初，李鴻章興辦海軍，始創設水雷營，上距中國始有水雷已數十年，國防建設，遲緩若此，而鴻章拮据經營，固已竭盡心力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盟國歐洲遠征軍美國地面部隊總司令布來德雷將軍

趙然譯

一九四三年三月，當一個新到的少將叫做布來德雷來當我尼西亞美第二軍副軍長時，他的一個副官告訴我：「你看，一年之後布來德雷一定要升為上將，而成為一個高級戰場指揮官」。

你想一個副官對他的上司總是推崇備至的，所以我僅對他露齒笑了笑。後來有一天，我在到馬克納斯的路上碰到布來德雷在那兒射擊。他剛剛不滿六呎高，長而瘦，身穿兵士用的粗子，褲子，腰布與一件舊戰場短上衣。祇有那頂綽風雨侵蝕的頭盔上的幾顆星顯示出他的階級。他臉上多皺紋，露出林背式的醜陋；他的穩定的灰目由角邊眼鏡中溫柔地的向外凝視。他的高調的嗓音有寬緩但長音，又足如此斯文有禮，使你不能設想他所能有鋼鐵般的性格。

當時我對布來德雷的估計是：他是一個規規矩矩的好傢伙，但缺乏所謂大將應有的風度。

但可希奇的是這個冷靜的教師型的將軍，作起戰術家來，比英國的誇大的蒙哥馬利更能驚人。四月中旬布來德雷導了第二軍。七月裏他是中將了。八月裏他的戰術技能的傳聞分佈各處，向成千上萬軍官與士兵部歌頌他。最後艾森豪威爾將軍任他為進攻西歐的美軍陸上部隊的高級指揮。

這位將軍以一八九三年出生在密蘇里州的克拉克地方。他的父親是一個學校教師，曾使他的兒子沾染了帶着槍與狗到野外去打獵的喜愛。他在孩子十三歲時死去；因此一個朋友建議說西點是一個苦孩子受教育的最好出路。布來德雷畢業於一九二五年，在有三十人收來成為將軍的一班中居第四十四名，那一班共一百六十四人——艾森豪威爾也是其中之一，居六一名。

布來德雷是一個產生了八位將軍的棒球隊裏的最好外場球員。他至今有對棒球的熱忱——假使他有玩一玩的機會，則從不放棄。但他說他對去秋世界棒球節目結束之快，覺得欣慰；因為如此軍士們才能專心於戰爭。他不以將軍資格而隱蔽的說着，解釋了為什麼我們這麼快的肅清了西西里。

西點班上的預言家說，布來德雷最顯著的個性是深入其間。布來德雷現在到底深入其間了。但這就費了他二十五年多的苦幹。他說：「我曾作過陸軍中的一切職務，我費了這二十五年多的功夫，好像是在替我解釋為什麼我在上次大戰中沒有出國 感謝上帝，這次終於免我了。」所以當這次大戰開始時，他還沒有聽見過一次戰爭中槍聲，而其他將領都已有豐富的戰鬥經驗，所以他想他們被選的機會多過於他。

事實上布來德雷是個特殊的人物。從他的教學中，顯出了他對戰術和戰略的精熟，必將使他成為高級指揮。一九四一年馬歇爾將軍擢升布來德雷為准將給他把規模很小的奔寧砲台步兵學校擴充為一次能訓練一萬四千候選軍官的龐大學院的任務。布來德雷作得很好。並且給他了一個狩獵的極好機會 ||| 為該地官於狩獵。而他的同伴常是幾個兵士。

陸軍部開始注意到他作首領的好條件。一九四二年二月布來德雷被升為少將，指定去組織第一個坦運部隊——第八十二

歸。

從好多現在役的前線將官中，獨獨他被提拔在一九四三年二月派去北非當巴頓將軍的副手。五月間他承樹巴頓的位置。在很多次緊要關頭中，他以戰術技能與特殊的計時感驚駭了德國人，並且奪取的擊敗了他們。他有一個愛用的格言是：兩次打擊敵人，第一找出他所獲得的，然後由他那裏搶過來。

四月間，軍部決定把布來德雷的第二軍從南突尼西亞移動到北方作一次奇襲。要移動五萬人十萬輛車與大量供應品在任何時機都是最困難的；這一次軍隊更須夜間進行，以避敵機，甚且要不被閃光發現。同時他們所要用的道路正切過那時正猛烈轟炸阿爾姆的英第一軍的東西供應線，祇要布來德雷的車輛堆集路上幾小時，其結果就會性命交關。

布來德雷的詳細計算，算到最精細的秒鐘。致敵人從未趕上，而英軍的軍火供應也沒被阻。在複雜的戰鬥開始前，布來德雷常出現在那兒對低級軍官和士兵講解這計劃，拿一枝細枝在沙上畫着。布來德雷認為在軍隊中知道現行計劃的內容的人越多越好。

他所過行的奇襲在戰術方面有點違反常規，他不從有道路的大路線，「山谷打過去，因為他想到山谷對敵人也是一樣便利的。他率着他的部隊沿着高山進行，而走過的那種路綫之險，使德國人從不想及任何人將嘗試之，他們就因此在不備中被捉住了。「沿着山脈攻擊」，布來德雷在他對馬歇爾將軍的正式報告中說：「有很多供應上的困難，但實上減低死傷人數，並且使敵軍的疲快方法。」六星期間，布來德雷使德國人二六顆頭。他們防禦比賽大的鑰匙是一座多在而流傳的六〇九號山頭！一個二七〇呎高的山峯控制着數十里內的地方。駐防孤立的是德國最優秀部隊之一，直打到巴隆丁降落傘團的保護。被害是德國最優秀部隊之一，直打到祇剩二人生存。

盟方第三十四師圍衝襲過六〇九山頭而被逐退。右翼第一師曾設法前進亦被迫停頓。第一裝甲師開在山谷中非擄取此峯不能前來。布來德雷在他的哈普車中對他的形勢加一測算。其後用了些時間於研究地圖。

他知道德國人的大部反坦克砲，已用於南方，以應付英國軍的威脅。所以雖然地勢不宜於坦克，布來德雷仍派遣了十個美國秀門式的坦克包圍六〇九號的背後。截斷了防衛者的供應後，更籌劃時間要使他的衝入與第三十四師的攻擊相會合。戰鬥甚猛，然而六〇九山頭被攻下了。跟着第一裝甲師開向衝過去。而七天之後德國軍隊潰敗了。被布來德雷的「衝所切斷的大批零散部隊投降了。他所謂的鼠陷阱，捕獲了萬七千個俘虜。

「此舉結束第二軍在北非的作戰，」是布來德雷將軍最後命令的原文全部。他的主將們更沒有可議論的了。傳訊的時候，他們附送一枚服務優越的勳章以表彰布來德雷的「堅定的判斷，良好的戰術技能，冷靜的勇敢」；結論是「此次作戰的奚然成功，大部成績賴於他的個性和努力。」

如此巨大的勝利而以如此少數的生命犧牲而獲得實所罕見，（三百五十一個美國人與七十個法國人）。這是布來德雷所以被稱為行伍將軍的源因。這種低死亡率的另一原因，是這位將軍把第一線救護站與後方醫院擺置在較任何將軍所置的地方更近於火線。那個不但救了人命，並且對士氣有莫大的幫助。

北非被俘的德國軍將領說：「跟你們美國人所打的是一種

紳士戰爭。」然而布來德雷並未答以好感。他很憤怒的訴說德國人如何埋置祇足以傷害平民的地雷，及他們如何布置祇能騙我們的死人的毒陷阱。「不要以爲他們是一種可敬的敵人」，他說：「他們是狡滑而不可靠的。」布來德雷的堆滿灰塵的車頭阻擋鋼板上有三顆白星的吉普車，時常在戰鬥的火綫上出現。兵士們說他總是在探入陣地的尖端，且他的司令部，通常是個營帳，或是一輛拖車，放在近於火綫的地方，看起來對於一位將軍實是不智。

布來德雷曾幾次死裏逃生，在非洲時，一個副官曾在他旁邊被殺，彈片且擊中他所乘的馬槍。另一回他前進得太遠了，一個敵狙擊兵對他射了一槍，他的軍曹司機連忙停車，布來德雷用他的馬槍射這狙擊手。這狙擊者逃脫了。而故事就傳播開去說，這將軍在僅有的機會裏都不能擒殺一個德國人。兵士們特別得意，因爲布來德雷常以是一個好槍手自傲。在奔海角台時，他早飯前的打靶，常是到池澤地裏射擊一打水蛇的頭部。這個就是射擊了！

布來德雷永遠是這麼有禮而多慮的。他說：「我從不知道何以一個强者必須發脾氣大叫。」他是對伍長們說：「抱歉得很」的唯一的將軍。有一次大家聽見他甚至罰咒。某次當他正考問一個俘虜德國軍官時，一個副官突然的放了一槍，子彈擦過布來德雷的耳朵，布來德雷喝罵說：「請對這種該死的東西稍留意點。」

一次在野地裏紮營時，這將軍找一個鏟子來鋤平一塊地，以放置他的小房子。當時一個手的自顧作這事，而布來德雷反說，「要睡在這兒的是我，不是你。」拿了鏟子便去工作了。現在他在倫敦還對替他提包的低級軍官揮揮手說：「讓他去吧！我已自已拿這袋多年了。」他是兵士們所說的「安靜的戰士」。一個伍長到他面前來怨稱他過期未被升爲軍曹，這將軍就問了他一些關於軍隊的規則的問題，他答不大出，於是布來德雷叫進來一個軍曹，拿同樣問題考問他；他一一答對了。那伍長便走開去，自知還不足以配敍那特殊的條帶。

這將軍有兩種嗜好，可口可樂與冰淇淋。他能在一天之內吃下這兩種東西，其份量要比第中任何人都多。至於他的撲克及橋牌並非惡嗜好，而是有價值的資產。這個凡是做過他的對手的都早就知道的。

有人曾說他永不會作一個將官而下致人死命的命令。布來德雷沉默了一時。「你對這个也許還不大清楚」，他承認，「但這工作讓一些青年軍官去作，也許比我還困難；因爲倒底我已費了二十五年多的腦經研究如何派人於可能死亡的境地，而不是讓他們盲目地送死。」

兵士們都知道，假使他派遣他們，那一定是必要的，他們可以在他面前說出他們說：「簡單說來，當他自已參加作戰時，他經設法替我們減少困難。」且他們久已證明他有這種能力

（譯自時代）

中國糧食工業公司

營養麵包　雜糧餅干　科學優品　米山製機

總公司：重慶中正路大信巷　電話：四二一九號

營業處：重慶第一路國民大會堂對面　電話：一一四三〇號

第一支店：重慶池子街範棋區①四號

第二支店：重慶米亭子特二號

第三支店：重慶化龍橋正街五十七號

第四支店：重慶南紀門上南區馬路二號

第五支店：重慶北正街三十八號

第六支店：重慶海棠溪正街五十二號

第七支店：重慶寺林坪正街三十三號

第八支店：重慶牛角沱國泰寺正街

提高糧食品質

促進國民健康

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航業

現有航線

重慶 涪陵 忠縣 萬縣 宜昌

支川

重慶 合川 北碚 沙坪壩 磁器口 涪陵 酉陽 秀山 綦江 合江 赤水 江津 永川 璧山 巴縣 南溪 長寧 高縣 珙縣 筠連 興文 屏山 宜賓 高縣 珙縣 筠連 興文 屏山 宜賓

電報掛號：民生

電話：重慶 一一一

東方雜誌

第二卷　第一期

短評五則　舜生

（一）羅斯福總統哀辭（二）蘇聯對遠東漸趨積極

（三）如何處置日本（四）赫爾利與拉鐵摩爾最近有關中國的言論

（五）關於貪污

邱吉爾氏民主政治標準七事釋義　張君勱

論國民天職　余家菊

政治成敗論　陳啟天

歡迎民主戰士共同奮鬥　章伯鈞

試論蘇聯外交政策　孫寶毅

世界文化之前瞻　超然譯

日本感到不愉快的一九四五年　抱貞譯

美國國會現代化　孫寶毅

波蘭內部的衝突　他山譯

蘇聯空軍建立史　毅生譯

誰是邱吉爾之繼承者　超然譯

東埔寨風土記序　張禮千

雲孩隨筆五則　陶元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四川絲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三仟萬元

總公司 | 辦事處 | 製絲場 | 製繭場 | 冷藏庫 | 主要成品

重慶總公司 西康路九十二號
電話總機一〇八 電話四一七八六

南充電報掛號 三台電報掛號
閬中 四七六七 成都 四八二八

北碚 巴縣 南充 一廠
三台 閬中 西充 仁和場

極樂口第一 三廠 南充第二 四廠

三合鄉五廠 閬中第七廠

重慶李子壩 南充平城門
北碚 上饒

改良種 改良生絲 絲棉 絲筋

正和銀行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押匯 儲蓄 其他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利息優厚 低廉匯費

△扶助後方生產
△發展社會經濟
△促進戰後建設
△增益羣衆福利

行址：重慶林森路一〇五號
總行電報掛號：三二二二
電話：四一二六一
儲蓄部地址：重慶太華樓街八號
分行：昆明
辦事處：重慶

金城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及各種儲蓄存款

各分支行處所在地

重慶成都昆明蘭州柳州梧州平遙西安寶雞貴陽長沙衡陽漢口沅陵

重慶分行

地址：陝西路第229號
電話：42362號（經理室）
42363號（營業室）

民權路辦事處

地址：民權路新生路
電話：42011號（營業室）
41269號（經理室）

兩路口辦事處

地址：中三路（兩路口）2號
電話：2072號

沙坪壩辦事處

地址：沙坪壩正街19號
電話：6259號

信託分部

地址：民族路137號
電話：14615號

華僑聯合銀行

本資僑華粹純

服華兼業銀經

務僑為務行營

服務項目

一、代理收解款項
二、代理家屬生活費用
三、代辦兒女升學事項
四、代辦投資企業事項
五、代辦旅運事項
六、代辦調查通訊事項

地址：林森路八十八號
電話：四一二七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短評五則

羅斯福總統哀辭

民主不死！自由不死！

「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可知者人事，難料者天道，在今日東西兩戰場正打得十分得手，德日兩主要法西斯快要引頸受戮的時候，而爲舉世民主國家所愛戴，所信賴，所懷念的羅斯福總統乃突以逝世聞！這眞是人類一個莫大的悲哀，世界一個最大的不幸。

上天對於一個偉大政治家的誕生，大概是最吝色的，像羅斯福總統這樣一個人，氣象是那樣的宏闊，思慮是那樣的周密，言語是那樣的溫婉，態度是那樣的雍容，意志是那樣的堅決，這豈止是非世寡儔，恐怕曠百世也不一遇啊！

羅斯福總統對於人類偉大的貢獻，不可屈指數，舉其最基本最顯著者厥有三端：

第一四大自由的倡導：一曰言論與表示自由；二曰宗教信仰之自由；三曰避免匱乏之自由；四曰避免恐懼之自由。

第二、租借法案的創建：這個法案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由羅斯福總統所簽署的，即以美國所節約的一切作戰工具，不分新舊，「援至民主主義的戰線」，其時效已經延續四年以上，凡今日蘇聯，英國，中國等所得到一切美國的援助，即以此偉大法案爲依據。

第三，大西洋憲章的公布：這個憲章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由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在大西洋上所共同簽定而發布的。在當時雖以美英兩國爲基點立言，但其精神是普遍適用於全世界的。現在在舊金山召集的聯合國會議，將樹立一世界的和平機構，即受此一偉大精神的感召而來。

假如我們得不着四大自由，則此次戰爭爲無意義，假如沒有租借法案，則民主國家的勝利，或將成爲不可能；假如沒有大西洋憲章的精神，則世界的永久和平將無望！

現在提供這三大貢獻的巨人是與世長辭了，但他的偉大精神是萬古長存的！

讓我們高呼：民主不死！自由不死！羅斯福總統不死！

蘇聯對遠東漸趨積極

柏林搖搖欲墜，美軍在大琉球島登陸成功，蘇聯對於遠東的態度乃漸趨積極：一面任命比得洛夫爲駐華大使，一面更向日本提出廢止蘇日中立條約的通告，這可以說是事理之當然，蘇毫無可驚異。

蘇聯對於遠東，自帝俄以迄今日，其歷史關係的演進相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複雜，其東歐與中國境地相接，犬牙交錯，綿亙近三萬里，質言之，無論從歷史或地理上觀察，蘇聯在遠東所處地位之重要，初不下於英美，或且過之。

自中國發動對日抗戰，其首先予以援助者實為蘇聯，在我抗戰初期，無論人力與物資，蘇聯均曾有過寶貴的供給。一九四一以後，蘇聯因自身受着德國的威脅，其無餘力以助我，吾人雖諒之。蓋蘇聯在遠東惟一的敵人厥為日本，而惟一可引與為友者實為中國，此點在列寧與中山先生之間，若有同一之信念。

中山先生的聯俄政策，雖不幸中經頓挫，然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式恢復邦交以後，迄今又已十二年以上，雖局部或個別的小事，兩方所見仍偶有出入，但大體可云良好，且此種局部或個別的小事，事實上亦不難於改正。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由莫斯科托夫松岡洋右所簽定的蘇日中立條約，一時頗引起舉世之疑慮與惆悵，其實在蘇聯自身殆亦所引不得已而為之，現在德國的威脅已完全解除，此項條約的拘束亦即宣告廢止，則蘇聯當日簽定此項條約的用意，豈不已為舉世所共見？

自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二，德國開始侵略蘇聯以來，迄今已將及四年之久，在此四年間，蘇聯忍受絕大之犧牲，其人力物力的消耗殆不下於中國，而所賴於英美之援助者亦甚多，因之其作風亦有若干的改變，最顯著者如第三國際的解散，宗教自由的允許，以新國歌代舊國歌，凡此皆意在減少世人的疑慮，以便增加彼此之合作，其對歐洲各解放國家的態度，亦事事求與英美協調，初無專橫之痕跡，由此亦可見蘇聯態度之穩健。

現在歐洲的戰局已入結束的階段，蘇聯之重視遠東，亦如其重視歐洲一樣，在遠東必須與中國及英美精誠團結，其方針必與應付歐洲者初無二致，吾人惟有以萬分的誠意以靜待此偉大盟邦之合作而已。

如何處置日本？

日本失敗的命運，已完全決定，如日本能迅早無條件投降，則處置日本的辦法，假可如下，而所列應之假定：

一、戰後日本領土，僅能以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為限。

二、自九一八以迄戰爭結束，凡因日本侵略所受到的一切損害，日本須負全部賠償責任。

三、天皇制應予廢止，而代以民主，天皇本身及其親族，可禁錮於檀香山。

四、在戰後日本領土內，得有一時期之駐兵，其兵額多少與時期長短，由直接參與對日戰爭的各國視需要情形共同商定。

五、日本一切重工業須全部停止，并得沒收其機件，利用其技術包括工作人員為賠償的一部。凡與兵工，造船以及製造汽車或飛機有關之工廠，更應本此原則，嚴厲執行。

六、由直接對日參戰聯合組織一教育文化委員會，從根本上改造日本之思想，使適合於今後世界民主與和平之要求。

七、組織一賠償委員會，處理日本應向各國賠償的一切事宜。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八、組織一財政監督委員會，監督日本財政及其財閥之行動。

九、嚴厲懲辦發動此次戰爭的一羣禍首。

上面所舉的幾點，好像過於嚴酷，但不如此，則不出三十年日本依然可以爬起來，甚至可能爲少數野心者所利用，再成貽禍於世界，並貽禍其人民。吾人對其七千萬之人民，固仍望其能逐漸改造，終有一日能與吾人共享世界和平之幸福也。

赫爾利與拉鐵摩爾最近有關中國的言論

據美國新聞處四月二日華盛頓電：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先生曾在國務院招待記者會上發表談話，說明美國不願以軍火直接幫助中國共產黨，同時他也有一個意思說明中國不會變成法西斯，而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府可能在中國實現。

我相信：希望中國有一個統一的民主政府，運用其所有的力量以擊敗日本，這是美國一貫的政策。

赫爾利先生又說：「當中國的政府承認所有政黨的時候如在黃金山會議中所要做到的，他所希望的結果就可來到了。」可見中國各黨派公開合法的存在，也是美國所期待的。

但同時他却說：「中國的政治團結，只有在用以擊敗日本的軍事團結實現以後，方能實現。」這一點與我們所見的不同，我們知道中國不先有政治團結，決不會有軍事團結。

另一位精通中國情況的拉鐵摩爾先生，在他的一本近著「亞洲的決策」裏，也談到這個問題，他根據種種的事實，提出四點結論。

一、共產黨在他們區域中的成績不錯；

二、解決軍令問題以前開始政治談判得到一個妥協是可能的；

三、一俟中國各處人民有了政權，並有了人民軍隊的政府，這政府才能做到軍令與軍政統一；

四、成立聯合政府既爲政治妥協所必要，共產黨實力還不足以選出黨人爲總統，因此，將委員長仍會被選爲總統。

我們承認拉鐵摩爾所說的，更合於中國當前的需要與事實

關於貪污

最近關於貪污案件的紀載，幾於每天都有，每報都有，尤以上月份所發生的黃金提價舞弊案，更是鬧得滿城風雨。

然此還是僅就已經發現者而言，其餘未經發現或不許問罪而尚難確指者，更不知還有多少。

有人說：「只要把貪污之風從政治環境中根本的肅清，則中國政治的建設，即可日起有功。」然而說之是很，卓，但做起來眞是談何容易。

對於貪污風氣所以發極一時的根本原因，自來是說法多端，舉其最著者，則有以下的幾點：

一、俸薄不足以養廉說。這一說的內容，很簡單，大率以近年物價步漲，凡一切公私機關的服務人員，其收入即令時有增加，但終於無法與物價競賽，既仰事俯畜之無資，甚至個人本

国史馆 Academia Historica

金作行政上當困難，因受此實際情況的壓迫，乃不得已出於貪污的下策。這一說我承認有相當理由，對一切公務人員必須維持其個人及其家屬的最低生活水準，我也極端贊成。可是要把這一點作爲貪污盛行的主要原因，則我認爲很不妥當：因爲我統計最近一時期的貪污案件，少者十數萬元，多者至數千萬元，數字既這樣大，則貪污者不單純是爲着生計，可想而知。並且我從歷史上以及目前的種種事實歸納出一個結論，發現愈是有錢者愈貪，愈是耐窮者愈廉，可見貪污與否與一個人的生活困難與否并無必然的關係。我們應該提高公務人員的待遇是一個問題，但是否能因此便可將貪污的事實減少，却是另外一個問題，千萬不可混而爲一。

二、機構太複雜周折太多易於上下其手說。這一點確很重要，普通所說的「混賬」，「混水摸魚」，都是說在一種複雜情形之下，人們容易作弊。現其自中央以至地方的保長，上下縱橫千千萬萬的機關，眞是令人目迷五色，因此無論向官廳舉行一筆貸款，請求一種救濟，承包一件工程，徵納或領取一份貨物，甚至好意對政府有所捐獻，只要涉及金錢，即莫不被人明敲暗蝕，鬧得烏煙瘴氣，令人有苦無所控訴。至於暗取回扣，接受饋贈，移用公款以便私圖，那更是普通而又普通的貪污了。可是像這樣一種複雜情形，也只是容易誘致貪污的媒介，還不是貪污所以盛行的基本原因，因此單靠改革制度，僅僅只能作爲遏止貪污的一種幫助，決不能相信制度萬能，因爲在形式上一份最科學的報銷或統計，裏面依然包含許多毛病。中國人有舞弊的天才，能超乎形式以上，決不是一種形式的東西把它拘束得了的。

三、教育不良生心害政說。這一點是漸漸接近到根本的了，可是其說太抽象，令人難於捉摸。誠然在二十年以前，一個青年初出學校大門，對於社會上種種貪污的情況，確是不大了解，甚至服務了若干年，其人也還是很老實。近年從唯物，唯經濟一直到唯生活所享樂的種種說法，猖獗一時，且附以種種曲解，於是把大家一層禮義廉恥的外衣，剝得乾乾淨淨，全體都是赤裸裸的，一個青年初到社會服務，大抵已不問事業是否合於自己的志趣，首先注意的便是待遇，甚至計較到正當收入以外，有無其他的好處。這種風氣的養成，既非一朝一夕，要加以矯正，也決不是短時期所能有功，不過不能因爲教育的改進收效很緩便加以忽視就是了。

上舉三說都道着了貪污盛行原因的一面，但或者並不十分重要，或者非一時所能補救，單靠從這些原因上以求挽此頹風，是不容易有效的。然則這樣說來，政治便永無清明的一天了嗎？是又不然。舉其最基本的改進辦法約有下舉的幾項：一曰實行民主，以樹立輿論權威；二曰厲行法制，法行自上；三曰登用人才以學術與操行爲標準，屏絕一切貪人敗類；四曰居高位者，正己以率國人；五曰對一切過分享樂者嚴予取締；然後濟以對公務人員生活的保障，盡定制度，簡化機關以明責任，再加以從教育上予以長時間的培育，其庶幾乎，然此已非有魄力，有辦法，有遠見的政治家莫辦，恐怕仍非所論於目前。

★ ★ ★

Academia Historica

邱吉爾氏民主政治標準七事釋義

張君勱

英首相邱吉爾氏於意大利脫離軸心同盟，簽字於停戰協定後，曾遊羅馬，視察前線將士，同時告意人以何謂自由何謂民主政治，其標準凡七，舉之如下：

（一）人民有無自由發表意見，反對政府，及批評政府之權利。

（二）人民有無權利，推翻其所不贊成之政府，憲法有何方法使民意表現而出。

（三）司法法庭，是否免於行政當局干涉，是否免於羣衆暴力威脅，與夫黨派因緣關係。

（四）法庭所舉行者，是否為公開與制定之法律，在人心中視之為合於真宜與公道。

（五）不論為貧為富為私人為政府官吏，其國中是否有公平競爭之風氣。

（六）各個人之權利，除其服從國家之義務外，能否保障，確認並提高。

（七）尋常工人農人以其勞力糊口養家為專者，能否免於一黨獨裁下之特務警察之滋擾，即能否免於納粹與法西斯主義國中之格殺太保，不經審判而拘捕人民置之圈圄之中。

邱氏所謂自由，即人權之謂也。自由發表意見，即言論自由之權利也。反對政府批評政府，則有反對黨之存在，即結社之權利也。不經審判不得拘捕，本於英國人身保護狀之意，即人身自由之謂也。不論為貧為富為官為民，是否有公平競爭之風氣，是所以使人民在法律上立於平等地位，不至以貴凌賤，以強欺弱，各有其努力上進之機會也。如此言之，邱氏之用語，雖與尋常憲法學者論人民權利一章之措詞不同，要其精神則一。

吾人讀邱氏標舉民主政治七項標準之言，深覺其與威爾斯人權宣言，法國人權協會之人權宣言（另詳），有不相類處，即兩種宣言皆以理論為出發點，而邱氏獨重事實，兩種宣言力求其所想像之各種事態之周密完備，而邱氏但指出言論自由，反對黨存在，司法獨立與特務警察之應廢止數端，其所以顯然不同之故安在歟？曰邱氏所陳，政治家之言也，但就政治上主要關鍵言之，而其次要者自含於其中。舉反對政府批評政府一點言之，則反對黨之存在也，反對黨之合法地位也，與夫人民之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自在其中矣。舉司法獨立言之，則法律之應代表民意，法官之不受干涉，與夫除法庭審判外，不應拘捕人民，自在其中矣。邱氏之言，為意大利人民發也，為反對法西斯獨裁發也，為指示意人革除法西斯之舊習發也。法西斯政治之特色，為言論之權操於一黨之手，為國中但有一黨，不許有其他黨之存在，為注意人民之言行，乃有祕密警察之設置。邱氏就此要點，指而出之，則民主與非民主之別，自然大白，其與威氏人權宣言之臚舉各項自由，各項權利者，不可同日語也。

吾人以為邱氏所舉七項標準，有英國數百年之歷史與近百年來各國民主政治之習慣為背境，彼以寥寥數語了之，在外人

Academia Historica

讀之者，或難於明瞭其義蘊，茲分為七目而解釋之。第一，個人權利之保障；第二，言論自由；第三，反對黨之存在；第四，政府之遞退；第五，人身自由之保護；第六，司法獨立；第七，公平競爭之風氣。

第一、個人權利之保障。一國之內，一方為政府，他方為人民，兩者常相對待，猶地球之有南北極與電氣之分陰陽極也。英人就兩者之對待，以謀兩者之平衡，一面鞏固政府權力，他面保障個人自由，兩方之銖錙悉稱，他國鮮有能與之並駕者矣。英政府之所以達此目的者，在其政府與人民知此二者不可有偏輕偏重之病，在其人民品性中養成此種觀點而習慣。自大憲章以來，人民有抵抗暴虐忠國王，國王亦鑒於人民曰：非經全國大會議之同意，不得更改法，不能收租稅，此即政府權力與人民自由之平衡之第一事也。在人民一方有納稅服兵及參加公務之義務（如地方自治及為陪審員等是），他方則有出席國會為人民代表之權利，此權力與自由之平衡之第二事也。人民既有自由，其行使自由也，有其不可侵犯他人與公衆之界限，此權力與自由之平衡之第三事也。既有國家，既有政府，則權力方面之分量常重，而自由方面之分量常輕，於是在美法兩國人權宣言之前，英國於一二一五年大憲章中，已規定有保護人民之法。其第三十九條曰，除依國法及同等級人之審判外，不得拘囚任何人民或處罰之。第四十條曰，對於任何人，不得出賣或拒絕其公平審判。第四十二條曰，應許任何人由水陸兩路來去英國，自由旅行，三項中，雖未詳敘人權，而一刺自由，然其間以保護人權為主，近數百年來，英人之言論，由與結社集會自由，以等於憲法之國，此項人民之基本權利，未見於憲法條文之中，然其進步，日在擴大之中，不因其不見於憲法而遂落於他國之後也。英人對於其所享受之權利，初未出以其為我所有之故，而稍露放縱恣肆之態，主持言論者未嘗以言論自由之故，而出於漫罵，列舉政黨者未嘗以結社自由之故，而造成多黨林立之局，此以英人深知權利之享受，常與義務之担負，相為對待故也。其為英政府者，亦知因時代之變，對於人民權利，隨時加以擴張，譬之數百年前人民之所爭者為徵稅同意權與人身自由權。然國大革命時代，轉而及於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與選舉權改革，及至二十世紀則為工人組合權與工人集體議價權與社會保險權，英政府每能利導而提高之，絕不默守成規而失其通之宜。故邱氏第六條之文曰，除其服從國家之義務外，對於個人權利予以保障，確認與提高，即表示權力與自由之平衡與其自由之因時代而擴大之謂也。

第二、言論自由。 合百萬千萬萬萬人以成國，其利害是非不一矣，政府惟有周詢博訪以求民意之所向。吾國古代頗記過之史，微瞽之牽，進善之旌，謗木，敢諫之鼓，所以防壅蔽之弊而求聚聽之明也。西方之英國，其議會政治自十三世紀迄於今日，未嘗一日中斷，其為議員者來自貴族與人民之中，視諫議大夫之由人君點陟者，其地位迥乎不同。及至近代，通儒國事者，非獨少數人，而為全國之人民，所以傳達事情者，非僅口口相傳，而尚印刷文字為電報往還，於是所謂言論出版自由，乃成為民主政治最重要之武器矣。薩德士氏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之關係曰：

言論自由，自古已有，久已認定新聞與論新之傳佈之職掌，應許之任何人自行，任何人得以印行其所欲刊佈之材料，惟按之法律，自有其濫用權力後所應負之責任。米爾敦氏著『大憲判』一書，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主張不須報照之印刷自由之第一篇文字，自是以來，其為民主政治之友人，皆認為言論出版自由為民治不容或缺之要件，亦以此故，此項自由早已列入各自由國憲法條文之中矣。有一古語為民主政府信賴者，其言曰：「讓人民知道眞事實，且有討論之自由，則各事自歸於妥善。」良以既有自由報紙，所提供者為眞實事實，則偽者自無於隱藏而羣起而攻之。各報紙互相競爭以發眞事實者之所好，則眞者自見，而偽者無所遁形。自由討論正所以為辨別眞偽辨別善好之良法也。各人得提出其意見，以供人採擇，而表決衆生自知取其善者而舍其不善者。衆人表決管轄，入歧途之日，然既有自由之言論，自能歸於大中至正，與禁止政管之藏頭露尾者不可同日語。故言論出版自由乃民主政治公約中之第一礎石也。

歐洲各國自法國大革命以降，從未有禁止人民之言論自由者，其明明所以為之者，自上次歐戰後之獨裁國家始。此等獨裁國家中，但有一黨，不許他黨存在，既有一黨，其言論亦只有一種，不許有其他歧出之政見，於是不獨反對黨之報紙在取消之列，即民間大印刷所之不隨聲附和者，亦在沒收之列矣。國中既但有一黨，但有一種言論，則一己獨是他人盡非之局，因以形成，擴張軍隊也，增加人民負擔也，對外侵略也，遂以發之，甚於肯人瞎馬夜半深池之境地，而人國人表如之何。今日德意諸國所以淪於國破家亡而國中輿論竟無能出而阻之者，豈一以此乎。此則邱氏所以列言論自由為第一條，而尤注重反對政府批評政府之言論也。

第三、反對黨之存在。　國家集多數人而成，其利害其意見既不一致，於是政府臨其各持一說，或聽彼等為實現其政見計而各成一黨，皆所以顯到各方利害而為因時代謝之計也。今兩黨有兩種政見，甲時以甲為是，乙時以乙為是，使甲時之甲必取乙而誅鋤之，則及至乙時，將無可以代甲而起之他人，而國家之元氣與人才，消耗於冥冥之中矣。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二者固相反者也，第一次歐戰前英之自由黨，持自由貿易政策，為人民所擁護，及至戰後之會議之日，而保護者先見之明驗矣。二次大戰之前　英國張伯倫內閣，固以對德綏靖為長策，邱氏之主張備戰者，人目之為好戰派而排之，然一九四〇年五月後其地位為首相者，舍邱氏莫屬。抑政策之變更，豈惟英國，即蘇俄何嘗不然，忽與德訂中立之約而袖手旁觀，忽因德人威脅而與英美同盟。甲時採世界革命管而成立第三國際，乙時取消世界革命管而解散第三國際。是政管受環境與時代之支配而繼更，自理勢之無可逃者，惟在英國則各黨之主張由兩黨分門担任，而在蘇俄出之於同一政府，此其所以異也。按人情物理言之，衆人之意見歧異，則代表者權政見之政黨之發生，自為事理之必然。英國知其然也，乃隨歷史之沿革，而勒之為定制，議會中除政府黨外，許有反對黨，名之曰「王陛下之反對黨」，平日批評政府及對政府方針，其所以發言者，非為雜亂無章之個人，而為反對黨之領袖，及至內閣倒塌之日，反對黨首領由英王召見，屬以組閣之大任，即在兩黨對峙之日，政府適有外交大問題，常召集在野黨代表使之預聞其事，及至對外作戰之日，則兩黨合作以成混合內閣。故反對黨之正式承認，久為英國憲政上不可缺之部分，惟反對黨領袖之由國家領取俸給，則自一九三七年始耳。總之，人民意見以政黨為發達出於一，則反對黨之存在，自然發生於政治進化之際，則而行之殆有永遠多元的政黨制之日也。

Academia Historica

第四、政府之進退。民主之國，確認主權在民之原則，平日許人民以言論結社之自由，人民於政府，以爲然者可之，不以爲然者反對之。列身政府者，對於國家大政，何者應爲，何者不應爲，在大選之中，示人以政綱，及每年議會召集，預算提出與夫討論方針之日，一旦內閣失去議會信任，則徇民意而辭職。張伯倫氏於一九四〇年春夏之交，對於德軍橫行，束手無策，迫於衆論，不得不辭職以去，爲世所共見共聞者矣。英國之例，任屆大選之日，在朝黨議席減少，在野黨議席增加，則在職者自請辭職，薦賢自代，一九二四年之選舉，保守黨議席增至四百二十席，於是麥唐納去而鮑爾溫繼之，及一九二九年保守黨人數降爲二百六十席，於是鮑氏去而麥氏又登台，及一九三一年金融風潮起，則麥氏自知其獨力之不克負荷，而混合內閣因以成立，皆以一己進退取決於大選中之民意與議會中之多少數也。即美國不行議會政治者，其總統州長與議會，例有任期，每屆選舉之日，即民意對於政府對於議會有所可否之日，杜威氏也，羅斯福氏也，皆四五千萬人之民意定之，豈如獨裁國之不容民意有所選擇於甲乙丙丁之間哉。邱氏第六條曰人民有無權利推翻其所不贊成之政府。此種權利，昔爲必待政府罪惡昭著之日，羣起而爲革命之舉，故美國獨立宣言中之言曰，倘政府違反其所以建設之本目的，（如保護人民權利），則人民得起而變更之廢除之。今則有選舉，有議會矣，所以更易之者，以選舉中議會中一舉手之勞，而新陳代謝之事畢矣。何也，依大選舉中之多少數，與議會中之多少數，爲政府進退之標準，其爲民主國憲法上習慣上之成例久矣。

第五、人身自由之保護。民主國既確認主權在民之原則，其爲民者，應有其理所應有而不可動搖之權利，此之謂人民基本權利，而基本權利之中如言論自由結社自山家宅自由等等，尤莫如人身自由之要重，以一人之身，或拘之於囹圄之中，或受軍警之監視，則身且不能行動，更何言論結社之有哉。惟其然也，英國自昔有所謂人身保護狀之制。凡警察非先獲有逮捕狀者，不得捕人，既捕之後，即移交法庭，不許作長期扣留，被捕者通知其家屬後，得請求交保釋放，如法庭不許，得更向高等法庭請求，此即英政府尊重人民自由之良法美意也。此種制度在英之運用何如，可舉例以明之。某婦人言行失常，警察疑其爲精神病捕之，關地方官吏知其逮捕出於錯誤，立即釋放，贈以賠償費五百鎊，以免雙方興訟，英內務部長更表示抱歉之意。戰期之中，英政府根據國防法案，制定拘捕命令，然此項命令權之範圍何如，每爲英國法庭所爭執。一九一六，一七年戰時，甲乙兩人犯助敵嫌疑，警察捕之入獄，於是發生有關於未證明有罪之拘捕命令之範圍問題。時英國上院承認此項拘捕爲合法，且聲明其未嘗違反人身保護狀之制，以其有國會立法可爲根據。及戰時既了，平時心理回復，政府又復宣言曰：非經國會之授權，不許不將人提交法庭按法審判，而擅行使其拘捕權。蓋採用英國法院拘捕權不得因命令而擴大行使之意也。一九三五年〇瑪司氏被捕後，向法庭控告警吏之不法，繼而法庭判決，謂當擾亂治安之危險將發生時，警吏自有侵入私人家宅之權。然一九三四年法西斯黨大集會，場上有人提出質問者，會中施以毆辱，於是社會人士大譁，責政府何以不加干涉，英政府答之曰，除非有擾亂治安之危險，警察不應侵入會場。究竟此時之英政府是否有意袒護法西斯，雖不可知，然其尊重平日不侵犯人民集會與人身自由顯然也。要之，英憲之中以尊重人身自由爲慣例，其社會與法庭對於政府之拘捕權嚴

Academia Historica

加限制，即政府之發佈拘捕命令，亦不顯其任意擴大，觀納粹與法西斯國，設為祕密警察之制，動輒以人一言之不慎，而置之集中營或處以死刑者，其合乎情理與背乎情理之相去，奚啻天壤。此第七條之所由來也。

第六、司法獨立。

民主國中之大政，除行政與立法二者外，司法之重要，不如二者之引人注目，然其國中設施之是否公平，是否正直無私，則決之於此而已。各國憲法，或為成文或為不成文，無不有主權在民，尊重人權，人民在法律前平等與夫以法律定之等語，所以表公平與平等之精神貫澈於上下也。然憲法與立法，雖有此種規定，所以澈底實行之者，在於英國所謂法律之統治（平日亦譯曰法治），其意曰行政與立法一切應依法律之標準而進行是也。美國兩院制定之法律，是否合於憲法，大理院得因人民之控告，加之以判決，如法院中認定法律為違憲，則此項法律即失其効力，此乃以法律之統治限制立法，獨在美行之，不見於其他國。以云英國，本無成文憲法，其法院自無由判法律之為合憲為違憲矣。然英國之所謂法律之統治，依英憲法學者戴雪氏言之，含有三義。第一，維護正式法律之至高性，一切專擅行為，如以帝王大權為藉口，以政府之廣泛斟酌權為藉口，皆在排斥之列，譬曰人之受罰，視乎法律是否有明文，如法律上無規定之文，則不得任意由政府處罰，此所以根據法律以防止專擅之行者一也。第二，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凡英國官吏侵害人民權利者，人民可以在普通法庭上控告，與歐陸各國官吏立於行政法庭之下者異，因而官吏有對人民賠償之義務，此所以根據法律以防止官吏對於人民之濫權者二也。第三，在他國中認為憲法之一部，且為人民權利之源泉者，其在英國則此類所謂憲法，立於普通法律之下，譬之皇室之地位與官吏之地位，在他國規定於憲法中，而在英國則此二者由私法之原則決定之。英國受此三原則之支配，因而其政府不得行使至高無上之權力，以壓迫人民，其人民之生命財產，處處受法庭之保護，不至受政府之蹂躪，以視德意兩國政府不知有法律，但知有黨令，不知有國會相反兩方之評論，但見有一致之舉手，因而無行己意，無所不為者，即一有法律之統治而一否耳。

上文所言法律之統治，與司法有莫大關係，非法院與法官維持其尊嚴，則法律之效力決難振充至於此境。此自有歷史上至遠之淵源，非兩強而致之者，而英國法官之有學識有操守，不受政潮波動，為人民所尊敬，亦其重要原因之一也。英國法官之崇高地位之維持，由於以下各項，第一，法官為終身職，非行政部所能任意任免，除因過失或議會批評外，不得免職，此為一七四一年來之慣例。第二，法官為杜絕其外誘計，畀以極高之俸給，初為法官者年俸五千鎊，大法官一萬鎊，視尋常為行政官為教授者不可同日而語。第三，法官之行使其審判權，不受外界干涉。第四，法庭之審判，一律公開。第五，法官中絕少等級升遷，不必有所逢迎，以為進級之地。此數者乃英國法院所以能公平審判，而維持其良好之司法傳統也。

由此言之，國家也，帝王也，官吏也。皆立於法律之下，謂法庭之効力貫澈於國民之全部生活可也。國民代表本至公之心，以制定法律，法官又本至公之心，以解釋法律，以執行法律，則全國之心中咸知其有一至公之標準，至可恃之保障，而號樂於作好犯科而不自圖振作乎。乃法西斯國家之執政政黨，挾其黨的武力，殺人放火於街市之中，滿佈祕密緹騎，伺人言行，或拘囚，或置之死地，直視法律如無物。則此兩種國家之

Academia Historica

執治權，執與新立，實待問後知定故。

第七，公平競爭之風氣。全國表面生活於同一標準之下，則人人爭自將礦產雖有痛苦而不至有絕望之安分守己習慣成爲習慣。譬之以運動謀走到平坦寬廣之路上，各人應在同一路上出發，不許阻擾他人，若其間判員者許其親暱之人先跑許干涉人，某人則否，如是計算繩墨，是得謂爲公平乎。欲求競賽者拿出新本領得乎。更以開會言之，某團體發號召衆人計，定其某日期會討論某事，及議事開始，發言者紛紛，乃發起人民甲等之發言不利於己，竟至動武，逐之而去，既曰開會，則明以辯論爲原則，竟乃以暴力勝人，而托名開會，是得謂公平乎，是權利平等之習慣安從而養成乎。如上所言，猶爲至微之事，不足以見不公平之影響爲何如，再以事之重大者明之。甲乙丙丁同爲商人，向銀行借款爲活動資金，各交保人各簽訂合同，其條件至酷也，然其爲甲者奔走於部長與總長之門，因而通融資金以數千萬計，或利用公家車輛運輸，則盈利大而致富速者，自爲此輩而已。政府對於商人待遇之不公如此，又誰肯奉公守法，而不奔走於權貴乎？政黨爲民主國中必有之結合，然甲黨恃其有功於國家，或在選舉之中，引誘人民投票，許之以酬報，或在議場之上，不遵議事規則，不將票數清算，擅將其所主張者，由出席人狂呼，或由主席爲同黨之故宣告通過。若此議事規則，任意蹂躪，安有合法決議之可言。而守法習慣，安從養成，其被壓迫者，心懷不平，起而反抗，則國中之和平與秩序，必難保持而成爲亂國已耳。此公平競爭之原則所以爲英大學之學生臨合會中與運動場中所特別注意，謂英國政治上之良法美意，本於此四字可也。

嗚呼，民主之所以爲民主，曰民意有所宣洩，不至隱懷不平，激而生變耳。因施政之善否，有所以監督之者耳，曰有公平競爭之法以定各人所應享受與其所應節制者耳。曰其政黨制度，許人民以選舉，因而易達內部之一致耳。此數者，在以上七項標準之中，向有其雛形之遵與運用之法，證之英美其餘，昭如日月矣。乃卻有墨索里尼氏與希特拉氏，本其獨出心裁，恃一黨之暴力，假長官於不暇，以爲安內攘外之計，除在於是，與諸勝於內，而其對外之成績何如哉。或者將反詰之曰，墨氏希氏雖以獨裁而亡，然法蘭西爲民主國，何嘗不於一九四〇年春夏之交一蹶不振乎。法國政治上所以不如英國者，其理自多矣，姑舉一二端以明之。英人對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人身自由等事，爭之惟恐不力，至於國家權力之運用，每出之以負責與合小異趨大同之精神，兩黨在議會中之辯論，各有領袖，其所發政府之言，由領袖自身爲代表，既以代替政府之方式出之，及其執政更迭之日，自免於小黨角逐之弊。平日議會議事時間，獨由政府支配，非尋常議員所得主張，所以集一切時間於政府手中，以防止一國三公之弊也。反國家對外作戰之日，則兩黨停止黨爭，改造一黨之內閣爲聯合內閣，併心合力於戰爭之勝利，此則英國議會政治之所以長久也。法人不識並中運用之妙，平時政黨離析，及其戰時則成爲分崩之局矣。吾人倘以法國失敗爲民主政治之過，是因噎廢食，因殺廢刀，不見食之利，而但見噎之害也，不見刀之利而但見殺之害也，其可通乎。

十一月十四日於重慶。

Academia Historica

論國民天職

余家菊

民覺二卷一期 26.4.15

尤里安赫胥黎有言：進化結果，多非進步而僅爲變化，又或有所前進，亦祇是一面的前進，命定其歸於死亡；但與質之進步皆貫通於其中。（查本民覺一卷十一期張申甫譯現代學人的責任）人類之進步乃人類之必然命運；雖有大力，莫之能遏；既遇拂逆，莫之能止。天賦人以向上之性，人雖不自覺，而其向上之行終演進于古而不息。人世文明，實植其根基。於是人類前途，實繫是而具有樂樂；人生奮鬥，亦由是而保得其價值。天之於人，其慈愛之心，可謂弘深極矣。

人依天性以制行，文明基於天性。吾人有慈愛之心，故能保種合羣。吾人有向上之心，故能日新又新。吾人有斂遜之心，故能尊重他人。吾人有判斷之力，故能辨別是非。孟子所謂仁義禮智四端，人皆有之者是也。仁爲惻隱，於同胞愛；是非爲惡爲向上，爲進取；禮爲謙讓，爲尊敬；智爲判斷，爲理性。人皆具此四端而莫知其所從來，强名之曰天命。性內天賦，非人力所能自主，寓於各人之身，而超於各人之上，爲一切善行之所淵源，教化之所依據。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就質體言之，所謂天者，宇宙之總名也。人在宇宙中，屬其一部，質爲全體中部份。部份爲構成全體之要件，全體爲範圍部份之輪廓。離部份則全體無以成其形，離全體則部份失其依存。人爲天體構成之要件。無人類則天有虧缺之憾；天爲人類存在之憑依，無天則人類失其範型。姑以自然現象明之：無日之照臨，熱熱無光，則人生失其發育之機能；無人，則光與熱失其推動文明之作用。耕稼之事不起，光彩之色不耀，雖有宇宙，宇宙亦且黯然。日往而不丹，月沒而不來，漫漫長夜，肅殺嚴冬，縱有人類，亦且蟄伏。故人之爲人有賴人乎天，天之爲天，亦有賴乎人。兩者之關係，非單體而對立者，乃部份與全體之關係。故互相影響，而互爲主勢。天人感應之，在本質上無誤，推於程級上係有時失衡，估計人力而失於過大，認天意可隨人意而任意轉移，則有補救無效等迷信，認人力爲天力所無能作抗衡，則陷宿命等說，而有宿命論。人力可以回天，但須遵循一定法則之可尋。故天人交感，[illegible]但其利害人亦有一定法則之可尋。故天人交感，[illegible]人陷溺發其必然法則而遵行之。

就天之爲理則言之，則天理至高無上。人當篤其己力己智以勉趨上游，而其勉之行亦不能自外於天之理則，其各種途徑，更不能軼出於天之理則以外。故天之理則，於人[illegible]之力，雖大勇大智，無所施其技。人之不能違天，正猶[illegible]能逃於今身，發軔之不能逆於一車。理之所在，[illegible]爲活躍，脈脈貫於全身之外自所孕力，實天[illegible]爲人間[illegible]人苟欲於天之理則以外自顯慧能，[illegible]天之怪異[illegible]於[illegible]。藉使人之活動不受拘束於天之理則，是若將各活私意，無[illegible]定軌，不可測度，則給紊狀態，無條理可尋，人類活動何所[illegible]以爲調協之憑依？故宇宙必須具有必然而莫得自外之理則，[illegible]人統實受其宰制。故曰天之理則，至高無上。換言之，即宇[illegible]法則，無可改移，莫可逃脫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天之理則，人類奉而行之，莫能自外，故天之率制力爲必然的而非任意的。今有天則於此，或從或違，常人每覺其身保有選擇之自由，揆諸事實，始如攀登階梯，立於梯之中級，或上或下，似可自由；但決意從下，則必墮九淵，決意向上，則可升九天；其一上一下，自有一定歸宿，未可任意改易之。奉天則，反天理，人各可以自決；不知奉行天則，則必然日躋於光明；違反天則，則必然日即於禍殃。或從或違，權操諸己；而從之斯有縱之之形勢隨生，違之斯有違之之機運俱啓。此必然之形勢與機運，非人力所得而突破，必將自食其報。有時似可突破，反禍爲福，實則於此場合，天之理則本有其另一方面，足與此一方面相抗衡，而人不曾認識，遂誤執此一理則爲不可違反耳。所謂曉之在前，忽焉在後者是也，又有人見善惡之報稱，不能刻舟以求，遂謂爲惡得福，爲善反得禍。不知惡人得福非緣其惡行，乃由其惡行之外，自有其可以得福者在；善人得禍，非緣其善行，乃由其善行以外，自有其致禍者在。明乎此理，則於「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斯可無疑焉。

天之於人也，悲憫弘深，欲人人各得其所，各樂其生。使天而無慈悲之意；則人之奮勉經營，動遭拂逆，摧之折之，虐之損之，雖有智勇，何術保證其成功。人類其所以能免於淘汰存者，皆由天賦人以求生之能，而能運用其才智以圖謀其生也。或謂天既愛人，何不置人類於又保證「有努力即有收穫」完全康樂之境，使其不陷於勞苦憔悴之中？推斯說用意，殆欲上天代兆民耕種，代萬衆紡織，不勞而足衣足食，以坐享其懶惰之福。天果如此，人世直成行尸集團，吾力雖薄，亦必奮力以擊破之。或謂天既愛人，何故世間有種種疾苦，如羸肉强食者。不知世有疾苦，非緣天意。使天而果欲施行其疾苦者，則吾人不得覺知疾苦之非正，今吾人既知其非正，是天已顯示其眞意所在，而將假手吾人以去之。奉行天則既爲吾人分內事，則世間有一分罪惡，即吾人有一分天職未盡。翹首冀未來，罪惡何時稀？吾人途程，甚爲遼遠！吾人任務，甚爲繁重！吾人開闢地，甚爲廣大！吾人當以愉快之心情，歡迎鉅艱之負荷。有一分之努力，天必報吾人以一分之結果。故曰求則得之。

天總將左，有求必應。天之應人之求也，又必遵守一定之法則；天不能人之求之也，而變更天則。天不違反天則，天亦不能背棄天則。故天道至公無私，至正無奇，至常無偶。天不擅作威福，其有所威福，皆由人自招之。故自助者天助之。天道人道，同條共貫；求天祐者，當盡人事。孔子所謂「丘之禱久矣」者，即此意也。或曰：奉行天道，當恪遵人間軌則，但人間理則，有不合正義者，毋乃將藉天則之名而拘執不變乎？應曰：天既示吾人以不義之存在，是即天未欲保持此不義，吾人之天職正在於改革之。漢視不改，咎在吾人之違反天意。天於罪惡不負責任。故曰：天道至仁。

天則由人表現於人間，人生義務即在與天則而實現之於人間。唯天則之實現於人間，殆無完全圓滿之一日。正因此故，吾人當自强不息，永求進步，不可中道而廢。倘實現天則，果有一日而完全圓滿，殆將安息優游於其中，更無所須於進步，從而無所須於努力。唯完全體履天則，惟聖者能之。至於常人，則體履之時實少於違反之處。故須能改過。能知己過者，不有見乎天則。窺見天國之形象，殆能洞察人間之罪惡。有所憧憬於未來，始能不滿於現狀。始向上要矣，而致知次焉。人不詳究事理，不知罪惡之所在，與夫天則之所當然，鮮不卑隨自安者。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天則之內容，凡各種學科所顯現之眞理，皆爲天則之實質，吾人要當就人類智慧之最高成就一一舉而行之。唯判斷知識之眞僞，亦有如下標準之可循。

一曰發揮人生之主動性。人類在宇宙中之地位，由屈伏而漸卽於主動。完全主動，雖無其時，而主動之分量，則隨時而俱加。故人類對於自然，當日增其控制之力；對於人類前途，當日增其自主之能。

二曰發揮人間之諧和性。人與人相處，當互求助益，而共去侵陵。剝削國人，固屬可恥，殘殺他國民，亦是文明汚點。愛之範圍，日求其廣，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敬之對象，日求其多，鰥寡孤獨，不敢侮慢。存民胞物與之心，爲老安少懷之事。

三曰發揮人生之自覺性。今日之人類，已知自求控制其命運，而特意致力，於可用知識之探求，且督策自身踐履之。當月之行爲，偏見之支配，皆當力求解脫。務期以自覺之心情，爲獨立不依之生存。

人生天職在向上，向上之目的在求進步，進步之特徵，有三項如上所述。此三項者，實符合於仁義禮智之四端。是皆天所與吾人者。國民欲使其國家爲光榮之存在，必須視爲天職而踐履之。吾國民於其天職若能秉嚴肅之心情，爲篤實之踐履，則其氣象自將日卽於剛毅，純厚，眞摯之境地，一掃輕浮，譎詐，卑陋，之惡習。

或謂履行天職，難在天職之認識；彼教人奉行天意者，必設立一威權以任天意之啓示與解釋；如是之制度，固不得謂爲無理由，揆之國情，似難推行，不知隆師尊聖，固爲窺測天則之一法，而反之自心，亦自有其昭然監臨而督策吾人者在，非如其所示以實行，此心卽怕然不自安。仁義禮智，人所固有，就其發露處，把握而擴充之，能內不愧己，卽外不負天矣。客觀之天，正在主觀之我之中，同時又超然於主觀之我之上，以發揮其監臨督策之力。一般的法治，自有其價值，然欲國民履行法規，而出以眞切不苟，則內在規律終不樹立。

誠然，主觀的規制，有時失當；奉行神意者每以辨別執爲神意執爲魔欲不易而感痛苦。欲避免誤認邪見爲正見，第一須純正其性格，第二須博思廣辨，第三須務免已經確立之法則。認識爲性格所支配，有中正之性格，始有中正之認識。故澄心寡慾等工夫，有其價值。有中正性格以排除認識障礙，再加以思辨之功，認識之正確，自能得其保障。惟人生精力有限，欲與一切問題而統皆思辨之，是爲不可能；故當用象圖智慧以爲一己智慧，於科學所樹立之定理定律著是明確之理由，卽一一眞而行之。又於科學之所未立者，則依傍聖哲之教言，以其亦爲民族經驗之結晶也。吾國民能拖定踐履天責之誠意，而又於認識上佐以上述三法，當能早見國民氣象之丕變。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政治成敗論（二）

陳啟天

政治如何才易成功而不失敗？這是本篇所要研討的一個大問題。我們要對於此一大問題得到一個比較中肯的解答，須先認清以下數點：

一、須認清政治成功方法與革命成功的方法不同，所謂革命，或政治革命，是要用暴力手段推翻一個舊政府。在新政府未建立以前，凡可以推翻舊政府的方法，都可稱爲革命成功的方法。這種方法的特徵，在富於破壞性。至於通常所謂政治，是要用和平手段，建立一種公共的政治軌道。非由革命而來的政府，固須用和平方法推行政治；即由革命而來的政府，也須用和平方法推行政治。這種方法的特徵，在富於建設性。所以政治成功的方法，要與革命成功的方法有點不同。換句話說，革命成功的方法，不一定就是政治成功的方法。一個黨派可以革命成功的方法，奪取政權，却不可仍用革命方法推行政治。如果仍用革命方法推行政治，則其政治的必定失敗。這個道理本很淺顯，然而尚有人不甚明白：喜用「革命」二字來作政治的符咒，以應付一切。此可謂只知革命，不知政治。

二、須認清政治成功的方法與作戰成功的方法不同。有些人把政治當做一種戰爭，因而把作戰方法應用到政治。又有些人根本不懂政治，只知道一點粗淺作戰的方法，因而也把作戰方法應用到政治。這兩種人的看法和作法，都由於沒有認清政治成功的方法，應與作戰成功的方法有點不同。作戰成功的方法，在於集中全部軍力與間諜，以殲滅敵人。如果政治也用武力與間諜來殲滅人民和異己，那就不是政治了。縱勉強稱爲政治，也不過是「武力政治」，「間諜政治」，或「恐怖政治」而已。以之禍國殃民則有餘，以之求治圖強則大誤。所以先哲曾特別指明政治作戰的方法不同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對於作戰固不妨「以奇」，而親民治國則必須「以正」。如「以奇」求親民治國，則必使民益不親，國益不治了。所以先哲又告誡帝王說：「以馬上得失下，不能以馬上治之。」這種道理，先哲既早經點明，不待多說。無奈世人多以爲在政治上能如作戰一樣，用間用奇爲得計，致國事敗壞於冥冥之中，日甚一日。此可謂只知作戰，不知政治。

三、又須認清民主政治成功的方法與專制政治成功的方法不同，民主政治與任何專制政治不同，因此使民主政治成功的方法應與專制政治成功的方法有點不同。民主政治，只可用民主方法，才有成功的可能。如用專制方法，決不能完成民主政治。即民主其名，專制其實的方法，或偏向於專制與民主之間的方法，也均不能完成民主政治。現在世界正是民主政治時代，至於專制政治則已成過去。中國欲政治成功，惟有立即走上民主政治之路。不過中國政治尚在由走上民主的過渡時期，難免對於民主方法與專制方法分辨不清，對於尚待學習的民主方法有點遲疑。所以我國欲從現在起，即漸次走上民主政治之路，必須認清民主政治成功的方法與專制政治成功的方法截然不同，專制政治在今後中國決無成功的可能，必須決心用民主方法，以建立民主政治，才能獲得政治成功。

我們既經認清以上所說三點以後，可知今後中國政治成敗

的關鍵，全看能否採用民主方法以實行民主政治。能採用民主方法，以實行民主政治則政治成功，否則難免政治失敗。換句話說，今後中國政治成功的方法，就是確使民主政治成功的方法。至於不能確使民主政治成功的方法，則只是政治失敗而已。所以我們要知政治宜如何才易成功而不失敗，則必須同時明瞭民主政治宜如何才易於成功而不失敗。現在依據這種觀點，試說明政治成功與失敗的要義如下：

第一、態度開明，與時進步的政治，則易成功，態度頑固，與時背馳的政治，則必失敗。從政治演進的歷史趨勢看來，大抵是由原始政治演進爲貴族政治，復由貴族政治演進爲君主政治，更復由君主政治演進爲民主政治。每一演進以後的政治，皆較未演進以前的政治合於人民的要求。具體說來，即是原始政治不及貴族政治合於人民的要求，貴族政治不及君主政治合於人民的要求，君主政治不及民主政治合於人民的要求。所以政治歷史已演進爲民主政治，便不能復返於君主政治；猶之君主政治不能復返於貴族政治，亦猶之貴族政治不能復返於原始政治。這可叫做「政治的時勢」。順應此種時勢的政治則易成功，違反此種時勢的政治則必失敗。故先哲說：「治與世宜則有功」。當今政治的時勢，已堺世趨向於民主。因此可以說，當今政治的唯一要務，便是實行民主。能實行民主，則是治與世（按此世字即謂時勢）宜而有功；不能實行民主，則是治與世違而必敗。故先哲又說：「識時務者爲俊傑」。識時務，非趨炎赴勢的意思，亦非人云亦云的意思，乃是認識當前政治的要務而決心推行之。如何而後始易於認識當前政治的要務？依我們看來，全視政治的態度是否開明而定。政治態度開明，自能識時勢，不惜革新政治；政治態度頑固，則無由認識時勢，甚或以時勢的遷變而恐怖，益趨於頑固，自談不到政治革新。政治不能隨時勢而革新，則除失敗外，那能有成功呢？欲求政治成功，必須態度開明。態度多開明一分，則政治多成功一分。態度多頑固一分，則政治多失敗一分。態度能隨時開明，則政治永久成功。態度不能隨時開明，則政治及身失敗。態度的開明或頑固，既與政治的成敗有如此密切的關係，所以欲求政治成功的人們，必須先自審察政治態度是否已夠開明，識時務。如已夠開明，識時務，自不然政治失敗。如尚不夠開明，不識時務，便休想政治成功，則須自求態度開明，認識時務，而立即決心實行民主政治。我們要知世界經過這次大戰，時勢已大變了。中國經過這次大戰，時勢更大變了。如果仍用抗戰以前，甚至二三十年以前的老態度或舊方案，來應付當前業已大變的時勢，則恐難免於頑固，而與時背馳，雖欲成功，豈可得乎！所以我們說，政治成功的第一要義，是態度開明與時進步。

第二、以天下爲公的政治，則易成功，以天下爲私的政治，則必失敗。政治的根本作法，不外兩大種：一是以天下爲公，又一是以天下爲私。凡以天下爲私的政治，無論是私天下於一家，如封建政治；或是私天下於一人，如君主政治；或是私天下於一黨，如黨主政治，都不外以國家爲統治者的私產，以人民爲統治者的奴隸，以政權爲統治者的特權。既以天下爲私，則奪取政權與保持政權，均不得不獎勵破壞，橫暴，陰謀，殘忍，虛僞，姦詐，甚至獎勵貪污。歷史上的政治，多是以天下爲私，故充滿這種種壞現象。在這種種壞現象之下，只有壞人才易於生存而且得勢。何能使政治清明？更何能使政治成功？政治成功不可少的一個要件，是要一切從政者都有一點公

Academia Historica

心。如何而後始易於引起一切從政者的公心？全在統治者先有公心。只有公心，才能引起公心。如果自己滿腔都是私心，如何能引起他人的公心呢？既都是私心用事，則除爾虞我詐，相斫相毀外，談不到政治，更談不到政治成功。所以，說不以天下爲私，則政治必定失敗。要政治成功，便必須以天下爲公。以天下爲公，自能「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用不着使暴，使詐，使貪。既用不着使暴，使詐，使貪，則除軍事與外交外，沒有不可公開的政治了。政治盡量公開，是以天下爲公的一種必要表徵。政治多公開一分，則可顯示公心多一分。少公開一分，則是顯示公心少一分。故眞正以天下爲公的政治，必須盡量公開。不過一般人好以軍事上的名詞，移用於政治，以爲政治也要如軍事一樣「嚴守秘密」，那便不免大錯特錯。我們要知：政治上秘密之所在，即是私心之所在；政治上的秘密機關，即是搗亂機關。自己私心，而要人家不私心；自己搗亂，而要人家不搗亂，古今中外，決無其事。所以荀子說：「上宜明要人家不搗亂，古今中外，決無其事。所以荀子說：「上宜明則下治辯矣，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愿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強，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眩矣，上險則下姦詐矣，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眩則難一，姦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難一則不強，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生也。故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見荀子正論篇）這種道理，早經我國先哲闡明，似乎以天下爲公的政治，早應在中國實現。然而事實猶迄今未能如此，其故安在？在只有以天下爲公的理想，而無以天下爲公的辦法。從來賢哲多不易取得政權，而取得政權的人們又不一定是賢哲，所以不易實現以天下爲公的政治。要實現以天下爲公的政治，只有一個辦法，即實行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之下，政府由人民而組織，爲人民而服務，一切必須以公開的方式出之。執政爲賢哲固須如此，非賢哲亦須如此。不然，則不能爲執政。縱僥倖執政，也隨時有被人民推翻的可能。所以民主政治是保障以天下爲公的一種必要辦法。依此辦法而行，則政治易成功。反此辦法而行，則政治必失敗。

第三，容許民意輿論與反對派批評監督的政治，則易成功否則必失敗。一切人類，除少數聖哲外，多有三大弱點，一爲好私，二爲好蔽，三爲好諛。此三大弱點在日常生活上，固易於暴露，而在政治生活上，以有權勢的關係，尤易於暴露。古今中外的一切聖哲，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教人去私，去蔽並去諛而已。然而人類好私，好蔽和好諛的弱點，只靠少數聖哲的道德教條，尚未能完全矯正，必須政治另有辦法，使此三弱點不易暴露。但又可惜從來的政治不注意及此，致多失敗而少成功。何以見得呢？從來的政治多是專制，一切專制政治多不容許民意輿論與反對派的批評監督，便是一個明的證據。一切專制政治，多以爲民意輿論與反對派是他的敵人，大抵以摧毀，便難完成任何專制政治。以摧毀民意輿論與反對派爲政治成功，則其結果不過是政治失敗。因爲民意輿論與反對派經經摧毀以後，政治必發病於腐化惡化，暴露好私好蔽和好諛的弱點達於極點，而至於不可救藥。先哲說：「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擬（按擬謂不能相若）者存，自爲一而莫己若者亡」。（原文見荀子仲虺之語篇，此依荀子堯問篇引文）從前的諸侯，何以有師友便能稱王稱霸，沒有師友便難免於滅亡，則以有師友，可以矯正諸侯好私好蔽和好諛的弱點；而無師友，則無由矯正而已。不過一個人既經在政治上有相當權勢以後，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有家族親戚，故舊和左右重重包圍，不易接近師友。因此，不惟好私好蔽和好諛的弱點無由矯正，且益加甚。專制政治之所以多失敗而少成功，即在此一點；其所以不可救藥，亦即在此一點。專制政治既不可救藥，所以近代各國莫不以民主政治代替之。在民主政治之下，無論何人執政，對於民意輿論與反對派的批評監督，不但應該容許，並且必須遵從。因此人類好私好蔽和好諛的弱點，便易於矯正，而政治也隨時改進了。政治既可隨時改進，自易成功。所以常有民意輿論與反派批評監督的政治，多成功而少失敗。從前專制時代，人們多希望專制者以賢哲為師友，以保證政治成功，然而多不免於失望。現在民主時代，無國無民意輿論與反對派，只須容許其自由批評監督，即可保證政治成功。如不容許民意輿論與反對派批評監督，則是自求政治失敗，雖有賢哲，亦莫可如何！孟子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此係就對外而言。若就對內而言，則可說：「無民意輿論與反對派者，政治必敗」民意輿論與反對派似與政府相反，而實相成。其所以相反，在能矯正政治的錯誤。其所以相成，在能促進政治的改革。要實行這個道理，既要大德量，又要大智慧，更要大勇氣，非新政治家莫能為，此其所以難能而可貴。

第四、法律有威信的政治，則易成功；法律無威信的政治，則必失敗。法律是建立政治制度與推行政治設施的一個必要公共標準、有此標準，則政治制度易於建立，政治設施易於推行。否則，政治無確定的軌道可循，一切不免於亂了。政治，原是求治的，只能以治求治，不能以亂求治；只能以治治亂，不能以亂治亂。要以治求治，則莫如在政治上先建立法律的威信。無論何國，無論何時，都有法律，但其法律不一定有威信，尤其不一定在政治上有威信。其所以不一定有威信的主要原因：一、由於從政者好只用法律治人民，不用法律來治政府；只用法律來治人，不用法律來治己。二、由於從政者好以便宜行事為痛快，為威風，為便利，而不顧法律。三、由於從政者好只引用於自己有利的法律，而於自己無利的法律，則視同具文，甚至任意加以變更。四、由於從政者好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思制定法律，而漠視民意輿論。五、由於政治上的特殊勢力與祕密機關立於法律之外，專門破壞法律。六、由於法律的本身不合法，法律的內容不統一，和法律的改訂太頻數。七、由於實依着法律實行的重要。八、由於法律缺乏民意輿論的後盾。以上所說八種原因，有一存在，便足使法律的威信掃地，何況不只有一種原因存在呢？法律既因種種原因而無威信，則是雖有法律而等於無法律。無法律，或法律無威信，自談不到政治，更談不到政治成功。政治上最要的法律，是憲法及其相關的法律。政治是否有成功的可能，全視憲法及其相關的法律能否具有威信。憲法及其相關的法律，能具有威信，則政治易成功，否則必失敗。我們試略舉民國以來的憲法史說說，便足證明這個道理。民國以來，雖僅僅經過三十餘年，而憲法之多，實已超過其他任何憲政國家。元年有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及臨時約法，三年有袁世凱的約法，十二年有曹錕的憲法，（二十五年有五五憲法草案，尚待制頒）。憲法雖如此之多，却無一種在其有效時期真能具有威信，致憲法不成為一種具文，便只是一種點綴而已。憲法是憲法，政治是政治，二者漠不相關，甚至互相衝突。憲法因此而失敗，政治也因此而失敗了。其所以失敗的根本原因，大要不外以上所說的八種。另外還有一個根本原因，須稍加補說：那便是從來政治上有權勢者，多只相信

Academia Historica

人而不相信法，多只相信人治，而不相信法治。不知人的喜怒無常，親疏不一，公私難分，不一律以法治之，何能成爲人治？故眞正的人治，必同時又是法治。眞正的法治，也必同時又是人治。只相信人治而不相信法治，則不惟不眞了解法治，亦且不眞了解人治，要實行人治，必須同時實行法治，猶之要實行法治，亦必須同時實行人治一樣。人治與法治同時實行，然後法律始能眞有威信。法律眞有威信，則政治自不患不能成功了。就一般的政治說固須如此。就民主的政治說，尤須如此，所以民主國家不但要有憲法，（成文或不成文均可）而且要有眞有威信的憲法；不但要有合於官意的憲法，而且要有合於民意的憲法；不但要有人民遵守的憲法，而且要有政府遵守的憲法。憲法不合民意，而政府又不遵守之，則法律無威信，政治必失敗。憲法合於官意，而政府又遵守之，則法律有威信，政治必成功。

第五、善用權力的政治則易成功，濫用權力的政治則必失敗。一切政治，都不能完全離開權力，便不是政治。所以任何政治問題，又同時含有權力問題在內。政治問題既同時含有權力問題在內，則政治的成敗，必與權力的運用方法有密切關係，可想而知。扼要說來，權力運用得法，則政治易成功。權力運用不得法，則政治必失敗。權力如何運用，才爲得法？如何運用，便是不得法？換句話說，如何爲善用權力，又如何爲濫用權力？這是一切從政者必須攷察明白的一個緊要問題。然而一般從政者，每多只知熱心奪取權力，越大越好，越多越好。至取得權力以後，又往往不惜濫用，以表示其有權力，此可謂只知權力，不知政治。我們要知政治上的權力，好比是一個利刃，好好使用，則可長期使用；不好好使用，則恐傷著人，而不能再使用了。所以從政者不可不切實講求善用權力的方法。關於善用權力的方法，其要點如下：（一）凡用權力者，須知權力的最高源泉，只是人民全體，而不是個人，不是階級，不是黨派，不是武力，更不是天神。如誤以個人，或階級，或黨派，或武力，或天神爲政治權力的最高源泉，則均難免於濫用。所以先哲說：「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所以近代民主國家，多在憲法上明白規定：「國家主權屬於人民全體」。（二）凡用權力者，須知權力最高源泉既爲人民全體，則任何權力的使用，均須對人民負責任。所謂對人民負責任，不僅口頭或文字說說便算了事，必須由人民的代表機關，經常加以監督。凡不如此對人民負責任，便是不負責任的權力，難免濫用。（三）凡權力的運用方法，有單一而確定的規模，而使民權高於政權，政權高於軍權者，則是善用權力，凡權力運用的方法重疊，混雜，而無規模，致軍權高於政權，政權高於民權者，則難免濫用權力。（四）凡黨須是黨，政須是政，二者不相混雜，則是善用權力。否則，政有個政府，黨又是一個政府，兩重政府衝突，即難免不濫用權力。（五）凡以權力賦與私人者，則私人恃有私關係，必濫用權力。凡不以權力賦與私人者，則以其無私關係可恃，反能善用權力。凡以權力賦與秘密機關者，則以公衆不能過問，難免濫用權力。凡以權力賦與公開機關者，則以人人能過問，必可減少權力的濫用。凡使用軍警令人恐怖，則是濫用權力。凡使用軍警令人安樂者，則是善用權力。凡使用權力獎勵爲善者，則是善用權力。凡使用權力獎勵作惡者，則是濫用權力。凡使用權力令人敢怒而不敢言者，則是濫用權力。凡使用權力令人敢言而不必怒者，則是善用權力。凡善權依其性質劃分，而各

Academia Historica

合一才能相稱之人專負其責者，則是善用權力。凡專權不依其性質劃分，而使一人負其名義，見使一才能不相稱之人負其實際責任者，則難免濫用權力。以上所言各種運用權力的方法，都與政治成敗有極密切的關係。權力多濫用之，則政治必失敗；多善用之，則政治必成功。故政治不貴在有權力，而貴在善用權力。民主政治可使人易於善用權力，而難於濫用權力，要求政治成功，只有實行民主，別無良法。

與政治成敗有關的要點，當不止於以上所說的五大種。不過我們深信以上所說的五大種，確是政治成功的基本要義，故特別提出來說說。如果從政者眞能（一）廣開明，與時進步，（二）以天下爲公，（三）許容民意與反對派批評監督政治，（四）建立法律的威信，（五）善用政治的權力，我們可以担保政治成功。萬一不能，則恐政治終於失敗，致前功盡棄，未免可惜。先哲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我國政治狀況早經到了「窮則變」的時候了，何不從速用民主來變變，以求其能通且久呢！

雲孫隨筆

煙草之異名

陶元珍

煙草原產美洲，明末始經菲律賓入閩粵，經朝鮮入遼東，物屬外來，其初並無定稱。談遷棗林雜俎榮植類云：「金絲煙出海外番國，曰淡巴菰，流入閩粵，名金絲烟。」姚旅露書云：「呂宋國有草名淡巴菰，一名金絲醺。……初漳州人自海外壥來，莆田亦種之，反多於呂宋。」又清崇德四年戶部有禁種丹白桂告示，見文獻叢編第十二輯。曰淡巴菰，曰丹白桂，皆原名 Tabacum 之音譯。曰金絲煙，曰金絲醺，則皆新名。「丹白桂」「金絲醺」知者已較鮮。其尤異者。明清史料乙編第三本頁二三三石城島千總鄂定國隱匿甫獲鰕船參斤等情殘件云：「及審南靈草，則供曰，曆國處處產之，而平安島則更繁盛焉。八人帶有三百包，亦去王京貨賣。此草在他國名曰甘白炭，王京人食之爲業，天寒尤爲急需，所謂煙酒也。」「南靈草」「甘白炭」，均指煙草而言。知者更少。今「煙草」久成通名，前舉諸名，久作廢矣。

Academia Historica

歡迎民主戰士共同奮鬥

章伯鈞

現在是民主的世紀，參加這次世界大戰的所有聯合國家，都是爲着民主自由的總目標，向法西斯主義進行澈底的殲滅戰。隨着戰爭勝利的結果，絕不允許任何型類的法西斯政治繼續存在；因爲有了法西斯主義的保留，即是戰爭的禍根不能消除，和平的秩序不能奠定。

中國必須是民主國家，而且民主的制度必須是澈底的。中國的民主如不能澈底的實現，其結果：即是不民主的中國或半封建的中國之延長，對內將無由統一，達到和平的經濟的發展；對外更無以戰勝暴日，立足於民主國際的舞台。民主國際的舞台如缺少民主的中國，即等於世界和平的體系不能堅實的建立起來。遠東的危機，太平洋的風雲，將使整個的世界不能得到永久和平。因此，所有世界民主國家，須要一個强盛的民主的中國，作爲東亞安定的因素。同時，中國人民尤不能不竭其力之所能盡，把半封建的中國變成眞正的現代化的民主國家，脫離半奴隸的生活狀態，獲得近代人生的幸福。

在這個眞理的認識之下，我們民主主義者正面臨着一個重大的歷史任務。即是：在對日戰爭極艱苦的接近勝利的後一階段中，我們要使一黨專政的統治，走上全民的民主憲政之正軌，結束半封建的軍事官僚主義的政治，讓中國各階層的人民，同於民主聯合的方式之下，發動抗戰的力量，奠立民主統一的基礎。

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從無眞正的統一。這次民族解放戰爭，正是帶給我們統一的機會。我們若是故意的錯過了，中國的災難，將無底止。所以，中國的民主主流輪，正是統一主，正是愛國主義者。我希望，懷疑民主主義的人們，必須認這個道理。

現在，有人號召全國青年或有志人士，作第三次大聯合運動。他們說：辛亥革命是第一度的聯合，國民革命是第二的聯合。這種說法，似乎近理。但是，第一度聯合的共同目，是在推翻滿清的異族的統治，創立中華民國。第二度的聯的目標，是在消滅北洋軍閥的統治，恢復民主革命的中國。在，因爲上兩次的聯合奮鬥，同歸流產，爲軍閥官僚們開剝削和壓迫中國人民的道路，造成民族的災難，引起日本法斯的侵略，所以需要第三度的更廣大的民主的聯合。它的最目標，是在完成民族解放的大業，實現名副其實的民主政治絕不是爲保衛一黨專政延長半封建的統治。

我們現時所需要的民主的聯合，正是中國民主同盟所擔的任務。在三年以前，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以結束黨治實施憲政爲奮鬥的目標宣告成立。現在，因民主策動加速的發展，世界民主的形勢加速的擴張，中國人更需要更廣泛的民主的組織作爲民主鬥爭的團結形式。所以去年九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爲了適應這種新的要求，乃毫保留的改爲「中國民主同盟」，藉以結納全國民主的戰士，同肩負民主抗戰利民建國的責任。

在民主同盟的旗幟之下，它應當結合一切愛國主流者，族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它祇以崇尚民主和抗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信仰爲標準，不受思想派別的限制；但法西斯主義者則必須絕對的加以排斥，不能任其混入民主的營陣。

根據這樣的綜合衆流的觀點，民主同盟的前途，將是不可限量的。它應該在各社會階層中，各職業團體中，獲得大量的忠實的同盟者和信從者，它對其他任何民主抗日的黨派社團以至社會人士，必能和協的相處，必能在民主的聯合戰線之上進行共同的工作。

在現時的中國，若是缺乏這種寬大的民主風度和民主精神的龐大組織，對於民主政治實現的前途上，將感到重大的困難。所以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從各種不同的社會階層中，吸引大量的民主的戰士，參加我們的組織，以配合其他的民主力量，來共同解決中國的民主問題。

爲求民主政治的實現，必須有堅實的民主的政治組織作爲推動的力量之一。近代化的民主政治，必須有近代化的政治組織，如只有一散沙似的民主的個人，缺乏定型的組織，自然不能發揮集體的民主的力量。其次，如只有微弱的而又孤獨的政治組織，孤車作戰，亦不能發揮決定性的力量，因此，我們從民主奮鬥的人們，必須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向着共同的目標努力奮鬥。其次，我們必須坦率的承認着，在近代中國政治鬥爭中，根本缺乏近代化民主生活的習慣和作風。自民元以來，政治舞台上只扮演着官僚和政客的勾當，他們雖然曾經喊過「共和」「自由」和政黨的口號，但實際的政治行爲，不外是權術和詭詐的玩弄。我們這一代爲民主而奮鬥的人士，都應該切切實實的學習民主的風範，自檢自重，坦坦蕩蕩，爲我們的子孫開闢民主的新紀元。

雲孫隨筆

明神宗之死

陶元珍

文獻叢編第四輯康熙起居注冊三王撫遼三擢引蔣廷錫等傳奉清聖祖面諭云：「朕猶及見萬歷年間內侍，得悉當時情事。萬歷以輩臣教諭，乃立泰昌。泰昌卒日，極不能盡孝道。萬歷之終，亦不甚明。泰昌之立，不過三月，足見夷之報施不爽。」說至可異。案明神宗本偏愛福王，果光宗平日不孝，安有不易儲者？至謂神宗之死不明，尤不足信。光宗秉性柔懦，決非弒逆之人，且並無兵力，門衛至以老內官充之，（湧幢小品）何能行逆？博稽公私紀載，均無此說。爲此言之明內侍，當係鄭貴妃之黨，故以冀須有橫誣光宗也。聖祖輕信讒言，未免無識。

Academia Historica

試論蘇聯外交政策

孫寶敎

蘇聯朱可夫將軍率領大軍，現已抵達柏林近郊，這是文章初讀者見面時，柏林或許已經被蘇軍佔領了。德國的投降條件，以及如何處置德國，遂成為大家所注意的問題。史大林，羅斯福和邱吉爾三巨頭在這次會議中所討論的，當然亦以這個問題為主題。

要清德國，蘇聯居首功，換句話說，歐洲的解放，蘇聯出力最多，對德國，對歐洲，蘇聯應有最大的發言權。蘇聯的意見如何呢？

蘇聯與英美之間，其意見並不完全一致，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就是史羅邱三巨頭，也如此坦白承認。蘇英美三國間意見的分歧，我們必須要追溯過去的歷史，才能夠找出其原因。蘇聯自無產階級革命後，英美就對她抱着猜疑的態度，甚而處處加以防備，根本的衝突點是在世界共產革命和資本主義的不相容。自日本於一九三一至三二年侵略中國東四省，以及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國掌握政權後，英美才發覺，德日不但威脅西方民主國家，並且同時威脅蘇聯。敵人既然是一個，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之間，似應取互相的諒解，以謀共同對付之策。一九三三年美國承認蘇聯，一九三四年允許蘇聯加入國際聯盟，一九三五年法蘇和蘇捷簽訂同盟條約，就是在這種需要之下產生的。但此最不常，英法美對軸心採取妨息政策，以至於慕尼黑會議的離棄蘇聯，遂使英法美和蘇聯之間的關係，又惡化起來。蘇聯為爭取自身軍事准備的時間計，簽訂德蘇不侵犯條約。當時，曾有許多人，認為德國之敢於發動第二次大戰，乃是由於無後顧蘇聯之憂的緣故。希特勒後來終於進犯蘇聯。日本也隨着進犯美國珍珠港，英美蘇遂形成一條陣線，共同對抗軸心國家，但當時的猜疑和成見，若要完全消除，則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事。

蘇聯為打破英美的猜疑和成見計，於一九四三年解散第三國際。英美最害怕蘇聯的，是第三國際的世界革命。其實，自史大林掌握實權後，即放開世界革命的策略，而將重心着重於一國之內實行社會主義。但第三國際的機構，始終存在，所以英美政治家對蘇聯不能完全信任，認為蘇聯遲早要實行世界革命。現在第三國際既然解放了，英美似乎從此可以信任蘇聯了罷！

由馬克斯主義到列寧主義，由列寧主義到史大林主義，本來是一脈相傳。但史大林主義，于其說它是一種主義，不如說它是一套隨機應變和抓住現實的政策。史大林的作風，腳踏實地，不好高務遠。三個五年計劃，紅軍的增強，和最近給予十六邦充分的自主權，可說是史大林的充沛國力和鞏固內部的現實主義的必然結果。稱此次抗德戰爭為愛國戰爭，其原因也可從此找出。所以有人指出，蘇聯現正傾向於國家主義，而史大林想把蘇聯改為一個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若欲成為民族國家，就勢必因之發生許多問題，如邊疆，國防和海口等等，在以前注重世界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化的時候，這些問題可以看作次要的。我們略要瞭解蘇聯近來的政策，應該從這個新角度觀察。

Academia Historica

一個國家若以現實主義爲作風，則其政策往往以行動表現出來，換句話說，其政策的原則，只可從其行動中歸納出來。蘇聯就是如此。現在讓我們看一看蘇聯對德國，對波蘭，對芬蘭，以及對中歐南歐西歐各國，在行動中所表現出來的政策爲如何。

對德國，史大林曾說過，「不可能消滅德國」，但蘇聯決心消滅納粹主義和普魯士主義，使德國不能再事侵略。合日蘇聯最害怕英美的，是對德一軟化」，所以蘇聯堅持法西斯必須根本消滅，並且認爲如此之後，始能保持將來歐洲的和平。希特勒之流，必須嚴厲處罰，納粹黨徒和德國軍閥所犯的不法和慘酷行爲，必須帶回犯罪地點，由當地政府和民衆判決罪狀。德國應由英美蘇（法）共同佔領，蘇聯的佔領區爲東普魯士和德國東部。柏林由三國共同佔領，各佔其三分之一。關於柏林的佔領區宜，或組織一個三強共同委員會，共同負責。至於整個德國，三強是否組織一個共同委員會，則尚在不可知之數。佔領時期的長久，以及將來英美蘇，是否同時撤兵，亦仍是個疑問。現在我們所能斷定的，只有以下二件事：第一、蘇聯在其佔領區內，必須實行土地和社會改革政策，扶植平民和小農，抑壓貴族階級，大資本家和大地主，以杜絕侵略主義的根源。是故，將來在英美蘇的佔領區內，其經濟基礎將各不同。第二、蘇聯在其佔領區內，必將搜索德國的資本工具，機器，飛機，鐵道和船隻，以作爲對蘇聯的賠償，或將招集近千萬德國勞工，送往蘇聯工作，以抵消德國在蘇聯的破壞。爲使德國不能再再侵略起見，蘇聯進一步主張將德國分爲若干較小的獨立國，扶立普魯士，使其不能再起，蘇聯認爲必如此，始能斷絕[illegible]

用[illegible]德國根本上是件不可能的事，所以蘇聯又扶植自由德國委員會，保證德國將來仍舊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在國際間仍居一個相當的地位。自由德國委員會，自由德國委員會在目前所做的事情，雖然尚限於宣傳性質，但可能隨紅軍進入德國本土，而發生極大的作用。[illegible]來的德國政府是誰，現雖不得而知，但蘇聯扶植波蘭民族委員會的例子，已告訴我們將來的事態發展爲如何了。

對波蘭，則蘇聯決不承認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認爲其內部反蘇份子太多，不共與之共大事，所以另外扶植波蘭民族委員會，並且已經進而承認其爲波蘭臨時政府。蘇聯和波蘭的邊疆，應以寇松線爲界。爲補償波蘭東方邊疆讓蘇的損失起見，蘇聯主張應以西方的德國領土，割讓給波蘭。據波蘭民族委員會基[illegible]稱，波蘭的西方邊疆，不但包括東普魯士，且應以奧得河和納西河爲界。蘇聯當局是否贊同這種意見，現雖不得而知，但蘇德波疆界的必須加以修正，以及人民的互相遷移，則爲蘇聯已定的方針。邱吉爾曾說，大西洋憲章不適用於德國，似乎也已經接受這個原則了。殷格講起來，蘇波問題根本不存在，其問題只是烏克蘭和波蘭白俄羅斯和波蘭之間的問題而已。史大林口裏所說的一個強大和獨立的波蘭，其意義是指民族的波蘭而言，換句話說，分開這些不能相安無事的少數民族。

在此，我們須一述蘇聯對於疆界的態度。自德蘇開戰後，史大林曾一再聲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蘇聯疆界的完整性。蓋蘇聯自一九一七年革命和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內戰後，努力從事於恢復第一次大戰前的帝俄疆界。東方和南方的疆界，都恢復了，但西方的疆界却沒有恢復。實際上一八年德蘇簽

Academia Historica

訂的布勒斯特里多夫斯克條約，德國割去了蘇聯的西部各省，後來雖然戰敗了德國，但英法美並沒有把這些領土歸還蘇聯。比薩拉比亞割給羅馬尼亞，波羅的海沿岸三省，則成爲三個獨立國家。以寇松線爲蘇波疆界的提議，波蘭不但不接受，甚而進犯蘇聯，結果被波蘭佔去了白俄羅斯和白烏克蘭（比薩拉比亞的西北，有烏克蘭省份，一爲北部布哥維納，一爲東部加里西亞，兩者從前都不在帝俄版圖之內，但於一九四〇年併入了蘇維埃烏克蘭。蘇聯歸併該兩省的動機，自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除此以外，蘇聯所稱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疆界，實與第一次大戰前夕的帝俄疆界，無大出入之處。）

蘇聯和芬蘭之間，亦有一段極長的歷史。一七〇〇至一七二一年彼得大帝和瑞典戰爭的結果，俄國奪得了納凡流域，可拉利亞半島和維堡。後來，彼得大在納凡河口建立新都（就是今日的列寧格勒），如此之後，可拉利亞半島和維堡的佔領，成爲戰略地理上的必要條件，換句話說，俄國佔領該兩地，始可保衛其京城的不受瑞典的隨時侵犯。一七四一年瑞典對俄宣戰，希望奪回彼得大帝所奪去的土地，結果不但戰敗了，並且割給俄國一部分芬蘭土地。一八〇八至〇九年俄瑞又開戰，俄國仍戰勝，併吞芬蘭其餘部分。當時俄皇是亞力山大第一，信仰自由思想，所以芬蘭享有充分的自治權。俄國革命後。列寧給予芬蘭完全獨立，當時有人勸列寧，如果芬蘭爲俄國的一部分，列寧格勒就無被攻之憂，如果芬蘭獨立，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但列寧沒有接受這個意見，不但允許芬蘭獨立，並且同意將彼蘇摩港給予芬蘭。後來芬蘭內部發生所謂白黨與紅黨的內戰，白黨獲得德國的援助，戰勝了紅黨。芬蘭存在着一個白黨的政府，對蘇聯並不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但是自希特勒登台後，形勢就十分危殆了，因爲芬蘭隨時被希特勒的利用，而成爲攻蘇的跳板。蘇聯不能不日夜憂慮，隨時可能性，所以在一九三九年歐局緊張之際，曾和芬蘭政府商量，互相交換領土，以保障列寧城的安全。因爲芬蘭政府的倔強，終於爆發了蘇芬戰爭。實際上，蘇芬戰爭德蘇戰爭的前奏，不過間於蘇德不侵犯的條約的約束，德國不能公然援助芬蘭而已，奈當時世人不察，認爲蘇聯的攻芬，是侵略行爲，且有利於希特勒。我們從蘇聯對芬蘭的行動中，可以看出，蘇聯並無併吞芬蘭的企圖，不過爲保列寧城的安全起見，想把一七二一年的彼得大帝的蘇芬疆界，重新恢復而已。一九四四年三月，蘇聯對芬蘭的和平條約，更給予了我們的證明。

約之，蘇聯對波蘭和芬蘭，以修正疆界爲重心，關於這疆界，蘇聯堅持一九四一年疆界的合於歷史和合於自然。這疆界，也就是第一次大戰前夕的帝俄的疆界，所以有人說，史大林在恢復帝俄的舊業。但蘇聯保證民族的波蘭和芬蘭的大部爲獨立主權國家。蘇聯認爲這種辦法，從國際的公道上說，也很說得過去。

說到蘇聯對中南歐各國的政策，就必然要牽連到大斯拉夫主義。在共產國際時期，蘇聯避免大斯拉夫主義，而着重於國際主義。但自此次大戰發生後，大斯拉夫主義又興起了。不過，今日的大斯拉夫主義與昔日的大斯拉夫主義，顯然有些不同。昔日的大斯拉夫主義，由俄國的保守份子如教會所策動，今日則可以說是民主的，甚而是民族的，其重心在於經濟和文化的聯繫。再有一點不同之處，就是昔日的大斯拉夫主義注重於巴爾幹的斯拉夫民族，今日則以捷克爲其柱石。

一般人提到大斯拉夫主義，心中就會聯想到，這是俄國

Academia Historica

擴張其勢力的一種工具。但是我們亦必須要體會到斯拉夫民族本身的感覺。昔日因爲土耳其和奧匈的壓迫，使斯拉夫民族不得不向俄國中央求援之手。今日則由於德國的蹂躪，又不得不向蘇聯伸出求援之手。斯拉夫民族本身內部，尚有許多問題，將來是否團結一致，現雖尚不得而知，但蘇聯必不放棄這個機會，而努力向這方面發展。則是我們可以斷定的。

捷克是第一大戰後新興國家中，唯一有民主經驗的國家，其工業化的程度，亦遠超過中歐和巴爾幹各國，所以捷克在今後歐洲的經濟和政治方面，必佔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蘇聯的政策，即以捷克爲新大斯拉夫主義的柱石，所以最先和她簽訂了交互條約。

關於斯拉夫問題，蘇聯則以扶植塞維托元帥爲其解決方法。塞維托元帥是共產黨員，過去和蘇聯十分友善。他有起而組織民主的南方斯拉夫聯邦的可能，這聯邦不但包括塞爾維亞人，哥羅提亞人，巴爾斯拉夫人，並且將包括保加利亞人。

對羅馬尼亞，除比薩拉比亞這塊土地外，蘇聯抱不干涉其內政的態度。莫洛拉夫曾聲明，蘇聯政府無意併吞任何羅國領土，亦無意改變羅國現存的社會機構。蘇聯對羅馬尼亞的用意，與其對意大利的相同，在使世界相信，蘇聯並無赤化歐洲的企圖。所以蘇聯最先和意大利波多格里奧政府交換特使，並使意大利共產黨對意王室改變態度，認爲國王不是個人，而是一種制度，在戰爭未停止前，無改變此種制度的必要。

最後再到蘇聯對西歐的政策。自巴黎光復後，邱吉爾曾親訪英倫，邱氏的目的在和法比荷組織一個「西方的集團」。蘇聯在以前常常警惕的海軍，可以高枕無憂，但自空軍發達和飛彈等新武器發明後，英吉利海峽已經不成其爲國防的藩籬，所以英國蘇於在其鄰近的歐陸上，獲得一個基地，作爲安全的保障。英國這種對法比荷的觀念，本來和蘇聯對波蘭捷的觀念相同。英國這種觀念的背後，尚有一種更深一層的意義。就是此次大戰後，所謂英美蘇三強，以英國爲最弱，所以英國原想組成西歐集團，以便與美蘇鼎足而立。史末資將軍曾把這種觀念說得最明白。但史大林眼明手快，遂請戴高樂訪蘇，並簽訂蘇法條約。東西兩強可能衝突之間，總算找出了一個避免的方法。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蘇聯外交政策的原則：第一、帝俄疆界的恢復，亦即一九四一年疆界的完整性。第二、與鄰國締結同盟，蘇聯本身的安全。鄰國政府可以是資本主義的，但必須是反法西斯的和親蘇的。這些鄰國應適一層使其成爲英美蘇合作的橋樑，而不使其成爲以前所謂「衛生隔絕地帶」。第三、在國際間至少須與英美立於完全平等的地位。第四，準備與英美戰後合作。蘇聯認爲目前若在歐洲國家中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勢必要破壞英美蘇間的友誼，所以蘇聯極力表示不擬共產主義化波蘭、芬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意大利。但蘇聯仍認爲其制度爲世界上最善者，各國皆該加以模仿，但蘇聯目前不願加速其實現而已。世界共產化和英美合作相比較，當然後者更有實現，蘇聯今日所採方針，就是如此。

蘇聯對一切事情的看法，是從現實方面爲出發點，所以據筆者的觀察，蘇聯當局今日心中所想的問題，大致如下：如何免遭打倒希特勒？這是一切的根本，因爲不打倒希特勒，一切無從談起。打倒希特勒後，如何完全消滅法西斯主義？如何使德國不能再起侵略？其次的問題爲：如何維持與英美的友誼？其次可達到何種程度？英美的戰時合作能否延長至戰後？以及如何合作？各種可能性，蘇聯當局都會想到。甚而會想到戰爭雖勝了，但和平是失敗了的局面。

（一月十日）

Academia Historica

世界文化之前瞻

ALFRED ZIMMERN
超然譯

一、樂觀與悲觀

二十年以前，在使用英語的國家裏對於整個未來國際關係和近代文明的全體，有一種廣汎的樂觀情緒。威爾遜總統首先提倡國際聯盟的觀念，當時厭戰的世界就從那裏看出一個新秩序的希望；在那裏，一切國與國間的武裝戰爭，都成了陳蹟，各種人民將聯合於同胞觀念和正常合作之聯繫中。不但講台上，即是教堂中，也能聽到一種聲音，說黃金時代的舊觀念可以復活，而國聯乃是天國實現於世界上的第一步。

然而現在一般的意見，又因醒覺之後轉變到反對的方向去了。悽慘的悲觀，成爲今日通常現象。國聯——無論說是強大會員國——對於解決戰爭所遺留的政治，經濟的問題之失敗，引起了對於文化的前途的懷疑，甚至有人說，在這個四分五裂與破壞的世界裏，生命本身都不再有生活下去的價值；文明人唯一辦法祇有放縱自己於一種自殺性的絕望中，並且不必再求其族類的延續。

這本書的目的，便是要查出此項悲歡不常的情緒之潛伏原因何在，而且要證明此兩種情緒，按之事實之光照，均非正當。一九一九年的樂觀的太早表現，是不恰當的。他最大的錯誤是在於牠對放在文明人眼前的問題之重大程度，不能認識。他們假定那大問題可以在幾年或幾十年中，靠了一種政治機構，便可解決。至於一九三九年的悲觀，尤其不應該，因爲他們的立場，使人對於一種應堅持而不容牠逃避的工作，不能予人以動力，世界上[illegible]七年[illegible]聯政制之後所積蓄的能力，幾三年前更爲豐富了。

二、這問題的三層性

一九三九年給我們以挫折與灰心的問題，究竟何事？是不是我們和極權國家——或集幾個極權國家——關係上的問題呢？

的確，那問題是存在的，而且存於一種極緊迫的狀態下，他最麻煩的特性是：我們自己和現在德國政府領袖間遇入於一種扞格狀態，不論在政治上，學術上，道德上，的情態，毫無意見的交換與夫任何諒解之可能。

但這一個僵局本身類出了：我們和德國政府間的關係，就是另一個更大更深的問題中的一部份，這是什麼呢？我們和德國以及日本意大利的關係，其政治問題是否只是一個表面現象？我們與這些政府和他們的人民的關係的問題的實質，是不是含有經濟性——因爲有的國富有，有的國貧乏，有的國內有豐裕的食物和工業原料，有的國內的自然的賜與貧乏，這樣兩種國家的對立，其中就有一種不公平而易生的問題嗎？難道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人民不應該和英法美的人民有同樣的分攤世界上資源的機會嗎？難道德國，意大利，日本的政府不該和大民主國家的政府有同樣的機會來供給他們的人民以這種資源所能供給的較好生活嗎？而且因爲同一道理，在公平正義的旗幟下，難道不應該不分太小，不分强弱，不分前進與落後，全世界的人民得到同等的機會嗎？

假如我們承認「會」爲等之正當，即在國內同胞間已沒有這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種爭鬥，我們又怎能否認各種民族間應該有享受權利的同等機會嗎？我們只要注意到因資窮而抱怨的政府——那所謂無的政府——正在系統的利用他們所有的資源，或者從外交，或者從其他手段獲來的資源，不是用來增加人民福利或提高人民生活標準，或是用於發展他們未來福利有益的生產能力，而是用來增加他們的軍力，使他們能免於被封鎖或免於物品禁輸之苦。總之要使他們自己與和世界上其餘國家隔離，而能仍舊有效的生存。

這個情形顯示了：因世界資源分配不平均而引起的經濟問題，更牽涉到另一更深刻的問題的——就是為什麼需要這些資源的動機的問題。而這個動機的爭鬥有兩方面——一面是霸國軍事力量的動機，另一面是普及福利於人民的動機——不能靠着貿易壁壘的排除，移民壁壘的排除，甚至任一純經濟性的解決法來解決的。因為所謂動機是屬於道德的範圍，而非經濟的範圍。因此即令召集所謂經濟會議，各參加國胸中各抱一個因不同動機而發生的政策，是注定了要失敗的。一開始便有的局面就存在於各個參加者的腦中。因為動機的鬥爭的底子，是道德觀念的鬥爭；而這種鬥爭，成為有組織的鬥爭時，便是道德系統的鬥爭。

但是難道沒有另一種經濟情形，更宜於承當「經濟問題」的名義嗎？——關於在同一國體內一方為富人一方為貧人；富人一階級和窮人一階級之共同生活問題，不是更是稱為經濟問題嗎？

的確，在大多數今日世界上的國家裏都有一個這種性質的問題。而這問題不是將領土由一處移轉於他處所能解決的：因為軸顯然是由於一個或幾個超過國界的原因而來的，此種原因和較他世界政經濟系統是互相關聯的。

因此我們發覺這個麻煩，我們的這個問題能分成三個各別要素。第一個是政治問題，牠是銳利的徵兆是一面民主國家——特別是英和法——一面是極權國家——特別是德國——之間的目前的關係。第二個是經濟問題，牠最銳利的徵兆，是貧與富的對抗，這個問題到處存在，就是生活標準遠高於他國的國還是同樣的存在。第三、道德問題，他最銳利的徵象是，國際間信標準的下降，和某幾個以開化著名的國家內的人道和諒和的標準的驚人下跌——更不顧從正義和自由了。

我們把三問題依次討論：因為我們把牠們能他們所構成的複雜的癥結中清理出來，我們才能對於這個整和局面有所認識。

我們要依他們的重要性的秩序來討論他們的重要性，是和他們的迫切性的秩序正相反的。

道德問題是最重要，但不是最迫切，因為在一切政治生活中，他是一個永久不解決的問題。

經濟問題也沒有政治問題那麼迫切，因為牠是因近代生活中一般狀況而發生的問題——就是因資產革命所發生的狀況下的問題——故可謂為「長距離的問題」。

政治問題是最迫切的，因為照我們所瞭解，牠在任何時刻都可以臨到我們頭上，故可以謂為「短距離的問題」。

三、永久的問題

自人類思想開始及於政治的時候，在古希臘，在中國，在印度或在其他地方，都知道道德觀念和政治事實之間是有一種永久衝突。沒有一個時候，即使是在最優良的統治者之下，政治生活曾和最佳的私人生活——如在一個和諧的家庭裏或在親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密的朋友之間的生活——是一樣的純潔。

這是事物的本性裏的困難，決要剝付牠只有兩個方法。一個是退出一切政治生活，仍然留在現實世界中退出政治，也就等於退出普通社會生活，因爲一個公民私人不能把他自己和因他所納的稅的用途上所遭成的責任切斷。這種方法名曰「僧院解決法」，在基督教的各時中代曾經有多數人的思想中以此爲善法。除這種「僧院解決法」，不容許任何折衷的辦法；另一途徑就是根據今人類道德性的努力所對此問題以求解決，這就是尋常所謂「把凱撒的東西獻給凱撒」這一句話的註釋了。

將我們凱撒所應得者，獻給凱撒這句話中所含的道德性的努力，其義有二：

第一層，當我們對付凱撒時——那就是說當我們參加了政治時，無論如何，甚至被動的疑成政見之日，我們是處在一個規模較大，非人對人的世界中，其與人與人接觸中所生之是非好惡之判斷，相距甚遠。我們將普通的道德態度：如同情，忍耐，仁慈，和謹嚴的正義等，應用於政治上，較之應用於私人生活上，更爲困難。每一個人都知道在應付稅吏和海關人員時，完全以合乎良心的，恰當的舉止待他們，是多時的困難。

更進一步，那情形不只是要把道德，度自私人生活轉換到公家的環境裏去——就是對待征稅吏和對待友朋或家族，發生同樣感覺。而是要把這些道德態度應用於一個有牠自己的標準或技術問題的特殊環境裏去。可借一個行業中很普通的問題爲例，以資說明。醫師們，從開始時候起，便有一個在他可能範圍內要有的他自己的道德標準——確實，充其量不應低於普通社團的道德標準。同樣的，政治生活有他一種特別儀式，猶之私人生活也有一種儀式。換句話說，有一個方法，把凱撒道德化，把他作成一個道德的東西，爲了政治的情況和需要調整私人道德生活。但是要一般公民發現這一條路，或想出這些細節，便不如此容易，特別是在今日世界的複雜情形下，而這就是爲什麼今日有很多人漸漸放棄政治，勉求一個超政治的立場。如此一來他們就變成了陌僧，但是沒有和尚的美德，和他們對於祈禱的信念。

政治方面第二種努力要素，是由於政治和權力相關聯，而權力是一樣危險的東西。政治這帶着權力，因爲政治是離不了政府，政府的職靠在乎決議，在乎實行，有時使用強力亦是必要的。所以任何政府照我們說來是當權的。權力即爲政治之流通劑，等於經濟生活之有貨幣。權力本身無善惡，牠是中性而不帶色彩的，牠可以被好用，也能被壞用。牠的用途要看用之者的動機和技巧。但是，權力和財貨一樣，牠同時帶着大誘惑力和誤用的機會——因此使人類經驗下一結論曰：人類的性情是脆弱而不能財與以無限權力的。這就是過去時代中的政治中政治的思想，何以專心於探討如何約束權力而不影響其有效用途的道理。換言之，置凱撒於羈鞍中——意法的鞍子——而不影響其步伐。

以上兩種困難，自有組織的政治生活開始以來，就麻煩着統治者與其臣民及公民，但是按今日之狀況言之，他們的困難，更加擴大而深刻。這個深刻化由於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因國際接觸之加多，而引起的政流生活規模的擴大。今日，大都份凱撒的任務，不只爲一國的事務，而是國際上的事務了——那就是有關於世界上各種不同種族的男女的利益，都爲一國所應注意。對此複雜情形要將道德標準使用起來，比昔日之情況下，更加困難。譬之一個國會議員或一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羅人股東，要他記住他對於長春觀—（WELSH）廠工或蘭開夏（LANCASH ire）織棉工人有他的責任，已經是困難的；倘要他對印度或錫蘭茶場的苦力或非州開得（RAND）金鑛中的非洲人，發生良心上之不安，是更加困難，更有在事實上，並不遠隔，而一般英國人心理上認爲無關係的歐洲人，——要使他發生道德上的不安，就更艱難了。

第二個困難，是更爲深入。人們在今日覺得應用道德標準於政治是很困難的，因爲根本他們自己需對他們自己的道德標準，有所懷疑。五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還可以宣稱歐洲和海外使用英語的地區，是基督教的，在那種地方的生活確非眞正達到了基督教的標準，但至少這種標準的存在是被承認的。雖然祇是在口舌之間加以敷衍，也還對他有相當的虔誠並且公開的違反牠還是認爲可羞的。

這種狀況，大部份由於前代所延續而來的，那時候基督教的道德標準還有他自己的制裁方法——即墜入地獄的恐懼。中世紀的皇帝們臣子們主教們以及其他大人物，都知道假使他們對正義待人的標準有了失檢處時，不但在政治舞台上，在任何地方，他都將受到因果報應。然而今日，在國際關係的競技場中，這種制裁大部份都已失効力。同時也還沒有其他能代替他們的東西。今日握着權力之人，除了自己失敗以外，甚麼也不怕，除了權力的縮減外，甚麼也不以爲羞。最近以前政治生活不過乎一大套制裁與均衡；此種制裁一半爲憲法的，一半爲良心的。在今日主持國際政治的國家中，這兩種制裁都被取消了。其結果使世界上公共生活之均衡，陷於破壞。

還有，我們不能忘記的：即今日之國際關係，不只像素來在西方那樣的僅僅存在於基督教人民之間了，所謂被國際公法的條文所約束的「國際家庭」，包括講平國家，此等國家之治者與人民向與基督教傳統毫無關係，雖所謂國際公法，自此傳統而來，然在今日言之，除了堅守人家對於西方教義與西方習慣之差別外，已無其他意義了。在這道德混亂的狀態下，今日國際政治之行爲標準，比十八世紀末瓜分波蘭後，任何時代，已低下很多，並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或者日後更再下降，亦未可知。有人認爲壓制度的動力能支持如此之久，日南所正見到的崩潰，不早早發生在他們心理上，亦是一種怪事。

有沒有方法，能挽救這種狀況呢？

有，同時也可說沒有。

當然，十全十美的辦方是沒有的。沒有方法能一次將道德理想和政治事實間的緊張一旦除根，因爲人家已經說過，此種緊張——此種不協調——是潛伏在政治性的東西，其實是世俗東西——的常性裏的。

但是，可以下手的事情，也還很多，並且的確早就該做了，可做的早做，就可以給民主國家較豐富的知識，較有把握的政治學理，把他們內部標準應用到外界環境去，同時盡其政治責任的人，亦可以得到一種幫助。

政治情況的變動性太大，不容許像中世紀的基督教教師們所企圖的呆板的規則。但在信條的呆固性和隨和性的機會主義之間，還是有一條中間地段。關於確立政治行爲之一般原則，以成爲特殊環境之指導方針，非不可能的事。但在這幾頁小書中，沒有地位細論此事。我們只願指出，若非肯下堅定的努力工夫，將凝世紀以來我們國家裏關於星期規則和日常生活之間之鴻溝上架一條橋樑，——須由兩面動工的橋樑——那麼經濟和政治問題之解決實際上的進步，恐怕希望是很小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四、長距離的問題

這長距離的問題，是將人類社會和政治的習慣，傳統，與工業革命以來的情況，加以調整的問題。

「工業革命」這一個名詞，是歷史家追溯一段歷程，起於十八世紀末葉，所造成的發明與其後來所生的現象而言。

這些發明本身是一種新方法，即採用科學與實驗方法之結果。此新方法是十七世紀以來，所以求自然界智識之進步，與所以藉科學以求發明之進步。兩個英國人在這紀錄裏佔着很卓越的地位——一個是培根，他是科學方法的先驅者，另一個是生頓，他是有引力的發現者。這些人和他們的同事，散佈在西半球的試驗室和學院裏，成爲那個步驟的主動者，而當那步驟在十八世紀末發得了重要時，便在百餘年之中把昔時人類曾經數千年之久方能完成的，今則於數十年之間竟將人類生活方式表大加改變了。喬治三世坐上寶座和喬治華盛頓長大的世界，外形上更近於埃及法老王，尼布卡尼撒（NEBUCHANEZZAR）凱撒（JULIUS CAESAR）和沙理大帝（CHARLEMAGNE）的世界，而不像喬治六世和佛蘭克林羅斯福的世界。

我們都熟悉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嫁妝，第一工業時代爲火車，輪船，紡織機，和其他機器——此爲煤和鐵時代——第二工業時期爲汽車，飛機，無線電，和其他機器——此爲電力，內燃機和輕金屬時代。我們對於他們十分熟悉，認他們爲當然的東西，好像是一種意外之財，使我們能不受到陳舊習慣的束縛，而享受到新便利和新舒適。但是我們沒有權利僅僅做科學家的寄生蟲。思想家，發明家，和組織家實現了工業革命，並且天天在發展牠的革命的動力，彼等所努力，做求我們同樣的努力，——要我們控制這些新力量，引導他們到有利的道路上去，——簡單言之，要把工業革命，轉變成爲一個社會革命，也就是說把開始是一道經濟步驟的東西，即其初爲世界經濟制度的變化，轉變成一個能改變人類社會生活的手續，而使得科學家從自然界奪來的成果，能滿培根所說「爲救濟人類生活狀態」之用。

工業革命替人類帶來的新可能性，可歸結於三個字之中：能力，富足和相互依賴。

從史前時候起，人就靠他們自己額上流汗來維持生活，因爲每一個人種社會基礎，須有一大羣工作者——不論是奴隸或名義上的自由者——一天一天的忙於勞力的單調的工作，科學把這道苦力的符咒解除了。牠的解決方法，就靠以機械力代手工。此以機械代替手工之法，始於多少年代之前，如野獸與笨，如水車，風車和其他發明，均屬此類，不過近發代來，更以不能度量的速率前進了。現在世界上的工作，雖非真正不靠肉體的苦力，廣義的也可算是免於賤役之苦。機器對我們猶之奴隸，對於早期文化有一樣的効用。但我們還須要控制機器。我們對指導他們的用途的目的，當然不能控制機器。這又使我們回到動機的問題——到上面所說的道德問題上去。

從不可記憶的時候起，人們就憂慮他們自己和他們的附屬者的飢餓。在每一個人類集團中總有一個現存資源的限度——一個由於自然原因，「自然的吝嗇」的限度——這個限度祇要一個季節內有一次歉收，就能達到了的。「飢荒」這字眼，帶着這種事件的相關形態和相關的心理狀態。飢荒的存在，並不就是說全世界缺乏穀子或其他必須的產品。埃及法老王的七個荒年，也許正是美索不達米亞的豐年；不過其中隔了一個阿爾伯沙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漠。「飢荒」表示一種缺乏，而在牠當時情況下，是不能用外來資源消除的。

「飢荒」在今日言之，是過去的事。如說他們還存在，他們就是科學家或政治家經把他們消滅後之狀況的餘蹟。所以消滅由於兩個原因：第一曰富足與第二曰互相依賴，由於農業化學家的勝利，把「自然的吝嗇」征服了，更由於交通和運輸的進步，取消了地域的障礙。

假使科學消滅了自石器時代以來籠罩着人類生活的兩件事，第一是饑餓，第二是匱乏之憂懼；為什麼他不能使世界成為更快樂的世界？為什麼無數富的人，還是工作過度而食不飽呢？為什麼世界上的人要排列在敵中的陣營中，奪取財富和權力，而互相鬼鬼祟祟，不肯供給是窮困的一方，有所盈，他方便有所虧呢？

這件事是很簡單的。些困難的原因，不在外表形象中。四分五裂上的力是最夠完成人世界的工作。資源也夠供給全世界的居民的需要。一切糾紛的原因，在人類心理中。世界上的居民所想像的力的人，簡直太多了。法老王的力是一人之力，把力看作法老王和尼布卡尼撒之所謂力，而不是像尼格拉瀑布，由他個人優勢所維持的，他的王杖便代表他拿棒的大棍。尼格拉河的力，在美加邊疆之上，不是私人的力，而是公衆的力，是受人統制而為鄰近居民謀利益的力，且不是白白廢棄，而用之於「救濟人類生活之用」的力。

同樣的，人們還拿老式吝嗇鬼的觀念來看財富，拿財富當作一堆金子或珠寶或其他實物一樣，只是用於私人的娛樂，一串不絕的飲宴和其他享樂上。他們對於財富不像民主國家的財政部長最近的看法，只作為一公共財富之流通，以發揮其對於團體生活之一般進步之最大效力。

人類思想趕不上工業革命所引起的外表情況的變化；此種失敗是由於兩個不同的原因，此兩種原因之不能辨別，為造成現在悲觀之大因。

第一個原因，僅為普通人類之保守性。人類是懶惰的動物。要使他覺得有改變他的成見的需要，必須要給他一次打擊，像一位思想家所說的，名之曰「思想上之刀刺」。人類之養成新習慣，須要相當時間，甚不博學的人，他們日常工作就是思想；他們的存在就是觀念，也須要相當時間以適應他們的思想於一新環境。歷史家們用了一百年的時間，才認清了在他們眼前發生的是什麼，才給他定名曰「工業革命」。在普通人更須費較長的時間來認清正在進行的事件，並認識牠對於世界和對於他自己的特殊意義。換句話說，在發科學推動了的運動人和類思想的運動中，有十種時間上的落伍。在較古的時代中，這種不一致是沒有的，因為世界的外貌和普通人的思想一樣，穩固且不變的。其實二者都在不停的運動中。不過他是那種在一世紀後至少在二代之後才看得出的運動，是冰河的運動而非急流的運動。今日科學所注射於世界的外表者，為急流的動力，而大多數人自己的想法，還是遺留在冰河的節奏上。其結果就是我們所看不見的不調協；舊式觀念，舊式節目單，舊式標語，甚至口號，都被應用於牠們不再有任何關聯的情況上，變之，在此萬物豐足的時代中，猶以征服領土為戰利品，在此相互依存時代中，猶有借其處於封鎖地區，以斷絕其與世界貿易之往還。

以上所云，即證明國聯如何會產生於一點毫無準備去接受他的世界上。宗教革命之前，曾有幾世紀的爭辯。一百餘年的

Academia Historica

試驗，才能決定國聯今日下了大道。但在歐洲、美洲或澳洲—且不論亞洲非洲—有誰在於一九一四年達到最高潮的那世紀中討論到國聯，或其有關的問題呢？

如何克服這困難？應有什麼工作，才能使人類思想追及所發生的事件？吾以為有兩個藥方—一曰教育，二曰經驗。我們的命運還沒有達到能先受教育而歷經驗的程度；如一般父母希望於他們的子女那樣。我們被迫着先受痛苦經驗的教訓，方能改變過去的懷情性。我們今日都知道國聯乃是一個問題而非萬靈的藥方。今日所需的，是要應用我們的思想，於此問題之上。因為我們已經渡過二三十年的光陰於白日夢幻之中，現在我們正要踏入一個政治教育的時期了。

以上所云，把我們帶到人類思想與今日世界外貌不一致的第二個而更基礎的原因上去。這原因是潛伏於人類天性本身之中的，在構成我們結構的大部份的遺傳性中。

在這裏，我們一定要旁及於生物學方面來講一講。

今日之悲觀與幻覺的散失，大部份是由於科學反駁了進步的信念，昔日吾人祖宗認進步為信條之一者，今日已在動搖之中。

五十年之前，一般生物學家都承認「既得性質」—一個生機體在他生命期中所得到的肉體和精神的特性，—和原有遺傳的結構，同樣由甲代到乙代的。這個信念才使早期的社會科學，對人類的社會進步，認為確然可靠的。他們以為生物學給他們以一種權威，可以想像到一個激速前進的環境下，展開了人類天性之發展。改進的環境，可以引到人類天性的改進，而人性的改進又可再有更進一步的環境。此種歷程等於利上加利的複利，從兩面加起來，其利益自不可限量，祇要待諸幾個世代之後，西方文明的輪利，就能擴充至全地球之上。而任何地方的人民，不論為古代東方與原始的非洲，就都能在西方制度之下過着和諧的生活。昔以詩人坦尼遜與當時科學相呼應的話來說：「將來世界上只有一個單獨政府，就是人類的國會，或曰世界聯邦」

我們在今日知道以上這些希望，是不能保證的。「既得性質」決不能遺傳的—至少不能如社會學家或政治學家所希望的那種程度。就實際言之，所需人性的原料即本能與衝動，性情和態度等等，不僅和法老王，尼布卡尼撒時代一樣，而且與石器時代會是們所要應付的，一模一樣。每一個才生的嬰孩—就他沒有被先天所影響來說—還是一個石器時代的嬰孩。在此觀點下，可以使我們看出我們問題的一部。此問題便是原始人生於摩登世界的問題，更確切地說，就是小規模人生於大規模世界裏的問題。

我們每一個都是小規模的男人或女人，我們每一個人的本身內都帶着一個遺傳的結構與人格的原料。這些均從人類開始起，生活於與小空間內，微小社會集團裏，經過無窮世代，而臨到我們身上的。我們怎能希望一個石器時代的結構，把自己調整起來和「相互依存時代」一切情形相適應呢？

我們的答案是：由人類歷史的經驗來判斷，這種調整不能說是無法達到的。假使石器時代的結構，不能禁止人類成群成族人和羅馬人，英國人和法國人，義國和英帝國的公民，為何人不能擴充他們的習慣的水平，社會良心的和社會義務的範圍，以至於包括全世界呢？這可名曰第一步—從穴居到村居，從血統的關係到鄰居的關係的那一步—是最艱難的；因為一個村居，有了分工，有了生產者：貿易者和工匠，已是一個小型的

國立故宮博物院 Academia Historica

世界了。雖然從工業革命開始以來，不知不覺已過了六七世代中，人類的政治歷史已在分崩離析了，人類對於世界普遍環境的知道他們的質和量，在解決他們時，我們只能得到很小的進步，因為在一九一八年以及其後幾年中，多數「國際主義」的擁護者，不理睬此項所遭遇的潛在困難，所以我們還停留在今日的地位上。因為要實踐一種主義，提出一個計劃，其中假定有「國際主義」是適合於普通男女的，此種做法不僅僅是從事於一個無結果的動作，並且牠要鼓勵起一種反抗運動，這種反抗運動是從人類天性最深處所得到牠的動力的。

所以接近這問題的正當途徑，不是給大家以一套的「世界聯合」計劃，而是要求他們支持牠的方法實與信者對於這主題的理解相反。那是要從另一端開始，並且要問那一種是變化我們既有的社會與政治的習慣和設置的最小的變化，所能幫助人類收穫「能力」、「富足」，和「相互依賴」時代的利益？解決我們的問題所需要，不是最大的變化，而是最小可能的變化，此種變化恰可以使小規模的人享受大規模的世界的物質利益，獲得所有開放於他們的一種較佳生活的一切可能性，而不使他們有內在的不快，不使他們知道工業革命帶給從日本到中非的許多人民的不和諧。

我們拿這種眼光來看這個問題，牠可處理部份就多些了。

大多數人願意以一部份的時間生活於適合他們的小規模的集團裏，但是並沒有阻止過去的大規模社會和政治的社團的發展，所以也不必阻止未來更進一步的發展。鄉村裏的雜貨商，和就治着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英國的下議院門口的警察，以及在國聯所在地的脚夫，我們都可以稱他們為小規模的人。但是最後所稱人山，並沒有坑害他們的自當生活。今日所要求於人類的組織，實在是十分單簡的調整，容易得多。在其一時期內，那實在是雜貨商的親先是十個由變的英國人，那就是說要求他擴大他的眼光，比要求於他的子孫的更大。因為我們現在不請求普通人在「民族」中過日子，不過是英國愛國主義的要求與國聯所在地的「世界的事業」是「世界的事業」罷了！

。我們不過請求今日的普通人，在他的行為中，作為公民的這一部份，應該使他自己習慣於較大他的眼界，而在暗示要想着廿世紀的「共事業」是「世界的事業」罷了！

以人類的大多數而論，這種思想上的新習慣的發生，但是以應付解決我們的問題的條件了。並不是需要大多數人終日懷着世界性的頭腦，所需要的不過是那些管理國家的大多數人，有些時候應該具有世界性的頭腦。所謂有些時候，實在是說成對一切政治的而所時，所需要的極有時候，所需要的極有時間已。由於這種關係，我們就能夠知道，要求這種問題由政治家以有限和以經的方式供給他們是多麼的重要了。一代之前，所未曾夢見就實現，假使大英帝國聯邦將來，各民族間必須有的協定的條文，一定可以減縮成最簡單的幾句。這句話應用於全體文明人間所需求的協定的條文，就更為適當了。這是一個心理上和政治上的眞理，也許凱洛格公約的簽訂者要比和約的作者，更懂得牠些。

但是，假使我們放鬆對普通人民的壓力，認為他們生來就愛在柏格森，所謂「緻密的社會」內生活，那末誰來推行我們這相互依賴的世界的日常國際活動呢，還是很成問題。這個問題就是領袖民族中的百分之一，或更少於此數的公民的問題，因為他們才負起跟「異族人」密切接觸，並且詳詳細細的實施

Academia Historica

無數種的調整，以獲得合理而和諧的大規模生活狀況的實際實任。

這些都是所謂「出口貨」——外交家，外國記者，商業旅行者，財政家，職工團體和其他職業組織家，作家與藝術家，和許多國技術和性情變成的種種「國際人」。這批人終日生活在這廣大的世界中。所以需要特殊的性質，和特殊的思想態度，有些人生來就具有這些特殊的性質和態度，有些人則靠了近年來所發達的那種方式的教育的幫助，更有些人，也是其中最好的，好像是生來就如此的。然而，又有些人生來就不會獲得這種特質和態度，他們在這種他們不得不與「異族」交接的國際空氣中，時常發生衝和不安的原因。這些就造成了國際間種種的困難中的困難物。他們和他們的親屬來往時，往往是一個良好而仁慈的人；所以他們在一個村莊裏也會快樂些。以他們為例，就可以作動的說明了職業指導這些意欲從事於國際工業的人，是一件極需之務。

五、短距離的問題

我們現在進而注意這較近的景色，而這並非是本書所分析的主旨。

上面已說過國際的最極人的特點是那種偏局——政治學術，道德各方面。

我們的歷史性和一般性的考察，能否解答這種偏局的原因呢？

道德的偏局雖是其中最重要的，但我們只擬略略涉及。他不需要更多解釋。現在德國的統治者憑藉他們支配下的強有力的方法，其所加害之人類的數目，大過於以前任何有權力的人。所以他們應負起這個罪名，而他們亦曾主動而且明目張胆地故負其責。阿狄拉（ATTILA）的記錄，比起他們來，可以說是深自無污的了，所以我們應該時時記住，不僅因為在這種情形下道德上的憤慨是一種公共的職責。而且因為這是這次殘暴的潛在原因。這是因為現行哲學本願到人類的人格的緣故，在這種哲學的影響下，這些罪行就犯出來了，他以此種哲學為人類達到其他目的的工具——這些目的在察驗之後，就證明不人性的目的。非德國人之所以被犧牲，即因他們與德國人比起來，如同塵土。但德國人本身又被摧毀了，因為個人和個人比起來，又皆無物了。但這個超過男人女人和兒童，同時又超過和惡的德國，又是什麼東西呢？其實就是的人，他決不是一個假上帝，一個墮落的莫落去（MOLOCH）嗎？

若要探討到把我們與現在領導分子的道德問題的根源，我們必須追踪全部人類的宗教史。

但是與我們更有密切的關係的，還是近時的政治方面。

當我們由這方面考察這個問題，很明顯的，由我們的觀點說，即從我們可以稱為廿世紀哲學通常說的「路德」——極權國家的領袖，這沒有發式的那麼不道德。他們似乎與舊時種種代表的的疾病，他們把瓦爾哈拉（VALHALLA）和奧丁（ODIN）神的性質又注入近代的思想和政策裏面了，而在今的事實和過程看來，這類往事已毫無意義之可言。

在這「富足」與「相互依賴」時代的充分高漲的潮流中，他們利用了長時期的苦工，貧乏和孤立的論調。權力在他們看來，仍是人統治人的權力，而非人征服自然的權力。鄰居在他們看來仍是一個可能的仇敵，並且還在窺探打劫的機會。兩處鄰居構成兩個敵人，和一次可能在兩面作戰的戰爭，稍誇大的說，成為一個「包圍」的形勢。富有自然資源的國家，這種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最近三個月

幾篇有關民主團結的重要文件

這幾篇文字，都是已經發表過的，但問題却沒有解決，現在一併彙錄於此，以供參考。（編者）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局宣言（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

最近歐洲情勢略小有變化，但不明德軍如何掙扎，德國之無條件屈服，及歐洲數個問題的澄清，要必於本年內告一段落。

美軍呂宋登陸，已大告成功，菲律賓的完全解放，當為時已近。菲律賓以後，或即為美軍之在華登陸，早則本年春夏之交，至遲亦不至延到今年秋夏季以後。

美軍一旦在華登岸，當以大量陸軍源源開到中國，屆時不問歐洲戰爭是否已完，倭決，倭已無抗戰的一度，而實為精橋。蔣[illegible]於遠東，即必一反其過去拿捕態，而不待論，即法國亦必以相當力量，與美軍配合，以圖恢復舊觀。

敵人於應付上述情勢，以圖死裏求生起見，特重視津浦與湘兩線以東，當不在重視兩線以西之下，其在中國境內的陸軍力量，必遠較過去加強。

凡此外在的形勢，均促使中國不能不團結統一，否則即不能發動一切人力物力，與美軍共法西斯敵人決戰，以收將最大全部聚殲之效。

就內在的形勢而論，自河南湖南廣西相繼淪陷，人民飽嘗顛沛流離之苦，後方各地自衛自救的活動，已漸漸興起。國共關係，自去年五月變方代表在西安談話以來，已歷時半年以上，且中經友邦有力人士多方撮合，但至今仍無成就可言，甚至我們認為比較輕而易舉之事，如釋放政治犯及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等等，亦未徹底一舉。月前全國要求民主之聲，自各黨派以迄文化界、工商界，自國民黨外以迄國民黨內，已逐漸趨於一致。然當局則迄無有效響法之表示。

本年元旦，蔣主席發表新年文告，謂：「一俟我們軍事形勢穩定，反攻基礎確立，最後勝利更有把握的時候，我要及時召開國民大會，不必再待之戰爭結束以後」；最近國民黨中常會，更有本年五月五日召開六全代表大會的決議，此種工作，即值討論，如何召集國民大會。假定能召開一舉國一致的又確能解決當前一切實際問題的國民大會，吾人在原則上自亦贊成之，但目前事實上乃毫無可期的希望。如僅僅將二十四年所選出之一部分代表，再就無法選舉之若干省分指派若干，以足二千四百四十名之額，更益以數百名國民黨中委及候補中委為當然代表，以此而欲制定一部全國共遵之憲法，以此而欲「還政於民」，並欲以此而成就全國的團結統一，吾人認為必將適得其反。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日本感到很不愉快的一九四五年

美烏特華特著
抱貞譯

日本早已開始感覺到尼米茲在今年元旦所說的預言的眞實性了，就是日本將有『一個很不愉快的一九四五年。』

去年十月起，美國母艦機隊開始轟炸琉球和台灣，（琉球離日本只有三百千哩。）當時已經給予日本一個預示，美國西南太平洋的機隊和母艦機隊以後將不斷的，以更大的重力，轟炸該區域。該區域不但貼近日本，並且離呂宋亦只有二百二五哩。

在美軍進佔雷伊泰島之前，太平洋艦隊的母艦機隊和以亞洲大陸爲基地的超級空中堡壘，所以轟炸琉球和台灣的緣故，是因爲它們在軍略上，實在居着極重要的地位。

尼米茲的心中，恐怕早已把台灣和琉球算計在內了，因爲他曾經說過，美軍將繼續進攻，奪取更貼近日本的新基地。接着又公佈最近十二個月以來日本已損失艦隻一千零一十八艘，其中包括主力艦兩艘、航空母艦五艘，重巡洋艦七艘，飛機六千六百五十架。

三年以前，美國太平洋艦隊的實力，遠不及日本。但此後，美國海軍力量的增强，有如突飛猛進，而日本則在逐漸衰退之中。

據非官方的世敵從寬的估計，日本現有海軍實力如下：主力艦十四艘，其中六艘四萬噸或以上，且在開戰後完成；航空母艦已全無，除了少數改裝的輔助航空母艦；輕重巡洋艦十一艘；驅逐艦三十四艘，魚雷艇除外；潛水艇六十二，中型除外。

日本最感缺乏的，是航空母艦，雖然有幾艘巡洋艦或許已經改裝爲航空母艦了。至於日本的巡洋艦和驅逐艦，則都是十分舊式的。

與日本相比較，美國現有海軍實力，據參議院海軍委員會最近報告如下：主力艦二十二艘，其中十艘裝有十六英寸大砲，航空母艦十艘，此外又有九艘由巡艦改裝的航空母艦，和六十三艘所謂「Babyflat-tops」，所以共有八十二艘之多，或重巡洋艦五十九艘，其中有兩艘爲萬七千五百噸的戰鬥巡洋艦」，驅逐艦四百二十五艘，驅逐艦四百九十四艘，潛水艇二百四十七艘。

兩相比較之下，可以見出美國海軍的分佈情形，是軍事上的必能，但是我們可以看出，美國海軍的主力是在太平洋，因爲不唐諱言的，美國所以集中此偉大的新海軍，其目的是在消滅日本。

美國新海軍的目標是轟炸和進攻日本。我們必須記得，日本的城市和工業，都集中在沿海岸，所以易於受我們的攻擊。

由於我們一步緊一步的進攻和奪取更接近日本的新基地，日本本土終有一天不能再從外圍獲得資源。日本一旦被隔絕，被封鎖，和被轟炸，她就絕望了。當時的問題是絞殺日本取得最後勝利呢，還是登陸大陸取得一個迅速的決戰呢？

另外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此中國軍隊在亞洲大陸上擊潰日本大軍呢，還是需要使用一支强大的美國軍隊呢？

Academia Historica

美國當局必須準備從海陸兩方面轟潰日本，從海方面，如果得到充分的支持，就比較迅速和有決定性些，但從陸方面，就須使用一支大軍，並須解決所有關於供應和將一一收復的廣大領土等等問題。

進攻日本之前，在中國建立陸空軍的主力，遇到了種種困難，所以茲今還是躊躇不決。因之，進擊日本的路線，漸漸傾向於從海方面。當美軍在菲列賓完全佔領了所有主要的基地，美國海空軍所能控制的弧形，在日本本土的一千五百哩的範圍以內，這樣就能把日本與其豐饒的帝國切斷。

日本何以傾其全力，不顧犧牲，阻止美國佔領菲列賓基地，其原因就是在此。美國以陸地為基地的空軍，開始活躍的時候，日本何以感到極大的絕望，其原因也就是在此。

雲孫隨筆

金安清之外交見解

陶元珍

俞樾春在堂隨筆云：「金眉生都轉安清，負才氣，喜談天下事，亦振奇人也。自西事之興，士大夫持正者，多喜言戰，眉生獨主和議，曰，人知和之可恥，而不知戰不勝而求和之更可恥。人知戰之為上，而不知不戰而能屈人之更為上。……偶見其上湘鄉相國書云：『和之一字，乃南宋之後第一惡名，而北宋以前無此成見也。……今海內新遭髮捻之禍，元氣已極敝矣，無業之遊民，失職之游勇，伏戎於莽，紛紛皆是。此時國家安集之不暇，若又從而為意外之國，則如大病甫愈之身，尚欲負重致遠，一有蹉跌，禍不可知。夫泰西各國鼎峙，緩則相噬，急則相援。竭天下之力，敵一國可也，而不敵衆國，支一時可也，而不可支數載。況外侮一起，內訌必生，洋人用財如泥沙，沿海五六省之莠民，為其所嗾，揭竿而起，則洋人不必親執戈矛，而中土已不勝其敝矣。故攘外必先自強，而自強在於刑政修，人才盛。三者苟備，則九世之仇可復，一旅之甲可興。非貿貿然暴虎馮河，操劍挾禮者，所可與議也。』其書千餘言，通達治體，今錄其大略如此。」案安清之論與郭嵩燾之主張略同，南宋以後，始諱言和，嵩燾尤屢言之。二人同時而並豪俗謗，俱未克盡其用。嵩燾之外交見解，尚為後人所道及，安清之外交見解，則愛遂湮沒。是於不幸之中，安清尤為不幸。或謂安清偏於主和，所言不免有覬覦禍亂之處。然在不能戰不必戰之時，固不失為良藥。試思庚子之禍，豈非安清夙所料及者乎？

Academia Historica

美國國會現代化

孫寶毅譯

美國在國際間，現居領導地位，是一件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美國今後的一舉一動，無疑的與整個世界息息相關。但我們認定，一個國家對外的聲威，是由於內政修明之故。所以，我們除注意美國的外交動向外，更應該注意美國的內部罷。

美國是個民生國家。民生國家必有一個代表人民的機構，這就是所謂國會。國會是全國的最高立法機關，一切重要的國策，都由國會決定。在美國國會從立國的一七七六年起，就告成立。它是兩院制，一叫衆議院，另一叫參議院。兩院議員都由人民直接選出。人民有選舉權，不受宗教與財產的限制，二十一歲以上的男女國民都有選舉權，只有幾個州還保留納稅資格這個小條件，種族的歧視是憲法所禁止的，但某些州至今還不准黑人參加選舉。

衆議院的議員，由各州按照其人口比例選出，任期二年，選舉即在歲時，亦必須如期選舉。衆議員的年齡，需在二十五歲以上，必須是七年以上的美國公民，並為選出州份的居民。

參議院的議員，由各州每州選出兩人，任期六年，每隔二年由人民投票改選其中三分之一。參議員的年齡，需在三十歲以上，必須是九年以上的美國公民，並為所代表的州份居民。參議員除了一般的立法職權以外，又賦有修正衆議院議決案的充分自由。總統要任命政府任何高級官員，須得參議院的同意。總統雖可與外國簽訂條約，但須經參議院三分之二的通過，才能發生效力。參議院其所以有如此的職權和特質，是由於美國當時不能不尊重州權之故。採取兩院制，衆議院議員按人口比例選出，參議院議員由各州每州選出兩人，這是制憲者，頗費苦心的想出來的一個妥協。

國會為節省時間，加速行動起見，設置若干委員會，某些問題的法案在提出以前，先由委員會加以研討，因之委員會的權力很大。衆議院各委員會的主席，以資歷為原則，多數熟在各委員會中服務最久的一員擔任主席。

衆議院的議長，按例由副總統担任。參議院的議長，則由多數黨選定。此外，參議院因為規模較小，所以還保留有稱為每個議員極大行動自由的議事決，辯論和發言，實際上毫無限制。

自上次大戰以來，國會對總統以及其他行政官員逐漸加強了，代表權威的運用，國會往往指定一個一般的政策，並且確定行的官員應依循的標準。

政府的每年預算，必須要提出國會通過，國會可以核減，也可以加撥。為了考核撥款的用途，以及政府的一般行政，國會又設有調查委員會。

以上所述的美國國會的組織與職權，祇是一個大概而已。我們現在所要說的，就是一二百年來運用的結果，不但這種組織與職權發生了許多弊病，並且證明並不是十分健全的。因之，美國最近呼出了國會必須要現代化的口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按美國憲章第一條第七款規定一切財政方案，必須由眾議院提出，參議院不得修改，並且藉此可以瞭解美國的內情和其趨勢。

譯者附識

美國的戰後工作，十分艱巨，不應該讓有毛病的立法機構來防礙。一般美國人都有如此的感覺，就是許多國會議員也如此。

近年世紀來，美國國會從未有過實質上的變更。這個機構本來適用於煤氣燈時代的，當時國家每年的費用，僅數百萬元而已。但今日美國政府每年的費用，達七百八十億元，如何能夠想用這些舊時工具來應付這個大局面呢？

這是美國國會何以要改革的主要理由。目前已有許多改革方案提出，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一個決議，這是成立一個國會的防禦席委員會，以研究國會的運用情形和其應改革的地方。這個委員會是超黨派的，參議院和眾議院各推出六人，由他們來加以通盤的研究和計劃。

一般輿論界指出，國會若欲趕上時代，必須要改革以下各點：

一、條約的通過，祇須眾議院和參議院的過半數票決，就可以了。以前的規定，單獨由參議院的三分之二的通過，必須加以廢止。

二、十分麻煩的委員會制，應該加以現代化。

三、參議員與眾議員的任期，一律規定為六年，一方面使他們得以從久努力，一方面使他們的平均年齡降低。

四、國會中規定一個經常的詢問時期，使內閣閣員和各部首長得以出席。

五、設置適量的人員，以供國會各委員會和議員事務所的使用。

六、使國會不再依靠於政府或業務機關對於事實和數目字的供給，換句話說，擴充國會搜集立法參考資料的機關。

七、國會議事，廣播全國。

以上七點中的第一點，最為重要。有人指出，自規定條約須經參議院三分之二的表決後，參議院就從來沒有通過什麼條約。許多真正重要的條約，就這樣遭難了

關於第二點，國會若要工作有條理和有效率，委員會制度實在需要檢查一下。眾議院有四十七個常設委員會，五個特設委員會，參議院有三十三個常設委員會，十個特設委員會。這九十五個委員會，有許多是重疊的。某參議員曾主張，參議院的三十三個委員會，可以取消二十個，並且限制每一參議員只能參加一個主要的委員會。

關於第三點，參議員和眾議員，任期規定為六年之後，可以避免重要的委員會的主席，每以資歷為原則，常落在年高的議員身上。並且此後議員可以集中精力於立法，而不必担心於是否再被選。

以資歷為原則的制度，其結果我們可以看一看幾個重要委員會的主席的年齡。例如：經費委員會主席格拉斯，現年八十七歲，因為年老多病，所以實際上並沒有做什麼事。自民主黨在國會中佔多數後，各委員會的主席，當然多數是民主黨人，但是各委員會中共和黨人的年齡，也並不見得輕輕。

關於第四點，其背後尚有一個用意，就是如果國會議員能夠更明瞭政府各部的工作，許多調查委員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並且如果可以召請行政人員出席國會，總統和各部首長在任命的時候，就勢必要再三考慮。

四於第五點，並無多大困難，就可實行。議員們可以任意替其他機關要求撥款，但對他們自己，却有會通來了。其結果使許多議員成爲替人民往返家鄉的信差而已。

關於立法的起草，是一件痛心的事，這就是第六點所欲解決的。國會的法律人員，不但人數很少，並且薪俸很低。因之，有許多戰時機關的立法，其起草人正是這個戰時機關所要聘的律師。

衆議院只有五個人員，用來起草法案，參議院只有三個。兩院在這方面所費的錢，尚不及農業部。

還有，議員使用參議院和衆議院經費委員會的職員是不妥當的。參議院經費委員會有四個書記，衆議院有八個。因爲這種閑樣的節省政策，防礙了研究機關的設備。雖然這了研究機關會圖書館。

這個機關，共有職員六十六人，其中四十四人每年薪金不到二千六百元。

第七點，不國廣播關於國會的議事，可以避免對於重要問題的誤解。如此之後，國會可以費較少時間於熱烈辯論。

以上所說的各點，誠能一一改革，那眞是美國前途之福。

雲孫隨筆

河北鹺地問題

陶元珍

今河北省南部，鹺地甚多，不宜五穀，民競熬製硝鹽，藉維生計。禁之則易激民變，不禁則有礙鹽法，爲施治一大難題。案皇明經世文編補遺卷四錢棲鹺議云：「古之河北，今幾何也，眞定以西，爲古大陸之澤，土下作鹹，生齒之徒，無旦暮之祿以居家命，則擇斥鹵之尤，積鹵之鹺，刮其土而鍊之。匹夫匹婦，窮月作勞，可得升斗苦鹽，易粟爲命。」是在明代，北直之民已有熬硝鹽爲活者。又案宋慶歷中，有上封事者，請權河北滄濱二州鹽。余靖諫曰：「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鹹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近民怨嗟，非國之福。」黃震翁亦曰：「河北之鹵，素無禁約。」其議卒寢。則遠在宋代即有此問題，惟以不禁爲愈。愚意眞如於序鹵之地昔產棉花，應教製硝鹽之事不禁自止，國課民生，可兩無妨礙，是在政府善於因勢利導耳。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波蘭內部的衝突

他山譯

在羅邱史共同發表的克里米亞會議聲明中，關於波蘭問題的一段，原文如次：「吾人此來克里米亞會商，決欲解決吾人間於波蘭之異見。吾人曾就此問題各方面澈底討論，吾人重申願見強大自由獨立及民主波蘭成立之一致願望。此次會談後，吾人已商得全國統一之新波蘭臨時政府可能獲得三大盟國承認而成立之條件。吾人所協商之內容如下：蘇聯解放波蘭後，新形勢已隨以產生。此需建立較西部波蘭被解放可能建立之基礎更廣大之波蘭臨時政府。由吳理在波蘭執行職權之波蘭臨時政府，及時將更廣大之民主基礎改組，容納波蘭國內外之民主領袖。此一新政府應稱之為全國統一之波蘭臨時政府。莫洛托夫、哈曼、卡爾受命以委員資格首於莫斯科與目前之臨時政府人員及波蘭國內外其他民主領袖進行會商，藉此根據上述方式改組目前之波蘭政府。此一全國統一之波蘭政府將保證儘早根據普選選舉及祕密投票方式舉行自由選舉。全國統一之波蘭臨時政府得參於蘇聯政府及英美政府之意見而建立時，三國政府將與全國統一之新波蘭臨時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并互派大使。各國政府根據大使報告，可獲悉波蘭國內之情形。三國政府傾袖考慮後，認為波蘭東部邊疆應以寇松線為根據，而於若干區域減短三至五公里，使波蘭感受其惠。彼等承認波蘭於西北兩西必須獲得廣大之領土讓予德國并認應於相當時期內徵詢全國統一之波蘭臨時政府關於讓予土地範圍之意見，并認波蘭西部邊界之最後定界應待和會討論。」聲明發表後，世界各地的反響，頗不一致。有人認為波蘭問題，為同盟國家間一個最難解決的糾紛，現既獲得協議，不僅為同盟國家間結堅固之象徵，各國具有戰後合作共維和平之意圖，亦可由此得到證明。而對於波蘭，此亦為一公平而合理之解決。有人為此係英美為遷就蘇聯而犧牲波蘭，而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更認為此係第五次瓜分波蘭，聲明反對。惟不論各方反響如何，現則此一決定，邱吉爾 向國會提出報告而獲得支持，羅斯福亦已向參議兩院正式報告。故波蘭問題將循此一方案而求其解決，實已成為定局。此一解決是否公平，且留待將來歷史家去着筆。而波蘭問題之所以演變至此，却有其歷史的，內在的因素。我們要明白其今日之果，須先瞭解其昨日之因。美國哈佛大學歷史教授費氏（Sidney B. Fay）在去年十二月一現代史料」上發表的「波蘭內部的衝突」一文，關於波蘭情形，分析極為詳盡。茲為譯出，以供留心波蘭問題人之參考。 三十四年三月七日譯者誌。

早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波蘭即因內部的衝突而分裂了。這衝突的兩個集團，一即所謂反動的軍人或地主集團 一即較自由的或社會主義者集團。在納粹侵入以後，不幸的是，這種衝突更加深與擴大了。到了一九四四年，在倫敦波蘭流亡政府和波蘭及蘇聯境內受蘇聯政府鼓勵及蘇聯金錢與宣傳所支持的許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各方面國體之間，結異更形成尖銳的對立了。

一九四四年夏天，由施龍爾將軍所率領的波蘭地下軍悲慘結局，此種形勢遂益趨尖銳。波蘭地下軍在華沙起而反抗納粹，經過六十三天的苦戰，終以遭受生命及物質的極大損失而潰滅了。這件事，在倫敦的波蘭人士，認為是由於他們沒有得到近在維斯杜拉河的蘇軍之預期的助力所致。

波蘭兩個敵對的政府與軍隊之存在，不僅使波蘭受內戰之威脅，并威脅同盟國家為戰事之一致努力及影響勝利後之遠景，若無勝利，即根本無波蘭。

倫敦波蘭政府，依然為英美所承認的合法政府。但蘇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因卡丁屠殺案件，已與之斷絕外交關係了。另一方面，由受蘇聯支援的國體蛻變而來的盧布林民族解放委員會仍未得到西方民主國家的承認，但因史太林的贊助，權却實際的管治着那些同蘇軍協助而獲得解放的波蘭領土。這使牠頗有最後成為眞正政府之望，將倫敦流亡政府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這顯引起在美國的及流亡在外的多數波蘭人之反感。

同盟國家在外交上曾作過許多努力，想使這種極不幸的波蘭內部衝突歸於終止。英美都曾盡力想使倫敦波蘭流亡政府與史太林獲得妥協，而史太林的回答，却總是除非波蘭流亡政府將他認作那些反動反蘇的份子摒斥，妥協是不可能的。史台丁特去莫斯科一路，與美國駐蘇大使哈立曼曾共同求得進一步的詳解。這種衝突，并曾成為羅斯福邱吉爾及羅邱與史太林私人會商的主題之一。

而最近的努力，則為邱吉爾在莫斯科的一星期之訪問。回來之後，十月二十七日他向衆議院報告：

「我希望能告訴衆議院，關於這問題（指波蘭問題）我們已經獲得一種解決方案。這種解決方案決非未曾經過，我敢說，我們差不多已近於獲得解決方案了。雖然我不忽視依然留下的困難，但我感到快慰的是，英國與蘇聯，美國更無疑問，都堅決一致主張重新建立一個強大自由獨立的波蘭，這個新的波蘭，是忠於同盟國家而又與其鄰國及解放者蘇聯維持友好的。我們經常不變的目的是：波蘭人民在這次苦難及騷亂之後，必須在歐洲有安息居住之地，他們的地方雖然不能完全與戰前的波蘭疆界相符，但必能適合波蘭民族的需要，且就全體看來，無論在質與量方面，都決不次於波蘭人在戰前所有者。假使倫敦波蘭政府在今年初即能接受我們的勸告，而由盧布林解放委員會之成立所產生的那些後來的複雜問題就根本不會發生了。」

衝突的原因

邱吉爾與史太林經一星期的討論，還未能獲得一個最後的協議，足見這衝突的嚴重。衝突的原因何在呢？主要的問題有三個。

（一）蘇聯是否要保有寇松線以東的領土？那是史太林奪自波蘭而於一九三九年合併於蘇聯的。這一問題，「現代史料」一九四三年二月號「蘇聯西邊疆界」及一九四四年三月號「波蘭的爭議」兩篇文章裏已經討論過，現在看來，將來的解決一定是肯定的了，縱使波蘭抗議亦屬徒然。為補償波蘭這種領土的損失，將以東普魯士之全部或一部并可能以西里西亞與東普尼亞之若干土地給予波蘭。在上引的邱吉爾報告中，已明了這一點。這雖然不是一個理想的解決，但却是一個唯一

Academia Historica

可能的解決，假使史太林依然堅持須保有白俄羅斯及兩島克蘭的決意的話。

（二）將來的新波蘭政府究竟由誰來組織。倫敦波蘭流亡政府？盧布林民族解放委員會？抑為上述二者之合併體（當前皆將其那些反動份子排除之後）？這問題的一部分是一個憲法問題，因為將來的波蘭政府究竟須建基於一九三五年皮爾蘇斯基專政的憲法，或一九二一年較為民主的憲法之上呢？前者為波蘭流亡政府權力的來源，後者則為盧布林政府堅持恢復的。

（三）許多經濟改革究須立即實施，如盧布林政府所希望的？抑必須在波蘭國會改選之後才能實行，如波蘭流亡政府所允諾的呢？

倫敦波蘭流亡政府的淵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政治經驗的缺乏，由於過去的波蘭分裂在三種不同的統治之下，并由於許多政黨及小團體的興起，使波蘭憲法遲延至一九二一年三月始發通過。因為法國人士均長期住過巴黎，所以很自然的波蘭新憲法頗與法國憲法相似。與法國一樣，總統也是由兩院組織總統選舉會來選舉，以得多數票為當選。總統并無多大權力。總統簽署的一切法案，必須有內閣閣員副署，由內閣對議會負責。顯然的為害怕皮爾蘇斯基專權，將戰時總統統率軍隊的權力剝奪了。國會兩院皆實行直接的普及的選舉，而上議院的選舉則附有年齡的限制。選舉人須年滿三十歲。實權則在下議院。

在一九二二年三月第一次國會選舉時，有二十餘政黨均曾提出候選人，在第一次下議院後得議席的，有一打以上的政黨。更使波蘭民族主義派感覺不安的是，即各少數民族……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猶太人及其他……獲得百分之二十的議席，與經濟的困難，使得國家日在風雨飄搖之中。於是對下院的主力遂生不滿之感，而要求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行政機關）出現。內閣時起，時仆，皮爾蘇斯基則為站在背後的實際指導者。他與他的黨徒均希望修改憲法，使總統有權發布命令并實行獨裁。他們也希望限制下院的權力。他們對此問題，曾作多次的擬議，但直到一九三五年三月使用陰謀手段（即使不是非法的）才獲通過了。因此，若干反對黨遂退出了議會，并拒絕參加新憲法之下的選舉。

六個星期之後，即五月十二日，皮爾蘇斯基死了，大權遂落於下列諸人的手中：總統莫司西基，（是皮爾蘇斯基一手提拔的）；總理斯拉常克；外交部長白克；李滋斯美斯將軍，他是陸軍檢閱官兼皮爾蘇斯基之任而為實際的獨裁者；與一個少數軍人團體叫做「新那克甲」（Sanacja）的。對於一九三九年爆發的戰爭，波蘭如負有責任的話，其責任即在這羣人的身上。當波蘭軍隊失敗之後，多數官吏都逃到羅馬尼亞去了，而為羅馬尼亞政府所拘留。總統莫司西基，依據憲法規定，必須有一個波蘭政府能自由的執行職權，遂將他的總統權力託付於當時在巴黎的拉克維支。

總統拉克維支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巴黎的波蘭大使館宣誓就職了。他任命西哥爾斯基將軍為總司令。三個月以後，并組織了一個波蘭國是會議，以為在沒有國會期間的一個諮詢機關。

一九四零年法國陷潰後，波蘭政府遂遷到倫敦去了。西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爾斯基將軍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在西班牙海岸因飛機失事而死，這是波蘭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在他死後，總統拉克維支遂任命米果拉錫克爲總理，桑哥斯基爲波蘭陸軍總司令。

一九四四年初倫敦的波蘭政府組織十三人，他們的職務分配如左：

米果拉錫克——內閣總理

郭賓斯基——工商部長

羅美——外交部長

古基爾——國防部長

巴納錫克——內政部長

哥德——情報部長

葛洛斯費——財政部長

史坦錫克——勞工及社會福利部長

柯曼尼基——司法部長

色達——計畫部長

鮑皮爾——波蘭行政計畫部長

卡辛斯基——教育部長

史特萊斯布格——中東部長

這個內閣與總統拉克維支，總司令桑哥斯基爲戰前波蘭政府的合法繼承人。他們并說他們足代表波蘭人民及各黨。在這個內閣中，農民黨勞工黨各有三人，國家自由黨國家民主黨各有二人，無黨籍者三人。在這十三位閣員之中，有兩位婦人（郭賓斯基與史坦錫克），有兩位工人（郭賓斯基與史坦錫克與巴納錫克），三位教授（哥德，柯曼尼基，與史特萊斯布格），一位律師（葛洛斯費），一位農人（鮑皮爾，色達，與卡辛斯基），一位[illegible]

盧布林政府的淵源

蘇聯的盧布林政府，是從兩個組織產生出來的。這兩個組織，一個在莫斯科，一個在波蘭本土，都是受蘇聯的庇護而發展過來的。

一九四三年春，當蘇聯與倫敦波蘭政府外交關係破裂時，波蘭愛國份子在莫斯科就成立了一個團體。這團體包括着多數的波蘭共產黨，他們都是在戰前或戰爭開始後逃亡到莫斯科的。這團體的領導人，爲一位女小說家，叫做華西琉茄。她是一位著名的社會主義者與勞工領袖的女兒，又是蘇聯劇作家哥尼古克的太太。一九四四年春，哥尼古克被任爲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的外交人民委員。

這個波蘭愛國份子的團體，雖然在教育、出版報紙、及波蘭兒童福利事業諸方面都很活動，但他的主要工作，還是要在蘇聯境內創立一枝波蘭軍隊。這枝新波蘭軍隊與在蘇聯的經史太林裝備過歸安德斯將軍統率的波蘭軍隊是完全不同的，因爲那枝波蘭軍隊并未幫助紅軍驅逐敵人，這也是一九四三年蘇聯與波蘭外交關係破裂的原因之一。

這個蘇波愛國份子的團體很快的完成了此項工作。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波蘭第一師團（爲紀念哥斯茲斯果，命名爲哥斯茲斯果師團。）即開上了前線。一九四四年一月第二師團（鄧布洛斯基師團），三月第三師團（多羅特師團）均完成了作戰之準備。三月九日在白林將軍統率下的波蘭部隊組成了一軍。這些波蘭官員在驅逐納粹出蘇聯及解放波蘭的戰鬥中，表現得極其英勇。他們中間有二百五十多人都因勇敢而得到了榮譽。他們在蘇聯與波蘭都獲得盛名，在波蘭，他們受到波蘭游擊隊[illegible]

Academia Historica

第二個親蘇組織是波蘭民族會議，他是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在華沙秘密組成的。為求明白其淵源起見，必須先略述波蘭地下運動。

當一九三九年波蘭遭受慘劫之後的最初數月中，德軍席捲波蘭，波蘭人民在政治上完全失却領導，所有波蘭的政治組織都被摧殘了。其後，倫敦波蘭政府漸漸與波蘭地下運動取得連絡，組成了若干的游擊隊。有些游擊隊是同情「那那克中」的波蘭陸軍官領導的，有些是在西科爾斯基將軍領導之下，比較趨向自由血民主的。西哥爾斯基將軍死後，這些游擊隊遂歸於桑哥爾斯基將軍，較趨反動了。

當一九四三年秦波蘭外交關係破裂之後，米果拉錫克內閣為害怕史太林會在波蘭建立一種共產黨的總編政府及類似的游擊隊，倫敦波蘭政府對於波蘭四大政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聯合宣言遂表示歡迎，或者更在內中予以鼓勵的。這四大政黨，即為基督教民主勞工黨，波蘭民族黨，農民黨，與波蘭社會黨。在這宣言中，他們允諾與倫敦波蘭及其在波蘭的秘密代表完全合作，以求恢復一個獨立民主的波蘭，直到波蘭能實行人民選舉的時候。在這篇宣言中，倫敦波蘭政府特別而明反駁蘇聯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宣言這一點上，因為波蘭宣言曾說：「流亡的波蘭政府已與其人民隔絕，決不能在波蘭本土對德國侵略者組成一種積極的鬥爭。」

波蘭還另有些游擊隊，與上面所說的完全異趣。他們與俄人都相信桑哥斯基的游擊，是追求着一種等待的消極政策，而不是冒險起波蘭人去與希特勒的德國人作戰的。所以在一九四四年新年之夜，波蘭各民主政黨的代表三十人秘密集合於華沙，研求積極的向德國人作戰之道。此次會議所包涵的代表，有農人，勞工會，青年團體，與游擊隊，會議往晚上六點到早晨五點，擬成了一個社會政治綱領，并將波蘭人民所有的武裝力量建立起一個聯合的作戰領袖，交二位代名的羅拉將軍去統率。而最重要的，還是組成了上面所提到波蘭民族會議。

波蘭民族會議對三大同盟國家致其祝賀，並要求給與武裝以便使其能實行解放之戰。他并宣稱依從一九三五年的憲法，蘇波將軍的隊伍其初是很少的，但增加的非常之快，因為他能以蘇聯的武裝供給他的游擊隊。一九四四年五月波蘭民族會議的代表到了莫斯科，與華西琉茄之波蘭愛國份子的團體發生接觸。這二者合流，遂組成了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不久以後，他的總部遷到了盧布林，故通稱之為盧布林政府。他的首腦為奧斯卡莫拉斯基。他立刻受到倫敦波蘭官方通訊社之否認，稱之為「一群叛徒」，企圖在波蘭實行少數專政的。

七月二十六日，蘇聯與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締了一個協定，并得到了史太林的承認與祝賀。因預料到蘇聯軍隊在波蘭的活躍，故在這個協定中，規定蘇聯軍隊與盧布林政府軍隊的關係，并承認盧布林政府在波蘭解放區域內之行政權力，只將實際作戰地帶除外。

同時，莫洛托夫正式發表聲明稱：「蘇聯政府宣布蘇聯對於波蘭無任何領土的追求，並不想變更波蘭的社會組織，波蘭軍隊在波蘭境內密軍事行動，純基於軍事需要，其目的，在勢力協助友邦波蘭人民自德國佔領下獲得解放。」

華沙的悲劇。

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底，波蘭有兩個敵對的政府，倫敦與盧布林，波蘭境內，有兩樣敵對的波蘭軍隊。而蘇聯的軍隊逐漸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接近華沙了。因爲希望在兩個敵對的波蘭集團之間覓得一種妥協起見，米果拉錫克總理遂於七月二十七日離開了倫敦，去與史太林及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諸領袖商談。三天以後，哥斯達斯果電台在莫斯科廣播，向華沙市民發出呼籲：「華沙市民！武裝起來！全體民衆應集結於地下軍之下。攻擊德軍！協助紅軍渡過維斯杜拉河。供給紅軍情報。指示紅軍渡河的最好地帶。」

八月一日，在華沙城內及周圍的鮑爾將軍的游擊隊起而反抗德人，希望得到蘇聯軍隊的救助及蘇聯飛機投予武器。鮑爾曾多次求援，米果拉錫克到了莫斯科之後也催促援助。但蘇聯軍隊却不向華沙前進，也不以飛機投擲供應品。只有同盟國家的飛機去接濟過，那是從意大利起飛的，因爲飛行太遠，本身受到很大的損失。

鮑爾將軍的部隊英勇作戰達六十三天之久，在他的人員和波蘭平民大受犧牲及華城內的房屋被點均被夷平之後，他被迫對德國軍隊投降了。

這悲劇是誰造成的呢？事實極爲複雜不明。倫敦的波蘭人相信這件事的興起是受到莫斯科的鼓勵的，隨後又置之不理，以打擊倫敦波蘭政府之信用。蘇聯報紙說華沙事件是波蘭倫敦政府所命令的，要想在蘇軍進到之前解放華沙以取得信譽，這種動機是犯罪的卑計。因爲蘇聯的軍隊擁有無數理由，在攻取像華沙這樣的堅固要塞之前，必須先在波羅的海一帶及維斯杜拉河上游有所行動。

無論如何，這件事將米果拉錫克總理赴莫斯科謀取妥協使命的機會毀掉了。這也是我們在前面說到的十月間邱吉爾要去莫斯科的理由之一了。

（完）

雲 孫隨 筆

清室退位詔出張謇筆

陶元珍

清室退位詔爲愛新覺羅氏還政於民之書面表示，亦即中華民國開國之重要史料。詔雖發自清廷，底稿實由南京政府送去，且出張謇筆。斯誠辛亥革命中之珍聞也。謇子孝若撰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載胡漢民致譚延闓書云：「清允退位，所謂內閣傳電，實出季直先生手，是時優待條件已定，弟適至滬，共謂須爲稿予清廷，不使措詞失當，弟遂請季直先生執筆。不移時，脫稿交來，即示少川先生，亦以爲甚善。照電袁。清內閣復電即退位詔，電中全錄詔文，特內內閣轉達。若非漢民此書，吾人無由知稿出南方且係謇所起草矣。漢民書又云：「袁至發表時，乃竄入授彼全稿一筆，既爲退位之文，等於遺囑，遂不可改。」是原稿並無此語，不足爲謇病。孝若謂聞此稿親筆，存趙鳳昌處。今鳳昌久沒，其子附逆，亦無從探詢矣。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蘇聯空軍建立史

殷生譯

蘇聯紅軍今日作戰之土地，不再是蘇聯之土地。蘇聯紅空軍今日活躍之上空，不再是蘇聯之上空。但此上空，由蘇聯紅空軍所控制，則屬不可否認之事實，猶之乎，其鐵蹄下之蘇聯紅軍控制其所佔領之非蘇聯之土地然。

今日蘇聯紅空軍之所以如此强大，誰之功耶？其人名曰諾維考夫（Novikov），即今日蘇聯空軍之總司令也。

莫斯科從未宣佈諾維考夫之行經，但吾人可猜想，彼此忙於從此機場轉該機場，視察其部屬，並鼓勵其戰志。諾氏現年四十二歲，正年富力强之時，如彼獲得親自駕駛作戰之機會，彼必毅然前往，但彼之好友史太林氏，不允許彼如此爲之。

戰爭爆發以前，蘇聯對於其空軍之建立，絕對保持祕密，故不但國外，即蘇聯國內之觀察者，亦全全不曉蘇聯空軍之究竟。

蘇聯自接受美國之租借軍火後，對其空軍之內情，亦仍諱莫如深。盟國局勢好轉，蘇聯方始勉强答應交換其情報。雖蘇聯飛機之最後樣式爲如何，迄今仍不公佈，但關於蘇聯空軍發展之經過，吾人已略可窺見其一二矣。

除馬列主義外之其他政治原理，不准提出於蘇聯，但不正統之軍事思想，則從未因其提出而加以處罰。自一九三〇年以來，蘇聯關於空戰之理論，即已超人一等。當時有名阿美來高夫者，首先提出以下之主張，現代戰爭須以坦克與飛機之聯合進攻爲其開始，德國這種心於此種閃電理論，但奈歐洲其他國家毫無所知何。至於降落傘兵與滑翔機空運部隊，其作第一次試驗者，亦係蘇聯。但首先實現於戰場者，則爲德國。

西班牙內戰，雖一般人認爲德國之試驗室，其實亦爲蘇聯之試驗室。蘇聯對於德國在西班牙間實戰之預演，在軍事上如在政治上，予以密切之注意。但蘇聯之飛機，落於時代之後，不相應於彼之空戰理論。蘇芬戰爭開始之際，蘇聯之飛機，亦並非不可欺者，而其勝利之所以獲得，應歸功於砲火。

但西班牙與芬蘭之教訓，蘇聯立即予以接受。諸如飛機之設計，與夫工廠之生產設備，無不立加改善。正值改善之中，德國進攻蘇聯。是故，德國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之進攻蘇聯，出於蘇聯空軍意料之外，大量飛機，被毀於機場之上，換言之，蘇聯之飛機在數量，武器，速度，高度等方面，俱在德國之後。直至冬季，始予彼等以一喘息之機會，因蘇聯飛機之降落設置，易於轉而適應於滑雪，蘇聯之空軍人員又知如何使其器與滑潤油，不至於凍結，但德國空軍人員對嚴寒則惟有叫其連天而已。

氣候漸漸暖和之際，英美租借之飛機已源源開始運來。由挪威至芬蘭，德國空軍猛襲由英美通至摩爾曼斯克之航路，因之有若干租借軍火不得不改道，經由波斯灣，通過伊朗，再運至蘇聯。在另一方面，蘇聯堅決不屈，將飛機工廠移至遠後方，繼續製造飛機，準備抗戰到底。

於史太林格勒之役開始之時，德國仍保持空中優勢。但局漸漸好轉，空中情形亦隨之漸入佳境，蘇聯之飛機，日益多，一方面由於彼等自己之工廠，一方面由於英美之租借。

Academia Historica

等因之獲得更優良之新式飛機，與更精練之空戰人員。當是時也，英美空軍開始大轟炸，殲滅德國空軍於其工廠中或於空中。是故，蘇聯輕而西向大反攻之際，蘇聯在空軍方面已與德國處於不相上下之平衡地位矣。

關於蘇聯空軍之建立，史太林氏應對四人表示感謝之意。此四人即為飛機設計家依留奧氏與耶考甫李夫氏，負責製造殲機之莎克何林氏，與負責作戰之諾維考夫上將。先由諾維考夫通知依留奧與耶考甫李夫兩氏，彼所需要者為何種飛機，兩氏即將其項目設計，最後由莎克何林負責製造。

諾維考夫現負空軍作戰計劃之責，彼曾言曰：「吾人需要能飛，能打。吾人有大批空軍戰鬥員，彼等雖有未受充分訓練者，但彼等能於實際戰鬥中完成彼等之訓練。吾人將因之獲得優秀之戰鬥員與如何戰鬥方法」。

諾維考夫之為史大林所賞識，開始於一九三九年之空軍會議中。史氏親與諾氏對如何建立空軍之見解，從此以後，兩人遂成知己。諾氏初服務於步兵，由於梯摩盛科將軍之證保，遂轉入空軍。一九四二年後，彼即任空軍總司令之職。

蘇聯有若干架重轟炸機，在設計與製造中者亦不在少數，今作初轟炸東普士與普洛斐什特者，即屬此項飛機。但諾維考夫不贊成製造長距離轟炸機，而贊成製造急切需要之戰鬥機，用以對付德國之轟炸機與戰鬥機，並用以攻擊德國之坦克，部隊，汽車，及其他小目標。要之，彼認為蘇聯空軍之主要任務為密切協助地面紅軍，而無時間顧及其他。

蘇聯最有名之飛機為伊留奧氏所設計之攻擊機，或名 ШТОРМОВИК。該項飛機對於空中協助陸軍之戰術，大有貢獻。該項飛機各方面裝有機關槍，火箭砲與炸彈。雖行動不甚快速，但其優點在於重裝甲保護，不易受機關槍砲之射入。其最理想之作戰高度為一百五十尺，大口徑之高射砲無法擊中。若在中程敵飛阻擋，該項飛機每有自身之戰鬥機予以保護。德軍之敗退，該項飛機與蘇聯砲兵之合作，應居首功。

耶考甫李夫氏所設計之戰鬥機，以最近公佈之耶考九號式為最著名。因原料缺乏與生產緊張之故，耶考式與攻擊機之一部分，乃由木材所做成。雖然如此，仍不失其為強壯之飛機，例如耶考式機不但輕快，且能達至高度。雖然它無氧機力，平方面之美國，如美國之野馬式機然，但德國空軍人員對之敬佩之言。蘇聯尚有其他種由拉伏契金氏所設計之戰鬥機。一九四二年，伊留奧，耶考甫李夫與拉伏契金三氏，曾各得獎金三萬美元，並榮為「史大林空軍之創造者」。

蘇聯空軍戰鬥員頗喜美國製造之「小毒蛇」。蘇聯共有該項飛機約四千架。美國方面曾建議蘇聯該項飛機不能高空作戰，但蘇聯方面並不認為此乃缺點，因之轟炸機與戰鬥機大多在一萬五千尺高度以下作戰。實際上其他各國之戰鬥機隊，亦均如此。

蘇聯空軍戰鬥員，大多是長期出身。彼得堡商熱情，與英國飛行員相比，彼等顯出年齡較大，小體較低，並不充分流露年輕人之血氣方剛，亦並不自命為不可一世之青年。因為訓練與生活之故，彼等態度嚴肅，工作嚴肅。彼等於作戰時往往不顧前後。彼等並無有如許之多之安全規則與設備，如美國空軍人員者然。彼等認為危險應設法避免，但在確保與安全之項，不能如此。有人曾言，彼等之駕駛飛機，「有如馬薩克之駕御其馬」。

彼等之戰志甚強，對其總司令，咸表敬意。諾氏之照相，

哩之谷機場，但諾氏之名，鮮少見於蘇聯之報紙。其為人也。美之協助），定能在空中戰勝德國。如在空中不能戰勝，則蘇聯或亦無戰勝之希望。

（節譯自時代雜誌七月三十一日）

沪，正直令人一見喜悅，除精通空戰外，且為一外交能手。英美租借飛機之源源而來，即彼等此方面之成就也。蘇聯每年製造飛機，據最近估計，約三萬架。是故，蘇聯紅空軍，加上英

暹羅地理序

暹羅為中南半島唯一之獨立小邦，其能幸存之理，厥有二因：吾僑鄭昭，匡復全土，免緬甸之蹂躪，成一統之大業，一也。地介英法勢力之間，成緩衝國，二也。然今之暹羅，一變其本來面目，既與英法為仇，又與中國為敵，徐經會謂其未被軍書之化，不知禮義，豈不信哉？原暹羅之有今日，全賴中華民族孕育而成，極榛之地，吾僑闢之，山林之區，吾僑啓之，輔暹王，施政治者，吾僑也，建新市，通貨殖者，亦吾僑也。今在暹純粹之華人，約佔全暹人口四分之一，而暹人之混有吾僑血統者，則恐十之八九，是以暹人不啻為吾中華民族之支庶，刺瑪七世，亦坦然言之，且中暹關係之切，自元至清從未間斷，明太祖鑄印以賜暹王，清乾隆亦一再飭封之，則暹之久臣服於中華也審焉。迨日暹親善，日人設「暹羅室」以研究之，於是日人有關暹羅之書，既層出不窮，而親善使節復絡繹於途，中暹關係之關鍵，此其一因，然國人之懵於暹事，實為離心之根源，試以最近之例為證，則竟有以鄭昭之復暹，繫於道光時者（見二月二十八日大公報吾國與泰國一文），又有東方語文專校之創辦人，竟謂泰族即是漢人者，凡此無根之談，其不啓侮誤國者幾希，然則暹人之忘本他求，尚誰得而非之耶？蔡君文星，長於景邁，學於湄國，頗通暹事，彙譯暹文，最近出其所編之暹羅地理一書，交余校閱，余見其條節明晰，敘述咸備，足供國人研究暹事之參攷，爰勸其付諸剞劂，以廣流傳焉。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上浣張禮千序於川東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誰是邱吉爾之繼承者

原著見五月新共和報

超輝然

要知道最近十年之中，世界上會發生什麼事變，須看中英美蘇四國的內政情形。可以說任何人都是如此想。的確，在英國，沒有多少人敢對於中國美國甚至蘇聯有所預言；而却有少數人開始拿大英帝國的政局來賭博的，更有不少人對於最偉大的領域不列顛三島，敢說出他的未來是什麼一回事，若果有人願意聽，他就願意告訴你。

那些預言家們，對於其中三個自治領的變遷，有較確實的根據，因爲明確選舉的結果已在那裏。一九四三年八月澳大利亞的總選舉給予工黨一個絕大優勢，他們藉此獲得整個上院中十九個空席，至少工黨可以控制政局六年。同月中，加拿大的合作公福蘇盟 Co-Opelativ: Common Wlealth Fa:ilation 於一夕之間，竟獲安大里選區內九十個議席中之三十四個。公福黨的前途也許還需要很大的努力，但至少他已超過了他的起點。一九四三年九月，新西蘭老練的工黨政府第三次連任。南非聯邦看來似乎會成例外，紐芬蘭是向來不足輕重的。一九四三年六月阿爾蘭選舉中，工黨也得到全票百分之十七，在一九三八年他們只得到百分之九。從以上這些，就看得出爲什麼現在沒有人再譏笑要打賭的人，說大英帝國五年之中要在工黨勢力之下了。

大英帝國的本部怎樣呢？直到一年或一年半之前，政局的觀者還在想戰後沒有另外一個人能跟邱吉爾的魔法相抗的。邱吉爾帶人到那裏，選舉人就跟到那裏。所以保守黨人能安然跳回家去，工黨的唯一希望，只是邱吉爾主持的戲班上佔一個落後的位置罷了。邱吉爾本人很明顯的是需要一個混合政府，其中繼續有無黨無派的人像吳爾頓勳爵 Lola Woolton安特生爵士Sir John and Anon克利濟斯爵士 Sir Stsir rd Cripps 三等人。然而局勢轉變了。工黨黨員鄭重聲明說無論勝利或失敗，他們在戰事結束之後，不再要一個混合政府，並且他們要在邱吉爾已允許的那次選敗德國以後的競選中，與邱吉爾爭勝負。工黨閣員也都同意於這種感覺。副首相阿特立甚且表示懊悔不該在去年工黨會議上作兩自縛，但他自己提出担保，說在對德戰爭停止時，應開一個全黨會議，來決定今後應繼續或終止這種參加，而工黨閣員爲黨的忠實信徒，自將採取與議決相同的行動。

其後選民們雖然不曾大規模的，却也明確的顯示了邱吉爾的魔法已經喪失了魔力。在很多補缺競選中，反對黨的候選人都接受了工黨，自由黨，保守黨的領袖們的正式擁護，包括邱吉爾簽過名的信件，他們佔有本地的組織以爲運動投票時的依據；他們因那張取締很多三十歲以下男女的選舉權的過時登記表而得到好處。但有很多證據，可以證明在軍隊或工業界的年青人都支持左派。

雖然困難重重，獨立的候選人幾乎在任何地方都減低了保

守黨的多數，而且在情形有利的地方他們被選了。很多左翼獨立候選人，受到公福黨六個運動投票專家的幫助。一個新任公福黨國會議員在約克郡斯基頓（Skipton）地方被選，而那地方，因爲是農業選區，一直被認爲不會有工黨的希望的。在西選以 West Derby 愛爾得曼懷特 Alderman White 工黨獨立候選人，也被公福黨所支持。因爲西賓貝是一個保守黨佔勝的選區，所以懷特氏的被選給哈定頓勳爵 Lord Hardington 一次大打擊。人家寫了一首詩的名詩來慶祝這次的勝利：

愛勳爵名叫哈定頓，不付去到達定頓
在伊頓的遊戲場上，他失去了位置。

在別瑞聖愛德蒙茲 St Edmunds 的補缺選舉中，柯貝特阿阿貝夫人 Mrs Corbett Ashby 是站在自由黨的立場，但她宣稱她對於一切聯合前進陣線的忠誠。她敵不過那第一流的保守黨候選人而失敗了，而這一次却減低了保守黨的多數的地位。她的口號是「戰時邱吉爾，和平時皮佛里治」。她贏得邱吉爾做戰時的最高地位是國人所一致接受的，若作平時領袖則不被信任的。

這些補缺選舉的結果，可以拿來說明大家對於現存政黨的幻覺是醒悟了。這種覺醒無疑的存在着，正如民衆觀察家哈里遜 Tom Harrison 氏最近在政治季刊上所指出的。但是就目前各黨來說，拿工黨作缺點最少的人，愈來愈多。這是與戰後選舉有很大關係的。原來爲要制裁重大利，而在一九三五年被選的保守黨，現在成了將爲人民所厭棄的舊秩序一樣的東西了。

一九四三年八月不列顛民意會向全國發出了：「假使明天有一次大選，你將如何選舉」的問題，所得結果如下：

工黨百分之三十九	共產黨百分之三
保守黨百分之二十三	公福黨百分之一
自由黨百分之九	

這是表示工黨的前途很好。但是在放下賭注之前，還有一種情形要考慮。工黨祇能在她的領袖們要獲勝時才能勝利，並且必須有一個保守黨很明顯的不合的政綱。保守黨人對製造選舉的恐慌，是拿手好戲，並且會儘其利用德國和日本戰爭結束前那個跟從邱吉爾的需要。工黨會因疏忽而失敗，但假使能激底的響應選民的新情緒，並且決定要使英國之專心致力於發展經濟社會福利，和平等的民主，成爲一個事實，那他就不致失敗。如若工黨會依照很多黨員所要求的那樣，把他自己放在一個包括左傾自由黨，公福黨，和共產黨的前進陣的前線，那結果便不成問題；因爲那樣左翼的精力與選票不是分裂而是統一的了。

教國的預言家常以說「一切預言是不可靠的」來掩飾自己。但無論你如何加上限制的辭句，我預備打賭說在和會席上，關於大英聯邦問題，要以工黨的語調發言，除此以外，還有什麼人可以繼承呢？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東埔寨風土記序

張禮千

自十三世紀以來，專誌柬埔寨之著作，除周達觀之眞臘風土記外，竟成絕響。明清載籍，雖間有著錄，然均一鱗半爪，其用不宏。迨法人治越後，對柬埔寨之史地經濟，始有詳細研究，數十年間，所刊著作，爲量甚豐。但國人之譯爲漢文者，尚不多覯。偶有介紹，則僅限於與中國載籍有關之史地考證。是以自唐迄今，國人對柬埔寨之認識，可說由密切而變成疏遠，由熟知而變成不知，良可慨也。最近黃君雄略示其所著，余已覽一過。覺首尾具備，是要可補國人今日研究柬埔寨之缺憾焉。

介伊洛瓦底江與湄公河下游間之一片土地。蓋係平坦沃壤，有兩種外來民族，繁衍於斯。一稱吉蔑人，一稱得楞子，後者別稱猛種。世人以此者之形貌相似，語文互通，來源相同，遂合稱猛吉蔑族。故我人欲明柬埔寨之吉蔑，可究與賈塔之得楞。按得楞係 Talaing 之對音，其字源于 Telingana 。後者又源於 Tri-kalinga ，而此字則出于 Kalinga ，至爲明顯。此即大唐西域記之羯餧伽也。該國建於何時，我人不知，惟悉無憂王於紀元前二六一年時，曾遣大軍，撻伐其國，羯餧伽人之被屠者十萬人，被俘者亦衆。我知此今屬麻打拉斯省之南印度人，因受屠殺之慘，遂於此時向東遷移矣。彼等既抵中南半島南部，見河流之廣泛，土地之肥美，雨水之潤澤，生活之簡易，即卜居於此。蓋唐以前，該民族拓地之廣，史所闕稱，而唐代載籍中屢見之墮羅，猛吉蔑族亦即其中之一也。迨泰族崛起於湄南，猛吉蔑族之聯繫，遂被其中斷，致造成今日得楞子居於南緬，吉蔑人居于柬埔寨之現象矣。關于吉蔑之源流，在黃君大著之中，本已提及，余在此敢贅一言者，除對黃君立說稍予補充外，並欲正近人以南洋民族盡歸入中華民族之異說耳。

三三・五・三一・序於重慶。

中國人最早至英國者

張禮千

國人最早至英國者一則，所論殆有商榷必要，茲就所知，錄供參訂。

頃閱本誌一卷十二期，在雲孫隨筆中有中國人最早至英國者一則，謂清高親至歐羅巴洲，三・二七・

謝清高者，粵之嘉應州人，生乾隆乙酉年（一七六五），年十八隨番船，朝夕船上者凡十四年，三十一歲而瞽，不能復治生產，遂流寓澳門爲通譯以自給，嘉慶庚辰（一八二〇）春，揚帆南興李秋田遊澳門遇焉，遂由謝氏口述，揭氏筆受，成海錄一書（余所見者爲海山仙館叢書本及商務印行之馮承鈞注釋本），中有嘆咭利（亦名紅毛）一則，敘述甚詳，稱 London 曰諭倫（此因閩粵人讀D如L之故），備志其地之繁華富庶，且呂蒙陽（與王韜同時，韜字紫銓，號仲弢，晚署天南遯叟）於重刻海錄序中，謂清高親至歐羅巴洲，布路亞（葡萄牙）英吉利諸國皆所身歷，具證謝氏之進第一段早於是無問題的半世紀矣。

Academia Historica

源人民急於作之於市場，不過是由一個饑餓的戰士部落很始忘的搶來而不還的寶藏的倉庫。供求的定理已廢除了，而代之以古代的强佔和破壞的規則。我們在西方已經親悉了的一百五十年的政治經濟，被遺棄了——或是當作戰爭藝術的附屬品。軍需官的辦事處是極權國家的經濟中心。

這一個僵局不能因妥協而避免。以戰爭作爲富强之法的國家，和從事於正常的廿世紀的生活的組織的國家，其間是沒有折衷辦法的，因爲今日的戰爭是全體性的，戰爭吞沒所有一切其他的社會活動。我們所能作的，祇是利用我們的資源——尚幸遠遠於那些舊日孤立主義者所有的——組織起來，以對抗他們的阿代遺傳的狂亂，並且確實的相信在廿世紀的事實的碰撞下，二人他們就要遇上，然後歐洲人民間，不論大小，才能有合理的友鄰的討論的方法。

最後分析起來，歐洲今日的政治問題可以拿一句話來總括，牠是德國人民的不成熟的問題，——這不成熟的原因，深深的潛伏在德國歷史中，和一種和諧順互相混合的民族性的，即是斯泰爾夫人（MADAMEDESTAEL）在一八一〇年所說的「有力的順服」和「模糊的接過生活興勃勃的專門細節」的脾氣的互相混合的德國民族性之中。正因這個緣故，才使德國八十年前在普魯士領導之下，與西方其他民族失去接觸，而採取他自己的路徑，而由這條路徑，她已掀起了四次歐洲的戰爭。

要說明這種奇怪的不成熟和不正常的原因，並且替中間一張樂方，不是這本幾頁的書所能做到的。我們只能說那種根深蒂固的狀態，一日不能加以處理，國際合作的進步，也就被遲緩了一日。歐洲大陸曾停留在政治落伍的境地中，而民主國家的政治家，在較好的環境中，能盡力於打倒自古昔遺留下來的偏見，並領導歐洲人民到因科學而開放給他們的大世界中去的；在這種情況下，會沒有相當努力於反抗無意義的霸武主義，或者最多能夠想出些渡過一個躊躇不安的時期的暫時止痛劑而已。

春游 并序

幼椿

乙酉元旦，予周兄約游南山老君洞，並戲其寫；晚歸，雪時思聰奏西樂。有作，寫呈予周醫梅

女士正之。

一番快雪喜春晴，游燕招邀慰客情。豆甲調羹鄉味美，松針鋪徑足塵清。爭樂柔綠迎初吉，修得梅花伴此生。向晚繁弦致夢覺，海天風雨正縱橫。

Academia Historica

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已有四年之歷史，其一貫的職志，即在突破一切軍事與政治之難關，爲中國實現民主團結，一以鞏抗戰之全功，一以確立建國的基礎。自去年九月召集全國代表大會，並於雙十節公佈抗戰最後階段的政治主張三十六條，舉其要點，則有如以下之十項：

（一）立即約束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權；

（二）召集黨派會議，產生戰時舉國一致之政府，並籌備正式國民大會之召開，及憲法之制定；

（三）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職業、身體之自由，廢除現行一切有妨害上列自由權利之法令與條例；

（四）開放黨禁，承認各黨派公開合法地位，並立即釋放一切政治犯；

（五）廢除特務及動員一類純粹法西斯之組織；

（六）全國一切派系之國之軍隊，應本平等待遇之原則，整備、補充、訓練、補充之公平，以求得作戰指揮之統一，並漸進於軍隊國家化之正軌；

（七）財政經濟公開，凡預算決算及增加人民負擔之措施，必須交由現有民意機關審查通過；

（八）保障人民之最低生活，改善士兵及公教人員之待遇，對戰時戰後之受災人民，尤應統籌救濟；

（九）立即停止教化教育，保障講學自由及從事教育職業之自由；

（十）促進中蘇邦交，加強對英美及其他盟邦之聯繫，以期澈底合作。

吾人提出上列各項主張，爲時已歷四月，但對目前情勢，仍完全適用。吾人認爲在戰爭未結束以前，必須將此項過渡辦法切實做到，中國始有實現民主政治之可能，否則藉延宕以資敷衍，弄名詞以飾觀聽，則不惟當前一切困難問題無從解決，整個國家民族且有陷於分裂破碎之虞。爲國民黨計，與其空談「還政於民」，似不如實行與民合作以免自誤誤國之爲愈也。

邦人君子，幸共圖之。

國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在外籍記者招待會上的公開聲明（三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半個月以來，政府代表（我是其中之一）曾與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先生在重慶會談。政府方面曾提出若干重要的讓步，下列各項亦在其內：（一）承認共產黨爲合法的政黨；（二）在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容納共產黨高級人員；（三）爲構成一種戰時的內閣起見，在行政院內容納共產黨及其他政黨代表；（四）組織一個三個人的聯合委員會，以考慮改組共產軍及他們給養的問題——在該委員會內，政府及共產黨代表有同等地位而可能由美軍官任主席。但共產黨覺得這些提議並不是他們所能接受的，他們拒絕了。共產黨提出召開一個各黨派的會談。政府之所以允許再次召開一個國共代表及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領袖會議，以考慮國民大會開會以前關於政治及軍事團結的過渡辦法，就是接受這個提議的意見。周先生已帶了這個提議返延，徵求他的黨的意見，至於結果如何，則非我所能預料了。

中共代表周恩來的聲明（二月十五日）

國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博士本星期三日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的聲明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因爲他只說了在國共談判中政府

方面提出的所謂讓步，而並沒有明白在什麼條件或前提下，才有這些所謂的讓步。第一，國民政府在談判中，要求中國共產黨將其所領導的一切軍隊移交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即是說，移交於國民黨領導，因為國民政府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第二，在談判中，國民黨堅持其一黨專政不能結束，由於有這兩個條件或前提，這一切所謂的讓步，不是落空，便是沒有任何意義，甚至不是讓步而是束縛或破壞抗戰的力量。具體說來，第一，不把軍隊移交給國民黨政府，便沒有中共的合法。第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從來就不開會，也沒有任何權力。第三，在黨政下的行政院內設置所謂戰時內閣，並經最後決定政策之權。第四，不取消黨治和不改變排除異己的領導政策，三人委員會改編中共軍隊仍等於將中共軍隊移交於國民黨政府。而且照打敵人的成績看來，應該改編的不是中共軍隊，而是國民黨軍隊。說明了這些，便懂得我代表中共中央為甚麼拒絕了國民政府修訂的提議，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國民政府拒絕了我們關於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與全統帥部，以統一中國一切軍事力量，以改革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政策的建議。我們又曾向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中國民主同盟提議：由國民政府召開黨派會議，討論和決定如何結束訓政，如何改組政府使之成為民主的聯合政府，並起草共同施政綱領，以便在取得一致同意後，好實現聯合政府的方針。國民政府的答案是一種諮詢性質的會議，而會議中預定的主要內容是繼續維持一黨專政，反對民主的聯合政府。因此，我必須延向我黨中央報告。至於我們希望國民政府首先釋放愛國政治犯，取消一切壓迫人民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務活動，撤退一切包圍邊區和進攻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隊等項，

國內當局進步輿論，迅速採取行動，這樣才能使談判成功，兩黨談判承美國大使赫爾利將軍熱忱相助，不斷努力，再人在此表示感謝。

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

說明中國民主同盟的緣起主張與目的

（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發表於重都新中國日報）

民主同盟的基本主張，是要取消一黨專政的黨治，實行主權在民，天下為公的真民主政治。內以求國家之統一，外以得國際盟邦之平等。

當二十九年冬間，國民黨與共產黨因新四軍事件而起糾紛，其時國民參政會中各黨派及無黨派之參政員十數人。聯合出而調解，向蔣委員長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兩項主張。以為惟有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 纔能解決國共兩黨糾紛問題，得到全國政令軍令之統一。雖未見採納，然此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遂為民主同盟之基本主張，至今未稍改變。

民主同盟組織的動機。是因鑒解國共兩黨以求全國團結之無效，三十年春間，遂由各黨派協商結合國共兩黨以外之各黨派，而組織一民主政團同盟。使之 為一個大的力量，居於國共兩黨之間，調和監督，以期全國終能達到民主的團結。并使於抗戰期中興抗戰軍事結束後，均不至再發生內戰，損害國家元氣，益陷於不易恢復之境。此種動機，亦至今未稍改變。

到了三十三年秋間，因國勢日趨危，已到極嚴重關頭。而在一黨專政的黨治之下，則政治軍事日益崩壞，財政經濟日益瀕竭，人心亦日益離散，非立即實行真民主政治不能振奮人心

團結全國，內以革新庶政，外以加強戰力，而獲得最後勝利。然欲促成眞民主的實行，僅限於黨派結合之政團，其力量實嫌不足。必須擴大到國內一般要求民主實成民主的各界人士，都來參加，羣起響應，共同努力，始能促成眞民主政治之實現。於是將民主政團同盟的政團二字取消，改稱民主同盟，以期全國之一致。

民主同盟目前對於國共兩黨之態度，是極其公開明白的。共產黨能放棄階級鬥爭，走上政治民主的道路，民主同盟即與之攜手，取友好態度，如共產黨還要蹈襲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鬥爭，民主同盟絕不與之合作。國民黨能實行眞正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民主同盟即與之攜手，取友好態度，如國民黨徒以三民主義爲口號，仍想藉訓政爲名，保持一黨專政的獨裁，民主同盟亦絕不與之合作。民主同盟的主張，始終是要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軍隊國家化的目的，是軍隊屬於國家，軍人應盡忠於國家，而澈底取消軍隊內任何黨的組織，全國任何方面再不許有黨軍與私人武力。政治民主化的目的，是實行主權在民的民治，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以期建設一個政治自由經濟平等的新民主國家，而走上安全繁榮之路。

更有言者，民主同盟基於國共以外各黨派之結合，而此結合，自有其共同的正確主張，與共同的遠大目的，絕不會受他方面之威脅或利誘，而改變，而分化。不過各黨派雖加入民主同盟，民主同盟不能拘束各黨派之一切行爲，各黨亦不能以其一切行爲單獨代表民主同盟。

民主同盟是始終站在國家的立場，謀各方之團結，以實行眞民主，以此救國，以此建國。乃近來常有自私自利的反民主的人，因見民主同盟主張取消一黨專政的黨治，公開政權，除既爲受共產黨利用。民主同盟是否共產黨利用，自有事實證明，試問三民主義，是不是進步的十足的民主政治，實行三民主義，即是實行主權在民的民主，當然要取消黨政，公開政權，所可惜者，三民主義，未見實行，而使民主同盟起而要求，并聯共產黨得而利用，這是國民黨人應該自己反省的。

蔣主席對憲政實施協進會演詞

（三十四年三月一日）

各位先生：中國國民黨繼承 國父遺志，努力國民革命，以實行憲政，完成建國，爲大目標。七七抗戰發生以前，政府原已決定於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不意日寇發動侵略，因此不能不延期召集。但國民黨實施憲政之意願，依然日益加强，第六次中央全會，仍決議於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終以戰事擴大，當時參政會同人主張緩開，乃又因而延期。於是在前年有憲政實施協進會之設立。本席於本年元旦，復代表政府宣佈本年內在軍事形勢許可之下，即可召集國民大會，頒佈憲法，以符國民爲建立民國，還政於民之宗旨。

就中國國民黨既往的歷史觀察，以實行三民主義，領導國民自求解放，以達到國內各宗族及國際之自由平等爲目的。辛亥以來，本黨領導國民，推翻滿清專制政府，消滅陰謀帝制之袁世凱，以及打倒擁續袁世凱而興起的一切軍閥，及至民國十七年，中華民國完成統一，最近八年來，不避任何犧牲，備歷險阻艱難，領導全國，抵抗日寇的侵略，同時並積極準備實施憲政的工作，凡此事實，均明示中國國民黨是一個以解放中國，決定民權，爲其歷史使命的革命政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們要在這一次神聖抗戰中，完成一個永久統一的國家，才能順利的推行各種經濟建設的工作，以提高我一般辛勞勤苦同胞的生活水準，而且更惟有統一的國家，才能在日寇開始侵略以前，本是一個完整的統一國家，到現在除了共產黨與他們的軍隊不受中央命令而外，還是一個完整統一國家，此外，並沒有不奉中央軍令的軍隊，亦並沒有不奉中央政令的地方政府。

本席迭次宣示：中國共產黨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近來外面對於中央竭誠寬容力謀解決的經過，尚有未明者，因此不得不將重要的經過，加以說明。

這幾年來中央與共產黨的會商，已有多次，每次均是懸而不決。而在我們所得到的經驗，都是一個要求方纔容納，立刻就來一個新的要求，共產黨最近的要求是要中央立即取消黨治將政權交給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而在我們政府的立場，是準備容納其他政黨，（包括共產黨），與全國無黨無派的有志之士參加政府。但在國民大會召集以前，政府不能違反建國大綱，結束訓政，將政治上的責任和最後決定權移交於各黨各派。造成一種不負責任的與理論事實兩不容許的局面。政府並又曾請中共參加行政院決定政策的政務會議，類如外國的戰時內閣之組織。

八年來在抗戰的進行中，國家屢遭軍事上的失利，與經濟上的壓迫，我們所以能渡過危機，實由於我們有一個鞏固安定而負責的政府領導着的緣故。現在戰事仍極嚴重，前途尚有不少的艱險，國民政府如將一切政權或責任交給各黨各派，則中央政權勢必日日在風雨飄搖之中，其結果必使抗戰崩潰革命失敗，將使國家引起可怖的變亂，而陷民族於萬劫不復的境地，因為我國情形與他國不同，在國民大會召集以前，我國便無一個可以代表全國人民，使政府可以徵詢民意之負責團體。所以吾人祇能還政於全國民衆的國民大會，不能還政於各黨各派的黨派會議，或其聯合政府。大家都知道國民政府之基礎，是革命先烈與抗戰軍民無數生命鮮血的犧牲所構成的，吾人上對國父與先烈，下對後世民族與抗戰軍民，都有不容放棄的責任，在此緊要關頭，更必須負責到底，以鞏固國家基礎，決不能以國事為兒戲，使抗戰大業功敗垂成，以辜負國民與友邦的期望。

我國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東三省被日寇侵略以來，此十餘年間無日不在危疑震撼狂飆暴雨的危舟中行過，中國國民黨已負起了偉大艱難領導全國的責任，所謂還政於民，就是交付這樣巨大的責任於全體人民，故必須經過國民大會的這個機構，始可有所託付，但在目前狀況之下，亦已準備其他黨派參加政府的組織。

其次，說到軍權統一問題。凡是一個獨立統一國家決沒有軍權不統一的，尤其是抵抗侵略的時候，如果是真正愛國愛民的政黨，決不會有妨礙軍權的統一，以削弱國家抗戰力量而幫助了敵人的侵略，我們在抗戰期中更應集中一切力量，驅逐敵人，所以必要軍權統一，共產黨不應有獨立的軍隊，這是很明顯的道理。現在共產黨在各國宣傳，說是他們的軍隊，如果一旦歸中央統一，便不免要被消滅或被歧視，而在國外亦不免有求明事實的人，受這種宣傳的鼓惑，甚至誇張共產黨的軍隊力量，與事實皆不符合。有時且與他們所宣傳的幾乎完全相反，抗戰以來，八年之中，始終負作戰責任的大家都知道，實際上是政府所統率的國軍，現在已有盟國的通力合作，政府已準備

Academia Historica

國強大的軍隊與配備，以遂行反攻，並配合盟國共同作戰，以驅日寇於亞洲大陸之外。

本席對於共產黨的要求，已曾明白答復，最近政府曾對共產黨代表周恩來說，政府在行政院內設置戰時政務會議，為行政院決定政策之機關，將使共產黨及其他黨派人士參加，政府並準備組織一個三人委員會辦理整編共產黨軍隊為國軍的一切事宜，三個委員中，一位代表政府，一位代表共產黨，一位是美國軍官，如美國政府同意，固然最好，即美國政府不能同意派人，我政府亦必用其他適當方法，担保共產黨軍隊整編後的安全，及與其他國軍享受同等待遇。

此外，本席還提出一種辦法，以為共產黨對於其軍隊的整編，既不免有無端的疑慮，政府願於在抗戰期中，如美國政府同意時，可將共產黨軍隊，在最高統帥節制之下，指派一個美國將官直接統率，不意上面這兩種提議，皆已遭受共產黨拒絕。所以共產黨如果真心誠意願與國軍及盟軍聯合作戰，在政府實已將公允可能的方法坦白誠意的提出了。

抑又有須申述者。自從上年十一月中央與共產黨開始會商以來，中央深信各方意見有爭執時，果為誠意商取解決，便不應互相攻訐，因此竭力勸告國內輿論，不應有攻擊共產黨的論調。乃不意共產黨即藉此次機會，在國內外廣事宣傳，並且對政府及國民黨肆意抨擊，國之國內外人士所聽聞者，無為共產黨片面之詞，且在雙方會商之時，竟造作各種極可笑的流言，如謂政府已在同日產洽商和平等語，本席在代表國家的人格與地位，認為此種謠言之言，實在不值一駁。

凡我國人，莫不關心於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未來之前途，亦莫不深明其本人對於其後世繼起者應負之責任，決不願重蹈覆轍，家發生內戰，亦必能深悉政府歷年來委曲求全的事實，準備應時與共產黨商榷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政府所提出的辦法，如此寬大，也已盡量替共產黨着想了。如果共產黨真正為國為民有團結一致共同抗戰的決心，而並無推倒國民政府，破壞抗戰，以取奪取政權的企圖，對於政府的提議，實在沒有不可以接受的道理。政府嗣後仍將繼續尋求合理的辦法，以期共產黨與其軍隊均能貢獻能力竭誠效忠國家。

本席所以不厭求詳，反覆說明中共問題者，實在因為中共問題，懸而不決，是目前抗戰與一切建設的障礙。至為實施憲政問題，政府將依下列步驟，促其早日實施。

（一）預定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八十誕辰召集國民大會，以實現憲政。（一俟五月間國民黨代表大會通過，即可正式決定公佈）

（二）自實施憲政之日起，各項黨均有合法的平等地位。（政府前經向中共宣示，並須共產黨願將其軍隊及地方政府的組織交歸政府，即可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此項宣示，仍為有效。）

（三）國民參政會將於最近舉行第四屆集會，此屆參政員人數，及參政會職權，均較以前增大，政府擬在此屆參政會時，將召集國民大會辦法，及其他憲政問題，提出參政會審議。

本席對於抗戰的勝利，與吾國民主政治的前途，均甚樂觀。現在一般輿論，要求全國軍事與政治的統一及建設，日益增强，此種輿論，為全國民心所向，將成為偉大澎湃而不可抑止之力量，深信全國任何團體，任何個人，終必遵循這種輿論的要求，共謀抗戰勝利與建設成功之實現。我們憲政實施協進會負有促成憲政，以鞏固國家統一與永久幸福之責任，故特為各

Academia Historica

位先生鄭重宣言之。

中國民主同盟發言人

對最近國內民主與團結問題發表談話（三十四年三月十日）

本月一日，憲政實施協進會舉行第五次全體會議，蔣主席以會長資格，出席發表演說，其內容計分兩大部分：其一部分說明政府以往曾就政治與軍事兩點，與中國共產黨代表經過多度協商，雖兩方意見仍未歸於一致，但蔣主席表示：「政府嗣後仍將繼續尋求合理的辦法，以期共產黨與其軍隊，均能貢獻能力，竭誠效忠國家。」其另一部分，說明預定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以實行憲政，並說明政府擬於本年第四屆國民參政會集會時，將召集國民大會及其他憲政問題，提出參政會審議。

吾人以統一與政主問題，係國家前途者甚大，特本平日一貫立場，重申吾人之主張如次：

國共兩黨間所引起之紛擾，原為二十年來之一宿題，演變至於今日，其利害不只及於兩黨之本身，乃關係整個國家民族之命運。所謂武力統一，在過去二十餘年間，國人已深受痛苦之教訓，經此八年之抗戰，則尤創鉅痛深，不求得國內之團結統一，則不惟抗戰仍將繼續延長，建設更將無從開始，故內戰為國人心理所不容，亦為國際情勢不斷不許，不論誰為戎首，其必為舉世所唾棄，實屬毫無疑義。吾人自來主張軍隊國家化，即謂軍隊屬於國家，軍人只能效忠於國家，非任何個人所得而私有！亦非任何黨派所得而私有！在今日國共兩黨之軍隊，仍各有黨的組織與黨的宣傳，甚至變本加厲，一隸軍籍，即須同時入黨，此不惟大背軍隊國家化之本旨，實亦匯成國家統一之禍根，目前中國之迫切需要，不僅須切實做到「還政於民」，更須切實做到「還軍於國」。

最近國共兩方，亦既慨於國家情勢之嚴重，國人公意之不可違，互派代表，從事協商，歷時已九閱月之久，且重勞國際友人，從中奔走，徒以互信未孚，我見未破，卒少成議。然目前世界整個局勢，歐洲之戰爭必於年內告終，遠東戰況，已日趨劇烈，如美英蘇三國集於形勢之需要，不能不於最近在遠東採取一致之行動，則國際關係所及於中國之影響，必更趨於微妙複雜，中國戰後國際地位之高低，系於中國自身對戰爭所盡力量之多少；同時國共兩黨在國人眼中之估價，亦即視其對國家合作效忠之程度以為差；此實兩黨一致奮起以爭取其自身榮譽之惟一良機，一面固宜有以副友邦期待之殷，一面尤不能不痛感其對國家民族所負責任之重且大也。

吾人細讀兩方公布協商經過之文件，誠知其在若干具體主張上，尚有相當之距離，但談判之必須繼續進行，民主團結之必須實現，似已為兩方所一致堅認。果能於本年四月二十五日召集山所召集之聯合國會議以前，本於最近協商之結果，由國民政府召集一各黨派及無黨派之領袖會議，各本互讓之情緒，運用現代政治家之常識，快刀亂麻，折衷至當，就軍事與政治求得一理論與事實兩俱可通之切實辦法，則不惟國人厭亂之心理可得到確實之慰安，友邦對中國之觀感可因此至變，即政府所欲於最近期間提案為治實施憲政之偉大工作，亦可因以奠定其良好之基石也。

本年十二月十二日蘇偉石陽之國民大會，其主要工作將為憲法之制定與確定，在其在建國史上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

本同盟於本年一月十五日所發宣言，曾請國民大會之提前召集；吾人在原則上甚表贊成，惟對於如何召集之方法，則不無疑慮。今政府已將審議此項召集方法之權付諸第四屆國民參政會，果本屆參政會之組織確能反映各方民意以提出一公允之辦法，則政府此舉自不失爲一種適當之措施，但在政府擬定此項召集方法提交參政會以前，本同盟仍願申述其主張，以待國人之採擇。

在二十四五年所已選出之一大部分國大代表，如僅除死亡與附逆外一律有效，吾人實不能苟同，蓋在最近八九年間，中國經過一度歷史上空前未有之對外戰爭，世界亦經過一度空前未有大戰，其所影響於人民心理及其政治意識者，實至爲深巨；以八九年前所選出之代表，欲以之反映經過八九年鉅大變化後之民意，實爲事實上之不可能。況國民政府所公布之憲法草案，明明規定國大代表之任期爲六年，誠以經過六年之時間，人民之意向不能不有甚大之變化，其代表應予改選，乃屬事理之當然。假定二十四五年所選出之代表仍屬有效，則是超過憲草案所規定之任期亦已三年，以有憲制憲法之第一次國大代表，如首開此違反憲政精神之惡例，其所予國民不良之印象爲何如？此應請國人重加考慮者一。

根據立法院所制定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其有權選舉國民代表者之年齡爲二十歲，有權被選爲國民代表者之年齡爲二十五歲，經過此八九年之時間，則是凡在戰前已屆十一二歲之國民，在今日已達十五六歲之國民，在今日已獲得其法定之選舉權；凡在戰前已屆十五六歲之國民，在今日已獲得其法定之被選舉權；合計此兩者之人數，其總數當不少於三千萬。且此類三千萬左右之少壯分子，實際即對抗戰貢獻最多之分子，今爲國家建立民主憲政之基而召集第一次之國民大會，乃實此三千萬左右有功抗戰者之選舉及被選舉之法定資格無端予以剝奪，無論爲事理上所不可通，即一在情理上亦豈人情之所許？此應請國人重加考慮者二。

今日敵後各區域之土地，猶是中華民國之土地；散居各區域數千萬之人民，猶是中華民國之人民；但經過此八年之抗戰，其情勢已較戰前大有出入，此爲事實之無可否認者，如不顧各該區域人民之情感，仍以戰前所產生之代表作成種種必須全國人民一一遵守之決定，萬一當大會開會之際，各該區域人民起而質有煩言，謂此類舊日之代表已不足以代表各該區域新近之民意，則已出席大會面與各該區域有法定關係之各代表，豈不將陷於啼笑皆非？其所及於國家之不良影響，又當可數計？此應請國人重加考慮者三。

當二十四五年舉行選舉之際，固猶是黨權極盛之時，當時國內除國民黨外，各黨派固無一能享有參與選舉之機會；即平日在社會雖負時譽之各界人士，如非早已取得國民黨黨籍，亦絕少有被選爲國大代表的可能：甚至在國民黨黨內之若干賢達，對於當時選舉之種種情況，亦有深致其不滿者；凡此均屬全國所周知之事實，不容否認。今時移世易，合全國之力以與日寇周旋，爲時已八年之久，世界民主高潮，既挾其排山倒海之力以俱至；而全國必須團結以共度此戰時戰後之難關，又實爲時代之迫切要求；如置上舉一切事實於不顧，仍舉八九年前所產生之舊代表，以之應付當前千難萬難之新局面，則所謂民主云云，團結云云，豈不將徒託空談？此應請國人重加考慮者四。

國民大會開會之日，應即爲國民黨黨權暫告結束之時，國民黨遵奉其故總理之遺教，固將以國民大會之召集以期「還政

Academia Historica

於民」之實際也。顧吾人尊稱國民大會組織法第三條，則國民黨中央之執監委員及候補執監委員，乃爲國民大會之當然代表。依據吾人上舉之事實，則九年前所辦之選舉，廉屬國民黨一黨所主持，今更益以此數百名之當然代表，則在將來大會內所表現之「黨空氣」，寧不稍嫌濃厚？萬一國民不諒，以此而疑及「黨及於民」不過僅有其名，而「政權合法化」，乃爲國民黨所要求之實際，則黨內諸賢達，其將何辭以自解？此應請國人增加考慮者五。

總之，現距國民大會之召集，已僅餘八個月之時間，值此短短之八個月，却爲國內國際若干重大事件之決定階段。吾人主張國內團結問題，必須由政府召集一各黨派及無黨派之領袖會議以求解決；軍隊力量之統一適當使用，亦必於此時求得一適當辦法，始足與登陸之盟軍配合以貫澈反攻；最近國際間所召集之重要會議，例如本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舊金山召集之聯合國會議，其出席代表之人選及中國方面所提之俱體辦法，必須使其確能反映我全國之團結統一。凡此種種，自表面觀之，似與國民大會之能否圓滿召集無關，但實際則相互之關聯甚密。吾人深望朝野各方以國家民族利益爲重，而暫置小己與集團之利害爲後圖，則國幸事！民主前途幸甚！

民國

第二卷　第二期

短評四則　　羅生
（一）日本有最近投降的可能嗎　　羅生
（二）在國民參政會召開以前　　海濤
（三）所謂政治結社法　　景陶
（四）談英格蘭人
民主政治與人性問題　　陳啟天
民有民治與民享　　余家菊
中英關係的探討　　張似旅
抗戰最後階段中吾國必需之現代將校　　孫寶毅
國際外匯基金組織基本原則　　瓦斯克連斯基教授
法國的政黨與抗敵團體　　沈頌芳
緬甸的普選　　張禮千
美國共和黨參加舊金山會議的性質　　孫寶毅譯
雲孫隨筆四則及其他　　陶元珍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長江實業銀行

實收資本叁千萬圓

竭誠為社會服務
扶助工商生產事業

重慶市範模一第行分

電話	電報掛號
41458	6060

匯通銀行

實收資本叁千萬圓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資力雄厚
信用卓著
作風穩健
服務週到

行址：民族路二一〇號
電話：四一一八八七

金城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及各種儲蓄存款

各分支行處所在地

重慶成都自貢瀘桂柳梧平西漢寶宜長衡辰沅威
沪
廣山都井明縣林市州涼安中雒陽沙陽榕陵遠

重慶分行

地址：陝西路第229號
電話：42362號（經理室）
42363號（營業室）

民權路辦事處

地址：民權路新生路
電話：42011號（營業室）
41269號（經理室）

兩路口辦事處

地址：中三路（兩路口）2號
電話：2072號

沙坪壩辦事處

地址：沙坪壩正街19號
電話：6259號

信託分部

地址：民族路137號
電話：14615號

建國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竭誠為社會服務
盡力謀顧客便利

行址：民族路二號
電話：二五六一四
電報掛號：六二一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短評四則

日本有最近投降的可能嗎？

舜生

最近日本和平攻勢的風傳甚囂塵上，甚至已引起盟方多少的注意，其實這是值不得注意的。

誠然，德意如此結局，不能不令日本感到胆戰心寒；就勉强撐支下去，其結果也還是失敗，這在頭腦比較清醒的日本人也未嘗不明白；可是日本決不會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就無條件的屈服，却是鐵一樣的事實。

第一、日本是一個自負心很强的民族，在她的歷史上有着一串的所謂『赫赫武功』，一種不可敗不能敗的虛驕之氣，實在對於她還有相當的支持力量。

第二、她覺得她作戰的本錢，不僅不是這大利所能望其項背，就是德國也還趕不上她，現在陸軍還沒有開始大規模的決戰，海軍至少還保留了半數以上，飛機增產的機構也還有大部不曾毀滅，就這樣便拱手讓人，這是她的自負心所不許的。

第三、日本所佔的土地太廣，兵力太分，這是對於作戰非常不利的，但她現在已經覺得了，因此在作風上也逐漸在改變，例如最近仰光的放棄，未經强烈的抵抗，便多少含得有保全實力縮短戰線的意味，她可能假定：如果將兵力集中使用，她還是可以多麼戰幾時的。

第四、日本可能把美英蘇間的矛盾估計得很高，他們覺得美英蘇在遠東的衝突，則終難於避免，因此，他們覺得只要把戰爭拖得越長，他們可運用的機會便越多，死中求活，不見得是不可能的事。

第五、她也可能把中國內部的團結問題看得過於嚴重，她以爲所謂國共問題的政治解決畢竟不可能，不待抗戰完畢，也許中國即將發生內戰。中國的內戰一日爆發，她覺得不是消極的使英美的援華熱漸趨冷淡，便是積極的使盟方的矛盾更趨尖銳，這兩者只要有一項成爲事實，都是於她有利的，因此她更覺得非多憧幾時不可。

第六、日本的對華侵略，本來是日本的軍閥所發起所領導的，可是戰爭的延續到了現階段，乃成了他們整個國家民族的存亡問題，因此戰爭的性質也起了變化，換言之，前幾年是日本的軍閥拖着人民戰，現在却是日本的人民逼迫着軍閥不能不戰，日本一部分的軍閥財閥可能有提早投降的希望，但日本人民對於亡國的恐怖却可能更趨剛結以支持軍閥財閥，實際即逼迫着軍閥財閥，使他們雖想結束戰爭而不可能。

凡此種種，我們都可以認爲只是日本片面的幻想，或者只是她主觀上的希望，不會成爲事實的。但是一個人到了將死未死之際，幻想是特別多的，只要她的幻想不全部消滅，她總還想在死神的掌中苦苦掙扎。因此，我們覺得國內外一部分對戰爭厭倦，在今天便希望日本無條件投降的人們，不是由於精神上的鬆懈，便是由於認識的不足。中國的兵家有言，『攻

三强在歐洲的矛盾似複雜而實小。——現在亞洲的矛盾似單純而實大，覺言之，他們以爲英蘇在歐洲的衝突還有妥協的可能，

Academia Historica

心爲上」，我們今天不單只應該從軍事上加倍努力，以擊潰日本海陸軍的主力，我們更應該從外交與政治上多想辦法，以消滅日本的一切幻想！否則戰爭還是可能延長的。

在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召開以前

舜生

國民黨的六全代會，在五月十七日，對於國共問題作了一項重要決議，其原文要點如下：

「大會聽取中央關於中共問題之總報告，深以中央以往所採政治解決之方針爲適當。本黨領導全國軍民艱苦抗戰，無時不盡力於團結禦侮，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共在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亦曾有四項諾言之宣告。……現值國民大會召開在邇，本黨實施憲政還政於民之初願，不久當可實現。爲鞏固國家之統一，確保勝利之果實，中央自應本此一貫方針，繼續努力，尋求政治解決之道。所願中共黨員亦能懍於民國締造原非易事，抗戰勝利猶待爭取，共體時艱，實踐宿諾，在不妨礙抗戰危害國家之範圍內，一切問題可以商談解決。……」

我們覺得單就這個決議的內容與文字論，國民黨月前所持的態度是很妥當的。中共過去提議請國民政府召集一由各黨派及無黨派的領袖人士所組成的會議，就當前一切重大問題作根本的協商，這與國民黨所主張的「政治解決」，以及所謂「一切問題可以商談解決，」其精神原屬一致。

今日全國的國民，因爲經過了八年的抗戰，實在是創鉅痛深，對於因國共兩方的爭執而可能發生的內戰，確實絕對的無甚附和，不問內戰的發起屬於那一方，也不問其根據何種理由或口實，只要內戰不幸一旦成爲事實，在一般國民視之，實在就是「妨礙抗戰，危害國家」，同時也會使得八年艱苦抗戰的結果，而不能「確保勝利之果實」。

蔣主席最初提出「政治解決」四字，在一般國民的了解，所謂「政治解決」，就是不用「武力解決」的意思，大家實在是衷心贊成。最近延安方面，發表了毛澤東先生一篇在他們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裏面也說到只要國民黨當局同意民主改革，他們還是願意「恢復談判」的。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兩方面都了解到自身對國家，對人民，乃至對國際所負的責任過於重大，並沒有那個願意把談判之門就輕輕的關閉起來，這可以說是解決這個問題所剩下的惟一希望！

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是這個談判如何恢復？何時恢復？關於第一點，我們覺得最好是由國民政府自動的正式召集前項會議。（要避免那種不必要的非正式談話）關於第二點，我們當得在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召開以前，即須開始談判，不僅開始而已，並且要談判一個確實的結果出來。假如不這樣做，我們如信不過國民大會不會開得圓滿，甚至連第四屆的國民參政會也不會開得圓滿！這是國家的統一與分裂的關頭，我們不能不坦率誠懇表示我們的意見。

所謂「政治結社法」

海濤

一個民主國家，人民是有集會結社的自由的，尤其關於政治的集會結社，更是民主精神之所寄托。假定在一個國家以內，人民不能自由集合若干主張相同的人組織政黨，而還要受到種種的限制，則至少從政治的意義去看，這個國家便不是民主

Academia Historica

國家。

假定在一個國家以內，事實上已經有了許多黨派，忽然要由在朝黨來一套所謂「政治結社法」加以取締或限制，則所謂「平等」云云，便已根本的不復存在，而所謂民主精神，也就消滅得無影無蹤了！

一個政黨的能否存在，依於它的主張是否正確，或執政的成績是否優良，假定它是正確而又優良，它自然會得着多數人民的擁護，你就不承認它，它還是假然存在的；否則它會引起人民的厭棄，你就承認它保障它也不相干。人民是一個政黨有無存在價值的最後裁決者，其他的任何辦法都是多餘的。

就退一步說，一定要創立一套所謂政治結社法，請教這一套法又如何創法呢？說一個黨的存在一定要有適當人數嗎？假定一個集有一萬個黨員的黨派，它能團結得堅如金石，又能忠於它的主張而努力去奮鬥，你說它不是一個黨，它却可能還是一個大黨。一個集有一萬黨員的大黨，假如它的內容渙散，并看不出它確爲主張而奮鬥的行動，則實際它只是一個小黨，甚至從另一意義上看它並不存在。說一個政黨一定要擁有相當的活動基金嗎？老實說，在中國這樣一種政治環境，除掉在朝黨有這種方便以外，在野的黨派是不容易取得這種條件，並且也不願意取得這種條件的。說一個黨派的被承認一定要它成立得有相當的年代嗎？這也還是不適的，好比個人，有三十歲而可以建功立業的，也有活到二百歲而毫無建樹的，一個黨派的存在要看它對於國家貢獻的多少，並不在乎它成立年代的長短。

老實說，目前中國的黨派間是有相當的糾紛存在着的，要把這種糾紛理出一個頭緒，便只有依據客觀的事實，從事黨派間的平等協商，並依據協商的結果，分工合作爲國家去分途努力。如果說黨派會議是開不得，這種所謂「政治結社法」便更加要不得。假定大家不要而一定要這樣做，則可能的結果不外兩端：其一是弱者顯繼續遭受壓迫，決不願除國家的憲法和普通法規以外，再受這種特別法規的束縛；其一是強者便根本不理，它有了力量便自己承認自己，並不需要任何別人的承認。不幸果然演成這種事實，則中國黨派間的混亂便會永遠沒有澄清的一天了。我們盼望當動這件事的負責方面，慎重而又慎重。

談英格蘭人

景陶

性格意相近似的人，意難互相了解。此一奇異現象的原因大要由於兩個原則，其一是：知己乃能知人，其另一是：對於人，每往觀其異於己者而忽觀其同於己者。基於此理，我們天天與英格蘭人同其呼吸而不自知。我們的大學生中學生日日讀英文，坎特伯利的故事，天路歷程，讀過的國人，實不計其數。由英人著作譯成中文的，如原富，羣學肄言，天演論，穆勒名學，利維坦，人性論，人類悟性論，教育哲學史等，亦難一一數。我們總不覺其有任何特殊影響，其原因即在於彼此相似之處太多，以同吸同，故無顯明的知覺。

英格蘭人以冷淡稱：殆由於英倫天氣使然。其實英國人是一個講究約制自身的民族。唯其講約制，所以重「保留」，不肯一洩無餘蘊，此與中國人的軌範正相近似。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所謂「至親無文」；皆是此意。往年筆者在英，常往某舊書店購書，與店主人祇是淡然應接而已。一日聞知予將歸國，店主人堅約予臨行前再往一見。如約而往，則殷勤道「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好運氣」之祝福。關後凡函請書籍，無論付款不付款，無不原班照寄。英國人的多情，是不無於流弊的，正與中國人同。

國人好說英國人驕傲，其實驕傲是自尊之誤解。英國人最講究尊榮（Honor）。所謂「尊榮」，與中國字「身分」之意最相近。不失身分，所以有矜持；有矜持，所以似驕傲。自己不失身分，同時對人不失禮貌，所以英國人最講禮貌，處處須得「小心」，粗猛實為大忌。此與中國人「敬愼」之意正相合。

國人又不諳英國之重實利。英人在商業上，殖民上多所成就，頗足與人以重實利之印象。其實重實利決非僅知發財，而發財亦不足以為商業與殖民之動力，英國人之實際性格，重視現實生活，殆為環境使然，正與我國古代的北方民族相同。其現實生活的背後，自有其崇高的理想。試就學術言之，英人的研究既切實又不急功近利。大英博物館所存埃及木乃伊便不計其數。動物園植物園規模的偉大，在歐陸絕無匹敵。凡此，皆非發財之一動機所能說明。

國人又覺英人太自私，無博愛的同情心。此與外人看見中國不理會路旁的病人，便說中國人冷酷，是同樣的誤會。中國人認定路旁的病人，應當有他的鄉里照應或當地人照應，一個行路人是可以不照應的，而且亦是不便照應的。英國人最重正義而不多言博愛。唯其重正義所以各人有各人的分際。所謂「鄉隣有鬥者，關門可也」。英商剝削殖民地，英國人的反對為鬼，並不少於別國人。

英格蘭本是切實沉着真誠的中庸民族，中國人所宜資以切磋者，實為此種風度太剛而亦異之民族。故作此簡略之談，以喚起國人注意。

Academia Historica

民主政治與人性問題

陳啟天

政治與人性有無關係？如其有關係，則比較合於人性的政治，是專制政治，還是民主政治咧？我們要正確解答這個問題，首須探究人性究竟如何。關於人性問題，從前的哲學家和現代的科學家，如心理學家，人類學家，生物學家以及社會學家等，有種種說法，本篇不能詳述，只提出幾個要點，加以討論與說明。

所謂人性，依據現代科學的見地，不外指人類與生而俱有的心理自然傾向而言（這種心理的自然傾向，或簡稱為「性」或另名為「本能」。現在「行為主義心理學家」雖或反對本能的說法，但不能完全否認人類心理確有些自然傾向。如果完全否認人類心理的自然傾向，便無異於否認人性，致人不明人類由生而有的本性了。

在人性問題中，首須略加攷究的，是人性的異同問題。一切人類的天性是相同的？還是相異的？關於這個問題，從來有兩種相反的說法：貴族主義者相信貴族的天性異於平民，而且高於平民，所以貴族應統治平民，平民應服從貴族。有些種族學家，或種族主義者倡言優等種族的天性異於劣等種族，而且優於劣等種族，故優等種族應統治劣等種族，劣等種族應服從優等種族。現在科學的優生學家與個性心理學家，如果將其說法推到極端，也均難免使人誤會人性相異。這都屬於一方面的說法。與這相反的說法，則相信人性相同。例如我國先哲說：「性相近」，（孔子）「聖人與我同類者」，「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塗之人可以為禹」，（荀子）「人同此心」（陸象山）；近代西哲說：「人生而自由平等」（盧梭），「不論何時何地，人類的心理均屬相同，此即所謂心理的一致性，在物質環境影響之下，凡環境的形態大致相同者，則人類心靈上即能產生類似的文化」。（語見哥登熙塞文化人類學）以上兩種說法，究以何說為是？依我看來，人性大體相同，不過不是完全相同，在大同之中，却有些小異。人性的大同點在其本質上，小異點則在其能量上。換句話說，人性的基本傾向是大同的，而其基本傾向的強度則是小異的。如果我們否認人性的大同點，即係承認一切人類不相屬於一類，未免不合科學。反之如果否認人性的小異點，即係否認個性，民族性，與優生學，也未免不合科學。

次須略加攷究的，是人性的善惡問題。人性是善的，還是惡的？我國先哲對於這個問題有種種說法：（一）孟子的性善說，（二）荀子的性惡說，（三）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說，（四）公都子所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說，（五）楊雄的性善惡混說，（六）王充、荀悅、韓愈的性三品說，（上智性善，下愚性惡，中人性善惡混）。（七）宋儒的人有二性，天地之性善，氣質之性惡說。又以自然社會為善的社會起原說，如我國道家及西洋盧梭等，都與性善說接近。反之，以自然社會為惡的社會起原說，如我國墨家，法家及西洋霍布士等，都與性惡說接近。以上各說的是非得失，現在不擬逐一詳論。但據現代科學看來，所謂人性，離不了生物學或遺傳學的基礎。從生物學或遺傳學上去看，人性不是全善的，也不是全惡的。如果是全善的

Academia Historica

，便不會有所謂惡。如果是全惡的，又便不會有所謂善。所以要在人性上追尋道德的起原固可以，但同時也可在人性上尋出罪惡的起原。這可以說是性善惡混說的樣式。不過我們若進一層加以考察，實在不能確切指明人性的某部分是全善，某部分是全惡，顯然有所分別。換句話說，所謂善惡，每每是依人性在環境中的表現形式與程度如何而定。同是一個人性，表現的形式與程度均當便成爲善，否則便成爲惡。例如同是一個好爭心，表現在御侮上便成爲善，表現在內戰上便成爲惡了。又例如同是一個好名心，用實至名歸的方法去表現便成爲善，若好名過度，便不免成爲惡。由此說來，可知人性也不是善惡混，而只是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而已。這種說法，我國先哲雖曾一度提及，然迄今尚少人加以大發揮。現在我們用現代科學加以印證，便覺其十分可信了。又如此看人性，亦頗合於常識。可以說是科學的或常識的人性觀，而不是玄學的或神學的人性觀。玄學的或神學的人性觀或把人性看得過高，又或把人性看得過低，均不大合於人性的眞相。而科學的或常識的人性觀則既不把人性看得過高，致誤認爲全善，也不把人性看得過低，致誤認爲全惡。如此，則人仍是人，而不是神，也不是鬼了。

又次須略加攷究的，是人性的內容問題。人性的主要內容，究竟是些什麼？孟子用道德的眼光，指明人性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荀子用現實的眼光，指明「人生而有欲」，「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逸，是皆生於人之情性」。孟荀以後的儒家，對於人性的內容問題，多是調和孟荀兩家的說法，沒有什麼新發明，不必詳述。現代心理學家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一種新的看法，即不論人性的善惡，而只論人性在社會生活中有些什麼自然傾向，及其對於社會生活的影響如何。在此種新看法之下，現代心理學家提出的本能說法。所謂本能，依照美國心理學家詹姆士所說是「不教而能，不先知其目的，而能達到某種目的之動作的才能」。（詳見詹姆士心理學原理）由這種本能 instinct 構成人性 human nature。故欲知人性的內容如何，則須知人類具有若干種主要本能。詹姆士所說的主要本能，有羣做、競爭、好鬥、憤怒、同情、「遊獵本能」恐怖、貪得、創造、遊戲、好奇、友愛、嫉妒和親子之愛等。英國心理學家麥獨孤 McDougall 所說的主要本能則爲逃避、拒絕、好奇、好鬥、自卑、自誇、父母性本能、兩性、集合、貪得、與創造等本能及其相關的情緒。（詳見麥獨孤社會心理學導言）極端行爲主義心理學家雖有否認本能的，但建立行爲主義的華生 Watson，仍說人類具有驚懼、情愛與忿怒的三種基本反應模形，不過將本能的範圍縮至最小耳。又有些心理學家不用本能的名詞，而改稱欲望。例如，托馬斯 Thomas 說人類有四種基本欲望，即安全欲，新知欲，權力欲，與反應欲，或友侶欲。丹拉普以消化欲，排泄欲，休息欲，活動欲，居住欲，愛戀欲，父母欲，名譽欲，從衆欲等爲人類一切行爲的基礎。人類的欲望內容雖多因後天的影響而異，然無論何時，何地，何人都具有的欲望，則不能不說是基於先天的人性而來。這種基於人性而來的欲望，也可簡稱爲心。其主要者約如下：（一）好生心，包含生命的保持，兩性的關係與種族的綿延等自然傾向。（二）好利心，包含佔有與貪得等自然傾向。（三）好名心，包含自尊與榮譽等自然傾向。（四）好權心，包含領袖，服從，權力與自由等自然傾向。（五）好爭心，包含競爭與妒忌等自然傾向。（六）好羣心，包含羣居，社交，團結，

Academia Historica

同情與愛國等自然傾向。（七）好知心，包含好奇，探險，求眞（哲學與科學）與理性等自然傾向。（八）好樂心，包含遊戲，娛樂，音樂，與藝術等自然傾向。這八種心理的自然傾向，構成整個的人性，至少也構成人性的主要部分。我們要知人性的全貌，必須兼顧這八種心理的自然傾向。如果只注意其中的某一種，而完全忽視其他，則其所謂人性，將偏而不全了。

又次須略加研究的，是人性的適應變化與調和問題。我們既知人性係由幾種主要的心理自然傾向構成，那末人生官如何一面適應人性，一面變化人性，以求其調和發展。實是社會哲學與社會科學上的一個重大問題。人性的各種自然傾向，每每不知不覺的表現爲各種要求或欲望。這種基於人性的要求，不能完全抹煞而不加以適應。因此產生各種社會制度。每種社會制度，愈能適應人性，則愈普遍而愈永久。不過完全適應人性的社會制度，自古迄今，尚未完全建立起來。所以需要隨時改進，以求其比較合於人性。又人性的自然傾向，表現於實際生活時，多難免有所偏。這卽宋儒所謂「氣質」，也卽現代心理學家所謂「個性」。但個性多就偏在好一邊的性質說，故需要變化。諺語云：「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由這句話看來，似乎一般的人性以及一個人的個性，均是不易變化的，那末爲什麼要說變化人性，或變化氣質呢？人性或氣質的本質不易變化，是一事實，我們須得承認。不過人性表現的方式與程度，則有種種差異，故還有變化的可能。換句話說，我們所謂變化人性，不是改變人性的本質，而只是改變人性表現的方式與程度而已。又人性中的各種自然傾向，有時不免互相衝突。例如好生心有時與好名心衝突，好利心有時與好奉心衝突，好爭心有時與好樂心衝突。這卽我國宋儒所謂天理與人欲衝突，好爭心有時與好樂心衝突。依據宋儒的意見，天理是全善的，人欲是全惡的，所以須用天理克制人欲。不過依據現代科學的見地看來，人欲基於人性，只可求其表現合理化，決不能完全取消人欲，而代以純粹的天理。要求人性表現的合理化，則必須調和人性的各種自然傾向，使其不大相衝突。

以上我們已將人性的異同善惡內容適應變化以及調和等問題，說了一個大概。繼此再略說人性與政治的關係，可從兩方面加以說明：第一從人方面說，人類需要政治。所以自古迄今，無論何時，何地，都有政治的組織。所以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明人類以外的動物沒有政治，只有人類才是政治的動物。人所以是政治的動物，卽由於人性本具有政治的要求。雖有少數理想家反對政治，主張無政府，但從來不能實現，將來也未必能實現。其所以不能實現的主要理由，乃由於政治可以大大滿足人類的好生心，好名心，好權心和好羣心等人性。如無政治，則此等人性便無由大大滿足了。在事實上，雖有人不問政治，甚至逃避政治，但仍不能絕對不問政治，也不能絕對逃避政治。如果絕對不問政治，或絕對逃避政治，必係由於實際政治的病態過於深沉，而激成一種人性的畸形表現。其實，人性實不樂有此種畸形表現。此種畸形表現一經達到極點，則必有政治革命隨之而起。所以我們可以說，人性有政治的要求。一切反對政治和逃避政治的說法，不過暴露實際政治不大合於人性的要求而已。第二、從政治方面說，政治就是人性的一種表現。所以政治現象可在人性上尋根源，卽可用心理去解釋。用人性或心理解釋政治現象的說法，從來卽已有之。不過專從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人性或心理的觀點以討究政治現象的著作，則至近代始漸有之。一八七三年白芝浩 Bagehot 發表的物理與政治 Physics and Poltics 論文，首先指明專做本能在政治生活中所佔的地位。近數十年來的社會心理學家以及心理的社會學家多曾用各種心理的觀點討論政治現象，詳見各家專書中，本篇不能詳述。至於政治心理學的專書，則有華勒斯 Wallas 的政治中之人性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值得我們一讀。總之，政治是人性的一種表現，可用人性的各種自然傾向或各種心理因素加以解釋，這不但從前的哲學家有此種說法，即現代的科學家也有此種說法，故我們必須加以相當的承認。

政治既與人性有相當的密切關係，那末可再進而討論究竟何種政治比較合於人性。關於政治的方式，古今中外雖有多種，但大要可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為政治主權屬於少數權階級的專制政治，如神主政治，族主政治，君主政治，軍主政治與黨主政治等，均可歸入此一大類；第二大類為政治主權屬於人民全體的民主政治，如直接民主政治與間接民主政治等均可歸入此一大類。關於此兩大類政治在本質上的分別，另詳拙著民主憲政論第五章，（商務印書館出版）本篇不擬再贅，只專論比較合於人性的政治，究為專制政治，抑為民主政治。

我們要知比較合於人性的政治是何種，只須看看人性在專制政治與民主政治下的表現如何。人性雖為先天的自然傾向，但其表現的方式與程度，常因環境不同而發生許多差異。對於人性表現有影響的環境，有自然環境，又有社會環境，本篇不能詳論。現在只說明一點，即政治環境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環境，對於人性表現具有廣泛的影響。其影響不但關涉多數人，而且滲透各方面，我們必須予以注意。要人性有健全的表現，必須先有健全的政治環境。民主的政治環境，比較專制的政治環境健全，所以人性在民主政治下的表現，比較在專制政治下的表現為健全。我們要證明此種道理，自須分別攷察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下的人性表現如何健全與不健全。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一般人性有八種主要的心理自然傾向，此八種自然傾向，必須都得到適度的調和發展，始為健全的表現，否則便為不健全的表現。現在試先說明專制政治下的人性表現如何不健全。原來一切專制政治，無論其形式為神主政治，族主政治，或君主政治，或軍主政治，或黨主政治，都不外是一種階級統治，即由少數特權階級統治多數無權的人民。在此種政治之下，特權階級與一般人民的人性表現，顯然有兩個極端，而各成一種畸形。例如好生心，在特權階級只有軍警與間諜，自以為獲得極度的安全感，而在一般人民，則常在軍警與間諜威脅之下，感到極度的恐怖。因此特權階級的好生心便不免發展過度，至於「率獸而食人」。而一般人民的好生心，則得不到人生所必要的發展，只能飲恨吞聲，苟且偷生。至則過於「縱生」，還想求「長生」；一則過於「迫生」，深感不如「無生」。（按迫生不如無生，語本莊子，意謂在專制政治的恐怖之下，勉強偷生，實無樂生之心，故不如無生。）這都是好生的畸形表現。又例如特權階級的好利心，也常不免發展過度，至以國家為私產，視人民為奴虜，而予取予求，食得無厭。而人民則，雖分所應得的利益，與由血汗得來的生活資源，亦常有被特權階級自由奪去的危險。一則惟利是視，越多越好，而不知止；一則仰事俯畜且難為計，尚須以貨賄貢獻特權階級。這都是好利心的畸形表現。又例如特權階級每每好過度自尊，而賤視人民，至於貪天之功，奪人之名，以為

Academia Historica

已有，尚不知恥。一切榮譽都收歸特權階級自己，至尊至貴，莫可與比。而人民呢，則只可含垢忍辱，以求苟全。一則好名過度，不惜肆意掠美。一則不敢近名，只好唾面自乾。這些都是好名心的畸形表現。又例如特權階級壟斷一切權力，享有絕對自由，其好權心可謂發展了到極點。一般人民既無一點權力，亦無一點自由，惟任特權階級生殺予奪，而不得稍稍伸冤。一則權力無上，為所欲為。一則終身受辱，束手待斃。這都是好權心的畸形表現。又例如特權階級內部明爭暗鬥，無時或已，雖至親以及同志亦不免互相傾陷，甚至互相殘殺。而特權階級對於一般人民，則不許其有絲毫爭心，如果一般人民有敢與特權階級爭者，則「鋤奸」或「黨錮」之禍即隨之而來。因此，使得一般人民不挺而走險，便只有相戒不爭，以求免禍。一則有爭心，只許自己爭，不許他人爭。一則太無爭心，雖理當力爭的，也不敢稍爭。這都是好爭心的畸形表現。又例如特權階級要集會便集會，要結社便結社，照來擾往，幾無一不可從心所欲。但一般人民則不得自由集會，亦不得自由結社。苟自由結集會社，則小之受警告，大之遭毒殺。因此，使得一般人民如一盤散沙，無由羣策羣力，以共求社會的進步。然好羣心實出於人的本性，既得不著正當的發展，如不甘於離羣索居，避世無悶，便只有走上秘密集會結社之途了。一則可以公開明比為好，一則不得自由，人往往，這都是好羣心的畸形表現。又例如特權階級常好以自己的主張，惟一的眞理，而不許一般人民有絲毫異議。異議多起於知識。因此特權階級如不採用愚民政策，不讓人民有知識，即強迫人民信從其主張，而不得自由研究，更不得自由言論。結果，使得人民盲應故事，不知知為何事，更不知這理想何物。特權階級不怕固陋，自安於八股式的教條。而多數人民慣於迫害，也只好隨之安於八股式的教條，此之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一則有言論出版自由，強不知以為知。一則無言論出版自由，只好「樂子之無知。」這都是好知心的畸形表現。又例如特權階級窮奢極欲，樂以忘憂。而一般人民則以特權階級過於殘暴，不勝其愁苦，只能向山林求逍遙，或向風月求安慰，或向酒色求發洩，或向上帝求保佑，或向浮雲求寂滅，甚或向死神求速死。一則太樂，不恤他人痛苦。一則太苦，只好「愚情聊勝無」。這都是好樂心的畸形表現。由上說來，可知人性在專制政治下的表現實在太不健全。特權階級的人性表現又太不足，至另成為一種畸形。前種畸形近於瘋狂，甚至就是瘋狂。後種畸形近於癡癲，甚至就是癡癲。瘋狂與癡癲都是精神病。所以我們可以說，在專制政治之下，無論特權階級或一般人民，都有發分精神病。特權階級愈瘋狂，則一般人民愈癡癲，則特權階級愈瘋狂。欲治療此兩種政治的精神病，只有用民主政治代替專制政治，使每個人民的人性都能獲得健全表現的機會而已。

在民主政治之下，人性的表現比較健全，也可詳細加以說明。民主政治承認人人俱有生存權，無論何人不得無故迫害他人的生命，也不得非法逮捕拘禁並處罰任何人，更不得有任何秘密機關任意殘害人民。因此在民主政治下的人民，身體有自由，生命有保障，好生心便可得到適度的發展，不致像專制政治下的人民，時時被受恐怖，更不致像專制下的特權階級，用虐殺同胞的方法來滿足他們自己的好生心。無論當權不當權，都可和平相處，各遂其生存，這是好生心得到健全的表現了。又民主政治承認人人均有職業自由權與財產自由權，無論何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不得以政治上的原因，剝奪人民的職業，侵犯人民的財產。則人民不致因失業或貧困的恐慌，而輕易改變其政治主張。如此，則好利心可用正當的職業與合法的財產予以滿足，而達到健全的表現了。又民主政治承認人人平等，則人人可以自由而不必相殘。每個人民只要肯努力，有人格，便可獲到社會的贊許。不以欺詐為能，而以正直為榮。不以爵位為貴，而以才能為貴。如此，則好名心可得到健全的表現了。又民主政治承認人人只有最高無上的主權。如此，則人人可以用投票的方法選舉自己所同意的政府；也可以用投票的方法，或立法的方法，監督自己所不同意的政府；更可以博得民意的方法，自行組織政府。故在民主政治下的人民，不但有自由，而且有權力；不是特權階級的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人人都有權，而人人亦不得濫用其權，致侵害他人。這是好權心得到健全的表現了。又民主政治承認人人均可在法治軌道以內公平競爭。因此則誰有能力，便誰可在政治上顯身手；不致像專制政治要奧陰謀，憑武力，以求取勝；更不致像專制政治壟斷政權，完全不許人民從事政治競爭。我們要知完全不許人民從事政治競爭，並不能斷絕競爭，只是顛倒人民走出法治軌道以外從事競爭而已。所以民主政治不怕人競爭，只求一切競爭合於法治軌道。如是，則好爭心便可得到健全的表現了。又民主政治承認人民均有集會結社的自由權。因此，則無「黨錮」之禍，而人人的好事心可因自由集會結社而得到相當的滿足了。又民主政治承認國家是全體人民的公器，不容許有特權階級以國家為私產。因此民主國家的人民易於感覺國家可愛，不情為國犧牲。這是好事心中的愛國心也得到健全表現了。又民主政治承認眞理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因此在民主政治之下，人人可以自由提出主張，也可以自由研究學術，更可以自由批評辯駁。經過自由批評辯駁之後，眞的主張可以獲得多數人民的贊同，便由誰執政，並實行其主張。如實行的結果不佳，則須改組政府，另由他人代之。所謂他人，乃指此時獲得多數人民贊同的黨派而言。故民主政治講道理，不講武力；講理性，不講感情；重說服，不重武斷；重協商，不重專斷。如是，則好知心便可得到健全的表現了。由上說來，民主政治既可使人人的好生心、好名心、好權心、好爭心、好事心、和好知心都得到健全的發展，則人生有活氣，有興趣，這便是一種大樂。不必要如專制政治下的人民，只能在苦中尋樂，強自慰慰。如此，則好樂心也隨着得到健全的表現了。

總之，政治是為人而設的，必須求其合於人性。一切專制政治都不合於人性，只有民主政治才比較合於人性。我們要人性的表現不流於瘋狂，也不流於萎靡，則須實行民主政治，使其易於獲得健全的發展。人人精神健全，自然政治易於清明。因為民主政治比較合於人性，所以現代多數國家都趨向於民主政治，而成為一種不可抗的世界潮流。如果還有人迷信專制政治，則不是瘋狂，便是癡呆。我們要治療這兩種政治的精神病，則無特效藥，惟有實行民主政治，使其恢復正常的人性，並獲得健全的表現而已。

Academia Historica

民有民治與民享

余家菊

民主爲當今時代大義，隨墨梭里尼希特勒之倒塌而昌盛，凡知自好者，皆不敢反逆之。顧顯倒眞理之技巧，早已繁多，不喜民主者，每濟亂民主眞義以打擊民主。故闡明民主涵義，並非無益之舉。今世民主有所謂政治民主，經濟民主，乃至社會民主；就政治體制言之，美國爲民主，蘇聯亦稱民主，全民政治固爲民主，階級專政亦稱民主。欲於民主立一正確而涵蓋之定義，殆不可能，竊謂民主之簡要說明，語其完善，仍莫過於民有，民治，民享之三語：民有者，屬於全民也；民治者，決於全民也；民享者，爲彼全民也。故凡謂國家爲某人，或某部份人所有者，非民主眞意也；謂國事當決於某人或某部份人者非民主眞意也，謂政治乃踩某人或某部份人之滿足者非民主眞意也。

或謂國家應爲爭取民主者所有，於彼反民主者，應當摧毀全民之外。持此說者，意在保證民主制度之安全，與夫民主運行之順利，原不可厚非。世間革命黨，爲求革命成功，而賦與革命黨及革命追隨者以特權，名之曰革命民權，亦殆成歷史之公例。然而如是之措施，謂爲一種暫時政略，藉國勢之穩定，自屬人情可有之事；謂如是措施，即理性之當然，而定爲經久體制，則實無以自圓其說。蓋民主眞髓，在人各有權如其良心所示而發爲主張，不問其與衆相同抑屬相異。使其力果足以震撼人心，而使吾不得不有以箝制之，則必吾之所爲有不盡合宜者在，此正須有人權策以警覺。故民主精神即在容允反對。於民主潮流之下，而胆敢不隨俗苟同，其人必爲豪傑之士而將成社會之中流砥柱。故國家應爲全民所有，而不問其信仰與主張是否合乎主潮。一有擯除，民主主義，即宣告死刑。或謂果如是，則漢奸亦有權過問政治乎？不知漢奸爲國人所唾棄，置之廟堂之上，將怪怪無地自容，稍有人心，何顏更作活動；漢奸爲羣衆所憤惡，非依人道主義加以保護，羣衆必將拳足交加，立置死地，肉體生命且不保，更何有於政治生命。用法律制裁漢奸，祇是表彰法律的尊嚴而已，非有所畏於漢奸之政治力，故不成爲政治問題。

民有爲虛名，而居虛位。民有能否畢其實，全視民治民享之能否實現。民有實寄寓於民治民享之中，離民治民享即無民有之可言。故民治民享爲實事，而民有爲虛名。雖爲虛名，而爲民治民享之所本。唯其有之，故應治之享之。否認民治民享而擁護特權階級者，必否認民有。其大意不外基於「唯勞得食」之原則，而謂用力取得者始能有之。不知國家之爲物，其所有權有異他性，既經佔有，他人即淪入無權階級，而人之出生於某一國家之內，又爲其本人所莫可如何之事，彼捷足先登者既取國家而獨有之，則彼後來者若不甘心爲無權階級而任人擺佈，則祇有出於打破現狀之途，於是而衝環革命起矣，故民有者乃所以杜絕內戰而鞏固人於和平康樂之境者。

民治之意，爲決於全民。所謂全民者，係指成年而能負担人生責任者而言。既已成年而負担人生責任矣，則於對彼有關之利害禍福，自須賦彼以參加決定之權。不然，則視由彼納，而稅收之用途則不得過問，兵由彼當，命由彼拚，而兵之待遇

Academia Historica

如何，命之價值何似，則不得過問；敵騎進擾，血由彼流，落由彼受，而防禦之措施如何，安全之保證如何，則不得置喙。有權者固見義勇爲，自矢以責無旁貸，揆之事實，究何補於流離喪亡。責人以委其生死得失於我之手，信我而任我所爲，微論未必能予人以安全福利，藉曰能之，所責於人民者毋乃稍嫌太過乎！國民於其身之生死禍福，概不自爲控制主宰而一以委之於人，其責任心既趨薄弱，對於國事自必流於淡漠。現代國家煩重艱鉅，非少數英雄聖哲所能支持，必全體國民對於國事共感興趣，各負其責，國事始有振興之望。故國事決諸全民，不唯在正義上爲當然，而在事勢上亦爲必要。反此道而行之，其禍必中於國家，空言責無旁貸，何益於事。

自來反對民治者，莫不以人民知識簡陋，德性低劣，不足以當國事決定之任。國事爲國民禍福所關，應由有能者任之。古所謂賢人政治，今所謂專家政治，皆此意也。夫國事之決策，有待於知識之運用，而人民之知識又有高低之不同，是皆確切無可否認者。推哲人政治之用意，非將國事置於天生聰明睿知之聖人之手不可。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固早已作如是之夢想。然而聖人之降生，誰能保證其代代不絕乎？假使某一時期，竟無聖人出生，又將如之何！且聖人者，不能由人自認，須由衆人公認之。假使由人自認，則人非聖賢，誰不自視爲聖爲賢？假使須由衆人公認，衆人既屬無識之徒，何能認識聖賢？認識聖賢者，認識聖賢之主張爲是爲非也。假使衆人認識聖賢之主張爲是爲非，則是衆人有評判之力，可以決定國事，選舉賢能矣。民治所要求者，不過如是，是其所言何異以反對民治始而以贊成民治終！

實施民治不愛人民知識不足，德性不充，其故亦可得而言。第一，國事須訴諸人民者，乃國事之方針，而非施行之技術。方針者，政策也。政策關涉於人民之禍福利害。人民縱無知，於其自身之利害終能知之。其禍福利害之遠遠不切身者似非人民所能關切或辨識，實則但須准許民間有識者得自由發展其異於官吏主張之見解，以訴說辯爭於人民之前，人民所取捨方議論，自可施行裁判決擇於其間。故人民無須具有創議設計之能力，而但須具有鑑別之能力。欲人民正確發揮其能力，但須政府報告確實，而民間又有批評之自由，則人民即優爲之。批判不自由，固爲民治之致命傷，而報告不確實，亦爲民治之大禁。報告不確實，即爲欺騙民衆，其罪等於舊日之欺君罔上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但須官吏不欺騙，民衆即能發揮其聰明，有欺騙民衆者，人人有檢舉糾正之責任；一經檢舉，即爲衆所共棄。惡人民與惡國家，同等重要。

其次，民治之德性，自亦多端，如奉公守法，尊人自制，統皆屬之。然而語其根本，則在對於國事，各秉其良知，以主張其自身之所願主張。民治之最大罪惡在強人棄其所信以從我，依據民主原則，欲人棄其所見而從我，其道祇能出之以說服，不得強之以恐嚇。用恐嚇以強人放棄其所見，是爲民治下之大逆不道，足以摧毀民治之根柢。夫人民既有所見，誠不願公開於世，以求有所助益於國事，微論人皆有利人之心，即就表現自己之動機言之，既有所見，亦不甘自行珍秘而不以示人。人之所以不肯公表其主張者，因公開其主張即有危險隨後也。人之所以不肯自作主張而必追隨潮流者，因爲自作主張即有蹈襲隨其後也。故欲人民具備民治之根本德性，其要不難，要在解除其言論之恐怖耳。能如是，則民間氣象，自然開朗活潑，而和平相處，自然可能，蓋人人既能於積極有爲，一切猜疑妬忌

Academia Historica

之情，自大必滅。民治氣象，即坦白氣象，即有為氣象。凡消沉，陰鬱，傾軋等病態，皆專制時代之流行病　觀其野，而知其政，並非虛語。

民治德性之要件，其又一種為服膺理性。民治之發展，本在理性得勢以後，在西洋中古時代，一切建立於權威信仰之上。善惡是非之判斷，一切唯權威之馬首是瞻，而個己良心無所施其力。權威之所是，良心不得非之，權威之所非，良心不得是之。權威依仗之表現於政治，則為「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凡帝王所言，無　而非「聖旨」；臣民祇當服從，不得批判。積至今日，於官吏所言，而有非難　即是忤逆，搗亂，至少亦認為於意見官吏下不去。民治時代，人人自尊，各依其良心為判斷。又人人自尊，眞知自己非全智之神，於眞理不能窺見其全面，故於其所偏執而遭人非難，不覺有何恥辱之可言，樂於接受他人之所見。國人正因不知此理，不喜受人非難者不具容納雅量，自反於人者亦必展轉曲折，多方顧全受非難者之面子；其不欲指出錯誤，迺如頌揚一番，再徐徐誘導幾句。是為立言技巧之所在。非有虛矯之氣，阿諛之心，兩在可恥，欲樹立民治，則必應糾正，善善從長之風，不可不加發揚。

民享者，政治設施係為人民而有，政府存在係為人民而起。政治是公衆的事，亦是謀求公衆福利之事。政府是人民生存之工具，而非生存之目的。人民至上，而政府並無神聖可言。政府存在之充實理由，在為人民謀求福利。官吏之設置，非所以使其驕恣於人民之上。官吏而不忠於人民，即失其官吏之存在理由。人民固當出汗出血出淚米麻絲血汗生命以供養官吏，然而「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官吏不但應解除人民痛苦，而且應增益人民之福利。「出錢買官，政府次之，官為輕」。人民尊重官吏，政府次之，官為輕。乃尊重其人。

八。究之，正當的人生，皆有所服務於國家社會，官吏並無特殊可尊之處，至有豐功偉烈之人，其受人尊敬，乃基於其豐功偉烈而然，非由於其為官吏而然。重官輕民之觀念不除，則民享政治無從樹立。欲去「官國」之恥，必先知官者乃所以服務於人民者也。

如何增進人民之福，是為實際政策問題，非今茲所宜討論，然而文明人類必然承認人人生而有生存之權，否則盲昏不為罪矣，棄嬰不為罪矣。人人有生存之權，有能有力者，其生存以貢獻其能力於人羣為條件，寄生的生存非吾人理性之所許，其凌虐他人剝削他人以謀生存者，一面為吾人之正義感所不容，一面為吾人之同情心所不允。至於用公職以敲詐人民，則直是一種刑事犯，而為文明之羞，宜排諸文明社會之外。彼老弱殘廢之人，力不能自存，吾人當發揮同情心，尊重其生存權，而保證其免於匱乏之自由，文明之所以異於野蠻人者，即在其由於力之崇拜而轉為理之崇拜與愛之崇拜。假使唯有力者始得生存，則吾人其去禽獸不遠矣。

在政治史上，從來有富國富民之爭。民既富矣，稅源充足，國庫何患不裕？此富民論者之財政理論根據，所謂百姓足什孰與不足是也。人民若貧，則志氣苟簡，意興卑陋，道德低落，不至於墮個文明毀滅而不止。至於營養不良，體質衰弱，路個民族即有滅種之可能。至於提高國民之生存權，國庫之支付。試問國庫支付之目的究安在乎？亦曰強兵而已耳。姑置強兵之目的應在養民於不論，國家富強人民之所有而以之養兵，無論國不能與，而兵亦必弱，蓋兵亦來自民間，民既疲苦，兵必無鬥志；兵無鬥志，民無生趣，國何能興？此歷代老成人所以對於富國論鳴鼓而攻之也。

民主定義，人各異辭；淫濫皆是，誤與是正。而民有，民治，民享　究為通行之界說。故據以疏釋民主涵義，或於觀念之釐正，不無小補焉。語有之：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觀念釐正，殆亦不可無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英關係的探討

張似旅

如果中英兩國，欲將聯合國的精神化爲建設性的動作，以樹立遠東長久的和平，則中英兩個國家應具有勇氣與果斷，在應戰爭需要所產生的環境下，擇一適合的時間，將此一向保持靜默的問題，作一直接與開誠的檢討。自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正式加入世界大戰，消除了中國對英國過去十年來遙東政策的迷惑，但是欲保持戰時同盟的關係，仍能繼續於和平時代，兩國間的關係尚有不少可以檢討的，在可能的範圍內，爲避免將來的誤會與衝突，太平洋戰爭所引起的重要問題，最好在戰爭未曾停止以前，彼此獲得相當的諒解。

我們要明瞭英國過去在遠東的政策是怎麼樣？英國遠東傳統的政策，在南太平洋方面，是要獲得殖民地的鞏固。在北太平洋方面，是要維持均勢的政策。在得丁法荷兩國諒解與優勢海權的條件下，他在南太平洋操縱一切，在北太平洋一部情形就較爲複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後，他藉英日同盟與擁護美國的開放門戶政策，維持他在中國的特殊地位，九一八事變後，俄國暫時退入西伯利亞，給予日本壓倒的優勢，英國不得不重新考慮他的地位，顯然的從北方不平衡發展的勢力，不獨影響他在中國的權利，而且威嚇他南太平洋的帝國，在這個情況下，他只有和日本妥協談判，或是援助中國的選擇，他兩方面都試過，但是未曾對任何方面，有堅決的推進，由于他的猶豫，妥協，卒至趨於被動的地位，十年來，英國政策模稜兩可，似乎他在做一種意願中的幻想，——一個能保全國家完整，而不強的中國，和一個可能滿足而野心壓得住的日本，——在東方巨大的動盪中，似乎他還想享受從前安逸的日子，逃避應付的災難。

避免與日本戰爭的政策，已經失敗，英國忽然發覺他與中國并肩作戰，他對中國的奮鬥，雖然有極大的好意，但是欲和中國作一盟國，尚須先打破臨海中的像一層厚殼的歷史成見，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和一個半殖民地的民族，共同作戰，並對抗共同的敵人，在歷史上係帶有滑稽性的一件事。所以在最濟日本以外，兩個國家應作極大的努力，來取得作戰目標的融合，兩個國家應該在永久廢除日本武裝在施行不能議議的殖民地政策，和真實改造中英關係的原則上，建造亞洲的新平衡。

太平洋的戰爭，並不是完全起於日本的侵略，從人類的進步和自由的歷史觀點，日本的野蠻，是自從二十世紀起東方帝國主義制度歷史注定改進運動過程中，最暴烈的一階段。假定沒有日本的軍國主義，一切陶鑄和造成東方民族命運的力量，亦會在另一種情態而同樣有力的伸張起來。日本冒稱爲東方民族自由的鬥士，虛偽，已經被他本身的野心刺破，國際的輿論，自應受公義的裁決，但其所置充的不易信條，必繼續和有力的存在。在槍林彈雨中，自由之聲，恰巧的發自統治的國家，不漸的進入千萬萬東方民族的耳朵裏，在這個鬥爭結束後，這些民族將不肯承認任何色族的武裝解放者，而要得到真正的解放，任何代價，都不能恢復過時代潮流的戰前狀態。因爲中國是第一個從流血鬥爭裏得到完全自由的國家，其他的東方民族，對中國自然有一種欽羨；雖然爲了建設的大業，中國不能亦

Academia Historica

不願活動的參加國境以外的事情，但是因爲在東方，中國是國際合作與民主理想之堡壘，故對於戰後殖民地民族的命運，萬難無關痛癢。而且散佈在南太平洋一帶有六百萬左右的中國籍的居民，這大量僑胞的地位與福利，永久是中國政府最注意的一件事，戰後一切關於殖民地的決定，主要的還是免不了操乎英國，但是關於大東亞的處理，如若缺少了中國的合作與贊助，會引起不幸的誤會。

在這一個區域內英國有雙重的職務，因爲他是歐陸外帝國主義制度的主要建築師，所以他是南太平洋各民族的主人翁，因爲他是反抗強盜的領導者，所以他同時亦是這些民族的武裝保護者，既然這一次戰爭最神聖的目標是驅逐一個自稱優秀民族統宰其他民族的邪見，苟欲繼續戰爭以前英國統治亞洲的制度，自然應受嚴格的檢討。這樣的說法，並非全無條件的責備英國以前殖民地的制度，在討論英國人一向與有色種民族的關係，我們要分別英國人自身優越的態度與英國行政的方法，隨便的斥責英國殖民地統治殘暴與傷害土人利益，是偏乎成見的斷語。反之，英人自稱其行動爲被統治者之利益而統治，是一種僞善的宣傳，事實或許是在兩個極端的中間，而其混合的程度，因地因時，各有不同，在我們中國的眼光來看，很難相信，這一次的戰爭，日本是單靠武裝優勢而能戰勝在緬甸，馬來亞，百年來根深蒂固的英國，在南太平洋戰事開始前後，土人絕默之態度，甚至引敵的行動，是一個敦促英國勝利之後，應履行改造殖民地政策的最有力的辨證，在未來進步的時代，應以機警與誠實來代替從前懷疑的教訓。

在這些地域中國自然不能本回歸戰前狀況的原則來與英國合作，但是中國亦並不是願意的，或希望英國自願的，或被迫的，——事實上不可能——退出這些地方，地理的拘束，天然的環境，和自治獨立的條件，在事實上並在相當時期內需要英國力量，留在南洋一帶，在那麼闊的海洋中，非有海軍的力量，就無法防禦侵略，與海盜的掠奪。此外還有其他值得考慮的問題，在國際安全負責權力指揮下，在南洋一帶，並在規定時期內，英國是施行武裝警察責任最合適的國家。在戰後經濟的建設，英國的財富技術，和其三百年來與非歐洲民族往來之豐富經驗，亦未可言非：東亞和平之主要條件，除了驅潰並防止日本軍閥再起外，就是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及其殖民地關係的調整。如果英國眞正的欲建立久遠的和平，就應將從前認殖民地爲統治者之特別市場和原料儲藏庫的觀念，換作一個認殖民地是統治者之特別市場和原料儲藏庫的觀念，換作一個認殖民地是獨立的單位的新觀念。在新的世界秩序，老式的殖民地帝國是一個反常的制度；開羅會議，已經宣佈，應許朝鮮在可能的時間內予以獨立，我們推想國際時勢的演變，在朝鮮初期脫離日本的羈絆，可能的暫時接受東方國際性的行政機構保護，同時在友邦援助下，立刻實施社會與教育建設程序，以提高人民程度，至能達到負起獨立的責任，英國亦應同樣的給予南太平洋被統治民族以相等的待遇。英國如果考慮得適切，就應該明白爲着了不能解除世上一般社會的色族與心理的成見，凡非白種人所殖的英屬土地，始終不能成爲共和帝國（British Commonwealth）的自然份子——雖然這個政體內的份子，是絕對自尊與自由的——這些地域，必有一日要脫離英國的，在戰事快完或初完的時候，英國就應該宣佈放棄這些土地的所有權，來表明和平政治的風度，在這裏我們要很明的指出來放棄所有權並不是立刻退出這些地方，或立刻讓出管理權，退出眞

Academia Historica

讓權是逐步演進的，演進的方式程序以下再討論，一個人道和平的世界，需要強有力的國家，以征服的手段，佔領別個民族的土地，而肯爲和平與人權而放棄的實證。

戰後的英國，對於南太平洋一帶的地域，應以家長的地位自居，倣照美洲初年獨立的模型，在英國的領導與保護下南太平洋羣島 可組成 聯邦，並在公佈的若干年後，（如美國對菲島的義決定）完全獨立。在訓政的時間內廣大的教育與社會建設計劃，且長期借外債的方式，由英國的技術與資本來援助其實現。在過去一百年來，英國殖民地管理的積習，是每一個直屬倫敦內閣管轄部的殖民地政府各自爲政，除了維持地方秩序和司法以外，對於提高人民程度的水準的工作，只是在豫算內 的小數內取一少部份來敷衍，同時英國私人的資本家與企業家盡量的開拓與發財。以後管理的制度應建立在人類順序進步的原則上統籌辦理，由政府發動與實施社會建設的計劃，對於以前英國私人的一切投資，應先由政府代表殖民地的民衆負責收買與賠償損失，以後的私人企業，應在給予本地人民有過半數的管理權的條件下，方能許可成立。南太平洋的天然資源，應在合法的國際分配辦法內開發。而不是單爲帝國圈子裏的優先享受來開發，南洋土地的膏腴與財源的豐富無量，如與土人的利益是整個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基礎，則不難在相當的時間內，將殖民地民族爲著各種建設所担負的龐大債務清償。住在各殖地的中國人民，入境後有固定的住所與職務，獲得平等的義務與責任，從前藉口保護土人利益施與僑民的苛例，與不成文的歧視 更應完全停止。惟有毅然發揮新的精神，和採用國家輔導增進的社會建設程序，方能把這一次大戰的犧牲者長久和平的具體貢獻。如果這樣的羣島的民衆，對英國一定有眞正的崇敬和深重的感激，我敢說，這種感情無疑的會受中國政府讚許，亦可能得到自行選擇居留各該地方數百萬僑胞的衷心，在上一次的歐戰中，南洋羣島在苟安的狀態下還陸續睡，這一次情形截然不同，他們現在已經在問——英國的政策是重行征服，還是實際的解放？

我們討論遠東及太平洋的問題，決不能離開防禦的事實，如果戰後鞏固世界的和平，仍然是一種各擁武裝各自爲政的局勢，一切開明的國際經濟政策與殖民地政策，都會受影響。假定在戰後的世界，防禦任何方面發生的侵略的責任，能到逐步的國際化，則每一個預備獨立的國家，用不着單獨負起防的責任，他們可以受有參加及履行爲共同防禦而成立的國際性組織的義務與責任。我們再一進想東亞國際變化的演進，現時在華盛頓常常開會的太平洋作戰會議，可能在戰後繼續的存在，而演變爲太平洋政治會議，由這個政治會議產生了南太平洋共同防禦策略的機構，預備獨立的南洋羣島，可同意的讓予因建築共同防禦工事所需要的據點或地帶。在這些防禦的地帶與據點，亦應准許南洋民族有相當的訓練隊伍混合參加駐紮，無論南太平洋防禦的制度如何產生，或者就是英國自己負担防禦責任，這個問題，決不能亦不必阻礙南洋民族成爲一個自治聯邦的進步。

戰後英國殖民地的政策，對中英兩國的關係，有極大的影響，中英關係中待解決的問題，應予以深切考慮，莫如香港。從香港起至新加坡哥倫布亞丁蘇彝士傳斯馬爾他及直布羅陀，是地理上形成一串的英帝國海道防禦點，與航行集中點，我們要明白，如果英國在地中海失去直布羅陀或蘇彝士，或在印度洋失去哥倫布，或亞丁，他的一等國的地位立刻會降低兩級，

Academia Historica

幸而香港係在帝國路線的尾巴，放棄香港，只是縮短而不至切斷，維持帝國的路線，在戰爭的期間內，如果明白的表示其對香港的態度，在英國方面有說不出的苦衷，如果宣佈放棄香港的主權，怕中了日敵誣謗其失敗主義與逃避責任的反宣傳；如果公然宣佈他意圖恢復戰前的狀態，勢必促成聯合國共同戰線的裂痕，危害盟邦的合作；在英國未曾凱旋入香港以前，欲希望他能對關於香港的問題對中國作任何的許許，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猛速的軍事演進中，遲回的外交，會引起不幸的疑慮，在太平洋戰事後一階段——最少在戰事未完結以前——關於香港的地位，兩國應達到一個諒解。如果英國的目的，在再以武力建立殖民地版圖，中英兩國殊途歧異的地方，何只香港的問題，如果英國承認與接受亞洲殖民地演進的潮流，關於香港的問題，自不難得到雙方均能滿意的解決，一個完全獨立和自尊的中國，確切期待着共同勝利的盟友，能作到矯正一件歷史不平正的事跡。我們要指明將香港的主權交還中國，並非是限期的無條件與立刻退出。以前香港的行政機構與英籍的公務人員，仍可由雙方商議協定予以繼續，以前香港殖民地政府與私人的財產利權，中國政府應完全的給予承認與保障，中國政府亦可繼續的維持香港做一個自由的通商海口。假定太平洋有中國活動參加的國際性的軍事設防，香港被擬為一個據點，中國政府亦應給予種種便利，一個勝利的英國，高舉亞洲眞正新秩序的旗幟，作一件偉大的政治事跡，更可發揚其偉大和增强其在遠東商業的地位，一個勝利的中國，經數十年的奮鬥，在他的領土內衝鋒奮戰，塊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遺痕，自然會引起相當的不快，香港可能成為中英兩國眞正與堅定的友誼邦交的富有歷史性的地方，亦可證為中英兩國關係難於融洽的殘影。

如果英國有誠意做中國的眞正友邦，香港對於兩國的合作與諒解，除政治外，還有極大的貢獻，英國人行程合人欽佩的美質，過去因為政治的特殊才能，正如中國人亦有足令人欽佩的美質，過去因為政治太深的關係，英國人在香港的特長未嘗受到中國人眞正的賞識，假定香港的主權，交還中國，在他新的地位，中國會虛心的領略英國人在香港表現的特長，除行政管理和工商業的發達外，最富有建設性的是英國的司法行政和學術精神。

司法行政是中國亟欲求進步而為英國具有特別技術的社會科學，香港有悠久公正司法的歷史，如若在中英兩國關於香港的協定內能夠便用在香港的英籍法官，在中國的法庭執行中國國家的民法刑法，本其公正無私與人道態度的背景，對中國整個法庭制度及學界一定有不少的裨益。

英國的學術與科學方法與我國文化合作之發展，較為重視，其原因在以商業為基礎的殖民地思想產生的社會空氣與環境，不適合文化的溝通，雖然香港有學術精良設備完滿的大學，一般人的印象中未能認香港大學能夠代表英國的學術，在中國的教育與學術界上，香港大學，並未享得其所應有的學術地位與聲譽，以中英兩國關係之長久及其未來的重要，實在須要在絕對平等與自由之空氣內，有一個最高的學府來代表英國的學術精神。如果英國的一個外國係屬——香港，能夠變為中英兩國友誼與互信的橋樑，則在新的環境與空氣，開明的香港大學，可卓立成為英國文化的海燈，來發揚英國民治和寬容的精神，和作為中英兩國學術研究與交換的媒介。

一百年來中英間不愉快的歷史已經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中英的哲約行了可慕禮，英國終於將一九二六年張伯倫外相應許的「聖誕禮物」獻出了，然而摘去了外交的文飾，還留條

Academia Historica

約等於正式承認中國歷年奮鬥將成未成而卒被日本侵略行動摧毀的一般以前不平等的事態。且有建設性的新約尚待雙方的商議。關於英國最注意的戰後中國貿易與市場的平等機會，中國既禁肉動的往憲政的路上邁進，應可給英國不少的安慰。為增便利戰後的建設，公私企業和中外合作的規範，如無因受兩國間還所牽制與顧慮，明文規定中英兩國通商的關係，似乎無需受時間的限制可提早的確定，這對於中英合作發展的種種預備是會有利的。

在中英兩國複雜關係中有一個問題，不是文字能顯明解釋的，這個問題既不能用一個名詞來說明，亦不容易指出發生之原因，一百年來，兩國間不愉快的關係，和自九一八事變至珍珠港事變十年來的枝節事件聯合的結果，產生了一種心理上的間隔，不知不覺中表現在私人的談話，公衆的討論，報章的節目，並在其他的事跡上，中國的心理，對英國有微分微妙的感覺，實在是不能否認，亦實在是不幸的。在中英通商以來，兩國智識界和有思想的人士，對於中英眞正友誼的需要，其感覺豪當如今日之深與誠，但是雙方心理的一種漠然的冷淡，從未曾溫暖起來，在這一種空氣籠罩內，不容易得到開誠的彼此交換意見和研究解決問題合理的方案，只有時間和誠懇的事實，纔能慢慢的將此種不良的空氣消除。中國的外交政策，不應被誤會對美國的信任心特別高出對於其他的友邦，但是如果東亞和平是共同的目標，中英兩國不應有直接不能解決的困難，最主要的就是兩國對於一切問題的政治觀，應發展的接近一點，惟有建立政治的和平後，方能達到共同繁榮的希望。

萬竹樓隨筆

（三十八）

舜生

侯官嚴幾道先生復

（1853　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年十五，天馬江船政學堂；二十五，留英讀攻海軍戰術礮台建築諸學。顧畢生以譯述享大名，其海軍諸學乃為文學所掩。其譯著之最有名者，商務印書館曾彙刊為嚴譯名著八種，即天演論，原富，羣學肄言，穆勒名學，法意，羣己權界論，社會通詮，名學淺說是也。其鄉人林琴南，以古文譯西洋小說百餘種，與之齊名，世稱嚴林，多以嚴林並舉，其實以學力論，林固非嚴比也。

Academia Historica

抗戰最後階段中吾國亟需之現代將校

孫寶毅

兩國戰爭之日，決定其勝負之因素固甚多，如兵力，資源，武器，裝備，給養，軍紀，士氣與軍事思想等，然而將校之優劣，其關係亦甚大。雖有勇敢之士兵與夫精良之武器，但若無優秀之將校，似仍無必勝之把握。由此可知，將校實可決定戰爭之勝敗，與國家之存亡，其重要性為如何矣。

將校之優劣，即「將孰有能」之問題也。關於此，孫子曾懸一標準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孫子所言，仍不失為現代將校之座右銘，然現代戰爭已與疇昔不同，換言之，現代將校自有其新標準在焉。

現代戰爭，一方面為混亂之狀態，一方面為有秩序的出動坦克，飛機，大砲，與兵艦，不但包括各種科學與技術，且屬一種最高之藝術。美軍專評論家鮑爾文，曾對現代戰爭之狀況，與現代將校在作戰時之如何行動，加以敘述如下：

「戰爭由數百人所計劃，由數千人所領導，由數萬人所戰爭。戰爭從未「按照計劃」，因無一人能窺見其全貌。初視之，一切在混亂之中，但其背後，確有計劃在焉。計劃乃理由與想像，統制戰爭之進行，在原則上為不可變動，但在實施時，可隨機應變，戰爭之事，過於複雜，不能加以詳述，而將領與其參謀人員，亦畢其一生於研究如何支配戰爭。

「作戰綱領上言曰：不論兵力之大小，不論任務之繁簡，指揮官須為管制戰爭之主腦，從其身發出能力與衝動力，以灌注於其部下。

「指揮官在戰時不應自身為一隊之長，不應侵佔或干涉其部屬之權限，雖部屬中之無能者，應立即去之。彼應如朱匹忒（古羅馬之主神）高坐於奧林比克（古希臘之競技會）之上，彼應忍耐而有遠見，於無消息或不利謠傳紛起之時，仍應保持其頭腦之清靜。彼不為不完全或虛假之情報所欺而妄動，但彼亦不交臂失之黃金機會。彼須認識一戰爭之迷霧」，常使戰爭之情形，瞭瞭不明，或一時不能分明。但彼從其地圖上，從其報告中，從其與參謀或部屬之會議中，獲得戰事進行之全部情況。

「指揮官之下新參謀本部，通常分為二部分，一為普通參，另一為特殊參謀，前者分四課，一人事，二情報，三作戰，四供應，後者乃專家所組成，如軍器，機械，坦克人員與空軍人員等，彼等或建議或協助前者。

「指揮官與其參謀人員指揮作戰部隊。所謂作戰部隊分二部分，一部分為步兵，砲兵，裝甲部隊等，吾人稱之為「軍力」，另一部分為供應，保存，與特種部隊，吾人稱之為「軍支」。

「將領負指揮之責，參謀負計劃之責，但真正作戰者，則由以上所謂之「軍力」。軍力又由「軍務」協助或供應之。軍力之基本單位為營。以美國編制而論，三營成為一團，三團成為一師，二師或以上成為一軍團，二軍團或以上組成一軍。

「每次作戰，先有計劃。由作戰課按照指揮官之意志，擬一計劃，同時參考情報課所供給之敵方情況。供應課負責供應，人事課負責受傷者之撤退，死亡者之埋葬，以及損失者之補充。

Academia Historica

「各軍團獲知此項總計劃後，即按照其應担負之任務，自擬詳細計劃，命令各師與各團執行。再由各團命令各營。此項命令之傳遞，有時力求迅速，不拘形式。

「譬如某營長於前線在無線電話中接到此項上級命令後，立即翻開地圖，召集部屬開會，急速登上指揮車，揮手言曰：「吾人就照此做去罷」！（文見八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雜誌）

約氏雖未詳論現代戰爭中之現代將校，其應具備之素養如何，但吾人從其敍述中，已可約略見出其一二矣。依余觀之，現代將領應具備之素養如下：

第一，新軍事科學之智識。現代戰爭，因兵種之繁多，與武器之進步，日複雜萬分。凡為將校者，不但應對其專屬之兵種與武器，有深刻之研究，且須對其他兵種與武器，亦應有相當之認識。換言之，陸軍應知空軍海軍，空軍海軍應知陸軍。現代戰爭之新戰術為聯合作戰，各種兵種各種武器聯合運用，凡為指揮官者應熟知各兵種各種武器之用途與其限度，然後能求統一與聯合指揮之功效。所謂各兵種各種武器，包括步兵，砲兵，騎兵，戰車，飛機，傘兵，以及海軍方面各種艦艇，於此可見現代將校之智識範圍為如何之廣泛矣。是故每一將校，應博覽各種軍事科學，庶幾能熟悉現代戰爭中之進步的技術。而高級將校，於軍事科學以外，尤應研究其他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

第二，强壯之體力與旺盛之精力。此自為軍人應有之條件，因必如是，然後能忍受各戰場上之各種氣候，與克服戰爭中之艱難困苦。

第三，勇氣。左傳上曹劌論曰：「夫戰，勇氣也。」兩方交戰時，勇氣者不在學問與經驗，而在是否有勇氣與胆量。」戰爭為至危險之事，軍人而無冒此種危險之勇氣，根本已不配為軍人矣。然所謂勇氣有兩種，一為對個人危險之勇氣，一為對於責任之勇氣。前者為出入槍林彈雨，而毫無懼色，後者則為由名譽心，愛國心與責任心所啓發之勇氣。由此兩種勇氣，經過情與理之磨練為平衡，而產生所謂大勇，非征服敵人不可之意志一也，不屈不撓之氣節二也，果敢接近一切困難與危險三也，犧牲之準備四也，認識失敗為永久之恥辱五也，深信必得最後勝利六也。有此六勇後，懼敵心理，自無由發生。

第四，領導之才能。將校為軍隊之樞紐，士兵之核心，故凡事應為部屬之表率，使士兵有歸嚮之中心，而後能於戰時同進同退，制敵之死命。而指導中最要者為精神上之領導，此可從兩方面言之，一為意志之領導，即傳給部屬非勝利不可之堅强意志，另一為思想之領導，即統一部屬軍事學術上之思想。前者可提高士氣之旺盛，因將領必須指示部屬任何犧牲在所不辭，任何困難不能阻撓之意志，然後部屬有生死與共之決心。後者可以養成部屬之靈活性和獨立性。因指揮官之思想能統一部屬之思想，故部屬能於作戰時，與指揮官之觀察，判斷與行動，無大異之處。戰爭之時，千變萬化，而意外為戰爭之定則，是故指揮官不能事事用命令規定，亦不能事事代替部屬判斷，但對部屬給予目的與企圖而已。知兵之將必先認識部屬之個性與能力，並考慮其所能達成之任務，然後給予其部屬以獨立性。英美當局於選擇軍官之時，應用各種方法，以試驗其是否具有此種領導才能　蓋以此故也。

第五，組織與管理之才能。現代軍隊為一複雜之組織，如何組織之，如何管理之，以求發揮最大之效能，自亦為現代將

Academia Historica

校總具備之才能。有人曾謂，現代將校有如大公司之經理，洵不謬也。

福煦將軍言曰：「戰爭中至要之事，是在特殊之時機，認識合於未知素之情況，判斷映在眼前之事物，推知未知之事物，迅速作一判斷，而果敢實行之。」福氏所言之「認識」，「判斷」，「推知」，「果敢實行」，即為戰爭之藝術，亦即為將領使用權之度量標準也。此項才能，一部分為天賦者，故曾人有謂：「凡人苟非天生將才，不論如何好學深思，終不能成為名將」，但吾人認為大部分實可由經驗，實習與學問獲得之也，換言之，可培養得來也。

綜合以上所論，現代將校之標準與其應有之素養如何，蓋可明矣。茲再引述任英近東總司令，現任印度總督之魏菲爾之言，以為參考。魏氏言曰：「甲，現代將領應具之資格：（一）應熟習對於其軍需作通盤之籌劃（軍事第一）；（二）須有膽識；（三）須有專重事實之思想（不尚空談）；（四）須有堅強一切之毅力；（五）善於觀察，不知疲勞，心思靈巧；（六）須仁慈而又殘忍，（丑）須率直而又狡猾，（寅）須是一個守夜人，而同時又是一個強盜，（卯）須慷慨而又吝嗇，（辰）須寬大而又狹窄，（巳）須魯莽而謹慎；（六）應熟悉略略（七）能吃苦耐勞，忍受戰爭中之艱難。乙，身體方面與精神方面之資格：（一）勇氣，（二）健康，（三）少年精神：（子）須有奮鬥精神與求勝意志，（丑）須有一些冒險精神，須有一些賭博者之精神。丙、心智上之資格：（一）有「何者可做，何者做不到」之常識，（二）有新軍事科學之智識。魏氏所言謂為吾人以前所論者之具體解釋可也。

此項將校，若能應時產生，誠國家之福也。此次第二次大戰，盟國之所以能戰勝軸心，亦因其能多出此項將校之故。如美艾森豪威爾，英之蒙哥馬利，俄之朱可夫，戰前皆屬無聲無之名之輩，但現今則皆升為元帥矣。美英俄有新將才產生，而德國之將領，則局限於狹小之特殊階級系統之內，此德國之所以敗也。

觀乎吾國，抗戰已近八年矣，然而新將才並未發出，其故安在耶？由於新將才之不能脫穎而出耶，抑由於吾國之以無人才耶？以余觀之，「世不患無才」，患無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耳。吾國軍人方面，最大之病根，在於過分重視派系關係，地方觀念，不以軍事能力與作戰成績為運任與升降軍官之準則，以致昏庸敗類者，反得「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曾國藩語）

吾國今後誠欲渡過此危急之抗戰最後階段，除健全組織與人事制度外，尤應注重如何培養與提拔現代將校。培養之道，或非日夕所可奏功，而提拔之效，則立時可見。合乎以上所言之素養與標準者，擢升之，不合此標準者，則斷然淘汰之。若不如此，仍堅持派系關係與地方觀念，則前途誠不堪設想矣，安論所謂建軍與夫使吾國軍隊立於國際之林哉。

蘇聯過去為一黨統治之國，然自戰爭發生之後，其將領不限於共產黨人，亦不限於俄羅斯人，凡有真本領者，皆一一升為元帥，而擔負方面之責，如現任參謀總長瓦西列夫斯基，曾指揮蘇沙前線之羅索科夫斯基，皆波蘭人也，而驅逐德軍入境曾魯士之激爾尼雅夫斯基，則猶太人也。因蘇聯如此，故能獲勝利，吾國可不鑒諸！

要之，軍隊亦應民主化，使成為一種神聖之事業，凡有學

誠與志向之青年，均可爲軍隊服務，而軍隊中已有之品德與能力健兒者，皆可擢升，而不必依賴任何身分，派系與手段。以民主精神改造軍隊後，自以人才主義爲準則，不但可使軍隊成爲眞正之國家武力，且可產生若干合乎以上標準之現代將校。

歐几獸德言曰：「給我一個支點，即可將全世界翻轉過來！」吾人可斷言，若給中國若干現代將校，亦定可將抗戰整個局面翻轉過來！

★　★　★

雲孫隨筆

陶元珍

李文忠公全集

李鴻章奏稿自訂本

李文忠公全集，爲吳汝綸所編，全集刻於清光緒末，乃憑一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即據是本影印。鴻章奏稿，具在全集中。全集本奏稿，公認爲最善之本，遺勝坊間選刊。而據李文忠公尺牘第三十二冊復辦理天津水師學堂即補道洪翰香將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伊犂副都統奉少珊保定督院幕府陳南僚諸人書，則鴻章在時，曾自訂奏稿，石印分贈，是吳編全集本更可珍矣。復洪翰香書云：「奏議選本編定後，匆匆付印，校書如掃落葉，原不能一遍無誤，然止此十餘卷書，而譌脫至四百餘處，可謂漏網於吞舟矣。茲承詳加校勘，逐一訂正，眼明心細，感佩良深。擬將指出各條另刊木印，朱誌於側，以免疑誤。」又復奉少珊書云：「附寄石印奏議一箱，平生政績，略具端倪，藉供瀏覽，少慰相懷之誠。」又復陳南僚書云：「承索奏稿，容過便再呈察覽。往事都如夢影，異日留供史料，或助談資耳。思之慨然！」可略見自訂本奏稿梗概及李氏情懷。自訂本奏稿，係甲午戰爭後，鴻章以大學士閑居京師時，選編付印。彼時鴻章自分此生事業已終，故有是編之選，用留紀念。後來辛丑議和一幕，誠所不及料也。自訂奏稿包含年代，僅較全集本略少，而其篇幅十餘倍，則遠不及全集本數十冊之多。或自訂本字較細密，相差並不甚遠，惟選稿選本，所收必較全集本爲少。惜自訂本今已絕不易得，一時無從取而參校矣。

李文忠公尺牘共三十二冊，係鴻章函稿，由幕友于式枚起草，經鴻章閱改者。全編起光緒十一年乙酉，終光緒二十五年己亥，爲全集所未收，而適與朋僚函稿相銜接，可補全集之闕。尺牘原本至民國五年丙辰，始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際外匯基金組織的基本原則

——瓦斯克遠斯基教授

——戰爭與工人階級第九期——

（去年）四月二十三日莫斯科公布一同盟國家聯合聲明的全文。同日，此一全文又在華盛頓，倫敦和重慶三處發表。在此全文中曾提及國際外匯基金組織。聯合國家為着貨幣的合作計，擬組織一恆久的機構，而此一機構的基本原則，在聯合聲明中已有論列。

從外國報紙的記載看，我們知道，此一聲明的公布，亦有一段歷史。關於穩定貨幣問題，誠為戰後世界經濟建設中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早在去年四月間，英美二國財政部均公布一戰後穩定貨幣的預擬計劃，以供各方面的研究參考。美國計劃的起草者為美國財政次長懷德（Harry White）氏，而此一計劃定名為「國際穩定基金」，而英國計劃的起草者為有名的經濟學者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s），其計劃定名為「國際清算同盟」。

由於美國專家和其他聯合國專家討論的結果，今日所公布的聯合聲明係以美國計劃為基礎，雖則此一計劃在討論的過程中，已經有極大的修改。在此計劃中首先涉及的問題，乃為如何瞭解黃金在戰後國際支付方面的任務。

凱恩斯計劃的出發點，在於否定黃金在國際收支方面的積極任務，而認為國家與國家間的支付，盡可藉清算機構調整，以保持一定的平衡。為達此目的計，必須另定一特殊的清算單位，以代替黃金在國際支付方面的單位。至於美國計劃，卻承認黃金的意義，而認她為國際支付的不可或缺的媒介。

我們知道，黃金在現代世界各國中，均被認為最普遍的等價物，而國與國間的支付，均以此充之。由是看來，國際通貨，除貴重的金屬外，實無其他東西足以代替。各國貨幣，其在國內雖可流通無阻，但一出國界，便喪失其價值，而除了貴重的金屬外，再無其他東西足以完成國際支付的任務。因之，關於創造特種的「支付票據」以代替黃金，在現代的國際流通上，僅就理論言，亦不能成立。穩定的貨幣，應當建立在黃金的基礎上，而惟有建立在黃金基礎上的國際通貨，方能幫助今後的國際商業日趨發展。這標見解不僅符合於現實的需要，且亦充分明瞭黃金和貨幣在今日國際貿易上的意義。

關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最首要的一點，乃為成立一國際機構，而以黃金為基礎，穩定各國貨幣，同時解除國際貿易上的所有的通貨限制。凡加入國際基金組織的各國，如因欲解除通貨上的限制和保證通貨為世界商業的競爭手段，而發生收支差額的不平衡時，基金組織應該出而予以支持。

聯合聲明的起草者認為，基金的用途必須有所限制。明言之，基金不得用以投資，或用以為出口資本等。為達此目的，必須再創立一特種的國際銀行。關於創立國際銀行的談判，據不久以前的懷德 表示，現在正在華盛頓舉行。基金的資產亦不得用之以救濟或重興解放區。為救濟和復興解放區計，現在已創立了另一國際機構——國際救濟善後總署。基金的資產亦止得用之於調整由戰爭的結果所產生的一切借款。基金的用途

Academia Historica

領限於國際支付方面。換言之，由於各國對外貿，所產生的正常的國際支付，始可動用基金。

為此目的，基金組織擬發行本八十萬萬美元（或二十萬萬英鎊）由聯合各國分別繳納，倘使全世界的國家加入時，則資本將增至一百萬萬美元。如聯合這一資本量如何龐大計，我們僅須指出戰前全美的所有股份銀行的資本總額，亦不過八十萬萬美元。

凡加入基金組織的各國，必須按照其所繳的攤額，繳納一定的數目。所繳納的數目，一部分必須是黃金，而其餘的，即為各該國的貨幣。至於應繳黃金的數目，應該等於該國所認攤額的百分之二十五，或該國所有黃金及美元外匯的黃金的百分之十，而其決擇，視此二者之中，以何者為小。凡因戰禍或為敵人所佔領的受難國家，對於其應繳的黃金，尚可獲得減繳百分之二十五的優待。例如有一國家所認的攤額為十萬萬元，則她應交付基金組織以二萬五千萬黃金，（假使這一數目少於其所存黃金總數的百分之十）和七萬五千萬該國貨幣。凡因戰禍或為敵人所佔領的受難國家，其所認的攤額為十萬萬元時，則其應繳納的黃金，非為二萬五千萬，而為一萬八千七百五十萬。

從專家所公布的聲明中判斷，各國所認的攤額似乎尚在協議中。這一攤額如何攤派，聲明中不曾明言。然而我們從以前美國報上所發表的材料看，即知美國專家們欲依幾個公式，決定各國的攤額，而這些公式似能使人明瞭各國在國際支付上的大體的需要。這些公式為：（一）國家收入，（二）黃金存量和現款，（三）戰前五年間的平均的年輸入，和（四）最大限的波動，即戰前五年間以平均年輸出為水準所產生的波動，而每一公式皆賦有一定的比例。美國財長摩根索於（去年）四月二十二日曾在新聞協會播音謂，美國的攤額將達十五萬萬元，而英國將達十二萬五千萬元（自治領不在內）。依據現有的估計，蘇聯的攤額，亦必達十萬萬元以上。

攤額的大小，對於該國在國際基金組織所演的任務，和對於基金的運用等，皆有決定的意義。依據攤額的大小，非僅將決定基金管理權的分配，且將影響其所能利用的信用範圍和出賣黃金給基金組織的義務等等。從另一方面看，由於攤額的大小，復可保證基金的活動性和伸縮性，同時又可預防其疲憊。

基金組織的會員國，假使需要外國貨幣以彌補其收支差額的不足時，她便有權利用自國通貨向基金組織購買其所需的外國貨幣。很顯明的，這種權利亦須有一定的限制。不然，各國向基金組織購買太多，非僅必使基金組織成為空盤，且也必無法應付各種請求。因之，每一加入基金組織的國家，其可以用自國通貨，換取外國貨幣，應以一年中間不超過其所繳納的攤額的百分之二十五為度。要是存於基金組織的某一國的貨幣減少，而呈出低於該國最初繳納的數額（即低於百分之七十五）時，則此一國家可隨時以自國貨幣加以補充，同時可從基金組織換取其所需要的外國貨幣。凡存於國際基金組織的任何國家的貨幣，不得超過該國所認的攤額的二倍。（二〇〇%）

這樣一來，每一國家可以利用國際基金組織，用自國通貨換取外國貨幣，以彌補其國際支付上的缺額，但其數目每年却不得超過該國所認的攤額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其期限為五年。茲再以上舉的認攤額十萬萬元的國家為例，則此一國家每年可在基金組織換取外國貨幣二萬萬五千萬元，在五年中間共可換取十二萬萬五千萬元。

Academia Historica

為使基金組織可能獲得各國貨幣計，當各國的需要貨幣超出其來源時，基金組織便必須出動其黃金。從這裏，我們亦可看出基金組織之所以必須握有黃金的技術上的理由。基金組織有借用或以黃金購買任何國家的（參加基金組織的）貨幣的權利。這樣一來，基金組織實以「金本位」在保證各國對外貿易上的國際支付。

然而當基金組織以黃金購買外國貨幣時，究竟再以何種方式補充其黃金的儲量？

基金組織補充黃金的方法頗多，而其中二法却與各國的權額機能有密切關聯。第一、基金組織將要求某一國家（倘然這一國家的黃金存量已超過其權額時）當她每一財政年度欲購買外匯時，其所購買的外匯的一半必須以黃金支付。第二、基金組織在財政年度之終，如發現某一國家的黃金存量，和外國貨幣被變為黃金的存量增大時，便可要求這一國家回購其存於基金組織的該國通貨的一部分。這一要求將應用於某一國家的貨幣存於國際基金組織的總數已超過其權額的百分之七十五時，或該國家的黃金存量，和外國貨幣的被變為黃金的存量，超出其權額時。此外，多金的國家，仍保有其新得的黃金出售於任何市場的權利。

除了這二種方法可使黃金流入基金組織外，誰都想得到的，每一國家復可依自己的需要。而用黃金向國際基金組織購回其自國貨幣的一部。同時，必有一些國家，因為擬以黃金購買外國貨幣，所以便這而與國際基金組織進行此一交易。

我們看到，參加國際基金組織的各國，將與此一組織發生極複雜的關係。此一組織有否生命，僅可見之於未來，因為過去在國際支付方面未曾有過類似的組織和經驗。無可疑議的，由於生活和實際的需要，此一組織必定時有修正，而以其現在所有的性質和規模，當然，我們猶不能預料其是否適合於世界商業，是否適合於國際支付關係的實際要求。

基金組織的最基礎的一點，在於基金組織和加入基金組織的各國之間，必須協議一種以黃金表現的外匯上的等價。基金組織的會員國，依上舉義務專家的意見，必須負有不擅自改變自國通貨等價的相互義務。凡通貨等價的所有改變，必須經過基金組織的核准；反之，基金組織如未得會員國的同意，亦不得任意改變幣值。

從國際基金計劃的性質看，我們亦能知道，當欲改變外匯等價時，最重要的，最值得注意的，是預防損失，而這種損失往往能使其他國家獲得商業外匯上的利益。因之，外匯等價的改變，假使是由於該國內政上的原因所誘起，且不與國際義務相抵觸時，則此種改變，在本質上便不屬於基金組織權限內的貨幣政策的範圍。由是，很顯明的，在金融專家的聯合聲明中便預先言明，基金組織對於這一類改變外匯等價的申請，一概加以拒絕。我們知道，一個對外貿易完全國營的國家，對於這類外匯等價的改變，似乎無須經過基金組織的任何同意。因為該國對外貿易係賦有國家的性質，所以比基金組織的任何決定，更善於保護此一國家的商業利益，而且，其外匯政策（包含改變外匯等價在內）亦絕不會與其國際商業契約相抵觸。對於這點，多年來的蘇聯對外貿易的經驗，便能給我們以一個最有力的見證。

誰都知道，蘇聯幣值的穩定性，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係建立在另一基礎上。由於實行社會主義經濟，而一切皆賦有「計劃」的性質，所以蘇聯能自行調整必要的行情和維持一

Academia Historica

定的幣值，而無須再藉補充的專設機構以確保其穩定性。由是，國際基金組織對於其他國家的通貨，雖有決定的意旨，但對於蘇聯的通貨却沒有多大的價值。這使蘇聯通貨對於基金組織，事實上不得不處於另一種關係，而將來的基金組織的實際活動，對於這點亦不能加以忽視。

同時設定：基金組織與參加基金組織的會員國間的交易，必須以外匯等價計算，而會員間彼此間的交易，雖可依行市決定，但却應在相互協定的等價的百分之十的範圍內，依據金融專家的計劃，基金組織的會員國，必須負有以下諸義務，即不得以高於或低於自國所規定的外匯行情，買賣黃金；不得在國內市場，以超出基金組織所規定的限度外的行情，與外國貨幣進行交易；不得未經基金組織的核准，而採取差別的外匯政策，或訂定多種的外匯行情等等。

然而我們必須知道，施行於戰時的外匯調整，不能在戰爭勝利後的第一日，便馬上現出成效。因之，再規定三年爲過渡時期，在這三年間，會員諸國認爲必要時，可以保存此種調整，同時亦可採取步驟，逐漸地，儘可能迅速地清算那些阻礙國際貿易的所有限制。

以上便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本原則的梗概。我們必須指出，這些原則，係由各國財政金融專家所提出，而且目前僅止於一種介紹性質，而與其政府並沒有任何聯繫，懷德在不久以前，曾對報界表示，（去年）五月底將召開聯合國及參加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代表會議，而在這一會議席上，將審議和確認這些原則。

當聯合聲明發表時，曾經獲得美國官方的好評。據美國財長摩根索言，國會中的許多委員會，均贊成組織國際基金的計劃。國務卿赫爾對此計劃亦有極高評價，而呼籲在戰爭未了之前，應將此一計劃促實現。

然而，我們知道，美國有些銀行家和實業家却反對此一計劃。例如銀行家奧特奇在其「自由的美元」一文中對於基金組織的計劃持反對的態度謂：

「假使美國能夠在國內堅住通貨膨脹，恢復黃金在國內流通，同時解除外匯方面的所有統制時，則美元對於其他國家的外匯，將成爲最有希望的定錢，她將被公認爲外匯流通上的唯一單位。」「紐約時報」和「紐約先鋒論壇報」於註解專家聯合聲明中所擬議的國際貨幣基金之餘，復寫道，穩定貨幣的最良好方法，無過於每個國家採行清醒的經濟，財政 信用，和外匯政策，在這些政策聲中務使達到其他國家不蒙受損失的目的。

紐約時報寫道：「每個國家不應該存有一種思想，認爲與其鄰國進行經濟戰爭，必於自國有利。須知，在這種思想下的改造尚未成功之前，各國的幣值是不得穩定的。倘然此種思想在思想改造達到目的之日，所謂複雜的國際穩定基金，亦必無成功的可能，若干多餘的東西。」

紐約先鋒論壇報認爲基金「可能協助在外匯上的國際合作的發展，和解除一時的失調，但却不能療治由外匯的惰性的不安定所誘起的宿疾。」

一般看來，英國較之美國，對於專家倡議組織國際基金的聯合聲明，似採取較保留的態度，倫敦泰晤士報寫道：「我們對於其成功，不要信心太大。對於基金最重要的，爲美國能夠安定的繁榮，不發生動搖性的貶值，和不致將美元幣值忽然提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高，忽然壓低，因爲由於這些措施所產生的損失，必擴大於遠在美國國境之外。這些個別的提高和降低，便夠使任何國際外匯計劃化爲烏有。」

在這裏我們應當再補充一句，猶如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一般，美國的經濟亦免不了存有內在的週期的恐慌。泰晤斯報的提示，非爲無的放矢，乃在告訴我們，戰後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循環的運動，將帶來一種極大的危險，而這將影響基金組織的活動，很顯明的，不問基金組織採取何種方策，未來的經濟危機可能破壞個別各國的幣值的穩定。

即從英美報界的首次的反響看，亦可知道此二國的工商界人士，事實上早已想到橫於基金組織的實際活動之前的許多嚴重的攷驗。他們或許因爲有鑑及此，所以纔在設法使基金組織不須負有太廣泛的任務，纔在設法使其工作僅限於商務方面的國際收付的調整。

除此而外，尚有許多批評基金組織的具體意見，亦值得我們注意。我們應注意的是，像國際基金組織那樣龐大的國際經濟機構，依其本身的存在，便頗可能召致弱小國家的若干危險。同時還有一個事實，即：不問將來基金組織將擁有何種權利，每一參加基金組織的國家似不能保留一種權利以確定：基金組織對其經濟所作的決定，是否適用或可接受的問題。從此或可謂，「這些決定」必須看爲一種介紹（或建議）性質，以供會員國家參攷（或攷慮），至於內政問題，因各國主權所在，基金組織實不便干預。至於基金組織和實行國營貿易的國家間的相互關係，很顯明的，基金組織也不能忽視這些國家的外匯問題的特殊性。

惟有充分攷慮參加各國的經濟的所有特殊性的條件下，這一國際機構方有順利進行其工作的可能，方能達到在外匯金融方面實行世國際合作的目的。

萬竹樓隨筆

舜生

嚴又陵先生晚年與熊純如書札，曾有數處論及袁世凱，其一云：「……大總統固爲一時之傑，極其能事，不過帝制時一才督撫耳，欲與列强君相抗衡，太乏科哲學識，太無世界眼光，交過欲以人從己，不欲以己從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滿意處甚多，望其轉移風俗，奠固邦基，嗚呼，非其選爾。顧居今之日，本情而論，於群雄兩派之中，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乎？此國事之所以重可嘆也。……」（見學衡雜誌「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十一）又其一云：「（海上）生性好用詭謀，以鋤異己，往者勿論，乃革命軍動，再行出山至今，若吳祿貞，若宋教仁，若趙秉鈞：若應桂馨，最後若鄭汝成，若張思仁，若黃遠庸，海宇騷然，皆以爲渠上之所主使。吳殺吳宋，雖公孫子陽而外之所不爲，然猶可爲說，至於趙秉鈞鄭汝成，皆平日所謂心腹股肱，從以洩祕滅口之故，忍於出此，則羣下幾何其不解體乎！……又況段祺瑞去秋辭職以後，數見危機，寢饋之間，不遑甯處，人間口語，怪怪奇奇，嗟夫，渠上父子之間，僅十餘人耳，左右雖皆寫書袁氏，勸其謝事歸隱。）」（見同上第二十。按是書作於民國五年；是年先生

Academia Historica

法國的政黨與抗敵團體

沈項芳

法國有兩個民意機關，一是國民參政會，一是全國抗敵會議。關於法關西的國民參政會，本刊第十二期已經介紹過了，現在再來敘述決關各黨各派及抗敵團體組成的全國抗敵議會。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法國地下活動，風起雲湧，滿地燃起復仇的烽火，在海外，倫敦的「民族委員會」和阿爾及爾的政權正當談判合作的時候，法國地下各抗敵團體，各黨各派及職工會也成立了一個統一性的全國抗敵會議。

它的發起人是一位地下青年，化名馬克斯（MAX），過去奔走於各抗敵團體，擔任聯絡工作，也曾秘密到過倫敦和盟高樂將軍會面，他帶了無線電具，用降落傘跳下，從此和海外互通消息，開邦由天空擲下武器，各抗敵團體也就展開更廣泛的地下活動。

一九四三年五月首次召開「全國抗敵會議」，全國各抗敵單位，各黨各派，各工會，各文化團體機關和各宗教團體都派代表參加，一致通過成立「全國抗敵會議」，並承認在臨時政府沒有回來以前，它是有最高權力的行政機構。同時也是本土地下活動的總領導機關。它的基層份子包括十九個單位，即共產黨，社會黨，急進黨，民主聯盟，大衆民主黨，共和聯合黨，總工會，天主教職工會，民族陣線，北部解放會，復仇會，軍民抗敵會，職門會，游擊隊，南部解放會，抵抗會，保衛法蘭西社，北方之聲社，洛林社，全國會議的代表共四十人。在納粹及維琪偵騎密佈之下，開會極感困難，由點轉更多次，有時在貧民窟內，有時在古堡或教堂內，從未被人發覺。每次在開會前半小時，由秘書長茂尼埃把出席人員一個一個的去找來。茂尼埃告訴人說：「巴黎這麼大的一座名城，我們混在城內，用不到化裝」。他是急進黨領袖之一，戰前在人民陣線時代，曾任萊翁勃倫內閣的空軍部長及國際和平運動會副會長。

全國抗敵會議有「項重要目的：一、在團結本土地下抗敵團體及各黨各派，彼此發生密切的連繫。二、在本土解放後舉行國會選舉，實行民主政治。馬克斯自倫敦歸來後，不久被納粹捕去，壯烈殉難。後來由皮杜爾繼任主席，設置在宣常委員共同負責。另設軍事行動委員會，指揮內地軍。

全國抗敵會議之下，設有「各州解放委員會」（CDL），由各抗敵團體及各黨各派指定代表一人或二人組織而成，來主持各州解放地區的地方行政。它管制「各地方解放委員會」（CLL）和「巴黎解放委員會」（CPL）。還有幾個附屬的團體如：「勞工行動團」，它担任意工和破壞的指導，它的支隊中，特別是鐵路職工，最為出力，曾做了許多非常有效驗的破壞，由於他們的英勇和殉難的精神，即納粹也表示無限的敬意。後來德軍不得不駐重兵來保護鐵道，並派出大批間諜去跟踪鐵路人員的行動。但火車仍不斷出事。另有一個社會服務團，幫助殉難人員的家庭，如其家長失蹤或投奔「馬基」他留下來的家屬無法生活，社會服務團就負責接濟，發揮「互助的精神」。

全國抗敵會議的政綱，分為政治、經濟、社會三類：

（甲）政治，一、廢棄維琪政府，恢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衛國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獨立，並恢復法國在國際間的權威和強大。二、懲罰賣國賊和法奸。三、沒收賣國賊的財產，凡操縱黑市囤積投機，或利用職權，橫徵暴斂所得來的產業全部充公；同時沒收敵人全部的產業。四、恢復普選，保證人民思想，信仰，意見和言論絕對的自由。凡人民住宅及書信祕密不可侵犯，且在法律前平等。

（乙）經濟：一、建立純正的自由經濟和民主的社會；排除大經濟壟斷的私人集團及大財閥的封建制度。二、成立國家機構，調和私人利益及國家利益，凡過去法西斯專制及壟斷下的國家經濟機構，全部解放。三、政府徵詢各生產代表的意見，擬定計劃，加強國民經濟生活。四、各項大企業，重工業，礦業，保險業，大銀行都收歸國有。五、輔助銷費者，農業和農民合作事業的發展。六、凡有資格的工人都得加入國營企業的領導和管理，並自由發表對國家經濟政策的意見。

（丙）社會：一、改善職工的待遇。二、調整薪津和工資。三、穩定幣制，提高民間的購買力。四、擬定綜合性的計劃，安定社會，保證一切公民均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五、職業須有保障。六、實施有利的物價政策，提高農民生活的標準，改良農業，並用社會立法，保障農民和工人享受同等的權利。

法國土最初成立的地下團體也就是全國抗敵會議的基層份子，在南部有「戰鬥會」（COMBAT），游擊隊 F.T.，南部解放會 LIB SUD，復仇會 C.L.V.，抵抗會 C.D.R.，北部解放會 LIB NORD 後來，這許多團體感覺有聯繫的必要，組成一個「抗敵聯合運動會」M.U.R. 共產黨在這些團體中起着領導的作用，特別在「游擊隊」裏都是共產黨員，其他不論在北部或南部的各抗敵團體中，它的幹部人物差不多都是共產黨員，他們組成「民族陣綫」F.N.。來領導這些抗敵團體的行動。「民族陣綫」成立於一九四一年，領袖居里夫人的女婿艾爾歐·居里 OLIOT（UR ED 及維勇 VILLON 他號稱愛國份子，不分政治思想或宗教信仰，站在民族的立場上共同合作。首先驅逐納粹，完成祖國的解放。他們須在德軍佔領的地區內破壞敵人一切的設施，懲處賣國賊及維琪合作份子。

共產黨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曾被政府解散後，即組成秘密組織，說到地下活動。當然共產黨的資格最老，本土淪陷後，它不但領導自己的「民族陣綫」，還控制了其他抗敵團體組成的「抗敵聯合運動會」。它在法國北部工業區域內的勢力很大。現在它採用了一個適合於各黨各派共同的綱領。共產黨領袖多列士說過：「馬克斯的理論，唯物論與辯證法不是一種定理的信條而是一種行動的準則，這種定理是以時間來轉移的，在目前新的環境之下就有新的定理來替代了，現在共產黨員的信條是戰鬥和工作，來加速希特勒的崩潰，而保障民主的勝利，並願望法國的強大」。

社會黨（舊日的第二國際）它是領導地下活動的大政黨之一，現在它的地位僅次於共產黨。「社會黨領導的「全國解放運動會」M.L.N.；它的團體「有保衛法蘭西社」D.F. 北方之聲社 VOIXNORD 洛林社 LORRAINE 抵抗社 RESISTANCE。並包括幾個抗敵軍事團體。領袖薩陽 SAILLANT（現任全國抗敵會議主席）顧安 GOUIN（現任全國諮詢會議主席）都是這團體的中堅份子。它的行動綱領（一）立即逮捕合作份子和投降派，嚴予處罰。（二）附逆產業全部充公。（三）侵佔公物，走私資敵，查明實據，一律槍斃。（四）愛國難對者，或強佔抗敵份子的財產均受重罰。（五）肅清中央和地方

Academia Historica

各行政機關的貪官汚吏，特別是財政部須迅速予以改組。（六）改善國民的經濟生活。（七）大企業，大工業，電力及公用事業等收歸國有。（八）重整法國軍隊。

社會黨本身的綱領：（一）支持法國和盟邦對敵作戰到底，迅速完成全面勝利。（二）戰後世界，祇有社會主義才能推翻托洛斯的壟斷和資本主義諸的壓迫，使人類和國家得到眞正的解放。（三）法國各項工業和經濟改革，非採用社會主義方法才能實行。（四）勞工階級從資本家壓迫中解放出來以後，將發揮他們全部的技能去努力生產，對農民也是如此。（五）國際間保持永久的和平才能實行社會民主與國際民主。（六）對於處置德國敵人的寬需工業機構和軍國主義的精神必須澈底清理，廢除德國的重工業和各種可怕武器的製造。（七）推動共和民主革命，建設自由與公正的社會。

急進黨，和急進社會黨，它的黨綱既不是急進的，又非社會主義者，乃是過去在政治上專作投機的一個政黨。它主張進步的資本主義，反對宗教教育。多少年來，農民說話，過去的領袖如赫里歐，達拉第，如丹電，赫里歐被納粹架走，現在德國，達拉第因戰事責任問題，被捕後生死不明；旭丹在美國作寓公。急進黨造成羣龍無首的狀，現任殖民地部長賈高必是唯一的領導人。戰前，急進黨是法國第一大政黨，現在連第三把交椅還坐不到，除了共產黨，社會黨以外，就該輪到大衆民主黨或民主聯盟了。

人民共和運動會M.R.P.是大衆民主黨，民主聯盟，全國共和聯合會結成的一條地下活動的抗敵陣綫。戰前都是些中間派的小政黨，在地下時代流過多少血汗，擴展了勢力，它已替代了過去急進黨的地位。

領導人有皮杜爾（現任外交部長，德孟東（現任司法部長），戴倘（現任宣傳部長）等，它的七項綱領：一、對國家，（A）締造自由，強大和公正的共和國，（B）尊重人民的主權及各種基本的自由，（C）絕對清洗法西斯的意識形態，尊重人權，（D）排除托洛斯和專利，（E）公用事業歸國家經營，例如電力，礦產，運輸和銀行業等。（F）言論界必須公正而自由。（G）全國普選，產生代表民意的國會。（H）婦女享受同等的選舉權和恩給金。二、對家族，（A）給予津貼和救濟金，（B）父母對其子女得自由選擇學校。（C）重視家庭衛生，主婦必須負管家的責任，三、對青年，（A）實施職業教育，授予經商智識，（B）舉辦結婚貸款，三星期的蜜月休假，薪資照給。四、對法蘭國，（A）恢復領土主權，成爲列强之一，（B）加强國際機構，使其有能力保障世界和平，（C）法國重整軍備，（D）尊重道德和宗教傳統。五、對勞工，（A）保障勞工階級最低限度生活的工資，自由組織本身的團體，凡經濟機構和企業的管理，勞工階級亦得參與其間，（B）土地產物由資本家與勞工平分；（C）實施勞工保險及社會政策，（D）保護技藝專家的專利，獎勵私人發明，（E）組織體育會和俱樂部。六、對戰俘，（A）從速恢復他們在國民生活中一切的地位和權利。七、對全體公民，（A）看重自己的工作來增進生活的愉快，（B）努力建設團結統一的法蘭西，謀個人意志的自由和國家法治的進步。

「軍民抗敵會」F.C.M.是前綫潰敗下來的士兵和兩次參戰退伍軍人所組成的地下團體。在每一武裝抗敵團體都有該會的會員担任軍訓和指揮，他們提出的綱領如下：

（一）普選必須消滅欺詐手段，過去國會裏的弊端和議員

Academia Historica

的保守思想絕對不容其再存在，二十歲以上的男女都有選舉權，並由大政黨或團體起來執政。

（二）民事行政機構必須忠實履行民主制度，不得利用個人的職權和地位來假公濟私。

（三）報紙維持職業的自尊心，言論絕對自由，不爲利慾或津貼所操縱。

（四）創造新的社會，教育平等，一般公民都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五）國家經濟機構保證公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提高勞工地位，並得參與工廠行政管理。

（六）不論任何政治制度，都由人民統治，且必須尊重他們的主權，如其發覺政制腐敗應該立刻予以推翻，免其禍國殃民。

（七）人民賦予政府最高的權力，如遭遇重大的困難，必須徵詢人民的意見。

（八）托拉斯制度增加人民的負擔，今後代以獨立的工業家，商人，工匠或店員，發展他們的企業，杜絕私人壟斷的專利，廢除一切包辦制度。

（九）懲罰賣國賊，決不寬赦，並依法審判操縱黑市的投機商人及發國難財者。

（十）組織人民的軍隊，編制內地軍爲正規軍。

總工會 C.G.T. 在一九四一年被維琪解散，會員原有五百萬人，大多轉入地下活動，重新組織新工會，執行委員會包括社會黨四人，共產黨三人，它和法國另一個勞工團體——基督教工會 C.F.C. 非常融洽合作，共謀勞工的福利，還有智識界職工聯合會，農業協會，農民聯合黨及工業聯合會，這許多勞工團體在巴黎解放後，正醞釀着要組織一個勞工黨和農民黨。

戰前，法國小黨林立，戰後仍舊如此，再過一二個月，普選就快開始，各黨各派都要忙於競選了。

雲孫隨筆

肅毅刀

陶元珍

李鴻章在北洋，曾向德國定製佩刀多柄，分給部曲，所謂肅毅刀是也，餘刀存天津機器局，厥後僚屬友好亦多索贈者。李文忠公尺牘第三十冊復直隸藩台員梧岡臬台季士周書云：「承取德國所製肅毅刀，當即函屬津局，檢配兩柄，就近寄至保定，分送冰案，到希查收。」又致總辦天津機器局即補道承敬雨書云：「頃接員梧岡方伯季士周廉訪來函索取德國所製肅毅刀，即請檢出兩柄，裝配齊備，由津交便人逕寄寄城，分送兩司署中查收。此頂刀件，近日來索者頗多，局中存儲尚有若干，便中并祈查示爲盼。」又復員梧岡書云：「昨奉惠書，知由津局配送之肅毅刀，已承察入，過勞推挹，紉荷如何。」（復直隸藩台員梧岡）又復湖北提台吳儀堂書云：「承索肅毅刀，當飭津局配齊全副，交來差帶回。」均關於肅毅刀之掌故。夫昆吾切玉，大食捫緣，並異域之精良，爲當時所推許。鴻章遠囑德廠，製器銘勳，長昭肅毅之封，上續弘景之錄，豈惟佳話流傳，亦見接受西法。當員季吳諸人來函索贈時，鴻章已因對日戰敗，去直督任，方以大學士閑居京師，撫今思昔，能不憮然！前引復員季二人書又云：「弟試早及鋒，用甘藏器，惜六州於魏博，魂一劃於誰承。」既慨乎言之也。

Academia Historica

緬甸的普選

張禮千

一八二四年一月，緬勇將班仕刺從阿薩干進討來犯的英印軍。同年三月五日，英印政府遂正式對緬宣戰，是爲首次英緬戰爭之始，五月十五日，英軍乘船登陸仰光，並加佔領，緬王孟既急召班杜剌回，衛仰光英軍，以武器懸殊，緬軍大北，班氏中流彈死，次年四月英軍遂陷卑謬，一八二六年二月更奪薄甘，三十四日英緬各遣代表，會於距首都阿瓦四十五哩的賽達塔，締結和約，結果緬屬的阿薩干，顛拿沙廉，阿撒姆三區割讓與英。

當緬王蒲甘明在位時，待在緬英人頗厲，且重徵英商賦稅，英人不能忍，訴諸印度英督，督遣使查詢，緬人復不爲禮，英印政府乃于一八五二年三月十五日致最後通牒，限四月一日答復，屆期杳然，英軍即於四月五日佔馬都，八月十二日陷仰光，十九日略勃生，這都是緬甸的要港，秋十月九日再取卑謬，至十二月二十日英將通告緬王以白古（勃臥）屬英，次年一月二十日英印政府更正式宣佈，以白古爲中心，便兼併了下緬甸，並於六月二十日英緬再締和約，英緬二次戰爭始止。

緬王西保頗具胆略，思聯法以制英，卒締攻守同盟密約於瓦城，事成，允以湄公河東岸的領土讓法，旋被英人偵知，大驚，遂定兼併上緬政策，此爲英緬三次戰爭的胚胎，一八八五年秋，英緬以商務問題又起齟齬，緬王即於十一月告全緬民衆驅逐英人，九日英方抗議，十四日英軍即進薄阿瓦，法人沒有來援，二十八卒陷首都瓦城，緬王被俘，流放印度，一八八六年一月一日，英國乃正式宣告合併上緬，於是緬亡，降爲印度的一省。

印緬合治到一九三〇年六月，始倡分離之議，其理由有四：一印緬的人種語言文化歷史和社會組織完全不同，二依據一九二一年修正的印度統治法，在印度中央會議中的緬人議席僅佔五名，是以每不能顧全緬甸的利益，三緬甸歲入的年額須納諸印度政府，致緬甸的財政基礎感受威脅，四印人的關稅政策，不合農業國緬甸的經濟利益，同時因印人資本的自由流入，致壓迫緬人的經濟活動，又因印度勞工的移殖，使緬人生活程度低下，遂影響於緬甸民族素質的劣化，嗣後印緬分治問題頓趨白熱化，至一九三五年印度統治法和緬甸統治法便各別制定了，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復頒新憲法，也就是緬甸統治法的頒訂，這樣印緬方正式分離，而緬甸歸英直轄了。

這新憲法（緬甸統治法）共十四章，一百五十九條，非常複雜，關於行政部門，總督是英王的代表，係行使緬甸的統治權者。同時南撣北撣和加蘭尼三部落，則稱總督直轄區，或稱特別區，或稱東部諸州，而在緬甸統治法適用範圍以外，所以這新憲法的實施區域，僅佔英領緬甸的百分之六十，換句話說，就是僅生於緬族住居的地方，按緬甸歸英後，把它劃成七管區和一特別區，其屬上緬甸者，曼吻外管區（第悅茂縣除外），曼德勒管區、實皆管區和一特別區，其屬下緬甸者有阿薩干管區，白古管區第悅茂縣，伊洛伊底管區和顛拿沙廉管區，茲將緬甸的行政區域和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緬政府公佈的人口，列表如下：

Academia Historica

管區總督	縣	人口
阿臘干	若開、阿臘干山、叫漂、仙道衛、	一、一八六、七三八
白古	仰光、白古（勃固）、磅耶瓦利、卑謬、永盛、卑謬	二、九六一、二四九
伊洛瓦底	勃生、興實搭、淜名、毛於、蓬、壁磅、	二、六五九、一二六
頗拿沙廉	東牛、沙溫、直通、奄哈士土瓦、丹莪、	二、一一〇、四二〇
吻外	親山、木谷具、敏巫、吻外、蒲悅茂、	一、九〇五、八〇九
曼德禮	曼德禮（瓦城）、叫棲、敏建、脉鐵拐、任屋申、	一、九〇七、七〇三
實皆總督直轄區	密支那、八莫、上親墩、下瑞帽、實皆、祖墩、傑沙、瑞帽、實皆、（南坪、北坪、加蘭尼）	二、三二二、六七五
合計		一六、八二三、七九八

在這總人口中，緬人約佔一千一百三十二萬，加蘭尼人約一百五十萬，印度人約一百三十萬，緬人約一百二十萬，華僑約五十萬，親山人三十五萬，阿臘干人三十三萬，喀膏人十五萬，傑沙人十四萬，具有選舉資格的公民總約四百二十萬，其中女性凡七十五萬，約佔選舉施行地域全人口的百分之廿五。

一九三七年的緬甸統治法，緬甸決採用議會制度，但英本國議會依然對緬甸爲最高的立法機關，換言之，緬甸議會須基于英本國的最高法權制定緬甸統治法，所以說緬甸議會是有自主性的議會，尚不恰切。至緬議會的構成，要素有三：一爲代表英王的緬甸總督，一爲上議院，一爲下議院，上院議員定數凡三十六名，其中半數十八名是由下院議員中互選而來，另入名由總督指定，任期七年，下議院共有議員一百三十二名，係用普選法選出，任期五年，議會年開二次，一在三月，一在八月，三月的會討論預算案，八月的會討論一般法律案，後者開會時期因適應候風（monsoon）故俗呼「濕淞會議」。

緬甸統治法的基礎，異於普通選舉制，選舉資格依年齡納稅力和教育程度等而定，凡有選舉權者不問男女均有被選舉權，下院議員其年須在二十五歲以上，上院議員須在三十五歲以上，這是主要條件，下院議員的選舉，分一般選舉和特別選舉，前者的選舉法依民族爲別，計自一百十三選舉區內選出議員一百十六名，後者以團體爲別，計自十一選舉區內選出議員十六名，全議席一百三十二名，其中緬人佔九十五名，如下表：

選舉種別	民族或團體	選舉區	議員定額
一般選舉	緬人（都市）（地方）	一四	一四七七九一
	加蘭尼人（地方）印度人（都市）	一二	一二八
特別選舉	英緬混種（全緬）歐洲人（全緬）	一	三二
	仰光大學（緬人）商會（緬人）	一	一
	同（印人）同（歐人）	二	五
	同（華人）同（英系）	一	一
	仰光貿協（英系）	一	一
	印度協會（印人）勞工協會（印人）	二	二
	同（緬人）	二	二
合計		一二四	一三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這種辦法，是否合理，本人不願討論，不過就事實言，緬甸在東方的殖民地中，約算具有民主雛形的一個國家。

輔佐總督的行政部便是內閣，閣員十名，總督得從下院議員中選任之，實際，總督僅從下院的多數黨（如國民統一黨，平民黨，自主黨，現代社會黨，聖國黨等）中選任首相，然後和首相銓衡其他閣僚，這是慣例，在太平洋戰事前緬甸內閣，計由首相和農林、內政、財政、工商、稅務、教育、勞工、衛生、交通等九部長而成，閣議時的議長是總督；但通例由首相代行，內閣的權限囿於緬甸內政，像國防（另置國防部，歸總督直轄，內設參議三名，二英一緬），外交和遵督等，總督得自由處置，僅容許內閣質疑討論而已。

以上所述是新緬甸戰前的政情，我想本篇脫稿後，仍不會有多大的變動，此可於去年十月英保守黨帝國事務委員會所擬的「緬甸憲皮書」中見之，現僅舉其特要諸點，以供關心緬事者的參考，（一）規定緬甸復興工作為六年，在這期間，一切事務統由緬甸總督全權指揮，並根據各方政情，於復興後制定憲法交由人民選舉代表組成的議會議決，樹立一自治領地位的政府。（二）國防和外交應由英國和緬政府共同商定，同時應建築海陸空基地，由英帝國政府管理之，（三）利用緬甸復興的良機以合理價格，由非自耕農手中收買田地，並創立一地政銀行，以合作貸款方法貸與自耕農，嚴禁將田地讓與非自耕農，最後一項是解放佃戶的妥善辦法，足供我們借鑑。

三四、四、一。渝

★ ★ ★

雲 清仁宗賜英王勅諭原件

孫 隨 筆

陶 无 珍

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英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至中國，提出各項要求，高宗悉予駁斥，然於英使待遇頗優，故馬戛爾尼歸後，對高宗猶存好感，中英間亦未生芥蒂。仁宗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英使阿墨斯特（William Pitt Amherst）復至，以儀節之爭執及清廷接伴諸臣之含混上奏會客引見，致阿墨斯特及副使均拒不入覲，仁宗亦震怒，立將阿墨斯特一行逐回，兩國關係遂趨惡化。仁宗為此曾賜英王勅諭，責阿墨斯特等無禮，並囑嗣後勿再遣使。勅諭全文，具載實錄，王先謙東華續錄有之，原件則存英外部。薛福成四國日記光緒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記云：「英外部侍郎山特生函約參贊馬格里（英人，原名為 Halday Macartney，久任中國駐英使館參贊。）赴外部語談，據云清釐檔案或有華文要件屬其代認也。余屬馬君，如有要件，可斷送至英館，交張聰帆錄一清稿見示，即面馬君來至巴黎。告余曰，外部有一匣，黃綾包裹重疊，庋存室中七十年餘矣。但相傳由中國寄來，並不知為何物。今啓視之，則匣內復以黃綾包裹竹筒，筒內有函軸。展視則嘉慶二十一年仁宗睿皇帝賜英吉利國王勅諭也。係漢文漢字暗丁文三樣合璧。余恭閱抄稿，乃與王益吾祭酒東華續錄所載，一字不殊。……昔年風氏未聞，中西語言文字莫相通曉。親其包裹完好，久庋外部，蓋英廷固無人能讀者，實未嘗啓視也。」案勅諭既有暗丁文譯文，英廷何至無人能讀，蓋由遂使致隙，不願啓視，故包裹完好如故。亦幸未啓視，否則愈增英人惡感矣。薛氏將任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輪駐倫敦巴黎兩地，其見勅諭鈔稿，方在巴黎，故於勅諭原件未克親見。日記謂「恭讀勅諭，齎義正大，洵足折服遠人。」此乃照例頌聖之辭。又謂英使司當冬云云，則係誤副使為正使。薛氏當時原不知嘉慶二十一年來華英使為誰，此亦記憶之而誤記也。

Academia Historica

美國共和黨參加舊金山會議的性質和其意義

斯頓著
孫寶毅譯

羅斯福總統指派三個共和黨人，出席舊金山會議，對於共和黨是一隻光澤的紅蘋果，還是一隻熱爛的馬鈴薯，目前還不能回答這個問題，除非該會議所欲商討的國際的和國內的政治問題解決後，才能夠得到一個明確的回答。

但這裏的共和黨領袖已經決決相信，參加代表團並不給予他們的黨一個難題。他們雖然很勉強地推想參加舊金山會議對於個人的雄志和其前途的關係，但他們不承認總統已經使他們的黨陷於窘地了。

同樣地，這裏社會上亦產生了一種非常有重量的意見，認爲羅總統指派三個共和黨人爲舊金山會議的美國代表是一個政治的狡計。

其實，在羅斯福總統的兩會宣告：「舊金山會議的美國代表團「實具兩黨一體的眞義」之前，共和黨領袖早已贊成該黨參加舊金山會議代表團的意見，並且亦早已提出以下的口號：「世界和平不是一黨的問題」。

范登堡是參議院的共和黨會議的主席，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主要份子，可以說是共和黨在外交方面的代言人。他最近主張：在和約之前，立即商討條約，規定德國和日本永遠解除武裝。

伊斯是衆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委員，可以說是國會與共和黨中的一個有力份子。

史達生是明尼蘇達州的前任州長，他極力主張消滅傳統的孤立主義。

羅斯福總統指派這三個共和黨人參加美國代表團，有人認爲：他的頭腦中必定有個主意，就是邀請他們參加關於戰後安全計劃的決定，使他們不再振振有詞地起來反對，換句話說，羅斯福把他們的槍口塞住了。用吸收的方法，來平靜反對黨，這種技術在從前並非沒有試過。

再者，范登堡和史達生兩人，可能是一九四八年的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羅斯福總統所實行的計劃和政策，或許是下次總選的主題，不論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是那一位，但是如果范氏和史氏兩人現在就和羅斯福的計劃和政策打成一片，他們的被提名爲總統候選人的可能性，就減少了。史達生也道，後來爲舊金山會議的代表，對他或對任何共和黨人，是一種政治的責任，但他後來沒有強調這種說法，所以有人相信，在他腦中並沒有將來出來做總統的抱負。

這裏共和黨的發言人，對於以下的一種思想，力加駁斥，就是認爲擁護舊金山會議代表時應注入黨派性。他們認爲范登堡等的被選爲代表，並不是完全因爲他們是共和黨人，而是因爲其他的理由，譬如他們的學問，經驗和才幹。他們的參加，可以使舊金山會議所欲解決的問題，更能得到一個聰明的決定。

所以，和代表們十分接近的人士，極力否認羅斯福已經得到代表們的默契。如果他們不贊成羅斯福的計劃和任何協定，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他們在舊金山會議中，仍然可以完全自由地起來反對和批評。

這並不是說，共和黨人的參加舊金山會議準備跟羅斯福鬥。他們指出，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對於聯合國際合作謀得戰後集體安全的基本概念，沒有什麼根本上分歧的地方。

共和黨人說，他們關於這方面的政策，已明白規定於麥金納克憲章（Mackinac Charter），杜威競選前，且曾經黨領袖們的通過。他們又說，他們的政策比民主黨更顯明，提出亦更早些。

舊金山會議的爭論點的種子，以後或許要發芽生長，因為共和黨主張集體安全可以經由國際合作獲得，不必創立一個國際的國家，共和黨發言人又坦白自認，舊金山會議所欲討論的敦巴頓橡園計劃與共和黨立場之間，有「極大的距離」共和黨的主張，着重於正義，認為正義是和平的先決條件，而敦巴頓橡園的計劃，他們認為着重於武力。

如此看來，羅斯福總統所指派的共和黨代表，或許會起來全部的或局部的反對舊金山會議的任何條約和宣言。有一位共和黨的發言人曾說過，共和黨代表「忠實的反對派」，所以當他們在他們所假定欲去反對的一個黨的黨魁領導下的團體中服務時，天生就存在着不同的反對意見。

共和黨很清楚，許多其他國家的代表亦將出席舊金山會議。美國的外交關係操縱於羅斯福總統和民主黨之手，已逾十二年之久，所以在許多從外國來的代表們看來，共和黨人似乎是一個生客，甚而是一個危險的人物。如何消除這種誤解，和如何保持他們在下次登台時的聲望，無疑的是依靠於共和黨代表的努力了。

舊金山會議舉行前，共和黨領袖間曾有所會商，以決定他們的對策。

他們雖然堅調他們的代表是自由的，不受任何黨的約束，他們的參加會議，並不作為共和黨的發言人，所以並且擁有嗣任投票權。

總之，雖然共和黨參加舊金山會議，並不給予共和黨一個難題，但共和黨決不猶疑於利用任何機會，以便取得從舊金山會議中所產生的政治資本。民主黨的做法，亦將如此，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譯自紐約時報三月四日）

Academia Historica

四川省銀行

資本總額國幣四千萬元

營業要目

一：發展社會經濟
二：調濟全川金融
三：扶持特產運銷
四：促進生產建設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代理公庫　儲蓄　信託　倉庫

總行：重慶

分行：成都　自流井　內江

支行：南充　合川　綦江　璧山　榮昌　富順　隆昌　簡陽　雅安　眉山　樂山

辦事處：

電報掛號總分支行處均冠寶九六六號

重慶 湖南省銀行

專管匯兌業務

行處衆多　手續簡單　辦理迅捷　匯水低廉

—通匯地點—

湘贛浙粵桂黔各地

行址打鋼街二十八號

（電話四一六五八號）

輪渡公司 水上餐廳

請坐纜車到

英美大菜
俄式小吃
鮮奶土司
各種冷食
座位舒適
風景天然
全日服務

電話：二〇七一四

門市部：專售書報雜誌，糖果餅乾，鮮果滷味等物，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廣西

第二卷　第三期

中國民主同盟　陳啟天
在抗戰勝利聲中的緊急呼籲
中國民主同盟主席　魏闕變
在招待外籍記者席上的談話
民主政治與道德問題　余家菊
論人欲　孫寶毅
論國民精神建設　毅坦譯
協助杜魯門保衛羅斯福的理想　紹智譯
製造和平的技術　陶元珍
現代強國之必要條件
雪孫隨筆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國農民銀行

國民政府特許設立之

唯一農業金融機關

△收受各種存款儲蓄▽
△辦理各種農業放款▽
△承做國內各地匯款▽
△兼營信託保險業務▽

分支行處遍布全國

匯通銀行

實收資本叁仟萬圓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資力雄厚　信用卓著　作風穩健　服務週到

行址：民族路一一二〇號
行話電：四一八八七

華僑聯合銀行

本資僑華粹純

經營銀行業務

兼為華僑服務

服務項目

地址：林森路八十八號

一、代理收解款項
二、代理家庭生活費用
三、代理兒女升學事項
四、代辦投資企業事項
五、代辦旅運事項
六、代辦調查通訊事項

電話：四一二七六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同豐銀行

竭誠為社會服務

盡力謀顧客便利

地址：林森路三十六號
電話：四一二二三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國民主同盟

在抗戰勝利聲中的緊急呼籲

抗戰勝利了，國內一切更複雜更麻煩的問題都來了，我們怎麼辦？

假如我們在歡呼勝利的時候，能夠更冷靜一點，更理知一點，也許一切複雜的情形可能簡單化；也許一切麻煩的情形可能輕鬆化；否則不是不可能演變得更糾紛更嚴重的。

中國民主同盟，以及參加同盟的各黨派分子和個人，我們自來的主張是很明確的，自來的態度是很客觀的。我們不能承認任何方面的特殊利益，但我們也未嘗不承認任何方面的特殊情況可能在不違背國家民族利益的最高原則之下，各各求得其適當的發展。

毫無問題，我們堅決的要求民主，一切反民主的都是我們所不贊成的。毫無問題，我們要求一個完整的國家，凡一切可以製造分裂或引起內戰的姿態或措施，也是我們要堅決的排除的。

我們現在的口號是民主統一，和平建國。

如何實現這八個字，我們有下面的主張十條，我們深求全國的老百姓給我們以擁護，請你們說話，我們所提出的這些主張，是不是正是你們所要主張的？其次，我們要求國際的朋友給我們以批評，請你們說話，我們所提出的這些主張，是不是你們也覺得這是中華民國可能而合理的出路？再其次，我們要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同時也要求有土地有人民也有武裝的中國共產黨，對我們的主張給以充分的考慮，請你們說話，你們承不承認我們這些主張，正是代表着老百姓的呼聲，同時值得你們的共鳴和贊許？

我們承認國民黨對抗戰是盡了力的，同時我們承認共產黨也盡了力，但我們痛定思痛，我們更承認這八年以來直接或間接為抗戰而死了的一千萬到三千萬的人民，以及今日仍舊在飢餓線上嗷嗷待救的千千萬萬的人民，只有他們的功勞才是最主要的。今後一切的黨派只有專專為着人民才有光明的前途，我們現在正是以人民的名義向你們叫出熱烈的呼喊，請你們千萬不要忽視。

下面便是我們具體的主張：

一、我們反對十一月十二日召開的國民大會，但我們並不是在原則上不要國民大會，現在好了，我們可以在戰爭結束的一年內，在一切失地全部收復以後，修改國民大會的選舉法和組織法，在全國和諧的空氣中實行普選，回到南京的首都，共堂堂正正開我們全國人民所一致需要的國民大會，頒憲法，舉總統，成立憲法的政府！這個時期可能是明年的七七紀念日，也可能是明年的雙十節，但政府一到南京，即要積極的開始籌備，並需要有全國的各方面共同參加籌備。

二、我們主張政府以明令重申保障人民的一切基本自由，包括各黨各派的公開活動，並廢止一切在戰時不得已妨礙人民一切基本自由的法令與措施，包括特務，勞動營，以及一切束縛言論出版的檢查條例。

三、釋放一切政治犯和思想犯，惟貪污分子和漢奸不在釋放之列。

四、我們主張由政府召集一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的政治會議，解決當前一切緊急和重大的問題，包括產生在憲法政府成

Academia Historica

立以前的一個舉國一致的民主政府。

五、我們主張在政治會議中，組織一全國性的裁軍委員會，由有關各方面的高級將領充當委員，本公平的原則，將軍隊裁減到國防所必需的限度，過此人民即無負担的義務，並且應該以有限的財力，用於國家和平的建設。我們主張任何黨派不得有黨軍，軍事教育不能含有黨化的成分，一切軍隊只能屬於國家，只能用以保護人民。應該精訓精練使其名實相符的做到現代化。在舉國一致的民主政府實現的條件之下，一切軍令政令自然應該絕對的統一，但初步應該注意到人事的合理安排，使各有關方面心安理得。我們並主張政府應逐漸做到使軍人主軍文人主政的原則。

六、我們主張在政治會議中組織一收復地帶人事調整委員會，根據當地的實況及人民的要求，作人事上合理的調整，以避免黨派間的衝突。我們主張自省一級開始，加強各級的自治，實現中央與地方的均權，以促進地方事業與文化的發展。

七、我們主張切實注意經濟的復員，包括遷到後方工廠的復興新廠的建設，確定民營國營的標準，廢除戰時的統制與專賣政策，代以有計劃的適當措施。

八、我們主張切實注意收復區人民的生活予以有效的救濟，並扶助遷回收復區人民的復業。我們主張政府對各收復區在淪陷時所流通的貨幣，作一合理的收拾，其要點在使過去在淪陷區的人民不致陷於破產與無以為生。我們主張設立一收復區人民的產業登記委員會，對原有的業主予以切實的保障，並調解其糾紛。

九、我們主張政府在本年度準備復員的時間立予停止，在戰時所加於人民的過重負担，應即分別廢止。

十、關於最近對日的和平談判，我們主張政府應採取全國各方面的意見，並應邀請各抗日黨派的領袖出席此次和平會議。對敵人所取得的賠償，無論現款或實物，應全部用以救濟因抗戰遭受犧牲的人民，對抗戰更應特別優待。

三十四年八月十六日

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表方在招待外籍記者席上的談話

諸位先生：

今天本人代表中國民主同盟，邀請諸位先生來此談談，承諸位惠然光臨，實在感謝的很。

本人一向居住成都，很少機會來到重慶。今天能得在此與諸位先生聚會一堂，尤感欣幸。

中國民主同盟過去經過，歷來發表的綱領與主張，以及最近發表的宣言，想諸位先生大致都已瞭解。現在只簡單地再向諸位報告幾點。

第一點先說成立經過。中國民主同盟是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二月在重慶正式成立的。它本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以外的若干黨派的一種結合。（包括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第三黨，救國會，職教派，鄉建派。）我們一些發起人當時都是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的會員。因為國民黨與共產黨發生新四軍糾紛的事件，深深感到為促進抗戰勝利，實有全國團結的必要。但要推進全國團結，各黨派不可不先自行團結。同時又感到政治不民主，全國團結，抗戰勝利，必無可能。因此經過多度商討多次籌備之後，乃有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

本同盟成立以來，實受了不少的壓迫。為擴大基礎，加強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力量，去年九月曾經決議改組；把民主政團同盟改稱民主同盟了。從那時起，同盟中不屬任何其它黨派的盟員就更加加多起來了。

其次講到同盟的主張。我們的中心主張，如前所說，一向就是民主，團結，抗戰，三層。而其中尤以民主一層爲中心的中心。因爲我們相信：中國如不實行民主，任何政治問題，黨派問題，物價問題，抗戰問題，軍事問題，以及一切社會教育文化問題，必都不能圓滿解決。

民主同盟的產生本是一方應乎中國人民的需要，一切由於世界潮流的推動。我願意藉此鄭重告訴諸位：我們同盟的立場，不斷一向是以國家民族爲立場，也將永遠以國家民族爲立場；我們同盟的主張，不但一向有其超然獨立的主張，也就是永遠有其超然獨立的主張。同盟的以民主、團結、抗戰爲中心的主張，也就是由於這兩緣故。

除了原則以外，我們同盟目前的具體主張，也可向諸位先生分別說明幾點。這應該分兩方面來講。

先從消極方面來講。最主要的就是：第一，我們絕對反對國民黨與共產黨間發生內戰。我們這個反對的主要理由，至少可以舉出以下三點：

A、假使內戰擴大，試問對日戰爭將變成何種景象？就令日本最後總是要打敗的，但是不是要延長了時日？這豈但是中國的損失，增加了中國人民的犧牲，也增加了盟國人民的犧牲。

B、假使內戰擴大，必非短時所能收拾。其勢必至影響全世界的和平。即以一般生活而論，在此世界大通之日，一地如發生戰爭事變，它地也必無不受到間接影響之理。

C、中國抗戰已經八年，猶未能勝利結束；人民困苦久已不堪言狀。今又加以內戰，人民更何能堪？國家元氣的斲喪，更將伊於胡底？兵連禍結，國家政治要到那天才能走上正常軌道？

至於如何達到我們這個反對內戰的目的，我們當一面喚起全國人民的認識與力量，一面向內戰的雙方有力者陳說利害。同時我們也希望盟邦友人了解中國內情，能援助中國使此不幸事件得以消除。

第二、對於足堪引起內戰或使之擴大，甚至造成國內分裂的所謂將在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的國民大會，我們同樣堅決反對。我們這個反對的理由，本久已有所聲明。但似乎還未全爲各方人士所了解。現在也願再提要簡單解說幾句。

對於所謂召集國民大會，實施憲政，還政於民，民主同盟當然不但并非在原則上反對，而且在原則上并是所久盼使其實現。但爲求有利無害，對於所謂國民大會，却不能不問其眞不眞，却不能不問其能不能代表全國民意，它所決定是不是能爲全國大多數人民所接受。我們深信，所有這些，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必都是作不到的。從今日中國實情而論，將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的國民大會一定不會是眞的國民大會，一定不能代表全國民意，其所決定一定不能爲全國大多數人民所接受，其所謂還政於民之民，一定不會是全國大多數人民或全國大多數人民的代表。召集這樣的國民大會，豈不將徒造糾紛，而大有於國家？我們同盟既以國家民族爲立場，對於大有害於國家的舉動，如何能不堅決予以反對？

試拿國民大會代表來看。假使承認十年前所選的代表仍然有效，試問他如何能代表經過八年抗戰的今日的民意？十年前

Academia Historica

因未到年齡而無選舉被選舉權的人今日大半已到年齡，試問對於這些人的選舉被選舉權，今日是否可以完全抹殺不管？而況十年前的選舉本是國民黨一黨所包辦，其它黨派都無合法地位，決無自由競選的機會。這種選舉當然非今日在野黨派所能承認。又照原選舉法所規定，所有國民黨中央委員都為當然代表。諸位先生都是歐美先進民主國的人士，試問那一種民主國家有這樣專擅的制度？

假使不承認當代表繼續有效，而行辦理選舉，或於當代表之外加以補充，但在今日事實上又何能許可？今天，國土大半猶陷敵手；離十一月十二日，為時又僅有三月；在地區上，在時間上，如何能辦到全國普選？尤其人民基本權利，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身體、居住、通訊等自由，都還沒有獲得；所有在野黨派也都仍沒爭到合法地位，不能公開活動自由競選。人民不能普遍自由競選而產生的代表，怎能是代表全國民意的代表？以不能代表全國民意的代表組成的國民大會怎能是真的國民大會？由不是真的國民大會而講實施憲政，還政於民，怎能不被人疑為是有意的欺騙，目的所在，只在黨權專政的合法化？

因此種種，所以我們民主同盟，不能不喚起國民注意，促請當局覺悟，勿徒製造紛亂，遺大害於國家，自傷民族元氣；應即停止召集名實不副的國民大會，應即採行切實可行的過渡辦法。

這種切實可行的過渡辦法，也就是我們民主同盟對於目前政局的積極具體主張，根據我們的宣言，我願意總括舉出以下五點：

第一、即行容許人民享有思想，信仰，言論，出版，結社，身體，職業，居住，遷徙，通訊、教育、講學，等項自由權利。廢除一切現行妨礙人民此等自由權利的法令與設施

第二、即行容許各抗戰的政治黨派合法存在，公開活動。釋放一切愛國政治犯。

第三、召集包括各黨派代表以及無黨派的有力人士的政治會議，協商國家大計，訂定臨時施政綱領。

第四、改組政府為舉國一致的臨時性質的民主聯合政府，執行由政治會議擬定的施政綱領，籌備真正的國民大會的召集。

第五、加速集結全國力量，配合盟邦軍隊，積極對敵反攻，非至收復一切國土，迫敵人無條件投降，抗戰軍事絕不停止。

這五點都是除了在消極方面立即停止內戰，進而積極加強團結以外，目前政局上應行而且可行的救急辦法，萬萬不容緩的。至於民主同盟關於將來戰後立國的國策，除了實施進步的民主政治，保障世界的和平安全以外，我願意藉此機會更提出兩個根本原則來，告訴諸位。那就是：

一、對社會各階層都保障其應得權益，力圖階級諧調，防止階級鬥爭，而求社會的和平順遂地發展。

二、切實推進國家的現代化，普遍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準，致育水準，文化水準，以打破今日中國各方面的落後狀態。

今天我因為感到諸位的親切，很是興，話說得太多了，耗了諸位許多時間，很覺抱歉。諸位先生如有什麼問題，我們同人也當竭誠奉答。

最後還有一句話。過去諸位先生中有許多位對我們同盟，特別在消息報道上，有許多幫忙，我們總是衷心感謝的。以後仍望對我們有不斷的幫助。這不獨幫助了中國真民主的實現，并且會有大助於世界和平安全。謝謝！（民國卅四年八月三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民主政治與道德問題

陳啟天

政治是否需要道德？從來的政治理論家與政治實際家，對於這個問題，有幾種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說法。大要說來，不外以下四種：第一種說法，以為政治就是道德，故政治必須道德，甚至只須道德。這種說法，在我國可以儒家為代表。孔子說：「政者正也」，這即是說政治就是道德。又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這即是說政治必須道德，也只須道德。孔子以後的儒家，如孟荀等，均紹述孔子的說法，而演成一種「德治」或「人治」的政治理論。

第二種說法，以為政治就是罪惡，故不必問政治的道德或不道德，最好是不要政治。這種說法，在我國可以道家為代表。老子說：「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竽，」（按竽字原作夸誤，茲依韓非子改正，盜竽猶今言强盜頭。）這即是說政治就是罪惡。又說：「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聖人在天下，歙歙為天下渾其心，」這即是說政治由來是非淆亂，黑白顛倒，不必去問政治的道德或不道德。又說：「清靜為天下正，」「為無為則無不治，」「太上不知有之，」這即是說最好的政府是無政府，最好的政治是無政治。老子以後的道家，如莊子等，更推演這種說法，而成為一種「無為」或「無治」的政治理論。

第三種說法，以為政治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故政治與道德宜分為兩事，不可完全混同，也不可彼此參雜。這種說法，在西洋可以近代純粹政治學家為代表。在我國則先秦法家也有些近似。西洋近代純粹政治學家以及我國先秦法家多只專論純粹的政治問題，而不涉及道德問題。因此使政治學成為一種獨立的專門科學，而不完全附屬於倫理學或道德學；又使政治的內容不完全等於道德的內容，而各有其領域。我國先秦法家雖反對儒家的德治及人治，但其所主張的「法治，」實含有德治與人治在其中，不過不名為德治或人治而已。故先秦法家的政治理論，在大體上固不可說是道德的，也不可說是不道德的，只可說是「非道德的」。

第四種說法，以為政治根本無道德可言，故政治可以不要道德，不擇手段，不講道義。從前所謂政治陰謀及政治權術，現在所謂政治策略或「革命戰術，」都是「政治鬥爭」所必要的，至少也是政治鬥爭所難免的。這種說法，在我國可以鬼谷子為代表，在西洋可以馬凱維里的霸術為代表。從歷史上看來，許多政治實際家（請讀者注意，政治實際家與實際政治家大有分別。此只說政治實際家，並未說實際政治家。）多半相信這種說法，而非薄講求道德的政治理論家為無用的「書生」。近年世界各種新政治鬥爭理論，都澈底發揮這種說法，致政治完全與道德分離，非人所能堪。

以上所說第一說法與第四種說法完全相反，第二種說法與第三種說法大體相反，第一種說法與第二種說法局部相反，第一種說法與第三種說法局部相反。不過各種說法雖如此相反相異，却都從同一根據而來。所謂同一根據是什麼？即是以上各種說法都是根據專制政治來立論，不是根據民主政治來立論。

Academia Historica

原來政治的方式，可粗分爲專制政治與民主政治兩大類。無論是神主政治、族主政治、君主政治、軍主政治、都與民主政治根本不同，我們可以統稱爲專制政治。關於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在政治上的根本差異，已詳論於拙著「民主憲政論」，本篇不擬再贅。本篇所擬稍加研究的，是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在道德上的根本差異以後，然後可以評論以上各說的是非得失，然後可以斷言政治是否需要道德。

我們用道德的眼光來比較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即可發覺兩者在道德上的根本差異很大。簡單點說，民主政治是道德的政治，至少也是比較合於道德的政治。而專制政治無論爲何種方式，都是不道德的政治，至少也都是比較不合於道德的政治。一切專制政治，都有特權階級。此種特權階級，幾乎不多少視國家爲私產，而任其驕橫；視政治爲私事，而任其專橫；視人民爲私奴，而任其壓迫。苟人民不甘爲私奴，而欲過問政治，改造國家，則特權階級必立即斥爲「叛逆」，而肆意加以摧殘，小之難免於拘禁放逐之苦，大之難免於族誅黨錮之禍。特權階級如此看待國家，人民和政治，便無異於強盜了。所以我國古人斥歷史上專制政治的特權階級爲「竊國的大盜」，詳見莊子；而今世人也稱德意的特權階級爲「法西斯強盜」。

一切專制政治之所以不合於道德，可粗分爲三方面來講：第一從專制政治的本質上看，便根本不合於道德。道德的第一要義，在人與人間應具有一種公道或正義。然專制政治真不一方面將特權階級升至人之上，而自視爲超人，甚至自視爲神人；又一方面將一般人民壓在人之下，而視之爲奴隸，甚至視之爲「非人」。在超人與非人之間，毫無所謂公道與正義，只見「強者爲王」，「強權就是公理」而已。既以強權爲公理，則是以不道德爲道德。所以說專制政治的本質，根本不合於道德。第二從專制政治的手段上看，也根本不合於道德。一切專制政治的主要手段，都少不了暴力與陰謀。任何暴力無不殘忍，任何陰謀無不險惡。殘忍與險惡都顯然與道德衝突，不待多說。專制政治不但慣用殘忍的暴力與險惡的陰謀，以求維持其本身，而且迫使人民也不得不採用殘忍的暴力與險惡的陰謀，以求推翻專制。因此全國上下充滿着以暴力對付暴力，以陰謀對付陰謀的恐怖現象。因此政治完全鬬爭化，並完全間諜化，根本談不到道德。所好談道德的人，反多爲此種現象所犧牲。我國歷史上的大聖大賢如孔子孟子等，皆對於當時的專制政治束手無策，便是一個證明。所以杜甫有「自古聖賢多薄命」的歎嘆。專制政治既慣用暴力與陰謀，又鼓勵殘忍與險惡，所以說他的手段也根本不合於道德。第三從專制政治的假託理由上看，更根本不合於道德。專制政治的本質與手段，既均不合於道德，於是除使用暴力與陰謀外，又多想假託理由來掩飾其不道德，以求減少人民的反抗。從來專制政治掩飾其不道德的主要假託理由，不外以下三種：一是假託神聖，即專制政治自以爲其特權得之於「天命」，人民只有絕對服從，如不服從，則必有「天誅」隨之。其實所謂「天命」與「天誅」都不過是一種假託而已。二是假託法律，即特權階級自行定法律，而強迫人民遵守。如不遵守，則謂法律如此，應當嚴厲處罰。其實專制政治的所謂法律，多是保障特權階級自身利益的一種假託而已。三是假託道德，即以假仁假義，而掩飾罪惡，一而欺騙人民。特權階級也有時講道德，講仁義，而其實不過如莊子所說，「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而已。（按捐字猶言廢棄，利字猶言假借。）西洋有一名言說：「惡人的慈悲，也是殘忍的

Academia Historica

。」歷史上的一切專制政治，多非惡人莫辦，故我們也可以說特權階級口中的道德，也含有罪惡；偶爾的慈悲，也藏有殘忍。任何道德必須是眞的，而專制政治所假託的神聖、法律以及道德，都經成假的，都不過是「僞神」「僞法」和「僞善」。所以專制政治的各種假託理由，更根本不合於道德。

我們用道德的眼光去看專制政治，是如此的不合於道德，而用同一眼光來看民主政治如何。民主政治的第一原則，是承認全體國民都是國家的主人。政府應負的法律責任，人民尚且不得過問，自然更談不到政府應負的政治責任與道德責任了。而民主政治則可隨時課政府的責任，普遍包括法律的與政治的兩重責任，而道德的責任亦含在其中。所以說民主政治的方法也比較合於道德。

至在民主政治之下雖亦難免有假託理由，但最大的假託理由不能離開國家與人民。人民以國家主人的資格握有政治自由與政治權力，以直接或間接監督政治。人民已處於從前神所處的地位，自不再容許政府假託「僞神」來冒充民意。人民已直接或間接握有立法權，自不再容許政府假託「僞法」來欺騙民權。人民已是道德的最高裁判者，自不再容許政府假託一僞善」來欺騙人民。總之，民主政治下的政治理由，都要經過人民的直接政驗。如此，則任何純粹的假託理由，便不易取信於人民了。比較易於取信於人民的理由，必須是眞實的。眞實的理由，可以說是合於道德的理由。由這點看來，民主政治比較合於道德。

諺語云：「習俗移人，賢者不免。」這句話是指明社會環境對於個人道德也有相當關係。依我看來，在社會環境中普遍影響個人道德的因素，似乎莫過於政治環境。大學中「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這句話，即是說明政治環境對於人民的道德影響很大。堯舜時代的人民，與桀紂時代的人民，何以有仁暴的分別？並非由於

成，人民可經由議會手續以實行監督政府。如此，則政府的法律責任固非常分明，即政府的政治責任與道德責任也非常分明。專制政治固有時揭言對人民負責，但人民並不能對之課責，則其所謂負責，只是欺騙人民的一種口頭禪，甚至只是不許人民過問政治的一種擋箭牌。政府應負的法律責任，人民尚且不得過問，自然更談不到政府應負的政治責任與道德責任了。而民主政治則可隨時課政府的責任，普遍包括法律的與政治的兩重責任，而道德的責任亦含在其中。所以說民主政治的方法也比較合於道德。

Academia Historica

人性有改變，而實由於政治環境不同。即由於堯舜時代的人民，是處在「聖王政治」的環境之下，而桀紂時代的人民，則是處在「暴君政治」的環境之下，大有不同而已。聖王政治是我國儒家所提示的一種理想君主專制政治，除儒家所稱頌的古代聖王，如堯舜禹湯文武以外，秦漢以後二千年中，不再見有儒家所謂聖王，可見聖王在專制政治下非常難產。關於聖王政治與暴君政治的比較問題，不在本篇討論之列，本篇只藉以證明政治環境與於人民道德確有普遍影響而已。

政治環境既對於人民道德確有普遍影響，那末我們可進而研究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的環境對於人民道德的普遍影響有無差異。孟子說得好，「陷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但是可惜得很，從來的專制政治，多是「不仁而在高位」，仁則便很難在高位。因此專制政治多是播其惡於衆。多是壞勵天道德。在此種不道德的政治環境之下，人民不但相戒「莫談國事」，而且相戒「偵勿爲善。」結果，使得道德分裂爲三種畸形發展：第一種畸形發展，即特權階級的「官樣道德」。特權階級對於一般人民多是不講道德的，但他却强求一般人民對於特權階級遵守道德，以便保持特權階級的威嚴與利益。自己本身不講道德，却要他人講道德，這可稱爲「驅子道德」。第二種畸形發展，即一般人民的奴隸道德。特權階級以奴隸看待一般人民，而一般人民也不得不安分守己的甘心做奴隸。換句話說，即以做奴隸爲道德，故又可稱爲「奴隸道德」。第三種畸形發展，即少數智識分子的「畸人道德」。畸人的名詞，出於莊子。此種畸人深深感覺專制政治的環境，不過是「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語見莊子人間世）只有學「渾沌」，「不識是非，以與世俗處，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語見莊子天下篇）不問現世界的善惡，而在精神世界上去求逍遙。這即莊子一類道家所說畸人道德的一個要旨。以上三種畸形道德，第一種太缺乏眞實性，第二和第三種太缺乏積極性，都不能算是健全的道德。此外雖還有眞實的並積極的講求道德的歷代儒家，但又以專制的政治環境根本不適於道德的培養，也難有廣泛的影響。我國歷代專制帝王雖還有少數聖賢做民族道德的象徵，而於其死後倘以冷豬肉，但於其生前則莫不加以冷遇，甚或加以利用與摧殘，使其不易生存。因此少數聖賢的道德教訓，只成爲專制政治的一種諷刺，並不能根本改正專制政治。先哲云：「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愈謹，小人愈長」。這等話頭，從一方面看來，固是少數聖賢對於專制政治的一種感嘆；從又方面看來，也是專制政治對於少數聖賢的一種警告。故在專制政治之下，雖可產生少數聖賢，却不易增進一般人民的道德水準。一般人民多難於像少數聖賢一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易於隨着風氣轉，尤其易於隨着政治風氣轉。一般人民眼見專制政治摧殘好人，獎勵壞人，如何能鼓起勇氣來努力做好人呢？結果，只有好人變成壞人，壞人變成更壞了。如果好人不肯變壞，則除須能耐冷耐閑以外，還須能忍苦忍辱。稍一不能，則難免不爲專制政治所摧殘。由此說來，可知專制政治的環境，對於一般人民道德的普遍影響實在太壞。

至於民主政治的環境，對於一般人民道德的普遍影響，則與專制政治大大不同。民主政治的環境，可以說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和人人友愛的一種政治環境。在此種政治環境之下，一般人民的個人價值固可普遍提高，即一般人民的社會意識

Academia Historica

也可普遍增高。一般人民的個人價值何以能普遍提高呢？因為在民主政治環境之下，一般人民都易於感覺他們都是頂天立地的人，每個人都有其相當的價值，不再是奴隸，也不再是遺民或叛徒了。每個人意努力，則其個人價值的感覺愈大，同時對於人生意義的感覺也愈大。在專制環境下，只有少數特權階級感覺有個人價值。而在民主環境下，則多數人民以至全體人民都感覺有個人價值。在民主環境下，則多數人民以至全體人民都感覺有個人價值。所以說普遍提高了。個人價值的普遍提高，對於一般人民的道德修養是十種大鼓動力。有此大鼓動力，則一般人民易於進德。無此大鼓動力，則一般人民多難免流於自暴自棄。從前我國儒家講道德修養，也很知道提高個人價值的必要，故首先教人立志希聖希賢希天。不過用聖賢的理想，提高個人的價值，只有極少數的上智才辦得到。至於極大多數的一般人民，則難免望而却步。為極大多數的一般人民設想，自不宜懸格過高，希望個個人成為聖賢，而只求其勉力做一個人。要使一般人民都易於勉力做一個人，則須先用民主政治的環境，以普遍提高其個人價值。

又一般人民的社會意識何以能在民主政治環境之下普遍增進呢？因為民主政治承認人人平等，不在種族階級宗教職業與黨派上設立差別待遇，則人民不至因種族宗教職業與黨派等不同而生出社會意識的障礙。換句話說，民主政治易使一般人民產生超種族、超階級、超宗教、超職業、超黨派的社會意識。即國家意識。人人有了國家意識，然後不至因種族階級宗教職業與黨派等不同而衝突到絕對不能相容的地步。然後可以一面競爭，一面協作，一面共同致力於公共的目的。但在專制政治之下，則一般人民不許產生國家意識，其惟一原因，在專制政治特權階級為鞏固其地位起見，故意使一般人民的社會意識必大分裂為三種：（一）有少數人只有超國家的社會意識，可與而不可即；（二）又有少數人，只有反國家的社會意識，究全不合現代國家的需要；（三）又有多數人，只有小集團的社會意識，更完全不合現代國家的需要。如此分裂的社會意識，對於道德實在是一個大障礙。因為共同的社會意識，是道德實踐上的一個基礎。沒有道德的心理基礎，自不易有道德的實踐，尤其不易有一致的道德實踐。要一般人民有一致的道德實踐，必須使其先有共同的社會意識。要使一般人民具有共同的社會意識，只在賊「國家至上」是不夠的，尚須給以易於明瞭社會意識的政治環境。質言之，即須實行民主政治。實行民主政治以後，則一般人民感覺國家與他們有份，政治與他們有關，不患共同的社會意識不能普遍增進了。

由上說來，可知民主政治的環境，對於一般人民的道德影響，也比較專制政治好得多。

我們在上面用道德的眼光，比較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的差異，已經說得很詳細。依據此比較，我們可以得一結論，即民主政治比較合於道德，而專制政治則否。近代國家多用民主政治代替專制政治，這不但在政治上是一大進步，而在道德上也是一大進步，即由不道德的政治，進步到道德的政治。我們可以說，專制政治之所以遭人反對的重要理由之一，即以其太不道德。民主政治之所以受人歡迎的重要理由之一，即以其較合於道德。專制政治的不道德狀況，從前我國道家，如老莊等，已經批評得淋漓盡致，無以復加。但道家對於專制政治只有消極的批評，並無積極的主張。因此只能使人發生厭惡專制政治，逃避專制政治，而不能使人積極改造專制政治。道家學說可為隱士的避塵品，均不能成為政治的推進力，這是他的一個缺

Academia Historica

點。我國固有學術中澈底反對專制政治的，原只有道家一派，而道家學說也未能因反對專制政治。而提出民主政治的主張。結果，名爲逃避專制政治。而其實不過等於放任專制政治而已。

從前儒家認定政治需要道德，這本合於民主政治的要求。不過儒家雖有民本思想，也無民主政治的明白主張。只是苦口婆心的勸專制政治者要「愛民」，「爲政以德」，而不大知道專制政治的本質、手段以及假託理由，多是不道德的。向不道德的專制政治者，講道德，說仁義，自然格格不入，難生實效。雖然有些狡猾的專制政治者，貪讀儒家深明「君臣之義」，偶爾加以利用，以便粉飾太平，然而他們何嘗在政治上眞正實行道德呢！要在政治上眞正實行道德，必須先行改造政治制度，即必須用民主政治代替專制政治。這點道理，儒家不曾明白道出。由此可以說儒家學說雖有充分道德的政治理論，却無便於道德實踐的政治辦法。結果，不是與虎謀皮，便是衣虎以文繡，連「仁義聖智」也爲專制政治者竊去了。我們要相當實行儒家所說的道德政治，只有在民主政治之下才有可能。因爲政治上道德的基本要求，不外要人能開誠心，佈公道。而民主政治即是使人在政治上不得不開誠心，佈公道的惟一辦法。

民主政治既需要道德，則我國先秦法家與西洋近代純粹政治家，將政治與道德完全分離的說法，也須加以修正。固然政治問題不完全是道德問題，政治畢不可完全與道德學混同。但政治是人生的一個重要方面，總不能完全不講道德。如果完全不講道德，便是主張專制政治，而反對民主政治了。至於一般政治實際家以爲政治不講道德，只是在從前專制政治下養成的一種不良心習，不足與言現代政治，尤其不足與言民主政治，自用不着多批評。

我對於民主政治與道德問題的意見，還有一些，以爲篇幅所限，本篇只能暫止於此，容待另篇再談。

更正

本刊第二卷第二期「民主政治與人性問題」一文內所引「迫生不如無生」語句下小註「見莊子」，應作「墨子」，特此更正。

Academia Historica

論人欲

鏡蘭譯

（一）求生之欲：蕭彭浩爾之悲觀主義

人之生也，莫不有欲，而欲之最熾者，莫如生。欲蕭彭浩爾（A Schopenhauer）以求生之欲，爲萬物之本。

人當羸羸逸豫之時，求生之欲，尚不甚顯。迨至於疾病，羈苦，犯刑，其情始著。疾苦之人，宛轉於衽席之上。求醫服藥，終不見效。行乞之子，踉蹌於風塵之中，碌碌敗衣，亦不可得。枉法之奸，呼號於挺刃之下，斷筋絕骨，堅不肯承。當其呼天拾地，籲訴無門之際，自運者觀之，豈復有生人之樂哉。如此之生，不如其死，而終欲其生者，求生之欲，驅之使然也。豈惟人之而已，動物植物亦然。發鍾之牛，過堂而觳觫，向日之葵，隨光而俛仰，彼牛與葵也，豈嘗有德慧術知，足以辨別生樂死苦哉。亦求生之欲，有以使之然也。豈惟動物植物而已，物之無生者亦然。水之就下，火之炎上，比其既沛然莫之能御者，亦豈無故而然哉。其不變已之情，與人生者正似，以類推之，謂爲求生，亦無不可也。夫萬物森列，必有其本。而物之不齊有者，必非其本。其能爲其本者，必物之所同然。今求生之欲，爲萬物之所同然如此，此蕭氏以求生爲萬物之本之所以甚有理而可信也。

人之所欲，既莫甚於生，則凡可以遂其生者，將貪取而無厭。方其未得也，惟恐弗得，及其既得也，又懼復失。非特懼其復失也，又思有以益之。非特思有以益之也，復思有以更益之。顧事增華，種本加厲。人之一生，營營逐逐，未有不嘅嘆得失之無常者也。人之情，喜得而惡失。未得之前，既皇皇然不可終日。既得以後，又惴惴焉若有人乘其后。牽而不失矣，思益之念，旋復崩勃於中，而不可終日之情，輒又如故。古人有云，昔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此又人生所以苦多而樂少也。夫天下之最，惟有靈者可貴，而物之相克，亦以自殘者爲酷。今萬物之本，既唯是欲，則其量無窮，而不可貴，亦以同本相殘，而傷殘最甚。以欲克欲，如以水益水；其水滋多。此理之常，有必然者。昔者莊周，憫天下之人，溺於嗜欲，惑於貨財，故爲書汪洋自恣，而要歸於齊得喪，一寵辱。夫特寵辱，人之恆情也，豈言說所能齊而一之哉。此蕭氏所以又以人生爲痛苦，而以滅生爲解脫也。

（二）奪權之欲：尼采之超人主義

蕭氏謂人所欲，莫甚於生，而復以有生爲至苦，則是人之所好者，至苦也，此豈人情哉。故尼采（F.Nietzsche）非之曰，人之所欲固莫甚於生，而生之可欲，則在其足樂，世固未有惡樂，而好苦者也。美飲食，華衣服，軀堅策肥，此豪商大賈之樂也，彈琴弄棊，書古書法圖畫，客至而奪觀之，此士大夫之樂也。尋章摘句，以求一義之安，彈精竭慮，欲發人之未發，此經生學者之樂也。當其御華美以耀人，陳書畫以矜博，出新義以譁衆，亦徒知樂耳，豈有苦哉。雖然，凡此之樂，皆非至樂。天下有至樂，則權力是已。蓋人生之所以可樂，在於能役使。世之可役使者有二。其一曰物，其二曰人。能役使器物，以飽口耳之欲，此已足樂矣，而未爲至樂也，獨至以人役人，驅之如牛馬，視之如草芥，同是圓顱方趾之倫而吾以一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獨踞於其上，生殺予奪，惟吾所欲，斯時之樂，乃爲至樂。古之帝王，爭城奪地，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卒至國困民貧，而終不悔得者，彼豈不知戰爭之士，肝腦塗地，鴻鵠之民，形銷骨立爲可憐哉，亦欲凱旋奏捷，逞其淫威，彰表稱雄，壓其耳目之觀耳，故人生之可樂，莫甚於權。此尼采權力至樂之說也。

世日以降，文教大興。耶穌因之，更爲克己愛人之說。以詔天下。於是初民粗獷之氣，漸變而爲柔懦，隨順之情，日益增於消亡。此中古以來之風尚也。尼采不安，又大言曰，人之有強弱，猶物之有雄雌也。雄雌一鳴，羣物伏。猛虎在山，百獸震恐，與肉強食者，生物之通例也，人間何能自外耶。豪傑之士，智勇絕人，予取予求，無所不適。愛何時期，其權之所專有也。報怨除害，亦其責之所不可辭責也。世所稱克己愛人，廉靜退讓者，皆屬弱點世之說說。自存之謀計耳，宇內非大，孳生無窮，豪傑之士，亦惡用愛惜此不可勝計之愚而且弱者哉。故生人之中，凡有二類：其一曰主人，主人所遵者，曰主人之道德。其二曰奴隸，奴隸所守者，曰奴隸之道德。人類不欲自存則已，若欲自存，則必服膺主人之道德，而以超人自期，否則人類之衰亡，有必然而無疑者，非特柔懦而已也。此又尼采超人之說也。

（三）自由之欲：康德之理性主義與史賓羅沙之汎神主義

尼采之說，信壯美矣。然使彼其類而推之，亦將見其有不可通者。今使天下之人，無爲超人，其武健同，其殷勤同，其專己而拒人亦同，則人類之滅絕久矣。經今一二億存，其力亦將無所可用，甚且與無力等，何者，强弱者，相對之義，弱者既已絕跡，强者之力，亦無安所施乎。又況消長有時，盛衰無常。昔之高城勢要，今復窮荒不可終日，自古以來，何可勝道，然則人世權力，亦惡足恃哉。此尼采超人之說，與其權力至樂之說，所以亦未能爲定論也。康德（Kant）以理性爲人之所以異多而樂少者，以其亂於物也，[illegible]，以其亂於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見其高意深遠，輒超然有出塵之感。又遊名山大川，見其峯巒起伏，波瀾洪闊，亦憬然有萬物一體天地同流之思，然則我之與物，窮其本而論之，固未嘗爲二也。世之賢哲，能遺嗜欲之累，忘功名之私，獨其所留己者，仍扞格而不去，則是畛域猶隔，陰陽慘舒，尚弗同於天地也，豈非遺憾乎哉。故史賓諾沙（B. Spinoza）爲之言曰，我之與物，其本固一體也。我與萬物，情狀雖殊，而萬物莫不備於我，我亦無不在萬物之中也。譬之樹木，由一仁而兩荄，由兩荄而千枝萬葉。人見乎枝萬葉之扶疎也，遂忘其所自。而不知此千枝萬葉者，正彼一仁之所發。特習焉不察，遂不克知耳。虛舟不怒，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何者，無人我之見也。人誠知萬物之與我爲一體也，則繼續歸釋，無往非我，復何物我之分乎。左臂爲雞，吾因以求鳴夜，吾亦安時處順而已，更何敝此之隔乎，人生之所以痛苦者，以其有尊卑貴賤，得喪榮辱也。所以有尊卑貴賤得喪榮辱者，以其有物我彼此也。今吾畢此一切而空之，則吾處斯世，焉往而不逍遙徜徉，而豈有不自由之患哉。此史氏汎神主義所以能爲人解粘釋縛也。

人生而有欲，蕭氏之求生，禽獸之我（Animalstch）之欲也。尼采之奪權，無驗之我（Empirichts Jch）之欲也。康德言理性，智慧之我（Intellegib.les Jch）欲司命也。史氏言汎神，智慧之我，亦欲融化也。至於融化則人與神通大道周流，人生所能致力者，其庶乎盡矣。（完）

陶元珍

雲孫隨筆

梁任公新中國未來記中之預言

英人威爾斯（H. G. Wells）撰預言小說數種，所料多奇中，以此爲世所稱。蓋據事理推測，非有神術。昔梁任公先生於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亦嘗撰新中國未來記小說，預言其後六十年中事，雖僅撰成數回，而所期必者固多成事實。世乃鮮注意之，何任公之不幸也！

未來記預言之已驗者。一爲民國成立，一爲南京建都，一爲俄國革命，一爲匈牙利獨立。其輔辟即將完本實現者則爲孤樂賓之獨立。而未來記謂一九六二年值中國維新五十週年紀念，光復興歌，是年非適爲民國五十一年乎（未來記中之民國成立，在維新開始之後，一蹴而致其和，任公所不料，實際之民國成立，可即視爲未來記中之維新開始。）

預言之不驗者。一爲光緒帝還政於民，並被推爲第一任大統領。（未來記中之羅在田，即光緒帝）。羅爲愛新覺羅之省稱，在田爲愛新之叶音。）此所料，使帝不早死，未始不可實現，因帝之死，周旋遂盡全非。然辛亥革命之終結，乃係以和平方式移轉政權，是非全不中也。一爲民國成立之前，有南方各省之自治，而廣東自治在海方各省中又爲最先。此雖與後來事實不符，然辛亥革命，確係發自南方各省，而辛亥春廣州之役，

（未完接二十二頁）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論國民精神建設

余家菊

建國事業，可分物質，制度，精神三素，而三者則迭爲條件。即如物質建設，若無適當制度以爲其範型，無優良精神以爲其動力，則物質建設歸於徒勞。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言制度建設，須勿忘物質建設，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也。言制度建設，須勿忘精神建設，所謂「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賊民興，喪無日矣」。言精神建設不可不具物質條件，所謂「救死不暇，奚暇治禮義哉」！是明言其反面也。言精神建設不可不有制度以體現之，所謂「徒善不可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是明言善意與法制須相依而行也。故物質，制度，及精神三種其本建設，無輕重可分，無先後可別。今茲之論，結言其一端耳。

精神建設，必有所依據。或以依據於天帝之信仰，吾雖擁護之，而世或嫌其遠於人事。又或依據於先賢之教訓，吾亦雖護之，而世或疑其遠於己身。今日之時代，一個人人格覺醒之時代也。於任一事理，唯確見其眞，始承認爲眞；訴之於自心之判斷，而不決之於權威之指示。此文明進步之所賴，而無可違反者也。中國之文化，一尚自覺，重自立之文化也。進吾自進；止吾自止。「孔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一切皆自決，而不依賴外力，此傳統的主要傾向，吾人當欣然稟承者也。故宗教的傳播，先民教訓之啓示，吾人信其皆可收效於若干人民中，唯欲用作國民精神建設之依據，則奏功未必能宏。宗教本爲人生需要之一種，政治的主義，亦自有其時代的必要性，二者當可與國民的精神依據並行而不悖。今茲之論，無意有所軒輕於其間。

精神建設，究宜何所依據？厥有依據人類之自性而已。考之西歐，中古與近代劃界於文藝復興。文藝復興之表象，在古希臘文化之探究，而其骨髓則在人類自性之覺醒與發揚。故其生活，由中古式之依傍的，壓抑的，枯寂的，而變爲現代式之自主的，開創的，活潑的，愉快的。近代世界之開拓，社會之發展，與夫學術之進步，實以此發展自性之精神爲其根源。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吾人鑑於西歐之往事，建設國民精神亦宜基於人類自性之上，當無大過。孔子曰：道不遠人。人道決當建立於人性之上。一切文化之發展，固當源於人性之時當覺以教人。近代文藝復興亦標性善之旨，而謂：凡如自然者，皆爲善；一經人爲，便成惡。但西洋哲學，在古代則多注神於玄學，在中古則多注神於神學，在近代又多耗神於認識論。對於人性之觀察，多偏而不全，取而不純。如馬基亞維利與霍佈士等主性惡說者，固無論矣；即如持性善論之廣博，其識論亦偏於其端而未竟其緒。若實踐理性論之康德，其氣象又殿畫而不平易，降至進化論源所發現之主意論，其結果則有個己之伸張而無羣己之和協。用是西方危亡不安，國際國內，時起紛擾。此非人性覺醒之過，其咎乃在對於人性之認識不足不精，而其所發展宜導者，各有偏至，而未能中和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國史上，首先對人性作深刻之覺察者爲孔子。人見孔子罕言性命，便信子貢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其實所謂罕言與不可得聞者皆是比較之辭，非絕對之說。論語所記孔子言仁之語，實皆言性者也。特言性係就自然言之，言仁則係就當然言之而已；其實仁根源於性，即謂仁爲性之本質，亦復確當。故孔子之言仁，即孔子之論性。世儒不察，以爲孔子於性，祇有「性相近」一語，皆因於文字中，而不能直會其精神者也。側怛說難，了解亦不易；可爲長歎！

孔子所謂仁者，實意志與理智交融，理智與情感和合之狀態也；故超越之者，有「致中和」之說。孔子曰：仁者愛人。是言人性之感情作用也。又曰：力行近乎仁。是言人性之意志作用也。又曰：克己復禮爲仁。禮者，理性之具體表現也。克己者，統攝自身之行爲也。克己復禮，即統攝自身，使其行爲符理性也。是謂意志與理性交融，亦即實踐理性之謂。故仁爲智，情，意三者之中和狀態。偏於情者，其失也懦；偏於智者，其失也誣；偏於意者，其失也悍。三者之發展，互相融合而交相節制，乃能臻乎中和。人能中和，則世界清平。孔子自身之言語會通觀之，確實含孕中和思想之胚胎。而「允執厥中」一語，亦確爲孔子所稱道。故中和說，爲後儒所發揚，而非從儒所附會於孔子者。人性之發展，當期其中和。

孟子亦言執中，亦言權，權即思量之謂。但孟子所謂之中，多就客觀事理之適中而言，似未嘗言及主觀智情意之中和。雖客觀的中和實爲主觀的中和之所表現，但其未嘗着重主觀的中和，要爲一大特徵。蓋以孟子之根本精神在就人所謂者的仁義禮智四端而擴存擴充之。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分析人性，見此四種傾向，爲人性的主動力，足以統攝全身，但須就此四者而發展伸張之，內之則足以盡心知性，外之則足以利世利民。其說不惟條暢明晰，亦且活潑奮發，足振國民進取之氣，示國民以直道之途。皆乎世人所接受者，多爲荀子之性惡論。荀子之性惡論，謂人之有是四端，其本意乃謂不當順從其性，而當用人爲之力以統率之。故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之意義爲「人爲」。「人爲者，努力趨向也。人性之善者，正在此努力趨向之工夫也。若果然以爲人性惡，則「其善者」三字非明指「人爲之善者」乎？又將何以解之。蓋其人性之善即在人性本身有力趨向之作用，故荀子直謂之積習，謂潛化性。積習潛化，化內我化，皆所謂人爲，皆出於自性之向上作用。孟子所謂「操則存，捨則亡」者，皆謂人性之主宰於作用。

孟子於人性之主宰作用，分析爲四端。側隱之心，發自內之凝結力，所以黏合人己者也。羞惡之心，爲向上之推動力，所以使自己上達於當然之理則者也。辭讓之心，爲向內之約力，所以使自己不陵犯他人者也。是非之心，爲對事之判斷，所以使自身動應得合乎理則者也。側隱之心，近似西人所謂榮譽心（Honour），西人博愛；羞惡之心，近似西人所謂自由平等；是非之心，即西人所謂實踐理性。四者各爲一種力量，所以主宰其他之各種情感者也。若以之爲人性之原質而與其他情慾如飲食男女等並而等視之，則誤矣。世人正因不明此理，故謂四端可發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五端，氏六端，甚至謂仁義禮智四端可用廢，鄙，暴，母之四端以抗衡之。此皆泥於文字而未能領會孟子之真意者也。

中國人關於人性之認識，由孔子奠其基，孟子發其端；而確立國民精神之依據。則後儒僅少所發明。至宋代周濂溪主靜，程伊川主敬。程伊川常曰：進學在致知，涵養須用敬。其實能敬即能靜。程伊川曰：「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此心常敬，提持警覺，則妄念不生，雜念不起，獨照其間者，唯有靈明之覺，據理則以指導身心之活動。故周子曰：無欲則靜。又曰：循理則靜。程子教人主敬，而不持主靜說者，因能敬則此心提持得起，而非僻之念自然不起；若祇求虛靜，則祇是一種平鋪狀態，儘管晶瑩如明鏡，及至事物到來，還須拿起明鏡去照；不似主敬，先已將此明鏡高懸起來，事物到前，便立即攝映入內。主靜主覺之人，祇是事來即照，照過便了，完全過着被動的生活，事未來，以爲與已無關，成不值關注，而不去尋事來照，廢却探究工夫，遂取活動。事既來，一照即了，以爲不過如此，或本來如此，值不得斡旋，廢却有爲精神，利濟活動。是爲旁觀哲學，無足取焉。與孔孟精神，相去不能一間矣。

朱晦庵紹承程伊川而標榜居敬窮理兩大義。宣曰：「力行何如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祇是硬行；道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行地行」。此言人當依其所見之理以行也。王陽明曰：「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良知者，對於是非之判斷力也；天理者，究判斷之是非也；致良知者，將所判斷之是非付諸實踐也。故致良知即是實踐理性。朱子所謂窮，雖與人以實踐研討工夫之印象，而其整個精神，自亦不外於實踐理性。至於主靜主敬，則皆是所以使理性與意志相融合之方法，祇是主靜較富消極意味，而偏於去私欲攝雜念，主敬較富於積極意味，而常保警覺之態度，所謂「常惺惺」也。

朱王之學，爲歷史上一大公案，而就吾人觀之，則同是主張實踐理性者。所不同者，陽明主率性而行，未嘗指意於發育天性之方術，而唯事發育之鼓吹。朱子知理性之實踐，須用理性之啓發以匡導之，故重視知識之講求。吾人謂建立國民精神於人性之上，當然不輕視知識之發揚，因知識爲指導實行所必要，實爲吾人理性之所確認者，而追求知識，又出自人性之發活動，人皆有愛智之心也。

持朱王之說，以與孔孟比較，則孔孟言於情感，而朱王皆偏於理智。孔孟言愛人，直基於愛人之自性而實行愛人；朱王亦言愛人，特似以爲愛人行爲是理性之所肯定，故當實踐之。一則以情感爲原始的，一則以理性爲最高的。故孔孟之說，直捷，活潑，而平易近人；朱王之說，偏重呆板，而易入於冷漠。誠然，據中和之說，情感須爲理性所節制，不可過其太過不及；但情感本身自有其存在權，理性祇能指導之，而不能剝奪之。不似理學家以理性爲最高無上者，情感須受其審核許可而後能存在也。即如求生爲人之大欲，若將求生欲置於理性審核之下，則亦默認者之曰實目的意志，而視之爲根本煩惱。孔孟思想，最近人情，而又直率活潑，實爲吾人觀察人性時所宜當以自盛者。人性固爲人所認爲國民精神建設依據之所當在者也。

Academia Historica

協助杜魯門保衛羅斯福的理想！

羅斯福總統於四月十二日逝世的噩耗傳來的時候，大家除了痛悼的情緒以外，內心還有一種無可否認的隱藏着的担憂，就是恐怕沒有人能夠繼起完成羅斯福的偉大崇高的理想。這種担憂，就是副總統杜魯門也深深的感覺到。所以，當他依照憲法的程序，進入白宮執行總統的職務後，於四月十六日立即向參衆兩院聯席會議發表首次演說道：「我現在以深重的謙卑的心情，懇請美國全國人民予我協助，使我全國團結保衛羅斯福總統前以卓越的言辭所闡明的各種理想。我亦願告我美國同胞及全世界愛好平和及自由的人士，我將以我全部精力及整個心靈支持並保衛上述理想」。這次演說，一方面在表明他自己的担憂，希望全美國人民予以協助，另方面則在清除其他人士的担憂，後繼人是有決心繼起完成羅斯福的理想的。

杜魯門的堅定決心「我們是無猶懷疑的，他已經向全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士差不多以立誓式的語氣保證了。不過，他在執行羅斯福的理想的時候，其趨勢將「稍偏於右」罷了。華萊士的落選，和杜魯門的當選爲副總統，民主黨當局在當時或許「經過慮到羅斯福的康健問題，換句話說，杜魯門的作用根本就是在調和左右兩派，而採取不左不右的中庸之道。民主黨各派代表或許更形團結，這是我們可以推想得到的。除此以外，杜氏曾在國會共務達十年之久，自然易於博得國會的好感，換句話說，此後民黨可以避免過去羅斯福與國會的關係緊張的景象。根據上面的理由，我們可以預料到，杜魯門的執行羅斯福的理想，或許比羅斯福自己來執行，更能圓滑地易於進行些

但是，無論如何，羅斯福的去世，確給予美國和全世界一個不可補救的損失。因爲羅斯福實在是太偉大了。他的一生是一部奮鬥史。他雖是世家子弟，但勤奮過人，厭惡做一個「上層階級的寄生」。他開始政治生涯，便做了民主黨員，一個黨部美國紳士而做民主黨員，簡直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亦從此可以見出他的勇氣的不可限量。威爾遜當選總統後，他做海軍部次長，他就不顧一切的從事建設「強大海軍」，第一次歐洲大戰中，美國海軍所以能夠應付裕如，他的功勞最大。第一次歐洲大戰結束，他和威爾遜同返國內，他始終不移的爲國際聯盟的理想而奮鬥。一九二一年，他突患所謂小兒麻痺症，他就開始和他的殘疾奮鬥。邱吉爾曾對此表示無限的佩服：「羅斯福總統深受身體缺憾的累，但他仍能堅自支持，經歷全年的紛擾與艱困，此誠不能不謂爲奇蹟」。像他這樣身有殘疾的人，而能投身於艱險與不斷的政治糾紛之中的，千萬人中無一人，能作此嘗試，即屬千萬人中無一人，而能成功的。更屬「一代無雙」。對於政治生涯的艱險，邱吉爾知之最深，因爲他自己曾經歷驗過，所以他的恭維羅斯福的話，可以說是最爲確切適當了。一般替羅斯福做傳的作家，亦以這一點證明羅斯福的奮鬥精神，認爲他的一生中不知道所謂不能克服的事情。一九二八年發，他當選爲紐約州長，他就開始爲社會的進步和福利奮鬥，例如減輕農民賦稅，實施保護工程，和廣泛植林等等。一九二二年他當選爲總統，他就開始爲經濟大恐慌奮鬥，他鼓勵美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人民道：「我們唯一要怕的就是『怕』這個字」。他又向美國人民宣佈，他的政綱是「新政」。「新政」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一個胆大的嘗試，一開始便舉行了一套緊急措置，例如「緊急銀行法」，强令所有資金交予政府，對業務困難的金融機關予以援助，保障存款人資金，便利現金週轉等。此外有如農業調整案（穩定農村收入），聯邦担保法（使所有證券交易合乎法規），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聯邦緊急救濟處，緊急運輸法，公共事業局，工務促進處，商品信用公司和全國復興法。「新政」雖然引起了許多大金融財閥的不滿，全國復興法又由最高法院判決爲無效，但他終於把經濟的大危局挽救了。「新政」的一切緊急措置，嗣後一一擴充爲永久性的社會立法。「新政」的理論，終止無政府自由放任主義，而採取國家負責主義，嗣後亦逐漸爲各國所接受了。他很早就預見到歐洲和遠東的戰爭危機，一九三六年日德反共協定締結後，他就斷定這協定「名義上雖對蘇聯，但事實上是一個反對自由世界的法西斯聯盟」，他就準備美國參加國際舞台，並開始和國內的孤立派作熱烈的奮鬥。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芝加哥演說道：「欲避免此種混亂與不安局勢的波及，決非嚴守孤立與中立所能收效」，接着他勇敢的提出「疫病隔絕」的主張：「破壞法律的行爲是與傳染的疫症相似的，會蔓延全世界，有加無已。當疫病方興之際，社會人士固知贊同隔絕病人，以保護公共衛生，不受其傳染……」，他的意思無異是說，美國很難担保不被捲入戰爭漩渦，所以應該有所準備，而目前唯一可能的辦法，祇有明白表示其態度，或可使侵略國家不敢妄爲。一九三九年七月希特勒侵略計劃逐漸公開時，他要求國會廢止中立法的軍火禁運條例，不幸爲國會所拒絕。是年九月希特勒侵入波蘭，第二次歐洲大戰終於爆發，當下年四月德國侵入丹麥挪威後，他立即下令佔領格陵蘭與冰島，同時與國內孤立派奮鬥，爭取援助被侵略國的辦法。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他致國會咨文道：「美國當前最有貢獻而迫切的任務，就是將自己變爲一個民主國家進一自己復可爲友邦的兵工廠。……讓我們來向民主國家進一言：「我們美國人對於你們保衛自由的奮鬥異常關切，我們正以我們的精力，我們的資源，以及我們的組織力，來增加你們恢復和平維持自由世界的力量。我們將源源不絕的把許多船隻，飛機，坦克和大砲送給你們，這是我們的目的，也是我們的保證。」……」。當時，德國的氣燄不可一世，法國已經崩潰投降了，只有英國仍在艱苦單獨抗戰，羅斯福的保證，給予邱吉爾以無限的勇氣。是年六月，德國轉而進攻蘇聯，羅斯福立即聲明租借法適用於蘇聯，這亦給予史太林以十倍的後勝利的自信。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發生，美國開始直接對日德作戰，第二次歐洲大戰名符其實的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戰爭中間，羅斯福一方面領導所有人民和資源動員起來，爲進一步澈底動員起見，他曾提出國民服役法，但不幸尚未爲國會所接受，另一方則爲團結盟國和奠定戰後世界和平起見，不惜以老病之軀發表遠海外，終於在克里米亞會議返國後，因勞瘁過度，突得强度腦溢血症而溘然長逝了。一般人都說羅斯福在「工作中死去」，並非是過譽之詞。

他是言行合一的人，所以只有從他一生的奮鬥中，我們始可見出他的偉大崇高的理想究竟是些什麼，和對美國與全世界的價值何在。他的一生，就是他的理想的說明，而他的理想，就是他的行爲的指針。爲了使我們更清楚他的理想起見，我們所以很簡略的把他的一生在上面很賅要的敍說一番。

Academia Historica

他的理想和行爲，不但影響美國，並且影響全世界，所以他夠得上稱爲一個世界範圍的政治家。這樣一個政治家的理想，我們決不能用三言兩語來敍述它，不過，我們何嘗不可提綱挈領的歸納出幾個大原則。

他的最高理想是四大自由，他自己曾說：「我們預期世界的基礎，將建築在四種人類自由的重要因素上。第一是言論與發表的自由遍及世界各處。第二是宗教信仰自由，遍及世界各處。第三是生活需求的自由——這以世界立場來說，就是一種經濟的諒解，使居住在每一國家裏的人民，得到一種健全而和睦的生活，這也要遍及世界各處。第四是無所戒懼的自由……這以世界立場來說，就是全世界各國徹底地減縮軍備，使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侵略其鄰邦，這也要遍及世界各地。」

這四項高理想，應用於國內政方面，就是民主制度，但這民主制度是經濟民主的內容的，關於此，他曾說：「我曾提出我們所謂爲美國的經濟民權……這些經濟上的眞理，代表第二個民權法案。（第二項：權利法案指政治民權法案，作者附註）。在此法案之下，可以認爲一個人民，不論地位年齡或信仰，建立一個文化繁榮的新基礎。在這些權利中，最近被的……

（今年一月六日致國會咨文）。爲了使這些權利成爲事實，他又指出了許多革命美國應做的工作：第一，政府必須藉……經濟的平衡發展，以求社會分工業，這便是說使人民的需要和購買力適合（調水準），使其足以代替戰時政府的需要，（因爲在戰爭中達到了充分就業的程度，其最大原因是由於政府散買全國所能生產的一切作戰物資）。第二，必須增加出口貿易，使分就業的一種方法）。第三，盡量使倚賴私人企業，供給職位。（運用私人企業，便是根據自發有力的競爭，不致有獨佔和壟斷的不自然現象的發生）。第四，保證企業投資，爲小企業以及生產事業的擴充，獲得信貸。獲得資金。第五，新設施，新工廠和新設備，以擴充不時生產能力，同時也需要大量新費的支出，（這筆費用，除由私人資本適當正常投資路徑取得外，政府本身亦應担負一部分責任）。第六，大規模開發天然富源以及其他有用的公共工程，例如田納西河流域的經營，許多企業許多新的刺激。第七，充分利用民用航空，和所能作的汽車，建立民用的航空站，並整理全國公路網。第八，住宅建築。第九，城市新建設。第十，修理貧民工場。第十一，社會安全，衛生和教育計劃等。從羅斯福所指定的工作中，我們可以知道他所採取的政策是經濟擴展的，致呼負責的，和有全盤計劃性的。

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內容最高理想，若應用於國際方面，就是一九四一年元月六日，他在吉爾共同宣佈的大西洋宣言：「一我們所謂……建設……企圖領土的擴張或其他的擴張。二、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所同意的領土改變，兩國不願其實現。三、尊重各民族有決定其所願以生存的政權的權利。各民族中此種權利有被剝……兩國俱欲使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主政府。四、力使世界各國，不論大小，亦不論其爲戰勝者或戰敗者，對於貿易與原料的取得，均享受平等待遇。兩國對各國現有的組織亦當尊重。五、希望促使世界各國在經濟方面的各面

合作，以從所努力擴張，以消遙步，以確保安全。六、待納粹
專制宣告最後的毀滅後，希望可以實建和平，使各國俱能在其
國土以內安居樂業，並使全世界人類共享自由生活，無所恐懼
，亦不虞匱乏的保證。七、所有各民族應可在公海及太平洋自
由往來，不受阻礙。八、兩國相信，全球各國無論從實際上或
精神上的原因，必須放棄使用武力。因為國際間倘仍有國家繼
續使用陸海空軍備，在其本國境外實施侵略威脅，或有此可
能，則和平必難保持。兩國相信，在廣泛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
未建立之前，此等國家武備之解除，實屬必要。同時兩國當試
行一切切實的措置，以減少愛好和平各民族因軍備關係所忍受
的重大負担。」他和邱吉爾史大林間互相周旋時，始終堅持大
西洋原則，在克里米亞會議時的大西洋憲章的一個原則解決歐
洲被解放各國的政治問題，並重申對於大西洋憲章中諸原則的
信心，可說是羅斯福的勝利。關於大西洋憲章，雖然有許多人
提出批評，甚而有人認為沒有規定各民族所自決的政權必須是
民主政體，並且月前某強國的行為，顯與大西洋憲章的精神不
合，所以大西洋憲章與威爾斯和王號二國沉入海底去了，但平
情而論，大西洋憲章諸原則確具建立世界和平繁榮與民主的良
好目標。羅斯福自己曾比之為「十誡」，並且說：「大西洋憲
章的宣言，並沒有一些能夠應用於當今每一世界戰爭紛雜局面
的規章。自保事實。但是它能夠包含着我們所能企望的目標，
自不失為一個良好而有益的東西，為一個必需的東西。我們不
會誤錯，我們要利用我們的力量，而且在利用，憑人力上所
可能的以度來實現。」

於下實現四大自由，在美國本身講，除保護美國人民在大
戰中所受的民主信仰外，應該實施經濟民權法案，擴大生產
，擴大社會安全制度。參加國際政治，以及實施普遍軍事訓練
，因為羅斯福深知道「無強大的美國，世界無持久的和平」。為
了實現四大自由，在外交方面講，應該實現大西洋憲章諸原則
。而實現大西洋憲章諸原則的先決條件，第一是聯合國家的團
結一致，這不僅是為了作戰應當如此，就是為了作戰所決的勝
利也應當如此。第二是和平的獲得，這又包括了兩點：一是要
日無條件投降，關於德國。羅斯福曾說道：無條件投降，亦等
於納粹主義與納粹黨及其所有野蠻法律與制度的永終正寢，等
於消滅德國公私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所有軍國主義的影響，而於
納粹的戰爭罪犯 等於為一種迅速公正而嚴厲的懲罰，亦即等
於德國武裝的完全解除粉碎軍國主義及軍事裝備的毀滅，並火生產
的終止。所有武裝部隊的遣散，使得一再破壞世界和平的德國
參戰本部的永久解體。在德國侵略下，無辜被殺者所受的損失
，應照償賠償，無論工廠機器車輛及原料，皆須依照原物強迫
其償。吾人將避免再蹈上次大戰時的覆轍，要求德國所永不
能付清的金錢賠償，這的方式。吾人不欲德國人民陷於飢餓，
使成為世界其餘部的負累。何以我們要如此處置德國，羅
氏說得很明白：「吾人處置德國的目標甚為簡單，即欲獲致未
來世界的和平。吾人已有甚多經驗，將明德國如能保持或多或
少的力量能發動侵略戰時，此項目標即不能達到。」（今年三
月一日羅氏報告國會克里米亞會議經過）。關於日本，羅斯福
亦強調戰後加以防範：「吾人對於日本將亦似對於日本不許其
保有建立軍隊足以作戰的任何力量，且將加以監視，並將自各
委任統治島嶼的一地內，逐出其勢力。美國對於太平洋所有必
須防止日本侵略的各區，將接受委託制。（羅氏在最後一次招
待記者席上宣稱）。羅氏的目的，在使侵略者以後不能再起發

Academia Historica

創世界和平。二是世界永久和平的普遍國際機關的建立。因爲羅氏認爲「國際和平與福利，也和國家和平與福利一樣，須藉可以發揚光大的制度才能確保。」頓巴敦橡樹會議所通過的建議案，是創立上述制度的準備。這次舊金山會議則欲獲得一個具體的決定。所以羅氏對於此次舊金山會議寄以極大的希望，他說：「世界聯合國將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舊金山會議，吾人希望並預算得一具體的機構憲章，藉以維持世界和平，並使一切侵略勢力永久滅絕。」我們相信舊金山會議各國代表一定多少可以符合羅斯福的厚望，不然眞可以說對不起這位偉大的政治家！關於羅氏本人對於世界和平機構的理想，我們最好引證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的聲明，「吾人必須訂立計劃，成立包括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國際組織，以維持和平與安全，並藉國際合作，建立各國間保持和平與友好關係所必須的安全與福利條件。因此之故，吾人認爲此一組織應爲代表一切國家的機構，具有廣大責任，以促進國際合作。吾人又認爲該組織中必須設立一個委員會，由它代表一切國家的機構，每年選舉一次，其中必須包括四個大國，以及適當數目的其他國家。此一委員會將負責解決國際糾紛，並應付威脅和平的事件。此外尙應有一國際法庭，處理一切有理可述的糾紛。……吾人贊成成立有效的協議與辦法，俾各國能按其能力維持相當武力，以應防止戰爭的需要，使任何國家無法備戰。並於必要時，以此等武力從事聯合行動。吾人現對敵人一旦失敗，凡此等等，均屬可能實現。並應以有效措施，使彼等無法再行製造戰爭，然後和平世界的希望，即將繫於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之手。此等國家，無論大小，均須各按其能力，負擔責任，共同合作，以維持和平與安全」。在這聲明的背後，羅氏有一套一貫的理論，我們不能否認權力在世界政治中，一切國內政治中是一個因素，但是權和責必須連繫起來，而且必須在共利益和互善主義的範圍內，維護本身，使本身有價值。所以今後國際的基本問題，在強國的團結，不然一切無從談起，因爲強國所有權力足以左右國際政治，但強國如果只知權力，而不知有責任，這就是誤用權力，也才是眞正的所謂「強權政治」，我們就勢必再走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悲慘道路，強國如果明瞭自己的責任所在，則所謂勢力範圍等觀念，自然不致蔓延成長，羅氏在克里米亞會議經過報告中曾說道：「世界主要國家如不發展合作，共負解決可能危及世界和平問題的責任，則此種發展，或屬無可避免。」強國的責任如何呢？統而言之，一方面是本身以身作則發成民主作風，另方面是培養各國的民主力量。國家同個人一樣，未必視點相同，所以強國不應堅持己意，而須在互相諒解的空氣下，立下決心願與觀點與本國不盡相同的國家合作。羅氏曾說：「最後決定將常爲相互讓步與協調的結果。美國將不能永遠堅持實行其主張，蘇聯或英國亦然。」關於培養各國的民主力量，理由是很簡單，因爲任何國家，一旦民意可自由表現，強國即無責任的可言了，羅氏關於這個問題在今年一月致國會的咨文中說得很清楚，我們可以引錄於下：「我們對於流亡政府，對於地下軍領袖，以及對於那些比我們更受痛苦的盟邦，負有責任，雖然不一定是立法的責任。我們和我們的盟邦曾宣佈過，我們的目的在於尊重各個國族選擇如何生活的權利，並且要使那些喪失了主權和自治能力的國家重行恢復這種權利。但是由於國內政見的不和，由於若干被解放國的人民現在仍然是戰爭俘虜或被迫在德國做工，我們很難想像名民族實際需要的是那一種自治政府。在客觀條件允許各民族

Academia Historica

表示意志的時候以前，或過渡時期以內，我們和我們的盟邦有一種義務，……就是要一直利用我們的勢力，不使被解放國家的臨時當局，阻止人民運用自由選擇自由人能生活其間的政府和機構的權利。我們要使我們所相信的成爲合理，使我們所喜歡的領袖負責，而使我們所不喜歡的領袖不再負責，那是極容易的一件事。敵對方面的政黨運動，無論它是否爲人所諒解，對於我們的工作也沒有幫助。我們的目的在幫助歐洲愛好和平的人民，像我好的鄰人一樣，同住在一起，認識他們的共同利益，而不再孕育下彼此間的傳統的仇恨。」在三月在里沃會議預備報告中，又說道：「三國將致力促使過渡期內的各國當局能藉代表其全國人民中的一切民主分子」。由強國的民主作風，使各國民主勢力抬頭，如此之後，「民主和完全的世界安全制度，」才能建立起來。

總而言之，羅斯福的理想綜系如下：最高理想是四大自由，實施於美國是爲政治民主制度加上經濟民權法案，實施於世界是爲大西洋憲章原則，其基本條件是聯合國家組織和和平的澈底。和平的澈底又含有兩義，一是德日無條件投降，二是和平安全機構的建立。美國社界互相發生關係和影響，所以美國本身先須強大，而積極負起責任。假使我在上面對羅斯福的理想的分析大致不錯的話，我們就可見到美國新總統杜魯門的講言和所負担的任務是多麼的重大啊！全美人民應該協助他，全世界愛好自由和平的人民也應該協助他，庶幾可以達成世界普遍的自由，和平，安全，繁榮和民主！

雲孫隨筆

梁任公新中國未來記之預言

陶元

（續本期第十三面）實爲是秋武昌首義之先聲，又國民革命亦係以廣東爲基地，自向南北各省，特別廣東，之爲改革策源地，任公圖已見及成立，所料未悉誤也。一爲中俄戰爭。此由自俄戰後，日本取俄國在遠東之地位，而代之中國所急者爲日本，即庚子亂後日俄戰爭，任公之推測，仍可證爲是也。（未來記中之中俄戰爭，亦恰相合）。

建。南方各省，特別廣東，之爲改革策源地，任公圖已見及成立，所料未悉誤也。此亦與後來事實不符。然立憲黨人於民國之興發，並非無功。其間則亦不能謂任公之期望過政黨運動，參加民國軍，所息者爲日俄國在遠東之地位而代之中國，若以當前之中日戰爭，則在二十世紀前之俄國中國戰爭，則在二十世紀後日俄戰爭前之中日戰爭，而未來記中之中俄戰爭，亦恰相合）。

國際會議一萬國太平會議一萬國協會一萬國郵政聯合會，以後在實現，亦未可知。又國語言文字，商紐約時報一九六二年實行新的世界語，國際語言之可能。（三十四年四月六日大公報）是吾國語文普及世界，法國學院及

製造和平的技術

G.A.Craig 著
毅生譯

當美英蘇三國外長於一九四三年十月在莫斯科會議，簽訂所謂莫斯科宣言時，令人油然想起一世紀以前的同樣的景象。於一八一四年二月反對拿破崙戰爭仍在進行之際，英，奧，普，俄四國外相於三月一日開會於法國的喬蒙特（Chaumont），他們所簽訂的條約，從兩方面來看，實與莫斯科宣言有類似之處，第一，他們宣告他們的聯合軍事行動，直至完全擊敗敵人為止，第二，他們聲明為恢復與維持和平起見，他們願意在停戰後的時期內，繼續他們的聯盟。

喬蒙特條約的目的是在終止以前擾亂四強間關係的內部的不和，加強他們的聯盟，以便迅速推倒拿破崙和進行可實行的和平協定的談判。其目的之一，可算是達到了。因為在締結條約後的一個月內，把拿破崙推下了法國的皇位，但是四強間的完全一致，則卻有成為虛實。甚而在戰爭結束之前，新起的政治和領土問題，已經把盟國弄成分立了，當他們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到恢復歐洲和平的困難工作上面時，這些糾紛不時引起威脅，以推翻他們以前所有的努力。

雖然，自一九四三年十月會談後，並不令人發生莫斯科宣言和喬蒙特條約將有同樣的命運的感覺，但是今日聯合國的情形，並不和一八一四年的情形，竟無相像之處。這次大戰中各強國間早已發生糾紛了，並且勝利愈樂近，新的糾紛和新的緊張，亦將愈是層出不窮。

喬蒙特會議後的情形和今日聯合國的情形，互相比較，或許要引起若干人的異議，但是從另一方面說，這種比較却可以修正若干討論目前戰爭和未來和平的一個趨向。這個趨向為若干人所主張，他們認為我們面臨的情況是獨特的，參致過去的史跡，不但不必需，並且是危險的。其結果遂造成以下的現象，雖然近年來關於未來和平這個問題的書籍和文章，有如汗牛充棟，但是沒有一本和一篇真正通曉過去歷史經驗的教訓，使與交戰爭停止後的聯合國有所借鑑。

這種不顧過去的趨向是十分危險的。當然，這次戰爭時間來的許多問題，確是與過去完全不相同。但是所有的上期世界是全新的，至少有一個甚大問題已經麻煩了我們以前各代。這個基本問題就是製造和平的技術。在近代史中，我們有兩個先例，當時若干列強，締結聯盟，獲得勝利，想法把他們各自不同的和衝突的爭目的，完成為一個正式的和平協定。這兩個先例就是一八一四年和一九一九年。從那時和平製造者所應用的技術問題，以及他們採用的方法和程度中來研究，我們可以引出若干我們現時所需要的教訓。

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一五年在巴黎和維也納所舉行的和平協定，終止了拿破崙戰爭。在拿破崙推倒之前，參加大聯盟的各國對於他們所必需要達成的協定，大致早已發覺了目標。自從歐洲經過了二十年的兵連禍結，他們都希望恢復相當的和平與十八世紀的勢力平衡的安定。這是他們的和平目的，也就是使他們離開到最後一位模糊的希望。但當拿破崙的崩落迫在眼前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時候，他們也顯然是要某種方法以達成他們的目的。換句話說，就是要製造和平的程序。

大聯盟各國曾經因爲他們的這個有力的原則「勢力平衡」而對過去有所回顧，但是對於根據過去的經驗，以制定他們的製和平的程序，則不勝其躊躇。自一六八四年的魏斯特非利亞（Westphalia）和平之後，清算彭薩爾騷以上的戰爭的習慣工具，是召開正式的和平會議，而各強國對於這個工具的運用，並不完全滿意。

和平會議的缺點是很顯然的。即使在十七和十八世紀中，許多戰爭都可以因調整朝代的要求，而復到結束，但和平會議則時常會引起比它所能解決的更多的問題。這種會議亦時常會延期，雖然所欲從事清算的爭端已經成功解決了。我們不久就發覺了以下的事實，不論和平的願望是如何的一致，談判者在一規定地點是和一規定時期內面臨製造和平的問題時，就極難可以找出任何互相同意的共同基礎。在以前的會議，這種困難命從對外交儀式的熱烈爭論中，表現出來。一六九八年在關落魏克因爲爭論上席而致會議不能進行，一七一二年於烏脫列特，因同樣的爭論，而致於不得不移去會議室中的鏡子，恐怕有一個位置在它下面或面對着它，會造成外交上的上起。應校閱於和平會議的描寫，真可說是確切極了：「和平會議是普通會議的一種，所改變的是桌子應該圓的，還是方的，會議室應該門多，還是門少，全權代表的臉和背應該對着窗，還是不對着窗，其他代表接近他應該走前兩步，還是不到兩步，以及其他同樣重要的種種式式的問題，過去三世紀來就是這樣無聊的爭論着」。

關於儀式的爭論，在十七和十八世紀中，成爲一種談判的通常方式，這當然嚴重地減弱了會議的功效。而以前的會議，尚有一個更嚴重的缺點，就是沒有適當注意到事前的準備。雖然後來成爲一個通則，就是在正式談判之前，至少先締約一個休戰協定，但見在會議召開期中，戰爭仍在繼續着，並不是沒有過，所以時常因爲戰事的轉移而影響到談判。例如烏脫列特會議，就因爲但南恩之役，延長談判達幾個月之久。再者，在會議之前，很少準備談判時的立場，也很少事前預備一個開會時的議程。一七二一至二五年的康白蘭會議和一七二八至二九年的落松會議的失敗，可以歸咎於缺乏事前的適當準備，並且這是十八世紀的通常情形。

以上所說的製造和平的以前的經驗，當大聯盟各國想到他們自己的問題時，並沒有打算到影響他們。他們不希望把戰爭所引起的複雜的領土問題提到大會上來討論，因爲這將破壞勝利國間的聯盟。除此以外，他們又有一個自私的理由使他們不採用過去的程序，召開一個像霍斯特和奧斯奈勃倫克這樣的會議，勢必包括一批小國的代表，這批小國在製造和平時必將煩求同樣的發言權，一八一四年時，大國與小國之間的區別，並沒有清楚確立。雖然，在大聯盟各國看來，已經區別得十分清楚了，所以他們堅持必須加以區別。換句話說，英，俄，奧，普四國決定，如果和平成爲合理和健全的話，其條款必須由列強單獨決定，而在一個歐洲一般性的會議中未見得能夠這樣做。

所以四強的領袖，在當時企圖設計一個新的程序，他們把製造和平的經過分爲三個分明的階段，第一，勝利的聯盟國和法國締結一個和平協定，這個協定中包括關於法國疆界的處置，第二，聯盟國間的初步協定，商洽以前爲拿破崙所佔領的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地如何恢復，第三，等到以上三點完成後，再召集所有關係國家的歐洲一般性的會議，以批准聯盟國所已安排的決定。

不論方法上如何請求，這個程序是很難實現的。不久即發現，四強對於處置法國的條件，並不一致。並且，在拿破崙一定可以擊敗，以及擊敗的程度可以肯定以前，若干國家不願意把他們的確實的領土要求坦白說出來。頭腦有條理的漢姆鮑特（Wilhelm Von Humboldt）對於這個趨勢，曾加以痛切的評論，他於一八一四年二月給他們的妻子的信中說：「我完全同意把政治的討論儘量可能擱在一旁，是一種聰明之舉，因為這將妨礙軍事上的作戰。但是我很奇怪，用間道側進的方法，能否延長到太久，這問題系久必須要解決的。」

據魏勃斯特先生所指出，當時英國外相卡斯特蘭烈（Castlereagh）曾努力維持大聯盟的團結，並且促成若干關於未來和平的一致意見。在他的領導之下，聯盟國於一八一四年三月及喬蒙特集會，重申他們對於依復歐洲平衡的願望，並宣告為此目的他們繼續團結，不能等到拿破崙擊敗之日為止，並且要繼續到戰後三十年。同時，他們開始進行這件困難工作，就是誘協他們的領土目的，所以當拿破崙在二月後崩潰時，他們得以對於處置法國的疆界問題，獲得十個協定，是故在巴黎召開會議時，他們達到了他們的主要的目的，和他們的敵人簽訂了一個確定的和平。

但是關於該拿破崙所佔領的領土，如荷蘭、瑞士、則在喬蒙特和巴黎，都沒有獲得一個試驗的意見。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因為和平協定的成敗，完全依靠著怎樣解決斯特蘭烈堅持所有關於領土的問題必須要和一般性的會議商決定，一般性的會議不滿意，將已同意的計劃加以重新討論和批准而已。於五月，他邀請其他盟國遣派代表參加在倫敦召開的預備會議，他說：「所有的主要問題（可以）安排妥以待批准。」但是從這方面說，倫敦會議並沒有比以前的會議較為成功。

所以當列強於一八一四年十月赴維也納開會時，他們原定的程序計劃已經大部分破壞了。而一般性的大會在製造和平的程序中所居的重要地位，亦超過於他們起初所設計的。這對於四強是一件困窘的事。因為他們認為大會只是一個批准和相當無害的一個機構，所以他們沒有在事前決定其組織，其代表的權限和產生其決定的方法。法國外相塔列蘭（Talleyrand）曾指出，即使請求方法的英國，也沒有完全準備。但是這些問題必須要加以解決，並且急速解決，因為維也納塞滿了從小國來的政治家，使他們希望參加所有的討論。

當談判進行之際，維也納會議的程序問題，也隨之作暫時的處置。四強決定把最重要的問題保存在他們自己手裏，遂阻礙一個四強會議。這引起小國方面的批評的浪潮，這種批評的浪潮一部分由於強國的願意和他們商討較小的問題，一部分由於安排他們的代表參加討論次要問題的委員會，終算平靜了。但其結果，由於小國的陰謀，和塔列蘭的聯絡他們，使維也納的談判，糾紛百出。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由於列強在會議前，對於領土的問題，沒有得到一個初步的協定。俄國要求合併波蘭，普魯士要求合併薩遜，作為參加戰爭的報酬，這就引起其他列強的猜疑，不止一次的，甚而會演成聯盟國的公開破裂。當時和平製造者居然能夠完成他們的工作，實是一件奇異的事。他們所以能夠如此，只因為他們憑藉了一個巧妙的權宜之策。例如英國和奧國與他們以前的敵人（法國）簽訂一張秘密條約，用以來促

Academia Historica

俄國和普魯士減低他們的要求。

不管維也納會議的陰謀，混和糾紛，它實在給予了以後會議的借鏡。第一，它溶解了事前詳慎計劃的重要，對於協定的一般性質以及明確的大綱，勝利的列强之間必須要在事先獲得初步的一致。大聯盟的和平目的，太家同意是在抵禦勢力平衡，但是在談判開始趨向破裂之前，他們不能夠把這個觀念轉過爲正確的地理的條款。第二，維也納會議引起了一個他們沒有解決的問題，就是在製造和平的程序中，大國和小國之間的關係。第三，它給予了我們一個經驗，任何戰爭之後必然完全推翻現狀，所以製造和平者應該明白他們的工作是兩面的。恐怕維也納議會的最卓越的成就，就是把結束戰爭和簽訂和平這兩件事分開，即使拿破崙捲土重來，他們也能夠把這整程序分開。

當維也納會議召開時，與相權特涅曾說：「這個會議不能根據以前的方式，用不到什麼遠大的政治眼光，就可以見到這點了。以前稱爲會議的集會，其目的是解決二個或兩個以上的交戰國的爭端……這是一個和平條約的問題。但這次會議，和平早已締結了，各國會而時好像朋友，雖然他們的利益不相相同，但都希望共同合作，以結束和決定現在的條約。」他的話是對維也納會議的任務的一個十分正確的描寫，但是其言中之意是向以後的談判者提出一個警告，戰爭的問題與和平的問題必須要先開。

然而這個警告，我們大家知道，並沒有爲百年後傾復第一大戰後的和平的談判者所注意。在表面上，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爲什麼一九一九年對於這個和其他維也納會議的程序的教訓，引起這樣少的注意。參加巴黎會議的各國代表的專家們，會費很多功夫，研究以前的如何製造和平。以美國而論，密特威爾教授告訴我們，活斯上校曾仔細研究過去如爲脫列特和柏林等會議的程序。在柏林，魏勃斯特曾寫一本關於維也納會議的傑作，他並特意爲在巴黎的談判者而寫的，而國會議員亦曾評論所有十九世紀的製造和平的經驗，該書的名字叫做「國際會議」。可是這些寫作對於巴黎的協定發生很少的影響。其原因一部分是由於當時的輕蔑一舊式外交」，尤以美國代表爲最，由於輕蔑過去鼓勵和平製造者的原則，當然勢必隨之忽視他們的程序。當時有一個普遍的信仰，好像今日許多人所堅持的一樣，認爲由戰爭所引起的問題是太複雜——和太革命了，所以注意過去的經驗不能夠實際上有所貢獻於他們的解決問題。這種意見，美國代表米納說得最爲明白，他在一篇備忘錄中說道：「正在召開的和平會議與維也納會議，巴黎會議和柏林會議的理論上的相像，是應該從現在的實際情形和以前的各次會議時的情形的大大不相同這觀點上而說的。這次和平會議的任務是如此的重大，是如此的不相同於世界以前所面臨的任何事物，而其程序的先例是值得我們付以極大的注重的。」

米納的論點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一九一九年的和平製造者，在堅持他們所面對的工作是獨特和沒有先例這方面說，恐怕是走得太遠了。因爲其結果，他們對於一八一四年談判者所引起的三點，他們竟沒有加以適當的攷慮。雖然實質上接受了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爲和平的基礎，但盟國間秘密條約的存在，阻礙了關於領土問題的完全一致，而盟國亦失敗於掌握一個黃金機會，在和平談判開始以前，廢止這些條約。再者，他們也不比維也納代表們高明，以解決大國和小國的問題，甚而這個問題在一九一九年時比百年前更爲嚴重。最後，他們完全亂亂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結束戰爭的工作和締結一個一般的和平協定。

這些問題都應該在任何正式談判之前加以決定的。雖然休戰協定和一九一九年一月和會開幕之間，相隔了兩個月，其間曾有若干企圖以掌握這些問題。這二個月內的決定，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爲其對於最後的協定發生極大的影響。

這是法國代表團首先認眞攷慮到這個製造和平的技術問題。於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他們起草各種議事方案，並交給其他列强商討。法國的和平製造程序的概念大體相像於一八一四和一八一五年，在草案中直認維也納談判爲其先例。法國認爲應由簽訂休戰協定的列强決定一個初步的和平。克里蒙梭曾告訴斯上校，這祇須三個星期的時間就可以完成。這步程序完成以後，才可召集一個一般的大會，不但包括所有的小國，且要包括敵國。這個大會與德國肯定地簽訂和平，然後從事組織歐洲一般的協定的工作，並建立構以維持之。

法國的計劃有二個點。第一，把停止戰爭和建立新世界程序的基礎，明白地加以區別，第二，法國的計劃中有一項條款，規定所有在戰中締結的祕密條約於談判開始之前應即宣告無效，這項條款如能實施，眞能去掉會議的許多糾紛的主要來源。

以上所說的法國的計劃並沒有予以接受，因爲它遭遇到威爾遜總統的堅決反對。總統發覺在法國的建議案中含有反對十四點的計談。總統的懷疑似乎是完全正確的，因爲法國計劃中曾申言十四點不足爲和平談判的基礎，並且設法代替以其他原則，用以掩護法國的强硬的關稅政策。但是威爾遜反對法國計劃的全部，並自己沒有提出他自己的程序計劃，是一件不幸的事。他沒有這樣做，其意義就是說、巴黎會議被迫開始其議事，而沒有一個程序計劃來指導它。

雖然，大多數盟國政治家仍舊相信，大會之前將有一個初步的和平。但在談判開始前的時期中有兩個決定，把所有的這點希望也弄成暗淡了。盟國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曾會於倫敦，決定小國得遣派代表參加初步的和平會議。這決定的所以採取，一部分是由於美國不願意担認强國統制初步的協定。這個決定的全部含義，當時沒有認識清楚。但是很顯然的，一旦小國得以參加，他們的私自的要求，必然會耗費去很多時間，這些時間本來是可以用來專注意於和敵國製造和平這個問題上的，再者，因此之後，初步和平的性質和宗旨，亦將發生變化。

威爾遜總統於十二月抵達歐洲，並開始積極參加初步計劃。無可避免的對於會議的性質和宗旨會引起極大的變動。總統的主要興趣是國際聯盟，所以他立即申言起草這樣一個機構的盟約應該放在初步會議的議程的第一位。如果召開初步和平會議，同時亦召開一般的大會，那末討論國聯的適當地方應該是後者。堅持國聯的問題放在談判的首位，實在是很嚴重的把結束戰爭和組織和平這兩件事混亂了。頻克蘭曾說：「企圖把國聯嵌入初步和平，似乎將完全破滅初步和平」。可是，總統堅持他的意見，其他列强亦服從了他的願望。

所以，當巴黎會議召開以前，盟國沒有完成一個裝潢和平的簡明的技術。他們曾經討論過程序的問題，但沒有獲得肯定的結論，他們亦曾經在倫敦關於初步會議的參加國，作一個草率的決定，但沒有明瞭其邏輯的必然結果，並且在開始討論議程的問題時，他們已經把結束戰爭和建立永久和平這兩個問題混亂了。法國於一九一年一月曾再度提出一個程序計劃，在這

Academia Historica

計劃中明白說出，製造和平的第一個工作是和德國締結和平協定。但這個計劃 和法國其他的建議一樣，建築在為威爾遜所反對的暗礁上。

所以，在列強集會時，好像一八一四年時的情形一樣，許多主要問題都沒有解決，至於議事的程序，隨着談判的進行，而加以臨時的處置 列強自己組織一個小理事會，掌握決定最重大問題的權力，並且他們亦發現，當他們着手進行解決問題時，他們的不同意見大過於他們所曾想像到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如維也納會議時，他們不得不費去極多的時間，以回答不平的抗告和解決小國的糾紛。而小國會議中的地位，並沒有清楚予以確定。並且他們亦不得不憑藉於建立許多委員會，雖然他們沒有適當規定它們的功用或調整它們的活動。因為沒有一個詳細的議程，所以時常把完成初步和平的工作與最後協定的較廣泛的問題兩相混亂起來，最後由於他們的臨時對付所引起的複雜和糾紛，以及輿論界的急切希望和平的要求所困惱，談判者終於完全放棄了初步和平的計劃，而訂立了一個肯定的和命令的和平協定，這協定引起了近年來許多不滿的批評。

過去談判者的程序經驗，對於今日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有什麼關係？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很少的。今日有一個 般的認識，以為巴黎的和平製造者想在幾個月內尋出一個肯定的解決方案，而這些問題是不能夠迅速解決的，因為這種認識遂造成一種印象，以為在巴黎所採用的程序是不能應用於我們今日 尤其是以下一種議論，認為正式的和平會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種和平會議僅適合於全體戰爭以前的時代，而在今日，如果要獲得一個健全的和平製造，最先需要的是取消以下的觀念，以為和平製造是限定在某一時間和某一地點的單獨的歷史事件。史末資將軍論到巴黎和平協定時，曾明白這個意見，他說：「和平會議召開於一九一九年一月，閉幕於五月。在這個時期中，由於倒而解決真正的問題，以及低估其他問題，我們將要遭入比我們以前所曾經見到的更大的災難。」

卡爾先生曾建議了一個我們今日所應採取的程序，我們應該注重敵人的軍事的完全與清國其瓦解，我們應該對於敵人的領土，予以有效的控制，我們應該籌劃立時的救濟，和恢復解放區的工業，農業和商業，並而開始重建設的長期工作，最後，當這種工作正在進行之中，同時像新秩序這類的事物已經在形成之中，我們再給予這個新創造的情況以政治的形式。他說，這樣的和平製造的程序「是顧到事實的，因為今日世界的基本問題，是以經濟的名詞，表達出來的，並且政治處置的出現好像是一塊成功的經濟重建設的頂石，這種處置才有些少機會持久下去」。

卡爾的建議是把戰爭的問題與和平的問題過分地加以分開，其停點是改正最後一次和平的最大的錯誤。但是即使我們能夠依從這個建議，我們把政治的決定依從於經濟的恢復，是否是聰明之舉，還是不很明白。我們單獨以歐洲而論，我們於戰爭結束後，能否避免不談土地的劃定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如此做，勢必要增加淪陷各國解放後的自然而能隨之而來的不安寧。再者，疆界問題沒有解決的歐洲，經濟復興可以有多少的成就，是很難使我們相信的。

無論如何，我們現在似乎被迫在比卡爾所設想的和平製造程序的較早時期中，就要作肯定的政治決定。我們稍注意到歐洲的疆界，就更可證明而的決定的不上誤。但是至少有一個疆界問題，就是蘇波疆界的劃，現在已經引起有方和輿論界的討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論了，甚而美國內部亦因之引起了黨派之爭，在在指明儘早解決這類問題，愈是聰明。

有人曾指出，今日的情形相似於一八一四年的反拿破侖的盟國所面臨的情形。因爲如此，所以西方列强的領袖們愈是應該好好研究那時分裂盟國的疆界糾紛，和注意這些糾紛對於和平談判的有害的影響。愈是因爲今日的問題更是複雜，所以盟國對於所有這些主要問題愈是應該團結。聯合國雖然迄今爲止有許多文字的約定未來繫住，但是這些約定在性質上和語氣上與一八一四年的喬裝特條約同樣的籠統。如果過去的經驗沒有留給我們其他的教訓的話，但至少以下的一個教訓我們應該記取，就是在原則上的協定是不是憑藉的，尤其是談判者之間存在着意識上的根本不同，換句話說，協定愈是明瞭和愈是詳盡，則其成功的希望亦愈大。

再者，現在迫在聯合國面前的，除於領土和其他政治問題的決定，必然會影響到在戰中爲德國所征服各國的權利，所以大國和小國的問題，亦必然會發生。這次戰爭之後，大國與小國之間的距離比前更大了，車車作戰之責任必須由大國負起，那末製造和維持和平的責任也應該是屬於他們的。但是單以歐洲而論，持久的處置能否由三强主持實是一個疑問，因爲嚴格說起來，他們都不是歐洲國家。許多有名的寫作家最近曾指出，我們今日的主要問題之一是決定究竟小國在和平製造的程序中居什麼地位。除非在戰事結束前解決這個問題，不然其危險的複雜性或許要比在維也納和在巴黎時更甚。

最後，建立一個和製造的有效機關，在今日的重要性，一如在一八一四年和一九一九年時。即使我們承認正式和平會議的時代已經過去，並且在戰爭停止和成立最後和平之間將有極長的時間的間隔，但是我們仍須建立某種機構以便經常在這個時期中互相會面討論關於和平製造的各方面的問題。在維也納會議和在巴黎會議時這個機構就是指揮軍事作戰的機構，並與反拿破侖的戰爭會議就是維也納會議的指導機構，第一次大戰的最高戰爭會議也就是巴黎會議的指導機構。在這次戰爭中，則還沒有建立這樣的一個機構，使美英蘇的主要政治家們聚首一堂，經常接觸。

誠然，在莫斯科會議中，曾經決定設立一個歐洲顧問委員會，以研究由於戰事的發展所引起的各種問題，並聯合提出建議意見於三國政府。最近，又積極從事於建立戰後組織。不論如何，我們可以斷定，戰事結束後，在在亟需協調的行動，並且如果這種機構早已上軌道，也就愈是易於應付所以這是一個需要嚴重考慮的一個問題。但是最後分析起來這不過是我們展望和平所必須要解決的許多類似的技術問題中之一而已。

（譯一九四年九月耶魯評論）

Academia Historica

現代強國之必要條件

英 H. N. Hodson 著
智 譯

紹

「軍事及空中力量，高度的工業，廣大的人口，國家的統一——

美國故總統羅斯福於去年的聖誕夜曾對美國人民播講，他說如果英蘇中美四國保有巨大的軍事力量，共同密切合作以堅決維護世界和平，則將不致有任、侵略國崛起以掀起另一世界大戰的可能。但是他立即說下去以緩和這幅由四大強國支持世界的景象。他說，這四國必定要和歐洲，亞洲，非洲，美洲的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共同合作。我想每一個人凡信願一個有組織的國際制度的，也就是說，他不是一個單純的非戰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必然願意接受羅總統所提供的概略輪廓作爲戰後政治世界的必然而且必需的地圖。

如果和平要獲得保證，則世界將有兩大問題需待解決。這兩個問題就是四大強國如何密切的聯繫，以及他們如何與一切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共同合作。前者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條件，後者則是一個對一切大小國家公正而令其可以接受的和平的要件。如果大強國合小強國互相合作，互相了解，則他們間的差別必不致使任何人担憂。有些人說，大小國之間原是這種差別，從最大的國家到最小的國家，從最強的到最弱的，其間有一逐漸的傾斜，至於凡是堅持大強國的特殊地位的人只不過是要求較強的國家支配較弱的國家的權力。關於這些，我又要引羅總統的話。他說：「強者支配弱者的理論是我們敵人的理論，我們絕棄之。但是如果武力爲維護世界和平所必需，則國際武力將按其所需，盡其可能，加以運用，這是我們所同意的。」

我的信念是接受羅總統的提議，爲保持世界和平武力可以是必需的，我們始得擁受大國的概念，一個大強國，按我們的想法，是一個對任一強國，亦即對世界上的任一其他強國能夠運用足夠的武力並有必然成功的可能。大強國是世界艦隊中的主力艦。在戰前，常有很多討論在現代海軍中主力艦是否有價值的辯論。海軍專家們告訴我們說主力艦於和敵人的主力艦作戰中是必需的。如果我們的敵人有一支戰鬥艦，我們一定也要有。不然的話，無論小型艦隻作戰得多麼好，數量多麼大，在最後的戰鬥中，我們在大砲口徑、射程，和裝甲方面必然不及敵人而致吃虧。這便是在擊毀德國主力艦俾斯麥號以及意大利海軍投降後，擊沉德主力艦香薩斯脫號的重大意義之一部牠的擊沉就好像把歐陸敵人剪去了一支能夠作戰的艦隊。雖然首先發現香薩斯脫號並把牠擊傷的巡洋艦，最後把牠擊沉的巡洋艦和驅逐艦，但是能夠和他作決定性的戰鬥，並以相等的條件和牠作戰的只有主力艦約克公爵號。這就像大強國和小強國。只有一個大強國才能以相等的條件和另一大強國作戰，擊敗之，使之投降。所以。只要有一個大強國可能企圖破壞世界和平的危險存在一日，則其他的諸大強國必然有一個特殊的地位以及特殊的責任以維護和平。空軍力量及海軍作戰機械化的增長使得這點比以前更爲重要。昔日，一個勇敢而有決心的小國能

歷史報 Academia Historica

夠靠作戰技術和自我犧牲來防禦本國，抵抗大國，並在約異獲得勝利。小國間的聯盟，只要把他們的軍隊相合即可在戰爭中和大國匹敵，但是坦克和飛機改變了這切情形。三個大強國和一個小強國作戰，能夠立刻取得壓倒的空中優勢，並把該小國的城市，軍隊，交通擊成粉碎。他的裝甲部隊能夠鑽入敵人所線，擊破最英勇的抵抗。速度過於迅快，不為的避開過於巨大，因之小國即使有良好的作戰精神，但也缺乏作戰力量。海洋的遮蔽，世界很多小國的聯合陣線，不再是一個穩妥可靠的盾了。在歐洲，只有那有助於但不能爭得最後勝利的游擊戰，以及在山間堡壘中的戰爭，才能使一個小強國把他們對大強國的德意志的抵抗抵長到兩三個星期或僅止數日。當然，作為一個同盟國家，小強國對於和他同盟的大強國的力量有所增益，世可能有很大增益，如果他居於戰略的要衝的支配特殊的資源，但是如只靠本身，沒有旁的大強國的協助來對抗大強國，究好像用一根木頭來堵塞決了口的堤。

在一個如果沒有有效的武力以阻止戰爭，任何國家可能把入戰爭漩渦的世界中，一個國家或帝國要享有這種簡明而實際意義的頭銜「大強國（The Great Powers）」，必得要有四個條件。

第一、他必定要有配備現代武器的巨大的海陸空三方面的常備武力。和其他國家比較起來應該有多大，則視其地位而定：例如，一個島國或許可以有較小的陸軍，但一定要有較強於他國的海軍。在現代，沒有一個大國能夠沒有一個第一流的永久空軍。

第二、一個大強國必定要能支配足以供給其本身配備以外援的廣大而頻繁的原料和工業資源。在作戰機械化的時代，只有一個第一流的工業強國才能夠成為一個軍事力量的大強國

第三、每一個大強國必定要有足夠的人民以維持並運用其軍事與工業潛力。

最後，與前三者一樣的重要，他必定要在其人民間有精神上和政治上的統一。不然，其軍事、經濟、人力的力量必然像緊拉一件蹩蛀了的衣服以的裂成片片。這便是法國在一九四〇年從大強國的地位下降的原因，而法國之所以能重獲得其應得的大強國的地也只有靠了其精神與政治統一的恢復。

第一流的陸海空軍；第一流的工業力量；足夠的人口以及情感和目的之同一，是一個大強國的四個特性。這四點可能屬於一個國家或聯合或一大強國單位的數個國家。但是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意圖互相聯合成一聯合大強國，他們最大的必要條件是前述四個條件的最後一面——他們的不同民族間情感及目的之同一，那便是不列顛共和國內各民族的統一使他們合起來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強國，為了這原因，依我看來，對於將來，保持不列顛共和國的統一比構成任何一特別的組織以表現其統一並運用其合併的力量更為本中之本。因為世界上諸神目的和政治目的不統一，我們必得面向了權力的試驗，一家對一國，甚至聯合王國本身也不能夠毫不畏縮。在一個權力政治（Realpolitik）的世界——即使我們不能結成聯盟，定立條約，民族國家的世界必依然存在；在一個權力政治的世界，凡是不能度過巨大的權力試驗的國家就像拿著刀槍的人們面向互挾有槍砲的人們一樣。

我們值得把這些試驗應用於一兩個個別的國家來看看，如果他們現在不是個大強國，將來有沒有希望能夠成為個大強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他今印度來說：他有廣大的人口，以及可能建成一個第一流工業強國的資源，正像他已經極期望的上帝。在某些方面，他能夠利用這些資源造成一個巨大的軍事力量。但是他仍然必需以民主政治的方式獲得其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間的自由的和情感的根本上的統一。在他能夠保有擁他的地位，世界所需要他以他本身的力量成爲一個大強國的大陸軍，海軍和空軍之前，他還有一大段路要奮鬥。在他脫離和平與共和國之後，他必然以第二等強國的地位繼續一個長時間。

再攷慮到被擊敗後的日本。經過一九四一年的每一試驗，證明他是一個大強國，並使得他自己比從前更強有力，因爲補救了一個大缺點——缺乏對現代工業和現代戰爭所必需的某些經濟資源。但是在戰後，非但剝奪了他在這次戰爭中的佔領地，並且以前所陷佔的土地，他將居於一種什麼地位？現在還沒有肯定的答覆，因爲眞相如何要看我們如何處置戰後的幾個遠東問題——依我想來，比著德國和歐洲的問題更棘手，更充滿了命運之數。如果我們說——我想開羅宣言已經明白表示了——戰後的日本不再列於大強國的地位，對於保持我們的目的，我們應該採取比前剝削土地更多的步驟。

戰後中國是不是將成爲一個大強國？他有廣大的資源和廣大的人口。他對抵抗日本已表現了震驚世界的國家的統一，但是在擊敗日本後。他能不能保持那一個國家的統一？他能不能把他的經濟資源用以構成那維持現代戰爭力量，特別是他在抗日戰中最脆弱的空軍所不可少的複雜的現代工業？這些都是對整個未來世界的絕緊有重大關鍵的問題。

至於德國亦和日本一樣：防止他再度成爲一個大強國是不是一個實際的目的，如然，應該把他四項資產中的那一項予以剝奪：武裝軍隊，工業力量，人力還是國家的統一？如果我們對歐洲戰事迅速結束的希望付諸實現，這些問題必得要解決而且要迅速的解決。

以上即就前面成引的羅斯福總統對一個強國之合作，首先在大強國之間，繼之以與一切其他善良的人和國家的合作，以維持穩定而健全的世界，所作演詞的概括觀念，所發表的意見。（譯自British Diplomat VOLIN P.15）

避兵七載，雅興都消，甲申重九，懷園主人招飲渝

荆天隱閣有感

頃波

七年如夢此重陽，蜀水巴山共舉觴。別母每多千里淚，堪離常覺一身忙；
洗兵久盼回天術，救老翻疑負國腸。楚囚使君能愛我，不妨捌錄劉清狀。

附錄一

中國民主同盟對時局宣言

歷年來，本同盟為全國人民而發向國共兩黨暨政府，痛切呼籲。所祈求者，惟在中國之民主與團結。誠以八年抗戰，國人捐軀喪產，輟德流離，血汗犧牲，奚止千萬？所以前仆後繼，死而無怨者，原非為任何政黨，支持權利；而實為國家民族，爭取生存。倘使團結無望，民主不行，則抗戰之成果不保。或更於勝利在望之時，我竟演成內戰。過去犧牲，盡付東流，民族前途，寧堪想像？如必執小忿而滑大義；逞私鬥而忘公仇，則所謂領導抗戰，解救人民，於義安在？是不僅自毀其光榮之歷史；抑何詞以對我數萬萬支撐抗戰多災多難之同胞。此則國共兩黨，共有責任，而執政之黨，尤無可諉責者也。即如裝備新軍，充實兵員，在反攻前夕，本為必需，而國人聞知，則亦視為畏途。解放區，本作戰期中，本為事實；而外人不知，則且懷疑且憂。再觀倘雪境內，全國人之心情，乃懷懼內戰之爆發。此其關涉之深，倘堪言耶？數年來各地不幸之發生，既成不可挽救之事實。而導來陝北衝突，益引起人心之疑慮。紛紛不寧，勢且泛濫。不幸再遭破裂，試問何以善後。所以然者，即因國共未能及早實現之過也。況今波茨坦會議，已作最大決定。且準告日本，迫其無條件投降。今後對日戰爭，或迅速結束行。登陸中國以能日寇，屆期亦必更近。我乃倘若統一，何以配合作戰。問題G！5線機，（註）勢不得不遵用於中國。「解放區」而稱為非法，而國人之感想則如何。所以然者，亦祇由國共未能及早實現之過也。於以證明本同盟

屢年所呼籲，不特為全中國人民一致之迫求，更為世界盟友熱烈之期望，而時至今日，更有其刻不容緩者矣。此次六參政員延安之行，既作邁一步之斡旋；參政會對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之國民大會，亦尚未作硬性決定。然於促現民主團結，則決議仍屬空疏。今後打開政治僵局，必取團結實現之關鍵。所賴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政治性的會議能否重開。本同盟以緊迫時期，此間會議，實已產生重綱。應請政府體察時勢，體念民情，即早召集。惟團結之基本條件，在能實行民主。換言之，必行民主，而後方團結之可言，此為不移之理。執政當局有放棄專政，實現民主之誠心，尤賴於下列數點，立予實行，俾資耳目，俾稽信紙：

（一）確實保障人民身體、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遷徙、居住之充分自由。

（二）釋放一切愛國政治犯。

（三）撤廢取消一切特務，及兩個特務之法令及機構。

（四）承認各黨派公開活動之權

各刻內部，實行任何民主國家內，人民最基本之權利。政府果能實行民主，即宜立刻照辦。倘以明令宣示民人，并求有事實之表現。若此四事，行之非難，殊不必待任何會議決定之後，始能踏實而發之。然表示以誠意。茲舉數端，以期政治協商，召開上述之會議。本黨主張，以期內，迅速實現國一致政府之目的，以應民望，以利開國家，惟此改組後之國一致的政府，原仍為放棄專政，初步實現民主之過渡組織。中者於籌備民主憲政之各項事務，尤應在政治會商中，先求一致之協議。即交過渡政府，負責切實推進。俾在一定時限之內，扶持國家，步入民主常軌。本同盟祇主張真能代表民意之機關，得

Academia Historica

經過全國一致政府之決定而早日實現。凡不能反映今日全國輿論者，任何方面，有此措施，均所反對。所望各本互讓之精神，以奠共信之基礎，各以國家民族為重，慎無不可解釋之感。今日之事，不但國家興替，民族盛衰，繫於團結與民主。即世界之政黨與其個人之成敗榮辱亦將繫於是否團結，能否民主以為斷。能以全國人之心為心，全世界之歸趨，歸趨，則人心歸之，同情與之。否則不啻自走絕途。何去何從？切盼國共兩黨賢達，深長計之！尤望執政之黨，能審此義，而知所抉擇！至十一月十二日政府所擬召集之國民大會，本同盟曾有表示，不敢苟同。其將來國民代表之選舉，本同盟在原則上，贊取普選，且不放棄今年三月十日所發表之主張。其於以後政府應採取之民主設施，更不放棄去年九月十九日，及本年一月十五日之兩次宣言。此為本同盟不得已之立場，必求其能次第實現。特再鄭重宣言，所冀三人君子，共起圖之！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註）G—5組織，內容共分六組，前據中央社公佈：「在歐洲戰區，此項組織，涉及軍政與民政，在中國則只為軍政府」。但又稱：「此為最複雜之組織，職掌為管理美軍及中國人民，以及民用設備接洽之大部份之工作。」又稱：「此項組織之效用，頗難分析：：：然在此次華軍肅清敵軍佔領地，以重大代價克復之每碼土地或基地中，其所表現者尤多。」近據美新聞處七月二十五日美軍總部電則稱：「解放區對於軍事行動，有直接關係之短暫時間內，其民政事務，全由軍人處理。此在其他戰區，行之已久。一俟可能民選行政，即儘速移歸民政府管轄。」則已明言將與其他戰區相同，變軍政，此項組織之性質及作用可知矣。

附錄二

請先實現民主措施從速召集國民大會以保國結統一而利抗戰建國案（國大第十六號）

左參政員羅生等七人在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一次大會提

本年三月一日，　蔣主席曾於憲政實施協進會表示，將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本年五月，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復依據此項提示，作成決議。　蔣主席於本會此次大會開幕致詞，又表示與召集國民大會有關各項問題，政府願聽取本會同人之意見。凡此均足徵政府之懼重將事。本提案同人以此事關係國家前途甚大，曾就事實與理論多方考慮，認為必須先行實現民主措施，協調全國意見，始可再行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否則不僅於國事無益，且可能造成不必要之糾紛，甚或促成分裂，引起內戰，而影響八年抗戰以來全國軍民艱苦奮鬥所獲得之成果。謹將理由與辦法略舉於後，敬候

公決

理由：

一、國民大會召集之目的，在國民意為結束訓政，還政於民。但今日全國人民散居淪陷區及國民政府政令所不能達到之區域者，實居半數以上。還政於民之對象既不完整，即還政於民之目的無從實現。且此等人民對國民大會之代表既無法選舉，對憲草之意見亦無從表示。所法國以有三百萬被俘之人民不能參加選舉，即不能成立正式國會。今我有半數以上之人民無從選舉，乃就什麼，必須具有全國性之國民大會，在手續上實

Academia Historica

不大旅草率？

二、國民代表在二十五年間，選已滿大部分。當時各項選舉，係由國民黨一黨所主辦，其他黨派概未與聞。承認國民代表有效，但國民黨立場容有其事實上之需要，然反對舊代表仍如的，在國民黨之各黨派，亦自有其極堅強之理由。無論何種勉強辦法，決不能解決此一大難題。在國民黨之理論，國民大會之召集，本在還政於人民，并非還政於黨派，各黨派仍不參加，但亦無不可召集之理。但除國家制定一百年大計之憲法，除國民黨外乃不能得任何另一黨派之支持，此在憲政之基礎上實不十分妥當？

三、希望國民黨提早還政，實行憲政，此於吾人十餘年來之一貫主張，如在本會亦曾有提案。但吾人所要求者，為憲政之實質，決非憲政之空名。所期待者，在先有一適宜於憲政發展之民主環境，而不在一紙白紙黑字之憲法。各黨派之合法地位，至今未被承認，是人民尚無集會結社之自由也。目前尚有若干思想犯罪者，不之則入勞動營，大之則或突告失蹤，生死莫卜，是人民尚無生命安全之保障也。言論出版自由，迭經本會呼籲，月前雖號稱改善，但一切檢查機關仍得曲解條例，任意刪削，甚至將整篇原稿扣留，不予發還。亦不證明任何理由，是人民尚無言論之自由也。惟甘受和，惟白受采，環境之不適於憲政如此，政府不汲汲以圖改造，乃斤斤於國民大會之召集，憲政之制頒，實不近於本來創意？

四、目前之黨派形勢，除執政之國民黨為全國第一大黨外，其人數與實力次於國民黨者，則有中國共產黨。凡有所關家之重大措施，事前必求將各黨派間之協調，此本為一切民主國家之常軌。今國民黨既有於本年十二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之決定，中共除公開表示不能贊同外，已着手於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之籌備，并明其召集日期亦有在本年十一月十二日之聲義，故一旦實果不幸演至此，試問國家尚復成何景象？國民參政會本為抗戰發動以後之產物，政府召集此會之目的，在團結全國人才，合力從事對外，七年來吾人苦心孤詣，時與黨派分裂為憂，唯不遺餘力集話。亦所不惜。今如明召集國民大會，既有此事實上之困難，如吾人輕手性和，則是以參加團結始，而以促成分裂終，此實為吾人之政治立場所不許。大會同人之愛護國家，至心關懷，決不後人，為吾人所深信，對此一問題如何決定，吾人不能不期待本會同人作深思熟慮也。

茲擬辦法：

一、由政府正式承認各黨派之合法地位，並公開活動。

二、尊重人民之身體，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之基本自由，解除一切不合法及不適當之束縛。

三、由國民政府發表召集全國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所組織之政治會議，解決一切重大問題，包括政府改組，并重訂召集國民大會之時期與具體之辦法。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民國史料叢書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七輯

民憲半月刊(二)

全二冊定價：精裝 新臺幣五〇〇元 平裝 新臺幣四五〇元

發行人：潘　振　球
編　者：陳　正　茂
執行校印：朱　文　原
印行者：國　史　館
地　址：臺北縣新店市北宜路二段四〇六號
電　話：二一七一五六
郵撥帳號：一五一九五二一三八號
承印者：長　達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地　址：臺北市西園路二段五〇巷四弄二十一號
電　話：（〇二）三〇四〇四八八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57-00-6415-3（一套：精裝）
ISBN 957-00-6418-8（一套：平裝）
ISBN 957-00-6417-X（精裝）
ISBN 957-00-6420-X（平裝）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七輯, 民憲半月刊／陳正茂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史館, 民84

冊 ； 公分.—（民國史料叢書）

ISBN 957-00-6415-3（一套 ： 精裝）. — ISBN 957-00-6418-8（一套 ： 平裝）

1. 中國青年黨

576.23 84011688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Vol. VII

The Democracy Bi-Weekly

Edited by
Cheng-mao Chen

ACADEMIA HISTORICA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1995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